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六章（上）

2020年9月

目录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第六章

1945年-1949年

———————————————————————————

联合国以及世界人权宣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

联合国（法语：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缩写作 ONU；英语：United Nations，缩写作 UN 或 U.N.），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致力于促进各国在国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公民自由、政治自由、民主及实现持久世界和平方面的合作。联合国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取代国际联盟以防止战争的发生并为各国提供对话平台。联合国下设了许多附属机构以实现其宗旨。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市曼哈顿，并受到治外法权的约束。其他主要办事处设在日内瓦、内罗毕和维也纳。

到2018年中为止，联合国总共有193个会员国，包括除梵蒂冈城国以外所有无争议的主权国都是联合国会员国。在联合国遍布世界的办事处中，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通过全年举行定期会议来决定实体和行政议题。联合国由六大主要机构组成：联合国大会（主要的审议机构）、安理会（以决定对和平与安全的某些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协助促进国际经济和社会的合作和发展）、秘书处（为联合国提供所需的研究、资讯和设施）、国际法院（主要的司法机构）以及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当前没有运作）。其他重要的联合国机构还有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的行政首长是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的经费由会员国分摊和自愿捐赠。联合国现今有六种工作语文，分别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

历史

背景和建立（1945年—1947年）

在联合国建立的之前一个世纪，为了规制国家之间的冲突，许多国际协约组织和会议被建立起来，例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1899年及1907年海牙公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损失之后，巴黎和会宣布建立国际联盟以保证国家间的和谐相处。这一组织解决了一些领土争端，并在一些领域建立国际架构，例如邮政、航空、鸦片控制等，其中一些后来被吸纳进联合国的体系中。然而国际联盟对于殖民地（当时占世界人口的一半）的代表权不够，并且诸如美国、苏联、德国和日本在内的列强参与度亦不足。它无法阻止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入侵、纳粹德国的扩张、1935年的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1937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最终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创立一个新的世界性组织的最初完整构想可以追溯至1939年的美国国务院。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首先使用了“联合国”一词，用于描述同盟国家。1942年1月1日，26国政府签订《联合国共同宣言》，联合国一词得到首次正式使用。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召开，50国政府及诸多非政府机构参与并起草《联合国宪章》。1945年10月24日，当时的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法兰西共和国、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及多数其他签署国（46国）共同批准宪章，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

1946年1月6日，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51个国家代表出席）以及安理会在英国伦敦的卫理公会中央礼堂举行。大会选定纽约作为联合国总部，其设施于1952年完工。联合国总部同联合国在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的总部一样，被指定为国际领土。同时，大会还选举挪威外相特吕格韦·赖伊为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总部完工前，在纽约长岛成功湖畔的临时总部即开始运作，即便后来1971年曾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被迫自行退出，以及

1991年发生苏联解体，然而至今临时总部位址仍悬挂包括中华民国国旗和苏联国旗等五大创始常任理事国的国旗。

冷战时期（1947年—1991年）

虽然维持和平是联合国的主要权力和目的，但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立却时常导致联合国陷入瘫痪的境地，使其只能对冷战之外的冲突进行介入，例外之一是1950年的安理会决议，授权美国领导同盟军抵抗朝鲜对韩国挑衅行动的大规模反击；该决议在苏联代表缺席（因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排除在联合国外）的情况下通过。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分治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两年之后联合国官员拉尔夫·本奇调停此后造成的冲突。1956年，联合国第一支维和部队建立起来以应对第二次中东战争；然而，对于同时苏联在1956年革命后对匈牙利的入侵却无能为力。

1960年，联合国部署联合国刚果行动（UNOC）以维持叛乱的加丹加国的秩序，并在1964年将其归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治下，这是联合国早年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前往同叛军首领莫伊兹·冲伯会谈的途中，常被称为是联合国最高效的秘书长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在空难中身亡；几个月后他被追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64年，哈马舍尔德的继任者吴丹部署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维和任务。

20世纪60年代，随着去殖民化的发展，联合国迎来一批新的独立国家作为其会员；单在1960年就有17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其中有16个来自非洲。1971年10月25日，虽然遭到美国的反对，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控制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控制台湾的中华民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一投票也被视为是美国在联合国中影响力下降的一大信号。第三世界国家在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之下建立七十七国集团，这一集团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联合国中的一股主导力量。1975年，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之下推动通过决议，宣布锡安主义为种族主

义；1991年，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决议被废止。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积极活动和对中东、越南和克什米尔冲突的调停不力，使联合国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其次要目标——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上。到70年代，联合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预算要远远高于其维和预算。

冷战后（1991年至今）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维和方面有显著的扩展，在十年内的维和行动数量超过过去四十年。在1988年和2000年间，通过的安理会决议数量翻了超过一倍，维和的预算也增加超过十倍。联合国调停结束萨尔瓦多内战，成功进行纳米比亚的维和任务，并监督了南非种族隔离和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之后的民主选举。1991年，联合国授权美国领导的同盟军事行动，击退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1971年至1985年担任副秘书长的布莱恩·厄克特后来说这些行动的成功为联合国带来一种“虚假复兴”——在之后，联合国的任务变得更为艰难。

联合国宪章原本目的是阻止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进攻，但在90年代初联合国面临许多同时发生的严重国内危机，包括索马里、海地、莫桑比克和前南斯拉夫。在美国于摩加迪沙之战中损失惨重而撤出之后，联合国在索马里的行动被普遍认为是失败的；而联合国在波黑的行动则因为面对种族清洗显得任务不清和不果决而成为“世界的笑柄”。1994年，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在安理会无法决断的情况下没能对卢旺达大屠杀进行介入。

在冷战的最后数十年中，联合国受到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批评家的批评，被指管理不善和腐败。1984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停止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英国和新加坡也紧随其后。1992年至1996年在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对秘书处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精简了组织的规模。他的继任者科菲·安南（1997年-2006年在任）面对美国撤资的

威胁进行进一步的管理改革。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联合国授权的国际介入形式多样。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的任务得到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支持，而对阿富汗的入侵则由北约领衔。2003年，在安理会决议未能通过授权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入侵伊拉克，新一轮的对联合国是否有效的争论就此展开。在秘书长潘基文任下，联合国维和行动介入苏丹的达尔富尔冲突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基伍冲突，并派出观察员和化学武器核查人员前往叙利亚内战地区。2013年，对联合国于2009年在斯里兰卡内战末期的行动的内部审查表明，该组织遭遇“系统性的失败”。在2010年海地地震中，有101名联合国人员殉职，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损失。

机构体系

联合国系统建立于五大机构之上——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秘书处以及国际法院。第六个机构托管理事会在1994年最后一块托管领土帕劳独立之后已经停止运作。

五大机构中的四个都将总部设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国际法院的总部位于海牙，而其他专门机构的总部设在联合国驻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的办事处，剩余的联合国实体则分布在全球各地。联合国用于政府间会议和文件的六大语文分别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根据《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联合国及其机构在其进行运作的国家具有外交豁免权，由此保障联合国对东道国及成员国的公平公正。

下列六个主要机构，如琳达·法苏洛所说，是一个“各种实体和组织的奇妙结合，而他们有一些甚至比联合国本身还要老，并几乎完全独立于联合国进行运作。”这其中还包括专门机构、研究和培训机构、项目和基金以及其他联合国实体。

联合国主要机构

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成员国的合议性团体-

联合国秘书处- 联合国的行政机构 -

国际法院- 国际法的法院-

可以向成员国决议非强制性建议，或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建议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提议吸收新成员

审查预算

选举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成员、根据安理会提议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法院法官

一国一票。

行政支持其他联合国机关，例如组织会议、撰写报告与研究以及准备预算案

行政首长为联合国秘书长，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是联合国实际上的领导人。

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做出裁决及提供司法建议

15名法官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任期九年。以相对多数为原则进行裁决。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 国际安全问题 -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国际经济和社会问题 - 联合国托管理事会

- 管理托管地（暂停） -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联合国托管理事会

负责世界和平与安全

发表强制性决议

决定维和、禁运等

15个成员：5个具有否决权的永久成员及10个选举成员。

负责国与国之间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合作

协调联合国专门机构之间的合作

54个成员，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任期三年。

原先负责管理前国际联盟托管地

在其最后一个托管地（帕劳）于1994年获得独立之后停止运作。

大会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的主要合议性团体，包括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每年定期举行会议，但紧急会议亦可以召开。大会由一位主席（由成员国中产生，根据区域进行轮换）和21位副主席主持。第一次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

在伦敦西敏卫理公会中央礼堂召开，有51个国家的代表参会。

大会对于重要问题的投票需要到场且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重要问题的例子包括关于和平和安全的建议、主要机构的选举、接纳、暂停和开除会员，以及预算事宜。其他问题则由简单多数决定，每个国家只有一票。除预算事项外，通过的决议对于会员没有约束力。大会可以对联合国范围内的一切事项提出建议，但关于和平和安全的事项则属安全理事会考量。

决议草案由八个委员会进行讨论之后交付大会审议。这八个委员会分别是：

总务委员会 – 监督委员会，由大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会主席组成

全权证书委员会 – 负责确定各会员国代表的全权证书

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

第二委员会（经济和金融）

第三委员会（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

第四委员会（特殊政治和非殖民化）

第五委员会（行政和预算）

第六委员会（法务）

安全理事会

安全理事会的职责是维护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安全。联合国的其他主要机构只有对会员国提出“建议”的权利，而安理会则有权提出具有强制性的决议，在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下，会员国必须接受并履行。

安理会由15个会员国组成，其中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以及10个非常任理事国。其中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于安理会决议具有否决权，因此常任理事国能够阻止通过安理会决议，但无法阻止讨论。十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根据地域分配原则由大会从成员国中选出。安理会的主席每个月根据英文字母顺序进行轮换。

秘书处

联合国秘书处由秘书长主持，由来自全球的公务人员协助运作。它为联合国机构召开的会议提供研究、信息和设施，并根据安理会、大会、经社理事会和其他机构的指示进行工作。

秘书长是联合国的发言人和领导人。根据联合国宪章，这一职位是这一组织的“行政首长”。宪章第九十九条规定秘书长可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特吕格韦・赖伊之后的秘书长将之解读为为这一职位提供了在全球范围推动行动的机会。秘书长一职已经发展成为联合国管理者和会员国间争端及国际问题的调停者两项职责的结合。

秘书长在安理会（具有否决权）进行推荐之后由大会进行任命。这一职责没有具体的要求，但如今已形成惯例应有一至两个五年任期，应根据地区轮转任命，且不应来自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

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ICJ）位于荷兰海牙，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于1945年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起来，并在1946年作为常设国际法院的继承者开始运行。国际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任期9年，由大会任命，必须来自不同的国家。

国际法院的所在地是海牙的和平宫，与海牙国际法学院（私立国际法研究

中心）共享一座建筑。它的主要目的是对国家之间的争端进行裁决。法院开庭审理过战争罪行、非法国家干涉、种族清洗以及其他一些事宜。其他联合国机构可以请求国际法院提供司法建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在推动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及发展方面对大会进行协助。经社理事会有54个成员国，由大会选出，任期三年。主席同样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来自经社理事会中中等或较小的成员国。理事会每年7月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地点在纽约或是日内瓦。它的主要职责是收集信息、为会员国提供建议，与专门机构进行协调并提供建议。由于协调机构的职责较为宽泛，因此经社理事会时常被批评为不够集中及无关痛痒。

经社理事会的下属机构包括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为联合国机构就原住民问题提供建议）、联合国森林论坛（协调和推广可持续森林管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协调各机构间的信息收集）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协调联合国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推动可持续发展）。经社理事会同时还为非政府组织提供顾问权，至2004年，已经有超过2,200个组织获得了顾问地位。

专门机构

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可建立专门机构以履行其职责。最为人所知的机构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通过这些机构进行大部分的人道主义工作，其中包括大规模疫苗项目（通过WHO）来为全球人类消除疾病，提高全球的健康水平、防止饥荒和营养不良（通过WFP）、改善全球儿童的健康和生活质素（通过UNICEF）、以及保护难民（如联合国难民署）等。

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在各地设有办事处，以联合国办事范围分区，共五大区：非洲地区、美洲地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欧洲及中亚地区和中东地区：

非洲：在非洲联合国的两个主要活动中心是肯尼亚的内罗毕和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联合国系统的许多单位也设立了区域和国家办事处。

美洲：北美地区的活动中心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在南美地区的活动中心智利圣地亚哥是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所在。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中心泰国曼谷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所在地。

欧洲和中亚：主要活动中心分别是瑞士日内瓦和奥地利维也纳。两地都有联合国办事处（日内瓦办事处及维也纳办事处），日内瓦则是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所在地。

中东：主要活动中心黎巴嫩贝鲁特是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的总部所在地。

2011年7月14日南苏丹加入之后，目前联合国总共有193个会员国，包括除梵蒂冈之外所有未受争议的独立国家。

联合国宪章中对会员国做出了规定：

凡其他爱好和平之国家，接受本宪章所载之义务，经本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该项义务者，得为联合国会员国。

准许上述国家为联合国会员国，将由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推荐以决议行之。

——第二章第四条

此外，联合国大会中还有两个非会员观察员国家：圣座（对梵蒂冈拥有主权）和巴勒斯坦国。库克群岛和纽埃两国皆是同新西兰自由联合的国家，是多个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正式会员，秘书处承认它们的“完全缔约能力”。

七十七国集团

联合国中的七十七国集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松散联合，目标是促进其成员的共同经济利益和提升在联合国中的集体谈判能力。该集团最初由七十七个国家创立，但截至2013年11月其成员国数量已经扩展至133个。1964年6月15日，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正式宣布集团成立。1967年七十七国集团在阿尔及尔召开第一次重要会议，采纳了阿尔及尔宪章并建立了永久的制度基础。

语文

联合国共有六种工作语文，分别为阿拉伯文（以古兰经为基准）、中文（普通话、简体中文）、英文（牛津拼写之英国英语）、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联合国大会1973年将阿拉伯语列入工作语文。秘书处则使用英文和法文两种语文为工作语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则是除常任理事国外使用国家数最多的语文（阿拉伯语是26国的官方语言，西班牙语是20国的官方语言）。联合国创建后，1946年决议官方语文共有五种，在1973年增加了阿拉伯文。

联合国新闻部为联合国六种正式语文分别建立了语文日，庆祝多种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并促进六种正式语文在联合国的平等使用。每年，3月20日是联合国法文日，4月20日是联合国中文日，4月23日是联合国英文日和联合国西班牙文日，6月6日是联合国俄文日，12月18日是联合国阿拉伯文日。

经费

2019 – 2021年度前25大联合国会费缴纳国

会员国　　　贡献

（占联合国预算的百分比）

美国

22.000

中国

12.005

日本

8.564

德国

6.090

英国

4.567

法国

4.427

意大利

3.307

巴西

2.948

加拿大

2.734

俄罗斯

2.405

大韩民国

2.267

澳大利亚

2.210

西班牙

2.146

土耳其

1.371

荷兰

1.356

墨西哥

1.292

沙特阿拉伯

1.172

瑞士

1.151

阿根廷

0.915

瑞典

0.906

印度

0.834

比利时

0.821

波兰

0.802

阿尔及利亚

0.788

挪威

0.754

联合国机构通过成员国的会费与捐款这两种方式取得经费。联合国及其机构两年一度的财政预算来自各成员国的会费。联合国大会审查联合国的经

费，并确定各国应付的会费款额。各国的会费主要是依照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来决定的。会费由经常性预算、维和费用和国际法院费用三部分组成。联合国的特别专案不在常规经费预算之内，这些专案是通过成员国的捐款来运作的。捐款的很大部分是为所需要国家提供农产品，但主要还是资金的支援。

联合国大会确立的原则是，联合国不应该在经费上过度倚赖任何国家。为此每财政年度联合国的会费设有“封顶”价格，规定各成员国所付会费的最高价。2000年协定的部分规定，单个会员国的会费占经常性财政预算最高额度从原先的25%降低到22%，目前这是美国承担的经费额度，而其他所有成员国的会费则更低，下限为0．001％。联合国会费缴纳比例每三年修改一次，会费比额编制方法的制定依据支付能力、同时给予人均国民收入低的国家适当宽减的原则。2010年至2012年，每年的会费总额约25亿美元。

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凡拖欠本组织财政款项之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之数目时，即丧失其在大会投票权。大会如认拖欠原因，确由于该会员国无法控制之情形者，得准许该会员国投票。

人权

创立联合国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维护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与种族灭绝令国际社会认识到，新的国际组织必须防止在未来发生类似的事件。早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律框架，以讨论并回应有关侵犯人权方面的投诉。

《联合国宪章》要求其成员国尊重人权，并应为维护人权采取联合或单独行动。《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被联合国大会确认为是世界各国应该遵守的人权标准。联合国大会也经常就人权问题进行讨论。大会下属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内的人权机构，主要就人权问题进行调查并提供协助。

贡献

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在坚持与贯彻《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方面起到中心作用。联合国为一些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国家提供协助，包括监督与协助开展自由公平的选举、提高司法系统的品质、起草宪法、训练人权官员。联合国机构为全球的民主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联合国也支持妇女权益的提高。联合国组织从1985年起开始出现性别主流化的主张，用意之一就是鼓励妇女积极参加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

2005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意设立一个新的机构“联合国和平建设委员会”，以协助刚刚摆脱战乱的国家避免再度陷入冲突。

2006年3月9日，联合国举行仪式，正式启动中央紧急应对基金，为联合国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立即开展救援活动提供了资金保证。

（以下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论民主 关于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在法国巴黎夏乐宫通过的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联合国大会第217号决议，A/RES/217），共有30条。宣言起草的直接原因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是第一份在全球范围内表述所有人类都应该享有的权利的文件。

《世界人权宣言》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起包含在国际人权法案中。后两个公约都是在1966年通过。

《世界人权宣言》由1946年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副主席为中华民国籍的哲学家兼剧作家张彭春。联合国秘书长邀请了加拿大籍的法学专家约翰·彼得斯·汉弗莱主持了宣言的起草。

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列出一系有关人权之一般原则，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该文件于1948年12月10日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在出席的56个成员国中，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南斯拉夫、波兰、南非、捷克斯洛伐克和沙特阿拉伯），另有2国代表缺席。尽管汉弗莱是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但加拿大在最初对宣言的草稿的投票中弃权，但同意了最终稿。以下是1948年投了赞成票的国家：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缅甸联邦，加拿大，智利，中华民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丹麦，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危地马拉，海地，印度，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亚，巴基

斯坦，罗马尼亚，希腊，冰岛，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瑞典，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英国，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

《世界人权宣言》既包括了第一阶段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也包括了更进一步的第二阶段的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后，联合国在1966年通过两项人权公约，分别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两项公约列出基本人权和自由，并规定所有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各种适当措施，贯彻这些权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财产所有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也明确了部分权利的有条件性或者绝对性。比如，第四条允许缔约国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并且正式宣布社会

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减少原本应承担的义务，但减少的程度必须是客观需要前提下的最低限度，而且不得包括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第二十八条规定，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公约的实施。这两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一般被合称为“国际人权法案”。自1950年起，联合国把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维基百科）

《世界人权宣言》是人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它由来自世界各个地区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代表起草，于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会议上以第217A(III)号决议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的共同成就，第一次规定了基本人权应得到普遍保护。《世界人权宣言》已被翻译成近500种语言。

《世界人权宣言》全文

序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鉴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

要性，

因此现在，

大会，

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

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㈠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㈡ 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

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㈠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㈡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㈠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㈡ 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㈠ 人人有权享有国籍。

㈡ 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㈠ 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

㈡ 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㈢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㈠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㈡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㈠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㈡ 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㈠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

㈡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

㈢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㈠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㈡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

㈢ 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

㈣ 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㈠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㈡ 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㈠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㈡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㈢ 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㈠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㈡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㈠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㈡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㈢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

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____

世界人权宣言的作用和意义

二战以后的七八十年，是人类发展与繁荣的七八十年；在绝大多数国家中，经济都已经实现了很大的腾飞。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文化水平、物质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民主制度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传播。如今，在世上大多数国家内都已经建立起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经转型成为民主国家。在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现在只有很少的一些国家还不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

二战以后的七八十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民主制度的传播和建立，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相比于二战以前的时代，或是相比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在二战以后的世界中，尤

其是在过去二十年内，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是处于空前的繁荣时期。

在过去七八十年中，由于世界人权宣言的广泛影响与传播，“人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政治概念。在各个国家中，民主制度的伟大意义，常常与“人权”联系在一起。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的通过，对于民主制度的广泛传播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概念基础。

然而，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寻找理想与完美的目标的时候，就总是会在其中看到失望与败坏之事。虽然，世界人权宣言本身是好的，但是，其中却有一个最大的缺失与盲点之处，那就是，它忽视了人生命本质层面的罪性。如果在人的生命和心灵本质中是纯洁无罪的，是有着圣洁真挚信仰的，那么，基于世界人权宣言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中最完美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然而，正如本书中开宗明义所说的，所谓民主制度，是圣洁自由之民所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因而，当我们观察和反思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时候，就会轻易地看到，由于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中的罪性，民主不但不能够完全解决人类社会中的问题，反而，在某些条件下、某些范围中，反而会加剧人类社会中的问题与缺陷的严重性。

这些不好的问题与缺陷之处，首先是从西方社会自身内部所产生并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此，我们在下文中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反思。

===

西方国家现状与内部矛盾

上述五件重大历史事件，与其背后所代表的无数历史进程，以及相关的深远意义与影响，对于整个人类从古代的愚昧贫穷、生产力极度落后、战争动荡不惜的局面，进入到繁荣、和平、发展、进步的近现代时代，产生了决定性的、催生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些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作用下，现代科学技术产生了爆炸性的发展，现代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等架构相比于古代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了上述五件重大历史事件之外，过去几百年来，还有很多事件，例如法国大革命、德国社会变革、意大利社会变革、苏联解体、日本社会变革、印度等许许多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国家独立、东欧剧变、东亚现代化、等

等，也对于世界民主大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指出，在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艰难发展以后，虽然全世界在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今天，世界又仿佛走到了十字路口。

今天，在西方世界内部，在美国内部、英国内部、以及其他西方各个传统民主国家内部，正在衍生着愈来愈严重的内部分裂与矛盾。在全世界许多地区，虽然很多国家之间仍然在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但是，在人们内心中，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正在继续产生着、繁衍着许许多多的矛盾。

一方面，在很多西方先进国家的引领下，科学技术仍然在继续飞速地向前发展、进步，经济仍然在快速地前行，人们的财富、经济发荣景象仍然在不断地扩大、遍及许多国家地区。

另一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先进”国家中，正在处于一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在对外关系上，这些国家

与以穆斯利世界为代表的中东人口存在着深刻的撕裂关系。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中国、亚洲许多地区之间，也有着深刻的隔阂，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战争危险。

但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所处于的内部环境恶化、撕裂的严重局面，愈演愈烈。一方面，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仍然是主流的信仰。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中，仍然有着数量巨大的、信仰真诚、心态谦卑的基督徒们。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就平均状况而言，人们的信仰愈来愈缺乏敬虔热忱的情感；在人们的心中，普遍地流行泛滥着许多诡诈与欺谎；尤其严重的，就是所谓的"白左"现象。

所谓"白左"，即白人中左派的简称。在海外华人中，常以此称呼那些观念迂腐，缺乏真理、正义和常识，主张无原则的容忍主义，主张无原则的加税、平均主义、"政治正确"、乌托邦主义思想等等的，西方自由派政客、思想家、文人、演艺界人士、知识界人士、美国的左派激进民主党成员等。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许多范畴内，这些白左早已经登堂入室、占据主流、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令很多人深恶痛绝的程度。我们仅以美国内部国情为例，简要总结归纳。

在今天的美国主流媒体界（包括主要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例如纽约时

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等主要纸面媒体与新闻社，以及CNN，ABC，CBS，NBC等主要电视频道），以及美国主要的人文学术界（包括所有的常青藤大学，以及全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历史系、文学系、哲学系、法律系的教授们等等），文化界，出版界，硅谷科技界，等等，到处都充斥着左派、自由派、反保守主义、反传统、解构主义思想的主流势力。这些左派势力，往往是以无神主义为内核，以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劫富济贫为经济理念，大力地提倡同性恋合法化，毒品合法化，性解放，贬低信仰的价值，贬低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等等重要意义和价值，大力贬低基督教信仰传统价值、重要意义、历史积极作用，等等。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就会发现，这些白左们的思想，与历史上的三个人，即，马克思、达尔文、弗洛伊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们的深刻思想影响，很有渊源。马克思的思想代表了，经济上劫富济贫和平均主义、政治上阶级斗争、信仰上无神主义的深刻思想观念。达尔文的思想代表了，认为人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而是来自于自然的进化，并且不但如此，这个世界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达尔文思想为现代无神主义者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尽管，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有效的科学证据能够证明物种之间的进化。弗洛伊德的思想则为罪、性淫乱等等给出了貌似科学的、中性、"理性"的解释；正是在佛洛伊德为代表之思想所开的先河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的自由化、性解放、同性恋、双性恋、性与毒品泛滥与合法化等等主张，到处漫延，并且不断地撕裂西方主流社会观念，激化左派、右派之间的争斗，带来深刻矛盾与纷争。

==

+++

+++

+++

+++

+++

+++

+++

+++

++

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

启示录16章

1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圣所里发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　神烈怒的七碗倒在地上！”

2第一位天使去了，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性的毒疮，生在那些有兽的记号和拜兽像的人身上。

3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水就变成好象死人的血，海里的一切生物都

死了。

4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了血。5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

“今在昔在的圣者啊！

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

6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该受的。”

7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主啊！全能的 神，

你的审判真实、公义！”

8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太阳上，太阳就得了能力，可以用火烤人。9人被高热烧烤，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难的 神的名，并不悔改，把荣耀归给他。

10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为痛苦就咬自己的舌头。11他们又因为所受的痛苦和所生的疮，亵渎天上的 神，并不为自己所作的悔改。

12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为了要给那些从东方来的王预备道路。13我看见三个污灵，好象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14他们原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牠们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去，叫他们在全能 神的大日聚集作战。1516污灵就把众王聚集在一个地

方，希伯来话叫哈米吉多顿。

17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圣所的宝座上发出来，说："成了！"18于是有闪电、响声、雷轰和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19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它。20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21有大冰雹从天上落在人的身上，每块重约四十公斤。由于这冰雹的灾，人就亵渎 神，因为这灾太严重了。

启示录13章

1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有十角七头，十角上戴着十个皇冠，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2我所看见的兽，样子好象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柄，都交给了牠。3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但那致命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很惊奇，跟从那兽。4因为龙把权柄交给了兽，大家就拜龙，也拜兽，说："有谁可以跟这兽相比？有谁能与牠作战呢？"

5龙又给了那兽一张说夸大和亵渎话的嘴巴，也给了牠权柄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6兽就开口向 神说亵渎的话，亵渎他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7牠得了允许能跟圣徒作战，并且能胜过他们；又有权柄给了牠，可以管辖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国。8所有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没有记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羊羔之生命册上的，都要拜牠。

9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10如果人应该被俘掳，

就必被俘掳；

如果人应该被刀杀，

就必被刀杀。

在这里圣徒要有忍耐和信心！

11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牠有两个角，好象羊羔，说话好象龙。12牠在头一只兽面前，行使头一只兽的一切权柄。牠使全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受过致命伤而医好了的头一只兽。13牠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14牠得了能力，在头一只兽面前能行奇事，迷惑了住在地上的人，吩咐住在地上的人，要为那受过刀伤而还活着的兽做个像。15又有能力赐给牠，可以把气息给兽像，使兽像能够说话，并且能够杀害那些不拜兽像的人。16那从地里上来的兽，又要所有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由的和作奴隶的，都在右手或额上，给自己作个记号。17这记号就是兽的名字或兽名的数字，除了那有记号的，谁也不能买，谁也不能卖。18在这里要有智慧。有悟性的人，就让他计算兽的数字，因为这是人的数字，它的数字是六百六十六。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启示录16章 启示录13章】】】

亨利马太圣经注释简本

启示录

第十六章

第一位天使把碗倒在地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1-7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第五位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8-11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12-16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17-21节）。

V。1-7

我们应当祷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记述了，一系列的可怕灾祸、神的可畏惩罚与意旨安排。这些灾祸，映照了埃及的那些灾祸与惩罚。罪是相似的，因而惩罚也相似。全地，空中，海里，江河，城邑，都要因他们的罪孽而被毁灭。神的圣洁、公义和真实，是可称颂的。神的审判与惩罚，是何等可畏。那些逼迫属神圣徒和先知的恶人，他们将要落入永远的悲惨之境。

V。8-11

人的心如此罪恶，以致于他们在最严厉的惩罚面前也不知悔改；若没有神的特别恩典，所有人就都这样坠入灭亡之中了。地狱本身，里面就充满了亵渎神、憎恨神的人；若我们熟悉人类的历史、人的本性，熟悉圣经，熟知人的心，我们就会知道，当人越经受痛苦的时候，当人越清楚地看见神手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就常常越对神充满愤怒和憎恨。罪人们应当到基督这里来，悔改自己的罪，寻求圣灵的恩典；否则，他们就会带着这颗不谦卑、不悔改、绝望的心，承受永远的痛苦和恐惧了。黑暗是与智慧和知识相对立的；人的心在黑暗和罪恶之中，充满了愚妄和慌乱，他们敬拜偶像、跟随兽。他们丝毫没有欢乐和喜悦，而是内心充满煎熬和烦忧苦痛。

V。12-16

这或许是在表明，东方各国的民将要进入到基督的教会之中；道路已经为他们准备。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与基督为敌的敌人们，想要招聚力量，在毁灭之前作垂死的挣扎。神警告属他的百姓，将会有试炼和患难；神鼓励、激励他们，要为此预备好。

将会有极大的引诱和试探；因此，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呼召他的仆人们，要儆醒。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耶稣基督，主的荣耀，会突然临到，并审判世界。那是一切信从基督之人所喜乐地盼望的。

V。17-21

第七位、最后一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罪恶的世界、巴比伦彻底地倾倒了。属天的教会，看见而欢喜，得胜的喜悦充满他们。那些沉溺在罪中、自觉安稳的人有祸了。许多人为灾祸而亵渎神、憎恨神：即使是在最大的灾祸面前，他们也不愿意悔改、谦卑。人若在神的面前心地刚硬，在神的公义审判惩罚面前刚硬顽梗，那么，这就是清楚的记号，表明那人必将承受确定的、永远的、彻底的惩罚与毁灭。

亨利马太圣经注释简本

启示录

第十三章

从海里有一个兽出来；龙将自己的能力给了那兽（1-10节）。又有一个兽，两角如同羊羔，说话却像龙（11-15节）。它让众人都拜他，并在额上受印记（16-18节）。

V。1-10

使徒约翰站在岸边，看见一个恶兽从海里出来；这是一个残暴的、充满偶像罪污的、迫害人的势力；它的能力来自于前面的那龙。这是一个何等可恶可怕的怪兽！它似乎代表了那些属世的、逼迫人的统治；多少年来，甚至从巴比伦被掳时期，它就对神的百姓充满敌意。从那第一个兽开始，就欺压、逼迫义人；而义人们更受到但以理所述的第四个兽（罗马帝国）的压迫；他们用许多残酷的迫害来逼迫圣徒们。这些黑暗罪恶的权势是来自于那龙。这权势，是出于魔鬼，并被魔鬼支撑着。受伤的头，或许是代表那所废弃的偶像罪污；头被医好了，代表着偶像之罪又卷土重来；那虽然是新的形式，却是同样的罪，为满足魔鬼的恶计。世人崇拜权力、计谋和成功。他们归荣耀于魔鬼，并顺服于魔鬼的统治和伎俩。魔鬼使用卑鄙的能力和诡计，让人把本属于神的荣耀归于受造之物。然而，魔鬼的能力和成功是有限的、是被约束的。基督有属于他所拣选的余民，是被他的血所救赎的，记在他的生命册中，是有圣灵的封印的；虽然魔鬼和敌基督的势力能够胜过他们的身体，能够夺走他们的性命，但是，它们却不能够战胜他们的灵魂，不能够使真正的信从基督之人放弃他们的信仰，不能够使他们离弃救主、去和这些神的敌人同流合污。在这极大的患难试炼和试探引诱之中，他们仍然持守着福音的信仰，仍然持守在对真神的敬拜之中。那些患难和试探引诱，虽然使地上的人、除了神的选民以外，都顺服了魔鬼；然而，那些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却一直持守着贞德。这是何等大的鼓励，是何等大的激励；使我们能够始终如一地持守在基督里，忠心到底；这，就是整本《启示录》的主旨。

V。11-18

前面的那个兽，代表的是属世界的权柄；而这第二个兽，则是在虚伪信仰的外衣下，藏着同样的恶意、迫害和权力。它伪装着作出对人灵魂慈善的样子；它要在属灵的层面管辖人；它假装是出于基督的；它先是用温柔的方式和样子欺哄人；但是很快地，它就显出龙的本像。它所说的话，暴露出它的本像；从它的口中，说出虚假的教义和残酷的命令；显明它本属于龙，而不是属于羔羊。它行使前面那只兽的所有权力。它包含着前面那只兽的所有恶意；即，使人偏离对真神的敬拜，使人离弃神，使人的灵魂顺服在罪恶的意愿和控制之下。这第二只兽，用诡计使人敬拜那死伤医好后的头一个兽。它把欺哄人的希奇之事，伪装成神迹。它迫害、杀死那些不拜兽像的人。它使那些所有拜兽的人都受印记；而且只有这些人才能作买卖，得属世的利益。他们要给那个受伤还活的兽做一个兽像，并且要俯伏敬拜在它的脚前，顺服于它的罪恶与命令，顺服于这恶兽的品性。这里给出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是666。这个数目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没有明言；但是，我们若有属神的智慧、知识，就会明白，神的任何敌人都已经被数算过、都已经被标出印记，即将被毁灭；他们罪恶的权势即将转瞬即逝；万国都将要俯伏于我们公义与和平之君的宝座前。

+++
+++
+++
+++
+++
+++
+++
+++
++

==

反思在民主起源历史中的五件重要事件的本质、影响与意义，正确与缺失之处

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世界范围中发展的进程，是一个漫长、曲折、远远还没有结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正如本文上面所述的五个重要里程碑事件。在这五个事件中，十三世纪英国大宪章的通过，是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第一道曙光。十七世纪的五月花号事件与英国光荣革命，则预示了民主制度在英国和美国将要生根发芽、成长结果。二十世纪的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则代表了民主制度将要在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

其中，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都是对于二战中希特勒法西斯所代表的专制主义思想的针对性反应。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都集中地反映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些严重错误思想的结果。这些错误的思想，集中性地体现在以德国等国家的思想学术界为代表的许多社会人文哲学观念体系中。在这些社会人文观念体系中，在

信仰上以泛神主义【即，否认上帝是能听、能看、能言的；把上帝仅仅看作是世界本身，或是无知无觉的一种因果关系、能量等等】、自然神主义【即，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上帝与世人今天具体的生活事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为表现形式，在政治上以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争霸、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等等为表现形式。例如，自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以来，德国等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就受到诸如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一大批泛神主义者与自然神主义者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发展到了尼采的"上帝死了"，以及马克思的"一个幽灵在欧洲大陆的上空飘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让全世界人民的主流观念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专制主义等等思想的深刻危害性。因此，以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所代表的政治理念，反映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的政治思想内容的精髓，简而言之就是，在这个世上，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随意选择自己所相信的内容，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政治制度，等等。

大西洋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所代表的思想框架本身，并非是不好的。如果它们被应用于一个在生命心灵本质中没有罪性的世人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么，它们所代表的，就是最好的思想与政治体系。

但遗憾的问题是，在这个世上，在每一个世人的生命与心灵的本质层面中，不但不是纯洁无辜的，反而是充满了深深的罪性。这里所说的罪性，并非仅仅是言语行为等外在的表现，而更是人生命与心灵的一种重要本质层面的性质，是人在内心深处对于上天、造物主、生命之主的背离，是：——人以自己为生命、生活、世界的中心，而不愿意去寻求真理、公义、圣洁，不愿意去谦卑而真挚地寻求和倚靠上帝。

因此，我们在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必须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在大西洋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之中所代表的思想观念体系，并非是一个绝对真理，而仅仅是对于专制主义的针对性反应而已。固然，专制主义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对于专制主义的反对，就是绝对正确的。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大西洋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思想中的缺失，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现代世界所流行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概念中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就必然会陷入今天西方世界中“白左”所陷入的怪圈和困境，必然会在民主的道路上，遭遇失败和重大的挫折。

对于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之罪性的忽视、无视，正是大西洋宪章与世

界人权宣言所代表之思想精髓中的最大缺陷，也正是现代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观念中的最大漏洞。

那么，在建设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怎样做呢？我们应当怎样弥补上面所述的那些缺陷和漏洞呢？我们应当怎样面对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之中的罪性呢？我们又应当怎样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罪呢？

请注意，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说，专制主义就是对的，或者，应当以专制主义的强力手段，来面对世人生命与心灵本质层面中所普遍存在的罪性。

我们如果想要明白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必须要深刻地明白在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深刻关系，也必须要深刻地明白人间法律与上帝律法之间的深刻关系。

++
++
++

++

++

++

++

++

++

【【【引述 圣思录 人间法律与上帝的律法之间的关系】】】

《我们都是罪人》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决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3: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3:11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3:12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3:13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3:14 满口是咒骂苦毒。3:15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3:16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3:17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3:18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 们 晓 得 律 法 上 的 话 ， 都 是 对 律 法 以 下 之 人 说 的 ， 好 塞 住 各 人 的 口 ， 叫 普 世 的 人 都 伏 在 神 审 判 之 下 。 3:20 所 以 凡 有 血 气 的 没 有 一 个 ， 因 行 律 法 ， 能 在 神 面 前 称 义 。 因 为 律 法 本 是 叫 人 知 罪

【第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在罪恶之下。我们自己的心思里面，是谗言，嫉妒争竞，虚谎自高；我们对待他人的心态里，总是含着骄傲自义；我们在面对他人的恶时，常常沉默不言，避之不及，没有勇气去在那些看起来事不关己的事情上，为了正义挺身而出。我们生活的一个箴言就是，少管闲事。我们的舌头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污言秽语、咒骂苦毒和花言巧语。

（1）

世人之间的差别，常常其实微不足道。

我们彼此相看的时候，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真是相差万里----无论是在地位上，才能上，财富上，成功上，所处环境上，起跑线上，成就上，道德品质上，业绩上，性格上，体质上，外表上，等等等等。我们常常以为，在这世上，有的人轻如鸿毛，有的人重于泰山。

或许，的确如此。然而，要看我们说话的参照系是什么。

就好象我们看世上的亭台楼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低不同，风貌万千。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地上的角度看，而是从天上看，从永恒看，从那无限、极远的光辉之处看，那么，这些楼阁亭台的彼此之间的差别，就可以说真地是微乎其微了。

同样，若我们从神的角度看，人心之中的尔虞我诈、迷魅魍魉、彼此勾

陷，大概也的确是彼此类似。不同的，是量；相同的，是质。

（2）

神的律法是什么？律法的总纲第一是爱主你的神，第二是爱人如己。这写在圣经的十诫当中，也写在世人的良心里面。

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都知道，那满天的繁星、浩渺的大地的背后，那繁杂的世事、波澜壮阔而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背后，有一位无限大能的造物主、“老天爷”。他是独一无二的，是自有永有的。他是全备而充足的。他能听、能看。他公义、慈爱------虽然，我们看不见他，因己罪而不认识他；但是，他从来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他。

我们每个人的良心里面，也都知道，我们应当敬畏、遵从这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因为，他是良善的源头，是一切生命的赐予者，是一切价值和意义的归宿与基点。阳光雨露，出于他。苦难中的甘霖，也是来自他。

我们也知道，这世界中的一切事情，善恶一定有报。这并非科学所研究的物理定则和规律，而是，超自然中的赏善罚恶，来自于那位超自然的上帝本身。

我们的良心更知道，应当以善待人，爱人，就如同爱自己一样。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己所欲，施于人。

我们渴望怜悯和同情，因此我们要怜悯和同情他人。我们渴望理解和关怀，因此我们要努力理解和关怀他人。我们期望别人对我们耐心忍耐，原谅我们的错，饶恕我们的过犯；因此，我们要对别人耐心忍耐，原谅别人的错，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憎恨、厌恶别人的罪恶、不义、不公、虚谎；因此，我们自己不应当罪恶、不义、不公，并要诚实。我们愿意别人为帮助我们而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也当为帮助别人而牺牲自

己。

这，就是人生的真谛。

【第二部分】

平安的路是什么？

也许，有的人在财富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亲情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哲理中找到顿悟和平安。有的人在工作和事业的自我实现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人与人之间的武力与威胁对峙中，找到和平与平安。有的人在健康和长寿之道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清心寡欲的生活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一生一世、山盟海誓、相濡以沫的爱情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放下"的心境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知足常乐的平凡人生中找到平安。有的人在"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天下可笑之人"的智慧中找到平安。

以上这些，无论好或不好，却都没有触及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罪（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私、自我、自利、不公、不义、虚谎、懦弱、不怜悯、不宽容-----无论是从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正如被通缉的逃犯无论逃到哪里、逃了多久，都终将不得不面对法庭的审判）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挣脱罪的网罗，洗清我们的罪责，逃脱罪的惩罚，躲避死亡的咒诅，改变我们被罪恶所玷污、所充满的生命？

无论我们自己怎样觉得-----问题是，对善恶的裁决和审判，对罪的惩罚，对善的奖赏，权柄并不在我们手中。

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是永恒中的审判。

____

《与弟兄和平》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5:22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无缘无故地五字）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5:23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5:24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5:25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5:26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第一部分】

先与弟兄和好

（1）神的律法，和人间的法律

（1.A）

人的良善，应是从心里、由衷的，是由内心而至外在的言语行为的，而不是相反：-----

因为神是鉴察人内心的神；也更因为，人的本质，是由其内心决定；人的

行为和言语，只是其内心真实光景的反映。

这世上的法律，只看人的言语和行为，只看人的外在表现。所以，一个内心罪恶的人，仍然可以通过伪装和约束，在这世上不触犯刑律，庸庸碌碌，终其一生。而另一方面，一个无辜的人，则可能会由于马虎大意，犯了过失之罪，承担刑责。

世上的法律，只以人所能查究核实的证据、证人或证言、供词为基础；关注的，只是世上的秩序、公平等。

换言之，人间法律所管辖的范围，是那些属世的、可见的、可把握的、可查究的、可测量的、非永恒的事情。

（1.B）

然而，这并不是说，世上的法律就没有价值；也不是说，世上的法律，与神的律法就没有关系。

只不过，这两者之间，绝非等价。

在世上的法律中，所言及的"公平"，"平等"，"公义"，"正义"，"罪行"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建基于神放在人良知之中的、先天性的，关于公义、公平、圣洁、正直、诚实、真实等的认知。

在这世上，若没有信仰、若没有对永生真神的敬畏，那么，人间的法律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如果人的心里，对宇宙天地主宰、造物主、神尚且没有敬畏，对自己的灵魂尚且毫不关心；那么，人也不会在内心深处，尊敬世上的法律。

人间的一部一部法律，无论多么完善，无论条款多么多么详细，都无法完完全全囊括人类生活中的复杂微妙、变化多端的方方面面；也无法事先预

见各种各样纷繁的情境。

人间的法律，必须假设，它所针对的对象，是能够、且愿意诚实地，理解并应用抽象概念和原则的；是愿意尽力去诚恳待人的；是愿意诚实守信、遵守契约的。否则，任何人间法律，都会成为一纸空文，如沙子筑成的城堡，瞬间塌垮。

然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如果人想故意逃避惩罚、规避人间法律、钻法律漏洞、破坏规则、为自己走捷径找理由，那么，他一定很快就能学会怎样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

他也许不一定敢于堂而皇之地杀人放火，直接与法律和国家公器对抗，但是他知道，怎样利用法律、规避法律、玩弄法律，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和罪恶之心。

很多时候，人们不杀人放火，并非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法律的惩罚。他们的罪恶之心是一样的。

所以，当一个社会的法律越看似健全，越复杂全面的时候，人们的心往往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成了更加虚伪和狡猾。

（1.C）

但是，世上的法律，并不能诛心，-----不能仅仅根据人心里的想法和动机，来定一个人的罪。对于隐藏在人心里深处的罪恶想法，和自私、猥琐、残暴、暴怒的意念，世上的法律无能为力。

实际上，若有任何的人间法律，要管束、定罪人的自由内心，那么，这样的法律，往往不是“善法”，反而很可能是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恶法”。

这样的恶法，以及制定这样诛心之法律的人，是愚妄地想要取代神的权柄，愚妄地试图篡夺神的荣耀；正如圣经《但以理书》中记述的，尼布甲

尼撒下诏，要求全地的人都跪拜他，把他当作天地之主来敬拜。

主耶稣说：

但 你 们 不 要 受 拉 比 的 称 呼 。 因 为 只 有 一 位 是 你 们 的 夫 子 。 你 们 都 是 弟 兄 。

也 不 要 称 呼 地 上 的 人 为 父 。 因 为 只 有 一 位 是 你 们 的 父 ， 就 是 在 天 上 的 父 。

也 不 要 受 师 尊 的 称 呼 。 因 为 只 有 一 位 是 你 们 的 师 尊 ， 就 是 基 督 。

你 们 中 间 谁 为 大 ， 谁 就 要 作 你 们 的 用 人 。

凡 自 高 的 必 降 为 卑 ， 自 卑 的 必 升 为 高 。

（1.D）

事实上，人间法律之所以不能够针对人的内心定罪，不仅是因为那终极审判的权柄在于神，也因为，我们世人往往不能看透人内心之中的真实光景。我们常常会屈枉一个软弱犯错的无辜之人，也常常会被一个罪恶虚伪之人的甜言蜜语和伪装所蒙蔽。

神是鉴察人内心的神，他的旨意纯全，他的判断是按着真实；人的心在他面前是完全敞开的，没有任何秘密和隐秘之事能够在他眼前隐藏；

而世人，则往往只能看见、也只看重，人的外表和表现，而看不见人的本质。

（1.E）

如果，世界上、人心之中，没有神的律法，没有神的权柄和主宰，那么，

任何的人间法律（不论多么貌似公正、貌似完善）也就毫无意义，毫无作用，毫无价值-----

因为，决定人行为的，是他里面的喜好、兴趣、倾向、口味、价值、欲望、思想、理念和选择；决定人言语、行为及其一切外在表现的，是他里面的本质和灵魂的光景。

虽然：-----人间的法律，在人的内心面前，无能为力；或者，像现代民主社会里面的法律那样，强调人的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对人的内心毫不关心、毫不在意，只注重外在行为层面的证据，以及外表行为层面的管理和管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心就可以像脱缰野马一般，在罪恶、诡诈、虚伪、狡猾、贪婪的世界里任意驰骋；更不意味着，人的灵魂，就不在神律法的管束和审判之下。

（1.F）

主耶稣说：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蠓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

面也干净了。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1.G）

世上人间的法律和刑罚，可以把人捆锁在监狱之中，甚至可以判处人死刑。但是，尽管人的身体可以被人杀死，世上却没有任何势力和权威，能够审判灵魂、把灵魂投在地狱里、永远地刑罚灵魂。

这宇宙天地和其中的万有，都随时在神的掌控和主宰之下；其中的任何事情及其发展，都是按着神的允许和安排，要成就神至善至美的旨意。顺从神的人，将要兴旺；悖逆神的人，必将衰亡。落在永生神的审判和惩罚之中，何其可怕。

然而，神更在那永恒之中，在终极的审判之日，对人的灵魂有着最高的审判和刑罚的权柄。那些活在罪中、死在罪中的世人，终将面临神的永远审判和刑罚；他们要在不灭的地狱之火中，永远地痛苦哀号。

神的审判，永远的、终极的审判，不是按着外在的虚浮与功利，而是按着人心的真实光景，按着人灵魂的真实面目。

（2）

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的，难免地狱的火。

拉加与魔利的意思，类似于“蠢货”“傻冒”等恶毒辱骂人的名词。

也许，一句脏话，尤其是辱骂、咒骂自己弟兄的话，在人眼里，在人间法律之中，并不算什么，也不会受到什么严厉惩罚。然而，在神的眼中，这却与杀人的罪同罪。因为，其背后的心境和动机是一样的。其本质和性质也是一样的。都是出于暴怒和仇恨。都是沉浸于罪中之人灵魂的外在表现。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谦卑自己的心，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灵魂的主，遵从他的吩咐和教训。我们要从自己的口舌上，悔改自己的罪。把罪中的故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里面，有一个崭新的、重生的、洁净的生命生长起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____

（大卫的诗，交与伶长耶杜顿。）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

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

耶和华阿，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

前，如同无有。各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细拉）

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主阿，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

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

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的笑容或作所喜爱的）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细拉）

耶和华阿。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

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

【第二部分】

偿还对人的亏欠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5:24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5:25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5:26 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1）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真的愿意来寻求神，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

在我们心里，与弟兄反目、对人苛刻、不怜恤人，是一件严重的向神犯罪、得罪神的事。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讨神的喜悦，真的愿意寻求神的饶恕，

那么，我们就必会寻求同弟兄的和好。

若要来神的祭坛前，向神献礼物，我们必须首先与弟兄和好。

（2）

我们也要偿还人的亏欠，否则，就必不得神的喜悦。

要与人和息。

【第三部分】

真诚的敬拜

神是灵，因此，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God is spirit, and his worshipers must worship in the Spirit and in truth.

不要自欺欺人；更不要，以为神是可以欺哄的！

===

===

+++

+++

+++

+++

+++

+++

+++

+++

++

==

民主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我们从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历史中，会清楚地看见，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不仅发源于欧洲，而且，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性而言，在西方各国中间，如果，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得越广泛，人民的基督教信仰越真挚而热忱，那么，在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越容易建立起来，并且，民主制度在这样的国家中就发展得越快、越稳定；反之，当一个国家中的基督教信仰越来越不受到人们重视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混乱喧嚣、内耗内斗；甚至，当这个国家中大多数人民都离弃了敬虔信仰的时候，也就必然会导致，民主制度终将引向彻底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并最终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所推翻、篡权。

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民主制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人民群众内部之间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复杂过程。在这样的复杂过程中，在一个社会中，尤其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主要国家中，必然会存在许许多多不同的利益冲突、不同的观点角度、不同的意识理念等等。那么，在这些不同的、甚至激烈的力量角力过程中，怎样能够达到和平安祥的、团结一心的、众志成城、稳定牢固的政治结果呢？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民主制度若要成功【而不是逐渐滑向无政府主义以及

专制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和面对以下这样的一般性困境：——在民主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过程中，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必然会有很多人口成分、很多政治力量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甚至，政策方向是被很多人所彻底反对的。【——尽管，当然，政策方向之所以被决定下来，是因为社会中超过半数的政治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那些在某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但是，由于社会政策决策有许许多多的方面，因此，这些在每一个政策决策上意见少于半数的人群，加在一起，人数就反而会占据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例如，有的人反对某些医疗方面的政策决策，而另外有些人则反对某些教育方面的政策决策；虽然那些人在每一项具体政策决策上都少于半数，但他们在不同政策决策相关方面上相应的人数加在一起，却超过了社会人口中的大多数。】

于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怎样避免扯皮、庸碌无为、无法决策？怎样避免决策结果导致国家动荡、不稳定、怨声载道？

核心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民主社会中的一个成员，那么，当面对某个不符合“我”利益、违背“我”意识形态的、然而却是民主程序下所制定的决策结果的时候【例如，民主决策的某个政策结果是：——减少某个地区的、面向某类职业的教育经费，增加某种医疗的收费，针对某种行业加税，增加某些方面的军费，甚至是堕胎，毒品合法化等等】，——在“我”的内心中，怎样还能有和平安宁的心情呢？“我”怎样还能够平静地、和平地遵守那些既定的民主秩序和政策法律结果【即，和平地等到下一次投票的时候

再去表达意见；甚至，——“我”心里明知道自己是少数派，无论再投多少次票也没用，根本不可能改变某种政策决策结果】，而不是心怀怨言、鼓噪喧嚣、甚至图谋用非法手段推翻既定政策法律结果呢？

本书必须在这里清晰地、大声地、毫不含糊地指出，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正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生死成败之关键所在。

如果在社会中的千千万万个“我”，在各种不同的民主决策结果面前，都忿忿不平地面对上述困境【例如，有的人是在医疗决策结果上，非常不满；有的人是在教育政策决策结果上，充满愤怒；等等】；那么，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就一定没有和平、平安和幸福；在这样的人民之中，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失败。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各种具体政策决策结果本身，就公义、平等、公正而言，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人们心中的各种怨言、不满、甚至愤怒本身，并不一定是没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不对、不合理的。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甚至看似很严重的不合理之处，虽然有这样许多的、看似合理的不满之处，但是，——民主制度本身怎样才能够，保持稳定、和平、长治久安，而不是被动辄轻易推翻、政权总是处于动荡更替的无序混乱之中？

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民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有限性，如果我们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上述问题，应当怎样面对上述困境，那么，——我们国家社会中的民主制度就必然不会成功，就必然会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并必然最终被专制主义所取代；我们就必然无法挣脱专制主义的欺骗、愚民、诡计、邪恶、与枷锁。

____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在各样的复杂政治角力过程中，在人民群众中间，如果没有一种深挚真诚的、敬虔热忱的、谦卑虚己的、以对于造物主上帝之敬拜为中心的信仰，——来调和、引领、协调民主决策过程，并在民主过程中起到根基性的作用，——那么，从几个世纪以上的长远眼光来看，所谓民主制度就一定会面临失败，跌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并被专制主义取代。

基督教信仰对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当人们以那属天的国度为心灵的归依，以造物主上帝自己为心灵

归依的时候，那么，——就会在生命品格中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方面，这样的人会积极热心地投身于公共事务的讨论、投票、决策过程之中，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眼旁观。另一方面，当民主决策的结果是违背自己的愿望和观念的时候，这样的人并不会要死要活，以为自己是绝望的；——因为，他内心的倚靠，从终极的、根本的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天上，在那上帝永恒的国度里。

最重要的是，在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为中心的信仰中，人们不会把自己当作是世界的中心，更不会颐指气使地把自己当作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甚至要“替天行道”、唯我独尊等等；而是，在内心深处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因此，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心灵深处一定是真正谦卑的，因为他的心灵之锚，他的一切盼望与期待，究其根本层面而言，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那永恒的天上国度里。正是因此，他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既勤勉地生活、一丝不苟地努力去做好一切所当行之事，以热忱的心灵和情感，去面对一切世事和世人；但同时，他并不以这个世界为依归，而是把心灵的眼目单单地瞩目于那天上的国度，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盼望所在。这一点，正是基督教改革回归圣经运动中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及无数英国清教徒们、和过去漫长历史中一代又一代无数敬虔基督徒们的深挚信仰和坚定信念。这种信仰和信念用一句简单的英文总结就是：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意思就是，勤勉热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以这个世界为归依。

正是这样的以圣经为核心、为根基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导致了现代民主

主义革命的诞生。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能够使得民主制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稳定地、平安地、和平地持续下去，并使得其中的人民看见世事真理、享有幸福。

正是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精神，才使得无数人们以敬虔的心去顺服“在上掌权者”、顺服于世上的法律体系、政权秩序、决策过程；使得人民群众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无论决策结果是否如己所愿，都能够和平地彼此相处。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基督徒们在关于各项公共政策事务的协商与决议过程中，会主动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会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努力地献计献策；但是，若自己的一些主张和意见建议没有得到全体社会的采纳，那么，基督徒们的心里仍然是有平安的，因为他们在心灵深处的盼望与归依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

+++

+++

+++

+++

+++

+++

+++

++

【【【引述 圣思录 顺服在上掌权者】】】

《顺服掌权者》：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13）

【第一部分】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13:5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13: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13: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1）正义是什么？正义的源头在哪里呢？正义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吗？我们又应当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正义呢？在这个世上能够得到完全的、真正的正义吗？

亲 爱 的 弟 兄 ， 不 要 自 己 伸 冤 ， 宁 可 让 步 ， 听 凭 主 怒 。（ 或 作 让 人 发 怒 ） 因 为 经 上 记 着 ， 主 说 ， 伸 冤 在 我 。 我 必 报 应 。

（2）这世上有多少罪恶，是在伸张正义的借口之下发生的。有多少人，看见不平，拍案而起；但是，他们却不过是在用一种罪恶来代替另一种不义。

许多人，想要伸张正义，但是他们的心中，却不过是在自以为义。

许多人，口中喊着替天行道（这话本身就是对神的亵渎），心里面热乎乎地热血沸腾；但是，他们心中，却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狂傲之心。他们内心的罪恶和污秽，遮盖在光辉理想的旗帜之下。

（3）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

在人们口中，无论是哪种所谓的正义，无论是哪种情境；如果，在人的心中没有对永生真神的敬畏，没有对神的圣洁、公义、主权、主宰、创造、救恩、恩慈的敬畏，没有人内心中发自心底的真正谦卑，没有摒弃自己心中的固执、愚顽、刚硬，那么，在人们中间的任何所谓“正义”都是枉然。人们所谓的革命，造反，战争，斗争，等等，都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的野心、贪婪、罪恶、欺谎、虚空、狡诈、诡计、虚荣、负气、情仇、自义所充斥着、包裹着、裹胁着、淘汰之下的恶性循环。

那么，又该怎样呢？敬畏耶和华，是人智慧的开端。顺服在上掌权者。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退后，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使自己的生活圣洁；以爱对待人；祈求神，不乞求人；敬畏神；对掌权者应当

恭敬而惧怕，但是，不要在灵里畏惧人；倚靠神，而不要倚靠人；活出基督的圣洁生命与爱，作基督救恩的见证；以彻底地的谦卑和爱，来对待所有的人，包括在上掌权者。

【第二部分】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13: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是人应当如何在世上立足、与人相处的一个基本原则。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第三部分】13: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13: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我们真正的正义和公义，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是在那些“在上掌权者”那里吗？也是，也不是。关键是，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应该是在何处。我们应当以这世界为我们的源头、归宿和倚靠吗？不，决不是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11:13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1:14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

乡。11:15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我们在这世上，都是作寄居、作客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家。坟墓更绝不是我们的归宿。以这世界为家的人，想要在这世上找到终极的公正；可是，他们无论是贫是富，无论是渺小还是伟大，都只能是品尝到真正的失望、眼泪、痛苦、无奈、疾病、衰残和死亡的滋味。在这世界中寻找正义的归宿的人，必然要空手失望而回。更何况：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

我们更应当警醒自己，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13: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只有当有了倚靠神的信、圣洁的生命、基督的救恩时，才能够在这世上真正地见证出神的爱、公义和圣洁。

+++

+++

+++

+++

+++

+++

+++
+++
++

在这世上的主要宗教信仰中，除了以圣经为中心、核心根基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之外，还有以可兰经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系列佛经为中心的佛教信仰体系。此外，还有具有一般泛神主义特征的印度教信仰。

那么，除了基督教信仰以外，其它的那些宗教信仰体系，与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为什么现代民主主义制度没有原发性地起源于它们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中，而是在来自西方外力的影响下，才开始实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呢？【甚至，在今天的中东世界，在许多强烈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民主之路仍然非常遥远。】

在伊斯兰教信仰中，虽然也是对于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天的敬拜，但是，却有着强烈的政教合一、排他主义的色彩。在伊斯兰教中，是典型的"因行为称义"的教义，即，一个人的信仰是否敬虔，要通过外在的许许多多繁文缛节的规条，例如禁食、每日定时祈祷、不吃猪肉、等等无数的规矩，来体现。一个人是否算作是真主阿拉面前可被接纳的信徒，要看其行为是否满足那些繁文缛节的规条，甚至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圣战士，等等。

伊斯兰教的重要主旨，是在地上按照可兰经的律法规条建立起伊斯兰国。伊斯兰教教义的核心是在于，人必须在行为上遵从和顺服阿拉、以及其最大先知穆罕默德的话语。这种"因行为称义"的教义，会两个严重的致命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在内心和良知中真正是诚实的，就一定无法否认自己心中的罪性，无法否认自己所曾经说过的谎话、自己心中曾经的不义的愤怒以及嫉妒、自己对于他人所属之物的贪恋、自己所曾经做过的错事，等等。任何一个百分之一百诚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无法"因行为称义"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因行为称义"的教义，一定会导致人在内心中自高、自傲、自义，并会论断他人、俾倪他人，从而导致和加剧——而不是消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上述"因行为称义"的特征，在其他宗教信仰体系中，例如佛教和印度教中，也很普遍，但在伊斯兰教中尤其明显。事实上，伊斯兰教所导致的文化土壤，从其当年所开始建立时的火与剑的时期，一直到今天，都始终常常贯穿着戾气、冲突、矛盾；以伊斯兰教为主的社会中，往往是专制主义、或是万马齐喑、而没有生机勃勃、热忱、勤勉而自由的状态。

佛教信仰的教义，与印度教特征一样，都是属于泛神主义宗教信仰体系。在这样的宗教体系中，并没有【——甚至直接否认——】：在这个世界之上的那样一位无限全能、全知、至善至美、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造物主、上天、上帝、永生真神。因此，佛教信仰与印度教信仰都具有泛神主义的一般特征，即，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在它们的眼中，这个世界的本质是虚无、虚空、虚浮、虚幻的，人生的本质是苦的；通向

幸福的道路，就是出世，就是看穿世事与人生的虚无，放下执着，以“舍得”的人生态度，来面对一切。换言之，它们看不到这个世界的浩大、瑰丽、奇妙、精确、秩序、等等，是出于上帝的无限智慧、设计、和伟大创造；它们更看不到在人的生命与心灵中，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在它们看来，世界就如同荒芜、默然、没有生气的沙漠、旷野、荒地；人生就如同荒诞而荒谬的一场戏。在它们的体系中，看不到道德法则的绝对意义、隽永价值与永恒根基，看不到生命的本质含义与指向永远的真正价值在于什么。它们更看不到“罪”的本质根源所在，以及怎样除去罪的根本途径【罪，不仅在于外在的言语行为，更在于人内心的自傲自义，在于人对于造物主、上天的背离，在于对良知中道德法则的悖逆】。它们所看见的世事人生，是空的、苦的，但它们看不见罪的本质。它们的敬拜体系中充满了人手所造的金、银、石、木的偶像。它们的教义中有许多关于超自然世界的烦冗的、人为臆想的“知识”，充满了人对于自己悟道与修行过程的倚靠和自傲之心，但却看不见“义”的本质和源泉所在。

在一个佛教或印度教所影响下而产生的文化土壤中，人们往往在心中、在关乎世事上没有执着、认真、奋进、殚精竭虑的态度，而是凡事看空、放下、舍得、反对执著。在这样的土壤中，人们并没有对于道德之罪的同仇敌忾的心理，并没有对于世事人生的热忱、对于公义的执著向往和锲而不舍的追求。当在西方外力作用影响下【甚至是在西方外力的胁迫下（如日本等地），或是保护下（如台湾、韩国、泰国等地）与促进下（如缅甸等地）】，它们的文化土壤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实行民主制度，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来，它们一定很难于发挥持之以恒的奋进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执著态度。

在中国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中，贯穿着下级服从上级等等三纲五常的伦理。在这种伦理体系下，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拥有极高的人身权威。儒家思想中强调，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以此世为中心的国家社会秩序伦常观念。然而，这种文化土壤所导致的是，人们在人身依附上、社会权势与权力分配上，在生命与人格上，都围绕着权力分配、追逐权力、争夺权力、依附权力等等生活方式为中心。在这种思想伦理体系中，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究其本质而言，人与人不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分成两类，所谓君子和小人。甚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儒家思想的这种文化土壤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度的今天，在中国却仍然没有开始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甚至，今天的中国距离一个稳定、成熟、现代、先进、发达的民主制度，还非常非常遥远。即使有一天，中国开始在表面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很有可能会如同70年前一样，是虚假的挂羊头卖狗肉，或是如同100年前一样，是动荡混乱、喧嚣躁乱、纷争不断的局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罗斯福总统夫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8%8E%89%E8%AF%BA%C2%B7%E

7%BD%97%E6%96%AF%E7%A6%8F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1884年10月11日－1962年11月7日）是一位美国政治人物。第32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妻子，从1933年3月至1945年4月罗斯福经历四个总统任期，因此埃莉诺·罗斯福也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第一夫人。二战后她出任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并主导起草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同时也是女性主义者，并大力提倡保护人权。哈里·S·杜鲁门总统在赞扬她的人权成就时称她为“世界第一夫人”。

生平

简述

埃莉诺的祖父是狄·罗斯福，是纽约的大企业家及慈善家。伯父是泰迪·罗斯福，即老罗斯福总统。父亲是埃利奥特·罗斯福一世，作为罗斯福和利文斯顿（Livingston）家族的一员，她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她的父母和一个弟弟在她很小的时候去世。 15岁时，她在伦敦的Allenwood学院学习，校长Marie Souvestre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对埃莉诺影响很深。回到美国后，1905年埃莉诺嫁给了远房堂叔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尽管富兰克林的母亲十分反对该婚事。富兰克林因为脊髓灰质炎局部瘫痪后埃莉诺说服他继续从政。富兰克林当选纽约州长后，埃莉诺经常代表他公开露面。

尽管她的晚年广受尊重，罗斯福仍然因为她的坦率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第一夫人，尤其是她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她是第一个举办新闻发布会的总

统配偶，并在全国党代表大会发言。有几次，她公开表示不同意丈夫的政策。她在西弗吉尼亚州为失业的矿工家庭推出了一个试点社区，后来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她倡导在工作场所扩大妇女角色，并为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和二战难民争取公民权利。

她的丈夫去世后，埃莉诺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她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主席，监督《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工作。后来，她成为肯尼迪政府妇女地位总统委员会的主席。她去世时，被视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女人之一”和“几乎获得普遍尊重的对象”。1999年，她被排在盖洛普20世纪最受推崇的人物名单前十位。

早年生活

埃莉诺·罗斯福于1884年10月11日出生于曼哈顿西37街56号。在她年幼时期，别人更喜欢叫她埃莉诺。她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侄女。她的妈妈给她取了个昵称“Granny”【奶奶】，原因在于尽管是一个孩子，但埃莉诺依然总是非常严肃的为人处事【也因为她长得像老年人】。她的母亲有时也会因为小埃莉诺的正直而陷入尴尬境地。

童年时期的埃莉诺

埃莉诺罗斯福有两个亲弟弟，小艾略特·罗斯福和霍尔。她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是她的父亲与家里的仆人私通所生，名字叫做艾略特·罗斯福·曼恩（1891–1976)，她的家族作为纽约上层社会的一员，毫无疑问她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

1892年11月7日，她的妈妈死于白喉，次年5月，她的弟弟小艾略特·罗斯

福同样如此。此前她的父亲因为酒精成瘾而被送入疗养院，最终于1894年8月14日因戒酒性谵妄跳窗，尽管一开始逃过一劫，但是却死于随后的癫痫发作。埃莉诺罗斯福童年时压抑的生活经历让她在此后的生活中容易陷入到抑郁的情绪中。在一系列打击之后，她的弟弟霍尔也同样不幸酒精成瘾。在父亲去世之前，埃莉诺受其父亲委托，在她的弟弟生活中扮演母亲的角色。

埃莉诺·罗斯福非常关心弟弟，当他于1907年被格罗顿中学录取时，她作为他的监护人陪伴他出席仪式。在他上学期间，她几乎每天都会给他写信，尽管如此，她依然常常对于霍尔没有拥有一个完满的童年而感到愧疚。霍尔在学习生活中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包括取得了哈佛大学的工程学学位，埃莉诺·罗斯福深深的为他而骄傲。

在她的双亲去世后，她在她的外祖母一家的照料下生活。作为一个孩子，她缺少安全感，生活中缺少情感交流，并且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一只“丑小鸭”。尽管如此，在她14岁时写下的文字中，她已经洞见的意识到一个人的潜力是不可以用外在的面貌来衡量的，她写道：“无论一位女性相貌多么平庸，只要她足够真挚、正直，那么她就可以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

学生时代的埃莉诺

埃莉诺罗斯福在她的早期生活中一直受到非正式的教育，在她的姑妈安娜的鼓励下，15岁的她前往位于英国的艾伦伍德学院进修，在那里她度过了3年的学校时光（1899-1902）.女校长Marie Souvestre致力于将女性独立的思想培植在每一位学生中。Marie Souvestre对于年轻的埃莉诺格外关注，此时的埃莉诺已经可以流利的使用法语，并且相当的自信。Marie Souvestre和埃莉诺罗斯福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直到1905年5月Marie Souvestre去世。为了纪念这位女士，埃莉诺将她的一幅肖像放在了自己的

书桌上，并且将两人的通信往来一直妥善的保留下来。埃莉诺的表弟科林·道格拉斯·罗宾逊（这位与埃莉诺共同在艾伦伍德学院进行了一个学年的学习）回忆说：“埃莉诺在学校中无处不在，每个人都非常的喜欢她。”埃莉诺一直希望可以在艾伦伍德学院继续学习，但是在1902年，她被祖母叫回了家，从这时起，她开始了自己的社交生活。

1902年，埃莉诺·罗斯福17岁，她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且回到了美国；1902年11月1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她第一次接触了当时纽约上流社会的社交舞会。后来她曾经回忆起自己的这次经历，她评论道：“那次实在是糟透了。的确是一场舒适的party，但是我一点也不能乐在其中。因为对于当时的一个女孩来说，如果她不认识在场参与party的任何一位年轻人的话，那么这场party对她来说一定会非常的难熬。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因为我在国外呆了好几年，所以我与几乎所有的纽约女孩都断了联系，这让我很难堪。”

埃莉诺·罗斯福曾经与刚刚建立不久的国际青年联盟协会共事，在东部贫民区教授舞蹈与健美体操。在埃莉诺的朋友同时也是该组织的建立者的玛丽·哈里曼的引介下，埃莉诺接触了这个组织，尽管当时的人们批评它是一个“把众多年轻女性带入社交场合的组织。”，但是埃莉诺并没有对此表示在意。

婚姻生活

1902年夏天，埃莉诺罗斯福在前往纽约的火车上遇到了他父亲的远房亲戚，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两个人即刻陷入了热恋并且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于1903年11月22日订婚。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母亲莎拉·安·德拉诺反对两位的结合，并且迫使罗斯福保证这一订婚一年内不会对外公布。

“我知道这会让你很痛苦，”罗斯福在给他的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从很久以前

就知道我在想什么，而且我别无选择。”

1904年，莎拉带着她的儿子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度假，希望这短暂的分离可以让罗斯福冷静下来，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婚礼的日期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日程相契合，后者曾表示自己愿意送新娘一程，最终于1905年5月17日两人喜结连理。

婚礼由Endicott Peabody主持（罗斯福在格罗顿中学上学时的校长），诶莉诺的表妹Corinne Douglas Robinson则是伴娘。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出席使得这一婚礼成为了轰动一时的大事件，《纽约时报》等报社都将其作为头版新闻放出。当西奥多罗斯福被问到如何看待两位罗斯福家族的远房结合，他回答到：“能够看到家族的名字继续延续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两位新人在海德帕克初步的度过了一个星期的小蜜月，之后开始收拾装修位于纽约的居所。当年夏天，两位前往欧洲进行3个月的正式蜜月。

蜜月结束后，两人回到美国。他们在纽约的住所由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母亲提供。这栋房子是家族的第二套房产，从这里可以俯瞰纽约海德帕克地区的哈德逊河。 从这时起，埃莉诺・罗斯福与她控制欲很强的丈母娘之间就已经产生了矛盾。罗斯福母亲给予两位新人的房子（位于市区）与她自己的房子之间只有一个小小的滑动门，萨拉（罗斯福母亲）在两人结婚头十年里经常在两间房子中活动，为此她向富兰克林・罗斯福解释道：“我不喜欢住在一个没有任何一部分属于我的房子里，在那里我什么也不可以做，任何东西都不能体现我生活的方式。” 萨拉同样对于抚养自己的孙子辈十分热衷，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回忆道：“富兰克林的孩子往往更像是我祖母的孩子，而不是我的。”埃莉诺罗斯福的长子 詹姆斯・罗斯福回忆起其祖母曾经这样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只是生育了你们，我比起你们的妈妈来说，更像是你们真正的母亲。” 埃莉诺与富兰克林两人一共育有6子，他们是：

Anna Eleanor Roosevelt (1906–1975)

James Roosevelt II (1907–1991)

Franklin Roosevelt (1909–1909)

Elliott Roosevelt (1910–1990)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Jr. (1914–1988)

John Aspinwall Roosevelt II (1916–1981)

尽管经过了六次身孕，但是埃莉诺罗斯福与丈夫的夫妻生活过得并不愉快，她曾经告诉自己的女儿安娜，认为这件事是“为了繁衍后代的苦差事”。同时她也发现自己对于当母亲没有什么感觉，她随后写道：“理解小孩的想法并且取悦它们，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1918年9月，埃莉诺罗斯福在整理他的丈夫的西装时，她发现了自己的丈夫与他的社交秘书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的一捆情书。罗斯福本人甚至已经在考虑为了自己的情人而与埃莉诺离婚。然而在他的政治顾问路易斯·豪与他的母亲的施压下，两人并未离婚。但他们的关系自那以后就更像是政治上的伙伴，而不是夫妻了。对婚姻感到幻灭的埃莉诺开始重新活跃在社交场合，将生活的重点放在了她的社会工作中，而不再是所谓的妻子的职责。

1921年8月，罗斯福一家前往加拿大的坎波贝洛岛度假，当时罗斯福正被确诊为因为小儿麻痹症而引发的中风症状。在他生病期间，埃莉诺罗斯福细心照料它，可以说真正意义上将罗斯福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是他还是永久性的下肢瘫痪了。后来，随着他的病情越来越清晰，埃莉诺与萨拉又一次就罗斯福的未来进行了坚定地斗争，她劝罗斯福继续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不是像他的妈妈说的那样退休去做个乡绅。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十

分看重的私人医生William Keen称赞了埃莉诺在这段罗斯福本人的艰难时刻中的牺牲与贡献，罗斯福后来评价说"她是我的女英雄。"

这也是埃莉诺与莎拉之间的漫长冲突的一个转折点，随着埃莉诺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她渐渐脱离了莎拉的控制。随后两人之间关于埃莉诺政治上的朋友这一话题的冲突在家族建造Val-Kill的活动住宅时爆发了。埃莉诺自作主张的将这里命名为Val-Kill，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瀑布涌出之地"。富兰克林罗斯福鼓励他的妻子埃莉诺将这座房子作为处理冬天时的诸多事物的工作场所。每年，当埃莉诺和诸多朋友一起在这里野餐聚会时，她的孙女Eleanor Roosevelt Seagraves往往会来帮助她。她一生都与自己的祖母非常亲近。Seagraves把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图书管理员的职业生涯集中在维持由埃莉诺开创并支持的许多事业上。

1924年，埃莉诺为民主党人Alfred E. Smith在纽约州的改选奔走，虽然后者最终当选，但这也造成了埃莉诺和自己的表兄弟Theodore Roosevelt,Jr的决裂（他正是在此次竞选中被击败的共和党候选人）。改选结束后，埃莉诺的姨妈Anna "Bamie" Roosevelt公开与埃莉诺断绝关系，她在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侄女，她说："我只是不愿意看到埃莉诺现在的样子。尽管她相貌平平，但她本来总是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的。唉，自从政治成为她最感兴趣的事以来，她所有的魅力都消失了!"埃莉诺并没有理会来自自己姨妈的批评。但是最终，两人还是重归于好了。

埃莉诺的儿子 Elliott名下有很多书的著作权，在他的一系列神秘主题的书中她的妈妈曾经扮演过一个私家侦探。然而实际上这几本书是由William Harrington所作，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William Harrington去世，而这时 Elliott已经去世10年了。Elliott同时又是《海德帕克的罗斯福》一书的作者，该书以高度私人化的视角揭露了罗斯福夫妇在海德帕克地区的生活，包括了罗斯福先生的两段婚外恋以及其最终坐上轮椅前后的相关细节。这本书发表于1973年，其中同时还包括很多富兰克林・德拉诺・罗

斯福1932年竞选的细节，尤其是详细介绍了他与 Louis Howe的合作。这本书一经发表就受到了罗斯福家族的批评，Elliott同时也受到了表兄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Jr的谴责。家族中的另一位成员Franklin James与Bill Libby一起与1976年写了另一本相关传记作为对Eliott的回应。

其他社会关系

19世纪30年代，埃莉诺与传奇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成为了很亲密的朋友。两人曾经一起结伴溜出白宫一起去外面的party找乐子。埃莉诺在和艾尔哈特一起飞行之后，她甚至萌生了学习飞行的念头，但是很快就放弃了。富兰克林对于妻子想要成为飞行员这一想法并不感冒。尽管如此，这两位女士之间的友谊却一直得到维系直到去世。

埃莉诺和美联社记者萝莉娜希柯克同样有一段长久的感情，后者在罗斯福总统竞选的最后一个月时采访过她，从此两人一见如故。在这段时间，埃莉诺每天写10到15页的长信给她的Hick（昵称），而此时的希柯克则着手给这位第一夫人写传记。埃莉诺给西柯克的信充满了热情的告白，在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的就职典礼上，埃莉诺带上了西柯克此前送给她的一枚蓝宝石戒指。FBI负责人约翰·埃德加·胡佛与罗斯福夫妇之间常有分歧，他鄙夷埃莉诺的同性恋倾向以及她关于公民权利的坚持，相应的，罗斯福夫妇对于胡佛的监视策略依然保有反对态度。因此胡佛一直保留着大量的埃莉诺的个人资料，包括后来被胡佛试图用于敲诈埃莉诺的关于这段不洁恋情的相关证据。出于能够进一步的走进埃莉诺的生活的需要，西柯克辞退了美联社的工作，作为回应，埃莉诺则帮助她成为了罗斯福新政的一位调查员。

关于埃莉诺和西柯克之间的关系史学界始终保持争议，从当时的白宫的工作人员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西柯克的确是一位同性恋者。学者们（包括莉莲•费德曼、黑兹尔·罗利）声称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涉及到身体上的成

分”，然而这一表述却被西柯克的传记作者桃乐丝·费伯嗤之以鼻，她认为这一个暧昧不清的表述对后来的史学界产生了误导。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在她1994年发表的文章《埃莉诺罗斯福与西柯克之间的关系是否超出了拥抱与亲吻》（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也获得了1994年的普利策奖）中的陈述并不能确定真实性。

但毫无疑问的是，埃莉诺本人的确是数个女同性恋情侣的好友，说明她的确是了解女同性恋关系是什么样的。玛丽苏·维施特，埃莉诺童年时的老师同样也是一位女同性恋者，而此人确实对埃莉诺后来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伯尔于1980年公开了部分埃莉诺与西柯克的通信记录，但最终他的结论是所谓的“热恋中的告白”不过是“迟来的女学生式的感情”，同时她也警告历史学家们不要被误导。但学者蕾拉杰·鲁普批评法伯尔的著作是“一个恐同症的专题研究”，同时她也指出在法伯尔的书中“一页又一页的证据都显示出两位女士之间日益深厚的情愫”。

也是在这一年，华盛顿传出了埃莉诺与新政的负责人之一哈里·霍普金斯的绯闻。两人在工作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埃莉诺与纽约州的警官厄尔·米勒有着亲密的关系，后者曾经被埃莉诺的丈夫任命为埃莉诺的贴身保镖。埃莉诺于1929年与米勒相识，这一年埃莉诺44岁，而米勒只有32岁。米勒成为了埃莉诺亲密的好友，他教会了她很多项运动，包括骑行与潜水等，同时也是埃莉诺的网球教练。传记作者Blanche Wiesen Cook在他的相关作品中认为，米勒是埃莉诺中年时期的第一个爱恋对象；Hazel Rowley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埃莉诺曾经爱上过米勒一段时间，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别使得其不可能产生绯闻”。

同样是在这时，华盛顿也传出了埃莉诺的丈夫与自己秘书玛格丽特·勒翰德的地下恋情。历史学家写道“显然的，无论是埃莉诺还是罗斯福本人，两人都对这样的情况保持了默许与接受的态度，因为他们都是拥有强烈掌控欲的人，也都希望彼此的生活能够快乐，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无法给对

方提供对方想要的快乐。"据说罗斯福与米勒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她1962年逝世。他们被认为每天会书信联系，但是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在她的晚年生活中，埃莉诺与自己的私人医生David Gurewitsch有过一段私密的深交，但二人的关系只是属于非常要好的朋友。

入主白宫之前

1927年，埃莉诺牵头，与库克，迪克曼，卡洛琳女士一起建立了Val-Kill实业公司。她们于纽约民主党的女性分部相识。这家公司总部坐落在海德公园（纽约州）。主要是由一系列小工厂组成，为当地的农民家庭提供额外的收入，营业的主要方向包括生产家具，白蜡，以传统方法制作的布匹等。受殖民复兴思潮的影响，大部分这里的产品都是18世纪风格的。埃莉诺积极在各种场合推广这家实业公司。客观的说，这家公司并没有像埃莉诺想的那样成为一个长久的项目，但是很多罗斯福新政的首创性政策都在这里经过了试点。1938年，囿于大萧条与自己身体状况的限制，库克退出了合伙。也正是这个时期，埃莉诺将其中的一栋商店建筑改装成了一间小别墅，在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埃莉诺一直居住在这里。

1977年，埃莉诺在此处的住所周边181英尺的土地被国会正式指定为"埃莉诺·罗斯福国家历史景区"以纪念这位美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在诸多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第一夫人时期

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正式就任美联邦合众国总统，埃莉诺也正式的成为了美国的第一夫人。在对20世纪以来所有的第一夫人有了解后，埃莉诺本人对这个新的身份感到十分沮丧。这一身份意味着她必须更加关注家庭生活以及女主人翁的身份。她的政治顾问卢·亨利·胡佛终止

了她的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的诸多社会活动，将她的生活重心更多的放在了白宫。事实上，埃莉诺对第一夫人这个身份的抵触非常的明显，以至于她的传记作者希柯克把她的传记的副标题设置为“不情愿的第一夫人”。

在胡佛与希柯克的帮助下，埃莉诺重新认识了这个身份。她的传记作者Blanche Wiesen Cook的评价是：“埃莉诺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最有争议的第一夫人。”尽管受到了多方批评，但是在丈夫的强力支持下，埃莉诺在作为第一夫人的同时依然维持着原先的生意与社会活动。而在当时并没有多少已婚女性能做到这一点。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定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总统家属，并且在1940年，成为了第一个对国会发表讲话的第一夫人。同时她也在新闻报纸上有自己的专栏评论，这也是历史首创。同时她还是第一个每个月定时写杂志专栏以及参与每周的广播节目。

在她丈夫第一年执政期间，埃莉诺的经济收入与自己的丈夫相当。她一年通过讲座以及写作的形式获得了45000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被她赠予了慈善机构。到1941年，她每个月通过讲座可以获得1000美金的收入，并且成为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荣誉会员，以表彰她的成就。

在埃莉诺入主白宫12年的时间里，她的日程安排一直非常紧张。她频繁的亲自出现在各种劳工会议中，向他们表达白宫对他们处境的关心。当时《纽约客》上有一副风靡一时的漫画，漫画中描绘了埃莉诺视察一座煤矿时的景象，一位工人从漆黑的地道中向上看去，对他身旁的工友说：“天哪，埃莉诺夫人来了！”

1933年，退伍军人们为酬恤金而举行请愿游行的事件爆发。先前对于这个事件，上届总统胡佛命令该集会自行解散，并且美国武装骑兵介入并且向退伍军人队伍投掷了催泪瓦斯。这次埃莉诺拜访了退伍老兵们的临时营地，倾听了他们的诉求并且与他们一起唱军歌。这次会见缓和了老兵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一位示威者评论道“胡佛总统派来了军队，而罗斯福（总统）派来了他的妻子。”同样在1933年，在她成为了第一夫人后，

有一种新发现的杂交香水月季被冠以罗斯福的名号。 1937年，她开始着手进行自己自传的创作，最终于1961年完成。

美国青年大会与全国青年总署任职

美国青年大会（AYC）是一个旨在伸张青年权利的组织，建立于1935年。该组织致力于将《美国青年权利法案》推入国会，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在埃莉诺的努力下，同年全国青年总署建立起来。该组织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项举措，旨在为16-25岁的青年提供更多的工作与受教育机会。奥布里•威利斯・威廉姆斯是全国青年总署的带头人，他是一位名声显赫的自由人士，来自阿拉巴马州，与埃莉诺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关系密切。

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数个演讲中，埃莉诺表达了她对于年龄歧视的忧虑，她说：“当我想到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一代人时我感到非常恐惧，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推动这一代青年人进入社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被需要。”1939年，戴斯特别委员会（后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了美国青年大会领袖，因为其同时参加了美国青年共产主义联盟。埃莉诺出席了庭审现场，并且随后邀请证人在逗留华盛顿期间居住在白宫。1940年1月10日，美国青年大会的成员在埃莉诺的邀请下，参加了一场举办于白宫的餐会，会上罗斯福本人告诫他们不仅要反对与谴责纳粹主义，同时也要谴责一切独裁政权。但是却受到了一片嘘声。此后，很多年轻人将白宫视作The American Peace Mobilization (APM)的标志。1940年年末，尽管埃莉诺本人公开发表声明“我为什么依然相信青年大会”，但是美国青年大会依然被取缔了。而美国青年总署则与1943年同样被关闭。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在二十世纪，从全世界范围而言，对于二战后世界局势之发展的影响最大的两个事件，就是二战期间的丘吉尔与罗斯福签订的《大西洋宪章》，以及二战后成立联合国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夫人直接催生的《世界人权宣言》。

大西洋宪章在西方理念上，终结了殖民主义时代，也无形中终结了西方传教士的时代。

一战和二战，在其宏观本质原因上，就是由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随着航海大发现的时代而导致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依次崛起【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与荷兰之间，西班牙与英国之间，也曾经发生了一些摩擦甚至战争】，从而使得，德国、俄罗斯等欧洲的“后起之

秀”在嫉妒纷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等情绪驱动之下，在欧洲内部、以及在海外广大领域内，与英国、法国等展开了激烈的利益争执。这些争执，终于导致了两次全欧洲范围内的、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大战。

在美国正式加入二战以前，罗斯福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美国本身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并没有很强的动机在亚洲或非洲等地进行海外殖民地领土扩张；并且，美国作为西方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曾经是最保守的国家，是当年清教徒后代们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此，美国人对于殖民地扩张本身有着一种天然的反感】，与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会面，双方签订了所谓《大西洋宪章》；其主旨就是，终结西方殖民主义时代，在战后推动世界各地的民族自决，推动民主制度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蔓延发展。

丘吉尔在签订大西洋宪章的时候，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在希特勒纳粹的严重威胁之下，英国必须寻求美国的帮助；而此时美国主流民意仍然是“外交孤立主义”，不愿意积极参与到世界各国之间的纷争中；因而，迫切需要说服美国向英国提供帮助的丘吉尔，很愿意答应罗斯福所提出的《大西洋宪章》所表达的理念。丘吉尔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从英国的角度而言，殖民主义时代所导致的、欧洲几大强国之间的彼此争权夺利、争风吃醋，——的确让很多英国人民痛定思痛，真心愿意结束殖民主义时代，在各个殖民地国家中，以民主法治、政治稳定、文明协商的方式，还政于民。

事实上，在二战以后，整个世界的局势发展，基本上正是按着大西洋宪章的构想而进行的。虽然二战以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们，以及中国、朝鲜、越南、古巴一直实行所谓共产主义的专制独裁政治制度；但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其余地区，尤其是在南部非洲、东南亚、印度等英国前殖民地地区，以及南美洲等西班牙和葡萄牙前殖民地地区，在当地各国民族的主动争取之下，都逐渐开始于1950年代、1960年代实行民族自立、民主制度建国运动。正是这样的民主运动，导致今天联合国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行了一人一票的真实民主选举政治制度。甚至连中国、越南、朝鲜、古巴、伊朗等少数专制独裁国家，也都要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宣称自己所实行的政治制度，也是“民主制度”。

。。。。

二战结束时、成立联合国初期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则是对于二战后世界格局发展的另一份重要政治文件。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催生者，正是罗斯福总统夫人。她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缔造者、首任主席。世界人权宣言的背景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精英们，在希特勒纳粹种族屠杀等残忍事件中，痛定思痛，呼吁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应当拥有信仰自由等人身权利。换言之，人们应当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理念，而这种权利应当受到保护。

相对于专制独裁、因言获罪的政治制度而言，《世界人权宣言》的确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思想理念。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并非是终极的、绝对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信靠和寻求那创造宇宙天地、赐予我们生命的主，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

【而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主旨是，上帝以爱和恩典来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使我们在心灵中、从罪中回转、真挚地归向他。在今世恩典的时代，上帝用微小的、温柔的声音对我们的心灵说话，而不是用狂风暴雨、武力来胁迫我们；他以十字架的爱来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命，替我们尝清罪债，——使每一个愿意悔改己罪、信靠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都能够进入他的天上国度，得到那永远的生命。】

关于《大西洋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的思想中所包含的内容之利弊，我们在前文刚刚讲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在这里，我们特别想针对罗斯福总统、以及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一生及其影

响，作一些重要的反思。

罗斯福总统夫人所代表的理念，正是今天在美国社会（尤其是政、法、史、经、哲等上层建筑领域）登堂入室、大行其道的左派思想的鼻祖。这种思想代表着，包容一切，宽容一切，凡事都无所谓对错；道德相对主义；等等。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剧变、包括嬉皮士、性解放、离婚率爆炸式增长、等等；也导致了二十一世纪的同性恋大行其道、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无原则地偏袒黑人、等等。

在基督教信仰中，包含着两个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1）憎恨罪，（2）爱罪人。只有当我们——对于上帝、那位宇宙天地之主、道德法则的给予者与审判者，——有着真挚敬虔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饥渴慕义，既热爱世人，同时秉公行义、存谦卑怜悯的心。

在许多西方左派的思想理念中，虽然看似也包含着许多博爱主义，但是，若我们认真地深究，就会看见，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公正、公义、饥渴慕义之心，而是在内心深处，以自己的权衡为分别善恶的标准。

。。。。

从婚姻是否幸福的角度而言，罗斯福总统与罗斯福总统夫人之间的婚姻，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真爱【甚至在婚后的漫长岁月里，在婚外情、奸淫之事上屡次犯了罪】，而仅仅是在以保守主义、敬虔主义文化为主流的1940年代美国社会中，维持着一种表面婚姻形式上的政治夫妻。甚至，他们的婚姻，远远不如同时代的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的爱情婚姻【二人在婚后一直持守忠贞、相亲相爱、直到去世】。

在政治光谱上，罗斯福总统属于中间偏左，而罗斯福总统夫人则是鲜明的政治左派【他们都是美国民主党的主要核心力量】。甚至，与同时期的很多欧美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她似乎也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不少兴趣【或至少有一定程度的容忍】。这正是因为，共产主义所表达的那种“打土豪、均贫富、阶级斗争、解放劳苦大众、无神论、人类应当自己解放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理念，与他们内心、心灵与灵魂的光景，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吻合。【殊不知，正如苏联、东欧各国、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等马克思主义国家所无一例外地显明的，当人们背离了那对于上天的敬虔信仰与敬畏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地上为自己寻找偶像，并会沉浸于自傲、自义、欺谎、甚至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罪中，——从而导致专制独裁主义，把人民置于铁蹄和铁拳统治的奴役制度之下。】

请注意，我们并非是在这里说，美国共和党就是好的、无可指责的；或政治右派就是好的、等等。而是，我们想要在这里强调的是，在美国民主党与美国共和党之间，都包含着基督教信仰的思想理念成分【民主党（即，政治左派）的立场，类似于“爱罪人”；而共和党（即，政治右派）的立场，则类似于“憎恨罪”】；但是，在两者之间，必须要保持适当的平衡、而不可偏颇。更重要的是，在两者之中，都应当有敬虔、真挚、热忱的、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基督之救恩的信靠。——否则，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将要逐渐沉沦于罪中而不能自拔；——当有一天，主流美国社会大众都离弃了基督教信仰的时候，那么，美国政坛就会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那样，也将要充满各种政治动荡、分裂、甚至争战不休。

圣经

弥迦书6章8节

世人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　神同行。

____

杜鲁门总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9%87%8C%C2%B7S%C2%B7%E6%9D%9C%E9%B2%81%E9%97%A8

哈里·S·杜鲁门（英语：Harry S. 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美国民主党政治家，第34任副总统（1945年），随后接替因病逝世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成为了第33任美国总统（1945年－1953年）。

面对美国国内事务，杜鲁门总统正好遇上新一轮混乱的经济衰退周期，当时物资短缺、有无数罢工事件和有关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的争议，都是当代的写照。杜鲁门虽于1948年成功连任总统，但却未能成功掌握国会多数，以致于他的“良政”计划几乎全部流产。然而他曾率先以行政命令在美军内部施行废除种族隔离，并因应形势主持第二次“红色恐慌”，从政府部门辞退了数以千计可能影响国政的共产党同情者。不过，由于受到一连串财政丑闻打击，有达数百位由他任命的官员必须辞职。

面对美国外交事务，杜鲁门总统任内发生了不少世界大事，首先是盟军战胜纳粹德国、美国在广岛与长崎投放原子弹、日本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接着是联合国的成立、以重建欧洲为旨的“马歇尔计划”的落实、杜鲁门主义对抗共产主义、冷战的开始、中国国共内战、北约的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方面，朝鲜战争使44,000名美军阵亡和失

踪，并直接破坏杜鲁门第二次连任的计划。最终，共和党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凭借反对杜鲁门运动与标语“韩国！共产主义！贪污！”赢得人心，而在1953年出任总统，结束了民主党长达20年执政。

杜鲁门是位素以友善和谦逊闻名的总统，他的不少名言，如“推卸责任止于此”（The buck stops here!）和“怕热就别进厨房”（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get out of the kitchen.）等等，都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相比前任总统，杜鲁门支持度不算高，但他谨慎果断的性格令他在面对险峻的国际情势时，可以完成许多艰巨挑战。

家庭背景

1884年5月8日，杜鲁门出生于密苏里州拉马尔，是约翰·安德森·杜鲁门（John Anderson Truman）和马莎·埃伦·扬·杜鲁门（Martha Ellen Young Truman）的长子。杜鲁门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分别叫约翰·维维安·杜鲁门（John Vivian Truman，1886年－1965年）和玛丽·简·杜鲁门（Mary Jane Truman，1889年－1978年）。

杜鲁门的父亲是一位农夫和家畜商贩，在杜鲁门11个月大的时候，举家迁到密苏里州格兰德维尤的由杜鲁门的祖父母所拥有的农场，农场占地达600英亩（240公顷）。为了方便上学，杜鲁门一家在他6岁的时候又迁移到密苏里州独立城。

早年经历

从事神职人员

1901年，杜鲁门从高中毕业后，从事了一系列的神职人员工作。1906年，

杜鲁门回到了格兰德维尤的农场并在那里度过了约十年的时光。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杜鲁门加入了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担任军官，并在法国带领一支炮兵部队，名为炮兵连D组，隶属于第35师60旅的129野战炮队。在体能方面，杜鲁门右眼视力为20/50，而左眼是20/40，但由于他在体能测试前秘密地记诵了视力检查表，所以他仍可以通过测试从征。

在前往法国之前，杜鲁门先在俄克拉何马州劳顿附近的锡尔堡接受训练。在受训期间，他被指派去打理军营的贩卖部（提供糖果、香烟、鞋带、汽水、烟草和撰写发给士兵的文件），因此营中几乎每位士兵都认识杜鲁门。为了方便打理贩卖部，他征募了曾在堪萨斯城的一家服装店当过职员的犹太裔朋友爱德华·雅各布森中士前来帮忙。此外，杜鲁门还在军营中认识了堪萨斯城政客汤姆·彭德格斯特的侄儿詹姆斯·M·彭德格斯特（James M. Pendergast），而这两位在战后对杜鲁门有一定的帮助。

在法国，杜鲁门上尉的炮兵连表现十分卓越，他们虽然在孚日山受到攻击，但他仍能够作出十分有效的抵抗。杜鲁门日后获擢昇为国民警卫队的陆军中校，而他一直也为自己在军队服役的背景感到相当自豪，因为在他的带领下，炮兵团的炮兵连D组在大战中没有损失过任何人。

婚姻和早期商业生涯

大战结束以后，杜鲁门回到了独立城，1919年6月28日，他迎娶了一直深爱的贝丝·华莱士。婚后，两人生有一女，取名玛格丽特·杜鲁门。

婚后一个月，杜鲁门把在西尔堡和海外服役所赚到的本钱，与好友雅各布

森开办了一家专卖男装的店铺，名为“杜鲁门与雅各布森”（Truman & Jacobson），位于堪萨斯城商业区的第十二街104号。雅各布森是杜鲁门的毕生好友，杜鲁门亦时常向他请教有关锡安主义的事。在最初的两年中，服装店可谓经营得非常成功，但到了1922年，由于谷物市场不景气，连带小麦和玉米价格下降，使丝质衣服供过于求。再加上服装店的客源主要来自以前129野外炮队的成员，所以服装店最后以破产结业告终。

原本1919年的小麦价格是每蒲式耳(bushel) 2.15 美元，可是到了1922年的时候，却只值每蒲式耳 88 美分，因此，杜鲁门归咎于共和党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认为梅隆的政策使他的服装店倒闭，而且之后又要工作数年，才能还清债务，于是这成为了杜鲁门日后加入民主党的一大因素。

投身政治

杜鲁门是最后一位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总统，但他曾经于1920年代在堪萨斯城法律学校（Kansas City Law School，即今日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大学的法律学校）读过两年的法律学位课程，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查理斯·埃文斯·惠特克曾经是他的同学。

1922年，杜鲁门向一位朋友缴纳了10美元的3K党入会费，但是这笔款项在不久以后又退还给杜鲁门，因此杜鲁门从来没有入会，从来没有出席3K党任何活动，亦从来不是3K党的会员。尽管杜鲁门曾经在日记对犹太人表示过憎恨，但他的朋友兼生意伙伴爱德华·雅各布森却是犹太人，而且杜鲁门在日后还成为以色列立国的一大推动者。

在堪萨斯城民主党领袖汤姆·彭德格斯特的帮助下，杜鲁门于1922年当选为密苏里州杰克逊县法院的法官。这个职位的性质和县首长相近，都是具行政性质，而不负责审理案件。其后，杜鲁门虽然在1924年竞选连任失败，可是他在1926年重新当选，并且在1930年连任。在任期间，他十分勤

奋，其中几项大型的公共建设项目，更为他获得不少赞誉，这些建设包括扩建道路以配合日益增长的交通量和兴建新的县法院大楼。此外，他还筹划在各地建造了十二座“小径圣母像”（Madonna of the Trail），以表彰杰出妇女对国家的贡献。

参议员

在1934年的美国参议院选举中，汤姆·彭德格斯特指定杜鲁门竞逐密苏里州的参议院席位，并支持总统罗斯福的“新政”。可是在民主党内部的提名选举中，杜鲁门却一度遭遇了竞争对手塔克·米利根（Tuck Milligan）。而塔克的兄长莫里斯·M·米利根在日后除了拉倒彭德格斯特的政治集团外，更在1940年的参议院选举与杜鲁门对垒。

参议院选举期间，尽管堪萨斯城有3人被杀，但选举没有被打断。最后在“彭德格斯特的参议员”的阴霾笼罩下，杜鲁门成功当选。任职参议员初期，他在彭德格斯特影响下大力支持“新政”，但杜鲁门本人指支持“新政”完全是自己的个人心态。

米利根在1936年对劳埃德·C·斯塔克当选密苏里州州长一事展开了调查，结果有258人被定罪。但更重要的是，米利根及后发现彭德格斯特从1927年至1937年间，都没有缴交联邦税款，而且又暗中诈骗保险。施塔克在竞选州长期间曾得到彭德格斯特的祝福，可是他在后来的审讯中却出卖和指证了彭德格斯特，并从彭德格斯特和杜鲁门手上，接管联邦政府发到地方、用作推行“新政”的资金。最终在1939年，彭德格斯特承认控罪，除了遭罚款10,000美元外，还被判入狱15个月。该次对彭德格斯特的审讯，曾因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又心脏病发，而多次拖延。

彭德格斯特失势后，1940年，圣路易斯民主党领袖罗伯特·E·汉尼根支持杜鲁门，成功连任参议员。后来在1944年，汉尼根又协助杜鲁门成为罗斯

福的副总统。

杜鲁门委员会

杜鲁门在战时领导一个委员会，通称杜鲁门委员会，负责调查军方有关行政混乱、浪费和诈骗资源等丑闻，为他搏得了不少名声和赞誉。其中，他对军方实施的“常识节流措施”，更使杜鲁门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敬重。最初，这个委员会被认为可能会损害军队士气，但事实证明委员会是一大成功，因为它为军方总共节省了至少110亿美元，而杜鲁门更因此出现在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杜鲁门曾9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其中在1945年和1949年更被选为“风云人物”。

副总统

职位：　　第三十四任美国副总统

任期：　　1945年1月20日－1945年4月12日

前任：　　亨利·A·华莱士

继任：　　阿尔本·巴克利

总统：　　富兰克林·D·罗斯福

政党：　　民主党

曾支持杜鲁门连任参议员的圣路易斯民主党领袖罗伯特·E·汉尼根，在1944年与杜鲁门达成协议，帮助他成为副总统。

当时汉尼根正出任民主党全国委员长，而总统罗斯福则因为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过分崇尚自由主义，希望予以撤换。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F·柏恩兹是其中的一位热门人选，但由于他的种族隔离主义者身份而被认为过于保守，所以汉尼根在芝加哥举办的1944年民主党全国会议中推

荐了杜鲁门，从而在194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出现了“罗斯福—杜鲁门”组合，结果这个组合在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至于汉尼根推荐杜鲁门一事，就被传媒称为“密苏里协议”。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杜鲁门宣誓就任副总统之后数日，即接替罗斯福任总统前的数个月，他公然出席了彭德格斯特的丧礼。据了解，他也是唯一一位列席的民选政府官员。

杜鲁门经常为自己支持彭德格斯特一事作出辩护，说到自己的得益大于回报。杜鲁门又说，当他晋身参议院的时候，彭德格斯特曾忠告到：

“闭上你的嘴，专心回你的邮件。”

第一届总统任期（1945年－194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

杜鲁门出席波茨坦会议，指令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杜鲁门是在罗斯福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时被任命为副总统的，而任职副总统的时间只有82日，因此他们两人没有开展重要的合作，一些主要计划如曼哈顿计划，杜鲁门亦没有参与。

在1945年4月12日，正当杜鲁门在国会和议长山姆·雷伯恩一起的时候，杜鲁门被传召到白宫。到达白宫后，埃莉诺·罗斯福告诉他罗斯福已经身故。于是杜鲁门慰问可以为她做什么，但这位前第一夫人却反问道：“我们有什么事可以为你效劳吗？你现在可正身陷困境。”

杜鲁门曾告诉传媒：

“我的感觉就像月亮、星星和所有星球都要坠落到我身上。”

以下摘录了杜鲁门上任后首五个月所发生的大事：

4月25日－各国代表在加里福尼亚州旧金山决议成立联合国

4月28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被杀

5月1日－希特勒已被宣布自杀身亡

5月2日－驻守柏林德军向苏军投降

5月7日－纳粹德国投降

5月8日－欧战胜利纪念日

7月17日至8月2日－盟国召开波茨坦会议，商讨如何重建战后秩序

8月6日－盟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杀害10万余名平民

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

8月9日－盟军在长崎投下原子弹，杀害约16万名平民

8月14日－日本同意投降，是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9月2日－日方在USS密苏里号上正式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联合国

杜鲁门在二次大战后意识到美国和苏联不再存在共同敌人和利益，因此他在政策方针上明显有抗衡苏联的倾向。作为一名“威尔逊国际主义者”，杜鲁门强烈支持成立联合国，并在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襄助下，促

成了首次联合国大会的召开，以回应社会在战后渴求和平的心态。

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

虽然杜鲁门谦称自己不熟悉外交事务，国会又为共和党所控制，但是他仍凭国内浸信会教徒的支持，而发表了“杜鲁门主义”及落实了“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实行“围堵政策”的开端，他先后请国会拨款4亿美元，支援希腊和土耳其对抗共产主义，又于1947年3月12日发表到：

“我认为支持自由人民对抗内部少数的武装行动，或外部压迫者的征服，必须成为美国的政策。如果希腊倒下了，整个中东将会陷于混乱无序的局面。全球的自由人民，都渴望得到我们的支持以捍卫自由。若果我们在犹豫不决，就可能会危及世界和平……我认为我们应该主要透过财政援助来给予支持……此外，我要求国会授权派遣美国非军事和军事人员到希腊和土耳其……”

为了使国会通过对“马歇尔计划”拨款，杜鲁门则尽量把国会的目光移到共产主义，指出共产主义正在欧洲的落后地区兴旺发展。另一方面，为了强化美国在冷战中对抗共产主义，他签署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又分别成立了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美国空军（独立自美国陆军航空军）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良政

经过民主党多年来在国会取得多数优势和持续由民主党人士出任总统，国民开始出现了厌倦，以致共和党在1946年中期选举重新在国会取得了多数优势。共和党除了在众议院有55席的增幅，在参议院也有数席的增长。杜

鲁门一向在外交事务上与共和党领袖有密切的合作，可是在国内事务上，两党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杜鲁门未能成功阻止减税和取消价格管制，而在《塔夫脱—哈特莱法》的争论上，他曾对法案加以否决，但否决决定最终遭国会推翻，以致工会势力受到相当的削弱。到了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再次向国会要求加税。

到了1948年的大选，杜鲁门声言自己是民主党的一分子，会贯彻“新政”的传统，因而在政纲中提出了不少的建议，包括提倡实施全民医疗保险、推翻针对工会的《塔夫脱—哈特莱法》，以及一系列激进的保障民权的立法措施。这些政纲在后来归类为“良政”。

然而杜鲁门的“良政”计划并不获普遍支持，当中只有一项主要的法案得到通过。

承认以色列

杜鲁门早在1939年已支持锡安主义的运动，并且有份策划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在1946年，英美调查委员会建议在巴勒斯坦地区逐步建立两个国家，以防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在该地区取得支配地位。可是，这个建议没有得到舆论支持，而驻守巴勒斯坦的英军因频频受到锡安主义集团的袭击，使英国政府备受压力，促成了撤军。结果在英国的催迫下，联合国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建议立即把巴勒斯坦分割成两个国家，这个建议在杜鲁门的支持下，于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中获得通过。英国政府于是宣告在1948年5月15日正式撤出巴勒斯坦，但阿拉伯联盟会议的成员国却对联合国的决议表示反对，并派兵到巴勒斯坦外围。

当时杜鲁门与国务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出了现明显分歧，与此同时，美苏关系也日趋紧张。最终，杜鲁门在以色列单方面立国后的11分钟，即确认了其主权，但是这个决定，在国内外均引起很大争议。

柏林空运

在1948年6月24日，苏联在未经咨议盟军的情况下，单方面中断了前往柏林之美、英、法占区的陆地通道，而柏林正位于苏联所占的东德之内，显示出苏联有迫使盟国撤出西柏林的意思。结果，美国驻德国美占区的司令卢西乌斯·D·克雷将军建议，沿着由西德至西柏林的高速公路，对西柏林进行大规模的空运物资，以示公义。空运本身将以完全和平的方式进行，但若果空运队伍遭受攻击或被迫中断，就应该作出防卫。然而，杜鲁门听取意见后，相信柏林空运计划很有可能会触发战争而表示忧虑。但最后在6月25日，盟国仍然决定对柏林空运，一直至1949年5月11日，前往西柏林的道路重开，空运行动才告结束。

国共内战

1947年，杜鲁门命令组成调查团再访华。魏德迈报告内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统一中国，他建议美国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惟不被美国政府采纳，撰写之报告更被列为机密被束之高阁。且美国总统杜鲁门坚决反对其意见，并在杜鲁门总统支持下，乔治·马歇尔已下令自1946年7月29日到1947年5月26日，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经杜鲁门批准后对国民政府援助4亿美元，其中1.25亿美元特别赠款用于自行购买军事物资而非直接援助 。由于各方的拖延，直至1948年底第一批物资才运抵中国。

杜鲁门政府清楚自己的对华政策，军经援助、调停行动均使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失败，决定赶在国共分出最后胜负前，采取“袖手旁观”政策，在盟友中华民国在大陆全面崩溃前尽速脱身。

消除军方种族差别待遇

自从【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以来，每届联邦政府都没有再关注民权的发展，而杜鲁门正是第一位重新关注民权的总统。在1946年，美国本土发生了数宗残暴的私刑，其中有两名黑人男子和两名黑人妇女在乔治亚州的

沃尔顿县附近被杀害；另外亦有一名刚从二战战场退役的非洲裔军人遭到虐待，称为艾萨克·伍德沃德事件。这些滥用私刑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对民权的关注，并促使杜鲁门在1947年发表一份名为《保障这些权利》的报告。该报告对改革民权提出了10点议程，包括将私刑列入联邦罪行。到了1948年2月，杜鲁门总统将这些议程提到国会，并建议设立几个联邦政府职位，以专责落实一些如选举权和平等就业等人权。

可是这些改革却招来南部民主党员在党内总统提名大会表达出强烈反对，但杜鲁门对此不以为然，并说："我的祖先是联盟国【即南北战争期间的南方】的人……但当我得知刚从海外归来的黑人士兵，在密西西比给抛出军车之余，又遭到毒打，我立即感到了反胃。"

第二届总统任期（1949年－1953年）

1948年大选

1948年11月2日，在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杜鲁门出乎众人预料之外，在大选中胜出。

在民主党全国党大会中，杜鲁门意图淡化他在民权方面的政纲，以缓和党内南北派系的冲突。可是，美国参议院候选人兼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长休伯特·汉弗莱在地区党领袖支持下，在会上建议民主党应采取更积极进取的人权政策，结果建议被杜鲁门全心全意地采纳。不出两星期后，杜鲁门签署了《行政命令9981号》，指令在美国军队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但杜鲁门事实上十分担心支持民权改革会带来政治风险，至于失去南方迪克西民主党人的支持，更有可能拖垮民主党。

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在民意调查中被认定稳操胜券，而盖洛普民意测验在大选前两星期，即使还有14%游离票，也停止了民意调查。结果，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创造者乔治·盖洛普犯了一个在日后不再重蹈的错误，他总结到："游离票站到了执政者的一方。"

杜鲁门站在火车车尾，沿着铁路穿州过省，到各地短暂停留，发表演说的竞选手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日后更成为每届总统竞选必备的重要环节。

杜鲁门在第一届任期没有副总统，在第二届任期则以艾尔本·威廉·巴克利出任副总统。

核武僵局

苏联在比预期中快的情况下，成功研发原子弹，更在1949年8月29日进行了首次试爆，从而促成了大战后的军备竞赛。在1953年1月7日，杜鲁门亦向外界宣布，美国已经成功试爆体积更大的氢弹。

新中国

1948年11月2日，杜鲁门竞选连任总统成功，击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为了争取美国对他再次的支持，再度派遣宋美龄前往美国，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态度冷淡。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做代理总统，但蒋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幕后操控政局。阎锡山出任国防部长兼行政院长在广州发号施令。蒋介石先后访问菲律宾及韩国会晤季里诺与李承晚，商议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中国内部战事方面，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攻陷国府首都南京，中共在全国战事明显占了上风，中华民国大势已去。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共占领南京后，并未随他国公使南下广州，而是留在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随后被召回美国。1949年6月，美国媒体还刊出了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承认中共的新闻。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为辩护其对华静观政策；白皮书严词批蒋，表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是国民政

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该书发表后，美国停止对中华民国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严重打击国府战斗士气。

不久，国民政府迁台，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隔年）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声明。

另外，受民主党传统左翼思想影响，杜鲁门对中国共产党一度抱有幻想，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可以容纳资本主义思想，认为有可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出苏联阵营，更试图在194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正式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投入苏联怀抱。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将不以任何方式干预中国目前局势，或进行足以使美国牵涉于中国内争的措施。”美国不拟在中国使用武装力量，不以任何方式干预中国内争，不予国民政府军事援助和劝告，但美国政府将继续给国民政府有限经济援助。

阿尔杰·希斯与麦卡锡主义的兴起

在1948年8月3日，《时代周刊》资深编辑惠特克·钱伯斯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提交一份名单，上面载有自1930年代至1940年代于美国政府内暗中活动的共产党员。该名单上载有阿尔杰·希斯的名字，而希斯是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曾参与创立联合国。事后，希斯在1948年8月17日找钱伯斯当面对质，白宫的官方回应亦要求终止对希斯的调查，以引开公众的注意。

然而两人的对质与白宫的回应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在1948年11月，钱伯斯带领两名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员到马里兰州的一块南瓜田，并在一个空心的南瓜中找到四枚微型胶卷。微型胶卷内所载的资料则在后来被称为“南瓜文件”。（事件亦使加里福尼亚州参议员尼克松一举成名，因为他

后来对着这些胶卷，摆出一个拿着放大镜的姿势，拍摄了几张广泛流传的相片）

1950年2月9日，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惠灵的共和党妇女大会上发言，指国务院涉嫌与共产党员纠缠不清。当时苏联正试爆核武、中国又成为共产国家，国内又有阿尔杰·希斯一案，结果麦卡锡透过在国内冒升的反共主义，成功从公众取得相当的支持，并揭开了“麦卡锡主义”时代的序幕。

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南征大韩民国，更差不多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杜鲁门立即强烈要求联合国作出干预，故此以道格拉斯·迈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在1950年10月成功把朝鲜人民军退回至中国边境一带。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全自身，以支援朝鲜之“志愿军”的名义对战事作出干预，迈克阿瑟立即建议杜鲁门出兵袭击中国在鸭绿江一带的军事基地，在必要情况下，更可以动用原子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援朝的情况下，联合国部队被迫南撤，而战线在1951年春天的时候，更退回战争爆发时的地区。但杜鲁门不同意迈克阿瑟的观点，担心他的方案会使苏联加入，使大战升级，最终有爆发核子战争的可能。于是迈克阿瑟在总统反对的情况下，公开广播出他对战事的意见，表示马歇尔使华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自由世界现在为此以鲜血和灾难付出代价；而且更不服从杜鲁门的指令。结果在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解除了迈克阿瑟的职务，并召他回国。此后朝鲜战争成为了僵局，直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任总统后，方于1953年7月27日达成了停火协议。

放任中国赤化，而造成朝鲜战争这场原本可能不会发生的战争与解除迈克阿瑟的职务，使杜鲁门在国内变得极不受欢迎，更促使他在1952年的大选不再寻求连任。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杜鲁门在1952年2月的支持率为

22%，是有史以来在任美国总统所得到的最低支持率。

翻新白宫

和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的是，杜鲁门入住白宫的时间非常之短。理由是有屋宇结构专家在他上任后不久指出白宫随时有倒塌的危险，部分主因是因为在1812年战争中，白宫的墙壁和地基曾被火焚烧，以致在结构上出现了问题。于是杜鲁门对白宫的地基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另外又在白宫的南翼柱廊的第二层，加建了一个阳台（即所谓的“杜鲁门阳台”）。至于杜鲁门一家则搬到附近的布莱尔宫，作为自己的“白宫”。

险遭刺杀

在1950年11月1日，两名分别叫杰斯里奥·托里索拉（Griselio Torresola）和奥斯卡·柯拉索（Oscar Collazo）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企图于布莱尔宾馆行刺杜鲁门，但行刺失败。柯拉索被裁定谋杀罪成，于1952年被判处死刑，不过后来得到杜鲁门减刑为终身监禁。

事件发生后，杜鲁门决定在波多黎各举行一次民主的公民投票，以决定波多黎各的地位和与美国的关系。最终波多黎各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并确立成为美国的自治邦。

连串丑闻

在1950年，参议院在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的带领下，对政府高级官员受贿进行调查，当中发现不少官员曾收受过名贵皮草和冰箱一类的物品，而国税局更牵涉在内。结果一共有166名国税局员工辞职或被解雇，部分人更被司法部控告瞒税和贪污等罪行。一般历史学家都同意杜鲁门没有牵涉到国税局的贪污丑闻，亦相信他对此并不知情—但却有一次

例外。在1945年，一位香水公司总裁送了一部十分昂贵的新型号冰箱给杜鲁门太太，该名商人其后在杜鲁门和他的好友哈利·佛汉将军的协助下，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取得优先前往欧洲的机票，而那名商人在回程时又与一位伤兵强夺机位，伤兵“被挤下机”。事件在1949年曝光，使杜鲁门大为尴尬，但他仍然大力为佛汉将军作出辩护，可是实际上，佛汉将军本人当时被一连串的白宫办公室丑闻缠身。

到了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发起一连串运动，指政府混入了不少苏联特工，再次使杜鲁门政府备受困扰。早于1947年，杜鲁门设立了一个“效忠委员会”，调查联邦政府是否混入了间谍。后果是，自1947年至1952年，大约有20,000名公务员遭到调查，当中有约2500人“自愿”辞职，400人被辞退。另外自1945年至1946年，约翰·埃德加·胡佛多次向杜鲁门作出警告，指财政部的助理部长哈利·德克斯特·怀特是苏联间谍。加拿大总理亦同样向FBI警告要注意怀特，而来自苏联的变节人士也证实了这个情报。

曾签署的重要法案

国家安全法案－1947年7月26日

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12日

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1948年4月3日

内阁

（所有在1945年供职的内阁官员均原先在罗斯福政府供职）

职位　名称　任期

总统　哈利·S·杜鲁门　1945年–1953年

副总统　　空缺　1945年—1949年

艾尔本·W·巴克利 1949年—1953年

国务卿　　爱德华·斯戴迪纽斯　　1945年

詹姆斯·F·柏恩兹 1945年—1947年

乔治·C·马歇尔　1947年—1949年

迪安·G·艾奇逊　1949年—1953年

财政部长　　小亨利·摩根索　　1945年

弗雷德·M·文森　1945年—1946年

约翰·W·斯耐德　1946年—1953年

战争部长　　亨利·L·史汀生　1945年

罗伯特·P·帕特森 1945年—1947年

肯尼士·C·卢瓦尔 1947年

国防部长　　詹姆斯·V·福莱斯特　　1947年—1949年

路易斯·A·约翰逊 1949年—1950年

乔治·C·马歇尔　1950年—1951年

罗伯特·A·洛威特 1951年—1953年

司法部长　　弗朗西斯·比德尔　1945年

汤姆·C·克拉克　1945年—1949年

J•霍华德•麦葛瑞斯　　1949年–1952年

詹姆斯•P•麦格雷纳里　1952年–1953年

邮政部长　　法兰克•C•沃克　1945年

罗伯特•E•汉尼根 1945年–1947年

杰西•M•唐纳德森 1947年–1953年

海军部长　　詹姆斯•V•福莱斯特　　1945年–1947年

内政部长　　哈罗德•L•伊克斯 1945年–1946年

朱利叶斯•A•克鲁格　　1946年–1949年

奥斯卡•L•查普曼 1949年–1953年

农业部长　　克劳德•R•威卡德 1945年

克林顿•P•安德森 1945年–1948年

查尔斯•F•布兰南 1948年–1953年

商业部长　　亨利•A•华莱士　1945年–1946年

W•艾夫里尔•哈里曼　　1946年–1948年

查尔斯•W•索伊尔 1948年–1953年

劳工部长　　弗朗西斯•珀金斯　1945年

刘易斯•B•施韦伦巴赫　1945年–1948年

莫里斯•J•托宾　1948年–1953年

任命最高法院法官

杜鲁门任内任命了下列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哈罗德·希茨·柏顿－1945年

弗雷德·M·文森（首席大法官）－1946年

汤姆·甘贝尔·克拉克－1949年

雪曼·明顿－1949年

卸任总统以后

1952年总统大选

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第22号修正案》，防止总统寻求第三届任期（若该总统曾有一次为期多于两年的任期，该总统日后只可有多一届任期），但杜鲁门不在此限。

1951年夏季，杜鲁门解除迈克阿瑟职务后不久，杜鲁门邀请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时仍未决定加入什么政党）为民主党出选总统、而自己则当他的副总统，但遭他拒绝。

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时候，由于杜鲁门没有对任何民主党候选人作明确支持，自己又没有宣布放弃竞逐，结果杜鲁门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在新罕布什尔州，任何人可未经当事人同意，在初选中作出提名）。然而，杜鲁门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被党内的埃斯蒂斯·基福弗击败后，3月，杜鲁门宣布放弃竞逐连任，又极力劝说伊利诺州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参选，最终史蒂文森成为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后来两次败给艾森豪威尔。

杜鲁门图书馆与回忆录

杜鲁门卸任后离开了华盛顿，搬到了他岳母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居所，并到各地发表演说和撰写回忆录。另外，杜鲁门又模仿他的前任总统罗斯福，在1957年出资成立了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捐赠予联邦政府。这也是自《1955年总统图书馆法案》通过以来第一所建立的总统图书馆，以后每位卸任总统都会建立一所总统图书馆。

杜鲁门任总统时曾落实通过对退休公务员发放退休金。可是他认为卸任总统接受任何的捐赠，都有损全国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和尊严，因而加以拒绝。虽然他卸任后从撰写回忆录赚取到600,000美元，但是当中的大部分款项均用作了交税和支付协助撰写回忆录的人员的薪水。

杜鲁门分别在1955年和1956年出版了两本回忆录：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Year of Decisions》（第一集，ASIN B000BC81YE）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Years of Trial and Hope》（第二集，ASIN B000CQXZWM）

有鉴于杜鲁门的财政状况，国会在1958年通过了《卸任总统法案》，向卸任总统每年发放25,000美元的退休金。当时另一位在世的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虽然并不缺钱，也领取了这份退休金，据了解是为免使杜鲁门尴尬。

晚年生活

在1956年，杜鲁门伉俪出访欧洲，一时间成为了全球的焦点。在英国，杜鲁门获牛津大学颁发民法学荣誉学士学位，并最后一次和朋友丘吉尔会面。回程美国前，他又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作全力支持（他最初支持纽约州州长W·艾夫里尔·哈里曼）。

杜鲁门年届80岁的时候，获宴请到华盛顿，并准备在参议院发表讲话，但因为他在欢迎仪式上大受感动，而不能言语。当时美国在越战泥足深陷，后来共和党政府又爆发水门事件，结果使杜鲁门的支持度急升，更为参议院候选人助选。

在1964年，杜鲁门在浴室跌倒，撞伤了额头，折断了两条肋骨，眼镜也撞碎了。自此，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并中断了以往每天到总统图书馆的习惯。1965年，约翰逊总统在杜鲁门图书馆签署了《医疗保健法案》，并把首两张医疗保健卡发予杜鲁门和妻子贝丝。杜鲁门亦曾在任内争取落实全民医疗保健，然而完全没有实践。

到了1972年12月5日，杜鲁门因肺炎引发肺气肿，被送往堪萨斯城研究医院及医疗中心。最终于12月26日因器官衰竭逝世，享年88岁。他死后被安葬于杜鲁门图书馆。

约翰逊是唯一一位出席了杜鲁门葬礼的在世前总统，但他自己在约一个月后亦因病逝世。

以色列国的成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srael

以色列国是位于中东地区的一个主权国家，1948年5月14日独立建国，人口900余万，主要人口为犹太人，以希伯来语为官方语言，通用英语。

以色列位于亚欧大陆交界处，自古为各民族交汇之处。其国家位处阿拉伯半岛西北角、地中海东岸和红海亚喀巴湾北岸，与巴勒斯坦领土（约旦河西岸地区、加沙地带）交错相邻，北接黎巴嫩，东北邻叙利亚，东与约旦接壤，西南则为埃及西奈半岛。

以色列领土范围不大，根据联合国1947年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以色列面积1.52万平方公里。经过四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目前实际控制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以色列国土南北长约470km，东西最宽处宽约135km，整体南北长，东西窄。地形和气候相当多样。以色列的金融及科技创新中心为特拉维夫，而耶路撒冷则为其法定首都、各政府机构所在地（国防部除外）及其辖下的第一大城市，外国使领馆驻特拉维夫。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在国际上有争议。

以色列所居领土历史上曾为多个国家统治。包括古埃及、新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帝国、哈斯蒙尼王朝、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十字军、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大英帝国。1918年，奥斯曼帝国一战战败，退出该地区，随即阿拉伯部落纷争。1922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托管。受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和反犹

主义影响，二战后，大批犹太移民迁入。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确定支持在巴勒斯坦托管地推行分治方案，支持以巴分别成立独立国家，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则由国际管理。

1948年5月15日零时，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终止。以色列建国次日，邻近的阿拉伯国家便集结了军队发动第一次中东战争争夺前巴勒斯坦托管地，与以色列军队交战，后双方战线沿当今被称做“绿线”处停战。约旦占领了绿线至约旦河的地区，并于1950年宣布将其并入约旦王国，约旦认为此地所有的阿拉伯人为约旦国民。

此后，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多次发生阿以冲突，以色列逐渐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1967年–现在）、西奈半岛（1956年–1957年、1967年–1982年）、南黎巴嫩局部地区（1982年–2000年）、加沙地带（1967年–2005年；但2005年撤退后仍被视为占领）以及戈兰高地。 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范围拓展至戈兰高地和东耶路撒冷。根据1993年以巴签订的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B”和“C”区行使部分或完全的管辖权，“A”区则由阿拉伯人完全自治。由于以阿双方多年以来都未遵循或承认1947年联大181决议划定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国界，冲突不断，国际社会只能有限调解以巴冲突，至今仍未达成和平。以色列至今不承认巴勒斯坦为独立国家，但以色列和埃及及约旦已经分别签署和平条约。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数据，以色列人口于2019年已达到900万，为世界唯一的犹太人占多数国家，其中约75%为犹太裔，20.8%为阿拉伯裔，人数达177万（包括德鲁兹派和多数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绝大多数阿拉伯裔以色列人为定居的逊尼派穆斯林，少数为半定居的内盖夫贝都因人；其余则为基督徒和德鲁兹人。其他少数族裔包括马龙派、撒马利亚人、多姆人和罗姆人、非裔希伯来以色列人、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越南船民等。以色列亦有一定数量的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外国劳

工和政治庇护者。

依根据《以色列基本法》，以色列为“犹太和民主国家”。以色列为代议民主制国家，采用议会制、比例代表制和普遍选举制。总理为政府首脑，议会为立法机关。以色列为一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2014年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37。该国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力，为全球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公民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亦为世界最高之一。其生活水平为中东最高和亚洲第四高，其人口预期寿命亦居世界前列。

中世纪和奥斯曼时期

公元638年，穆斯林从拜占廷帝国夺取该地区的控制权，之后一千多年数个穆斯林帝国统治过这个地区；包括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花剌子模和蒙古帝国，在1260年至1517年间由马木留克王朝统治，接着在1517年成为奥斯曼帝国一个省份。至1918年奥斯曼帝国于一战战败，由英国托管。

英国托管时期与锡安主义和犹太人回归

近几个世纪以来，诸多流亡海外的犹太人一直试图返回以色列。18世纪便开始有数波小型的回归潮，从数百到上千人不等。在1878年，佩塔提克瓦出现第一个大型的犹太人农场社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回归浪潮则始于1881年，散居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来到中东定居，并从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

1896年，基于犹太人在东欧受到种种迫害，维也纳记者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发起了锡安主义运动，又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该运动号召散居全世界的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尔，他召集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大会决议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或国家）”。“犹太国民基金”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等相应机构成立，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锡安主义运动的发展推动“第二次回归浪潮”（1904－1914年），约有四万名犹太人返回定居。

此时该地区仍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省。一战中，1915年，在丘吉尔的主导下，英法军队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了加里波利之战，遭遇失败。随后1915年7月至1916年1月，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与地方首领侯赛因·本·阿里互通信函，达成著名的麦克马洪-侯赛因协定，并由英国陆军中尉军官，阿拉伯的劳伦斯，组织当地以贝都因人部落为主的军事力量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有效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

1916年5月16日，英国的中东专家“马克·赛克斯”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皮科”又签订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图获得法国中东军事力量的支持。

1917年一战尚未结束时，英国外长贝尔福发表《贝尔福宣言》：“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

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完全退出中东地区并于1923年瓦解，而阿拉伯部落之间纷争不断，最后1918年默认由英国占领。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英国决定将今叙利亚地区转交法国，将今伊拉克地区划给费萨尔·伊本·侯

赛因；1920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管辖其余部分。1922年英国将托管地划分为两部分：东部外约旦地区（现约旦）为哈希姆家族管理，西部内约旦地区被正式称作巴勒斯坦地区为英国管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掀起“第三和第四次回归浪潮。

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引发“第五次犹太人回归浪潮”。

1944至1948年之间，约20万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来到巴勒斯坦地区。

以色列复国和第一次中东战争

1948年5月15日，英国政府决定结束巴勒斯坦托管者的身份。

犹太人的移民数量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保持增长；受到二战中的犹太人大屠杀影响，移民数量骤增，犹太人复国主义情绪高涨。

分别建立犹太人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巴勒斯坦国的分治理念也获得联合国支持。联合国成立“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表决《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33国赞成（包括美国和苏联），13国反对，10国弃权（包括英国），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之前约旦河东岸的上巴勒斯坦领区77%于一战结束不久的巴黎和会已划给哈希姆家族管理，成为今天的约旦）；约旦河西岸划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分治，分为多块交错的领土，两国分别拥有大约55%和45%的领土；耶路撒冷被置于联合国的管理之下，以避免双方发生冲突。

分裂方案在已开发领土上大致采取照顾传统聚居点、按人口比例均分的原则，但考虑到未来大量犹太难民的迁入，将南部人烟稀少的内盖夫沙漠划入犹太国，故犹太人以相对少的人口占据较多的领土。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分治方案的当日，本-古里安接受该方案，但阿拉伯国家联盟认为联合国无权干涉当地事务不予承认，坚持不让以色列复国，作为占领和托管方的英国对决议表决弃权。于是阿盟国家对以色列展开为期三天的军事行动，紧接着犹太人组织民兵部队展开还击，这些战斗很快便蔓延为大规模的冲突，继而引发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1948年5月14日，在英国的托管期结束前一天，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

在以色列复国的隔天，英国宣布结束托管，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对以色列“驱逐”（阿拉伯不承认以色列国，因此名为宣战，但实际是没有这样的正式宣言），几天内集结军队开始第一次中东战争的进攻。北边的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军队都在接近边界的地方被阻挡下来，来自东面的约旦军队则攻下耶路撒冷的东部，并且对城市的西部展开攻击。在缺乏外国正式军援的情况下，犹太人民兵部队阻挡约旦军队，而地下的国民军组织部队也阻止来自南方的埃及军队。

7月9日，以色列军队向阿拉伯军队发动攻击，这次进攻名为“十天进攻”，取得胜利。在数个月的战斗后，双方在1949年达成一则停火协议并划清暂时的边界，这条边界线被称为“绿线”（Green Line）。以色列在约旦河的西方占领额外的23.5%的管辖领域，约旦则占有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南部一块山地区域和撒马利亚，后来那里被称为西岸地区。埃及在沿海地区占有一小块的土地，后来被称为加沙地带。

随着1948年的战争，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口开始迁入以色列，大量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使得以色列的人口遽增两倍。在接下来几年里将近850,000名瑟法底犹太人移民，其中约有600,000人迁移至以色列，其他的人则移民至欧洲和美国。

以色列行政区划包括以下六个行政区（括号内为首府）：

1 北部区（拿撒勒）

2 海法区（海法）

3 中央区（拉姆拉）

4 特拉维夫区（特拉维夫）

5 耶路撒冷区（耶路撒冷）

6 南部区（贝尔谢巴）

另外，以色列还有以下三个争议地区（括号内为争议地区所属的行政区）：

A 戈兰高地 （北部区）

B 约旦河西岸 （犹大-撒马利亚区）

C 加沙地带 （加沙区）

主要城市

以色列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

#	名称	人口
1	耶路撒冷	801,200
2	特拉维夫-雅法	404,500
3	海法	269,300
4	里雄莱锡安	231,700
5	阿什杜德	211,400

6　　　佩塔提克瓦　210,800

7　　　贝尔谢巴　　195,800

8　　　内坦亚　　　188,200

9　　　霍隆　182,000

10　　伯尼布莱克　161,100

政治制度

以色列是一个实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有实行选举权。大多数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等地区的阿拉伯人都有权获得以色列国籍，但他们之中大多数都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主权而拒绝以色列国籍，虽然没有国籍，但他们拥有以色列的永久居留权。分治后的巴勒斯坦人同样没有，但有权获取以色列国籍。无以色列国籍者没有在以色列投票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基本法与法律

以色列没有正式的成文宪法，而是有12部以色列基本法，包括《议会法》、《国家土地法》、《总统法》、《政府法》、《国家经济法》、《国防军法》、《耶路撒冷法》、《司法制度法》、《国家审计长法》、《人的尊严与自由法》、《职业自由法》和《犹太民族国家法》共12部基本法。

以色列的法律系统混合了英美法系、欧陆法系和犹太法典的影响，另外也受到以色列独立宣言的影响。法律体制建立在先前判例的原则上。

最高法院、地区法院和基层法院三级制组织系统，此外还有军事法庭、宗教法院和劳资法院。以色列的法庭采取抗辩制度，而不是审讯制度，当事

人（原告和被告）必须自行将证据带到法庭上，法庭并不会作任何独立的调查。如同欧陆法系一样，以色列不设陪审团制度，案件是由专业的法官判决。许多主要的以色列法规（例如契约法）也都受到欧陆法系的影响，是根基于民法的原则上。以色列的法规并不是由法典组成，而是由单独的法规构成。宗教法庭（犹太教、伊斯兰教逊尼派、基督教以及德鲁兹派）则在婚姻的离婚判决上拥有独占的法律权利。

行政

以色列总统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主要只是担任礼仪上的象征，总统另外必须指派国会里的多数党或多数派联盟领袖作为总理。以色列总理担任政府首脑以及内阁的领导人，主要的权力在总理手上。

政府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一个或几个政党联合组成。议会选举结果揭晓后，总统在综合议会各党派意见基础上提名总理人选，授权其组阁。总理由成功完成组阁者担任。

议会

以色列的立法机构为一院制，由120名议员组成，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负责制定和修改国家法律，对重大政治问题表决，批准内阁成员并监督政府工作，选举总统、议长。

国会里的议席分配是由各政党在大选里的得票比例决定的，透过比例代表制的投票制度，设3.25%的得票门槛。国会的选举通常是四年举行一次。目前国会里有12个拥有议席的政党。作为以色列的立法机构，国会负责颁布法律、监督政府，并且有权选出或罢免以色列总统。

国会议员的选举制度继承了英国管辖时期留下的传统，使得任何一个政党都难以获得多数议席，因此政府通常是由政党联盟组成。总理由国会议员选出，因此都是由最有能力组成联合政府并争取最多议员支持的人出任。

在总统选举之后，总理有45天的时间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的内阁也必须要由国会集体批准。

司法

以色列的司法部门是由三层架构的法庭组成。在最低层次的是地方法院，分布于大多数的都市。第二层则是地区法院，同时负起上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功能，分布于五座城市：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贝尔谢巴、以及拿撒勒。

最上层的法院则是以色列最高法院，位于耶路撒冷。最高法院是最高的上诉法院，也身兼高等法院（HCQJ）的功能。

一般的法官是由国会组成的委员会、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以色列律师行会的会员联合选出的。法律规定要求法官在70岁时退休。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司法部长所批准，负责指派所有法庭的常务官员。

政党

以色列工党和团结党（利库尔德联盟）一直是以色列的两大政党，两大党在过去65年大部分时间拥有主导联合政府的权力。工党在2000年后支持度大幅下降，利库尔德遂主导联合政府。2019年3月、9月与2020年3月举行之国会大选，由前参谋总长甘兹Benny Gantz领导的蓝白党崛起为与利库尔德党席次不相上下的挑战政党，最后2020年5月两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

国际人道主义

以色列长期向全世界提供紧急援助和应对灾难的人道主义小组。以色列的人道主义努力于1957年正式开始，它建立了以色列国际发展合作机构Mashav，另外，还有别的以色列人道主义和应急小组与以色列政府合作，其中包括IsraAid，这是由14个以色列组织和北美犹太团体共同执行的合作

项目；此外还有ZAKA， The Fast Israeli Rescue and Search Team (FIRST)，Israeli Flying Aid (IFA)，Save a Child's Heart (SACH) 和 Latet。

在1985年至2015年期间，以色列派出了IDF研究与救助部门的24个代表队（Home Front Command）到22个国家中。在2010年海地地震之后，以色列是第一个建立提供外科手术的场地医院的国家。以色列派出了200多名医务人员，在现场对受伤的海地人进行治疗。在11天的人道主义任务中，以色列代表团对1100多名病人进行了治疗，共进行了319次成功的手术，分娩了16次，救出或协助拯救4人。尽管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啸中存在辐射的危机，但以色列是灾难发生后第一批派遣医疗代表团的国家之一。以色列于2011年向海啸灾区栗原市派出一个医疗队。这是由以色列IDF的50名成员组成的医疗诊所，其中有儿科，外科，妇产科，妇科和耳鼻喉科病房，还有验光部门，实验室，药房和重症监护室。他们在两周内对200名病人进行治疗，之后，应急小组向日本人捐赠了所有设备。

经济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以色列有着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但政府也作为一定的管理。以色列在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煤炭）、粮食、牛肉、原料、军事装备上都依赖进口。尽管受到自然资源的限制，以色列还是发展出了非常成熟而密集的农业和工业。除了牛肉及谷物类粮食以外，以色列在蔬菜水果花卉类粮食上可以自给自足并出口。钻石、高科技、军事装备、电脑软件、药物、高级化学原料、以及农业产品（水果、蔬菜、和花卉）都是以色列的主要出口货物。

以色列有着广泛的炼油、钻石开采、半导体制造产业。依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以色列有着中东地区管理最良善、对财产权利保护最佳的经济体制。

在1989年－1999年间来自苏联的大量犹太人移民有750,000人，总计来自苏联的移民则高达百万人，等于以色列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之中许多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科学和专业技能的人才，这对以色列经济是一大利多。加上在冷战结束后新市场的出现，有效刺激了以色列的经济，在1990年代早期得以快速的发展。不过，经济的发展在1996年开始减缓，政府施加了更严格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移民所带来的经济成长开始减缓。这些政策有效的减低了以色列的通货膨胀，在1999年通货膨胀到达了新低的纪录。24%的以色列劳动人口拥有大学学历，这也使得以色列成为工业国家里学历程度第三高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荷兰。

宏观经济

以色列经济与欧美经济关系密切，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这为以色列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提供了环境。战后，大量来自苏联和欧美的高端人才皈依祖国，为以色列节约了大量的培养成本和培养时间。依靠回归和自身培养的人才，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雄踞世界前50名。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400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3万美元，居世界前30名。2014年人类发展指数高居世界第19名。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产业举世闻名，其在军事、科技、电子、通讯、计算机软件、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工程、农业、航空等领域具有先进的技术水平。其电子监控系统和无人飞机与美国有深度的技术交换，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很高的口碑。以色列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逾80家，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包括全球最大非专利药制药企业——TEVA、以色列最大企业——全球网络保全产品巨头Check Point软体科技公司和著名国防承包商Elbit系统。以色列被视为中东世界里经济发达、商业自由、新闻自由和整体人类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

支柱产业

高科技

以色列对于科学和科技的发展贡献相当重大。由于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致力于科学和工程学的技术研发，以色列的科学家在遗传学、计算机科学、光学、工程学、以及其他技术产业上的贡献都相当杰出，1990年代前苏联解体而涌进的俄罗斯新移民，有不少是工程师、科学家、医生等高层次人才，也为国家提供了创新动力。以色列的研发产业中最知名的是其军事科技产业，在农业、物理学和医学上的研发也相当知名。

总计已有十二名以色列国公民曾获得诺贝尔奖【不包括诺贝尔奖历史上其他国籍的犹太人】。包括共同获得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生物学家阿龙·切哈诺沃和阿夫拉姆·赫什科，共同获得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晶体学家阿达·约纳特，获得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材料学家丹·舍特曼；共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梅纳赫姆·贝京，共同获得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伊扎克·拉宾和希蒙·佩雷斯；共同获得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共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以色列裔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共同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以美双重国籍经济学家罗伯特·约翰·奥曼。

高科技产业在以色列经济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以色列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及对于教育的强烈重视使得高科技产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以色列在软件开发、通信、和生命科学上都是世界顶尖的国家之一，以色列还经常被称为是第二个硅谷。

直到2004年，以色列获得的风险资本投资总额高过了任何欧洲的国家，并且有着世界最高的VC（投资资本）/GDP比率。除了美国与加拿大以外，以色列有着全世界最多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以色列出产的学术论文数量就人口来算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平均10,000人里有109篇。以色列的专利权申请档案数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研究和开发（R&D）花费指数上，以色列是第三高的国家，在科技准备

（产业界在R&D上的花费、科研社群的创造力、个人电脑和网络覆盖率）上则是第八，在科技创新上是第十一，高科技出口总额上是第十六。

农业

以色列是当今世界少数实现科学灌溉的国家。其特有的滴灌技术，充分利用水资源，并将大片沙漠变成绿洲。这使得农业人口不足总人口5%的以色列不仅解决了自身的水果、蔬菜、花卉类粮食问题，同时还向其他国家包括巴勒斯坦大量出口优质水果、蔬菜、花卉和棉花等，大量换汇大量进口小麦、牛肉、玉米，解决了自身的粮食问题。

旅游业

以色列另外一个重要的产业是观光业，其优势在于以色列国内大量而又珍贵的历史和宗教遗迹，从犹太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其他独立教派）、伊斯兰教、到巴哈伊教等都有。另外以色列的温暖气候和丰富的海滩度假资源也是优势之一。以色列的观光业包括了围绕于圣地的各种历史和宗教景点，也包括了现代的度假海滩，以及各种考古学观光、古迹观光、以及生态旅游。

以色列的美食烹饪可以追溯到公元三千年前，受到欧洲，中东，北非，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深远影响，不同的烹饪艺术和迥异的饮食习惯汇集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熔炉风格。

能源业

以色列在过去被认为是没有油气资源的国家。但2009年，2010年，以色列在海法以西的地中海发现了两个巨型天然气气田，塔马尔气田和列维坦气田，有望改变能源格局。2013年，塔马尔气田开始供气。2014年，以色列和约旦签署150亿美元天然气订单，将从列维坦气田向约旦出口天然气。这是以色列和约旦目前最大的经济合作。

交通运输

全国共有48个机场，主要机场是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位于两大城市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主要的海港有海法港、阿什杜德港和埃拉特港。全国公路通车总里程为18096公里，铁路总长度为1001.4公里。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的铁路已于2018年9月25日通车。

教育

以色列有着中东地区以及西亚最高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与韩国并列为整个亚洲平均受教育年数最高的国家，而在全世界上则排名21名。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以色列也有中东地区最高的识字率。

（以上文字信息引自中文与英文维基百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上） 关于以色列的简史】

背景介绍

==

圣经 传道书7章29节： 我 所 找 到 的 ， 只 有 一 件 ， 就 是 神 造 人 原 是 正 直 ， 但 他 们 寻 出 许 多 巧 计 。

圣经 哥林多前书9章26节：所 以 我 奔 跑 ， 不 像 无 定 向 的 。 我 斗 拳 ， 不 像 打 空 气 的 。

==

本书的内容概要与目的

本书的主旨是想要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以及思想层面的反思与思辨，来探寻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科学的意义与起源是什么；为什么现代科学发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等其他地区？

为此，我们将要追寻那些现代科学开创者们的思想与书籍，看一看当年，在他们的头脑中曾经在想些什么；看一看他们是受到了哪些前人的影响，得到了哪些方面的什么启迪；看一看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是什么，梦想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动力是什么。我们可以打开他们的陈年旧作，看一看其中所讲述的——他们的世界观、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方法论观念等等是什么。我们可以重温他们探索宇宙自然世界、发现科学的旅程，并从中得到深刻的教益与感悟。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言论、著作、思想、方法、成就，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技术家、哲学家的言论、著作、思想、方法、成就相比较，看一看他们的异同是什么，看一看中国思想家的优点是什么，缺失是什么，成果是什么，遗憾是什么，以及他们与西方思想家的这些异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在今天的影响是什么，等等。

==

本书所想要说明的历史事实

——本书所想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深刻的事实：现代科学的起源，是出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内在因果关系。

很多世人常常误以为，现代科学之所以得到开启与发展，是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欧洲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和影响。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偏颇的、片面的、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一个简单的反驳是，在非洲、在南美，在南亚、印度，在东亚、中国、日本等地，并没有什么成体系的所谓宗教信仰的"束缚"；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那些地方被开启、独立发展起来呢？换言之，在那些地区，科学发展的真正阻碍，是来自于什么呢？一般性而言，在古代世人心中的世界观、信仰观、人生观里面，有着哪些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因素？

而且，更进一步说，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开启与发展，恰恰是在马丁路德基督教宗教改革以后，是在圣经被广泛地翻译、传播、大量印刷发行以后呢？在基督教改革、圣经的广泛传播，与现代科学的开启之间，有着什么

内在的联系呢？现代科学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开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与基督教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之间，与基督教信仰中所包含的世界观之间，有着什么内在性的联系？这种内在性的联系，是一种必然的关系，还是一种偶然的关系？

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死后第三日复活、成就那美好救赎恩典，正如圣经旧约在那之前的将近一千八百年中的无数预言。从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以后，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临到世界，至今已经两千年了。今天我们的公元纪年，就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时间为坐标原点。耶稣基督从三十岁开始公开传道，到三十三岁半被钉十字架、成就了那美好的救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在三年半时间中所成就的伟大事工，胜过了这世上无数伟人的事业，胜过了这世上无数思想家的哲学，胜过了这世上无数开疆拓土的君王们所建立起来的王国。

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信仰所产生的文化土壤，能够直接地导致现代科学思想的开启和建立，那么，为什么一直到公元十六世纪，而不是在之前更早的时间点，现代科学的曙光才开始显现、并开始爆炸性地大规模发展呢？固然，这与过去两千年中的生产力发展进程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更深一步说，从思想的角度而言，在现代科学的开启与发展背后，还有着什么更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单凭物质性的生产力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或促成现代科学思想的建立与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现代科学思想的开启和建立，才导致了现代生产力、工程、科技水平的爆炸性的发展。那么，在现

代科学思想体系的开启、建立和发展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至关重要性的导致原因呢？这也正是本书试图努力探讨和思索的问题。

===

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简述

在现代社会，很多世人心中流行着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在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矛盾性的张力关系。人们经常误以为，科学正是证伪了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却总是想要阻碍科学的发展。甚至，在当今时代，很多世人以为，宗教信仰是迷信的、愚昧的、违反理性的，而科学则是昌明的、智慧的、理性的，等等。

然而，世人往往不知道、或故意无视的是，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开启者们、思想家们，无论是牛顿、开普勒、培根、波义耳，还是笛卡尔、莱布尼兹、哥白尼、伽利略、法拉第、麦克斯韦、普朗克、等等数不胜数的伟大科学家们、科学思想巨人们，都是基督徒，甚至是非常敬虔而真挚的基

督徒。直到今天，在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间，基督徒们也都占了绝大多数。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方面，的确，在世上许多宗教信仰中，充满了许多荒谬、愚昧、迷信、光怪陆离、野蛮甚至愚蠢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在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与科学之间，却有着深刻的、看似难解难分的关系。因而，我们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是，现代科学的诞生，究竟是由于因宗教信仰而导致的原因，还是由于克服了、胜过了宗教信仰的原因？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两个方面的题目。第一个题目是，现代科学的意义与起源究竟在于什么？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涵义、定义是什么？科学的内涵、外延、作用、影响、局限、积极意义分别是什么？第二个题目是，当我们说到"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到底何谓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内涵、外延、作用、影响等等是什么？在宗教信仰的比较中，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或是错误的？究竟什么是信仰的真理？

在本书中，我们着重于思考上述第一个题目，但也会涉及到上述第二个题目。关于后者，在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护教学书籍中（例如《基督教之大众证据》等书籍）有更加深入的探讨和介绍。

==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简述

所谓基督教信仰是指，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基准的、以耶稣基督救恩为中心的信仰。众所周知，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的基督教信仰体系，是世上（至少在名义上）信众最多的宗教信仰体系。虽然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以欧洲为主要文化土壤，但是，就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言，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信仰系统。今天，在非洲至少有一半人、将近六亿人是基督徒；在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大多数人也都是基督徒；在亚洲，基督徒的数量也早已经达到数亿人以上。在世上七十亿人口中，基督徒的数量有二十三亿。在这个世上，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自称为基督徒。

今天，圣经是世上最畅销的书籍，是印刷量、发行量、传播量最大的书籍，是被翻译成世上人类语言最多的书籍。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极其深刻、巨大、深远的影响。为了简单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仅仅以几件现代人所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例：一夫一妻的婚姻法律制度，教育男女学生的公立学校系统，以及照护医治普罗大众的公共医院系统；这些都是由基督教信仰体系而导致、建立、推动、确立的。

那些把基督教信仰体系当作是迷信、当作是过时的东西、当作是落后思想的人们，显然往往是由于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调查、分析和了解。事实上，基督教信仰正是现代文明的根基而发源所在。

基督教信仰体系对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法律、哲学体系等等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无远弗届的关系。今后，我们会在其他的书籍中，对于那些话题试图进行仔细的阐述。而在本书中，我们则聚焦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从大量的历史事实而言，为什么说，正是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的启动、产生和建立？

固然，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上，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的、甚至缓慢的、水滴石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每一个国家、民族、文明，都对其有所重要的贡献。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指南针、火药等重要的技术；阿拉伯人、中东人在数学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古希腊人、罗马人在数学、物理、逻辑哲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毋庸置疑，现代科学思想体系正是建立在那些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之上的。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科学体系与古代科学技术之间，有着清晰明显的区别。前者是系统化的，而后者往往是零散的、支离破碎、停滞不前的。前者虽然是后者的继承者，但却在量与质上产生了飞跃，上升到了体系化的世界观层面，并给人类社会的面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革命，给现代工程、技术、生产力状况带来了与古代技术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境界。从某种程度看，在现代科学来临以前，相对于近现代的人类物质生活面貌而言，人类在从前几千年中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面貌基本上是变化很小的。而现代科学的来临，不仅对全人类各个国家、民族、文化、文明体系在思想上带来了巨大的撞击，而且，给世上无数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上的造福，深刻地改变了世人的生活方式与物质生产力面貌。

因此，本书中所聚焦讨论的问题，即：现代科学的意义与起源、以及现代科学的开启历史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深刻关系，非常值得世人注意思想、深入思考。

而本书全部内容中想要说明的论点正是：——现代科学的开启与建立，正是以圣经为直接根基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体系，所直接导致的结果。这正是为什么，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当圣经被翻译、印刷、广泛传播以后，现代科学得以诞生、开启，并得到爆炸性的发展。

===

简述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其他宗教信仰体系的异同

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但是，成体系的、有强大理论背景支撑的、有系统化经书正典的、有悠久历史与渊源的、在世界人口中占据可观主流地位的、以超自然思想和教义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中，只有三个宗教信仰体系（也许可以再加上印度教，但印度教往往缺乏统一的教义与经典和历史文字传统、礼仪典章等等），即，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可兰经为核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一系列佛经为核心的佛教信仰体系。

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小规模的、零散的、局限于某个较小地域范围的、或是历史短暂的、所谓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及各种偶像迷信风俗等等。

在这些各种各样宗教信仰中，有着一定的共性，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深刻而广泛的、本质性的不同。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在于，不论一个宗教信仰多么看似博大精深、历史源远流长，或是看似多么肤浅、零散、支离破碎，这些宗教信仰都在试图回答一些关乎以下某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了什么而活着？我们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我们的生命来自何处？我们的世界本源是什么？世界的本质与价值意义是什么？道德的本质和本源，以及正确的内容应当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中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应当是什么？

尽管世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与上述问题有关，且都想要给出超自然的回答与教义，并且，它们在很多重要内容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多数宗教信仰中的教义都认为，人的生命应当是良善而圣洁的；善将要得到奖赏与祝福，而恶则将要受到惩罚和咒诅）；但是，世上的宗教信仰在教义层面，却更有着天壤之别的内容。例如，在中国南方、港台等地，或是南亚等地区，有许多"拜拜"的传统；他们敬拜妈祖、观音、关公等传说中的、神话性质的人物，甚至敬拜一些动物、牲畜，祈求他们、她们或它们，来

保佑自己的娶妻生子、家人平安、升官发财等等诸如此类各样的属世之事、属世之利。然而同时，在佛教的经典书籍中，则反对把神佛当作是具体的音、声、相；甚至佛教教义自身常常会陷入矛盾状态，一方面反对实相，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教义为核心，另一方面则建筑各种各样的庙宇、制作各样雕塑，来敬拜那些长着卷发与垂耳的、酷似印度人的各样佛像。

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与佛教信仰体系三者之间，前两者都属于一神主义，而佛教则属于泛神主义思想。换言之，基督教信仰体系与伊斯兰教信仰体系都认为，在这个世界之上，有那样一位无限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造物主在掌管、主宰；这位造物主、上天、上帝、真主，应当是世人所敬拜的对象与信仰的核心。而佛教则认为，在这个世界之上，并没有那样一位无限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造物主在掌管、主宰；而是，这个世界是由因果、因缘所驱动的（即，这个世界并非是被那样一位无限伟大的、能看、能听、能言的创造生命之主所创造和管理的）；不但如此，人生和世界究其本质而言，其终极的真实性都是应当被否定的，是虚无的、虚空的、虚乏的、虚浮的；人生在本质上是苦的；并且，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与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虽然它们都认为这个世界之上有着那样一位无限全能、全知全在的造物主；但是，它们两者对这样一位上天的认识却非常不同。在伊斯兰教看来，那位造物主是无限地高高在上的；世人只能远远地对他顶礼膜拜，却不能近身

来到他的面前；而只能通过穆罕默德这位真主的先知来明晓真主的旨意和话语；世人必须要通过顺服，必须要通过遵守真主的诫命，才能够成为一个圣徒。在伊斯兰教中，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繁文缛节；人们必须要遵守那些各样的规定，以及每日按时祈祷等等，才能够被称为合格的穆斯林。简言之，伊斯兰教信仰体系是一种因行为称义的信仰；人必须在真主面前俯伏敬拜、五体投地、遵守许多繁文缛节，才能够得到真主的悦纳。这种因行为称义的信仰有两点问题。第一点是，一个真正内心诚实而谦卑的人，一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绝非是毫无瑕疵的；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的贪欲、撒谎、奸淫、自私、不恰当的怒气、自我中心等等根深蒂固的、本质性的毛病与罪错；在这世上，任何一个被造之人在造物主面前，都无法说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即，一个内心真正谦卑诚实的人，一定会在内心深处知道，人无法以自己的行为在上天面前称义。第二点是，一个因行为称义的信仰，一定往往会导致人心中愈演愈烈的自傲、自大、自义之心；因为，既然是以行为称义，那么，信徒们就会在彼此之间、或是与其他世人之间，进行某种"行为意义上"的比较，因而，（尤其是那些看似信仰敬虔的人们）有意无意地会认为，自己比别的人更加高尚、圣洁、敬虔。

基督教信仰体系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它是所谓"因信称义"的信仰；即，人应当、且只能够以信心，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人只有凭着那来自于上帝自己的救赎恩典，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这救赎恩典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且死后第三日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永生的救恩；凡是真心相信和接受基督救恩、真心承认和悔改己罪的人，就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无限美好的永生，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的、属天的上帝国度。

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信仰诞生于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与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世；三十岁开始传道、三十三岁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日复活；圣经新约随后很快诞生）；伊斯兰教信仰诞生于六百年之后的公元七世纪；而它们两者都与更早之前的、犹太人的旧约圣经有着紧密而直接的关系（然而，伊斯兰教的可兰经虽然时常提到圣经旧约的摩西五经，也提到圣经新约中的耶稣，但显然，穆罕默德并没有真正完全了解圣经新旧约全书的内容，而是产生了许多一知半解的误解，以及许多支离破碎的扭曲式理解；例如，穆罕默德完全没有明白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预表与涵义）。圣经旧约是在从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到大约公元前四世纪的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中、由数十位先知笔者们所写成的、包含39本书籍的书集。圣经旧约的内容具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圣经旧约的核心主旨就是，上帝以犹太人民族为百姓、为记者，以大量的历史、文字与预言向世人表明了，将要有那样一位造福全人类的救赎主来到世上，成就那无限美好的救赎恩典，建立那属天的、永远的、圣洁的、上帝的国度。整本圣经（圣经被称为新旧约全书；它包含着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前者是对后者的预言和预表；后者是对前者的实现与成就）的主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

基督教信仰的简史与涵义

在世上的三大宗教信仰体系，即基督教信仰体系、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佛教信仰体系之间，基督教信仰有着可考的、最古老的历史；它诞生于公元一世纪（而圣经旧约的历史则更为古老；圣经旧约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甚至是从这世界被创造时的历史开始记述的）。伊斯兰教次之，诞生于公元七世纪。佛教脱胎于泛神主义、神秘主义的印度教思想，但是，佛经的梵文原典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已不可考，而只剩下了佛经翻译的文字（因而，我们甚至无法知道那些佛经的真伪性，也无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知道它们是否由后人假名所作；尽管，我们可以从教义的角度，来分析那些佛经内容彼此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这些翻译的佛经文字大多始自公元六七世纪以后。

公元元年左右，耶稣基督降生；他从三十岁的时候开始传道，并于三十三岁半被钉十字架、且死后第三日复活、成就了那美好的永生之救赎恩典；这些正如圣经旧约在过去千百年中、从创世以来所预言、预表的。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正是罗马共和国开始强盛、取代之前的希腊文明体系的时候；此时，罗马共和国（即，由罗马参议院和恺撒共同执掌国家权力）逐渐转变为罗马帝国（即，由恺撒皇帝大权独揽）。罗马帝国东征西讨，权力几乎遍及了当时罗马人已知的所有世界。然而同时，从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以耶稣基督十二使徒为代表的初代基督徒们，以谦

卑、和平、温柔、忍耐的方式，把基督教信仰传遍了罗马帝国境内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但是，在从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的三百年中，无数基督徒们也常常经受着痛苦、患难、逼迫、迫害。直到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帝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并以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无数基督徒们所受的患难与逼迫才稍微缓解。在这三百年中，由于有许多罗马帝国的公民成为基督徒，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文人哲士，因此，有海量的历史文献记录，使我们可以看见圣经新约正典的成书过程、广泛传播，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历史真实性。

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帝王把罗马帝国的首都向东迁至一个名叫拜占庭的城市。拜占庭位于海陆交通上的一个枢纽、瓶颈位置，是连接欧洲大陆与亚洲大陆的关节点。君士坦丁迁都以后，拜占庭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帝国，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延续了上千年以上的和平时期而没有经过改朝换代，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王国。这个王国自称为罗马帝国，也称为基督帝国，但被十五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称为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

与此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或被后世称为天主教的罗马教廷，

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今日。以罗马为中心、影响遍及整个西欧各国的西方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影响遍及整个东欧各国以及近东地区的东方教会，虽然彼此有一些争竞，但她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一千年左右。西方教会（即后来所称的天主教）与东方教会（即后来所称的东正教）在教义上是一致的；她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上帝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恩典为信仰的中心、核心；但双方之间在教会的权柄与治理的事务上，常会有一些争议。公元一千年，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相互指责对方，彼此不承认对方的权威。

公元五世纪，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攻陷，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然而，罗马天主教廷忍辱负重，以坚定而忠贞的信仰面对一切痛苦与患难，并最终使得整个西欧众民族皈依基督教信仰。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的早期历史中，恰好具有某些相反的特点。在西方教会，没有统一的君王，但有着统一的教会组织结构；在东方教会，有着统一的君王朝政，但各地的众教会基本上具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围绕着君王和平相处。

公元九世纪，以俄罗斯为主的民族、斯拉夫民族以及其他东欧各民族开始在东方教会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信仰。同时，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北欧等诸民族开始在西方教会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信仰。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陷，后来成为了伊斯坦布尔；那附近的地区成为了后来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以后，东正教的中心后来逐渐移到莫斯科。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东正教的影响日渐衰落；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逐渐因海上贸易而先继纷纷崛起；中世纪正式结束，人类社会在过去五百年中开始全面地进入现代社会。

公元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在德国指出：天主教中的一些重要教导内容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从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以德国、英国、荷兰、以及北欧各国、还有法国部分地区为代表，各地的基督徒们纷纷摆脱天主教的影响，回归圣经。以加尔文为代表的一大批基督徒领袖们、基督教改革先驱者们，激烈地反对罗马天主教廷的权威；他们提出"五大唯独"的原则：——"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

公元十六世纪，英国正式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成立了英国国教教会，即英格兰教会。公元十七世纪初，英国的清教徒天路者们首次来到北美大陆，并最终于150年后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从此，现代民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等，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角落。

==

简述基督教信仰体系中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之间的关系与异同

严格地说，在纯粹核心教义的层面上，天主教、东正教以及马丁路德基督教改革以后的所谓基督教新教（实际上是回归圣经、以圣经为唯一权威与根基的纯正基督教信仰）彼此并无本质性的不同。它们都以同样的一本圣经为上帝的话语、启示、旨意，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为信仰的中心。因此，无论是在天主教、东正教还是在基督教新教中，都会有真挚、敬虔、属神的基督徒们，有紧紧地信靠和仰望基督救恩的人们。

事实上，导致和推动西方基督教改革与更正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得一大批东正教人士带着希腊文原典的圣经新约以及其他历代基督教文献来到西欧。进而，这使得许多西欧天主教人士们认识到，在天主教拉丁文的圣经译本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翻译错误，从而间接引发并促进了基督教信仰的更正运动。

因此，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之间的不同，并非是在于核心教义的争执，更不是在于经书正典的争议，而是在于，教会的组织路线、以及一些具体教导内容的缺失与谬误的方面。例如，天主教与东正教之中，都错误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把她看作是上帝之母，对她敬拜、向她祷告祈求等等；或是，把历代基督教圣徒当作是敬拜和祷告祈求的对象等等；这些错误的教导内容，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圣经的人来说，都是明显地不符合圣经、甚至直接地违背圣经所教导的内容的。关键是，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中，圣经却都往往被教会神职人员们束之高阁，从而使得普通民众无法能够容易而方便地读到圣经。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中，虽然其核心的教导并非不是以圣经中的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为基础与中心，但是，在信仰实践上，许多天主教人士们、东正教人士们却往往并不熟悉圣经，也并不真正明白圣经中所讲述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的真正涵义与内容；因而，很多信徒们在信仰中是冷漠、冷淡的，而不是真挚热忱的。

在天主教中，在关乎宇宙观、世界观等方面的问题上，罗马教廷仍然是以基督教信仰之前的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等人的宇宙世界观念为基础。我们将在本书后面详述这一点；并指出和分析这一点对于现代科学之起源的严重阻碍作用。

==

以色列人的简史

根据圣经历史，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以撒是雅各的父亲。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向他们应许了弥赛亚的救恩；上帝清晰地告诉亚伯拉罕，世上万国都要因他的那位后裔而蒙福。

雅各的十二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在短短数百年内，就在埃及成长为一个人口至少上百万的极大的民族。然而，他们在埃及受到法老的奴役。上帝拯救他们，使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并要进入那美好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那富饶的迦南地。在他们离开埃及的前夜，上帝告诉他们，要在每一家的门框、门楣上，撒上羔羊的血，这样，上帝的公义惩罚就会越过他们、不临到他们的家庭；而其他埃及人家中的长子都要死亡；这被称为以色列人的逾越节。

（这表征了：我们因罪而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被奴役者；世界成为了我们的被奴役之地。迦南地预表了每一个属神之人所将要去的美好天国；在那里有无限的丰富与幸福，更有着永远的生命。逾越节，既预表了一切世人所将要面临的、圣洁公义之上帝的终极审判，也更预表了，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得以承受上帝的饶恕恩典，而得到永生的救恩。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

越节的羔羊；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因着他为我们所尝清的罪债，得以与上帝和好，得以能够在上帝面前因他的救恩而称义。）

以色列人在摩西与约书亚的带领下，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美地；上帝与他们立约，并把十诫律法赐给他们。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在士师们的率领下，在众先知的带领下，敬虔地活在上帝的面前；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常常犯罪背离神。上帝差遣先知们责备他们、警诫他们；并在他们中间设立合乎自己心意的王。大卫是以色列人中的第一个伟大的、信仰敬虔的王。大卫王的时代，是公元前一千年。

（大卫王本身，就是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表；在大卫治理下的强盛以色列国，是对于上帝百姓之国度的属灵预表。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百姓的君王，是天国的元首，是天父的儿子，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大卫王以后，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以后，以色列国民因罪而分裂为南国和北国；南国称为犹大国，其中包含犹大支派与便雅悯支派；北国称为以色列国，其中包含以色列其余十个支派。南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北国以撒玛利亚为中心。

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南国和北国因罪而背离上帝，并被亚述国与巴比伦国掳掠。然而，上帝不断地差遣先知告诉以色列人，向他们预言说，他们将要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他们在被掳七十年以后，真的得以归回到迦南地。

这一切历史都记载在圣经旧约中。在圣经旧约的历史书、律法书、智慧书、先知书、诗篇等等内容中，都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中心；那就是，上帝将要差遣那位弥赛亚来到世间，把属神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上帝的国度将要在世人中显明出来；那是指向永远、永生的无限美好的国度；那就是弥赛亚（即，希腊文中的基督）的国度；世上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

更令人震惊的是，圣经旧约预言了，若以色列民持守在良善之中，那么，上帝的祝福将要护卫着他们、不离开他们；但是，若以色列民犯罪、沉浸在罪恶中而不悔改，那么，他们将要被抛撒在万国之中，并将要成为世人的惊骇和笑谈。

在圣经旧约最后一本书、玛拉基书以后的几百年之后，公元元年，耶稣基督降生。他以神迹和大能，在以色列人中间传道，对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并且，他清楚地告诉世人，自己就是从天父上帝那里来的，就是圣经旧约所预表的一切之事的中心、弥赛亚、基督。然而，在以色列人心中所盼望的弥赛亚，却与耶稣基督非常不同；以色列人所盼望的，不是那个圣洁美好、属灵的天上国度，而是地上的强盛政权与国度；他们所期望的，是上帝差遣的弥赛亚带领他们在地上重建如同当年大卫王治下的强盛以色列国。不但如此，以色列人在那些假冒为善、只注重外表形式主义的犹太人宗教精英人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老等的鼓动下，弃绝了耶稣基督，甚至把他交在罗马官府的手下，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基督却在死后第三日复活，并向众门徒等许多人显现，并勉励他们，让他们到普天下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与救恩，直到地极。

正如耶稣基督自己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所曾经预言的（公元33年左右），以色列人在不久以后、因反叛罗马帝国的治理、于公元70年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下彻底亡国；以色列人被掳到欧洲各国等地。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亡国历史，直到1948年回归迦南地、重新成立以色列国。从以色列在公元70年亡国以后，再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圣经新约福音书所记述的那样，通过家谱来显明自己是大卫的直系后裔；而圣经新约福音书清晰地显明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显明耶稣是大卫的直系后裔；圣经旧约曾经预言了，弥赛亚将是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国度，正是对于上帝百姓国度的属灵的预表，是对弥赛亚国度的属

灵的预表。这正如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我的国不属乎地上，而属乎天上。”【关于这一点的深刻涵义，关乎到我们怎样看待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以及怎样看待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社会体制等等；我们会在本书的后文中略有提及，并会在其它书籍中深入讨论。】

==

今天，以色列人虽然只占世上人类0.2%的人口，但却占据2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两千年来的历史中，虽然多数以色列人不愿意相信和信靠耶稣基督（在他们许多人心中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救世主”，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被钉十字架、为罪人尝清罪债、把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赎主；而是来带领他们建立属世国家、建立地上荣耀的人），但是他们始终忠实地持守着圣经旧约正典；这本身就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角度证明了圣经旧约正典的历史真实性，也显明了圣经旧约的内容的真实性。随着历史的演进，今天，以色列人、犹太人中，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徒，成为相信和信靠耶稣基督的、上帝的百姓。

++

++

++

+++
++

+++
+++
+++
+++
++

+++
+++
+++
+++
++

+++
+++
+++
+++
++

马歇尔计划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shall_Plan

马歇尔计划（正式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RP）是于1948年通过的、美国倡议下的援助西欧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复苏，并向西欧经济体援助了120亿美元（折合等于2019年的1300亿美元）。

从1948年4月3日开始，该计划取代了先前的Morgenthau计划提案，实施了四年。美国的目标是重建饱受战争灾害的地区，消除贸易壁垒，建立现代化工业，改善欧洲繁荣，以及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马歇尔计划》要求减少国家间贸易壁垒，取消许多法规，并鼓励提高生产率以及采用现代商业管理程序。

马歇尔计划援助大致按人均分配给参与国。主要工业大国获得了更大的资助，因为普遍的看法是，对大工业强国的复兴对于整个欧洲的复兴至关重要。马歇尔计划资金的最大接受国是英国（约占总额的26％）。其次是法国（18％）和西德（11％）。约有18个欧洲国家获得了计划援助。尽管提供了参与机会，但苏联拒绝了计划援助的利益，并且也阻止了对匈牙利和波兰等东欧集团国家的援助利益。美国在亚洲提供了类似的援助计划，但它们不是《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

二战结束后，1947年，实业家刘易斯H.布朗写作了（在卢修斯·D·克莱将军的要求下）《德国报告》；它充当了战后德国重建了详细的计划建议，并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基础。该倡议以美国国务卿 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名字命名。该计划得到了华盛顿两党的支持；此时美国共和党控制了国会，而民主党控制了白宫，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担任总统。该计划主要是应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伯格参议员的要求，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帮助下，由国务院官员，特别是威廉·克莱顿和乔治·肯南，所开创的。

马歇尔在1947年6月于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谈到迫切需要帮助欧洲复苏。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协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经济复苏，并减少那些国家内部的共产党的影响。

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的影响，苏联也制定了自己的经济计划，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但是实际上，二战以后东欧国家集团不得不向苏联输送大量资源作为战争期间的补偿。

短语"相当于马歇尔计划"通常用于描述拟议的大规模经济救援计划。

1951年，《马歇尔计划》基本上被《共同安全法》所取代。

开发和部署

1947年6月5日，该重建计划在相关欧洲国家的会议上制定。它也试图对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友们提供相同的援助，但它们拒绝接受，因为这样做这样可以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共产主义经济。实际上，苏联阻止其卫星国（即东德，波兰等）接受。马歇尔部长开始确信斯大林对帮助恢复西欧的经济健康复苏没有兴趣。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于1948年4月3日签署了《马歇尔计划》，向16个欧洲国家提供了50亿美元的援助。在该计划生效的四年中，美国捐赠了170亿美元（相当于2019年的2021.8亿美元）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以帮助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欧洲国家复苏。这笔170亿美元是在1948年美国GDP 2580亿美元的背景下进行的。除此之外，在战争结束到该计划开始之前（1945-1948），美国还曾已经向欧洲提供了高达170亿美元的捐赠援助；这些款项没有计算在《马歇尔计划》内。

1951年底，《马歇尔计划》被《共同安全计划》所取代；在1961年被另一计划取代之前，该新计划每年提供约75亿美元。

ERP解决了战后恢复的每一个障碍。该计划面向未来，而不是集中在战争造成的破坏上。更重要的是，努力使用高效的美国模式来使得欧洲的工业和商业惯例进行现代化变革，并减少人为的贸易壁垒，而且给西欧人民带来希望与自力更生的感觉。

到1952年，随着资助的结束，每个参与国的经济都超过了战前水平。对于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来说，1951年的产出至少比1938年增长了35％。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西欧的经济增长繁荣空前。

马歇尔计划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初要素之一，因为它消除了贸易壁垒，并建立了在欧洲大陆协调经济的机构，也就是说，它刺激了西欧的全面政治重建。

比利时经济史学家赫尔曼·范德威（Herman Van der Wee）得出结论认为，马歇尔计划是“巨大的成功”：

它为西欧的重建提供了崭新的动力，并为更新运输系统，工业和农业设备的现代化，恢复正常生产，提高生产率以及促进欧洲内部贸易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战时破坏

二战期间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被摧毁。战争期间持续的空中轰炸严重破坏了大多数主要城市，特别是工业设施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住在临时营地。该地区的贸易流量已被彻底破坏。数以百万计难民的生活都不得不依靠来自美国的援助；这些援助由“美国救济和复兴管理局”及其他机构提供和管理。

粮食短缺严重，尤其是在1946-47年严酷的冬季。从1945年7月到1946年6月，美国向欧洲和日本运送了1650万吨粮食，主要是小麦。它占美国食物供应量的六分之一，提供35万亿卡路里，足以在一年中为3亿人每天提供400卡路里。

战争期间特别遭到空袭的是铁路、桥梁和码头等交通系统；许多商船沉没了；运输基础设施尤其受到损害。尽管大多数小城镇和村庄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但运输的破坏使他们在经济上与世隔绝。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因为大多数参与战争的国家在战争期间都耗尽了国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基础设施未受到重大破坏的唯一主要大国是美国和加拿大。他们比战前更加繁荣，但出口经济却只占它们各自经济体中的很小一部分。欧洲人将使用马歇尔计划的大部分援助资金来从美国和加拿大购

买制成品和原材料。

战后初期事件

恢复缓慢

欧洲的大多数经济体正在缓慢复苏，但由于失业和粮食短缺导致一些国家常常出现罢工和动乱。农业生产只有1938年水平的83%，工业生产是88%，出口是59%。例外的是英国、荷兰和法国，到1947年底，马歇尔计划实施之前的它们经济生产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意大利和比利时也将在1948年底前复苏。

在1945-46年的德国，住房和食物条件很糟糕，因为运输，市场和金融的中断减缓了恢复正常经济状态的速度。在德国西部，战争期间的轰炸摧毁了500万间房屋和公寓；在德国东部，有1200万难民涌入。其1946-48年食物产量仅仅是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而谷物和肉类则无法再像战前那样从东部运来。

粮食产量下降可归因于干旱；干旱导致大部分小麦作物死亡；而严酷的冬季在第二年摧毁了剩余大部分小麦作物。这导致大多数欧洲人每天只能依靠1500卡路里的饮食。此外，战争期间曾经从被占领国源源不断运来的大量粮食已不再运往德国。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直到1949年底才重新达到了战前水平。

德国努力从战争的破坏中复苏；其真正的复苏工作始于1948年6月；这正是因紧急救济而得以启动的。1948年的货币改革由军政府领导，并通过鼓励

生产来帮助德国恢复稳定。改革重估了旧货币和存款，并引入了新货币。税收也减少了；德国准备消除经济障碍。

在占领德国的前三年中，英美两国在德国大力推行军事裁军计划，部分是通过拆除设备，但主要是通过对原材料的进口禁运，这是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批准的《摩根索计划》的一部分。

尼古拉斯·巴拉伯金斯（Nicholas Balabkins）得出的结论是："只要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欧洲的经济复苏就将被推迟。"

到1947年7月，华盛顿意识到，如果不重建德国的工业基础，欧洲的经济复苏就不可能真正前进，因而，美国决定"有序，繁荣的欧洲需要一个稳定和生产性德国的经济贡献"。

此外，在法国和意大利由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的实力影响使华盛顿感到担忧。

美国国务院在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领导下认为，美国需要在世界舞台上采取明确立场，否则就要担心失去信誉。新兴的遏制学说（而不是回退）认为，美国需要大量援助非共产主义国家，以制止苏联势力的扩散。也有人希望东欧各国家加入该计划，从而使之被排除在新兴的苏联集团之外；但那由于苏联的阻挠而没有实现。

需要重建德国

1947年1月，杜鲁门任命退休的乔治·马歇尔将军为国务卿。1947年7月，马歇尔（Marshall）废除了根据《摩根索计划》（Morgenthau Plan）制定的第1067号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该指令已"不采取任何步骤来寻求德国的经济复兴，或旨在维持或加强德国经济的目标。"

新计划JCS 1779指出："一个有秩序和繁荣的欧洲需要一个稳定和多产的德国的经济贡献。" 对德国重工业生产的限制得到部分缓解；允许的钢铁生产水平从战前产能的25％提高到战前产能的50％的新限制。

此时，共产主义叛乱的影响，正在威胁希腊（尽管这个威胁是来自于希腊内部而不是来自于苏联）；而英国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无法再继续向希腊提供援助。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了他的"杜鲁门主义"主张：——"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国内少数派武装叛乱、或抵抗外界征服压力的、寻求自由的人民"，并提出了有关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设想。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指出："整个欧洲经济通过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交换与德国经济相互联系。如果不恢复德国作为生产力的贡献者，就无法恢复欧洲的生产力。" 胡佛的报告使华盛顿意识到需要一项新政策。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宣布，"德国工业特别是煤炭开采业的全面复兴"对美国安全现在具有"首要意义"。

迄此为止，美国已经在帮助欧洲复苏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在战后1945至1947年底期间，已花费或借出的金额超过140亿美元，这不算作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这些援助资金的大部分旨在恢复基础设施并帮助难民。例如，英国获得了37.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联合国还推出了一系列几乎完全由美国资助的人道主义和救灾工作。这些努力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缺乏任何中央组织和计划，也无法满足欧洲许多更基本的需求。早在1943年，就成立了联合国救济和复兴管理局（UNRRA），以向从纳粹解放的地区提供救济。UNRRA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康复援助，并帮助了约800万难民。1947年，它停止了在欧洲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活动；它的许多职能已移交给其它几个联合国机构。

苏联谈判

1947年1月，马歇尔被任命后，政府官员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

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等人，要求建立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德国，其中包括对苏联人在其占领区已经搬走的工业厂房，货物和基础设施的详细核算。但莫洛托夫拒绝提供苏联资产的账目。苏联对德国采取惩罚措施，要求延迟而不是加速德国经济恢复，要求无条件履行所有先前的赔偿要求，并要求朝着全德国范围内的社会经济转型迈进。

经过六周的谈判，莫洛托夫拒绝了所有美国和英国的提议。莫洛托夫拒绝任何进一步商议谈判，并拒绝把苏联在德国东部的占领地区包括在新建的德国内。

在与斯大林亲自会面以解释美国不可能放弃其对德国的立场后，马歇尔尤为灰心，而斯大林对解决德国的经济问题则表现得毫无兴趣。

在与苏联就可能的德国重建进行六周失败的讨论后，在莫斯科会议休会以后，美国得出结论，解决方案不能再拖延了。

为了阐明美国的立场，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就正式援助计划发表重要讲话。

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致辞。他宣布美国将要对欧洲进行系统化的经济援助，以促进欧洲的复兴和重建。演讲描述了欧洲经济的失调，并提出了美国援助的理由：——

"基于产品交换的现代分工体系有崩溃的危险。... ...除了对整个世界造成毁灭性影响，以及由于有关人民的绝望而引起的动荡的可能性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后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合乎逻辑的是，美国应尽其所能协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健康，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稳定，也没有和平的保证。我们的政策并非针对任何国家，而是针对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任何愿意协助经济复苏的政府，都会得到美国

方面的全面合作。其目的应该是复兴世界上的经济运转，以允许出现可以存在自由机构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马歇尔坚信，经济稳定将为欧洲带来政治稳定。他提供了援助资金，但欧洲国家必须自己组织和实施该复苏计划。

这与其说是一项计划，还不如说是一项提案；这对欧洲领导人进行合作与协调构成了挑战。它要求欧洲人制定自己的欧洲重建计划，并表示美国随后将为该计划提供资金。

美国政府认为该计划可能在许多美国人中不受欢迎，而马歇尔的演讲主要针对欧洲听众。为了使马歇尔哈佛演讲不出现在美国报纸上，官方特意没有与当地美国记者联系。并且在同一天，杜鲁门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以防止马歇尔的哈佛演讲成为美国国内新闻媒体上的头条新闻。相比之下，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被派去联系欧洲媒体，尤其是英国媒体，并且该讲话全文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上被逐字宣读。

斯大林的拒绝

东欧集团

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听到了马歇尔的广播讲话，立即与法国外交部长乔治·比多（Georges Bidault）联系，开始准备对这一提议进行快速的欧洲回应（并接受）；从而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英法两国一致认为，有必要邀请苏维埃作为另一主要盟国。马歇尔的讲话明确地包括了对苏维埃的邀请，认为排斥苏维埃将是一种不信任的

信号。但是，美国国务院官员知道，斯大林几乎肯定不会参加，而且任何向苏联提供大量援助的计划都不太可能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

初步反应

莫洛托夫在1946年10月10日的巴黎和平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已经表达了苏联的担忧："如果美国资本得以自由进入那些因战争而毁灭或衰弱的小国，那么，它会收购当地的工业和企业；它会购买有吸引力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企业；它将成为这些小国的主人。"

起初，尽管苏联驻华盛顿大使怀疑马歇尔计划可能导致建立反苏联集团，但斯大林对此提议持开放态度。斯大林指示，在即将于巴黎举行的有关马歇尔援助计划的谈判中，东欧集团国家不应拒绝施加于其上的经济条件。

斯大林只有在得知以下情况时才改变了看法：（a）信贷只会在经济合作的条件下提供，并且（b）对于德国的援助，应当是针对整个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斯大林认为，这样一来，苏联对于德国西部的影响就会受到严重阻碍。

同样令斯大林担忧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急于接受援助，同时波兰人也表明了与捷克斯洛伐克人一致的态度。

苏联强迫东欧集团拒绝援助

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离开巴黎，拒绝了这项计划。此后，苏联方面有言论暗示与西方未来的对抗，称美国既是"令人着迷的"力量，又是"全球反革命和反苏活动的中心"，所有与美国结盟的国家都被冠以敌人的烙印。

然后，苏联人还于几个月前的1947年春季在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选举中将共产党候选人的损失归咎于美国。它声称必须以任何方式抵制和防止“马歇尔化”，并且法国和意大利国内的共产党人士将尽最大努力破坏马歇尔计划的执行。

此外，西方驻莫斯科使馆被隔离，其人员被拒绝与苏联官员接触。

7月12日，在巴黎召开了一次更大的会议。欧洲的每个国家都被邀请参加，除了西班牙（对轴心国表示同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国）以及安道尔，圣马力诺，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这三个小国。大会邀请了苏联，但知道它可能会拒绝。还接触了未来的东欧集团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意参加。苏联对东欧地区实行严格控制和统治的最明显迹象和反映是，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大臣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被传唤至莫斯科，并受到斯大林的指责，因为捷克斯洛伐克考虑了可能参与和加入马歇尔计划。波兰总理约瑟夫·西兰基维兹（JózefCyrankiewicz）因斯大林的阻挠而最终拒绝了马歇尔计划；他受到斯大林的奖励；该奖励包括，苏联提出的为期五年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协定，大约相当于4.5亿美元援助（1948年； 折合为2014年的44亿美元），形式为长期信贷和贷款；并提供20万吨谷物，重型机械和制造机械等。

当斯大林阻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参加巴黎会议时，其它“马歇尔计划”参与者并不感到惊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之外，其他东欧集团国家立即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提议。

芬兰也拒绝接受马歇尔援助计划，以避免与苏维埃抗衡。

南斯拉夫

所有其他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都服从于斯大林的要求而拒绝了马歇尔计划援助。然而，铁托在1948年与斯大林在其他问题上果断地破裂，使南斯拉夫成为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美国领导人

内部存在分歧，但最终达成了共识，并于1949年开始小规模汇款，并在1950-53年间大规模汇款。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不是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

斯克拉斯卡波伦巴会议

9月下旬，苏联在波兰西南部召开了一次由9个欧洲共产党组成的会议。一开始就读了苏联共产党（CPSU）的报告，以设定强烈的反西方基调，说"国际政治由美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所主导"， "奴役欧洲被削弱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破坏活动，与美国在欧洲的存在作斗争。该报告进一步声称，"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对德国和日本，特别是对希特勒德国，寄予了特别希望；它们把德国看成是一支最有能力打击苏联的力量"。

该报告在谈到东欧集团时说："红军的解放作用，得到了热爱自由之人民、与法西斯掠夺者及其雇佣者的、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补充。"

它认为"华尔街的老板"正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地区攻城掠地"。马歇尔计划被描述为"美国奴役欧洲的计划"。

它描述了现在的世界"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阵营【指英美和西欧】，另一方面是反帝国主义和民主阵营【指苏联和东欧】"。

会议主席安德烈·兹达诺夫（Andrei Zhdanov）一直与克里姆林宫保持无线电联系，并从中得到指示。他还谴责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与他们各自国家的国内议程进行合作。赫达诺夫警告说，如果他们继续不与莫斯科保持国际联系以就所有事项进行磋商，“将对兄弟党的工作发展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

其实，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本可以指出，实际上是斯大林曾指示他们不要在1944年对马歇尔计划采取反对立场。但是，在此次大会上，那些共产党党内纪律要求他们，不得向苏联方面在会上针对他们所提出的批评提出反驳异议。

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党一样，随后将其使命转移到“破坏资本主义经济”上。并且苏联共产党新闻局（Cominform）将指示和掌控法国共产党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活动。

当他们问兹达诺夫（Zhdanov）他们回家时是否应该为武装起义做准备时，他没有回答。在与斯大林的后续谈话中，斯大林对兹达诺夫解释说，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将在民族独立的口号下进行。

国会通过

在保守的共和党人的控制下，美国国会出于多种原因同意了该计划。由参议员肯尼思·S·惠瑞（共和党-内布拉斯加州）领导的、包含20名参议员的、以美国中西部乡村为民意基础的、参议院“外交孤立主义”保守派，对马歇尔计划持反对意见。但由参议员亚瑟·范登伯格（Arthur H.

Vandenberg）（共和党-密歇根州）领导的新兴“国际主义派”支持马歇尔计划。

反对派认为，通过支持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府来反对共产主义是没有道理的。美国的商品将运抵俄罗斯并增加其战争潜力。他们称其为“浪费的老鼠洞’”。

范登伯格得到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共和党-麻萨诸塞州）等人的支持。他们说，马歇尔计划虽然也许不一定会全部成功，但至少会制止经济混乱，维持西方文明，并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

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 Taft）对这一问题也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马歇尔计划或许在经济学意义上而言是不合理的；但是，这在“反共世界斗争”中“绝对必要”。最终，只有17名参议员在1948年3月13日的美国国会决策过程中投票反对。

最初获得50亿美元拨款的法案在国会两党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了国会批准。国会最终在该计划的四年中分配了124亿美元的援助。

国会的投票结果，反映了公众舆论，这与共产主义在贫困中蓬勃发展的意识形态论点产生了共鸣。

杜鲁门在1948年大选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大大增强了杜鲁门的声望和力量。在整个美国，包括商业，劳工，农业，慈善事业，民族和宗教团体在内的多个社会集团将马歇尔计划视为解决大规模问题的廉价解决方案，并指出这也将有助于美国的出口并刺激美国经济。

大型报纸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其中包括诸如《时代》杂志之类的保守派。范登伯格确保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得到两党的支持。团结的民主党南方

选民给予了高度支持，中西部的上半部对此表示怀疑，但人数不多。该计划遭到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反对任何大型的政府支出计划，并对欧洲人持高度怀疑态度。在左派中【即，那些同情、或接近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人士】，也有一些针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对者；这个反对阵营由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领导。他说，该计划对苏联充满敌意，而且是对美国出口商的大型补贴，并肯定会使东西方之间的世界两极化。

但是，由于对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政变的震惊，马歇尔计划在美国所受到的反对大大减少。

著名企业家保罗·霍夫曼（Paul G. Hoffman）被任命为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董事；这本身向保守派人士们显明，巨额援助资金将得到有效率的处置。

谈判

将计划变为现实需要参与国之间进行谈判。16个国家在巴黎开会，确定美国的援助将采取何种形式以及如何分摊。谈判是漫长而复杂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

法国最主要的担忧是德国不会被重建为先前的威胁国。

在比荷卢国家（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尽管在纳粹统治期间承受了痛苦，但它们有着与德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漫长历史，并认为他们未来的利益也取决于德国经济的复兴。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瑞典）坚持不中断与东欧集团国家的长期贸易关系，也不得侵犯其中立性。

英国坚持自己作为二战期间长期交战的特殊地位，担心如果它与遭受破坏

的欧洲大陆大国被一视同仁地对待，那么，它将几乎得不到任何援助。

美国人则在推动自由贸易和欧洲统一的重要性，以形成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由威廉·克莱顿（William L. Clayton）代表的杜鲁门政府向欧洲人保证，欧洲人可以自主地自行制定该计划，但美国政府还提醒欧洲人，实施该计划取决于该计划在美国国会的通过。多数美国国会议员致力于自由贸易和欧洲一体化，不愿在德国花太多钱。

但是，在《马歇尔计划》生效之前，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需要立即得到援助。1947年12月17日，美国同意向法国，奥地利，中国和意大利捐款4000万美元。

协议最终达成。欧洲人向华盛顿发送了一项重建计划，该计划由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于1947年制定并商定。在文件中，欧洲人要求提供220亿美元的援助。杜鲁门在提交国会的议案中将这笔款项削减至170亿美元。

1948年3月17日，杜鲁门在匆忙召开的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对欧洲安全进行了阐述，并谴责了苏联。杜鲁门试图遏制苏维埃在东欧集团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要求国会恢复和平时期的军事草案，并迅速通过《经济合作法》，即《马歇尔计划》的官方名称。杜鲁门在谈到苏联时说："当今世界的局势主要不是大战后自然困境的结果。这主要是由于一个国家【指苏联】不仅拒绝合作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的、有荣誉的和平世界，而且还刻意地阻挠这样的和平建设。"

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第80届国会（1947年至1949年）的国会成员对此表示怀疑。俄亥俄州众议员弗雷德里克·史密斯指出："实际上，他告诉美国民众，我们失去了和平，我们的整个战争努力都是徒劳的。"其他人则认为杜鲁门没有用足够强硬的立场来遏制苏联。来自乔治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尤金·考克斯（Eugene Cox）表示："杜鲁门所说的话不够强硬。苏联根本就不可能跟我们合作"。尽管有保留，但美国第80届国会还是满足了杜鲁门

的关于马歇尔计划的要求。这进一步加剧了与苏联的冷战。

杜鲁门于1948年4月3日签署了《经济合作法》，成为法律；该法案设立了经济合作管理局（ECA）来管理该计划。ECA由经济合作主管Paul G. Hoffman领导。在同一年，参与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西德，英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土耳其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建立了由法国人罗伯特·马乔林（Robert Marjolin）领导的欧洲金融合作总组织（后来称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实施

根据Armin Grunbacher的说法：

美国政府没有直接向参与国捐款、让他们随己意购买他们认为需要的任何东西。而是，美国向参与国政府交付了货物并提供了服务，主要是跨大西洋运输，然后由参与国政府将商品出售给相关企业和个人；这些企业和个人必须以当地货币（“对等物”）的美元价格来支付商品的货币价值。这些支付款项要汇入在该国中央银行设置的ERP特别帐户。

这种操作方式具有三个优点：不向欧洲直接提供美元、而是向欧洲提供美国商品，有助于缩小阻碍欧洲重建的美元差距；累积的资金可以用于该国长期重建的投资（如在法国和德国发生的情况）或用于偿还该国政府的战争债务（如在英国）；以当地货币支付的商品通过将这些资金暂时存放在特别帐户中而暂时将其撤出流通，从而限制了通货膨胀。

ECA的官方使命宣言是提振欧洲经济：促进欧洲生产，提振欧洲货币并促进国际贸易，特别是与美国的贸易；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是在于，要求欧洲变得足够富裕以进口美国商品。

ECA（以及《马歇尔计划》）的另一个非官方目标是遏制苏维埃在欧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一点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实力日益增强中尤为明显。

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就这样被转给欧洲各国政府。这些资金由各国地方政府和ECA共同管理。每个欧洲首都都有一位ECA特使，通常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商人，会就此过程提供建议。ECA鼓励合作分配资金，并召集政府，企业和劳工领导人小组审议经济状况，并查看需要援助的地方。受援国由以英国政治家奥利弗·弗兰克斯（Oliver Franks）为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共同代表。

马歇尔计划援助主要用于来自美国的货物。欧洲国家在战争期间几乎耗尽了外汇储备，而《马歇尔计划》援助几乎是他们从国外进口商品的唯一手段。在计划开始时，这些进口主要是急需的主食，例如粮食和燃料，但后来采购转向了原定的重建需求。在随后的几年中，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以及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越来越多的援助被用于重建西欧军队。到1951年中期分配的约130亿美元中，有34亿美元用于原材料和半制成品的进口；32亿美元用于食品，饲料和肥料；在机器，车辆和设备上的投资为19亿美元；以及16亿美元的燃料。

还建立了对等基金；该基金使用马歇尔计划援助款项、以当地货币建立基金。根据ECA的规定，接受者必须将这些资金的60％投资于工业。这在德国尤为明显；在德国，这些政府管理的资金在向私人企业信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私人企业会花钱投资、进行工业重建。这些资金在德国的再工业化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例如，在1949–50年间，这些资金在德国煤炭工业中的投资占40％。

这些公司有义务偿还给政府的贷款，然后政府将这笔钱贷给另一组企业。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一直在以国营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fürWiederaufbau，意为重建信贷研究所）的名义进行。当时由联邦经济部监督的特别基金在1971年的资产价值超过100亿马克。在1997年，它的价值为230亿马克。通过循环贷款制度，该基金到1995年底已向德国公民提供了约1400亿德国马克的低息贷款。其余40％的对应资金用于偿还债务，稳定货币或投资于非工业项目。法国最广泛地使用匹配资金，以减少预算赤字。在法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地区，对应的资金被吸收到了政府的一般收入中，而不像德国那样被回收继续使用。

荷兰获得了美国在荷属印尼地区的经济复苏援助。但是，在1949年1月，美国政府为反对荷兰在印尼国民革命期间试图恢复其在印尼的殖民统治的努力，而中止了这一援助，并暗示威胁说，如果荷兰政府继续反对印尼独立，马歇尔计划将停止对荷兰国内经济的援助。

当时美国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马歇尔计划》的目标之一是让欧洲使用石油代替煤炭，但欧洲人想购买原油并使用《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来建设炼油厂。但是，当美国独立石油公司抱怨时，ECA拒绝了用于欧洲炼油厂建设的资金。

技术援助计划

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向希腊提供的援助

在欧洲，提高工业生产率是当务之急，这被证明是马歇尔计划最成功的方面之一。美国劳工统计局（BLS）为技术援助计划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美国国会于1940年6月7日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允许美国劳工统计局“继续研究劳动生产率”，并拨款创建了生产力和技术发展部。然后，BLS可以利用其在生产效率领域的专业知识在每个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西欧国家实施生产力效率驱动计划。配套资金用于资助那些欧洲国家派遣代表团对

美国各行工业的大规模考察。例如，法国派出了500个任务团，有4700名商人和专家参观了美国的工厂，农场，商店和办公室。美国工人的繁荣给他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美国，工人们平均使用九个月的工资就能买到便宜的新车，而在法国，则平均要30个月。

通过进行技术文献调查和组织的工厂访问，美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工程师能够对欧洲制造商进行统计测量方面的教育。美国人提供统计和技术援助的目的是提高欧洲制造商在所有行业中的生产效率。

为了进行此分析，BLS执行了两种类型的生产率计算。首先，他们使用现有数据来计算工人每小时的工作量—平均产出率。其次，他们将特定国家/地区的现有产出率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产出率进行了比较。通过对所有行业进行这些计算，BLS能够确定每个国家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的优缺点。由此，BLS可以推荐每个国家可以实施的技术（尤其是统计技术）。这些技术通常来自美国。到技术援助计划开始时，美国使用统计技术“比（欧洲人）使用的技术领先一代以上”。

BLS使用这些统计技术为西欧国家创建了工厂绩效报告。美国政府向欧洲派遣了数百名技术顾问，以观察该领域的工人。这种现场分析使《工厂绩效报告》对制造商特别有用。此外，技术援助计划还资助了24,000名欧洲工程师，领导人和工业家访问美国，并参观了美国的工厂，矿山和制造工厂。这样，这些欧洲精英人士们将能够返回自己的祖国并实施在美国所学习到的技术经验。工厂绩效报告中的分析和欧洲生产率团队的“动手实践”经验有效地发现了欧洲工业中的生产率缺陷；从而，如何使欧洲生产更加有效变得更加清晰。

在技术援助计划尚未生效之前，美国劳工部长莫里斯·托宾（Maurice Tobin）向美国和欧洲经济领导人表达了对美国生产力和技术的信心。他敦促美国在提高欧洲的生产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为该计划的管理者提供四项建议：——

1.BLS的生产率人员应在美欧理事会上任职，以提高生产率；

2.可以并且应该实施生产率目标（基于美国生产率标准）以提高生产率；

3.应进行一般性的信息交换和发布；

4.“技术摘要”服务可以提供信息的主要来源。

技术援助计划的效果不仅限于提高生产效率。在成千上万的欧洲领导人去美国进行工作/学习旅行的同时，他们也能够观察到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欧洲人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与多元社会中的公民共同努力。他们观察到一个民主社会，除了更先进的工厂和制造工厂外，还拥有开放的大学和公民社会。技术援助计划使得欧洲人带回许多类似于美国社会的想法。

技术援助计划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低成本。虽然在《马歇尔计划》中分配了194亿美元的资本成本，但技术援助计划仅需要3亿美元。在这3亿美元的成本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由美国支付的。

英国

战争结束后，英国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美国则经历了经济繁荣。战后，美国继续为英国国库提供资金。这些援助的大部分旨在恢复基础设施并帮助难民。1946年，英国获得了37.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这是一个50年期，利率低至2%的贷款。马歇尔计划提供了一个更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向英国提供了33亿美元。马歇尔计划的钱是一个礼物，并要求英国收支平衡，控制关税、并保持足够的货币储备。总理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

美国制定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帮助重建战后的英国经济，帮助实现其经济

现代化，并最大程度地减少贸易壁垒。当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并且禁止其卫星国参加马歇尔计划时，马歇尔计划成为正在兴起的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美两国在马歇尔计划要求方面存在政治紧张关系。

伦敦对华盛顿强调将欧洲经济一体化作为战后恢复的解决方案表示怀疑。

伦敦试图说服华盛顿，美国的经济援助，特别是对英镑货币区的援助，对于解决美元短缺是必不可少的。英国经济学家后来认为，随着欧洲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到1950年，他们当初的观点正确性得到了证实。

华盛顿在1947年7月15日要求英镑与美元之间可进行兑换，这给英国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1947年8月20日，英镑的可兑换性被暂停。

但是，到1950年，美国的重新武装以及在朝鲜战争和冷战上的巨额支出终于结束了美元的短缺。吉姆·汤姆林森说，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是战后政府麻烦的源头，其原因不是经济下滑，而是政治扩张。

西德和奥地利

马歇尔计划于1948年至1950年在西德的实施，是使其工业流程现代化和应用最佳实践的一种方式。马歇尔计划使西德有可能迅速恢复其具有强大出口企业部门的传统工业生产模式。若没有该计划，农业在西德恢复期中将不得不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其恢复期会更漫长得多。

关于奥地利，贡特·比绍夫（GünterBischof）指出：“奥地利经济被注入了过多的欧洲复苏计划资金，创造了奇迹的增长数字，该数字与德国的数

字相匹配，甚至超过了德国。”

总体而言，马歇尔计划、特别是对口基金，实际上对西欧的冷战宣传和经济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很可能导致了共产主义在西欧的吸引力下降。

支出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大致按人均分配给参与国。主要工业大国获得了更大的资助，因为普遍的看法是，大工业强国的复兴对于整个欧洲的复兴至关重要。马歇尔计划也向盟国提供了更多的援助，而对那些曾经成为轴心国或保持中立的国家则相对而言减少了援助。唯一的例外是冰岛，它在战争期间一直是中立的，但人均获得的援助却比第二高的接受者更多很多。下表显示了马歇尔计划中按国家和年份（以百万美元计）的援助支出款项。关于确切的数额，没有明确的共识，因为不同的学者对于在此期间美国援助的哪些内容确切地属于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存在不同的看法。

国家	1948-49	1949-50	1950-51	累计
奥地利	232	166	70	468
比利时与卢森堡	195	222	360	777
丹麦	103	87	195	385
法国	1,085	691	520	2,296
西德	510	438	500	1,448

希腊	175	156	45	376
冰岛	6	22	15	43
爱尔兰	88	45	0	133
意大利	594	405	205	1,204
荷兰	471	302	355	1,128
挪威	82	90	200	372
葡萄牙	0	0	70	70
瑞典	39	48	260	347
瑞士	0	0	250	250
土耳其	28	59	50	137
英国	1,316	921	1,060	3,297
合计	4,924	3,652	4,155	12,731

贷款和赠款

与GARIOA一样，马歇尔计划也包括赠款和贷款形式的援助。在总额中，有12亿美元是贷款援助。

爱尔兰通过马歇尔计划获得了1.462亿美元物资，获得了1.282亿美元的贷款，其余的1800万美元为赠款。到1969年，爱尔兰仍在偿还的《马歇尔计划》债务达3100万英镑，而爱尔兰的外债总额为5000万英镑。

英国以贷款形式获得了马歇尔计划援助中的3.85亿美元。此外，在马歇尔计划项目之外，英国也从美国获得了46亿美元的直接贷款。英国和法国的马歇尔计划贷款与马歇尔计划赠款的比例大约为15％至85％。

直到1953年达成债务协议之前，德国都必须以偿还所有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假设为依据进行工作；德国非常谨慎地花费使用了相应资金。马歇尔计划货物的“对等资金”由重建信贷研究所管理，该研究所将这些资金用于德国境内的贷款。在1953年的《债务协议》中，德国要偿还的马歇尔计划援助金额减少到不到10亿美元。这使得对德国的贷款与赠款的比例与法国和英国的比例相似。德国于1971年进行了最后一次贷款偿还。由于德国选择从德国联邦预算中偿还援助债务，因此德国ERP基金保持原样，该基金得以继续其重建工作。到1996年，它已累积了230亿德国马克的价值。

1948年4月3日至1952年6月30日的经济援助（以百万美元计）

国别	总计	赠款	贷款
奥地利	677.8	677.8	/
比利时-卢森堡	559.3	491.3	68.0贷款总额包括向比利时提供的6500万美元和向卢森堡提供的300万美元：无法清楚地区分在两国之间定义各自所收到的赠款。
丹麦	273.0	239.7	33.3
法国	2,713.6	2,488.0	255.6
西德	1,390.6	1,173.7	216.9湾 其中包括第一笔贷款1,690万美元，再加上2亿美元，这笔赠款是根据1953年2月27日签署的协议将赠款按比例分配的部分。

希腊	706.7	706.7	/
冰岛	29.3	24.0	5.3
爱尔兰	147.5	19.3	128.2
意大利	1,508.8	1,413.2	95.6
荷兰（*印度尼西亚）c。在1949年12月30日主权移交之前，对马绍尔、荷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计划的援助扩展到荷兰。向荷兰东印度群岛提供的援助总额为1.014亿美元（赠款为8420万美元，贷款为1720万美元）	1,083.5	916.8	166.7
挪威	255.3	216.1	39.2
葡萄牙	51.2	15.1	36.1
瑞典	107.3	86.9	20.4
土耳其	225.1	140.1	85.0
英国	3,189.8	2,895.0	384.8
区域性	407.0 其中包括美国对欧洲支付联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资金的捐款3.614亿美元；一般货运帐户3350万美元；欧洲获得技术援助的授权（多国或地区）1,210万美元。	407.0	/
所有国家总计	13,325.8	11,820.7	1,505.1

为中央情报局前线提供资金

在中央情报局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资金（约$ 685万，分布在六年中），它用

来资助海外暗箱操作的5%。通过政策协调办公室，资金被用于支持工会，报纸，学生团体，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正在反抗共产党资助的反美同行。最大一笔款项拨给了文化自由大会。在苏维埃或其卫星国家之间，没有这样的工作。文化自由大会的创立会议于1950年6月在柏林举行。来自美国和西欧的主要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哲学家，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弗朗茨·博克瑙（Franz Borkenau），卡尔·贾斯珀斯（Karl Jaspers），约翰·杜威（John Dewey），伊格纳齐奥·西隆（Ignazio Silone），詹姆斯·伯纳姆，休·特雷弗-罗珀，阿瑟·施莱辛格小，伯特兰·罗素，恩斯特，雷蒙·阿隆，阿尔弗雷德·艾耶尔，克罗齐，阿瑟·库斯勒，理查德·洛文塔尔，梅尔文·J·拉斯基，田纳西·威廉斯，欧文布朗和胡克。参与者中有保守派，但非共产主义（或前共产主义）的左翼分子更多。

效果和遗产

《马歇尔计划》原定于1953年结束。由于朝鲜战争和重新武装的费用不断增加，任何延长其计划的努力都停止了。对该计划怀有敌意的美国共和党人也在1950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席位，对该计划的保守派反对派也重新占据主流。因此该计划于1951年结束，尽管此后美国继续向欧洲提供各种其他形式的援助。

1948年至1952年是欧洲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工业生产增长了35%。农业生产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

战后不久的贫困和饥饿消失了，西欧开始了空前的二十年增长，生活水平急剧提高。此外，经济一体化的长期影响大大提高了欧洲的收入水平，到1970年代中期增加了近20%。

关于欧洲战后的经济奇迹增长，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歇尔计划，历史学家之间存在一些争论。

大多数人都反对仅凭马歇尔计划而奇迹般地复兴了欧洲的想法，因为有证据表明，在马歇尔计划实施之前，西欧总体复苏已经在进行中。多数人认为，马歇尔计划加快了复苏进程，但并未启动它。许多人认为，它强制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非常重要。经济历史学家J. Bradford DeLong和Barry Eichengreen称其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结构调整计划”。该计划的效果之一是，它通过美国流行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和摇滚乐的影响力的增长，来巧妙地“美国化”了欧洲国家，尤其是奥地利。

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影响可能与经济影响一样重要。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使西欧各国放松了紧缩措施和配额，减少了不满并带来了政治稳定。共产主义在西欧的影响力大大降低，在整个地区，在马歇尔计划实施后的几年中，共产主义政党的知名度逐渐下降。马歇尔计划所促进的贸易关系帮助建立了北大西洋联盟，该联盟将以北约的形式在整个冷战期间持续存在。同时，东欧集团国家的不参与，是该大陆现在分裂的最早的明显迹象之一。

马歇尔计划在欧洲一体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人和许多欧洲领导人都认为，欧洲一体化对于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繁荣是必要的，因此使用了《马歇尔计划》准则来促进一体化。在某些方面，这项努力失败了，因为OEEC从来没有超过成为经济合作推动者的角色。相反，是不包括英国在内的、独立的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最终将发展为欧盟。但是，OEEC充当了架构的测试和培训基地；这些架构随后将被欧洲经济共同体使用。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马歇尔计划还极大促进了整个地区的自由贸易。

尽管今天的一些历史学家感到对马歇尔计划的赞美有些夸大，但它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因此许多人认为类似的项目将对世界其他地区有所帮助。

共产主义垮台后，一些人提出了“东欧马歇尔计划”，这将有助于该地区的复兴。其他人提出了《非洲马歇尔计划》以帮助该大陆，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提出了《全球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已成为旨在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任何超大型政府计划的隐喻；通常在要求联邦政府支出以纠正私人部门的失败时使用。

尼古拉斯·沙克森（Nicholas Shaxson）评论说：“人们普遍认为，该计划通过抵消欧洲国家不断增加的赤字而奏效。但是它的真正重要性……仅仅是为了弥补美国未能对从欧洲流入的热钱实行管制的补偿。......美国的战后援助小于在其他方向上流动的钱。”欧洲热钱流入美国使得美元升值，给美国出口造成不利。

还款

马歇尔计划的捐赠资金是美国财政部的赠款形式，无需偿还。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资金与货物分配方面采取了主导作用。美国供货商得到资金的支付，并记入适当的欧洲复兴计划资金中。欧洲收货人以当地货币付款（通常以信贷方式）。这些款项由参与特别配对基金的欧洲政府保留。反过来，这笔对应的资金可以由政府用于进一步的投资项目。对方资金的5％已支付给美国，以支付ERP的管理费用。

除ERP赠款外，进出口银行（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同时还以低利率发放了长期贷款，以资助马歇尔计划在美国所进行的主要购买活动；所有这些都已偿还。

以德国为例，从1920年代起还有160亿马克的债务在1930年代违约，但德国决定偿还债务以恢复声誉。这笔钱是欠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政府和私人银行的。另有160亿马克是战后偿还美国的贷款。根据1953年的《伦敦债务协议》，当时的可偿还金额减少了50％，降至约150亿马克，而且有效期延长

了30年，与快速增长的德国经济相比，影响较小。

没有被计划涉及的区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很多地区并未从马歇尔计划中受益。唯一被排除在外的西欧主要国家是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西班牙，该国在华盛顿非常不受欢迎。随着冷战的升级，美国重新考虑了自己的立场。1951年，在佛朗哥积极的反共政策的鼓舞下，美国成为西班牙的盟友。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将有大量的美国援助提供给西班牙，但比其邻国在《马歇尔计划》下获得的援助要少。

战争给苏联和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严重的影响。苏维埃向在其势力范围内的轴心国盟友强加了大笔赔偿。奥地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尤其是东德被迫支付巨款，并向苏联运送大量物资。这些赔偿金意味着苏联本身从马歇尔计划援助中获得的援助与16个欧洲国家差不多。

根据与苏联达成的协议，西德从1946年3月31日开始从德国西部运送已拆除的德国工业设备，交给苏联。根据该协议的条款，苏联本应当把诸如食品和木材等原材料运给西德地区。鉴于苏联没有这样做，西德地区表面上是暂时性地暂停了发往东部的运货，尽管后来从未恢复过。后来显示，中止向东运送货物的主要原因不是苏联的行为，而是法国的顽强坚持。苏联从西德收到许多工业设备，例如滚珠轴承设备，戴姆勒-奔驰飞机发动机工厂设备，Deschimag船厂设备，Gendorf发电厂设备，等等。

苏联确实将COMECON确立为“马歇尔计划”的替代计划，以向东欧集团国家提供援助，但是由于苏联为致力于自己从战争中复苏的努力而使这一情况变得复杂。Comecon的成员国们向苏联寻求石油。但是，反过来，他们向苏联提供了机械，设备，农产品，工业品和消费品。东欧的经济复苏要比西欧慢得多，从而导致了东欧短缺经济的形成、以及东西欧之间的财富差距。

芬兰被苏联禁止加入马歇尔计划，并被要求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芬兰的经济在1947年恢复到战前水平。法国通过马歇尔计划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同样，到1949年，其人均收入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到1948年中期，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略高于战前水平的水平。

援助亚洲

从战争结束到1953年底，美国向亚洲国家提供了总计59亿美元的赠款和信贷，特别是中国（台湾）（10.51亿美元），印度（2.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15亿美元） ，日本（24.4亿美元），韩国（8.94亿美元），巴基斯坦（9,800万美元）和菲律宾（8.03亿美元）。此外，还有2.82亿美元流向以色列，1.96亿美元流向中东其他地区。所有这些援助与马歇尔计划是分开的。

加拿大

像美国一样，加拿大受到战争的破坏很小，1945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经济体之一。它实施了自己的援助计划。1948年，美国允许ERP援助款项用于从加拿大购买货物商品。在运营的头两年，加拿大的销售额就超过10亿美元。

世界总数

从1945年到1953年，美国向世界提供的赠款和贷款总额达到443亿美元。

意见

德国标志，表示“美国海外援助计划支持的农业咨询”

Bradford DeLong和Barry Eichengreen总结说，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结构调整计划”。他们声明：

它规模不大，无法通过融资投资，帮助重建受损的基础设施或缓解商品瓶颈来显着加速复苏。但是，我们认为，《马歇尔计划》确实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歇尔计划援助附带的条件将欧洲政治经济推向了一个方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混合经济体”有了更多的“市场”和更少的“控制”。

国内支持运动

在通过并颁布《马歇尔计划》之前，杜鲁门总统和乔治·马歇尔开始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全国范围内舆论鼓动。其主旨是在向美国普通民众告知，马歇尔计划是什么、以及该计划最终将做什么。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说服美国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且美国公众应当接受，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民众将会承受更高的收税。

大量的宣传最终有效地影响了公众舆论，以支持马歇尔计划。在全国范围的支持运动中，“分发了超过一百万份宣传《马歇尔计划》的出版物，包括小册子，传单，复印本和情况介绍”。

杜鲁门和马歇尔的努力被证明是有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在1947年7月至

1947年12月之间进行，结果显示，不知道《马歇尔计划》的美国人比例从全国范围的51％下降到36％。到《马歇尔计划》准备实施时，整个美国公众已经普遍达成共识，认为这对美国和将要接受援助的国家都是正确的政策。

美国意识形态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人是高度孤立主义者，许多人称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人意识形态的“里程碑”。通过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内的民意测验数据，人们会发现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将他们的孤立主义理想换成了更加全球化的国际主义意识形态。

民意测试数据

在1947年向国会提出任何建议之前，杜鲁门政府做出了精心的努力来组织公众舆论，以支持《马歇尔计划》的开支，并与代表企业，劳工，农民，妇女和其他利益集团的众多国家组织进行接触。政治学家拉尔夫·莱弗林（Ralph Levering）指出：

政府开展大规模的公共关系运动并为诸如马歇尔计划公民委员会之类的私人团体提供支持。在将这些马歇尔计划援助措施付诸国会表决之前，杜鲁门政府已经精心地取得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们的支持。

1947年的民意测验一致地显示出美国人对马歇尔计划的大力支持。此外，盖洛普（Gallup）在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超过60％的人们对此支持。

西欧战后重建

https://share.america.gov/zh-hans/postwar-marshall-plan-rebuilt-europe-marks-70th-anniversary/

纪念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70周年

1947年6月5日，脱下戎装转入政界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发表历时11分钟的讲话，为欧洲复兴奠定了基调，缔结了欧洲大陆与美国长达几十年的紧密联系。

马歇尔选择这个低调的场合宣布美国为欧洲提供大量援助，帮助欧洲从第

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Two）的废墟中得到重建。这个计划就是著名的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又称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该计划开创了美国新的扩展性对外政策的时代，促进了欧洲与美国至今仍然保持的牢固联系。

马歇尔当年的讲话阐述了有关和解、美国的责任和慷慨相助及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等思想至今仍然在人们耳边回响。

马歇尔在战时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U.S. Army chief of staff），曾参与组织1944年盟军进军法国的行动，最终导致德国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军队的败局。马歇尔后来担任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政府的国务卿，在前往哈佛大学接受荣誉学位的时候发表了著名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欧洲复兴计划的目的不仅在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这项计划要求在4年内为欧洲提供130亿美元资金。

马歇尔认为，欧洲作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地区实现复兴，可以抗击共产主义俄罗斯扩张的野心，并成为美国基本的经济和贸易伙伴，为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歇尔说，“我们的政策旨在抗击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并不针对任何政策和信条，其目的应该是重振全世界有效益的经济，促进有利于自由体

制生存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出现。”

他的讲话反映了华盛顿（Washington）关于美国未来的繁荣与西欧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信念。当年美国仍然受到自身经济衰退的重创。

欧洲的新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战胜希特勒向欧洲调集军队和武器，战后又为欧洲提供资金、食品和能源供应。但马歇尔明确指出，欧洲国家自身必须为执行重建计划承担责任。他说，“这是欧洲人的职责。”

他要求欧洲国家相互合作，打破以往的政治和贸易壁垒。他强调，“这个计划应该联为一体，即使未得到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必须得到一些国家的赞同。”

这次讲话立即引发了人们对欧洲产生新的希望。当时，16个西欧国家的代表在巴黎（Paris）举行会议，并在9月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共同文件，提出对欧洲重建需求的估算。1948年4月3日，杜鲁门签署了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批准实施马歇尔计划。援助工作随即展开。

1949年，西德恢复自治后也被纳入该计划。1964年，战后担任西德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评估马歇尔计划时表示，“一个战胜国伸手相助，希望被征服的一方能重新站起来，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马歇尔计划促进了欧洲煤炭和钢铁等行业的复兴。各国以超过原来预期的速度恢复生机。该计划还刺激了美国经济，因为大部分资金都用于购置美国工厂和供应商提供的产品。

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性变革

美国老资格的外交人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谈到，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讲话清晰透彻，简洁平实。他写道，“马歇尔描述了事态的重要性，毫无自我贬抑之意，也不见光灿的豪言壮语。”

基辛格说，美国人以往视对外政策为一系列需要谨慎对待的挑战，必须个别得到解决，但是马歇尔的讲话摆脱了历史的窠臼。

马歇尔的讲话没有详述该计划的细节，但为今后数十年跨大西洋关系的发展确定了原则。

1997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在纪念马歇尔讲话50周年之际表示，“马歇尔计划改变了美国处理与欧洲关系的方式，为此也改变了欧洲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

他说，“这次讲话播下了制度的种子，逐渐将西欧连接在一起，建立了欧洲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和北约等机制，为弥合历史久远的分歧奠定了基础。”

1953年，马歇尔因倡导马歇尔计划获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

二战以后的苏联与东欧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rsaw_Pact

华沙条约

《华沙公约》是对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的军事补充，该委员会是中欧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域经济组织。华沙条约是根据1955年伦敦和巴黎会议于1955年将西德纳入北约的反应而创建的。但它也被认为是由苏联维持对中欧和东欧军事力量的控制所致。

《华沙公约》的确立是对北约的力量平衡或对峙。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军事对抗。相反，冲突是在意识形态和代理战争中进行的。北约和《华沙条约》都导致了军事力量的扩大，并使其融入了各自的集团。其最大的军事参与是1968年8月《华沙条约》国家组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除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外，所有其它华约国家都参加了此次入侵）。在某种程度上，在这次华约国家组织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到一个月之后，导致了阿尔巴尼亚退出该条约。1989年东欧剧变以后，该公约逐渐解体。

1990年德国统一后，东德退出了该条约。1991年2月25日，在匈牙利的一次会议上，剩余的六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宣布结束该条约。苏联本身于1991年12月解散，尽管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在此后不久成立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在接下来的20年中，苏联之外的七个华沙条约国家都加入了北约（东德通过与西德统一；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成为独立国家；以及波罗的海国家）。

结构

《华沙条约》的组织有两个方面：政治协商委员会处理政治事务，契约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控制多国部队，总部设在波兰华沙。在华沙条约组织的统一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指挥和控制各成员国的所有军事力量，也是苏

联第一副国防部长。华沙条约组织统一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长，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第一副总参谋长。因此，尽管表面上是一个国际集体安全联盟，但苏联主导了《华沙条约》武装部队，类似于美国对北约联盟的主导。

战略

《华沙条约》形成背后的战略原因是，苏联希望防止中欧和东欧各国倒向西欧国家集团。其政策也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原因。从意识形态上讲，苏联垄断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意识形态的权利，并担任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一个必然结果是，例如，如果一个东欧国家看似违反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中明确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思想，则必须对该国进行干预。

历史

开端

在签订《华沙条约》之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惧怕德国的重新崛起，试图与东德和波兰缔结一项安全条约。这些国家强烈抗议西德的重新军事化。华沙条约之所以生效，是因为北约内部的西德重新崛起。像铁幕两侧的许多欧洲国家一样，苏联领导人担心德国再次成为军事强国和直接威胁。德国军国主义的后果在苏维埃和东欧国家中仍然记忆犹新。

由于苏联已经与所有东部卫星国家签订了双边条约，因此《华沙公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多余的”，并且由于仓促行事北约官员将其命名为“纸板城堡”。

苏联担心德国在西德恢复军国主义，于1954年要求加入北约，但遭到美国

和英国的拒绝。

1954年1月至2月的柏林会议之后，苏联提出了加入北约的要求。苏联外交大臣莫洛托夫提出了使德国统一的提议，并在美英法苏四国撤军、德国保持中立【即，德国不可倒向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条件下选举一个全德政府。但这些提议都被美英法外长拒绝。

统一德国的提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52年3月20日早些时候，关于由所谓的“斯大林笔记”发起的德国统一的讨论，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坚持反对之后就结束了：——美英法反对苏联提议的原因是在于，美英法坚持认为，统一的德国不应该被强迫保持中立【即，德国不应当被限制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往来】，而是应该可以自由地加入欧洲防卫组织（EDC）并重新武装。

詹姆斯·邓恩（美国）在巴黎会见了英法官员，他重申“目标应该是避免与俄国人进行讨论，并敦促欧洲防卫共同体”。

根据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 ）的说法，苏联“几乎没有倾向探索这一提议的意愿”。

历史学家罗尔夫·施泰宁格（Rolf Steininger）断言阿登纳尔（Adenauer）坚信“中立即意味着苏联化”是拒绝苏联提议的主要因素。

阿登纳尔（Adenauer）也担心德国的统一可能导致基民盟在西德联邦议院席位的终结。

因此，莫洛托夫担心欧洲防卫共同体（EDC）未来会针对苏联。为了“防止针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某些欧洲国家集团的形成”，莫洛托夫于是提出了《欧洲集体安全条约》的提议。在欧洲，“向所有欧洲国家开放而无需考虑其社

会制度”，这将包括统一的德国（因此将使EDC被矮化）。

但是英美法外长反对莫洛托夫这一提议。

一个月后，拟议的《欧洲条约》不仅遭到了EDC的支持者的反对，而且遭到了欧洲防卫共同体的西方反对者（例如法国高卢主义者领导人加斯顿·帕洛斯基）的反对。他们认为该条约“目前的形式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把美国排除在外了”。

然后，苏联人决定向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提出新建议，接受美国参与拟议的《欧洲总协定》。

另一种反对苏联提议的论点是，西方各国认为这是“针对北大西洋公约，并试图使北约解体”。

于是，苏联决定宣布他们“准备与其他有关各方，讨论有关苏联参加北大西洋集团的问题”，并指出，“美国加入《欧洲总协定》不应以三个西方大国同意苏联加入北大西洋公约为条件”。

不久之后，苏联的所有提议，包括加入北约的请求，都很快被英国，美国和法国政府拒绝。英国的Emblematic将军是北约扩张的坚定支持者。他反对苏联于1954年提出的加入北约的要求。他说：“苏联加入北约的要求就像是一个不悔改的窃贼，要求加入警察部队。”

1954年4月，阿登纳（Adenauer）首次访问美国，会见了尼克松，艾森豪威

尔和杜勒斯。EDC的批准被推迟了，但是美国代表向Adenauer明确表示，EDC必须成为北约的一部分。

纳粹占领的记忆仍然很浓烈，法国也担心德国的重新武装。1954年8月30日，法国议会拒绝了EDC，从而导致了EDC的失败，并阻碍了美国对欧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将西德与西方进行军事联合。美国国务院开始拟订替代方案：将邀请西德加入北约，或者在法国人反对的情况下，实施规避法国否决权的战略，以使德国在北约之外重新武装。

1954年10月23日，在盟军（英国，美国和苏联）击败纳粹德国之后第九年，终于决定接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1955年5月9日，西德被正式纳入该组织。挪威外交部长黑尔瓦德・朗伊把这件事情描述为“在我们大陆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1954年11月，苏联提出了一项新的《欧洲安全条约》，以便做出最后的尝试，以避免军事化的西德将来可能会反抗苏联，但没有成功。

1955年5月14日，苏联和其他七个东欧国家“重申希望建立一个基于所有欧洲国家的参与、而不论其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的欧洲集体安全制度”，作为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北约的回应。

苏联宣称：“重新军事化的西德以及后者融入北大西洋集团增加了另一场战争的危险，并威胁到和平国家的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平国家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其安全。”

华沙条约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东德，被苏联允许重新武装；而其国民人

民军则成立为该国的武装部队，以对抗西德的重新武装。

成员

《华沙条约》的八个成员国承诺对将要遭到攻击的任何成员进行相互防御。条约签署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基础上的。

《友谊，合作与互助条约》（华沙条约的官方名称）的创始签署国包括以下共产主义政府：

阿尔巴尼亚（由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人的分裂而于1961年停止支持；于1968年9月13日正式撤出）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东德（在德国统一之前于1990年10月2日撤出）

匈牙利（匈牙利革命期间从1956年11月1日至4日暂时撤出）

波兰（1989年6月4日退出，团结工会赢得了全国部分性自由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

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革命之前于1989年12月23日撤出）

苏联

观察员

蒙古：1963年7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条约第9条要求加入《华沙条约》。由于出现中苏分裂，蒙古仍处于观察员地位。苏联政府于1966年同意在蒙古派驻部队。

最初，中国，朝鲜，蒙古和越南具有观察员地位，但中国在19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撤出。

在冷战期间

36年来，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未在欧洲直接进行过战争。美国和苏联及其各自的盟国在欧洲实施了旨在相互遏制的战略政策，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的冷战中努力争取影响力。其中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猪湾入侵，肮脏战争，柬越战争等。

1956年，随着伊姆雷·纳吉（Imre Nagy）政府宣布匈牙利从华沙条约（Warsaw Pact）撤出，苏联军队进入该国并消灭了该政府。苏联军队镇压了匈牙利全国范围的叛乱，导致大约2500名匈牙利公民丧生。

多国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唯一联合行动是1968年8月《华沙条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除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所有其它华约成员国都参加了入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仅仅提供了很少的支持。

冷战结束

1989年，民众和政治群体的不满情绪推翻了《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府。

随着冷战的最后一幕进行，华沙条约组织的几个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参加了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在海湾战争中解放科威特的努力。

1991年2月25日，剩余的华沙条约国家在匈牙利举行国防部长和外长会议；《华沙条约》在会上宣告解散。

1991年7月1日，在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正式结束1955年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

苏联于1991年12月解散。

《华沙条约》之后的中欧和东欧

在整个中欧和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之前和之后的北约扩张

1999年3月12日，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加入了北约；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于2004年3月加入；阿尔巴尼亚于2009年4月1日加入。

俄罗斯和其他一些苏联后国家于1992年加入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或于1996年加入了上海五国组织，该组织在2001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后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SCO）。

2005年11月，波兰政府向国家纪念学会开放了《华沙条约》的档案，该学

会于2006年1月发布了约1,300份解密的文件。然而，波兰政府保留了100份文件的公布，以待对其进行军事解密。最终，在保留的100个文档中，有30个秘密文件被发布。70个仍是秘密且未公开。在发布的文件中，有《华沙条约》的核战争计划，以及《莱茵河七日战役计划》；这是一次简短的快速反击，利用核武器进行自卫，并试图攻占莱茵河以东的奥地利，丹麦，德国和荷兰。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85%B0%E5%8E%86%E5%8F%B2

10世纪中叶，以格涅兹诺为中心的波兰部落逐渐统一其它部落。

皮亚斯特王朝的大公梅什科一世（960-992年）建立早期封建国家。966年，波兰接受基督教。

1025年，博莱斯瓦夫一世（992-1025）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

12世纪中叶，在博莱斯瓦夫三世（1102-1138年）死后，由于王公、贵族和教会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全国分裂为几个公国，波兰进入封建割据时期，达200年之久。

蒙古入侵

1241年4月9日，在莱格尼察的一座小村庄，由蒙古帝国大将拔都统率，速不台指挥的2个图们蒙古军队（8,000 - 20,000人）与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率领下的波兰军队（25,000人）交战，为列格尼卡战役，这支联军的士兵分别来自波兰、以及少量条顿骑士团、摩拉维亚。

蒙古人取得胜利，令欧洲各国震惊，但是由于窝阔台汗去世，他们不得不折返回去选出新任大汗。金帐汗国大汗别儿哥入侵波兰，波兰王国首都克拉科夫被攻占，蒙古军大掠而去。金帐汗国再次入侵波兰，但今次被击退，从此再未侵入波兰。

雅盖隆王朝（1385-1572年）

瓦迪斯瓦夫一世（1314-1333年）统一大波兰、小波兰、库亚维，于1320年在克拉科夫加冕为波兰国王。卡吉米日三世（1333-1370年）统一马佐夫

舍，但是西波莫瑞和东波莫瑞还分别为勃兰登堡和条顿骑士团占领，西里西亚则被波希米亚占领。

为抵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于1385年在克雷沃签订联盟条约，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以联姻的方式实行王朝联合，立陶宛大公瓦迪斯瓦夫二世·亚盖洛为波兰国王。在波兰的影响下，大部分立陶宛人皈依罗马天主教。

1410年，波兰－立陶宛领导的由波兰人、立陶宛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捷克-摩拉维亚人、瓦拉几亚人、鞑靼人、马扎尔人等组成的联军在格伦瓦尔德战役中，给予条顿骑士团毁灭性的打击，并全歼由德意志人、法兰西人、瑞士人等组成的骑士团2.7万人，阻止条顿骑士团的东侵。该战役巩固波兰-立陶宛大国的地位，战役的胜利也是斯拉夫民族和波罗的海民族团结战斗的象征。

1466年，从德意志人手中收复富庶的东波莫瑞，以格但斯克为中心的东波莫瑞的收复，刺激粮食的出口，贵族庄园纷纷建立劳役制庄园，从事商品粮食的生产，城镇开始出现手工工场。亚盖洛王朝的波兰政治清明，国力强盛，从此开始被波兰史学家称为“黄金时代”的极盛时期。

第一共和国时期（1569-1795年）

波兰-立陶宛组成的王国联合一直都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一个形式上的国家联盟。1505年，议会通过宪法，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无权颁布法律。从而削弱王权，招致外来势力干预，此时，位于东方的莫斯科公国开始强大起来，其治下的鞑靼骑兵严重威胁到波兰-立陶宛王国联合的生存。面对莫斯科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为加强王权，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议会在卢布林通过成立统一的波兰共和国的决议，即卢布林联盟，史称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第一共和国），首都从克拉科夫迁到华沙。统一的波兰幅员辽阔，在1618年的疆域极盛时面积达100万平方公

里，疆域比现在的波兰大得多。该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农奴制国家，统治着东欧的波兰、立陶宛、捷克—摩拉维亚人、瓦拉几压人、马扎儿人、鞑靼人、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捷克等诸多民族。

波兰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非常特别，称为“贵族民主制”。

17世纪后半期，农奴制进入危机阶段，1648年赫梅利尼茨基领导的哥萨克在乌克兰举行民族起义。统治阶级的内部也分崩离析，1652年大贵族迫使议会通过自由否决权，1654年俄罗斯宣战，并于1657年兼并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北方战争初期、波兰被迫追随俄罗斯参战，之后波兰丢失部分领土。

1733年～1735年俄、奥与法、西、撒丁为争夺波兰的控制权进行战争，严重破坏波兰主权和国家经济。而波兰的黄金时期不但因1630年代后的一系列战争而结束，原本强大而独立的军事力量，也在18世纪上半的战乱中没落。

近代波兰

18世纪后半期，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中小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发起爱国革新运动，但受到俄罗斯帝国女皇凯瑟琳二世的武装干涉。

1772年5月，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三国在彼得堡会谈，于8月5日签署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据此，波兰丧失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割地予俄普奥，波兰成为这三国的保护国。

人民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把革新运动推向高潮。1791年5月3日，四年议会通过《五三宪法》，取消自由否决权，也是欧洲最早的成文宪法。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

1793年1月23日，俄、普在彼得堡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经第二次瓜

分，波兰成为仅剩领土2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的小国，再次割地予普鲁士和俄罗斯，并成为沙俄的傀儡国，波兰国王未经沙皇许可，不得与外国宣战与媾和。

1794年，人民在民族英雄科希丘什科领导下举行起义，后被俄罗斯军队镇压下去。

1795年1月3日，俄、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10月24日，普鲁士也在协定上签署。根据该协定，波兰领土被全部瓜分。“俄罗斯吞并立陶宛、库尔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把边界推进到尼曼河—布格河一线，共12万平方公里，人口120万；奥地利占领包括克拉科夫、卢布林在内的全部小波兰和一部分马佐夫舍地区，共4.75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普鲁士夺得其余的西部地区、华沙、其余部分的马佐夫舍地区，共5.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

至此，存在800多年的波兰灭亡，而波兰立陶宛联邦亦解体。在三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中，俄罗斯占62%，46万多平方公里；普鲁士占20%，14.11万平方公里；奥地利占18%，12.18万平方公里。经历三次瓜分之后，波兰亡国，从欧洲地图上消失长达123年。

外国统治（1795-1918）

1809年，耶拿战役，普鲁士被法国打败，拿破仑的法军攻入普属波兰，在波兰中部建立傀儡政权华沙公国。

拿破仑和其法兰西帝国失败后，欧洲各国签署《维也纳和约》，欧洲恢复拿破仑战争前的格局，短命的华沙公国被肢解，其西部土地成为波兹南公国（Wielkie Księstwo Poznańskie），受普鲁士管辖；在克拉科夫成立中立的克拉科夫自由市（Rzeczpospolita Krakowska，或者 Wolne Miasto Kraków）；在其主要地区成立波兰会议王国，由俄罗斯沙皇兼领国王。

1830年11月29日，一批贵族青年在华沙举行起义，结果失败。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也遭失败，克拉科夫被并入奥地利。1848年波兰人民又一次掀起革命，迫使普奥当局废除农奴制度。1863年1月的起义遍及波兰王国、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1864年3月2日，沙皇政府不得不颁布解放农奴的法令。

1864年后，波兰王国的经济有很大发展，19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产业革命。从1880年代起，先后成立波兰国家民主党、波兰无产阶级党、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后改名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现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民主党投靠俄罗斯，社会党右派投靠奥匈帝国、德国，只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左派坚决反对战争。

进行到关键的1915年8月，德军攻入俄属波兰，并占领了立陶宛，推进至拉脱维亚西部及白俄罗斯西部等腹地。11月，德国政府许诺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12月底，德、奥成立“波兰摄政王国”，并开始在波兰征兵，社会党人毕苏斯基被任命为临时国务会议的军政部长。

到1917年，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

第二共和国（1918-1939）

1918年10、11月，一战接近尾声，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趋于崩解，从而为波兰的复国形成有利的国际条件，波兰复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10月23日，华沙组成波兰政府，10月28日，奥占区的波兰爱国者在克拉科夫成立“波兰清算委员会”（Polska Komisja Likwidacyjna）。11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则在卢布林成立波兰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Tymczasowy

Rząd Ludowy Republiki Polskiej）。

11月11日，波兰政府由毕苏茨基领导。卢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清算委员会也宣布接受毕苏茨基领导。11月18日，毕苏茨基在华沙组成联合政府，他成为波兰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这样，自1795年波兰被瓜分灭亡以来，历经123年，至1918年11月恢复独立，重建国家。

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巴黎和会上通过决议，同意重建波兰国家，承认波兰共和国，并建议在俄波之间划一临时分界线，即沿着格罗德诺、布列斯特、赫鲁别舒夫、普热梅希尔直到喀尔巴阡山一线。然而，波兰政府力图恢复1772年的俄波边界线，为此，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就对苏联发动战争，史称苏波战争。1920年4月，波军进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广大地区，苏俄红军进行反击，将参与干涉的波军赶出国境，并将战火烧到波兰的首都华沙，但最后在华沙战役中苏俄军队被波军击败，波兰军队虽然取得最后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自己也被力不胜任的战争弄得民穷财尽，最后双方同意媾和。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代表协约国致电苏俄建议停火，停火线大体是巴黎和会决议中规定的分界线，故称“寇松线”。7月22日，波兰要求停战。

1921年3月18日，波兰与苏俄在里加正式签订《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即《里加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不过在1922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苏俄共同成立苏联），划定波兰东部边界（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划归波兰），这时波俄边界线约在寇松线以东约150英里处。根据该条约，波兰获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苏俄在这场战争中损失大片领土，这也为二战时苏联和德国分割波兰埋下伏笔。

由《里加条约》确定的波俄（苏）边界一直保持到1939年9月17日。另外，根据1919年巴黎和会决议，波兰从德国获得东波莫瑞和波兹南地区，但泽（后波兰改为格但斯克）被辟为在国际联盟监督下的国际但泽自由市，西

里西亚的大部分仍归德国，波兰领土面积共38.8万平方公里，成为一个地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的欧洲大国。

1921年3月，议会通过宪法，波兰成为议会制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二共和国。

在获得难得的独立并经过和苏联的战争后，波兰开始国家的建设，尽管波兰在一战和苏波战争中遭受到巨大的破坏，但是波兰依然使自己的经济建设逐步进入正轨，1924年，波兰开始在全境推行自己的货币——兹罗提，并成为当时中欧稳定的货币之一，波兰经济慢慢从战争的创伤中复苏。

波兰在二战爆发之前，成为欧洲一个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国家。波兰还在建国后不久就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参加苏波战争，波兰骑兵利用自身优势，在华沙城下战胜强大的苏俄，获得最后胜利。二战前，波兰陆军在欧洲排名第五。

不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也存在致命的弱点，由于波兰的领土分别由德占区、奥占区和俄占区合并而成，民族问题显得非常突出，东部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民族一直存在分离主义倾向，东部的经济水平也明显落后于西部，这就形成东西部的经济落差，使得东部民族对波兰政权更加不满。另外，从1926年5月毕苏斯基发动军事政变并上台执政开始，波兰境内实行独裁统治，逮捕议会中反对他的人，宣传法西斯主义。 对外，他奉行两面策略，在其两个强大邻居德国和苏联间取得平衡，1932年，签订《波苏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签定《波德互不侵犯条约》。

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波兰在大敌当前之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拒绝苏联提出的订立集体安全条约的建议，决心依靠西方国家的帮助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4年）

1938年，波兰在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保持中立，而从中吞并西里西亚东南部的切申；然而，从1938年10月起，希特勒向波兰提出波兰走廊的问题，并向波兰发出战争威胁。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苏联一直否认该秘密议定书的存在）。1939年9月1日，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发动波兰战役，波兰战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德军迅速侵占波兰大部分领土，波兰军民英勇抗战。9月17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开始履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义务，同时也为苏联的利益建立防范德国的缓冲地带“东方战线”，命令60万苏联红军越过苏波边界，进入波兰东部，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与此同时，波兰政府逃亡国外，先在巴黎组成以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流亡政府。法国战败后，1940年，流亡政府迁往英国。9月18日，苏军与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德、苏两军以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为界分割波兰。9月28日，德军攻陷华沙，波兰再次沦亡。波兰人民开始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10月初，德占波兰中的波兰走廊和但泽被纳粹政府纳入德国版图，而将波兰南部成立“波兰总督府”。

波兰战役中，波军死亡6.63万人，伤13.37万人，被德军俘虏69.4万人，被苏军俘虏或投降苏军的有21.7万人，10万军队逃往邻国，波兰居民遭受巨大伤亡，仅华沙就死亡约25万人，受伤者不计其数，约1万名波兰人被占领后的德军集体枪杀。德军在波军的奋勇抵抗面前也有1.06万人死亡，3.03万人受伤，0.34万人失踪。而在半年过后的1940年春，苏联则将其俘获的2~3万名波兰军民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等地杀害，造成卡廷森林事件。

1941年，纳粹德国开始利用德占波兰领土为攻苏基地。6月22日德军突然大规模进攻苏联，战争开始阶段，苏联措手不及，节节败退，德军全部占领先前波兰第二共和国所拥有的领土，苏联西部大部分领土也被德军占领，并兵临莫斯科。而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942年，流亡政府在国内建立国民军，同年，苏联支持的波兰共产党人建立波兰工人党和

波兰人民军，在地下同纳粹占领军展开斗争。1943年，由于德国发现卡廷森林事件中的死难者遗骸，并将此事大肆宣扬，在大量证据面前，苏联选择否认，在这种情况下，流亡政府和再次和苏联断交。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德军很快转攻为守，苏军的反攻将战线逐渐推进到波兰境内。1944年元旦，在工人党的倡议下，成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由贝鲁特任主席。1944年7月22日，在海乌姆组成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Polski Komitet Wyzwolenia Narodowego，PKWN），颁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也叫《七月宣言》，Manifest PKWN，Manifest Lipcowy），宣告波兰新国家诞生。

1944年8月，苏联红军推进到华沙的近郊，波兰地下军想在苏联红军到达华沙前解放德国的占领，以避免受到苏联的控制，这就是著名的华沙起义。不过，苏军并没有给予华沙城内起义军太多的支持，在纳粹德军的血腥镇压下，起义失败，希特勒下令将华沙夷为平地，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遭到毁坏，大部分华沙人也被送入死亡集中营。

1945年1月17日，苏波军队解放已成为废墟的华沙。4月，波苏两国签订友好互助与经济合作条约。6月，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民族团结临时政府。

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确定波兰东、西部边界，东部以寇松线为波苏边界，西部波德边界则向西推移至奥得－尼斯河，并把什切青和希维诺乌伊希切划入边界的波兰一侧。

在二战中，大约有600万波兰军人和平民在这场战争中丧生。在波兰境内发现许多纳粹屠杀犹太人和其他平民的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所有参战国中，若按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波兰是死伤最惨重的国家。

（1944-1989年）

1947年，苏联支持的贝鲁特当选为总统，社会党人西伦凯维兹任政府总理，西方的流亡政府基本被排斥在权利中心之外。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贝鲁特任总书记。

1956年 3月，贝鲁特病逝于莫斯科，奥哈布继任第一书记。

依据苏联模式，波兰制定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按“重—轻—农”的顺序进行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片面发展，农业长期落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波兰历史上一直是笃信天主教的国家，不过在二战后，共产党政府实行广泛的无神论宣传和教育，对天主教会进行迫害。1978年10月16日，波兰出生的大主教沃伊蒂瓦被选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年后他造访波兰，不仅受到波共当局的隆重接待，而且其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争相迎接。成千上万的教徒匍匐在他的脚下，虔诚地听其训示。

1981年统一工人党的九届四中全会上，卡尼亚辞职，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1981年12月13日波兰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团结工会被取缔，瓦文萨等工会领导人被拘禁，部分工会骨干转入地下活动。工会内部分成两派，以瓦文萨为首的缓和派主张避免同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提倡协商对话；激进派则主张通过暴力推翻政府。

1984年波兰宣布大赦，而瓦文萨等人则努力为使团结工会合法化而斗争。

当代

第三共和国（1989至今）

1989年6月4日，波兰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获99%的参议院席位。9月12日，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茨基组成以团结工会为主导，包括统一农民党和

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原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出任首任总统。同年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更改国名、国徽、国家性质，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红底戴王冠的白鹰恢复为波兰的国徽，删去统一工人党领导作用的条款，实行军队国家化，禁止政党在军队、企业和国家机关中从事组织活动，新生的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三共和国。波兰政治正式走上奉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经济上实行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1990年11月举行大选，瓦文萨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总统。他提出“建设自由、民主、富裕的新共和国”，经济上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取消对土地自由买卖的限制和对外政策强调向整个欧洲和世界开放等。

从此，波兰实现政权的更迭和政治制度的改变，并开始向西方靠拢。1995年，瓦文萨在总统竞选时输给前统一工人党改组、代表民主左派联盟的克瓦希涅夫斯基，连任失败。在经济上，波兰的转轨带来阵痛。但波兰依然成为东欧国家中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几个国家之一，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1997年4月，波兰国会通过新宪法，确立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以社会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规定：众议院和参议院拥有立法权，总统和政府拥有执法权，法院和法庭行使司法权；波经济体制的基础为经济自由化、私有制等原则。

1999年，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03年6月波兰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加入欧洲联盟，2004年，波兰和其他10个欧洲国家一道正式加入欧盟。

（以上内容引自中文维基百科文字，有删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8%81%94%E5%8E%86%E5%8F%B2

（有删节）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一月剧变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罗斯取得了政权。随即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并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随后的几年里，由托洛茨基指挥的红军通过内战击败了白军和外国武装干涉。

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共同签订《苏联成立条约》，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正式成立。

斯大林时期

1924年，苏联的创始人列宁逝世，之后苏共中央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获得最高权力。斯大林为了巩固个人地位，通过残酷的手段打击政治对手，以肃反的方式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展开了大清洗。同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其在任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送进了劳改营。

1939年冬，苏联入侵芬兰，迫使芬兰割让部分领土，史称苏芬战争。

1939年8月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苏提出希望改善彼此关系。苏联于8月23日和纳粹德国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按照该条约划分的势力范围，苏联出兵瓜分波兰领土，占领东欧大

量地区，制造卡廷惨案，屠杀波兰民族精英。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被强行并入苏联，三国的民族精英被屠杀，数以十万计的民众被强制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

苏联开始将大批物资、设备从欧洲部分运往大后方，为之后的苏德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斯大林有一点还是失算了，他始终认为德国攻下英国之前不会对苏联发动袭击。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以370多万兵力、5100架飞机、3800辆坦克和大量大炮，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由于战争准备不足，苏联红军遭受重大军事损失。

1945年，包括苏联红军的盟军攻占了德国全境，欧洲战事结束。苏联军队对德国占领区的民众犯下包括强奸妇女在内的诸多战争罪行。

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12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宣布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苏联针锋相对地于1955年和他的社会主义盟国签订了华沙公约，成立华沙公约组织，同北约相抗衡，冷战时期开始。

赫鲁晓夫时期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进行了几年的政治斗争，最后赫鲁晓夫斗垮马林科夫成为了最高领导人，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此后，赫鲁晓夫结束了警察恐怖，释放了数百万政治犯，为近2000万人恢复了名誉。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5周年庆祝活动。1954年10月3日，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正式会谈，赫鲁晓夫最终对毛泽东想拥有核武器这一要求妥协，答应派专家协助中国建立一座小型核反应堆。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

同年10月，先后发生了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革命。

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所有的科技人员和专家，开始了苏共与中共一系列纷争。

1962年10月，爆发古巴导弹危机。引发了美苏两国在冷战时期一次最严重的军事危机。

勃列日涅夫时期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获得政权，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为总书记），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此间，原本有机会改善中苏关系，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等边境冲突，更是令中苏关系雪上加霜。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干涉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民主改革；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两次行动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对外推行扩张政策，除了东欧集团和蒙古之外，又把越南、南也门、古巴、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国纳入苏联阵营，或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有限主权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他提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为了剥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将别国变成苏联的附庸国。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还与美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耗散了国力，加剧了苏联国民经济遇到的困

难。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被视为苏联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橱窗，但是由于入侵阿富汗，却变成了有史以来抵制国家最多的一次奥运会。

戈尔巴乔夫时期

1985年，苏共改革派人物戈尔巴乔夫接掌政权，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改变了许多以往观念。戈尔巴乔夫试图改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治国方法，在国内实行改革和开放性政策，对历史错误进行清算。

随着“公开化”的日益深入，苏共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罪行得到揭露，导致其失去民心。

1989年，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

1991年8月19日，苏共中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但是在人民、大多数苏共党员的反对及部分军队的倒戈下，政变仅仅维持3天便宣告失败。

8月24日，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宣布独立。联盟开始走向解体。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在1991年年底，他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及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来取代苏联。苏联其他加盟国纷纷响应，离开苏联，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亡。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叶利钦。

在原苏联境内，现在分布有15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是：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摩尔多瓦。其中12个国家（除外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

亚）组成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

———————————————————————————————————

此时的美国与中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BE%8E%E9%97%9C%E4%BF%82%E7%99%BD%E7%9A%AE%E6%9B%B8

《中美关系白皮书》（英语：The China White Paper），正式名称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注重1944年至1949年间》（英语：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又称《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是由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及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导发表对国共内战及中国问题立场的政治文件。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美国为辩护其对华静

观政策。白皮书严词批蒋，表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是国民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是为“袖手旁观”政策。白皮书被认为是国共内战中，杜鲁门政府为自己对华政策失败开脱。该书发表后，美国停止对中华民国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当局，严重打击国府战斗士气。不久，中华民国政府迁台。隔年(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月5日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声明，然而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惊觉错误，立即下令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并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决定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御体系。之后美国更在1954年和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作为新的对华政策。

时代背景

1943年，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宋美龄作为蒋中正外交特使，于该年二月访问美国。她成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的贵宾，在白宫住了十一天，并于2月18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兰女王），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随后，宋美龄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总计有超过25万人听过她的演说。3月1日，宋美龄本人首次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这也是她第三次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宋美龄成功完成对美国募款的任务。

但蒋介石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驻中国美军指挥官史迪威长期不合，自1943年起曾两次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但因为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在美国的反对而未成。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亲自了解情况。华莱士到华后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能力给予很低的评价，但同意史迪威成为两国交往的障碍。8月中，罗斯福再三向蒋中正提出将中国大陆之军队交予史迪威指

挥，为此特意将史迪威晋升为上将。罗斯福一度以接近命令的口吻向蒋提出要求，史迪威得悉后，亲自将该份电报交予蒋介石，并在他的日记中记下快慰之感。蒋介石回复罗斯福，倘若要将指挥权交予史迪威，宁愿不惜脱离盟国独自抗日。最终罗斯福权衡下在1944年10月18日下达命令撤换史迪威。美国委任魏德迈接替史迪威的工作。在任内魏德迈协助国民政府抗日，尤其在对国民革命军在训练、后勤及装备的提升有显著贡献。日本投降后的受降、接收等问题亦由魏德迈协调。1946年3月魏德迈返回美国，临行前获赠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中国发生全面的国共内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故辞职，美国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中国战局，当时马歇尔原来计划由魏德迈接替赫尔利任美国驻华大使，后因消息走漏，中共大力反对，马歇尔因而改请司徒雷登任美国驻华大使。

马歇尔对蒋成见已深，希望成立联合政府降低蒋的影响力。由于“国民党人仍握有绝大部分权力，无意让出一丁点；而共产党人则寄望藉苏联之助，夺取整个政权”，他虽无力调停国共内战，但以军援要胁，处处牵制国军。最明显的一次，是逼迫蒋介石下达六月停战令使国军在四平战役（1946年）中胜利后无法前进。另一方面对中共却无法控制，他的行为使中共站稳脚步并使国军士气低落。最后马歇尔调停失败，但是受到杜鲁门的宠信，仿佛立了大功，回美后升任国务卿。

1947年中国时局转变，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又询问魏德迈使华的意愿，魏德迈拒绝但同意率团来华考察，魏德迈报告内警告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于劣势，中共很可能统一中国。魏德迈建议美国承诺给予国民政府援助，但马歇尔反对，并且对国民政府实行了武器禁运。魏德迈意见不被马歇尔采纳，更以魏德迈建议美英苏共管东北对中国不敬为理由，将撰写之报告列为机密被束之高阁。马歇尔更以蒋将失败、援蒋有损美国威信为由，断绝对中国政府之援助，最后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之溃败。

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但蒋仍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幕后操控政局。阎锡山出任国防部长兼行政院长在广州发号施令。蒋介石先后访问菲律宾及韩国，商议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中国内部战事方面，1949年4月，中共突破长江防线，攻陷国府首都南京，中共在全国战事明显占了上风，中华民国大势已去。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随他国公使南下广州，而是留在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随后被召回美国。1949年6月，美国媒体还刊出了司徒雷登建议美国承认中共的新闻。

杜鲁门政府清楚自己的对华政策，军经援助、调停行动均告失败，决定赶在国共分出最后胜负前，采取“袖手旁观”政策。在盟友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全面崩溃前尽速脱身。

发表

美国早在1948年11月即打算公布一份指控国民党“误国”的报告，由于大选缘故，国务院拖至1949年5月，才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编纂“白皮书”，这个小组工作人员共有八十余人，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好友，前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法教授翟士普(Philip C. Jessup)领导。1949年7月2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杜鲁门报告，《白皮书》要延后一周发表，同时军方对《白皮书》部分内容可能有保留，杜鲁门说应依现有计划日程推动发表。

国府对此事曾透过外交途径设法劝阻。1949年7月25日，艾奇逊报告杜鲁门，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国防部长詹森对《白皮书》所提出之疑点之性质及出版政策等问题，并告诉杜鲁门，他将在杜鲁门作最后决定前，提报军方立场之文件；杜鲁门相信发表《白皮书》是必要和适切的，要把发表时机与司徒雷登大使取得离开南京之许可合并考虑。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曾召见美国驻华公使蓝钦，请他报告国务院勿在此关头发表这样的文件，以免影响民心士气，同时外交部亦训令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做同样

的表示。“飞虎将军”陈纳德也劝翟士普教授不要在此时影响中国民心，但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坚持下，《白皮书》仍在1949年8月5日发表。

内容与影响

《中美关系白皮书》包括正文八章及附件八章，外加〈中美关系年表〉及〈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总共1054页，约一百多万字。介绍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中美关系。由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说起，说到1949年五月李宗仁致杜鲁门书为止，历述105年的中美关系。

在八章中，讲述前一百年的只占两章，其余六章都是叙述最近五年的事。其中收集了大量美国政府发表或未发表的对华关系有关文件，历任总统相关演讲，与国府往来的电报，几乎所有和中国有关之协议、国共两党的相关声明函件以及美国派驻中国大使定期给国务院写的报告。

白皮书附录颇多，其中较重要的包括美驻华大使代办埃齐森给国务院的备忘录，建议罗斯福明告蒋介石，美国鉴于军事需要，不得不与中共合作；美国驻华大使馆一些馆员给国务院的越级报告备忘录；1944年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和蒋介石的谈话纪录，内容为劝国府与中共合作；1947年魏德迈赴华考察的报告书，内容批评国府腐败，建议援助国府五年，且促使国府内改革，同时将东北交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托管，以免落入苏联手中。

白皮书中收录《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可视为整部白皮书的的编纂原由与主要结论，也就是全书的核心。艾奇逊在其中说：“在合理范围以内，美国所做任何事，都没有改变中国局势的可能；美国若做其所未做的事，对局势也不会产生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造成的结果，结局是中国内部所决定的，是一方怠忽职责所形成的。”

白皮书主旨除了大力批评蒋介石集团治国的腐败与无能，强调美国在国共内战中没有责任外，也对中共进行了批评。《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美国退出国共内战，不再援助国府，对国府“反共抗俄”的民心士气

打击很大。

中国方面反应

蒋介石提前得知白皮书内容

白皮书发表之时，宋美龄已在美国争取对国府的援助。1949年7月下旬，蒋介石召见助手黄仁霖，表示宋美龄来信，要他立即前往纽约。黄仁霖赶到纽约，宋美龄告诉他美国政府正起草白皮书的事，并委托他设法取得白皮书的誊本，或借助关系拖延、搁置白皮书的发表。第二天，黄赶到华盛顿拜访一些熟识的美国官员并说明来意，官员很直率的承认白皮书的事，且表示无法拖延或搁置发表，他同时将一份白皮书样本交给黄仁霖，宋美龄立即命黄仁霖返台并把样本呈送蒋介石。途中经过香港转机，黄在旅馆停留之时，机场的行李遭人打开搜查，幸好黄把白皮书样本随身携带，才免于被搜走。8月2日，黄仁霖赶回台北，将白皮书样本交给蒋介石。故蒋在发表前三日就提前知道白皮书的内容。

其时，蒋介石在浙江定海游历。蒋经国在1949年8月5日日记中写道，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此事对国府反共抗俄民心影响极大，但蒋介石闻讯，却泰然处之，在庵门观月听涛，谈笑自若，对美国发表白皮书之事无动于衷，得力于“寓理帅气”之休养功夫。其实是因为蒋介石已在8月2日看过白皮书内容，故已有心理准备。

蒋介石与中华民国政府反应

白皮书发表后一日(8月6日)，蒋介石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李承晚会面，商议组成远东反共联盟。8月6日蒋经国日记说，上午，蒋经国以白皮书内容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投共之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不觉惊异，反镇定非常。

蒋介石在8月6日的日记上说：“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

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

然而同时，蒋介石也对幕僚表示了自己的气愤，他对幕僚说：“美国常说中国重要，在援华时却又小气的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军援得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输的这么惨，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太不道德！”在8月10日的日记，蒋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蒋介石的幕僚王世杰建议蒋对白皮书应以官方文件反击。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台北草山(今阳明山)，召集幕僚王世杰，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外交部长叶公超等开会，商议如何回复白皮书。叶公超首先拿出一份以外交部名义草拟，且经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修订过的文稿，蒋看后觉得内容空泛，王世杰随后拿出另一份自己草拟的文稿给蒋，蒋认为这份文稿比前一份好。

八月十五日，蒋再次召集重要幕僚开会，他表示，美国的白皮书有瑕疵，以后有机会要发表一篇详尽的全面声明驳斥，现在先发一则短暂的声明稿。当天文字修正不多，声明稿由叶公超、洪兰友带回广州后经党中央非常委员会通过，八月十六日，共330字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对美国政府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的声明》发表，措词简短乏力，未做出率直的抨击，只表示“中国政府无意对此争议加以分析，以致有损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以及民主集团共同目标。”声明中还说，中华民国政府将在适当时机对白皮书各种复杂问题详加说明。

八月七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发表了一份英文声明，措词谨慎，只表示中国政府日后将发表一些补充资料使全貌表露完全。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反应

相对于国府不痛不痒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对白皮书的反应颇为强烈，毛泽东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文章，大骂杜鲁门政府、艾奇逊和白皮书，毛泽东表示“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毛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对人民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听话的。”

胡适指责美国发表《白皮书》

胡适在为司徒雷登的回忆录《旅华五十年记》写序时，指责美国“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停止对华的有效援助，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自己是个大国和无人可抗争的世界领导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美国方面反应

美国国会“中国游说团”的抨击

当时国民党在美国国会中有不小的势力，和几位议员过从甚密，国会甚至存在大力支持国府的“中国游说团”，对《白皮书》和杜鲁门的对华政策提出强力抨击。“中国游说团”是政治人物、商人、利益团体、保守派新闻媒体人士、退役军事将领及其他强烈支持蒋介石立场者的“非正式大集合”。共和党参议员诺兰、布里基斯和民主党右派参议员麦卡兰联合署名发表一件备忘录，一致认为《白皮书》是“一千零五十四页的掩饰失策”。

后续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向大韩民国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政府始发现其错误并体认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决定将台湾列入西太平洋反共防御圈范围，在6月27日下令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以防中共进攻台湾，也不支持中华民国反攻大陆。 另外在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凭借反对杜鲁门运动与标语“韩国！共产主义！贪污！”（Korea! Communism! Corruption!）赢得人心，而在1953年出任总统，结束民主党长达20年执政。杜鲁门原有资格竞选连任，在支持率低落下黯然下台。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a_White_Paper

《中国白皮书》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通用名称，特别提到了1944年至1949年；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发布该出版物，以回应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即将取得的胜利方面的关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指示其工作人员进行准备，以回应那些批评美国政府的批评者，称其为“中国的损失”。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 ）的介绍引起了争议。艾奇逊写道：

“不幸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内战在中国的不祥之举是美国政府无法控制的。美国在其能力的合理范围内做过或可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结果；美国已经尽其所能去做了所有该做的事情，但对于中国内战之局势无能为力。”

背景

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期间，由于对冷战和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担忧加深，杜鲁门政府的批评者激烈地提出了“谁失去了中国？ ”这个问题。杜鲁门在大选中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胜利；当时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稳步击败了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并赢得了中国内战，这引起了人们的批评。

1948年11月，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提议，向美国公众发表一系列文件，以解释和捍卫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采纳了这个提议，并下令其工作人员准备。

该小组由沃尔顿·巴特沃思（Walton Butterworth）远东分部主任领导，但是大部分工作由在战争期间曾在美国国务院驻苏联和中国的外交机构中工作过的Charles W. Yost，John F. Melby和菲利普杰瑟普（Philip Jessup）完成。1054页的文本于1949年8月出版；当时，毛泽东和他的随从们即将胜利地进入北京。

白皮书内容

该文件包括412页从1944年至1949年的关系叙述，以及642页的附录。它完全基于国务院档案中的文件。这些章节涵盖了1844–1943年的美国政策；1921-1944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1944-1945年帕特里克·J·赫尔利少将大使及其在调解工作中的努力；《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的中苏条约；1945-47年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在中国内战中的调停使命；中国内战的发展；1947–1949年的约翰·莱顿·斯图尔特（John Leighton Stuart）大使【即，司徒雷登】；中国内战的进一步发展；1945-49年的军事情况；1947–49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附件中还包含186个条约、正式声明和

其他文件。

该卷的正文之前是“发送信函”，尽管不是由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签署。这封信描述了白皮书的起源和性质，并为1944年至1949年的美国政策辩护。这封信的开头说：“

尽管中美之间相距遥远且背景差异很大，但团结两国人民的宗教、慈善和文化纽带始终加强了我们对该国的友谊... ”

信中建议：“应该给中国人民一些时间来发展那些最能满足现代世界需求的政治体制。” 中国革命的“原因”是“无法承受的土地压力”和“西方的冲击”。 对日战争的“悲剧”是“在很大程度上，人身和自然的破坏摧毁了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由主义和民主的骨干和核心……”。这是“不幸的”。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美国在其能力的合理范围内已经尽其所能地做了一切所应当做之事，但无法改变中国内战之结局……。”

这封信继续说，共产党人“已经誓言丢弃了他们的中国传统遗产”，并“公开宣布了其服从”俄罗斯。白皮书的这种说辞很可能被精心计算过；其目的是为了，有意用激将法来“羞辱”中国的新领导人，并迫使之向美国表达善意；而美国则在幕后期望等待尘埃落定以后，可以在外交上承认中国新政府。

反应

如果艾奇逊和国务院期望白皮书会平息美国国内反对派的声音，那他们是错的。批评既迅速又激烈。约翰·梅尔比（John Melby）后来回忆说：“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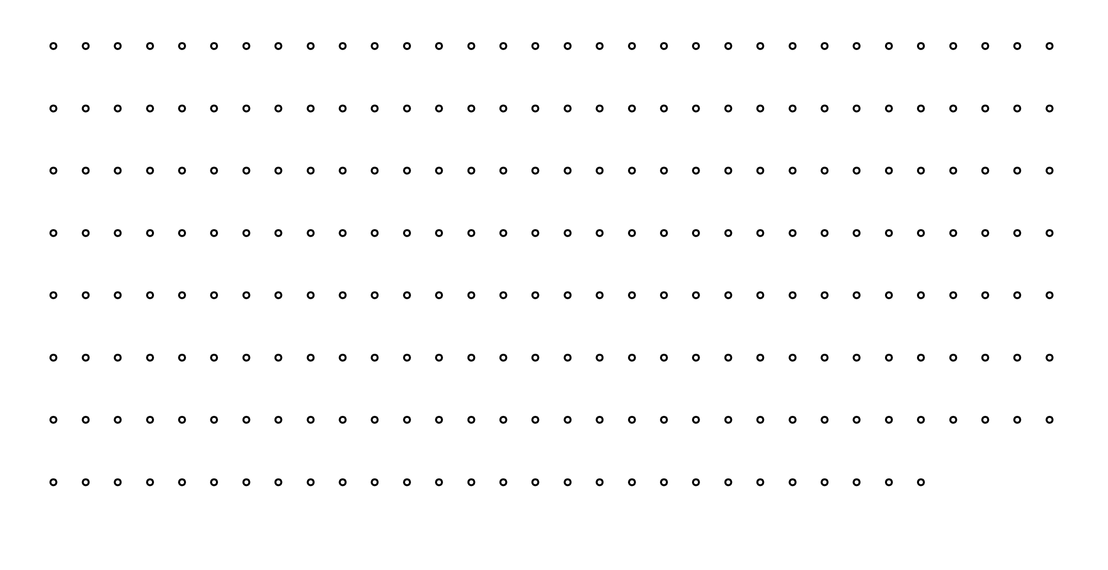
皮书的目的本来是想要使得美国的中国游说团体静音。那没有用……它只是向大火中加入了更多的燃油。" 他发现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国务院的政府部门中，有很多很有才华和经验的人，像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热门话题知之甚少"。

学者们普遍对此同意。汉娜·古尔曼（Hannah Gurman）称白皮书是"灾难性"的。罗伯特·纽曼（Robert Newman）解释说，其"致命缺陷"在于它与"正确腔调"的应有本质背道而驰，"它完全地否认了，美国应当以强有力的形象来面对相关问题"。

美国公众中有许多人反对白皮书指责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战争期间曾在中国服役的华盛顿特区全国专栏作家约瑟夫·阿尔索普（Joseph Alsop）写道："如果，当你的朋友在水中马上快要沉没、淹死的时候，你向他的脸上连续踢了两脚，那么，你就不能说，他的溺亡是注定的，因为他的游泳技术很差。"

毛泽东迅速而愤怒地作出了反应："艾奇逊在将侵略描述为友谊时讲的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相反，毛写道：——自1840年美国与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合作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表现出的只是所谓的"友谊" ，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帮助蒋介石"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的这种"友谊"的伟大举动，....

毛对于白皮书中关于中国人口过多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刺激性影响等论述也表示强烈反对。毛泽东还以讽刺的语调指责艾奇逊不理解中国的这场革命。



https://www.ea.sinica.edu.tw/QDown.ashx?ID=2199

《欧美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二期（民国九十一年六月），341-386

国民党最后的美国诤友

—— 魏德迈将军与中美关系

魏良才

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

摘 要

魏德迈将军学养人品俱优，在曾在中国战区服役过的美军将领中真正具有中国人敦厚、谦逊以及重情义的特质。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任内，魏氏以同情、谅解与包容的态度对待 蒋介石及其政府，并积极代为争取美国政府援助，同时又能直言不讳，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处。

一九四七年，魏德迈又奉杜鲁门之命来华实地调查，可惜其援华建议并未为国务卿马歇尔所接受，报告亦遭压制。在国共内战的大悲剧中，魏氏的确曾真心诚意地为国民党政 府尽一份心力，可惜当时若干主客观因素汇聚而成的历史洪 流非其个人所能抗拒。 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固然是蒋介石个人生涯中最大的悲剧，也是魏德迈一生中极大的憾事。

。。。。

壹、前言

在194〇年代的中美关系史中，有几位美军将领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例如马歇尔（Gen. George C. Marshall）、史迪威（Gen. Joseph W.

Stilwell）、陈纳德（Gen. Claire L. Chennault）、魏德迈（Gen. Albert C. Wedemeyer）以及具少将军阶但非职业军人出身的赫尔利（Gen. Patrick J. Hurley)。 其中，对国民党政府抱持同情支持的立场，而又能直陈其缺失，敢于提出诤言的当非魏德迈将军莫属。 本文之目的即在探讨魏德迈将军之生涯背景及其与中国的渊源、 两次奉命来华之任务及其对国民党政府之支持与诤谏。

。。。。

贰、魏德迈之生涯背景及其与中国的渊源

在上述几位将领中，马歇尔、史迪威及魏德迈皆曾随美军第十五步兵团驻守天津。 其中史迪威先后五次来华，居住长达十年以上，通晓华语，被美国军方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中国通」。 但其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奉命来华以客卿身份担任蒋介石的中 国战区参谋长，最后竟演变成宾主水火不能相容，被迫衔恨离去，中美双方皆引为憾事。

马歇尔于1924年至1927年间任驻天津美军第15步兵团执行官（副团长），与第一次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场结识的史迪威再度共事，两人交情愈深。 一九四五年底，马歇尔以杜鲁门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国共之争。 惜因国共双方未能妥协，失败返美，以使命未成，复因前此其旧属兼至友史迪威被召回事件， 对国民党政府军政领袖深感不满。 马氏返美出任国务卿

后，即断绝对中国政府之援助，最后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之溃败。

同样的，魏德迈曾继马、史二人之后于192九年至 1931年间服役于驻天津的美军第十五步兵团。 其对中国事务及风土 人情的阅历与马歇尔相仿，而远不如史迪威。 但相较于马、史二人来华任务的失败，魏德迈于抗战后期奉命来华接替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指挥官的职位，襄助蒋介石执行对日作战的 任务无疑是相当成功。 这多少与魏氏本人能坦率直言但又诚恳谦 逊的圆润个性有关。

魏德迈于1897年7月9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玛哈市（Omaha，Nebraska），祖父母皆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地区。 祖父为逃避征召入伍而于1830年移民美国乔治亚州，但于内战中参与南方作战。 此一德裔背景，曾为魏氏军旅生涯带来若干困扰。

魏德迈童年时代向往成为外科医生，但高中时适逢一次大战爆发，乃矢志从军报国。 因著名之进步派参议员诺瑞斯（George Norris）之推荐，获甄选进入西点军校就读（Wedemeyer， 1958： 31； Eiler， 1983： 38)。 一九一九年自西点军校毕业后，魏德迈与班级同学赴欧洲旅游数月，目睹战后残破景象及阵亡将士之墓碑罗列， 感触良深（Wedemeyer，1958： 46）。 返美后入佐治亚州班宁堡（Fort Benning）之步兵学校服役，并于1920年晋升中尉。

一九二三年奉调远东地区，在搭船前往菲律宾途中，结识随父母赴菲履新

的上校之女安必克小姐（Elizabeth Dade Embick）。 两人于1925年2月在菲结婚，生有二子，婚姻美满。 一九二九至三一年间，魏德迈奉调驻华第十五步兵团。 在华停留期间，与其夫人勤习中文，并结识中国政商领袖、学者与社会贤达，与林语堂、顾维钧及清废帝溥仪等人均有所接触，对中国风土人情了解渐深。　一九三一至三三年再度奉调菲律宾。 一九三四年返美入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 之指挥参谋学院受训。一九三六年至年，魏德迈获选赴德国柏林之战事学院深造。 此一经历，真正奠立其日后成为一个战略家及一流参谋人才的坚实素养，并得以结识不少德国优秀少壮军官（Wedemeyer，1958： 49- 57：艾勒， 1983： 38-39）虽然具备坚实的素养与训练资历，但魏德迈早年在军中的升迁并不顺遂，屈居尉官达二十年之久，至1940年始升任少校。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前，以参谋作业长才见重于参谋总长马歇尔，调派至军部战争计划组工作，升任中校。 因其负责草拟之美国未来参战计划书「胜利计划」（Victory Plan） 之内容被反罗斯福政府之报纸揭露，遭军部及联邦调查局盘查，复因其德裔背景及曾在德国战事学院受训，被怀疑有亲德倾向，并遭黑函讦，魏德迈几蒙不白之冤，幸得马歇尔之信任及维护，始得保全（Wedemeyer， 1958： 15-42; Mosley, 1982: 152-158; 项国宁，1986：91）。

珍珠港事变后，魏德迈于1942年6月升任上校，临时奉命向访美之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L. S. Churchill）及高层军政领袖析论美国在欧洲作战策略，并直言英方计划之缺失。 以态度从容，临场表现得宜，受马歇尔赞赏，于同年七月擢升准将，参与联合〔作战〕策略委员会（Joint Planning Committee）工作。 一九四三年八月，英美在印度新德里成立东南亚战区指挥所（Southeast Asia Command），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爵士（Admiral Lord Louis Mountbatten）出任联军最高统帅。 同年九月，魏德迈晋升少将，并奉派出任东南亚战区副参谋长。　魏氏与蒙巴顿及其他

英军高层将领相处融洽并颇受敬重。 期间魏德迈曾奉蒙巴顿之命来华，商谈中缅边界纠纷问题。

。。。。

参、奉命来华取代史迪威及其对中国战区的贡献

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初来华担任蒋介石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因器量狭窄偏私，个性尖酸刻薄，与人难以相处，加以对中国政府军政领导阶层敌意甚深，因此宾主间的关系日趋恶化。 虽然罗斯福派赫尔利来华调停，终未挽回。 8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 于1944年10月19日下令将史迪威召回，并任命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所遗留之中国战区参谋长及美军指挥官的职务，而当时正在锡兰驻地康堤（Kandy，今名马哈努沃勒）的魏德迈也于十月二十七日夜晚接到马歇尔的电讯。 魏德迈对其新任命并不感到欣喜，因为除了仍然希望能率军赴欧洲战场外，他也早就耳闻「中国是美国军事及外交官员的坟场，有许多优秀官员的前程葬送在中国 （Wedemeyer， 1958： 269， 272）。 」但是，作为一个军人，除了接受命令，他别无选择。

为了避免魏德迈来华重蹈史迪威的覆辙，参谋总长联席会议 在于十月二十四日给魏德迈的指令中，明确规定其主要任务如下：

1. 向蒋委员长提供建议并协助其进行对日作战。

2. 指挥其属下之美军作战部队自中国实施空中作战，并在作战、训练及后勤支援方面继续支持中国之空军地面部队。

3. 除因保护美国人民之生命及财产而有必要者外，不得使用 美国的资源镇压〔中国〕内部的斗争。

此外，并将以往并未明确划分的中缅印战区正式划分为中国战区 及印缅战区，后者由曾任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副手的索尔登中将（Lt.Gen. Daniel I. Sultan）负责。 此一决定无形中降低了中国战区在美国亚洲全盘战略考量中的地位，史迪威事件对中美战时合作关系的立即影响已然浮现。 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身份，发布命令，任魏德迈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索尔登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秦孝仪，1978，5： 629）。

十月三十日，魏德迈率随员自新德里飞越驼峰抵达昆明，在当地停留一宵，次日飞抵重庆，在机场迎接者有外交部长宋子文、 赫尔利及参谋总长何应钦等人。 十一月一日，魏德迈由赫尔利陪同晋谒蒋介石。 魏德迈同时发现，史迪威对于其接任该注意之事项并无任何留言或交代。

抵达重庆之后，魏德迈发现当时中国的情形相当不乐观，西南之战况尤其危急。 魏氏在十一月十日致参谋总长马歇尔的电报中表示：「毫无疑问目

前中国的情况是严重的，而且在继续恶化。 桂林事实上已被包围，柳州的陷落也在旦夕;而中国人的毫无组织，与计划的没有章法则更是出人意表。 」事实上，在魏德迈拍发此一电报的前一天，桂林已经被日军攻下，柳州则在十一日陷落。 贵阳之情况亦甚危急，如果贵阳失守，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则是作为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援华空运唯一的终点昆明以及陪都重庆本身。 魏德迈担心一旦昆明失守，不仅危及重庆，更可能造成中国政治及军事上的崩解。 13 魏德迈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将曾受美军训练及装备，目前在缅甸作战的五师国军中的两师调回，并由参谋总长何应钦驰赴贵阳，指挥援军反攻，贵州战局始告稳定 （Wedemeyer， 1958： 291；秦孝仪，1978， 5： 648）。

为未雨绸缪，魏德迈曾向蒋介石建议，如贵阳失守，应有迁都昆明之准备。 于十二月二日，蒋以「余绝未考虑及此」婉拒。 根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十二月四日之记载：

魏德迈参谋长来谒，于谈话中复以迁都之事相询，公乃郑重告之曰：「此为中华民族精神大节之所关，不能讨论， 余纵在渝被敌包围，亦绝不离渝一步也。 」魏氏为公决心所感，随亦言曰：「如委员长不离渝，余亦绝不离左右。 」 公因自记曰：「闻其愿与共患难，同生死之言，殊以为感也。 」（秦孝仪，1978，5：647）

此一记载与事实稍有出入。 根据魏德迈自己的说法：「我明白告 诉委员长我无意留在重庆被日本人俘虏或杀害，但如果可能我会到昆明去，如果情况许可在那里组织坚强的抵抗。 」

一九四五年一月，魏德迈晋升陆军中将。 除了扭转战事的劣 势之外，魏德迈对中国战区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缩编台军兵力、 提高台军待遇与建立后勤补给中心。 魏氏抵华之初，国军约有三 百师兵力，训练及装备均严重不足。 魏氏在四月二十六日呈送给 蒋介石的备忘录中指出「国军约有三百师之众，美国装备绝不足 以配备如此多之单位，故先充实三十六师之训练与装备，若再有可能则扩充至50师。 」此一三十六师之精简，加上仍在缅境作战之三师，共39师，即为战后美国协助中国政府建立现代化军队，初步装备陆军39师计划之由来。

魏德迈深知仅凭训练与装备仍不足以致胜，士气是赢得战争不可或缺的要素。 中国自古即让军队「就食于民」，而军人也认为保国卫民，受之无愧，因此强取豪夺之事实层出不穷，造成民怨甚深。 魏德迈调查发现，中国人竟无「行军靠肚皮」（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的观念（Wedemeyer， 1958： 335）。 国民政府所实施的给养制度是依士兵人数将定额款项发给各部队长，由其负责解决粮饷问题。 但由于其时军官薪俸微薄，不足以养家活口，因此部队长克扣军粮及吃「空缺」的情形极为普遍，造成战力不足，士气低落。 为彻底解决问题，蒋介石接受魏德迈之调薪建议，主动将台军待遇一律提高一倍 （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秦孝仪，1978， 5： 655-656）。

为杜绝部队长的中饱私囊，魏氏又拟具新的配粮计划，分别在昆明及重庆设立一个给养中心，负责采购军粮，分发至各分支单位，再以卡车运送至各部队。 此一新配粮计划在全国实施成效良好，不仅士兵粮食不虞匮乏，军民之间的关系亦大为改善。 魏德迈并要求马歇尔派遣一位食品专家来华，研究国军膳食情形， 并提出改善建议。 同时，自美国运送维他命丸，以补充士兵营养之不足（Wedemeyer， 1958： 322， 335-336;

Romanus & Sunderland, 1985: 65)。 国民政府迁台之后沿用至今的台军后勤补给制度，多少是受魏德迈当年在中国战区所采行措施的影响。

除了协助解决台军兵员过剩及给养问题之外，魏德迈在抗战 期间也曾数次向蒋介石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其所针对者虽非 军国大事，但却颇收移风易俗之功效，更充分反映了魏氏对中国贫苦大众的同情与关怀。 例如，魏德迈抵华之后常获国府官员邀宴，菜肴丰盛，有时竟达二十几道菜。 魏德迈认为当无数中国人颠沛流离，身处饥馑，而领导阶级却如此奢侈，极为不当。 因此他建议蒋介石，在战争期间，此类宴会应予停办，并建议蒋氏以身作则，本身宴客亦应以四菜为限。 蒋氏对此欣然同意，并以婉转方式普遍实行（Wedemeyer， 1958： 322）。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建议改变中国人靠左驶的行车习惯。

在中国，数千年来行人及路上交通工具皆是靠左行走。 但是在抗战时期，此一行之多年的旧习惯却造成了不少意外。 因为在中国战区所使用的车辆绝大多数是美制的汽车及卡车，其设计是靠右行驶，与英制的车辆不同。 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人车改为靠右行走。 蒋氏立即接受此一建议，并打算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内立刻实施。 魏氏建议给予数月缓冲期，并大力倡导。 此一改变因影响英产汽车在华市场，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Sir Horace Sey- mour）甚至指使若干中文报纸为文攻讦，并要求蒋介石重新考虑，收回成命（Wedemeyer， 1958： 354-355） 。

此一新的规定于1946年元旦在全国开始实施，过程顺利，未发生任何意外。 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靠右走」仍是海 峡两岸中国人一体遵行的交通规则。

抗战期间，魏德迈在中国战区所提出的兴革建议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采行，主要是由于其诚恳谦逊的圆润个性获得了蒋氏的尊重与信任。 魏氏抵华之初，蒋介石即已感觉其人「直谅坦诚，其性格适与史迪威相反（秦孝仪，1978， 5： 640）。 」同样的，魏德迈对蒋介石也极为钦佩，但却非盲目的崇拜。 对于蒋的能力、领导风格、战略素养及其在当时所面临的困境皆有相当透彻、一针见血但却十分公允的评析。

在其于1958年出版，极获好评的回忆录《魏德迈报告》 (Wedemeyer Reports! ）一书中，魏德迈对目睹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的情形，说出了他的感受：

我开始领会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惊人的坚 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 法国在德国发动攻击之后六个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 发动侵略战争七年后，中国在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撑。

当我对局势了解更多，我认知到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是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在一九四一年之前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牺牲，大部分时间皆表现漠不关心。 (Wedemeyer, 1958: 279)

对于蒋介石当时所面临的困境，魏德迈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 说：

蒋一直是四面作战：对抗日本;对抗以中共为代表的苏 俄;对抗以前军阀或半独立省份文武官员所代表的离心势 力;对抗「西方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

美国人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拒绝承认蒋介石所面临的困难，就是对中国战后的命运毫不关心。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确定中国必须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不管她的精疲力尽及其人民的惨重牺牲与苦难。当我奉派前往中国战区，军部给我的指令中所使用的就是这些字眼。 (Wedemeyer, 1958： 281）

魏德迈更进一步指出：

美国人以为只要蒋介石下一道命令，它就会被执行。 我则体认到委员长不仅不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只是一个松散联合政府的首领，有时会在获取其属下服从一事上遭遇极大的困难。 (Wedemeyer, 1958: 323)

当然，魏德迈也坦诚指出蒋介石本人能力及领导风格上的弱点及缺失。 一九四五年三月，魏德迈返美述职。 在与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的餐叙中，史氏询及蒋介石的能力。 魏氏回答说：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他不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或熟练的战略家。 他在领导中国军队对抗军阀及共党方面相当成功，但极少展现现代军事战术或技巧方面的知识。 (Wedemeyer,

1958： 342）

对于蒋介石的个性及领导风格，魏德迈曾做过相当透彻的分析：

在我与蒋介石两年的相处中，我确信他是一位正直无私 的领袖，对其人民的福祉极为关切，并渴望建立符合孙中山 理念的宪政体制政府。

在我看来，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他对朋友及旧属的忠 诚。 在他那群僚属中，有些既腐败又无能的人。 如果他能接受劝告而去掉他们，中国局势将会变成怎样实在难以臆 测。 我曾告诉他，他的僚属中很多极为腐败无能，这些人一 日不去，则其为人民所构想的良好计划将永远不能实现。 因为这些人使他无法接触到不少中国最爱国能干的人才并获 得他们的支持。 我承认蒋在政治方面极为机敏，有合理的思 考力与坚强的个性。 但他却被儒家强调忠于家人朋友的哲学 所限。 他不愿舍弃他周围那些党同伐异的人，因此疏离了不少中国最好最能干的人才。

魏德迈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尤其是共产党人在中国的意图有 极深刻的认识。 他承认：「我也像马歇尔一样，曾受惑于史迪威 的报告。 但经验使我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能有所警惕。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二人曾在魏德迈的寓所中与其辩论共产主义 的本质与手段。 追忆这一次谈话，魏德迈写道：

我常听说他们〔毛、周〕不是真正的马克斯主义者，而只是对中国人福祉关心的农民改革者。 但是这一次非正式的历史性会面却拆穿了这些在美国被广泛传播的报告根本就是谎言。 (Wedemeyer, 1958: 285-287)

根据魏德迈自己的说法，抗战期间，毛、周曾一度邀请他指挥共军，但遭其以「身为战区〔美军〕指挥官，指令要求其支持国民政府」而婉拒;但当共区发生严重疫病，他曾运送十一吨医药用品救急。 (Wedemeyer, 1958: 287)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 随之而来的是受降、接收及遣返在华日军及平 民问题。 三个问题中，受降只是形式也较单纯，而接收及遣返日人问题则颇复杂也牵涉较广，若无美国协助，国民政府根本无法 完成。

魏德迈曾劝请蒋介石亲自接受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呈递降书，蒋则希望魏德迈代其受降，为魏氏婉拒。 魏德迈并表示：「中国遭受敌人蹂躏八年，牺牲数百万生命，没有任何外国代表该在中国战区之内受降（Wedemeyer， 1958： 350）。 」蒋氏乃任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受降代表，曾任魏氏参谋长之麦克罗少将 （Maj. Gen. Robert B. McClure）则代表美国。 魏德迈并宣布：中国战区内一切受降事宜均由中国代表负责执行，美方运输机决协助运输中国官员及军队前往目的地（秦孝仪，1978，5： 806）。

遣返日本投降后留在中国各地、朝鲜、以及印支半岛的三百九十万日本军民，其工作之艰巨自不待言;但在魏德迈幕僚人员之周详规划以及联合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东京总部人员之密切配合与支持下，顺利完成，并未如预期困难（Wedemeyer， 1958： 351-

352）。

在接收问题上所遭遇的最大阻碍来自苏联及中共。在美国第二颗原子弹投落日本长崎前夕，苏联于八月八日对日宣战，随即挥军进入东北，于两周之内占有东北全境，掳走日军五十九万四千余人，及数量庞大之战利品。另一方面，中共则拒绝接受中央政府命令，由共军总司令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于八月十一日连续发布七次命令，指示各地共军全面发动，部分共军进入东北，配合苏联作战，并阻挠国军接收，虽然国民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即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但显然未能消弭史达林扶植中共的意图。

在苏联及中共的阻挠下，协助国军接收的工作原本就已不易，而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于八月十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前四天，下达一个部分条文内容互相矛盾，窒碍难行的指令给魏德迈，使其协助国军完成接收的任务更难达成。 此一指令一方面要求魏德迈对「中央政府军队为收复中国战区内目前仍被日人占领的所有地区所采取的必要军事行动提供军事协助」，「协助中央政府， 将政府军快速运送至中国重要地区」;另一方面却要求所有行动「不得违背美国在中国兄弟阋墙之争中不支持中央政府的基本原则以及不得使美军地面部队介入中国战区任何地方的重大陆上战役中。 」

此一限制使魏德迈后来在面对苏俄及中共阻挠国军在东北及华北的接收工作时根本束手无策。 魏德迈于11月20日致一长电给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将军（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在此电文中，魏氏重申他对蒋介石肯定的评价并分析其面临的困境。 魏德迈也明白指出苏联在东北劫掠破坏，阻挠接收。 依据魏氏的看法，中央政府不仅无力接收东北，甚至连掌

控华北都有困难。 但蒋介石及其幕僚似乎无视于此，反而要求魏德迈提供空中运输，自平津地区运送国军前往东北。 因此，魏德迈向蒋介石建议在企图占领东北之前，先致力于华北之收复并巩固在该区之军事及政治地位。

魏德迈同时建议美国政府就下列事项知会中国政府：（1）其美军指挥官兼任委员长参谋长之职务可以立即解除，因为此一任命系为战时协调中美对抗共同敌人日本之战斗行动而批准。 （2）尽早自中国战区撤离包括陆战队在内之全部美军，否则其目前之指令应予更改以合理化美军在中国之维持及使用。 至于东北问题， 魏德迈则大胆建议由中、美、英、俄四国暂管，直至中国有力接管东北。

十一月二十三日，魏德迈再致电艾森豪，明白指出：

如果由国军统一中国及东北是美国的政策，则必须接受介入内战及与苏联交战的可能性，而这将必然需要在中国战区投入较当前更多的美军以执行此一政策 （显然还将必须改变我当前命令）。

在华府，陆军部长帕特生（Robert P. Patterson）及海军部长佛瑞斯特（JamesForrestal）会商魏德迈的报告。 十一月二十六日，在联名致送国务卿伯恩斯（James F. Byrnes， 通译贝尔纳斯）的冗长备忘录中，两人指出：

从长程军事观点来看，陆军部及海军部认为对美国在远东有利的最重要军事要素就是一个包括东北在内的统一而对美国友善的中国。 这也是预防远

东地区动乱及爆发战争的最好保证。

他們同時表示：

如果东北或者华北无法为中国人所掌控，反而由于情势的演变而沦为苏联或其所支配的分离政府所统治，那么俄国将可达成日本当初所欲达成的目的。

但他们也认为：「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现况是一个必须从政治层面而非立即的军事必要性去解决的问题。 」

在二十七日伯恩斯、帕特生与佛瑞斯特的会议中，陆军部及海军部同意国务院所提处理战后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以政治妥协方式解决，并强迫蒋介石接受。 伯恩斯并认为当时正返美述职之驻华大使赫尔利应携带依此方针拟具之计划，尽快返回中国。

可是就在同一天，赫尔利因为不满国务院远东司人员对其调停国共之争工作掣肘，并怀疑国务院提供内部机密限阅资料给反蒋之众议员戴拉西（Huge De Lacy）在众院内对其攻讦，愤而宣布辞职并发表书面声明，严厉批评政府在执行外交政策时言行不一（Buhite，1973：256-257）

为减轻赫尔利突然辞职所造成之冲激，杜鲁门总统接受农业部长安德逊（Clinton Anderson）之建议，立即任命甫自参谋总长职位退休的马歇尔担任特使，前往中国继续赫尔利未竟的调停工作。此为马歇尔来华使命之

缘起。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0日飞抵上海，魏德迈及何应钦迎于江湾机场，当晚在马歇尔下榻的华懋饭店（Cathay Hotel）内，魏德迈明告马氏，其调停任务将难有所成。 对于魏德迈之直言，马歇尔甚为不悦。赫尔利辞职前后，杜鲁门曾两度直接或间接询问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之意愿，魏氏均因接受马氏之劝告而婉拒（Wedemeyer，1958： 358， 364; Eiler, 1987: 158-159)。 一九四六年初，马歇尔因调停工作进展不顺，而魏德迈颇受国共双方尊重，乃思借重其影响力突破僵局。马歇尔在征得魏德迈同意后，致电杜鲁门建议任命魏氏为驻华大使（Wedemeyer， 1958： 365）。

马歇尔于3月11日奉命返美述职，而魏德迈则于4月4日自沪启程回美。在美期间，魏德迈除治疗鼻疾外，并治装静待大使任命正式宣布后返华履新。但在七月初魏德迈之大使任命突然生变。 副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告知：因其任命消息已为报章刊布，引起中共抗议，对马歇尔调停工作造成困扰，故马氏已致电杜鲁门，要求取消魏德迈之使华任命（Wedemeyer， 1958：366; 项国宁，1986： 91-92; Beal, 1970: 110)。 对于马歇尔行事之反复，魏德迈深感不满，而对其大使任命竟因中共之反对而取消，尤其无法接受。 马、魏两人之关系自此转淡，渐行渐远（Wedemeyer，1958： 366， 369：Beal， 1970： 202）。

返华之路既然难行，魏德迈接受军部之安排，出任陆军第二军军长，驻防米德堡（Fort Meade， Maryland）。 另一方面，马歇尔于七月初建议特鲁门任命时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 （JohnLeighton Stuart）为驻华大使。 杜鲁门于七月十日向参院提出任命案，参院于十一日通过

（Stuart， 1954： 165-166; U. S. Depart- ment of State, 1970, I: 173)。

虽然有号称「中国通」的司徒雷登之襄助，马歇尔的调停工作并不顺利。正如魏德迈当初坦言相告者：国民党人仍握有绝大部分权力，无意让出一丁点;而共产党人则寄望藉苏联之助，夺取整个政权（Wedemeyer， 1958：363）。 可惜马歇尔自恃声望如日中天，又得到杜鲁门的绝对信任，在军政两界皆睥睨纵横，自认可完成不可能之任务，因此听不进魏德迈之忠告。 马歇尔调停国共之争的任务最后终未完成，而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衔恨离华，行前发表声明，痛斥国民党内之反动派对其「为求组织一真正联合政府所作之各种努力，均加反对;」而「固执之共产党人士绝不犹豫使用激烈之手段，以求达到目的……而不顾及中国人民因此所受之苦痛。 」双方拒不妥协，致造成其任务之失败。 杜鲁门于马歇尔离华之当天，即宣布任命其为国务卿。

。。。。

四、魏德迈再度来华实地考察

一九四七年春季，魏德迈奉陆军参谋长艾森豪之命，以交换将领身份前往英国访问，在数个皇家军事学院发表一系列的演讲。 魏氏在离英之前接获其老长官国务卿马歇尔之电报，命其返美途中顺道访问若干欧洲国家（Wedemeyer， 1958： 381）。 魏德迈返国后，于七月初向马歇尔报告访

欧观感。 马氏趁机表示：「司徒雷登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工作表现乏力。 」马歇尔并询问魏德迈是否愿意重返中国担任驻华大使。 魏氏询以去载马氏要求其使华却因共党反对而撤销任命事。 马歇尔毫无窘态或表示歉意，仅笑称：「今日中共可能亦视我为不受欢迎之人（Wedemeyer，1958： 382）。

魏德迈虽拒绝使华，但因军人服从之天性且念及旧谊，表示愿应马氏之请，率团前往中国作短期实地考察。 同时，他也希望能为反共的蒋介石再尽一分心力。 正如他多年后所说的，他使华任务有双重目的：「让中国人知道他们必须证明美援不会被浪费;同时说服华府必须提供此一援助（Wedemeyer， 1958： 388）。 」 另一方面，马歇尔之所以选择魏德迈，则主要是基于实际的考量。

正如他告诉副国务卿罗威特的：「概括地说，他〔魏德迈〕熟悉 中国事务，尤其与重要官员熟识，而他甚受蒋委员长的敬重。 」当然，在战时即力主援助国民政府的魏德迈，也较易被亲蒋的共和党议员所接受。 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纽约、华府、波士顿、芝加哥、丹佛、纽奥良、普洛维顿斯等大城市的主要报纸皆表示反对在国民政府进行改革之前给予援助（Stueck， 1984： 18）。

魏德迈受命草拟的指令，在经过罗威特以及远东司长范宣德的修改后定案，于7月9日经特鲁门签署。 指令要求魏德迈：（一）立即前往中国对其目前及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心理及军事情况作一评估。 （二）在与负责之中国官员及领导者讨论时，表明此为一事实调查团，美国政府只有在国府对于促进复元的有效方案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时，才会考虑提供援

助;而任何可能的援助必须接受美国政府代表之监督。 （三）在作评估时，希望不要觉得需要事先允诺支持或赞助与稳妥的美国对华政策不符的中国官方计画。（四）在提出考察结果时，应简明陈述所拟之援助的性质、程度及可能之后果;以及如果不援助之可能后果。 （五）完成在华之任务后，前往韩国作短暂停留，并评估当地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对照魏德迈所草拟之指令以及杜鲁门所签署 之正式指令的内容，可以发现罗、范二人作了若干重要的修正。 在魏氏草拟的指令中，他被授权对中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美国 政府准备实际并立即协助一项复元及安定计划」;而正式指令则 要求他只能表明其所率领者为一「事实调查团」，而美国只有在 国府对复元方案提供令人满意的证据时，「才会考虑」提供援助。

另外，魏德迈在陈述援助之可能后果外，也要陈述「不援助之可能后果」，这是草拟指令中所没有的，也为其后魏德迈考察报告之遭受搁置预留伏笔。

对于调查团人员的挑选，魏德迈在与指令相关的执行细节中表示要有一位来自远东司的代表，但他强调「不要一个对国民政府或共党存有坚定的支持或反对立场的人。 」对于魏德迈此一「远东司内有人亲共」的影射，范宣德相当不满。在呈给马歇尔以及罗威特的备忘录中，范宣德表示：「远东司没有亲共的人。绝大多数远东司的官员对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之缺失有切乎事实的认识，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 」

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在三十五年（1946） 五月五日自重庆还都南京〕，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则是在中央通讯社向使馆求证时始获知魏德迈将率团赴华的消息。 司徒雷登在12日接获马歇尔7月11日的电报，告知调查团即将立刻启程，命其将此一讯息尽快通知蒋介石。 司徒雷登在七月十六日致送马歇尔的电报中，对于魏德迈调查团来华消息在新闻发布之前，未能事先知会使馆， 致造成其本人及幕僚之尴尬，深表遗憾。马歇尔随即于同日覆电表示因消息走漏而被迫提前发布。 马氏并向司徒雷登保证：「魏德迈调查团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这一句话才是马歇尔的真心话，也点出了马氏派遣调查团的真正目的。

魏德迈调查团一行共十一人于7月22日飞抵南京。在机场迎接者除司徒雷登大使外，尚有国府文官长吴鼎昌、外交部次长刘师舜等。在其发表之抵华声明中，魏德迈表示：

余之任务主要系在调查实况，而由专家小组如经济、财政、工程与政治等人员，助余进行，吾人特别注意者，为研究及考察中国政府在复员时所取种种措施之功效……吾人并非根据吾人所希望者为真实之事实，而系根据客观彻底之考察，而断定为真实之事实。 ……余将竭尽所能执行杜鲁门总统给与余之使命，调查与政治、经济及军事局势有关之良好或恶劣之事实，将其互相连贯，予以评价，而在余之任务完成时，将此种工作所获之结果，贡献与美国总统。

蒋介石以及其他国府高层官员对于魏德迈之来华在起初显然是抱着很高的期望，认为是象征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契机，随之而来的将是大量的军经援助。随着调查团考察行动的展开，这份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与不满。蒋介石首先感到不快的是调查团将甫自日本殖民统治下解脱的韩国包括在

行程之内，与中国相提并论，对中国的尊严及主权是严重的羞辱;其次，美国政府在宣布派团来华之时，未与其事先磋商对其本人是极为不敬。

对魏德迈而言，这种失望与不满的感觉是相互的。 魏德迈发觉自从他在1946年4月初离开后，在过去的15个月间，中国的政治及军事情况非但毫无改善，反而日趋恶化。 大使馆一等秘书鲁登（Raymond P. Ludden）在七月二十三日向魏德迈提出的备忘录中指出：

不幸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间，国民政府只会以武力对付政治反对势力。 目前政府除苦于严重军事挫败以及过度通货膨胀之外，正在失去所有人的信赖……要想把作为中国一股主要力量的共产党人除去将非常困难，即使政府能获得大量军经外来援助……很显然的蒋介石坚信中国共产党问题可以单凭武力解决而不必同时进行社会及经济改革的看法始终未变。 …他目前所采行的途径正是刺激共产主义的快速发展，美国对此一情况不能再坐视不管。

同日，蒋介石的侍从武官兼总长办公室副主任蔡文治将军告诉调查团政治顾问石博思（Sprouse）：

国军的主要弱点是士气低落，逃亡者众。共党士气优良。 但是，国军如果能吃得饱，获得好的薪饷及装备，士气会一样的好。政府唯一的希望是美国提供军经援助。缺少此一援助，政府将很快崩溃，共党会很快控制全中国。

就在同一天，国民政府委员蒋梦麟在寓所中也告诉往访的石博思：「没有美国的援助无法挽救国民政府。 」蒋氏更明白指出「中国最大的腐败存在

于军事指挥官之中，所有在东北的将领都预期溃败，都打算趁机能捞就捞。 」

在如此悲观的气氛中，调查团于二十六日自南京前往上海，正式展开考察活动。魏德迈于二十八日返回南京。 二十九日， 在其抵华后呈给马歇尔之第一封电文中，报告了他的初步观感：

调查团不幸地已被一般中国人视为解决中国所有苦难的万灵丹。 我们被寄望在一夜之间解决此一情势错综复杂之地区所有重大而存在已久的问题。

我觉得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已经破产。他们不明白为何而死或做任何牺牲。 他们对军政领导阶层已失去 信心，预期全面崩溃。 那些居上位的的贪腐之辈则试图在崩溃之前竞相捞取。

当晚，在外交部与石博思的长谈中，叶公超次长也坦白地说出了 他的看法：

虽然蒋〔主席〕犯了很多过错，无人能取代之……他必 须做些有益人民福祉的事，必须进行改革，使政府获得人民的支持……上校以上阶级的军官有百分之九十应予淘汰，军队应该重整并给予适当的训练。 军队指挥官的贪赃枉法已使军队成为无效率的机器，使士气低落。 现在国军在素质上已不如共党军队。

如果有一个良好而值得他们支持的政府，有很多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中国人

可能就会离开。 蒋仍然坚信他可以靠武力对付共产党人，却不明了对付共党唯一有用的方法就是有一个诚实而有效率的政府。

在以后三个星期中，调查团又先后前往北平、天津、汉口、沈阳、抚顺、青岛、济南、台湾、广州等地考察。 所到之处，与当地人士访谈的结果令魏德迈相当震惊。 其中以东北及台湾的情形最为严重。

在东北，魏德迈认为从军事观点来看，当地情况已非国民党人所能掌控。 在八月八日呈送马歇尔的电报中，魏德迈指出：

国军犯下劫掠罪行，他们经常傲慢无理，以征服者而非负有保护东北人民使命之中国军队的姿态出现。 东北人民准备接受共产党的严苛对待，但是他们希望从国民政府的官员及军队那里得到友善的合作。

魏德迈对于蒋介石派往东北接收之将领的表现相当不满，对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及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二人之印象尤其恶劣。 八月六日，魏氏在离开沈阳之前与适才抵达的参谋总长陈诚会面，建议后者转请蒋介石将熊式辉及其总部人员全数撤除， 另择廉洁能干之将领统率东北所有国军。

调查团8月11日抵达台北考察，距二二八事件发生不到半年。 在台湾，魏德迈发现了与东北相当类似的情景。 在17 日致送给马歇尔的电报中，魏德迈指出：

前行政长官陈仪的统治造成〔台湾〕人民与中央政府的疏离……中央政府失

去了一个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展示其具有提供廉能政府能力的良机……〔台湾〕人民真诚热切的期待自日本人的束缚中获得解脱。 但是，陈仪及其党羽却毫不留情地将其腐化贪婪的统治强加之于这群快乐而顺从的人民。 军队以征服者自居，秘密警察肆意威吓〔百姓〕以协助中央政府官员的剥削……

八月十九日，魏德迈完成在中国的考察行程。 当天，蒋介石与其长谈六小时，就政治、军事、党务等有关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但未触及美国之世界与远东政策或中美具体合作办法。 蒋对此似有不满，在日记中有如下之记载：「对美国之无政策，深为世界前途忧。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不自强，何能为人所重， 故除自强雪耻，努力奋勉之外，别无他途也（秦孝仪，1978， 6：548-549）〞

很显然的，魏德迈对于此次来华考察的发现也相当失望。 在他与蒋介石相处的经验中，从未像现在这样，对蒋的领导能力几近于完全失去信心。 正如他离华前夕写给当时在美国的麦克罗将军的信中所说：「他〔蒋〕向我保证他是真心要帮助他的人民以及消除腐败。 他要不是一个玩弄权谋者，就是他无力进行现在有急迫需要的改革 （Stueck， 1984： 43）。」但是魏德迈也知道，在当时蒋介石是唯一可以领导国民党击败共产主义的人。 他希望蒋介石能真正了解改革已刻不容缓，在后者迈上改革之路时，出一分推动的助力，也让他更能说服美国提供援助。 因此，当蒋介石邀请他在国府委员会及各部会首长联席会议演说时，他虽考虑再三仍勉强答应（Wedemeyer， 1958： 387-388）。

八月二十二日，面对六十多位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宋美龄等在内的国府高级官员，魏德迈，以一个诤友的身份，坦白地说出了他考察的观感。 他抨击

政府之军事措施以及国府军政官员之腐败无能。 魏德迈并指出共党问题非一时仅赖武力所能解决，政府必须立即从事政经改革，以获取人民之支持。 当时在座的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长戴季陶聆听之余，感触甚深，竟至泣下。 可惜， 蒋介石以及大多数之国民党领导阶层似乎听不进魏德迈的肺腑之言。 他们认为魏氏对国府之批评「其中因受共党及其外围份子宣传之影响，颇有曲解及误解者（秦孝仪，1978， 6： 550）。 」

魏德迈原拟于8月23日晚间在司徒雷登大使官邸设宴答谢蒋介石、宋美龄及行政院长张群夫妇。 但在当天下午蒋介石托辞身体不适，无法赴宴，魏德迈乃取消此一宴会。 蒋介石对魏德 迈坦率批评之不悦，由此可见。 而张群则对魏氏因蒋介石无法出席即取消宴会亦极表不满。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魏德迈及其幕僚飞东京转往韩国考察。 在行前发表的离华声明中，魏氏更明确而直接地指出：

余今日见中国各地多有冷漠无情与麻木不仁之现象，对 眼前之问题不求解决，而以相当之时间与精力掷于谴责外来之影响，或觅取外来之协助，多数能干爱国之中国人士，原应满怀希望与决心者，反陷于可鄙之失败主义，言之诚属令人丧气。 中国虽经多年战争及革命之阻挠及削弱，现仍拥有其本身所需之大部分物质资源，复兴有待于睿智之领导与道德及精神之再生，而此仅能求诸中国内部。

同等重要者，目前中央政府能裁除在政府组织内，尤其省县机构内，担任职位之颟顸或贪污官员，而获得并保持大多数中国人民一致及热忱之支持……为重获得并保持人民之信任计，中央政府须立即实施大刀阔斧而范围广

大之政治 及经济改革，纯作诺言，将无济于事，亟需见诸实行。 常规所应接受者，即军事力量本身将不能消灭共产主义。

如所预期的，魏德迈的离华声明在国民党内立刻引起了极大的反弹。 首先，在魏德迈离华后次日晚上，蒋介石召唤司徒雷登之私人秘书傅泾波（Phillip Fugh）至官邸，详询调查团来华之背景，并对既有大使驻华又派遣此一未经过邀请之调查团表示不解。 蒋介石显然关心美国是否有意逼他退隐或以其他方式令其去职。

八月二十六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行政院会议之报告中，详述魏德迈声明中之各项错误。 王氏认为：经济复苏缓慢是由于抗战带来的纷乱失序以及国军未能在日本投降后收复整个东北所造成的结果;国民政府在与共产党人斗争时并非只追求军事的解决;而在清除公务员贪污的工作上亦已获得若干进展。

八月二十九日，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长文，强调中国的问题不能用西方的政治及经济的尺度来衡量。 他更进一步批评「那些只不过访问少数几个城市，即对当今政府之缺失擅下结论的外国人（Stueck， 1984： 47）。 」

九月份，国府高层对魏德迈的批评愈趋明显。 九月二日，行政院长张群在接受美联社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政府的内政或外交政策不会因为魏德迈调查团而有所改变。 他说：「有很多事情 魏德迈不知道。 」张群并指

出：魏德迈来华访问时，他曾数度与其见面，但魏德迈从未与其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 张群抱怨说：

「比较起来，政府之外的人比政府内部的人更受到魏德迈将军的重视。 」张群并且强调：魏德迈在离华声明中建议的改革事项， 有很多在他来华之前已经实行了。 可能魏德迈将军认为他离开中国并不太久，对中国仍很了解。 当时即将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王世杰在九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中美关系因魏德迈访华后所作之公开声明，显然日趋恶化（王世杰，1990， 122）。 」

九月十六日，国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长孙科接受合众社记者访问时表示：除非美国立刻给予大量援助，否则中国将会与苏联合作。 孙科宣称：魏德迈的「不够技巧的」批评已令许多中国人不满，因此使转向莫斯科的工作变得单纯。司徒雷登在9月20日呈给马歇尔的报告中也指出甚至有国府高层官员向他表示，可能会请求苏联驻华大使调停国共内战。 」

很显然的，国民党高层对魏德迈的批评恼羞成怒。 值得注意的是当初力劝魏德迈接受蒋介石演说邀约的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电文中也隐约指出魏德迈对国府之缺失「过于坦白的」批评有伤国民党人的「颜面」。 而他们也担心这些出自一位总统特使口中的言辞会激励共产党人，鼓励无党派人士反对政府，同时也 会造成金融市场的骚动。 因此，司徒雷登认为魏德迈对国府高层 官员的谈话以及离华前发表的声明对国府来说「无疑是一个粗鲁无礼的震惊。 」

事实上，蒋介石未尝不知道魏德迈对国民党高层的谈话以及在离华声明中

的批评皆是实情。 单就军人而论，抗战结束未久， 军纪败坏将领腐化的情形就已普遍存在。 蒋介石在民国34年（1945年）11月16日以及民国35年（1946年）4月3日两次对台军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就痛切指出：

各部队经过此次长期抗战之后，军队风纪的败坏几乎成了普遍的现象，以后剿匪的工作，其艰巨困难不亚于抗战， 我们高级将领如果不极力振作，以新的精神和决心来振刷部队的风纪，提高部队的朝气，就没有不失败的！但是我听到现在还有许多高级将领，沈溺于赌博，动辄输赢几十万，这是最可痛心的一件事，这些人我今天不必一一指出，你们自己应该明白。

现在反动派到处宣传，说我们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下级军官也很健全，惟有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都是腐败堕落，而且阶级愈高，精神愈萎靡，行动愈腐化，狂嫖滥赌，走私经商，吃部下的空额。 不仅反动派如此说法，就是一般外国朋友也是如此看法。 这不能怪人家轻视我们，而必须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缺点。 我可以说，我们高级将领虽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 （蒋总统思想言论编辑委员会，1966， 19： 23， 68-69）

他在以后多次对国民党员的训话中，一再提出同样的指责。 民国 三十七年(1948年)一月四日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的开训讲话中，他就明白指出：

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我们革命的工作，不但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而且因为本党自身在人事上缺乏健全的考核制度，凡是刻苦耐劳富于革命精神的同志，不仅没有人识，反而要受人妒忌，工作上遭到阻碍，这样一来，一般同志工作的情绪，自然更加低落，而整个党务，也就更加因循泄沓了。 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

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蒋总统思想言论编辑委员会，1966， 19： 23， 291）

三十八年（1949年）十月，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国民党政府播迁台湾。蒋介石在十月十六日革命实践研究院的开训讲话中再度指出：

「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像（蒋总统思想言论编辑委员会，1966， 19： 397）。」

三十九年（1950年）三月十三日，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所在地阳明山庄所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中又再三提醒国民党人：

近年我国党政军各阶层中普遍流行的现象，是虚伪、欺骗、因循、苟且。说了话不能实行，下了令不能贯彻。 循至于纪律废弛，组织散漫，风气颓丧，官常败坏，外国人讥讽我们政府「贪污无能」，都是由于这种虚伪积习所发生的结果。 （蒋总统思想言论编辑委员会，1966， 20： 10）

由蒋介石这些讲话可以得知，他对国民党政府内部这些弊病相当清楚。 但是除了他本人之外，其身边部属幕僚，即使能看出问题之所在，又有几人敢坦率直言？ 在台湾的几十年间，在国民党的改造声中，蒋介石曾在无数次的讲话训词中一再重复这些责备，但已流于形式，不具有任何激励改革的实质意义了。

另一方面，在1947年8月24日离开南京的魏德迈调 查团在东京短暂停留之后，于26日下午飞抵汉城。 魏德迈在 韩国进行为时一周之考察活动，于9月3日离开汉城至东京。 同日，魏德迈得知司徒雷登于八月二十六日致马歇尔电文之内容。 魏氏对司徒雷登当初力劝其接受蒋介石之讲话邀约，而今却暗指其发言不当之作法深感不满。 魏德迈立即致电司徒雷登表示不满，并对蒋介石及其他国府高层官员之反应深感遗憾。 魏氏指出：「我衷心觉得我之工作系以美国及多数中国人之最佳利益为 念。 」魏德迈最后深感遗憾地表示：战时我在中国竭尽心力。 而在过去两年间我在美国也以演讲及写信方式尽我所能地帮助中国，如果蒋介石或任何爱国明理的中国人对我的动机及作为作不利的解释，令我感到悲伤与失望。

司徒雷登虽于9月12日致电委婉解释，但魏德迈对其言行不一之作法始终难以释怀。魏德迈调查团离开东京后转赴夏威夷，在檀香山停留九天，积极拟就考察报告。 魏德迈于9月18日返回华府，次日即向杜鲁门提出书面报告。 这份冗长的报告共分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概论从国际局势的观点陈述中国的现况;第二部分则分别从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各层面分析中国在战后所面临的问题;第三部分从同样的层面分析韩国的现况及问题;第四部分为结论; 第五部分为建议。

在概论中，报告指出：尽管人们在中国所见到的全是腐败与无能，可以确定的 是大多数人民对共产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并无好感。 有些人为了对警察的高压措施、腐败的作法以及国府官员的施政不当表达愤怒的抗议而与共党合作。 有些人则因对现今的中国领导阶层完全不抱希望，在绝望中而变成共产党人。

对于苏联在远东的图谋，报告亦指出：美国在雅尔达会议中同意俄人重入东北，而后来又拒绝对国府提供援助，间接地帮助了苏联在远东的计划……东北情况已恶化到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以阻止该地区成为苏联的附属。中共可能即将获得对东北的军事控制并宣布成立政府。

报告亦不忘提醒美国政府，在战争期间，虽然日本人提出愈来愈有利的投降条件，中国仍选择坚守同盟阵营。 如果中国接受投降的条件，大约有一百万日军可以被用来对抗太平洋地区的美 军。 」

在政治层面，报告预测共党最后可能统治中国：虽然中国人民一致期望不计任何代价求得和平，照目前情况来看，此一愿望似难实现。 一边是国民党，其保守的领 导阶层、镇压及腐败已使大众对台当局失去信心。 另一边则是在意识形态上服从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公认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党政府……温和派则处于国民党的失政与镇压和共党残酷极权主义的夹缝中。少数党缺乏强而有力的领导与众多追随者。 由于国民政府的镇压，无论是温和派，其中很多是在国民党内，或是少数党皆无法发挥他们的影响力……目前的趋势是国民政府的控制逐渐崩溃，而最后可能出现一个共党统治的中国。

在经济层面，报告所呈现的远景也极不乐观：由于内战及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在解体中。 目前 趋势最可能的结果是不会立刻崩溃，但持续而缓慢的麻痹 将会造成国民政府威信与权力的衰退。 过去十年的战争造成运输通信设备、矿藏、公用事业及工业的严重损坏。 虽有若干令人赞赏的努力与大量的经援，但其整体的能力尚不及战 前的一半。 由于运输设备的中断以及失去了大部分的华北及 东北，这些富庶地区的重要资源

已无法再支持经济的复原……国民政府在经济上最迫切需要的是降低军事预算。

在社会文化层面，报告认为公众教育已成为战争以及社经崩 解的一个主要受害者：

教室、课本以及其它设备多已损毁，而目前已无力作较 多数量的添购。教师，就像其他公务人员，发现他们一个月 的薪水已贬值到只够几天的米钱。 从提供全国严重文盲问题 解决之道的小学到培养国家专业、技术人员与行政人才的大学，整个教育体系皆是如此。 而大学也遭受另外一个同样严重的打击—传统学术自由的箝制。 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遭受国府情治人员严厉有时甚至残暴的惩罚……教职员经常在并非不能胜任的情况下被免职或解雇，显然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政府官员不合。 同样的，刊物经常未经指控即被以「军事安全理由」关闭，在更换新的经理人员后，才能重新营业。

在军事情势方面，报告指出国军已渐居劣势：在过去数月间，国民政府的整体军事情势在恶化中，而目前的状况对中共的军队有利。 虽然国军在力量上占优势， 但战术的先制却是操控在共军手中。 共军为达成摧毁其所择定之据点或地区的任务而采用的打跑战术（hit and run），使他们比国军享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后者必须防卫包括通信连接线在内的许多重要地区。

为实质改善目前的军事状况，国军必须先稳住前线，再重获先制。 此外，由于政府使用了全国预算的大约百分之七十以支持内战，为舒缓此一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显然必须朝向提升军队效率，并伴随社会、政治及经济改革计划，包括减少军队编制的数量……中国目前的工业潜力不足以有效地维

持军队。 国军在目前状况下无法顺利应付内战或履行其国际社会一分子之责任。 因此任何作战行动计划若期望能够成功，在进行之前必须先有军火（弹药最迫切需要）以及技术援助形式的外援。

美国提供军援给国民政府，可能会促使苏联公开或暗中提供相同的援助给中共......如此将造成一个类似一九三五 年在西班牙的意识形态冲突的竞技场。 如果此种在欧洲及中东地区出现的类似状况也在此一地区发生，可能随时会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结论中，报告指出：大多数的中国人〔及韩国人〕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他们也不关心意识形态。 他们渴望的是食物、遮风避雨的地方以及平安度日的机会。在第五部分中有关中国者，报告具体建议：（一）知会中国，美国愿继续援助中国，以保障其领土完整及加速复原；（二）中国应有效使用其本身资源以执行经济复兴计划。 并采行健全的财政政策，以减少预算赤字；（三）中国政府能持续证明其已进行具迫切必要性之政治及军事改革；（四）中国接受美国军事及经济顾问，以有效使用美援。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东北问题，魏德迈在报告中建议中国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以中止在东北的敌对行为，并要求将东北由中、苏、美、英、法五国共同监护，或依联合国宪章托管。此一部分，魏德迈认为系其报告中之「最重要之成分」，但马歇尔却认为此一建议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此一建议，当时若予公布， 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意指国府无力统治其领土，对中国人的感受是极为无礼的。 」马歇尔要求魏德迈将其报告中此一部分删除，但遭后者婉拒。 马歇尔乃决定将报告压制，不予公布并列为最高机密。

正如一位著名的中美关系史学者所写的：

压制魏德迈报告是〔杜鲁门〕政府一项最无必要也最不幸的行为。 如果报告得以公布，其所引发的公开辩论可以澄清许多基本问题。 如果〔美国〕大众显示无意承担一项积极对华政策之花费以及最后介入中国内战的风险，政府的消极政策便可得到某种背书。 如果政府输了这场辩论，则采行新的对华政策犹为未晚……不管怎样，政府均不至于〔后来〕 在遭受对国会及美国民众隐瞒重要讯息的指控时而无法辩解。 ……魏德迈关于东北建议之揭露，其对中美关系之伤害应不会大过雅尔达密约或马歇尔本人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所发表的离华声明。 对于国民政府的感受突然表现过度的热切，〔杜鲁门〕政府犯了一个可以避免的错误。 （Tsou, 1963:460-461）

魏德迈本人对其报告的被压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他在回忆录中指出：

调查报告的结论及建议部分，在用字遣词上皆很慎重，就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快。 而几乎所有构想皆在极融洽气氛中事先与蒋介石商量过。 因此我确信调查报告的公布，不会让美国政府或中国人难堪。 如果我错了，那么在一九四九年的对华关系白皮书中公布了我的报告，则似乎是严重的外交错误。 （Wedemeyer, 1958: 398）

他更進一步表示：

当我在报告遭到压制之后又重回军旅，我也许已经犯了 一个严重错误，也是对国家的未能尽责。 如果我当时辞职并说出我心中想法，也许我能让美国大众了解真相，因而使中国免于共产党人的征服，使后来残酷而徒劳无功的韩战得以 避免。 但对马歇尔将军的尊敬与情谊，使我很难放弃军旅生涯，以便在政策上向他挑戰。 (Wedemeyer, 1958: 402)

对魏德迈个人来说，调查报告的遭受压制，正式宣告了魏德 迈与马歇尔两人之间长官部属关系以及私人情谊的终结，也使他在军旅生涯中终于无法再上层楼。

。。。。

伍、对国府之支持始终如一

在其报告遭到压制之后，魏德迈立即归建军中，先后担任过陆军计划及作战署长（1947-48）、陆军副参谋长（1948，主管计划及作战）、陆军第六军军长（1949-51）。 魏德迈于1951年以中将军阶自陆军退役，正值54岁壮年。职务虽屡有更动，但魏德迈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支持则始终未变。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六日，距其提出考察报告不到一个月，魏德迈发表谈话，吁请美国当局继续支持蒋介石领导之国民政府，并认为：「非立即给予中国以军事物资及道义上的支持，实不足以阻止共产主义之滋蔓。 」（秦孝仪，1978， 6： 569-570）两个月后， 魏氏在参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再度力主紧急援助国府。 他说：

我认为蒋主席是中国合理的领袖，美国应该将其可能予中国的援助，和中

国可以有效方式利用美援的能力，予以相 称的配合。 最重要的，是他始终如一的反对共产党，在太平洋战争的最高潮，蒋主席可以在极有利的条件下，与日媾和。 因之，日本可调出150万人，与美军作战。 蒋主席决定忠于他的盟国，他是一极可钦佩的人物，美国应当速予中国以军事、经济援助。 （秦孝仪，1978， 6： 529）

一九四八年中，国军剿共情势日趋不利，亟需美国军经援助。 六月初，参众两院讨论援华法案，马歇尔及陆军部长罗耶尔（Kenneth C. Royall）等人皆认为美国援华，不独消耗金钱，反而有损美国之国际威信。 魏德迈则力陈：「中国所处地位在对苏军战略上重要，美国既抱抵制共党蔓延政策，何以轻视亚洲情势，不予援助。 」最后，援华法案经两院协商后于六月二十日通过，援华总额为四亿美元，其中包括军援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根据联勤总部派往美国之杨继曾署长之报告：

马歇尔将军对中国成见甚深，彼历来不主张援助中国，认为中国已不堪救药，终将沦于共党之手，援助不成，必至丧失美国体面，此次国会拨款之讨论，又予以阻挠之机会……幸魏德迈将军之答复，认为时机虽属已晚，但尚可发生有用之效力，否则，此项援助几将全部取消。 （秦孝仪，1978，7 ：101）

由此可见，若无魏德迈之仗义执言，此一援华法案似难在国会通 过。 虽然军援部分之首批军械于1949年1月初始运送来华，对遏阻共党攻势已经太晚，但魏氏之义助仍足感人。

三十八年（1949）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政府播迁台湾，蒋介石于次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复行视事。 一九五一年九月中，魏德迈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我认为蒋介石目前是中国人理所当然的领袖，我们美国人必须与其合作。 ″1951″（″Interview，″ 1951： 39） 他始终认为未能在精神上支持蒋介石，是美国战后在远东所犯的一项根本错误。 他说：先是参众两院于四月二日通过援华案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杜鲁门政府欲将此案完全推翻，乃有两院于六月初之复议。 最后虽未能如愿，但仍得以将援华总额削减六千三百万美元。 秦孝仪（1978，7：100-101）。

如果我们在一九四六年明确声明蒋介石是战争期间一位忠实而有力的盟友，美国决心继续给予支持，协助其带领中国走出动乱并自八年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崩溃中复原，共产主义可能不会得手……我也深信，如果（我们）能及时给予选择性的精神、经济及军事援助并加以监督，蒋介石应可阻止共产党人在亚洲的扩张。 (“Interview,” 1951: 41-42)

三十多年之后，他在接受一位也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的历史学者的访问时，仍然认为共产党人的接管中国并非「不可避免」（Eiler，1983： 46）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9年建交之后，中共曾多次邀请魏德迈夫妇访问大陆，均遭其婉拒。 正如他在一九八三 年二月初写给一位中间传话人的信中所说的：

我始终坚信真正的和平、繁荣与快乐只有在一个基本人权受到尊重，个人在充分自由的环境中得以自行发展并表达其天赋才智与期望的社会中才有可能。 许多年来，尤其是我在战时及战后在远东服务的那段期间，我一直鼓励中国人依据这些原则追寻他们的命运。 ……现有的证据充分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恰好是奠基于对这些价值的否定上。

到中国大陆访问，即使是拜访老友，将必然会被解释成赞同或至少是默认中国的现况。 因此很遗憾地，我要让你知道，如果此时接获邀请，我们将不得不予婉拒。 我们热切期盼中国已有改变的确实证据，使我们在有生之年，得以心安理得地再次重返那具有可敬人民与美好土地的伟大国度。
(Eiler, 1987: 221-222)

可惜，他的此一愿望未能实现。当他于1989年12月17日以92岁高龄逝世于维吉尼亚州贝尔沃堡市（Fort Belvoir）时，魏德迈终未能再踏上那片他曾贡献过心力，睽别四十多年的土地。

。。。。

陆、结论

在二次大战期间崭露头角的美军将领中，魏德迈是一个学养人品俱优的人;而在所有曾在中国战区服役过的美军将领中，他也真正具有中国人敦厚、谦逊以及重情义的特质。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之前，魏德迈即以其参谋长才能获得马歇尔的赏识与擢拔;可惜后来也因其在对华政策理念上与马氏背道而驰，两人关系渐行渐远，进而遭受排斥，使他在美国陆军中的升迁无法更上层楼。

一九四四年十月，罗斯福应蒋介石之请，将史迪威召回，同时派遣魏德迈来华，接替史氏所遗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指挥官职务。在华期间，魏德迈因其个性谦和圆润，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高层皆能相处融洽，尤受蒋氏之信任与敬重，使抗战后期因史迪威事件而濒于恶化的中美战时合作关系得以舒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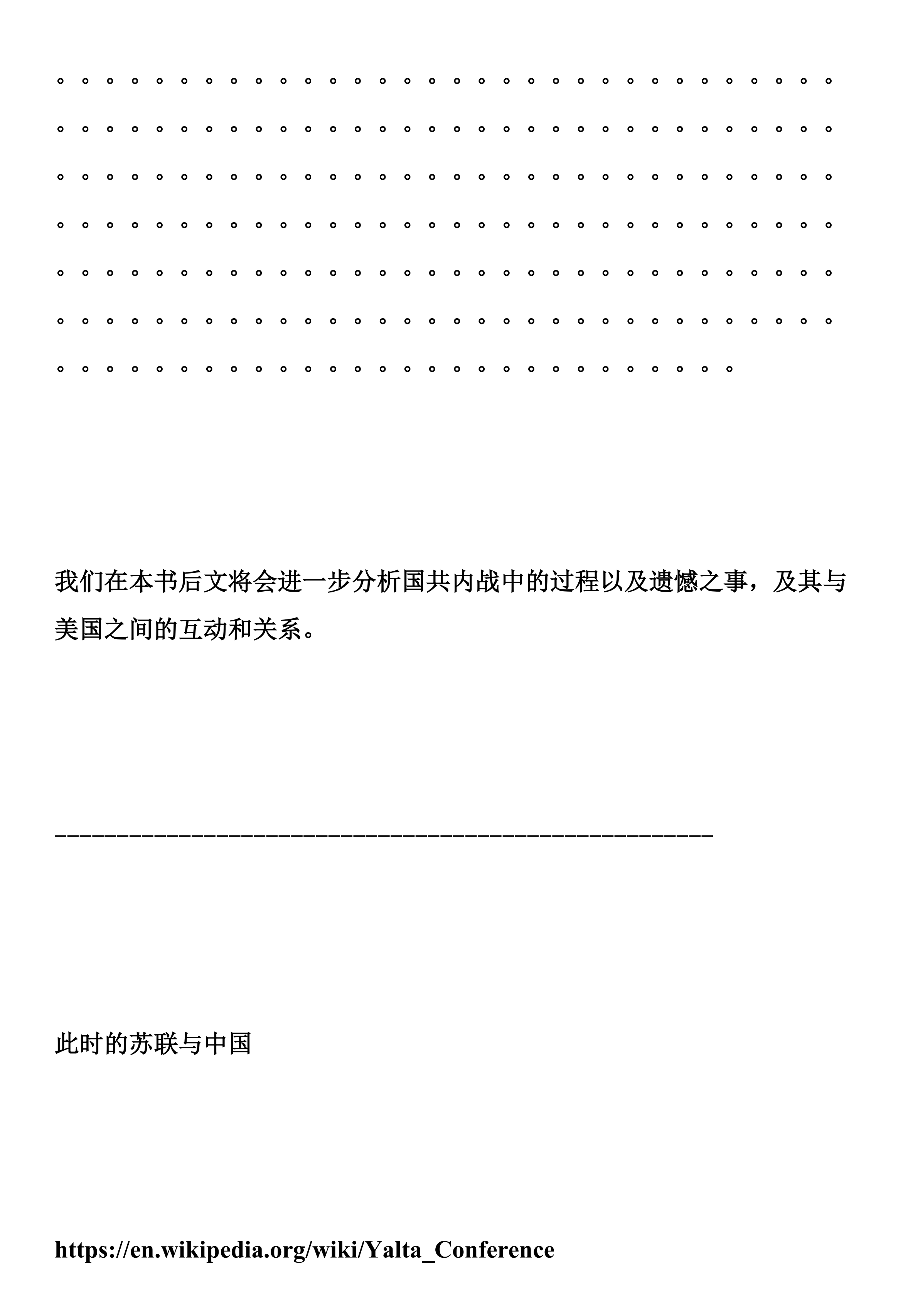
在中国战区参谋长任内，魏德迈除改善国军膳食，建立后勤补给制度之外，并建议消除奢靡风气，改变国人行车习惯，颇收移风易俗之功效。在对中国抗战曾贡献过心力的美军将领中，他与陈纳德二人最令中国人怀念。陈纳德因率飞虎队来华助战，并娶国人陈香梅为妻，极受蒋介石及宋美龄之宠信;但未见其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缺点有所指陈。真正能以同情、谅解与包容的态度对待蒋介石及其政府并积极代为争取美国政府援助，同时又肯直言不讳，指出其弊端及亟需改革之处的只有魏德迈一人而已。可惜，魏氏的坦诚谏言有时并未得到国民党政府高层的善意回应，反而遭受误解与无谓的攻讦。

在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的中美关系发展中，虽也有若干积极支持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人，如所谓「中国游说团」（ChinaLobby）中的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H. Judd）以及参议员诺兰（William F. Knowland）等人;但这些支持者对国民党政府的弊端缺失未必真正了解;或即使曾有所闻，但在冷战「反共第一」的前提下，也未忍多加苛责。

在抗战期间及其后的中美关系史中，对蒋介石的个性、领导风格，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弊端缺失有深刻体认，敢于批评并提供改革建言，而犹能终其一生未改变其支持立场者，魏德迈是唯一， 也是最后的一人。对于这样一位真正的朋友，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是有所亏欠的。

在杜鲁门任内曾任国务卿的伯恩斯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他 对国共内战的感想：「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人力充沛物产富饶的 国家，却因阋墙而分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剧（Byrnes， 1947：226）。 」在这场国共生死搏斗的大悲剧中，魏德迈的确曾真心诚意地想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存续尽一分心力。 可惜，战后东亚局势的演变，国民党政府内部长久以来存在的许多问题以及杜鲁门、马歇尔二人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厌恶，这些主客观因素汇聚成为一股非魏德迈个人力量所能抗拒的历史洪流。 在大陆蒋介石及其政权是被这股洪流所淹没的。 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最后之失败固然是蒋介石个人生涯中最大的悲剧;对魏德迈而言，也是其一生中极大的憾事。

。。。。。。。。。。。。。。。。。。。。。。。。。。。。。。。。



我们在本书后文将会进一步分析国共内战中的过程以及遗憾之事，及其与美国之间的互动和关系。

————————————————————————————————

此时的苏联与中国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alta_Conference

雅尔塔会议

雅尔塔会议，又称克里米亚会议，举行于1945年2月4-11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府首脑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美国，英国和苏联主要讨论战后德国和欧洲的重组。这三个国家分别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约瑟夫•斯大林元帅代表。会议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附近举行。会议地点是在利瓦迪亚，尤苏波夫和沃龙佐夫宫内。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塑造战后和平；它不仅代表着集体安全秩序，而且是要使纳粹后的、欧洲的、被解放人民进行自决的计划。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国家的重建。然而，在短短的几年内，随着冷战分裂了大陆，雅尔塔会议成为了引起激烈争议的话题。

雅尔塔会议是美英苏之间所举行的三个主要的战时会议中的第二个会议。他们之间的第一个主要会议是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第三个主要会议是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雅尔塔会议之前，1944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中（罗斯福总统没有参加会议），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那次会上曾经谈到了欧洲战后问题，以及西方和苏联的影响范围问题。

。。。。

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时，西方盟国的武装部队已解放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全部领土，并在德国的西部边界进行战斗。在东部，苏军距柏林65公里（40英里），已经将德国人从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驱逐。关于德国战败的问题不再存在；问题是战后欧洲的新形态。

召开第二次“三巨头”会议的倡议来自罗斯福。罗斯福希望在1944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举行会议，但随后敦促1945年初在地中海的中立地点举行会议。建议的地点分别是马耳他，塞浦路斯和雅典。斯大林坚持认为他的医生反对任何长途旅行，因此拒绝了这些选择。相反，斯大林建议他们在克里米亚的黑海度假胜地雅尔塔会面（斯大林对飞行的恐惧也是这一决定的一个促成因素）。然而，斯大林推举罗斯福担任会议的主持人；所有全体会议都将在利瓦迪亚宫的美国居所举行，而罗斯福始终坐在集体照片的中央（所有照片均由罗斯福的官方摄影师拍摄）。

三位领导人各自对战后德国和欧洲的解放安排有着自己的议程想法。罗斯福希望苏联在美国对日太平洋战争中给予支持，特别是计划入侵日本（八月风暴行动），以及苏联参与联合国；丘吉尔敦促东欧和中欧（尤其是波兰）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民主政府；斯大林要求苏联在东欧和中欧的政治势力范围得到保障，作为苏联的重要方面的国家安全战略。斯大林在会议上的立场给人的感觉很强硬，甚至是颐指气使。美国代表团成员兼未来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表示，“这不是我们想让俄罗斯人做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可以让俄罗斯人做什么。”

波兰是苏联议程上的第一个条目。斯大林说，“对苏联政府来说，波兰的问题是荣誉和安全问题之一”，因为波兰一直是试图入侵俄罗斯的部队的历史

走廊。此外，斯大林谈到历史时说：“因为俄罗斯人对波兰犯了大罪”，“苏维埃政府正试图为这些罪行赎罪。”斯大林总结说：“波兰必须强大”，并且“苏联对建立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感兴趣”。因此，斯大林规定，波兰流亡政府的要求不可妥协：波兰应通过以牺牲德国为代价扩大其西部边界来获得补偿。与他先前的立场相反，斯大林答应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尽管他最近在红军占领的波兰领土上成立了苏联赞助的临时政府。

罗斯福希望苏联与盟国一起参加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他希望这能早日结束战争并减少美国的人员伤亡。

苏联对日宣战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美国对蒙古独立于中国的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24年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家）。苏联还希望承认苏联在满洲铁路和旅顺港的利益。苏联人希望归还卡拉富托（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从俄罗斯手中夺回的卡拉富托），以及日本对千岛群岛的割让，这两个都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

作为回报，斯大林承诺，在德国战败三个月后，苏联将进入太平洋战争。后来，斯大林在波茨坦许诺杜鲁门总统尊重朝鲜的民族团结，朝鲜将部分地由苏联军队占领。

此外，鉴于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的投票方式的理解，苏维埃同意加入联合国，从而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每个国家都可以阻止其不想要的决定。

三位领导人均批准了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协议，该协议确定了德国战后占领区的边界：三个占领区，三个主要盟国各占一个。他们还同意给法国一个占领区，从美国和英国的区域中划出。

欧洲解放宣言

《欧洲解放宣言》是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提出的。这项承诺使欧洲人民能够“建立自己选择的民主体制”。该宣言保证，“通过响应人民意愿的自由选举而建立战后的政府”。这类似于《大西洋宪章》的声明，即“所有人有权选择其所居住的政府形式的权利”。

会议的重点如下：

协议中的优先内容是，纳粹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战后，德国和柏林将被分为四个占领区。

斯大林同意法国将在德国拥有第四个占领区，但它必须在美国和英国区之内组成。

德国将经历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

德国的赔偿，部分是以强迫劳动的形式进行的。强迫劳动将用于弥补德国

对其受害者造成的损害。但是，劳动者还被迫收割庄稼，开采铀并从事其他工作。（详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迫德国的劳动”，与“苏联强迫德国的劳动”）。

建立一个赔偿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设在苏联。

讨论了波兰的地位。同意“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重组由苏联成立的波兰共和国共产党临时政府。

波兰东部边界将沿柯松线（Curzon Line）划线；波兰西部将从德国获得领土补偿。

斯大林承诺允许波兰自由选举。

罗斯福得到斯大林的承诺，苏联将加入联合国。

斯大林要求所有16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内部的俄罗斯卫星国）都被授予联合国会员国资格。这一点得到了考虑；但最终拒绝了14个共和国。杜鲁门后来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入联合国。

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投降并终止欧洲战争后的两三个月内”开始与日本帝国的战斗，结果，苏联将占领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大连港将实现国际化，并恢复苏维埃旅顺港的租约，以及其他一些特许经营权。

为了对日本进行轰炸，美苏达成协议，美国的B-29轰炸机将以Komsomolsk-Nikolaevsk地区阿穆尔河河口附近（并非像早先提议的那样靠近海参威）为飞行基地；尽管这后来并没有发生。安东诺夫将军还说，红军将把萨哈林岛的南半部作为其首要目标之一；而苏联希望美国在防御堪察加半岛方面提供援助。

纳粹战争罪犯将被调查，并在犯有罪行的领土上接受审判；纳粹领导人将被处决。

三巨头进一步同意建立民主制，所有解放的欧洲国家和前轴心国都将举行自由选举，并将恢复秩序。

在这方面，他们承诺通过各种程序重建被占领国，使它们“建立自己选择的民主体制。这是《大西洋宪章》的一项原则，即，所有人民有权享有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

会议指出，英美苏这三个国家将协助被占领国成立临时政府，“通过响应人民意愿的政府自由选举，来争取最早建立政府”，并“在必要时促进举行此类选举”。

该协议要求签署国“共同商讨履行本宣言中规定的共同责任所必需采取的措施”。在雅尔塔（Yalta）讨论中，莫洛托夫（Molotov）插入了削弱声明执行力的语言。

关于波兰，雅尔塔报告进一步指出，波兰临时政府应“保证在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尽快举行自由和不受束缚的选举”。

最终协议规定：“因此，现在在波兰运作的临时政府应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重组，包括波兰和国外波兰人的民主领袖。”

后果

波兰和东欧集团

由于斯大林的诺言，丘吉尔相信他会信守关于波兰的话，并表示“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相信他可以信任希特勒。他错了。但是我认为我对斯大林没有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共产党政府在波兰成立。许多波兰人感到被战时盟友出卖了。由于苏联在战后对波兰公民的一系列镇压措施，许多波兰士兵拒绝返回波兰。结果就是英国1947年通过的《波兰移民安置法》；这是英国第一部大规模移民法。

3月1日，罗斯福向国会保证：“我从克里米亚归来，坚信我们已经迈向了通往和平世界的道路。”但是，西方国家很快意识到，斯大林不会兑现他对波兰进行自由选举的承诺。

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由于苏联军队在波兰实施的暴行，丘吉尔在伦敦受到其它英国政界人士的严厉批评；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一封绝望的信，其中提到苏联对波兰反对派人士的全面驱逐和清算。

罗斯福在3月11日对丘吉尔的回信中说：“我最肯定地同意，我们必须对克里米亚的决定【即雅尔塔会议协议】作出正确的解释。卢布林政府【即波兰的苏联傀儡政府】的舞弊行为或纯粹的粉饰是错误的；波兰之解决方案应当与我们在雅尔塔所设想的一致。”

到3月21日，罗斯福驻苏联大使阿弗雷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致电罗斯福说：“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所计划的极权主义的建立，终

结了我们所提倡的人身自由和民主制度。”两天后，罗斯福开始承认他对斯大林的看法过于乐观，并说“阿弗雷尔是正确的”。

四天后，即3月27日，苏联人民内部事务委员会（NKVD）逮捕了16名被邀请参加波兰临时政府谈判的波兰反对派政治领导人。逮捕是NKVD使用的伎俩的一部分；NKVD后来将这些领导人带到莫斯科进行表演性的审判，然后判处他们到古拉格服苦役。

丘吉尔此后向罗斯福说道，莫斯科的策略是“在卢布林政府委员会巩固其权力的同时”拖延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的时间。

后来，波兰在1947年1月16日举行的所谓选举，正式导致波兰在1949年正式转变为共产主义国家。

在苏联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担心雅尔塔协议的措辞可能会阻碍斯大林的计划，斯大林回答“没关系。稍后我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做。”

苏联将几个被占领国吞并为（或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所占领的中欧和东欧其他国家也被转换为苏维埃控制的卫星国家，如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以及东德。最终，美国和英国在承认当时以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时做出了让步，牺牲了《雅尔塔宣言》的实质内容，但仍保持其形式。

中止的执行计划

在1945年春季的某个时候，丘吉尔试图研讨一项应急性军事行动计划（对苏联发动战争），以取得“波兰的解决方案”。该研讨项目于5月22日发表研究结果报告，指出此军事行动计划的成功概率不高。报告的论点包括地缘战略问题（可能的苏日同盟，苏联对伊朗/伊拉克的威胁等）以及有关欧洲陆战的不确定性。

波茨坦和原子弹

波茨坦会议从1945年7月到8月召开。参与者包括斯大林、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取代了丘吉尔首相）和哈里·S·杜鲁门总统（在罗斯福去世后，继任美国总统）。

在波茨坦，苏维埃否认了他们干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事务的说法。

会议的结果是：（1）关于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和（2）《波茨坦协定》关于苏联吞并Curzon线以东的前波兰领土的规定，以及在最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最终条约》中要解决的规定，将德国在Oder-Neisse线以东的部分地区归入波兰，以及东普鲁士的北部地区归入苏联。

罗斯福死后四个月，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8月6日命令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

。。。。。。。。。。。。。。。。。。。。。。。。。。。。。。。。

。。。。。。。。。。。。。。。。。。。。。。。。。。。。。。。。
。。。。。。。。。。。。。。。。。。。。。。。。。。。。。。。。
。。。。。。。。。。。。。。。。。。。。。。。。。。。。。。。。
。。。。。。。。

https://avalon.law.yale.edu/wwii/yalta.asp

雅尔塔会议原文

The Yalta Conference

See Also : Agreement Relating to Prisoners of War and Civilians Liberated by Forces Operating Under Soviet Command and Forces Operating Under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mmand; February 11, 1945

February, 1945

Washington, March 24 - The text of the agreements reached at the Crimea (Yalta) Conference between President Roosevelt,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and Generalissimo Stalin, as releas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today, follows:

PROTOCOL OF PROCEEDINGS OF CRIMEA CONFERENCE

The Crimea Conference of the heads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which took place from Feb. 4 to 11, ca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 WORLD ORGANIZATION

It was decided:

1. That 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proposed world organization should be summoned for Wednesday, 25 April, 1945, and should be h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The nations to be invited to this conference should be:

(a) the United Nations as they existed on 8 Feb., 1945; and

(b) Such of the Associated Nations as have declared war on the common enemy by 1 March, 1945. (For this purpose, by the term "Associated Nations" was meant the eight Associated Nations and Turkey.) When the conference on world organization is held, the delega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will support a proposal to admit to original membership two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i.e., the Ukraine and White Russia.

3.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n behalf of the three powers, should consul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he Frenc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n regard to decisions taken at the present conference concerning the proposed world organization.

4. That the text of the invitation to be issued to all the nations which would take part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should be as follows: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behalf of itself and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ic Republic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invite the Government of -------- to send representatives to a conference to be held on 25 April, 1945, or soon thereafter , at San Francisco,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prepare a charter for a gen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The above-named Governments suggest that the conference consider as affording a basis for such a Charter the proposa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ener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hich were made public last October as a result of the 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 and which have now been supplemented by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for Section C of Chapter VI:

C. Voting

"1. Each membe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should have one vote.

"2. Decision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procedural matters should be made by an affirmative vote of seven members.

"3. Decision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all matters should be

made by an affirmative vote of seven members, including the concurring votes of the permanent members; provided that, in decisions under Chapter VIII, Section A and under the second sentence of Paragraph 1 of Chapter VIII, Section C, a party to a dispute should abstain from voting.'

"Further information as to arrangements will be transmitted subsequently.

"In the event that the Government of -------- desires in advance of the conference to present views or comments concerning the proposals,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be pleased to transmit such views and comments to the other participating Governments."

Territorial trusteeship:

It was agreed that the five nations which will have permanent seats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should consult each other prior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question of territorial trusteeship.

The acceptance of this recommendation is subject to its being made clear that territorial trusteeship will only apply to

(a) existing mandate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b) territories detached from the enemy as a result of the present war;

(c) any other territory which might voluntarily be placed under trusteeship; and

(d) no discussion of actual territories is contemplated at the forthcoming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r in the preliminary consultations, and it will be a matter for subsequent agreement which territories within the above categories will be place under trusteeship.

[Begin first section published Feb., 13, 1945.]

II. DECLARATION OF LIBERATED EUROPE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has been approved:

The Premier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ve consult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of their countries and those of liberated Europe. They jointly declare their mutual agreement to concert during the temporary period of instability in liberated Europe the policies of their three Governments in assisting the peoples liberated from the domination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peoples of the former Axis satellite states of Europe to solve by democratic means their press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The establishment of order in Europe and the rebuilding of national economic life must be achieved by processes which will enable the liberated peoples to destroy the last vestiges of nazism and fascism and to creat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f their own choice. This is a principle of the Atlantic Charter - the right of all people to choose the form of government under which they will live - the restoration of sovereign rights and self-government to those peoples who have been forcibly deprived to them by the aggressor nations.

To foster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 liberated people may exercise these rights, the three governments will jointly assist the people in any European liberated state or former Axis state in Europe where, in their judgment conditions require,

(a) to establish conditions of internal peace;

(b) to carry out emergency relief measures for the relief of distressed peoples;

(c) to form interim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broadly representative of all democratic elements in the population and pledged to the earliest possible establishment through free elections of Governments responsive to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d) to facilitate where necessary the holding of such elections.

The three Governments will consult the other United Nations and provisional authorities or other Governments in Europe when matters of direct interest to them are under consideration.

When, in the opinion of the three Governments, conditions in any European liberated state or former Axis satellite in Europe make such action necessary, they will immediately consult together on the measure necessary to discharge the joint responsibilities set forth in this declaration.

By this declaration we reaffirm our faith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 Atlantic Charter, our pledge in the Declar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ur determination to build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peace-loving nations world order, under law, dedicated to peace, security, freedom and general well-being of all mankind.

In issuing this declaration, the three powers express the hope that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m in the procedure suggested.

[End first section published Feb., 13, 1945.]

III. DISMEMBERMENT OF GERMANY

It was agreed that Article 12 (a) of the Surrender terms for Germany should be amended to read as follows: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shall possess supreme authority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In the exercise of such authority they will take such steps, including the complete dismemberment of Germany as they deem requisite for future peace and security."

The study of the procedure of the dismemberment of Germany was referred to a committee consisting of Mr. Anthony Eden, Mr. John Winant, and Mr. Fedor T. Gusev. This body would consider the desirability of associating with it a French representative.

IV. ZONE OF OCCUPATION FOR THE FRENCH AND CONTROL COUNCIL FOR GERMANY.

It was agreed that a zone in Germany, to be occupied by the French forces, should be allocated France. This zone would be formed out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zones and its extent would be settled by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Frenc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It was also agreed that the Frenc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should be invited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Allied Control Council for Germany.

V. REPARATION

The following protocol has been approved:

Protocol

On the Talks Between the Heads of Three Governments at the Crimean Conference on the Question of the German Reparations in

Kind

1. Germany must pay in kind for the losses caused by her to the Allied na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war. Reparations are to be receiv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by those countries which have borne the main burden of the war, have suffered the heaviest losses and have organized victory over the enemy.

2. Reparation in kind is to be exacted from Germany in three following forms:

(a) Removals within two years from the surrender of Germany or the cessation of organized resistance from the national wealth of Germany located on the territory of Germany herself as well as outside her territory (equipment, machine tools, ships, rolling stock, German investments abroad, shares of industrial, transport and other enterprises in Germany, etc.), these removals to be carried out chiefly for the purpose of destroying the war potential of Germany.

(b) Annual deliveries of goods from current production for a period to be fixed.

(c) Use of German labor.

3. For the working out on the above principles of a detailed plan

for exaction of reparation from Germany an Allied reparation commission will be set up in Moscow. It will consist of three representatives - one from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n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 With regard to the fixing of the total sum of the reparation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of it among the countries which suffered from the German aggression, the Soviet and American delegations agreed as follows:

"The Moscow reparation commission should take in its initial studies as a basis for discussion the suggestion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that the total sum of the repa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ints (a) and (b) of the Paragraph 2 should be 22 billion dollars and that 50 per cent should go to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The British delegation was of the opinion that, pending consideration of the reparation question by the Moscow reparation commission, no figures of reparation should be mentioned.

The above Soviet-American proposal has been passed to the Moscow reparation commission as one of the proposal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commission.

VI. MAJOR WAR CRIMINALS

The conference agreed that the question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should be the subject of inquiry by the three Foreign Secretaries for report in due course after the close of the conference.

[Begin second section published Feb. 13, 1945.]

VII. POLAND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on Poland was agreed by the conference:

"A new situation has been created in Poland as a result of her complete liberation by the Red Army. This cal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lis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which can be more broadly based than was possible before the recent liberation of the western part of Polan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which is now functioning in Poland should therefore be reorganized on a broader democratic basis with the inclusion of democratic leaders from Poland itself and from Poles abroad. This new Government

should then be called the Polis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M. Molotov, Mr. Harriman and Sir A. Clark Kerr are authorized as a commission to consult in the first instance in Moscow with members of the present Provisional Government and with other Polish democratic leaders from within Poland and from abroad, with a view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resent Government along the above lines. This Polis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shall be pledged to the holding of free and unfettered ele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suffrage and secret ballot. In these elections all democratic and anti-Nazi partie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take part and to put forward candidates.

"When a Polish Provisional of Government National Unity has been properly form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bov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S.S.R., which now maintain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esent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Po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new Polis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National Unity, and will exchange Ambassadors by whose reports the respective Governments will be kept inform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Poland.

"The three heads of Government consider that the eastern frontier of Poland should follow the Curzon Line with digressions from it in some regions of five to eight kilometers in favor of Poland. They recognize that Poland must receive substantial accessions in territory in the north and west. They feel that the opinion of the new Polis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should be sought in due course of the extent of these accessions and that the final delimitation of the western frontier of Poland should thereafter await the peace conference."

VIII. YUGOSLAVIA

It was agreed to recommend to Marshal Tito and to Dr. Ivan Subasitch:

(a) That the Tito-Subasitch agreement should immediately be put into effect and a new government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agreement.

(b) That as soon as the new Government has been formed it should declare:

(I) That the Anti-Fascist Assembly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AVNOJ) will be extended to include members of the last Yugoslav Skupstina who have not compromised themselves by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nemy, thus forming a body to be known as a temporary Parliament and

(II) That legislative acts passed by the Anti-Fascist Assembly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AVNOJ) will be subject to subsequent ratification by a Constituent Assembly; and that this statement should be published in the communiquÃ© of the conference.

IX. ITALO-YOGOSLAV FRONTIER - ITALO-AUSTRIAN FRONTIER

Notes on these subjects were put in by the British delegation and the American and Soviet delegations agreed to consider them and give their views later.

X. YUGOSLAV-BULGARIAN RELATIONS

There was an exchange of views between the Foreign Secretarie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desirability of a Yugoslav-Bulgarian pact of alliance. The question at issue was whether a state still under an armistice regime could be allowed to enter into a treaty with another state. Mr. Eden suggested that the Bulgarian and Yugoslav Governments should be informed that this could not be approved. Mr. Stettinius suggested that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Ambassadors should discuss the matter further with Mr. Molotov in Moscow. Mr. Molotov agreed with the proposal of Mr. Stettinius.

XI. SOUTHEASTERN EUROPE

The British delegation put in note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ir colleagues o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a) The Control Commission in Bulgaria.

(b) Greek claims upon Bulgaria, more particularly with reference to reparations.

(c) Oil equipment in Rumania.

XII. IRAN

Mr. Eden, Mr. Stettinius and Mr. Molotov exchanged views on the situation in Iran. It was agreed that this matter should be pursued through the diplomatic channel.

[Begin third section published Feb. 13, 1945.]

XIII. MEETINGS OF THE THREE FOREIGN SECRETARIES

The conference agreed that permanent machinery should be set up for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three Foreign Secretaries; they should meet as often as necessary, probably about every three or four months.

These meetings will be held in rotation in the three capitals, the first meeting being held in London.

[End third section published Feb. 13, 1945.]

XIV. THE MONTREAUX CONVENTION AND THE STRAITS

It was agreed that at the next meeting of the three Foreign Secretaries to be held in London, they should consider proposals which it was understood the Soviet Government would put forward in relation to the Montreaux Convention, and report to their Governments. The Turkish Government should be informed at the appropriate moment.

The forgoing protocol was approved and signed by the three Foreign Secretaries at the Crimean Conference Feb. 11, 1945.

E. R. Stettinius Jr.

M. Molotov

Anthony Eden

AGREEMENT REGARDING JAPAN

The leaders of the three great powers - the Soviet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Great Britain - have agreed that in two or three months after Germany has surrendered and the war in Europe is terminated, the Soviet Union shall enter into war against Japan on the side of the Allies on condition that:

1. The status quo in Outer Mongolia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shall be preserved.

2. The former rights of Russia violated by the treacherous attack of Japan in 1904 shall be restored, viz.:

(a) The southern part of Sakhalin as well as the islands adjacent to it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Soviet Union;

(b) The commercial port of Dairen shall be internationalized, the pre-eminent interest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is port being safeguarded, and the lease of Port Arthur as a naval base of the U.S.S.R. restored;

(c) The Chinese-Eastern Railroad and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road, which provide an outlet to Dairen, shall be jointly operat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joint Soviet-Chinese company, it being understood that the pre-eminent interests of the Soviet Union shall be safeguarded and that China shall retain sovereignty in Manchuria;

3. The Kurile Islands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the Soviet Union.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agreement concerning Outer Mongolia and the ports and railroads referred to above will require concurrence of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The President will take measur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is concurrence on advice from Marshal Stalin.

The heads of the three great powers have agreed that these claims of the Soviet Union shall be unquestionably fulfilled after Japan has been defeated.

For its part, the Soviet Union expresses it readiness to conclude wit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a pact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between the U.S.S.R. and China in order to render assistance to China with its armed forces for the purpose of liberating China from the Japanese yoke.

Joseph Stalin

Franklin D. Roosevelt

Winston S. Churchill

February 11, 1945

。。。。。。。。。。。。。。。。。。。。。。。。。。。。。。。。
。。。。。。。。。。。。。。。。。。。。。。。。

。。。。。。。。。。。。。。。。。。。。。。。。。。。。

中文译文

雅尔塔会议

【另请参阅： 与在苏联指挥下的部队和在美国指挥下的部队解放的战俘和平民有关的协定；1945年2月11日】

1945年2月

华盛顿，3月24日-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元帅之间达成的协议文本

美国国务院今天发布的内容如下：

克里米亚会议纪要

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美利坚合众国，英国联合王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首脑克里米亚会议得出以下结论：

一。世界组织

决定：

1.召集一次关于拟议的世界组织的联合国会议，于1945年4月25日星期三举行，并应在美利坚合众国举行。

2.应邀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家应为：

（a）1945年2月8日成立的联合国；和

（b）于1945年3月1日之前向共同敌人宣战的相关国。（为此，“相关国家”一词是指八个相关国和土耳其）举行期间，英国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将支持一项提议，接纳乌克兰和白俄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原会员国。

3.美国政府代表三国应就本次会议上就拟议的世界组织作出的决定与中国政府和法国临时政府进行磋商。

4.将发给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所有国家的邀请文本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本国政府，英国联合王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民国政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邀请贵政府派代表参加将于1945年4月25日或之后不久在美利坚合众国旧金山举行的会议，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般国际组织起草宪章。

“上述政府建议，会议认为，关于建立一个一般国际组织的建议是该《宪章》的基础，该建议是去年十月在敦巴顿奥克斯会议上公布的，现已得到

补充。第六章C节的下列规定为：

C.投票

“ 1.安全理事会每个理事国应有一票。

“ 2.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事项的决定应以七名成员的赞成票作出。

“ 3.安全理事会关于所有事项的决定应以七名理事国的赞成票作出，包括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但在第八章A节和第1款第二句的决定中，在第八章C节中，争端当事方应放弃投票权。”

“有关安排的更多信息将随后发送。

“如果——有国家政府希望在会议之前提出有关提案的意见或评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将很高兴将这些意见和评论转达给大会其他参加国政府。”

区域托管：

商定，将在安全理事会具有常任理事国的五个国家，在联合国关于领土托管问题的会议之前，应相互协商。

接受这项建议的前提是要明确指出，领土托管将仅适用于

（a）国际联盟的现有任务；

（b）由于这次战争而与敌人脱离的领土；

（c）可能自愿置于托管之下的任何其他领土；和

（d）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或在初步协商中，不打算讨论实际领土托管问题。关于将上述类别的领土置于托管之下，是事后协定的问题。

二。欧洲自由宣言

以下声明已获批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元首，英国联合王国首相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已经为各自国家人民和欧洲自由人民的共同利益进行了磋商。他们共同宣布同意在解放后的欧洲不稳定时期协调一致行动，其三个政府的政策将协助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解放的人民和前欧洲轴心国的欧洲人民通过民主

手段解决问题，包括他们紧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在欧洲建立秩序和重建国民经济生活必须通过各种进程来实现，这些进程将使解放的人民能够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遗迹，并建立自己选择的民主体制。这是《大西洋宪章》的一项原则——所有人有权选择他们将生活在其中的政府形式的权利，——为那些被侵略国强行剥夺了权利的人民恢复其主权和自治权。

为了营造被解放的人民行使这些权利的条件，三国政府将共同协助欧洲任何被解放的国家或欧洲前轴心国的人民；这些国家根据其判断条件要求，

（a）建立内部和平的条件；

（b）采取紧急救济措施以救济受困人民；

（c）组成临时政府当局，广泛代表人口中的所有民主成分，并承诺通过响应人民意愿的政府自由选举方式，尽早建立政府；和

（d）在必要时为举行此类选举提供便利。

三国政府在审议与它们直接有关的问题时，将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和临时当局或欧洲其他国家政府进行磋商。

三国政府认为，任何欧洲解放国或欧洲前轴心国之卫星国家的状况使采取

这种行动成为必要时，它们将立即就履行由于该宣言所规定的共同责任而需要采取之措施进行磋商。

通过这项宣言，我们重申对《大西洋宪章》原则的信念，我们对《联合国宣言》的保证，以及我们决心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合作，致力于依法建立和平，安全，自由的世界秩序，和促进全人类的福祉。

三国在发表这项声明时希望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可以在建议的程序中与它们联系在一起。

三。关于德国的分解安排

商定，德国的投降条款第12（a）条应修改如下：

“英国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对德国拥有最高权力。在行使这种权力时，他们将采取这样的步骤，包括为了未来和平与安全，对于德国进行必要的分解安排。”

关于分解德国程序安排的研究已转交给一个由安东尼·伊顿， 约翰·温南，费多（Fedor T. Gusev）先生组成的委员会。该机构将考虑与相关法国代表联系。

四。关于德国占领区控制委员会，以及法国在德国的占领控制区。

商定，一个将由法国军队占领的德国地区，会被分配给法国。该地区将出自英美在德国的当前占领地区；其范围将由英美与法国临时政府协商后确定。

还同意应邀请法国临时政府成为德国联合控制委员会的成员。

五。赔偿

以下协议已获批准：

协议

在克里米亚会议上，三国政府首脑之间就德国实物赔偿问题进行的会谈

1. 德国必须以实物赔偿战争期间德国对盟国造成的损失。那些承担战争主要负担，遭受最重损失并组织起来战胜敌人的国家将首先获得赔偿。

2.实物赔偿应从德国以下列三种形式提供：

（a）在德国投降后两年内，或在德国本国以及其境外的德国国民停止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两年内，相关德国物资（设备，机床，船舶，机车车辆，德国海外投资，德国工业、运输和其他企业的股份等）将被搬迁、移除；这些搬迁主要是为了摧毁德国的战争潜力。

（b）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从德国经济产出中，交付一定的货物。

（c）使用德国劳工。

3.为了根据上述原则制定详细的德国赔偿计划，将在莫斯科成立一个联合赔偿委员会。它将由三名代表组成：一位来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位来自英国联合王国，一位来自美利坚合众国。

4.关于赔偿总额的确定及其在德国所侵略国家之间的分配，苏美两国代表团同意如下：

“莫斯科赔偿委员会应以其初步研究为基础，讨论苏联政府的建议，即按照第2款（a）和（b）点的赔偿总额应为220亿美元。百分之五十应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

英国代表团认为，在莫斯科赔偿委员会审议赔偿问题之前，不应提及赔偿

数字。

上述苏维埃－美国提议已作为该委员会要审议的提议之一，已转交给莫斯科赔偿委员会。

六。主要战争罪犯

会议商定，会议结束后应在适当时候由三国外长就主要战犯的问题进行研究与报告。

七。波兰

会议同意以下关于波兰的宣言：

“由于苏联红军的全面解放，波兰面临着新的局面。这要求建立一个波兰临时政府；其基础应当比最近解放波兰西部之前的基础更广泛。因此，现在在波兰运作的临时政府应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重组，应当包括来自波兰本国和国外波兰人的民主领导人；所以，这个新政府应称为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

“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拉克・科尔先生被授权作为委员会成员，在莫斯科与现任波兰临时政府成员、以及来自波兰国内和国外的其他波兰民主领导人进行首次协商，以期根据上述方针，进行现任政府改组。这个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应保证，在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尽快举行自由和不受束缚的选举。反纳粹党派有权参加并提出候选人。

“按照上述规定适当地组成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之后，苏联政府（它现在与波兰现任临时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英国联合王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与这个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互派大使；这些大使将向各自的政府通报波兰的情况。

“三国政府首脑认为，波兰的东部边境应遵循柯尔松线，并在偏远的五到八公里的某些地区有利于波兰。他们认识到波兰必须在北部和西部方面获得大量土地；他们认为，应在这些相关土地问题上，适时寻求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的意见，此后，对波兰西部边境的最终划界应等待和平会议的通过。”

八。南斯拉夫

同意向铁托元帅和伊万・苏巴西奇博士推荐：

（a）铁托-苏巴西奇协定应立即生效，并在该协定的基础上组建新政府。

（b）新政府成立后，应宣布：

（I）扩大民族解放反法西斯联盟议会（AVNOJ）的成员，包括最近的南斯拉夫Skupstina的成员；这些成员在与敌人的合作中并未妥协；从而形成一个被称为临时议会的政治组织，并且，

（II）民族解放反法西斯议会（AVNOJ）通过的立法法案将由制宪议会随后批准；并且此声明应在会议公报上发布。

九。ITALO-YOGOSLAV边界，以及ITALO-奥地利边界

英国代表团就这些问题作了陈述记录，美国和苏联代表团同意对它们进行审议，并在以后发表意见。

十。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的关系

外长之间就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同盟协定的合意性问题交换了意见。有争议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允许一个仍处于休战状态的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缔结同盟条约。伊顿先生建议，应告知保加利亚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这个同盟协定是不可接受的。斯蒂纽斯先生建议，英美大使与莫洛托夫先生在莫斯科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先生同意斯蒂纽斯先生的建议。

十一。东南欧洲

英国代表团就以下主题作了陈述记录，以供其同事们审议：

（a）保加利亚控制委员会。

（b）希腊对保加利亚的债权，特别是在赔偿方面。

（c）罗马尼亚的石油设备。

十二。伊朗

伊顿先生，斯蒂纽斯先生和莫洛托夫先生就伊朗局势交换了意见。商定应通过外交途径处理此事。

十三。三方外长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应设立常设机构，以使得三方外长可以经常讨论和交换意见；他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开会，大概每三四个月开会一次。

这些会议将在三国首都轮流举行，第一次会议在伦敦举行。

十四。蒙特雷公约和海峡

商定，在即将于伦敦举行的三国外长的下一次会议上，他们应考虑苏联政府将就《蒙特雷公约》提出的建议，并向其各自政府报告。应在适当时候告知土耳其政府。

1945年2月11日，三国外长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批准并签署了上述议定书。

ER Stettinius Jr.

M. Molotov

Anthony Eden

关于日本的协定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这三个大国的领导人同意，在德国投降并终止欧洲战争后的两三个月内，苏联将对日发动战争；其条件是：

1.应保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

2.应对苏联恢复1904年日本袭击侵犯俄罗斯以前的权利，即：

（a）萨哈林岛的南部及其附近的岛屿应返回苏联；

（b）大连商业港口应实现国际化，维护苏联在该港口的主要利益，并恢复作为苏联海军基地的旅顺港的租赁；

（c）通向大连出海口的中国东部铁路和南满铁路，应通过建立苏中联合公司来共同经营，但应理解，苏俄的主要利益应受到维护，而中国应保留对满洲的主权；

3.千岛群岛应移交给苏联。

上文中，有关外蒙古，以及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议，将需要通过蒋介石将军的同意。美国总统将根据斯大林元帅的建议采取措施，以保持这一共识。

三国首脑一致认为，在日本战败后，对苏联的这些要求无疑将得到实现。

苏联方面表示愿意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和同盟协定，以便以其武装力量向中国提供援助，以将中国从日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约瑟夫·斯大林

富兰克林·罗斯福

温斯顿·丘吉尔

1945年2月11日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tsdam_Conference

波茨坦会议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英美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克莱门特・艾德礼，以及哈里•杜鲁门总统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他们聚集在一起决定如何管理德国；九周前的5月8日（欧洲胜利日），德国已经同意无条件投降。会议的目标还包括建立战后秩序、和平条约问题以及应对战争的影响。

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 Byrnes），莫洛夫（VM Molotov）和安东

尼·伊顿（Anthony Eden）以及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这三个政府的外长以及其他顾问也参加了会议。

从7月17日到7月25日，共举行了9次会议。此后，由于宣布英国大选的结果，会议被中断了两天。到7月28日，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击败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并取代他担任英国政府代表，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厄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取代了安东尼·伊顿（Anthony Eden）。

随后进行了四天的进一步讨论。在会议期间，三位政府首脑与三国外长举行了会议，而且外长们还单独举行了会议。外长们任命的委员会事先审议了问题，每天也开会，就许多其他问题达成了重要的决定和协议，并交换了意见。会议随后成立的外长会议继续审议这些事项。会议结束时，由于三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牢固。这再次使人们相信，它们将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一起确保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的五个月中，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极大地影响了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苏联占领了中欧和东欧，红军有效控制了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难民从这些国家逃离。斯大林在波兰成立了一个傀儡共产主义政府，坚称他对东欧的控制是对未来可能袭击的防御措施，并声称这是苏联势力的合法范围。

温斯顿•丘吉尔（Warston Churchill）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中担任英国首相，但在会议期间将由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接任英国首相。丘吉尔政府自1940年代初以来就实行的针对苏联政策，与罗斯福的相应政策大相径庭；丘吉尔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恶魔”般的暴君，领导着一个邪恶的制度。

1945年7月5日英国举行了大选；但其结果延后发布，以使英国武装部队人员的投票在他们各自家庭住址的选区被计数。会议期间，当艾德礼（Attlee）成为新首相时，结果就广为人知。

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当时美国副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继任总统；此时，VE Day（欧洲胜利日）在一个月之内就将要发生，而VJ Day（日本战败日）也已经近在眼前。

战争期间，为了维持盟军的团结，罗斯福刻意忽视了针对斯大林在欧洲之恶劣掠夺性与危险性的警告。罗斯福说："我觉得斯大林不是那种人。。。。我认为，如果我能够满足斯大林的各项要求，而不求回报，那么，斯大林会因他自己的荣誉感，而不会在欧洲侵夺任何国家的领土，并会与我合作，一同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与民主的世界。"

杜鲁门密切关注盟军的战争进程。乔治·伦佐夫斯基（George Lenczowski）指出："尽管他相对谦卑的背景与其前任的国际魅力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杜鲁门却有勇气和决心扭转那些他认为幼稚和危险的政策；那些政策往往是出于战争的某些具体要求而临时决定立即采取的，并且经常仅仅是临时的、没有长远规划的、行动和解决方案。"

随着战争的结束，盟国团结统一的优先重要性，被两个新兴超级大国彼此之间关系的挑战性所取代。美苏两个大国继续向公众描绘互相之间的亲切关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存有很多猜疑和不信任。

杜鲁门比罗斯福对苏联人的怀疑要多得多，对斯大林的意图也越来越怀

疑。杜鲁门和他的顾问将苏联在东欧的行动视为侵略性扩张主义；苏联的这种扩张主义行为，与斯大林二月份在雅尔塔承诺的协议不符。此外，当斯大林反对丘吉尔提出的、关于按照在德黑兰会议上商定的时间表撤退盟军的提议时，杜鲁门意识到，在与苏联之间，很多地方都可能存在的麻烦。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是唯一首次见到斯大林的人。

在雅尔塔会议上，法国被给予德国境内的占领区。法国是“柏林宣言”的参与者，并且是盟军控制委员会的平等成员。然而，在美国人的坚持下，戴高乐没有被邀请到波茨坦，就像他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雅尔塔会议一样。外交上的轻视使他产生了深深而持久的不满情绪。其中的原因包括罗斯福和戴高乐之间长期的个人对立，以及法国和美国关于德国占领区的持续争执，还有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预期利益的冲突。这也反映了英美两国的判断，即法国在会议议程上的许多项目的目标很可能与英美商定的目标相抵触。

协议

会议结束时，三位政府首脑就以下行动达成了一致。所有其他问题都将由最终召集的和平会议解决。

德国

盟军宣告占领德国的目标：非军事化，铲除纳粹化，民主化，权力下放，拆解，反垄断主义。更具体地讲，为达到德国的非军事化和裁军的目的，盟军将解散德国的相关军事武装部队、盖世太保、空军、陆军和海军、以

及所有负责军事运转的相关德国机构和组织。关于德国的民主化，美英苏认为，摧毁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盟国将禁止所有纳粹活动，并为在德国重建民主政治生活做准备。

所有纳粹法律将被废除。这些法律建立了基于种族、信仰和政治见解的系统化歧视体系，因此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接受的。

按照雅尔塔原则上达成的协议，德国和奥地利都将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同样，首都柏林和维也纳也将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

纳粹战犯将被审判。具体来说，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政府试图就战争罪犯的审判方法达成协议；针对这些罪犯的审判，将根据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宣言》所定义的罪行进行审理，不受地域限制。同时，领导人同意，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代表将要在伦敦进行为期数周的讨论。他们的目的是尽快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并最终昭示天下。首批被告名单将于9月1日之前公布。美英苏领导人的目标是，伦敦谈判将取得积极成果，并得到一项协议的确认（该协议于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签署）。

战争期间德国在欧洲吞并的所有土地都将被扭转、归还，包括苏台德地区，阿尔萨斯-洛林，奥地利和波兰的西部地区等。

德国的东部边界将向西移至奥德–尼西线，有效地将德国的面积从其1937年边界减少约25％。新边界以东的地区是东普鲁士，西里西亚，西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的三分之二。这些地区主要是农业地区；上西里西亚除外；上西里西亚是德国重工业的第二大中心。

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但不是南斯拉夫）地区，对仍住在德国新的东部边界以外的德国人进行“有序和人道的”驱逐。

在德国，担任政府职务并反对战后盟军目标的纳粹党成员将被免职。他们将被那些基于其政治和道德信仰而支持民主制度的人所取代。

在德国，司法制度将根据法律上平等和正义的民主理想进行重组。

为了消除法西斯主义和发展民主观念，德国的教育制度将受到控制。

盟国鼓励德国拥有集会和公开讨论权的民主党派。

言论，新闻，宗教和宗教机构的自由应得到尊重。也应允许建立自由工会。

商定了从德国占领区（东部地区）对苏联进行的战争赔偿。除了这些赔偿外，苏联还将从西部占领区获得赔偿，但必须放弃对位于西部地区的德国工业的所有要求。具体来说，将把由冶金，化学和机械制造行业组成的15％的可用工业资本设备从德国西部地区运出、交付给苏联，以换取德国东部地区的、一定数量的食品，煤炭，钾盐，锌，木材，粘土和石油产品等、从德国东部运给德国西部。苏联承担了在五年之内从东部地区转移产品的责任。此外，超出德国和平经济所需之外的、西部地区的工业能力的10％将在两年内转移给苏联，而苏联没有义务再付出任何形式的回报。苏联答应从自己的所获赔偿中解决波兰的赔偿要求。斯大林提议接受波兰的意见，将波兰排除在德国赔偿范围之外，然后苏联再把其所获赔偿之15％给予波兰。苏联没有对盟军在德国捕获的黄金提出任何要求。

大会得出结论，有必要对战败的德国海军和商船的处置和未来使用设定限制。美国，英国和苏联政府决定，他们将指派专家进行合作，以促成三国政府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并宣布的原则。

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赔偿将从其自己的占领区收取，赔偿金额将在六个月内确定。美国和英国将放弃对位于占领区东部的德国工业以及在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东欧的德国外国资产的所有债权。为满足赔偿要求，从西部地区撤出工业设备的工作将在确定赔偿后的两年内完成。盟军控制委员会将根据盟军委员会制定的政策并在法国的参与下确定那些设备。

要防止德国的生活水平超过欧洲平均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要拆除的工业的类型和数量将在以后确定。

德国工业战争的潜力将被所有具有军事潜力的工业的破坏或控制所摧毁。为此，所有民用造船厂和飞机厂将被拆除或以其他方式销毁。与战争可能性有关的所有生产能力，例如金属，化学制品或机械的制造，都将降低到最低水平，这将由联合控制委员会确定。如此制造的“剩余”生产能力将作为赔偿被拆除或以其他方式销毁。所有的研究和国际贸易都将受到控制。经济将被去中心化（去垄断化）、并进行重组，其主要重点是农业和和平的国内工业。1946年初，就后者的细节达成了协议：德国将转变为拥有农业和轻工业的经济体。德国的出口将是煤炭，啤酒，玩具，纺织品等，它们将取代重工业产品，后者是战前德国大部分出口产品。

法国因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拒绝在其占领区执行波茨坦协定。特别是法国人拒绝安置任何从东方驱逐的德国人。此外，法国在联合控制委员会的议事程序中不承担遵守波茨坦协定的任何义务；尤其是，他们保留阻止一切在整个德国建立共同政策和机构的提议以及任何可能导致德国统一政府最终兴起的权利。

奥地利

苏联提议将卡尔·雷纳（Karl Renner）临时政府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奥地

利。英美军队进入维也纳后，盟国同意审查该提议。

波兰

美英苏三巨头对苏联控制的波兰临时政府的承认，实际上意味着对被称为伦敦波兰人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的结束。

英美两国政府采取了措施，以使波兰临时政府拥有位于波兰领土上的财产，拥有该财产的所有合法权利，从而使其他任何政府都无法拥有它。

盟军决定，所有确实返回波兰的波兰人都将享有个人权利和财产权。

波兰临时政府同意，尽可能快地举行，基于普遍选举权和无记名投票的，自由的选举。民主政党和反纳粹党有权参加这些选举，盟军新闻界的代表将有充分的自由报道选举期间的事态发展。

苏联宣布将从自己所获的全部赔偿金中解决波兰的赔偿要求。

波兰临时的西部边界将是由奥得河和涅斯河划定的奥得河-涅西线。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的南部和前丹泽自由城将由波兰管理。但是，波兰西部边界的最终划界将等待和平解决（该解决直到45年后的1990年作为《关于德国的最后解决条约》实现）。

苏联向会议提议，在这些地区建立和平之后，应永久解决领土问题。更具体地说，该提案提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西部边界位于波罗的海附近的部分。该区域将从丹兹格湾的东岸向东，在布劳恩斯贝格和戈达普的北部，再到立陶宛，波兰共和国和东普鲁士边境的交汇点。

在会议审议了苏联的建议之后，会议商定将柯尼斯堡（Königsberg）市及其附近地区移交给苏联。

杜鲁门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保证，当和平最后达成时，他们将支持大会的决议。

意大利

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和《联合国宪章》的决定，向会议提出了有关意大利领土的提议。

在讨论了有关该问题的各种意见之后，各国同意，必须立即决定为意大利准备和平条约，并结合处置任何意大利前领土的决定。9月，外长会议将审议意大利领土的问题。

德国人口的有序转移

在会议上，盟国领导人确认了他们先前对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驱逐德国人的承诺；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生效。波茨坦的三个盟国坚信，应尽快完成对这些德国人口的转移。他们强调，转让应有序，人道地进行。

美英苏领导人决定由德国盟军控制委员会处理此事，优先考虑德国人在占领区之间的平均分配。控制委员会的代表将向他们的政府和每个地区政府报告已经从东部国家进入德国的人数。这些代表还将对转移的未来速度做出估计，重点是德国的人员接纳能力。

东欧国家政府已获悉进一步转移的方法，并被要求暂时中止驱逐，直到联合控制委员会报告为止。美英苏对控制委员会的报告感到关切，因此，他们将对此事进行审查。

经修订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联合控制委员会程序。

美英苏注意到，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位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盟军控制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已向英国和美国同事传达了改善控制委员会工作的建议。三位领导人在考虑到本国政府的利益和责任的情况下，同意修改这些国家的委员会程序，共同向被占领国提出了停战协议。

外交部长理事会

大会商定建立一个代表五个主要大国的外交部长理事会，继续进行和平解决的基本准备工作，并承担其他事项。所涉理事会的设立与克里米亚会议【雅尔塔会议】的协议不矛盾，即三个政府的外长之间应举行定期会议。根据建立理事会的协定的案文，作出以下决定：

1.应该建立一个由英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法国和美国组成的外长理事会。

2.（I）理事会应在伦敦开会并组成联合秘书处。每位外交部长将由一名高级副手陪同，并由一小组技术顾问组成；高级副手经适当授权可在其外交部长不在的情况下继续安理会的工作。（II）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应不迟于1945年9月1日在伦敦举行。会议也可以根据共同协议在其他首都举行。

3.（I）应当授权理事会向联合国起草：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平条约；并向联合国提出建议，解决战后欧洲的相关领土协议问题。理事会还应为建立德国的和平解决方案作准备；在适当的德国政府建立以后，此和平协议将得到德国政府的同意。（II）为完成先前的任务，理事会将由受降国家政府的成员组成。

4.（I）当理事会讨论的任何问题涉及到某特定国家的时候，该国政府可以派代表参加讨论。（II）理事会将能够使其程序适应所审议的特定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在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之前进行其初步讨论。根据大会的决定，美英苏分别向中国和法国政府发出邀请，通过该案文并加入建立理事会的行列。

缔结和平条约并促进加入联合国

会议同意采用共同政策，尽早确定和平条件。

总的来说，美英苏三巨头希望意大利，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在谈判结束前得到解决。他们相信其他盟国也同意他们的观点。

由于意大利的处境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需要新的外交部长理事会予以注意；美英苏这三个政府特别关心与她缔结和平条约，特别是因为意大利是轴心国第一个与德国决裂并参加盟军对日作战的国家。

意大利在获得自由和拒绝以前的法西斯政权方面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并为重建民主政府铺平了道路。如果意大利拥有公认的民主政府，那么美国，英国和苏联将更容易支持意大利加入联合国。

会议还要求外交部长理事会审查并准备确定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平条约。若与在这四个国家的、被认可的、民主政府缔结和平条约，那么，这将会促使美英苏可以接受该四个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要求。而且，在和平谈判结束之后，美英苏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会研究恢复与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外交关系。美英苏确信，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局势，同盟国新闻界的代表将在这四个国家享

有新闻言论自由。

《联合国宪章》第4条规定：

1.联合国会员国身份，对所有接受本宪章所载义务并根据该组织的判断有能力并愿意履行这些义务的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开放；

2.联合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决定接纳任何一个这样的国家加入联合国。

美英苏领导人宣布，他们愿意支持战争期间保持中立的任何国家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要求，也满足了一些其它国家的要求。美英苏认为有必要明确表示，他们不愿支持在轴心国支持下成立的西班牙政府申请加入成员的资格。

波茨坦宣言

除《波茨坦协定》外，7月26日，丘吉尔、杜鲁门和蒋介石（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苏联此时尚未对日本宣战）发布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

后果

杜鲁门在会议期间向斯大林提到了一种未指定的“强大的新武器”。在会议结束时，即7月26日，《波茨坦宣言》给了日本最后通牒，无条件投降或遭遇“迅速彻底毁灭”；它没有提及新炸弹，但承诺“无意奴役日本”。苏联未参与该声明，因为它在对日战争中仍然是中立的。日本首相铃没有回应，这被解释为日本帝国无视最后通牒的迹象。结果，美国于1945年8月6日在

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于8月9日在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所使用的理由是，两个城市都是合法的军事目标，必须迅速结束战争并保存美国人的生命。

杜鲁门向斯大林通报有关原子弹之事时，他说美国"拥有一种具有异常破坏力的新武器"，但斯大林却从曼哈顿计划内部的苏联间谍网络充分了解了原子弹的发展；他在会议上告诉杜鲁门，他希望杜鲁门"将对日本人充分利用它"。

苏联把东欧和中欧的几个国家变成自己的卫星国，如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都见证了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

波茨坦会议以前的主要会议

1945年2月4日至11日，雅尔塔会议

1944年9月12日至16日，第二届魁北克会议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德黑兰会议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开罗会议

1943年1月14日至24日，卡萨布兰卡会议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plomatic_history_of_World_War_II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外交史

二战外交史包括，1939年和1945年之间的同盟国和轴心国内部以及互动之中的重大外交政策历史。

盟国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导致英法对纳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开始形成。英联邦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与英国一起（但没有其他国家）加入了对德宣战。英法最高军事委员会（SWC）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统筹军事战略。它一直持续到1940年6月德国成功入侵法国为止。英国及其盟国继续与德国作战。

第一次同盟国会议于1941年6月上旬在伦敦举行，包括：英国，四个共同作战的英国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八个流亡政府（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

夫），和自由法国。

苏联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就已经与德国合作；它在盟军与德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1941年六月下旬后，苏联由于被德国侵略，因而也加入同盟国。

美国一直向盟国提供战争物资和金钱；并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正式加入盟军。

自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以来，中国就一直在与日本进行长期战争，并于1941年12月正式加入盟军。

大联盟

美国，英国和苏联组成了“三大联盟”。他们通过大使，高级将领，外交大臣和美国使节（Harry Hopkins）等特使经常接触。三者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决定性的战争努力，并为战后世界的安排计划作出了重大决定。

英美之间的合作特别紧密，包括组建参谋长联席会议。

有许多高级别的会议。丘吉尔总共参加了14次会议，罗斯福参加了12次，斯大林参加了5次。最明显的是美英苏三次首脑会议，将三位最高领导人汇集在一起。在这三个会议上，盟军对德国和日本的政策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欧洲优先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后不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略要素达成了共识。根据这项政策，美国和英国将利用其资源优势首先

在欧洲征服纳粹德国。同时，他们将使用相对较少的资源，对太平洋地区的日本进行遏制行动和有限的进攻。当被认为对英国和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德国战败后，所有盟军都可以集中力量对抗日本。

整个战争期间，“欧洲优先”的政策一直有效；但是，在针对日本的具体战争行动中，在“遏制行动”和“有限进攻”之间的区别究竟在于什么其实并不清楚；盟军领导人以及高级军事将领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应用、灵活掌握。在阿卡迪亚，美国同意将轰炸机部署到英格兰的基地；英国同意加强其在太平洋的力量。英国拒绝了美国在1942年“自杀性地”入侵北欧的提议。丘吉尔反而强调，应当于1942年在法属北非登陆。在罗斯福的支持下，英美于1942年7月计划，当年晚些时候开展“火炬行动”。

尽管如此，正是太平洋的战略局势和相关的后勤要求，主导了美国在战争爆发后的行动，并导致人们最初将注意力集中在太平洋上。到1944年和1945年，随着“欧洲优先”战略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既定目标，美国的资源平衡已严重转移到欧洲战场。即使在战争的后期，随着欧洲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战区行动的扩大，两个战区之间对资源的竞争也很激烈。

德黑兰会议

在1943年10月至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作了准备之后，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巨头的第一次会议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伊朗的德黑兰会议上举行。会议同意1944年入侵法国（开辟对德“第二战线”）；并开始考虑处理有关土耳其，伊朗，临时南斯拉夫的事务，以及关于对日战争、战后局势安排等问题。

雅尔塔会议

雅尔塔会议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地区召开。会议专注于战后的欧洲各国边界问题。此时苏联已经控制了波兰。波兰的新边界尤其重要；斯大林还寻求控制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波兰将获得德国的部分领土。斯大林承诺，在他所控制的波兰临时政府的主持下，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在罗斯福的强烈敦促下，斯大林同意在德国战败三个月后对日本发动战争。双方商定，苏联将是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将是联合国会员国，但其他12个苏维埃共和国则不是。德国将被划分为三个占领区，法国也将获得一个占领区。在一项备受争议的决定中，所有平民将被遣返。

波茨坦会议

波茨坦会议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召开。斯大林相继会见了美国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和两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克莱门特・艾德礼。会议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并最终确定关于联合控制委员会占领和控制德国的安排。根据先前在雅尔塔达成的基本协议，会议讨论了其他被占领国的地位。

联合国

盟国于1942年1月正式公布联合国《宣言》。四大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向轴心国宣战、与盟国并肩作战的国家，共同加入了联合

国。

敦巴顿橡树会议

在敦巴顿奥克斯会议上（正式名称为，华盛顿国际和平与安全组织对话会），美国和英国代表团首先会见了苏联代表团，然后会见了中华民国代表团。他们审议了关于建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取代无效的国际联盟的提议。会议于1944年8月21日至1944年10月7日在敦巴顿奥克斯举行。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对这些原则的审议和拟定。

旧金山会议

1945年4月25日至1945年6月26日，50个公约盟国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开会。四个提案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邀请了其他国家参会；这四个提案国的代表团团长轮流担任全体会议主席。在该公约会议上，代表们审议并重塑了《敦巴顿橡树协定》。

该公约促成了《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该宪章于6月26日开放供签署。

英国–美国关系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在战争中都偏爱英国，但在美国，人们普遍反对美国对欧洲事务进行军事干预。不过，罗斯福总统的租借政策仍然使得英国和法国可以从美国得到弹药。

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1年8月起草了《大西洋宪章》。

丘吉尔长期以来一直对德国提出警告，并要求重整英军；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彻底瓦解、并且英国无法扭转德国对挪威的入侵之后，丘吉尔就任首相。1940年4月，法国沦陷后，罗斯福向英国提供了美国参战以外的所有可能援助。

根据1940年9月的英美“驱逐舰换基地”协议，美国得以租借英属大西洋战略性基地，为期99年；作为交换，英国皇家海军从美国得到50艘驱逐舰，并以此在大西洋海战中对抗德国U型潜艇。

罗斯福还出售（以现金形式）大量武器弹药给英国，由英国船支从美国港口带走；包括超过50万支步枪，85,000挺机枪，25,000支自动步枪，迫击炮，数百门野战枪以及必要的弹药。1940年6月敦刻尔克撤离时，英国需要这些武器弹药来重新装备那些失去了全部武器的撤退英军士兵【他们在紧迫的敦刻尔克撤退过程中，不得不把武器弹药装备都遗弃在敦刻尔克】。

从1941年3月开始，美国颁布了Lend-Lease协议，向盟军发送坦克，战机，弹药，弹药，食品和医疗用品。在向盟军提供的501亿美元物资中，英国获得了314亿美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不是贷款，也不涉及还款。

战争期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军人驻扎在英国，这导致了美军士兵与英国男人的一定程度的摩擦，以及，许多美国士兵与英国女人的婚姻。1945年，丘吉尔派出一支英国舰队，以帮助美国进攻和侵略日本。

卡萨布兰卡会议

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联合作战人员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他们决定了1943年欧洲盟军的主要战略，尤其是意大利的入侵登陆和法国的入侵登陆计划。在罗斯福的建议下，他们同意了“无条件投

降”的政策。这项政策提高了盟军的士气，但也使纳粹决心奋斗到最后。罗斯福还试图在两个主要法国盟友，法国北非高级专员亨利·吉罗（Henri Giraud）和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之间建立合作工作关系。

英国

英国于1939年8月签署英国-波兰军事同盟后，于1939年9月对德国宣战。该宣言包括英国在各处直接控制的王室殖民地和印度；这些政权在外交政策上是独立的，尽管它们都是在英国宣战后立即或在宣战后的几天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在1940年6月法国大败之后，英国及其帝国独自对抗德国，直到1941年6月为止。美国从1940年开始就提供了强有力的外交、财政和物质支持，尤其是通过1941年开始的借贷。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并商定了《大西洋宪章》，其中宣布“应尊重所有人民选择其所居住的政府形式的权利”。这个措词是模棱两可的；英国人，美国人和民族主义运动者们将对此作出不同的解释。

从1941年12月开始，日本占领了英国在亚洲的属地，包括香港，马来亚，尤其是新加坡的主要基地，并进军缅甸，向印度进发。丘吉尔对美国参战的反应是，英国现在获得了胜利的保证，帝国的前途是安全的，但是迅速的失败不可逆转地损害了英国作为帝国大国的地位和威望。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认识到英国无法捍卫他们，因而，这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美国建立了永久的紧密联系。

印度

美国主张，应当使印度获得独立；美国的这个要求，使得英美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丘吉尔强烈反对美国这一主张。多年来，罗斯福一直鼓励英国

从印度脱离。美国的立场是基于——对殖民主义的原则性反对，对战争结果的实际关注，以及对美国在后殖民时代扮演重要角色的期望。但是，在1942年印度国大党发起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运动时，英国当局立即逮捕了包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在内的数以万计的激进分子，并将其囚禁至1945年。与此同时，印度成为美国援助中国的主要渠道基地。丘吉尔扬言，如果罗斯福在印度独立方面过于努力，丘吉尔将辞职，因此罗斯福退缩了。

英国和法国

1939年春，英法两国正式宣布，将共同捍卫波兰的领土主权完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不相信他们会在如此遥不可及、毫无希望的事业中卷入战斗；希特勒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英法两国于1939年9月3日宣战，但他们无法做什么实际的事情帮助波兰。英法成立了最高军事委员会（SWC），负责统筹联合军事战略。

针对苏联的冬季战争的计划

苏联于1939年11月对芬兰发动了冬季战争。芬兰人对庞大的苏联军队进行了出色的防御。无故的入侵激起了芬兰民众和精英阶层的广泛愤慨；不仅在战时状态中的英国和法国，而且在中立状态中的美国，都支持芬兰。

国际联盟宣布苏联为侵略者并将其驱逐出国联。“美国舆论界人士将对芬兰的袭击视为值得每天当作头条的、卑鄙的侵略；此后美国加剧了对俄罗斯的恶感。”

英国和法国的精英意见转而赞成军事干预政策。主要倡导者是时任皇家海

军统帅的温斯顿·丘吉尔（Royal Royal），以及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

当时在欧洲大陆上发生了一场军事与外交政策上的僵局状态，称为"虚假战争"；在伦敦和巴黎的、最高的文职、军事和外交层面，进行了几个月的反复规划，经历了多次逆转和深刻分歧。最后，英法两国商定了一项计划，其中涉及对中立的挪威，瑞典，冰岛和丹麦的法罗群岛进行入侵，其目标主要是破坏德国的战争经济，并协助芬兰与苏联进行战争。此时，英法盟军针对苏联的战争是该计划的一部分。

英法盟军的实际主要目标不是帮助芬兰，而是通过切断瑞典铁矿石的运输，以进行针对德国的经济战；他们认为这将严重削弱德国的战争工业。英国经济战部表示，针对挪威的计划可能会"对德国的工业产出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无论如何，对战争的延续时间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英法的想法是，将力量从在西方静态战场上的无所作为，转移到在新战线上的积极作用。12月，英国军方意识到，他们攻击德国石油供应的计划不会得到英国政府高层批准，而入侵挪威等地的计划将会得到英国政府高层强有力支持；因而，英国军方领导层也成为了入侵挪威计划的热情支持者。

苏军进攻芬兰人时的不佳表现，增强了英法盟军的信心，即，英法军人认为，入侵挪威等地、以及随后与俄罗斯的战争将是值得的。然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领导下的伦敦政府的文职领导层，撤回并推迟了入侵挪威计划。挪威等中立国拒绝合作。同时，芬兰终于被苏联大军胜过，不得不于1940年3月13日屈服于莫斯科；因而，英军的计划被推迟。

英军放弃了针对苏联的战争计划；其新的目标是沿着挪威海岸线设雷，以防止携带铁矿石的船只从挪威北部通过。

但是，英方有更多的延误；当埋雷措施最终于4月9日开始时，为时已晚；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德国人已经入侵了挪威，并且在挪威战役中占了上风。

德国入侵（1940年）

当德国于1940年5月开始对法国发动进攻时，英军和法军再次并肩作战，但法国很快战败。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英国皇家海军在敦刻尔克撤离中紧急疏散了198,000名英国士兵和14万法国士兵；并在仓促紧迫之中，不得不留下数以万计的坦克，卡车和大炮，以及所有的无线电，机枪，步枪，帐篷，零件和其他军事装备。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承诺，英国将继续为法国的自由而战，即使它必须单独这样做。在米尔斯克比尔港海战之后，英国承认自由法国为其盟友和法国的合法政府。

美国与维希法国【即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法国傀儡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直到1942年底），并避免承认戴高乐的地位；戴高乐宣称自己是法国的唯一政府。陷入美国和戴高乐之间的纷争的丘吉尔试图寻求两者之间的妥协。

英国和苏联

1941年7月签署了《英苏协定》，两国之间结成联盟。

1944年10月，丘吉尔和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伊顿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和他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他们讨论了，由谁来控制战后东欧的局势。他们同意，将控制希腊90％的影响力交给英国，将控制罗马尼亚90％的影响力交给苏联。苏联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控制影响力有

80％。苏联在南斯拉夫有50%的影响力；而在意大利则没有影响力。

中东

伊拉克

1939年，伊拉克是一个独立国家；英国在伊拉克有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其油田领域。

伊拉克与德国的关系破裂了，但其国内有强大的亲意大利的政治力量。1941年，伊拉克国内的亲意大利军官们，在拉希德·阿里的领导下，推翻了阿卜杜勒伊拉的摄政政权。但是，伊拉克的这个短命的、亲纳粹政府，在1941年5月被英军快速攻陷；伊拉克摄政王重新上台。

后来，伊拉克被盟军用作进攻法国维希政府在叙利亚属地的军事基地，以及支持英苏入侵伊朗的基地。

伊朗（波斯）

1939年，伊朗的独裁者是沙赫·雷扎·帕列维（Shah Reza Pahlevi）；他是一名军官，于1921年发动政变并称自己为“沙阿”。他是现代化主义者，对传统宗教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但与德国人合作。1939年二战开始时，伊朗宣布保持中立。1941年8月，英军和苏军占领了伊朗，推翻了国王，并成立了其儿子穆罕默德·里扎·莎拉·帕拉维（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所领导的伊朗政府。伊朗的农村人口为1300万，拥有大量的油井；伊朗是美国向苏联运送军事物资的主要路径。

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了《德黑兰宣

言》，并保证战后伊朗的独立和边界。

但是，当战争真正结束时，驻扎在伊朗西北部的苏军不仅拒绝撤军，而且还支持伊朗内部起义叛乱；1945年末，这些起义叛乱力量在阿塞拜疆和伊朗库尔德斯坦北部地区，分别建立了：短命的、亲苏的、分离主义民族国家，——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和库尔德斯坦共和国。

直到1946年5月，当苏联获得了伊朗石油特许权的承诺以后，苏维埃军队才从伊朗撤出。后来，伊朗北部的苏维埃共和国很快被推翻，苏联的石油特许权也被撤销。

澳大利亚

战争期间，澳大利亚感到被伦敦抛弃，并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在美国对日战争中发挥了支持作用。澳大利亚总理约翰·科廷（John Curtin）表示："我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对美国寄予厚望；但这不会对我们与英国的传统联系或血缘关系产生任何困扰。"

二战期间，由于日军攻击菲律宾，美国总统罗斯福命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将美国基地从菲律宾迁至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到1943年9月，已有超过12万名美国士兵驻在澳大利亚。美国人受到热烈欢迎，但也存在一些紧张局势。麦克阿瑟与澳大利亚政府密切合作，指挥了其作战行动。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战斗仍在继续。当欧洲战争宣告结束时，澳大利亚和美国仍然要继续对日本进行战争。麦克阿瑟指挥美国军队实行"跳岛"政策；同时他建议澳大利亚军队继续从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婆罗洲和布干维尔清除和包围日本人。

加拿大

1939年当德国侵略波兰之后、英法向德国宣战的时候，加拿大也加入英国、向德国宣战；加拿大的这种举措，引起了一些美国孤立主义者的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指责加拿大人说，加拿大的参战，仅仅是因为，对于加拿大而言，对于英格兰王室的偏爱，要比美洲独立性更加重要。

但是，大多数批评罗斯福援助英国的美国孤立主义者，都无法针对加拿大对于英国的援助提出同样的批评。当法国陷落于德国纳粹之手以后，在北美的人们开始愈来愈担心英国也可能会被德国攻陷。

1940年7月，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举行军事会议。1940年8月16日，两国签订《奥格登斯堡协定》；其中概述了北美国家相互防御的计划，以及常设防务联合委员会。起初，相互防御计划包括美国人在入侵事件中承担加拿大军队的指挥权；但是，随着1941年英国人的情况有所改善，修订后的国防计划使加拿大政府拒绝将其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美国人。

为了在加拿大北部建设必要的设施，战争期间有33,000名美军士兵和平民在该地区工作，以便建造阿拉斯加公路，Canol管道和用于往返苏联之飞机的军事简易机场。

美国在加拿大北部的庞大派驻机构引起了英国驻加拿大高级专员的关注；英国高级专员通知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有关美国在派驻机构对其主权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

1943年5月，加拿大政府任命了一名特别专员，以监督美国在加拿大北部的活动，并将其报告给渥太华。1943年12月，加拿大政府表示，将购买战争期间美国人在加拿大建造的所有军事设施，以防止美国人保留这些财产。

与英国和大英帝国联盟中的其他政权不同，加拿大一直与维希法国保持外

交关系，直到1942年11月。

加拿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人希望与法国维希政府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后来，当戴高乐从当地维希政权手中夺取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之后，加拿大政府卷入了一次自由法国人与美国之间的短暂外交事件。由于群岛位于纽芬兰沿海，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将自由法国人驱逐出该群岛；但加拿大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将其驱逐。直到1944年10月戴高乐对蒙特利尔的访问期间，加拿大政府才正式承认自由法国为合法的法国政府。

新西兰

随着英国宣战以后，新西兰在1939年宣布了对德国的战争宣言。新西兰工党政府在国际上对法西斯主义力量提出了批评，例如1935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入侵（第二次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

新西兰承担了保卫一些太平洋国家的责任，例如斐济（代表英国）。

南非

1939年9月战争爆发之初，南非议会以80票对67票对战争投了赞成票；赫尔佐格辞职后，伦敦对于南非将可能会听取其首相赫尔佐格（JBM Hertzog）的建议而保持中立的担忧得以缓解。

美国

罗斯福总统竭力避免重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覆辙。威尔逊曾呼吁在思想和行为上保持中立；而罗斯福则明确表示，他的

政府强烈支持英国和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向英国提供贷款不同，美国通过贷款租赁向盟国提供了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几乎没有偿还的希望）。威尔逊在一战中的美国宣战之前，并没有扩大与战争相关的工业生产。但是罗斯福却这样去做了。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关岛，维克岛，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和香港后，美国国会于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向日本宣战。罗斯福经常提到他在威尔逊政府中的角色；但他补充说，他从威尔逊的错误中学习到的功课，多于他从威尔逊的成功中所学习到的功课。

战争期间罗斯福外交政策的主要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联合国来解决所有世界问题。

1941–1942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反战情绪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该国立刻在外交政策上团结一致。1941年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美国对此作出了反应。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实施了一系列战争战略，目的是制止德国在苏联和北非的进军；发起对西欧的入侵登陆，目的是在两个战线之间击溃纳粹德国；拯救中国并击败日本；但是，美国舆论优先考虑对日本的打击，因此美军在1942年主要被派往太平洋。

在太平洋战争的头几周，日本顺利地占领了菲律宾以及东南亚的英国属地和荷兰殖民地，并于1942年2月占领了新加坡。此外，日本切断了通往中国的陆路补给路线。美国以高昂的代价将补给品通过喜马拉雅山脉之上空运给中国；直到1945年，才从西南方开通一条通往中国的道路。

罗斯福在12月下旬会见了丘吉尔，并计划在美国，英国，中国和苏联之间建立广泛的非正式同盟。其中包括丘吉尔（Churchill）登陆入侵北非的最初计划（称为“体操运动员行动（Operation Gymnast）”）和美国将军针对西欧入侵的主要计划（直接针对德国）（Sledgehammer行动）。还达成了一项协议，要求在太平洋战区进行集中指挥和进攻，称为ABDA（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以拯救中国并击败日本。尽管如此，令丘吉尔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大西洋优先”战略仍然完好无损。1942年元旦，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联合国宣言》，代表26个国家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轴心国三方协定。

中国

1931年，日本利用了军阀时代中国非常弱小的中央政府的处境，制造了奉天事件，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溥仪曾是中国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后来再次成为满洲国的“皇帝”。他是日本人的傀儡。1937年，卢沟桥事件引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是甲午战争】。日本的入侵战争，首先从轰炸上海，南京和广州等许多城市开始。1937年9月22日至23日，日军的新一轮轰炸与侵略行径，引起了广泛的国际抗议；国际联盟远东咨询委员会达成一项决议。

日军很快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并在南京犯下了战争罪行。日军占领中国领土以后，在中国范围内扶植建立起了三个傀儡政府【满洲政府，华北政府，以及南京汪精卫政府】。

1937年日本正式入侵中国后，美国成为中国的坚决支持者。在美国国内，即使是那些反对参与欧洲战争的孤立主义者们，也支持对日本采取强硬路线。

1937年中日战争的正式爆发，使得大量援助物资从美国运往蒋介石所领导

下的中国。

传教士，小说家（如Pearl Buck）和《时代杂志》等，对于日军在中国的残酷暴行的报道，其中包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引起了美国公众对华人的广泛同情。

日美关系在日军轰炸南京期间、因Panay舰船事件而进一步恶化。罗斯福要求日本人道歉；但两国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到1941年初，美国准备派遣由身穿中国制服的美国飞行员所驾驶的美国飞机，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甚至轰炸日本城市。当美国参战时，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领导下的“飞虎队”很快到达了中国。

陈纳德的飞虎队拥有100架P-40B飞机；1941年5月，为了增加陈纳德将军率领之飞行队伍的军事力量，华盛顿决定，再给他派遣144架Vultee P-48飞机，125架P-43飞机和66架洛克希德和道格拉斯中型轰炸机。目的是在1942年初之前使中国拥有一支按远东标准令人尊敬的空军部队，足以——“（a）保护战略要点，（b）帮助当地军队发动进攻，（c）可以轰炸日本空军基地以及在中国和印度支那的补给场，以及对沿海和内河运输的轰炸，以及（d）对日本本土偶尔进行纵火式轰炸。”

在美国正式参加战争的前一年（1941年12月7日之后），陈纳德曾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对日本基地进行偷袭。他的“飞虎队”将使用美国轰炸机和美国飞行员；所有飞机上都带有中国标记。

美国军方反对陈纳德的计划，并不断对他设置障碍；但包括亨利·摩根索（Jr. Morgenthau，Jr。）（对中国进行资助的财政部长）在内的最高文职官员，尤其是罗斯福总统本人，都同意并采纳陈纳德的建议，而且将其列为高度优先事项，进而以此保持中国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战时

在1941年12月正式宣战后，美国加大了援助中国的物资流量，但由于日本封锁了其他路线，因此不得不通过印度和喜马拉雅山脉将其运送。蒋介石所领导的、陷入困境的政府，现在将总部设在偏远的重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曾在美国受过教育；她访问美国国会并周游整个美国，为中国争取支持。美国国会修改了“排华法”，罗斯福结束了不平等条约。但是，美国人渐渐觉得，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下，其部队装备简陋，饮食不良，无法有效地抗击日本人；或者他更倾向于集中精力打败共产党。

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等“中国通”认为，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以此为从陆上反攻日本做准备，符合美国的利益。

1943年开始的迪克西使团，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其他美国人，例如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主张使用空中力量。

1944年，蒋委员长应罗斯福的要求，同意由一名美国将军负责指挥该地区的所有部队，但蒋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魏德迈将军取代了史迪威；而赫尔利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中美关系因而变得顺畅。

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在埃及开罗举行开罗会议；会议讨论了二战期间的抗日盟军立场，以及战后亚洲局势的相关决定。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出席了会议。约瑟夫·斯大林没有出席会议，因为他与蒋的会晤可能会引起苏联与日本之间的摩擦。

战后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爆发了一场全面内战。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试图促成停战，但他失败了。国民党的军事形势不断恶化；1949年，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国民党被从大陆驱赶到台湾等岛屿。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至今仍在台湾。

苏联

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以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为外交部长控制了苏联的外交政策。直到1939年8月，他们的外交政策仍是保持中立。

苏联军方在莫斯科与来自英国和法国的高层军事代表团进行了对话。苏联要求波兰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并保卫该国、对抗德国，但波兰拒绝了。那些对话无济于事。

8月21日，希特勒向斯大林提出了友好建议，导致8月23日达成莫洛托夫-里本特罗普互不侵犯条约；这震惊了整个世界。

苏联与德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以瓜分东欧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苏德达成协议后，德国入侵并迅速击败了波兰。然后，苏联入侵并控制了

其在波兰东部的预先划定的地区。这两个入侵者都系统性地消灭了波兰精英。在1940年的卡廷大屠杀中，苏联秘密警察（NKVD）处决了22,000名波兰军警和平民知识分子。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苏联向德国提供了石油和谷物。此外，克里姆林宫命令全世界的共产党谴责英法对德国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例如，法恩伯勒（B. Farnborough）说：“在法国沦陷前的整个时期，英国共产党都充当希特勒的宣传机构。”

当斯大林一再刻意拒绝他人关于德国之潜在危险攻击的警告之后，希特勒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这震惊了斯大林。斯大林最终通过一系列首脑会议巩固了与英国和美国的和解。美国和英国通过租借方式来向苏联提供战争物资。尤其是在1944年夏天，英美与苏联在军事行动上有一些协调。

战争结束时，斯大林是否允许东欧自由选举令人怀疑；这个核心外交问题决定了盟国未来的关系；事实证明，苏维埃-西方联盟不是一个永久的联盟。

法国

法兰西共和国

1921年法国和波兰签署了联盟关系。1939年，英法密切合作；德国侵略波兰的两天之后，英法就对德国宣战。此时，除英法、以及英国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以外，没有其它独立的国家加入宣战。英法两国采取防御姿态，担心德国会对城市发动空袭。法国希望马其诺防

线能够保护其免受德国入侵。从9月中旬波兰沦陷到次年春天之间，战斗很少。这段时间内，英国进行着“虚假战争”，法国则是“Drôlede guerre”战争（一种有趣的战争）。英国尝试了几次和平提议，但希特勒没有回应。

当德国腾出手来向西方发动进攻时，希特勒对丹麦和挪威发动了闪电战，轻松地将英国人赶出了那里。然后，它入侵了低地国家，并诱使英法两国将其最佳战斗部队派遣到荷兰深处；1940年5月，他们被困在法国战役中。英国皇家海军从敦刻尔克（Dunkirk）救出了30万英法士兵；但在仓皇撤退过程中，不得不抛弃了所有军事武器设备。

维希法国

与德国的关系

巴黎于1940年6月14日沦陷于纳粹德国之手。法国在1940年6月22日的停战协议中，与其新领导人菲利普·佩坦元帅（1856-1951）一起向德军投降。

在纳粹德国军队掌控下，法国的维希政权具有专制、天主教、父系、反犹太主义的特征。佩坦元帅的魅力和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勇角色所获得的声望，增强了他的权威；但他年纪太大了，无法关注细节琐事。

1942年10月，德国夺取了维希法国全部领土之后，纳粹德国设置了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作为傀儡，而让佩坦（Pétain）成为了一个被架空的虚位领导人。

德法停战协定包括了很多削弱法国的条款；并且，德国将200万法国战俘和工人抓到德国扣为人质；所有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法国人不得不屈从于那些德法停战协定中的条款。

维希法国名义上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它从未对苏联或英国宣战，直到1942年为止一直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

尽管维希法国名义上控制着整个法国（除阿尔萨斯-洛林外），但德国实际上控制了其五分之三的领土，包括北部和西部海岸，东北工业区和巴黎地区。佩坦政府离开巴黎、搬到了维希（Vichy）度假小镇，并在那里控制了法国其余部分领土。

从一开始，德国就希望获得法国的食物，矿产和工业产品，并希望法国人到德国工厂去工作。德国允许维希政府控制其法国海外属地；在法国海外属地，维希政府可以防御自由法国的力量，并在其可以抵御英国海军攻击的范围内控制法国舰队。1942年10月，德国全部占领了法国领土，维希政权完全沦为德国占领者的傀儡。

卢瓦尔河畔蒙托瓦的小镇是两次会议的现场。1940年10月22日，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会见了希特勒。10月24日在希特勒和佩坦之间举行了一次会议。最终，两者之间握手的照片广为流传，但实际上，他们的讨论完全是笼统的，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希特勒对佩坦捍卫法兰西的态度印象深刻。关于法国对殖民地以及德国对法国港口和法国舰队的控制做出重大让步的谣言比比皆是。德国控制了整个法国经济，并要求法国以黄金和粮食对德国进行巨额赔偿。将近200万法国士兵在德国成为战俘；他们在德国工厂中充当人质和被强迫劳动者。维希极度保守和反共，但实际上是无助的。当德国人于1944年夏天逃亡时，维希终于垮台了。

美国给予维希充分的外交承认，海军上将威廉·利亚希（William D. Leahy）被派到巴黎担任美国大使。罗斯福总统希望利用美国的影响力来鼓励维希政府中反对与德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那些人。维希仍控制着其海外殖民地；华盛顿鼓励维希抵制德国的要求，如在叙利亚建立空军基地或通过

法属北非运送战争物资。

美国的基本立场是，法国不应采取停战条款未明确要求的、可能对盟军的战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行动。

当德国完全控制法国时，美国和加拿大与维希断绝了联系。到1942年，德国要求维希将犹太人移交给德国集中营。起初，维希政府不情愿地遵从于德国的要求，然后变得更加主动热情。在维希政府管辖之领土上的33万法国和外国犹太人中，他们交出了80,000；德军杀死了77,000人。

1942年11月，当德国试图在土伦占领法国舰队时，法国海军将自己的所有舰艇都摧毁了。

法国舰队

英国担心，强大的法国海军可能会落入德国之手，并被德国自己的海军部队使用；这对于维持北大西洋的运输和通讯至关重要。在德法停战协定下，法国政府被允许在严格条件下保留法国海军。维希政府保证，舰队将永远不会落入德国之手；但拒绝将其舰队运送到英国或西印度群岛等法属遥远领土，拒绝将其运送到德国无法企及的范围之内。

法国投降德国后不久，英国袭击了在Mers-el-Kebir港的一个大型法国海军特遣队，炸死1,297名法国军事人员。维希政府切断了与英国的外交关系，但没有向英国宣战。

丘吉尔还命令英国皇家海军扣押在英国港口的法国船只。

勒内·埃米尔·戈德弗罗伊海军上将所领导的、位于埃及亚历山大的法国中队，被英方拘禁，直到1943年。

美国对维希法国政府和自由法国的立场是不一致的。罗斯福总统不喜欢戴高乐，也不信任戴高乐，并同意利亚希大使的观点，认为他是“学徒独裁者”。

北非

为了准备在1942年下半年登陆北非，美国寻找了法国的盟友。在美军1942年11月8日登陆之前不久，美国找到亨利·吉罗（Henri Giraud），然而吉罗在当地的支持很少。

偶然地，维希领导人弗朗索瓦·达伦海军上将被俘并支持了美国人。1942年11月22日，由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的同盟国与达伦海军上将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盟国认可达伦为北非和西非的高级专员。

在盟国内部，很多人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向前几天还刚刚在与纳粹合作的人、达伦海军上将发出了很高职位的任命而感到震惊。罗斯福和丘吉尔支持艾森豪威尔，因为艾森豪威尔遵循的计划是在伦敦制定并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批准的。

达伦于1942年12月24日被暗杀，因此华盛顿再次转向吉罗；后者被任命为盟军在法属北非和西非的高级专员。但是，吉罗未能在北非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基础。因而，吉罗很快就被戴高乐（De Gaulle）代替了。

自由法国

自由法国是设在伦敦和法属海外殖民地的起义法国政府，由富有魅力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领导。戴高乐曾经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政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职务。1940年6月18日，他从伦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广播讲话，劝告爱国的法国人民抵抗纳粹德国。他组织了自由法国军队，其中包括与英国人一起在敦刻尔克（Dunkirk）逃脱的法国士兵。在英国的军事支持下，自由法国逐渐控制了除日本占领的印度支那之外的所有法国殖民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希望维希政府出于声望的原因而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小岛保持名义控制，但戴高乐还是在1941年末占领了它们。

1944年6月，英美人在法国登陆时，戴高乐领导了一个流亡政府，总部设在伦敦，但他继续为美英制造外交问题。他拒绝允许法国士兵在D日跟随盟军登陆，并坚持要求其他盟国将法国视为大国，而他本人则是法国的唯一代表。陷入美国和戴高乐之间纷争的丘吉尔试图寻求妥协。

在德军逃离后，美国和英国让戴高乐成为第一个率军进军巴黎的人。

中立国家

主要中立国是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土耳其。

苏联在1941年6月之前在欧洲一直处于中立状态。

直到1945年8月苏联在亚洲与美国合作对日本发动进攻之前，苏日之间一直处于彼此中立状态。

拉丁美洲

美国误认为，德国有一个总体计划来颠覆并控制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华盛顿将反纳粹活动列为该地区的高度优先事项。到1941年7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授权成立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OCIAA），以回应德国和意大利在拉丁美洲的宣传工作。罗斯福通过使用美国的新闻，电影和广播媒体，力求加强其睦邻政策，通过使用文化外交促进拉丁美洲的泛美主义和防止军事敌对行动。

三个南美洲国家积极参加了战争，而其他南美国家则与轴心国被动地打破了关系或名义上对轴心国宣战。

古巴于1941年12月向轴心国宣战，并积极帮助保卫巴拿马运河。它没有向欧洲派兵。

1942年德国U形潜艇击沉了将原油运送到美国的墨西哥油轮后，墨西哥向德国宣战。1945年，墨西哥派出300人的战斗机中队参加抗日战争。

巴西于1942年8月22日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并派出25,700人的步兵部队，主要于1944年9月在意大利前线作战。1945年5月，其海军和空军在大西洋行动。

阿根廷

战争爆发前，阿根廷主持了强大而组织良好的亲纳粹分子集团，该集团由德国大使控制。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也有纳粹运动，但规模较小。

美国的外交政策努力，使整个拉丁美洲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德国。

阿根廷对此表现出顽强的抵抗力，而美国则努力破坏阿根廷政府。

然而，当1943年发生阿根廷军事政变、阿根廷军人夺取了国内政权以后，美国政策受到很大挫折。

阿根廷与美国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华盛顿认真地想要在经济和外交上孤立阿根廷，并在1945年试图将其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但未能成功）。历史学家们现在同意，阿根廷与德国之间所谓的亲和力被大大地夸大了。

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的最后几天，阿根廷政府都一直在二战中保持中立；但在1945年，阿根廷悄悄地默许了那些逃离德国、比利时和维希法国的纳粹领导人们，进入阿根廷。

纳粹战争结束之后，一个阴谋论逐渐兴起，极大地夸大了进入阿根廷躲难的德国纳粹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所带来的黄金数量。历史学家们表明，其实，那些纳粹所带来的黄金很少，进入阿根廷的纳粹人员数量也许并不多。但是大量关于此事的风言风语仍然存在。

波罗的海国家

尽管宣布中立，但是，波罗的海国家还是由于苏德之间所秘密通过的“莫洛托夫-里本特罗普特协定”，被分配给苏联势力范围。后来，波罗的海国家先后被苏联和纳粹德国占领。在此期间，在国际政坛上，波罗的海国家流亡政府的外交使团继续代表波罗的海国家。二战期间，美国从未承认过德国人或苏联对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控制权。

爱尔兰

爱尔兰在战争期间试图严格保持中立，并拒绝允许英国使用其基地。但是，它对英国的出口量很大；而且，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加入了英国武装部队。

葡萄牙

葡萄牙控制着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西洋上的、重要的、亚速尔群岛。英国和美国制定了名为“Operation Alacrity”的行动计划，必要时对其进行入侵。葡萄牙虽然与英国结盟，但在二战中的官方立场上保持中立态势。它的最高目标是避免德国入侵。

它的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萨（Antóniode Oliveira Salazar）与英国合作，向他们出售了橡胶和钨。1943年末，他允许盟国在亚速尔群岛建立空军基地，以打击德国U型潜艇。

他还帮助西班牙避免了德国的控制。

钨是重要的工业产品；他也将钨销往德国。到1944年6月，德国入侵葡萄牙的威胁不再可能，因此，他停止了对德国的出口。

在日本占领东帝汶后，葡萄牙努力重新获得对东帝汶的控制。

二战期间，葡萄牙接纳了数千名犹太难民。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与英国和美国保持通航联系。

里斯本是间谍的温床；也是国际红十字会向德国所抓获之各国战俘分发救济物资的基地。贵格会与其他和平团体以里斯本为基地援助难民。

西班牙

德国纳粹领导人在战争中花费了很多时间，试图说服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参战，并允许德军进军直布罗陀海峡。

但是，德国的提议被证明是徒劳的。

佛朗哥很同情纳粹德国，但在二战中始终保持中立。然而，西班牙确实需要还清对德国的沉重债务。因此，佛朗哥确实为意大利和德国提供了各种支持。西班牙向德国出售了许多补给品，特别是难以找到的钨矿。它组成了45,000名志愿者队伍参加德军部队，但仅在东线作战。

总体而言，西班牙保持中立，并与盟国进行交易。德国想要夺取直布罗陀海峡的主要要塞，但佛朗哥将其军队驻扎在法国边境以劝阻德国占领伊比利亚半岛。

面对盟军的经济压力、轴心国的军事要求、以及西班牙的偏僻地域特征，佛朗哥表现出实用主义立场；他主要从西班牙的利益出发而行事。

随着战争的进行，他变得对德国愈来愈强硬，对盟国则愈来愈包容。

瑞典

1939年9月，德国与波兰、英国和法国爆发战争；瑞典宣布保持中立。在11月芬兰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爆发时，瑞典宣布“不交战”，以便有可能在苏芬冬季战争中以武器和志愿人员支持芬兰。

从12月13日到苏芬战争结束，由瑞典总理佩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和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根特（ChristianGünther）领导的瑞典

民族团结政府组成，包含了瑞典议会中的所有主要政党。

从1940年4月起，瑞典和芬兰被纳粹德国和苏联包围，并受英国和德国的封锁。1940年春夏，美国停止向瑞典运送战斗机。瑞典对盟国和德国都做出了让步。

它认为，与德国的中立与合作对于生存是必要的，因为德国要强大得多；让步是有限的，只有在威胁太大的情况下才作出让步。中立是勉强的，但没有破裂；民族团结至高无上；在任何情况下，瑞典都拥有与德国进行贸易的中立权。

德国需要瑞典的铁矿；并且，德国不会因入侵瑞典而获得任何额外收益；反而，德国如果侵略了瑞典，倒可能会因战争破坏而损失很多铁矿。

瑞典作为一个自由国家，——战争期间，来自芬兰，挪威，丹麦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难民逃往瑞典。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瑞典可能从德国集中营中救出了一些受害者。

瑞士

瑞士是中立的，并且与战争双方都有业务往来。它动员军队保卫自己免受任何入侵。德国人曾经制定过入侵瑞士的计划，但从来没有真正侵略过瑞士。

后来，瑞士与盟国的联系被迫中断；瑞士的贸易大部分是与德国进行的；瑞士银行是纳粹最喜欢存放赃物的地方。瑞士人依赖德国的许可，进口其食物和燃料。瑞士人大规模走私了高精度工具和武器（例如宝石轴承，钻石模具和计时码表）到英国。

瑞士成为军事间谍和工业间谍活动的便利中心。

瑞士银行向德国支付了13亿瑞士法郎货币，以换取黄金。德国使用这些瑞士法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物品。

然而，在后来的战争中，瑞士的许多黄金被洗劫一空。盟国在战争期间警告瑞士；试图阻止瑞士与德国合作。1947年，瑞士支付了2.5亿瑞士法郎，以换取盟国不再为瑞士的黄金交易而谴责瑞士。

战争期间，瑞士接纳了48,000名难民，其中20,000名是犹太人。另外，他们还拒绝了约40,000名难民身份的申请者。

瑞士在与纳粹德国合作方面的角色，在1990年代引起了极大争议。

威利说："瑞士因参与战争而受到广泛谴责。它被指控教唆种族灭绝政策，拒绝为希特勒的受害者提供庇护所，向纳粹战争经济提供资金，并从希特勒的谋杀行动中牟取暴利、夺取了在死亡集中营中丧生的人们的财产。"

另一方面，丘吉尔在1944年末告诉他的外交部长：

"在所有中立国中，瑞士起到了很优秀的作用。她一直是将那些骇人的国家【德国与意大利】与我们盟国联系起来的唯一国际力量。她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我们所希望的商业优势，或者是否为德国人提供了太多的东西（以维持瑞士自己的生存），这有什么关系呢？她一直是一个民主国家，在自己的山脉、领土中捍卫自己的自由。尽管她的种族与我们不同【而与德国人更近】，但在思想上，她却大体上站在我们的一边。"

土耳其

土耳其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在1939年10月与英国和法国签署了一项条

约，规定盟国将在德国进攻土耳其的情况下捍卫土耳其。而且，在这个条约中，英法盟国向土耳其发放了4100万英镑的贷款。

1941年，土耳其曾面临德国入侵的威胁；但德国没有真的入侵；安卡拉拒绝了德国的要求，拒绝让德国部队越过土耳其边界进入叙利亚或苏联。

战前，德国一直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战争中，土耳其则继续与盟国以及德国双方开展经济业务。它从双方都购买了武器。盟国曾试图阻止土耳其把铬出售给德国（德国用铬来制造质量更好的钢材）。

从1942年开始，盟国向土耳其提供了军事援助，并要求它向德国宣战。土耳其总统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了会谈，并答应在得到军事武装援助的情况下参战。

到1944年8月，随着德国开始战败，土耳其中断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1945年2月，它对德国和日本宣战；这仅是象征性的举动，并使土耳其得以加入未来的联合国。同时，土耳其与莫斯科的关系恶化，为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冷战的开始奠定了基础。

轴心国

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举行了多次会议。他们从未与日本最高领导人会晤。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处理了德国与日本之间的许多谈判，但是自从1941年开始，日本驻德国大使与日本本土之间的的密码通讯就已经被美国截获并解密。美国与英国分享了这些信息。这些密码通讯透露了许多重要的德国计划。

德国

德国在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在柏林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下，建立友好政府。一个主要目标是，从意大利和匈牙利等高级盟友那里获得兵源，并从诸如维希法国等傀儡盟友那里获得数百万的工人和充足的粮食供应。

到1942年秋天，东线纳粹德军中有24个师来自罗马尼亚，10个师来自意大利，10个师来自匈牙利。

当一个傀儡国家不再可靠时，德国就进占该国、完全控制它，正如对待1942年的法国，1943年的意大利和1944年的匈牙利那样。德国对那些国家的完全控制权，使得纳粹德国能够优先实现大规模杀害所有犹太人口的首要任务。

尽管日本在官方名义上是德国的一个强大盟友，但德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却距离非常遥远，几乎没有任何协调或合作；例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前，德国一直拒绝向日本分享由煤制合成油的秘密配方。

迪纳尔多认为，在欧洲，二战期间德国的外交政策失灵，因为希特勒分别地、单独地对待每个“盟友”，并拒绝在盟友之间建立任何可以同步协调的联合政策，也拒绝整合、综合联结德国友邦之间的军备、战略、战事人员。

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分别单独地与柏林打交道；它们彼此之间从未互相协调其活动。德国不愿分享其强大的武器系统，也不愿培训那些各个轴心国之国家的军官。不过还有一些例外，例如德国和意大利在北

非的部队之间的密切合作。

希特勒

希特勒在战争期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军事和外交事务。他经常会见外国领导人，例如1943年1月10日，他在德国战地总部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理爱因·安东特斯库元帅，双方都是高级军事将领。1943年8月9日，希特勒召集保加利亚的皇帝鲍里斯三世在德军野战总部召开了一次气势汹汹的会议，并要求他向苏联宣战。保加利亚皇帝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同意向遥远的英国宣战。美国新闻报道称，希特勒试图在会议上殴打他；保加利亚皇帝在会议上心脏病发作。他三周后去世了。

强迫劳动

德国的政策不是在被占领的东欧使用或建造工厂，而是将数百万工人转移到德国的工厂和农场去劳作。有些人被迫，有些人自愿去（寻找食物），而另一些人则是战俘。

他们受到严密监视；食物和住房不佳；并受到严厉对待。他们的精神状态与劳动生产水平很差。

二战期间，在顶峰时期，强迫劳动者占德国劳动力的20％。总计大约有1500万人曾经被迫为纳粹德国劳动。大多数强迫劳动者来自波兰，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地区。战争结束时，这些强迫劳动者全部被遣送回国。

维希法国是能够对德国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它试图保护那些被关押在德国境内的、被俘的近200万法国士兵。维希法国政府安排了与纳粹德国之间的一项协议：——根据计算那些前往德国劳动的、法国志愿者的人数，德国将相应地释放此数字的三分之一数量的法国战俘【即，每三个法国志愿劳动者，交换一名法国战俘】。

威胁波兰

希特勒早在其从德国政坛崛起并掌握大权之前，就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波兰人和捷克人都是一些乌合之众；他们并不比苏丹或中国的居民更好多少；他们一分钱都不值；他们如何要求独立国家的权利？”

希特勒曾经要求，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一同对波兰进行瓜分。在谈到一战前后恢复建立波兰国家的国际政治努力时，希特勒曾说：“建立波兰国家，是有史以来针对德国人民的最大罪行”。

1934年1月，德国与波兰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在当年晚些时候，德国与波兰之间开展了经济贸易活动。（但是同时，德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秘密组织了入侵波兰的计划，并进行了大规模杀害波兰人口的准备工作）。

1934年春季，希特勒开始公开地考虑，为了与波兰建立军事同盟，他可能需要提供什么诱因。

在1919年至1939年之间，波兰奉行与苏联和与德国之间的平衡外交交往政策，并与它们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初，希特勒希望波兰以初级伙伴身份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以帮助德国入侵苏联。

斯坦纳指出，希特勒“希望与波兰的无所不能的外交部长贝克上校达成协议；这将把自由但泽城【其中的居民主要是日耳曼人】和波兰走廊地区带回到德国势力范围之内，并且仍然使波兰保持为德国的朋友。”

希特勒向波兰提供了一个新的互不侵犯条约；并承诺，如果波兰同意允许但泽城作为日耳曼人居住的城市回到德国所掌控之势力范围内，以及同意允许德国建设域外公路以通过波兰领土而连接但泽城和东普鲁士，那么，希特勒将承认波兰的既有边界。

希特勒的这个提议意味着，德国将有效地吞并部分波兰领土，同时波兰的海陆主要贸易路线将被切断。

波兰政府不信任希特勒，并将该提议视为对波兰主权的威胁。波兰人认为，——如果，波兰真的同意了希特勒的这个提议，那么，波兰实际上就是屈服于轴心国和反共产主义集团；同时，这也将使波兰自己沦为近乎奴隶的国家地位；若果真那样的话，波兰的整个贸易都将取决于德国，仰德国之鼻息。

法国驻柏林大使罗伯特·库隆德（Robert Coulondre）在1939年4月30日致法国外交部长乔治·邦内特（Georges Bonnet）的信中写道，希特勒寻求：——

“... 对波兰的外交政策有所制约；同时，希特勒保留了德国自己完全的行动自由，可以与其他国家缔结合适的政治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提出

的新解决方案将但泽城的问题和跨越波兰走廊通道的问题联系起来，以此增加对波兰外交政策的制约，实际上使波兰从属于轴心国和反共产国际集团。但波兰华沙政府拒绝此举，以保持其独立性。到三月，希特勒放弃了原来想要与波兰人继续保持友好的设想；四月份开始计划入侵波兰。麦克斯·多马鲁斯（Max Domarus）把希特勒针对波兰的外交提议描述为，这是希特勒试图在对抗波兰之前，为德国争取时间。”

波兰在国际舞台上很少有朋友。两项重要的事态发展使波兰措手不及。1939年3月，英国和法国宣布，如果德国入侵波兰，他们将对德国宣战。但是，每个人都意识到，就军事方面而言，英法在帮助波兰进行实际战争的事务上，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因为英法两国军方认为，如果德国入侵波兰，那么，“波兰的抵抗力量将在战斗的初期崩溃”。

英法两者都没有“想到西方针对德国会真的有任何重大的军事进攻行动”。他们的希望是，两线战争【东线是来自于苏联对于德国的潜在对峙危险；西线是来自于英法对德国的战争威胁】的现实性威胁，将阻止德国，使之不敢轻举妄动。

希特勒相信，英国和法国是在虚张声势；而且，他在8月底通过与斯大林达成的苏德联盟协议，解决了苏联的危险性问题；苏德协议中包括，通过秘密条款来分割波兰；并且后来，德国与苏联真的瓜分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

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威胁并不是虚张声势；德国在9月1日入侵波兰后，几天之内，英法确实向德国宣战了；但是，英法两者都无法对波兰战事提供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帮助。

波兰有一百万人的军队，但在组织、训练和装备方面远远落后。波兰的军事预算约为德国的2%；其指挥官Smigly-Rydz元帅根本没有为这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

1939年9月17日，当苏联在与日本帝国军队之间发生的、位于远东（诺门罕）的诺门罕战役中、大胜日本军队之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苏联的心腹之患；苏联一直担心，在未来的苏德对峙中，苏联将会腹背受敌，一面受到德国威胁，一面受到日本入侵；二十世纪初的日俄在满洲战争中、俄罗斯的打败还仍然让苏联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但诺门罕战役让人们认识到，日本的军力远逊苏联红军；在诺门罕战役中，交战的一方是苏联红军与蒙古军队的联军，另一方是满洲军队与日本关东军的联军】，苏联在向波兰不宣而战的情况下，侵略了波兰东部。

波兰随后被划分为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被苏德分别占领。

战争期间，纳粹德国在一些中立国和盟军控制的领土上，与当地的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右翼组织建立了联系，例如以纳粹党为基础的、南非的、反英亲德的、主要由荷兰移民构成的、准军事组织Ossewabrandwag。

"反犹大屠杀"

"反犹大屠杀"是指，在战争期间，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1941

年至1945年之间，在德国所占领的欧洲区域内，纳粹德国在非德语合作者的协助下，有计划地谋杀了大约600万犹太人；他们约占欧洲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二。

德国通过不断升级的阶段，实施了迫害。

当纳粹德国刚开始入侵某国时，纳粹往往在当地建立新的犹太人聚居区，并建立数千个营地和其他拘留场所。

最终，1942年1月，纳粹在柏林决定了一项政策，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在党卫军的协调下，在纳粹党最高领导的指示下，在德国境内，在整个被德军占领的欧洲区域、以及轴心国控制的领土上，都发生了杀戮事件。

在1941年至1945年之间，名为Einsatzgruppen的、准军事人员所组成的死亡杀戮队，在德国占领军和当地合作者的帮助下，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和大屠杀中杀害了约130万犹太人。

到1942年中期，密封的货运火车，把犹太人从欧洲各地的犹太隔离居住区，运输到死亡集中营，在那里被大批消灭。在死亡集中营，犹太人被毒气室处死，或被强迫劳动致死，或被殴打致死，或因疾病、医学实验致死，或在死亡迁移中致死。屠杀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为止。

欧洲犹太人被定为纳粹的灭绝目标；但这仅是纳粹德国及其合作者迫害和杀害数以百万计其他人群的更大政策的一部分；那些其他被杀害的人群包括：波兰人，苏联平民，苏联战俘，罗姆人【吉普赛人】，残疾人，耶和华见证会人士，政治异见人士，同性恋者，和黑人德国人。

英国有许多杰出人物，他们试图让丘吉尔政府将制止大屠杀列为优先事项。但这从未发生过；英国政府也没有公开过其所知的、有关德国纳粹正

在进行之暴行的信息。

在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对美国犹太选区的重要性很敏感，并与美国犹太社区领袖们进行了磋商。他遵循他们的建议，不对纳粹德国所进行的大屠杀行为进行强调和渲染，因为担心这会在美国也掀起反犹太主义的情绪。

历史学家认为，珍珠港事件发生后：

“罗斯福和他的军事与外交顾问试图通过避免出现为犹太人打仗的样子来团结国家，并削弱纳粹的宣传。他们绝不容忍潜在的分裂行动或任何转移其行动的努力，以尽快果断地赢得战争。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相信，战场上的成功是拯救幸存的欧洲犹太人的唯一确定途径。”

瑞典外交官拉乌尔·沃伦贝格（Raoul Wallenberg）利用他的外交豁免权，于1944年发行了保护性护照，以拯救布达佩斯的许多犹太人。尽管这些文件在国际法中没有地位，但它们的确给各地海关检查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帮助了约8万名犹太人逃脱。

教皇PIUS十二世反对大屠杀，但梵蒂冈只做出了三心二意的无效努力；而柏林很容易地无视、忽略了梵蒂冈的这一努力。

意大利

英法盟国的政策是与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保持友好，希望他保持中立、或仅仅执行适度的希特勒扩张计划【而避免激烈的战争对峙】。

但是，在1939年5月，墨索里尼与德国一起加入了轴心国组织，并签署了《钢铁公约》。当法国处在崩溃的最后阶段时，墨索里尼开始参战并获得了一些战利品。墨索里尼为希特勒带来了一支强大的意大利海军力量；该海军可能会挑战英国人对地中海的控制。罗斯福谴责此举："在1940年6月10日这一天，握着匕首的那只手已将其击中其邻居的后方。"

意大利对战争的准备不充分，因而越来越受纳粹德国的统治。战争起初阶段，意大利在英属索马里兰，埃及，巴尔干（尽管最初击败希腊）和东部前线取得了一些初步成功；但是，在那以后，意大利在北非和东非的军事努力都失败了。德国不得不进行军事干预，以营救意大利。

1943年，盟军登陆入侵并占领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于是墨索里尼政权垮台了。

墨索里尼被捕；意大利国王任命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将军为新总理。随后，他们与盟国签署了卡西比尔停战协定，并在意大利境内宣布法西斯党为非法。

但是德国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帮助下，进驻了那不勒斯以北的意大利领土。德国伞兵营救了墨索里尼；希特勒将他任命为意大利社会共和国（通常称为萨洛共和国）的伪政府首脑。意大利发生内战。

德国军队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坚守阵地；在那里的意大利山区领土，给德军提供了许多天然防御优势。

英国在1944年之前担心，意大利将会在苏联的影响下成为共产党国家。于是，英国放弃了原先想要在意大利建立起英国主导性影响的设想，取而代之的是，英国支持意大利独立自主的政策；意大利的自主政策受到美国的高度影响。

巴尔干地区

希特勒为了要准备入侵苏联，将其注意力转向南欧的巴尔干地区；希特勒希望掌控那个地区，以确保在苏德战争时，德国的南部或巴尔干侧翼享有军事安全。

在德国入侵罗马尼亚之前，罗马尼亚承受着来自于苏联方面的沉重压力，并不得不向苏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割让其40,000平方英里的领土，以及居住在那里的400万人口。

德军入侵、进驻罗马尼亚，是为了保护那里重要的油田（除苏联向德国提供的石油以外，那些罗马尼亚油田是德国唯一的石油来源）。

1940年11月，罗马尼亚与德国签署了《轴心国协定》，并成为德国的“盟友”。匈牙利（1940年11月）和保加利亚（1941年3月）也先后加入了这个“轴心国协定”，成为了德国的“盟友”。

希腊

1939年春，意大利占领并吞并了阿尔巴尼亚。英国希望阻止意大利的入侵，并试图保证希腊的边界不受侵犯。希腊在爱奥尼斯·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的独裁统治下，为支持英法同盟国的利益而拒绝了意大利的要求。

意大利于1940年10月28日入侵希腊。但经过艰苦的斗争，希腊人击退了入侵者。到1940年12月中旬，希腊人占领了阿尔巴尼亚近四分之一的地区，困住了53万意大利军队。

梅塔克萨斯（Metaxas）倾向于偏爱德国；但在他于1941年1月去世后，希腊接纳了英国军队和英国人所带来的补给。

1941年3月，意大利军队针对希腊的一次重大反击失败了；这使得意大利军方自命不凡的情绪受到严重羞辱。

德国需要确保其南部战略要塞的军事安全，为入侵苏联做准备。因此，希特勒无奈地于1941年4月发动了针对希腊之战。轴心国军队成功入侵了南斯拉夫，迅速战胜了希腊和英国的部队。

随后，希腊被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联军占领。

希腊流亡政府在开罗成立（后来移居伦敦）。德国在雅典建立了希腊伪政府。后者吸引了许多反共分子。

战时的平民面临着严峻的生活条件。由于谷物产量暴跌，以及德国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没收各地收获的粮食，因此，各地都饥荒猖獗。疟疾流行。

德国人为遭到希腊抵抗运动的怠工破坏，而进行野蛮报复。多个希腊抵抗

团体组织建立起来；但这些组织之间经常不团结、互相敌对。其中包括，全国共和党希腊联盟（EDES），民族和社会解放联盟（EKKA）；——最强大的是共产主义民族解放阵线；它的军事部门、全国人民解放军（ELAS）有50,000名士兵。

1944年9月德军离开希腊后，各种希腊政治军事组织之间的互相竞争，导致了希腊内战。

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

1941年3月，南斯拉夫以德国盟友的身份签约加入轴心国。但是在几天之内，由塞尔维亚人领导的反纳粹政变组织，在英国的帮助下，推翻了摄政王，驱逐了国内纳粹力量，并设立了17岁的王位继承人，即彼得二世国王。

德国立即轰炸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并于4月6日对其进行了入侵。几天之内，德军就完全控制了该国。南斯拉夫的新国王，以及该国许多政党领袖，都开始了逃亡路程。

一些重要的南斯拉夫政治界人士支持德国人；而另一些南斯拉夫人对于德国的支持则仅仅是被动、被逼无奈的。

德军针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入侵行动，引发了南斯拉夫国内的一场极为血腥的长期内战；内战造成超过100万人丧生。

德国肢解了南斯拉夫，其中有部分土地被划分给德国和意大利。科索沃被划分给了阿尔巴尼亚（当时由意大利控制）。马其顿被划分给了保加利亚。Bačka，Baranja，Međimurje和Prekmurje移交给了匈牙利。塞尔维亚成为德国的一个傀儡国家；但那里成为南斯拉夫抵抗军的重要基地。

在斯洛文尼亚，德国人将斯洛文尼亚人驱逐到塞尔维亚，将他们招募到德国军队中，或驱赶他们到德国的战争工厂和劳改营里工作。

在塞尔维亚，德国人设立了傀儡米兰·内迪奇将军，让其负责“塞尔维亚国家救助政府”；但不允许其维持正规军或外交部。

在安特·帕维利奇（AntePavelić）及其法西斯主义的乌斯塔什（Ustashe）政党的统治下，南斯拉夫只剩下了新克罗地亚独立国（NDH）。它成为了轴心国的盟友，并控制着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乌斯塔什（Ustaše）谋杀了约90,000人（主要是塞族人和37,000犹太人），驱逐了25万人，并迫使另外20万人“改信”天主教。

南斯拉夫出现了两个主要的反德国、反法西斯游击运动。第一个是由克罗地亚人、乔西普·布罗茨·铁托（Josip Broz Tito）领导的、欧洲人自发组织的、反法西斯游击运动（始于克罗地亚）。铁托领导下的游击队得到了苏联克里姆林宫的支持。第二个是由塞尔维亚人、切特尼克·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上校领导的、切特尼克人游击队伍；他们忠于流亡伦敦的皇室政府。铁托的游击队在1945年的南斯拉夫内战中获胜，处决了敌人，并重新统一了南斯拉夫。

日本

1939年，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日本征服了整个满洲地区和几乎整个中国，但盟国拒绝承认这一征服行动。

日本与德国一起加入了轴心国组织，但互相之间很少交换信息情报。

日本90％的石油依赖于从盟国进口。在1941年中期，由于盟国禁运而导致的石油运输的中断，使日本的军舰和战机只能维持一到两年的战斗；——除非，日本就中国问题与盟国达成协议，或占领东南亚的英国与荷兰属地的油田。

后一种路线意味着战争。之前，日本关东军在与苏维埃交战（诺门罕战役）中遭到惨败，因而，日军不想北进而与苏联发生战争；于是，日军期望的战略转为南下。所以，日军敦促日本政府采取上述路线，即与英荷美发动战争，南下侵略东南亚。在日本国内，一些海军将领以及日本平民和文职官员们，包括日本首相在内，都认为，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最终将会以失败告终。

但日本人不愿意失去荣誉与权势。日本外交官们试图推出日本版的“门罗主义”，期望向西方的英荷美等国提出政治妥协的建议；其目的是，日本想要自由地控制中国。但是，美国拒绝了日本的外交提议。于是，日本帝国军队人士们认为，现在，日本的困局只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帝国征服

日本在东亚发起了自己的闪电战。1937年，日军入侵并占领了上海等中国大部分沿海城市。日本接管了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英属马来亚（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泰国成为日本的卫星国，从而保持了名义上的独立。

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日本击沉了美国，英国和荷兰舰队的主要部分；占领了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到达印度边界；并开始轰炸澳大利亚。日本突然实现了统治“大东亚共同繁荣圈”的目标。

帝国统治

1935年，伪满洲国海报宣传各国人民之间的和谐。标题写着：“在日本，中国和满洲的帮助下，世界可以和平相处。”

在战争期间急剧扩张的、日本殖民帝国的意识形态，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冲动。

一方面，它宣扬了大东亚共同繁荣圈的统一；该联盟由日本领导，反对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和整个欧洲的“帝国主义”。这种方法强调、宣扬、和庆祝了东方的精神价值观，以反对西方的残酷“唯物主义”。

实际上，这是日本抢占土地和获得必要自然资源的委婉称谓。

另一方面，日本人安置了具有组织意识形态的日本官僚和日本工程师们，来管理他们大日本帝国统治下的广阔新疆域。他们相信效率、现代化和工程，能够解决社会问题。

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下的这种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是基于技术的法西斯主义；并且拒绝了西方的民主规范。1945年后，日本工程师和官僚们接管了原来被军方人士所统治的日本本土社会，并将战时日本海外的技术法西斯主义，转变为日本本土企业家的管理技能。

日本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建立了伪傀儡政权。这些傀儡政权在战争结束以后都立刻消失了。

日本陆军在大多数被征服地区经营着残酷的、残暴的、镇压性政府统治，但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那里，日本的主要目标本来是获取石油；但日本在苏加诺（Sukarno）的赞助下发起了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在与荷兰人作战数年之后，苏加诺终于在1940年代后期上台。

当日本占领印尼时，荷兰人摧毁了他们的油井，但日本人重新开放了它们。不过，大多数想要把石油运往日本本土的日军油轮，都在太平洋上被美国潜艇击沉，因此日本的石油短缺变得越来越严重。

中国各地的日本傀儡政权

日本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方建立了伪傀儡政权。战争一结束，它们就都消失了。

昭和钢铁厂是满洲国经济的支柱。

满洲是清朝统治者历史悠久的故乡；它自1912年起就具有模棱两可的特征；它由当地军阀管理。日军在1931年夺取了满洲控制权，并于1932年为生活在那里的3400万满洲居民建立了伪满洲国。伪满洲国不仅包含中国东北三省，还添加了相邻的蒙古部分地区以及华北长城一带的其他区域。超过80万日本人以管理员身份进入满洲。满洲国名义上的统治者是溥仪；他小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1911年革命期间被罢黜而退位；现在，日本人将他带回到满洲，承担了满洲国皇帝的虚位。

在国际外交上，只有轴心国组织中的国家才承认满洲国。美国在1932年宣布了《史密森主义Stimson Doctrine 》，指出它将永远不承认日本对满洲的主权或控制权。

日本在满洲国对其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并将其作为日本经济的卫星国。满洲国超出了美国轰炸机的航程范围，因此，其工厂的工业生产能力一直持续到了二战最后。满洲国于1945年归回中国。

当日本在1937–38年战争中夺取对中国的控制权时，日本中部远征军设立了一个在汪精卫（1883–1944）名义上的领导下的、伪造的、中国国民政府。它位于南京，被日本人完全掌控，是日本的傀儡。

1943年，这个汪精卫傀儡政权对盟国宣战。汪精卫被日本人允许在上海管理国际租界地。汪精卫傀儡政权拥有90万士兵，并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对峙。它仅仅进行了很少的战斗。

军事失败

偷袭珍珠港时，日军似乎对美国太平洋舰队造成重大的打击；看起来，它几乎全歼了位于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大获成功。但是，它错过了当时停留在外海海域上的美国航空母舰舰队，也没有对夏威夷的陆上重要军事设施带来什么严重破坏。

如果，当时日军真的摧毁了美国航母舰队，或是摧毁了夏威夷岸上的海军油库，那么，其破坏作用可能严重削弱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军事作战能力。

最终，从长期来看，对于日本而言，珍珠港袭击被证明是一场战略灾难。实际上，日军的珍珠港袭击，对美军只造成了相对较小的破坏；美国海军其实并没有遭受到重大的长期损害；同时，珍珠港袭击事件促使美国内部团结一心、在一场全面发动的战争中报仇。这场全面战争的结局，对于美国而言只能是，敌人的无条件投降。

正如日本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所曾警告的那样，虽然，珍珠港事件给日本带来了六个月的短暂军事优势的时间窗口，但是，日本帝国海军的进攻能力在中途岛之战中被美国海军严重削弱，日本海军大败；日军的短暂军事优势因而告终。

随着全面战事的扩大化，战争的核心竞争力变为大规模军事工业生产能力和运输能力的较量。

美国建立了一支实力更强的海军，拥有更多的战机，以及更出色的通信和

后勤物流系统。

日军则因战线拉得太长，而无法供应自己的前线基地；许多日本士兵死于饥饿。

日本大量建造了战机，但质量却下降了；尤其是，训练有素的日军飞行员的数量呈螺旋式急剧下降。【在战争初期，日本空军的零式战机曾经令其敌手闻风丧胆，因为零式战机灵活机动，在空战中可以轻易地消灭对手。但是，零式战机在设计过程中，为了刻意寻求轻盈灵活性，而极大地牺牲了战机结构中对于日军飞行驾驶员的保护作用。随着早期训练有素的日本零式战机飞行员的大量牺牲，日军飞行员的生疏青涩的飞行技能成为了日本空军的最大软肋。这直接导致了后期日军在与盟军的空战中经常大规模落败。】

日本帝国海军输掉了一系列重大战役，从中途岛（1942）到菲律宾海战（1944）和莱特海湾战役（1945）。这使美国远程B-29轰炸机能够从那些美军占领岛屿上起飞，从容地轰炸日本本土。

从1945年3月开始，一系列大规模的空中袭击烧毁了东京的大部分地区和64个主要工业城市。而盟军针对日本“饥饿行动”的空袭，严重破坏了该国至关重要的内部运输路线。

不管战争如何变得无望，日本天皇身边的顾问们仍然坚决拒绝与盟军公开谈判。终于在八月，两枚原子弹和苏联对满洲国的入侵证明了，日本的负隅顽抗是徒劳的；而裕仁天皇的主动投降，保住了日本天皇制度的王位。

死亡

1937年至1945年，日本的军事死亡总数为210万人；大部分发生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饥饿或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约占日本在菲律宾军事死亡人数的80％，占中国军事死亡人数的50％。盟军轰炸日本65个城市的空袭，似乎至少夺走了40万人的生命，甚至可能夺去了近60万人的生命（仅东京就超过100,000人因空袭死亡；广岛和长崎因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超过200,000人；以及冲绳战役中死亡日军80，000至150，000人）。

1945年冬天，大量日裔居民试图从满洲返回日本；在旅程中，日本平民死亡大约为100,000人。

芬兰

芬兰两次与苏联作战，第一次是在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时；第二次是在1941年至1944年，当时芬兰与德国联手夺回了卡累利阿。

根据1944年夏末的苏芬停战协定，他们于1944年底成功地将德国军队赶出了芬兰的拉普兰。

1939年8月，德国与苏联之间的《莫洛托夫-里本特罗普特协定》包含了一项秘密协议，将东欧大部分地区瓜分开来，并将芬兰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

1918年之前，芬兰曾是俄罗斯治下的一个大公国；许多讲芬兰语的人居住

在俄罗斯的邻近地区。

在试图对芬兰人施加领土和其他侵夺性要求的尝试失败以后，苏联于1939年11月入侵了芬兰，开始了苏芬冬季战争。

芬兰在英国和美国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

苏联在芬兰的军事成功将威胁德国的铁矿石供应，并为盟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干涉提供了可能性。在苏芬冬季战争中，苏联人压倒了芬兰的抵抗力量；并于1940年3月签署了苏芬和平条约。该条约将芬兰的部分领土割让给了苏联；这些割让领土包括，拥有芬兰第二大城市Viipuri的卡累利阿的峡地地区，以及军事防御结构中至关重要的曼纳海姆防线。

苏芬冬季战争结束后，芬兰寻求英国和瑞典的保护与支持，但没有成功。因而，芬兰与德国走得更近，首先是为了争取德国的支持以抵消苏联不断施加的压力，后来又借助德国的帮助而重新夺回了失地。

芬兰于1941年6月25日（在芬兰史学上称为“继续战争”）向苏联宣战。

为了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英国于1941年12月6日勉强对芬兰宣战，尽管英国随后并没有什么军事行动。

芬兰和美国之间从未宣战，尽管由于《雷蒂—里本特罗普特协定》（Ryti-Ribbentrop Agreement），美芬两国之间在1944年断绝了外交关系。

芬兰与德国有着“借助一臂之力”的合作，但是芬兰人尽量避免与英美对抗。

最终，英国对芬兰宣战以满足其苏联政策的需要，但并未真正参与对芬兰

的战斗。芬兰在强大的德国压力下结束了与苏联的停战谈判协议，并继续与苏联战争；而英美两国则按照自己与苏联的既有联盟政策而行动。

芬兰保持着自己对于军队的指挥能力，并独立于德国之外而追求自己的战争目标。在对摩尔曼斯克的联合进攻“银狐行动”期间，德国人和芬兰人确实紧密合作。

芬兰拒绝了德国要求芬兰参加围困列宁格勒之战役的主张，并向犹太人提供了庇护；而犹太裔士兵则继续在芬兰军队中服役。

在德军进攻苏联的军事行动陷入僵局之后，1944年，吕蒂（Ryti）的继任者，马歇尔·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总统（Marshall 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与苏联展开谈判；结果于1944年9月19日达成了苏芬停战协定。

根据这个苏芬停战协议，芬兰军队必须把9月15日之后的、仍然驻在芬兰领土上的、剩余的德国军队驱逐或监禁。这导致了一场军事运动，——在1944年最后几个月，将德国军队从拉普兰驱逐出去。芬兰于1947年与盟国签署了和平条约。

匈牙利

匈牙利在战争中是德国的一个勉为其难的盟友。

在1930年代，匈牙利王国依靠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贸易增长来摆脱大萧条。

到1938年，匈牙利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已变得具有更加尖锐的民族主义特征。匈牙利采取了顽固的政策，试图恢复对邻国匈牙利民族地区的控制。匈牙利从与轴心国的关系中，在领土上受益。

匈牙利就领土争端问题，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王国进行了谈判。

1940年，匈牙利签署了《三方协定》。

次年，匈牙利部队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入侵和对苏联的入侵。德国观察员指出，他们的参与特别残酷；在匈牙利部队的统治下，被占领人民遭受任意暴力。匈牙利志愿者有时被称为从事“谋杀旅游”。

在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同时，匈牙利总理米克洛斯·卡拉（MiklósKállay）与美国和英国进行了和平谈判。此时，柏林已经对卡拉政府产生怀疑。

早在1943年9月，德国总参谋部就计划入侵和占领匈牙利。卡拉（Kállay）政府对此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如果匈牙利真的做好预备、抵抗德军入侵，他们不一定就会在抵抗中失败。

1944年3月，德军占领了匈牙利。当苏联军队开始威胁匈牙利时，摄政王米克洛斯·霍西（RegentMiklósHorthy）宣布，他要求与苏军停战，并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因而，匈牙利退出了战争。

此后不久，霍西的儿子被德国突击队绑架；霍西被迫撤回他的与苏军停战宣言。摄政王霍西随后被废黜，而匈牙利法西斯领导人费伦茨·萨拉斯（FerencSzálasi）在德国的支持下成立了新政府。

1945年，匈牙利军队和德国军队被侵入匈牙利的苏联军队击败。

罗马尼亚

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后，卡罗尔二世国王领导的罗马尼亚王国正式采取中立立场。但是，1940年欧洲局势的迅速变化以及国内政治动荡破坏了这一中立立场。

在罗马尼亚，铁卫队等法西斯主义政治力量日渐盛行，并敦促罗马尼亚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

1940年春季，罗马尼亚的两个主要军事保护国（法国和英国）的战事命运瓦解；罗马尼亚政府因而转向德国，希望从德国那里获得类似的、英法所曾经给予罗马尼亚的、关于领土完整的保证。罗马尼亚不知道，柏林已经按照《莫洛托夫—里本特罗普特协定》的秘密协议，将东欧国家在柏林与莫斯科之间秘密进行瓜分。

1940年夏季，一系列领土争端问题，以不利于罗马尼亚的外交方式进行了解决；这导致罗马尼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边界上失去了大部分领土。

因而，此事导致罗马尼亚政府的声望直线下降，进一步加强了罗马尼亚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和军事派系力量。

他们最终发起了一场政变，将国家变成了一个独裁国家。

罗马尼亚新政权于1940年11月23日正式加入轴心国组织。

罗马尼亚于1941年6月22日派遣部队入侵苏联，并向德国出售了工业设备与石油。它向东线派遣的部队超过了德国所有其他盟国的总和。

在乌克兰，比萨拉比亚，斯大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战斗中，罗马尼亚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马尼亚军队负责在罗马尼亚控制的他国领土内逼迫和屠杀了多达260,000名犹太人；尽管，生活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大多数犹太人幸免于难。

根据历史学家和作家马克·阿克斯沃西（Mark Axworthy ）的说法，虽然有人说，欧洲第二强大的轴心国军队可以说是罗马尼亚军队，但这是有争议的，因为许多人都同意，意大利军队应当被算作是欧洲第二强大的轴心国军队。

德国战争风潮逆转之后，罗马尼亚从1943年起被盟军轰炸，并于1944年被苏联军队入侵。随着德罗战线的瓦解，罗马尼亚国内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急剧下降。罗马尼亚国王迈克尔（Michael King）领导政变，废黜了安托涅斯库（Antonescu）政权，并将罗马尼亚置于盟军的阵营中，以进行剩余的战争。安托涅斯库（Antonescu）在1946年6月被处决。

战后，大罗马尼亚仍被拆解；罗马尼亚丢失了许多领土给保加利亚和苏联；但从匈牙利手中夺回了特兰西瓦尼亚。

流亡政府

英国欢迎各流亡政府在伦敦设立总部。还有一些其他流亡政府则在中立或其他盟国领土上设立。国际上对这些机构的外交认可，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情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波兰：流亡和地下

1939年9月的前三周，波兰军队被德国拆解时，波兰政府消失了；大多数波兰领导人逃到了罗马尼亚，并遭到了罗马尼亚政府方面的拘捕。其他领导人逃到了法国，后来又逃到了伦敦；在伦敦，由西科斯基将军建立了波兰流亡政府。直到1944年，盟军才认可它。

在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内部，形成了波兰人的地下抵抗运动。名义上，这些波兰地下游击队效忠于波兰海外流亡政府。

战争期间，约有40万波兰人加入了波兰地下军队；约有20万忠于波兰流亡政府的波兰人参加了西线战事。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约有30万波兰人在苏联的指挥下，与德军进行了战斗。

自战争爆发以来，波兰人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地抗议德国占领其领土并残暴地对待其平民。1940年，波兰新闻部列出了被纳粹谋杀的人的清单。1942年12月10日，波兰流亡政府发表了长达16页的报告，写给盟国政府，名为《德国占领波兰下的犹太人大规模灭绝》。该报告载有八页拉齐斯基斯基的说明；该说明已发送给26个政府的外交部长；这些国家在1942年1月1日加入联合国、并签署了《联合国宣言》。

挪威

在1940年4月德国占领挪威、取得其控制权之后，包括挪威王室在内的挪威流亡政府都驻扎在伦敦。挪威流亡政府暂停了政治活动，积极从事与盟国间的协调行动，保留了对挪威全球外交和领事服务的控制权，并经营了庞大的挪威海上商船队。

它组织并监督了挪威内部的抵抗活动。

一项长期影响是，挪威放弃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统的中立政策。

挪威于1949年成为北约的创始成员。

战争开始时，挪威拥有世界第四大商船队，共达480万吨航运排水量级，其中包括世界五分之一的油轮。德军占领了约20%的挪威船队，但其余的约1000艘挪威船只被挪威流亡政府接管。尽管有一半的船被沉没了，但其船运收入却足以支付挪威流亡政府的运营费用。

荷兰

荷兰政府于1940年逃往伦敦；在那里，荷兰流亡政府指挥着一些荷属殖民地以及荷兰海军和商船队的运营。

当荷兰流亡政府人士们到达伦敦时，他们认为自己仍然是中立的，但发现其解放荷兰的愿望与盟国的战争目标相吻合。

法国沦陷后，荷兰总理德克·扬·德·吉尔主张，在荷兰与德意志第三帝国之间进行独立和平的谈判。荷兰威廉敏娜皇后担心，荷兰东印度群岛被日本占领后，会使得荷兰在任何和平协议中永久性地丢失那些东印度群岛。

1940年9月3日，女王废黜了总理，并聘请彼得·舍尔德·杰布兰迪（Pieter Sjoerds Gerbrandy）接任荷兰流亡政府总理。后者与丘吉尔和罗斯福共同努力，为美国对于荷兰相关局势的干预，铺平了道路。

荷属阿鲁巴（Aruba）与当时世界一流的炼油厂库拉索（Curaçao）一起为盟国提供了主要的成品油产品。阿鲁巴从1940年至1942年接受英国的保护，从1942年至1945年接受美国的保护。1941年11月23日，根据与荷兰流亡政府的协议，美国占领了荷属圭亚那，以保护那里的铝土矿。

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十月，在流亡的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巴黎，非正式地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

该流亡政府试图与法国进行外交谈判，获取法国的外交承认，但失败了；随后，纳粹德国即将占领法国；于是，该流亡政府1940年逃到了伦敦。最终，该机构被承认这一机构的国家视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合法延续。

比利时

在比利时军队投降之前，德军的入侵比利时的战役在1940年仅持续了18天。比利时国王暂留在本国，但比利时流亡政府先逃到了法国，然后逃到

了英国。

比利时在1944年末获得了解放。

比利时在非洲拥有两处土地，是比利时位于刚果的一个非常大的殖民地，还有Ruanda-Urundi的领地。比利时所属之刚果没有被德军占领，仍然忠于盟国，成为有用的经济资产。比利时流亡政府从刚果向美国出售了340万磅铀矿石，被美国用于生产原子弹。

来自比利时刚果的部队参加了东非对抗意大利人的运动。该部队也与英军一起在其他战区并肩作战。

南斯拉夫流亡

南斯拉夫在伦敦有一个很弱的流亡政府，包括国王彼得（Peter King）。

战争期间，南斯拉夫本国境内的政治力量分为三种，其中包括，德军及其“盟友”力量；以及，两个塞尔维亚抵抗团体。

德拉萨·米海洛维奇（Dra**žaMihailović**）领导下的保皇派、反共人士、切特尼克人（Chetniks），在名义上处于流亡政府的控制之下。

切特尼克人是反对纳粹的塞尔维亚人，但有时与德意志人和乌斯塔沙人合作，与约瑟普·布罗茨·蒂托（Josip Broz Tito）领导的、共产党控制的、民族解放军进行激烈的游击战。

铁托的实力在1943年有所增强，而米哈伊洛维奇和保皇派则远远落后。

英国丘吉尔在1943年12月改变了政策路线，结束了对米海洛维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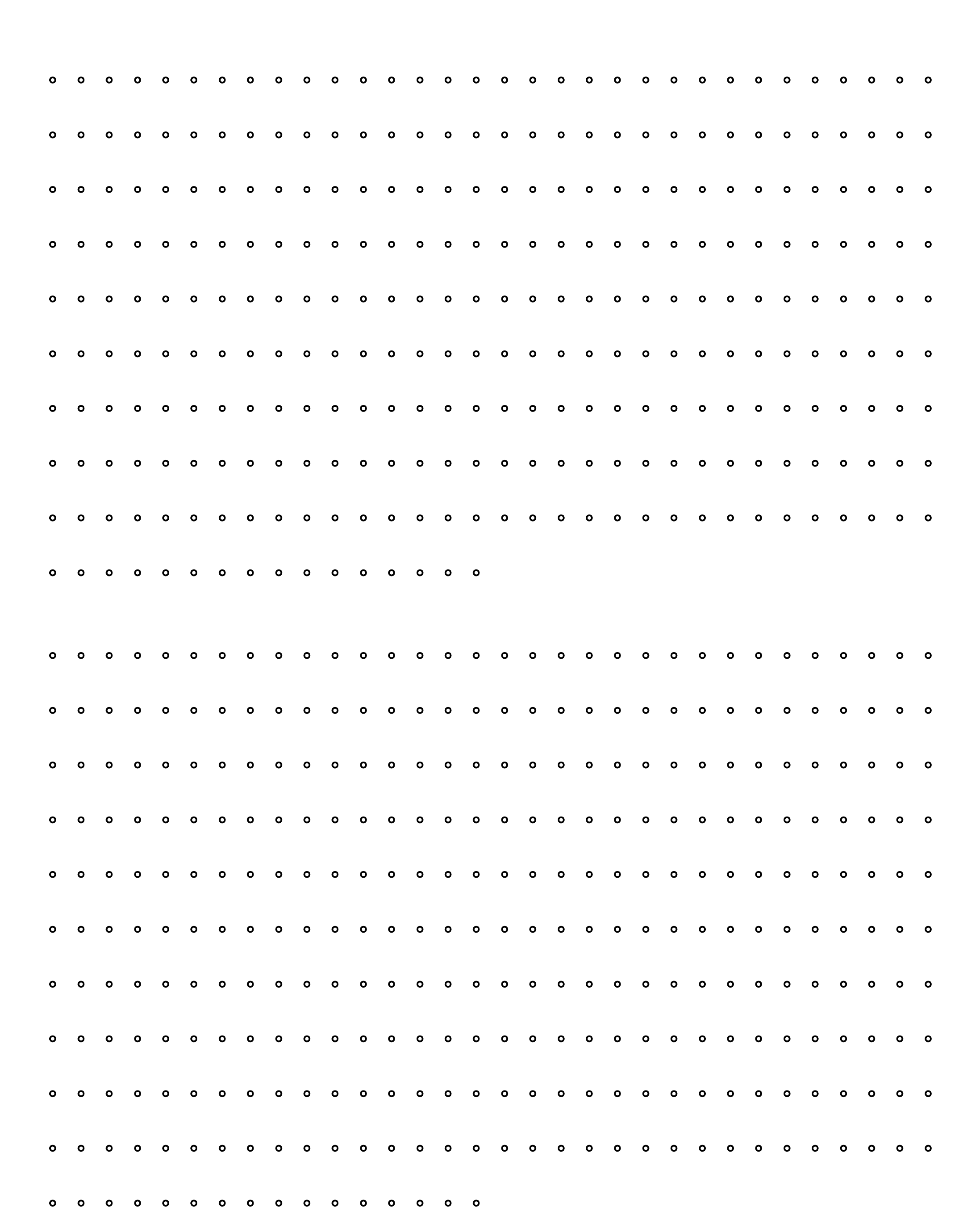
（Mihailović）部队的支持，转而支持铁托。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紧随其后，也支持铁托。铁托在1945年驱逐了德国人，也驱逐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清洗了米海洛夫（Mihailovic）部队。这样就形成了独立于莫斯科的、铁托所完全控制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国家。

韩国

总部设在中国的上海、后来迁至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1919年13月作为韩国流亡政府，直至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ond_Sino-Japanese_War

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军事冲突战争。在中国，该战争被称为“抗日战争”，或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后一个术语起源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战时联盟。该战争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中的中国战区。

战争的开始通常可以追溯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当时日中两国在北京地区的部队之间的争端，升级为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与日本帝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通常被视为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下令，在所有教科书中的术语“八年抗战”应以“14年抗战”代替；其中所提供的1931年9月18日的修订日期，是日本侵略满洲的开始日期。

根据历史学家Rana Mitte所说，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对于中国教育部2017年“一刀切式”的命令很不满；——尽管1931年后，中日之间就处于持续的紧张局势，然而，在1931-1937的6年期间，中华民国当时没有认为自己与日本处于不断的战争状态中。

中国在苏联和美国的援助下与日本作战。后来日本在1941年攻击珍珠港和马来亚；中日战争合并为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战争。一些学者认为，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完全分开的，尽管是同时发生的战争。其他学者认为，1937年第二次全面的中日战争的爆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第二次中日战争是20世纪最大的亚洲战争。它是太平洋战争中大部分平民和军事人员伤亡的原因；有1000万到2500万中国平民以及超过400万中国和日本军事人员死于与战争有关的暴力、饥荒和其他因素。这场战争被称为“亚洲大屠杀”。

这场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此之前、长达数十年的政策的结果；该政策旨在扩大日本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以确保获得原材料储备，食物和劳动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给日本政体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左派人士寻求普选，并为工人争取更大的权利。中国工厂增加的纺织品产量对日本的产量产生了不利影响；大萧条导致日本出口大幅放缓。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日本好战的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崛起。该派系由裕仁天皇之下的帝国统治援助协会的东条英机内阁领导。1931年，奉天事件助长了日本对满洲的入侵态势。中国人被击败，日本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许多历史学家都将1931年作为中日战争的开始。这种观点已被中国政府采纳。从1931年到1937年，中国和日本继续在局部发生的小规模事故中产生冲突，即所谓的"事件"。

继卢沟桥事件之后，日本人取得了重大胜利，在1937年占领了北京、上海和中国首都南京，并"强奸"了南京。在武汉战役中未能阻止日本人入侵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在中国内陆迁至重庆。继1937年《中苏条约》之后，强大的苏联物质支持帮助了中国国民党军和中国空军继续对日本的进攻施加强大的抵抗力。到1939年，中国在长沙战役和广西战役取得胜利之后，随着日本的战线深入到中国内部，中日战争陷入了僵局。

但日军最终成功地在长达一年的南广西战役中占领了南宁，切断了中国战时之都、重庆的海上补给线。

日本统治着中国大城市时，却缺乏足够的人力来控制中国广阔的乡村。1939年11月，中国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攻势，而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华中发动了进攻。

美国通过一系列、不断地抵制日本的行动来支持中国；最终，在1941年6月，切断了向日本的钢铁和汽油出口。此外，诸如"飞虎队"之类的美国雇

佣军直接向中国提供了额外的战斗支持。

1941年12月，日本对珍珠港发动了突袭，并向美国宣战。美国反过来宣战，并增加了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根据美国《贷款租赁法》，美国向中国提供了总计16亿美元（按通胀调整后相当于184亿美元）的军事物资。由于缅甸道路被切断，美国通过喜马拉雅山上空的飞行，向中国重庆等地空运物资。

1944年，日本发起了“一号行动”，入侵了河南和长沙。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中国军队投降。1945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恢复了进攻，并完成了连接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重要物资运输公路。

同时，中国在华南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并夺回了湖南和广西。

日本于1945年9月2日正式投降。中国收复了所有在战争中输给日本的领土。

。。。。

战争的开始

在中国，这场战争最常见地被称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战争”，并被简称为“抗日战争”或“抗战”。它也被称为“八年抗战”；但在2017年，中国教育

部发布指令，规定教科书将此战争称为“十四年抗战”；反映了人们对中国1931年以来与日本的更广泛冲突的关注。这场战争也被称为是“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历史背景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94年至1895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当时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被日本击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并承认韩国在“下关条约”中的充分和完全独立。

由于战争胜利，日本于1895年初吞并了钓鱼岛/尖阁诸岛（日本声称这些岛屿在1895年无人居住）。清朝由于内部起义和外国帝国主义而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日本通过其有效的现代化措施已成为大国。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1644-1911）。但是，中央权力瓦解了，共和国的权力屈服于地区军阀，主要是前北洋军。统一国家和排斥帝国主义似乎是非常遥不可及的。一些军阀甚至在彼此的战斗中与各种外国势力结盟。例如，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公然在东北与日本合作，从而得到日本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二十一条

1915年，日本发布了二十一条，要求进一步勒索中国的政治和商业特权；袁世凯接受了这些要求。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接管了德意志帝国在山东省的势力范围；这导致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反日抗议和大规模示威游行。在北洋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仍然支离破碎，无法抵抗外国入侵。为了统一中国和击败地区军阀，广州国民党（国民党，又称中国国民党）在苏联的有限协助下于1926年至1928年发起了北伐战争。

济南事件

国民党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席卷了中国南部和中部，直到在山东受到制止；他们与日本在山东之驻军的对抗升级为武装冲突。这些冲突统称为1928年的济南事件；在此期间，日军杀死了数名中国官员，并向济南发射了炮弹。据信在这些冲突中有2,000至11,000名中国和日本平民被杀。由于济南事件，中国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

统一中国（1928）

当国民革命军接近北京时，张作霖决定撤退回满洲，然后于1928年被关东军暗杀。他的儿子张学良接任了奉系军阀集团的领导人。同年晚些时候，张决定宣布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效忠，因此，中国名义上由

一个政府统一。

1929年中苏战争

1929年7月至11月，因中国满洲东部铁路（CER）发生的中苏战争冲突进一步加剧了东北部的紧张局势，导致了奉天事件，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中日战争。

苏维埃红军对张学良部队的胜利，不仅使苏维埃重新控制了满洲的CER，而且还揭示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官们迅速注意到的中国军事弱点。

苏联红军的表现也震惊了日本人。满洲对日本的东亚政策至关重要。日本1921年和1927年的东部地区会议都重申了，日本致力于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的主导力量的战略志向。1929年苏联红军针对张学良之奉系军阀军队的胜利，将日本这一政策志向推向了核心，并迫使日本决策层重新思考满洲问题。

到1930年，日本在满洲的关东军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支日渐壮大的苏联红军。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时间临近了；日本征服东北的计划加速了。

中国共产党

1930年，中原战争在中国各地爆发；北伐战争期间与国民党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结盟的地区军阀参与其中。

1927年上海大屠杀之后，中国共产党公开与南京政府之间发动战争；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持续扩大自己的力量。

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先集中精力围剿中国共产党。

前奏：日本对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入侵

中国的自相残杀让日本看到良机；日本人看见，——满洲有取之不尽的原料供应；满洲的巨大人口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可以销售日本的制成品（此时，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关税，日本的制成品无处可售卖），而且，满洲作为一个缓冲地区，可以很好地帮助日本抵御来自苏联西伯利亚的威胁。

1931年九月，日本以九一八事变为借口，全面地侵略了满洲。日本指控说，——其在满洲所获得的、自从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胜利以来的、应有权益，已经被系统性地侵犯；有"侵犯权益，干涉业务，抵制日本商品，不合理的税收，拘留个人，没收财产，驱逐或停止营业，殴打，以及对朝鲜裔居民的压迫，等等的案件超过120件。"

5个月战斗后，日本在1932年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被设立为它的傀儡统治者。中国的军事力量太弱，无法直接挑战日本，因此向国际联盟呼吁、寻求帮助。国际联盟的调查导致发表了Lytton报告；该报告谴责日本入侵满洲，导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除了温和的指责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对日本采取行动。

奉天事件之后中日战斗冲突不断。1932年1月28日，中国和日本军队在上海地区发生了战斗。这导致了上海的非军事化；这禁止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城市中部署军队。

在满洲国，日军进行了一场不断的运动，以打败中国人的抗日志愿军；这些抗日志愿军是由于人们对中国政府不抗日政策的广泛愤慨所致。

日本帝国的领土扩张

1933年，日本人袭击了长城地区。后来的“塘沽休战”使日本控制了热河省以及长城和北平-天津地区之间的非军事区。

日本的目的是在伪满洲国与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建立另一个缓冲区。

日本越来越多地利用中国的内部冲突来减少其顽强的对手的力量。在北伐以后的数年中，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力仅限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国的其他部分基本上掌握在当地的中国军阀手中。日本寻求各种中国合作者，并帮助他们建立了对日本友好的政府。这一政策被称为“华北特殊化”；通常被称为中国北方自治运动。受该政策影响的北部省份是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和山东。

日本的这一政策在内蒙古和河北地区最为有效。1935年，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国签署了《何梅协定》；该协议禁止国民党在河北开展党的活动。同年，签署了《秦土协定》，将国民党赶出察哈尔地区。因此，到1935年底，中国政府已基本放弃了华北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在那些地区建立了日本所支持的、东部河北自治委员会和河北察哈尔政治委员会。1936年5月12日，在察哈尔的权力真空处，蒙古军政府成立；日本为之提供了所有必

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此后，中国抗日志愿军继续抵抗日本对满洲、察哈尔和绥远的侵略。

战争进程

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

1937年7月7日晚上，中国和日本部队在通往北京的重要通道卢沟桥附近交火。最初的混乱之后，零星的冲突很快升级为一场全面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北京及其港口城市天津沦陷于日军手中（1937年8月至8月）。

7月29日，东部河北军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的约5,000士兵哗变，转而抵抗日本驻军。除日本军事人员外，根据1901年《义和团协议》在通州居住的约260名平民在起义中被杀害（主要是日本人，包括警察部队和一些朝鲜族）。然后中国士兵们放火烧毁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只有大约60名日本平民得以幸存，他们向记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了第一手证人的证词。由于兵变针对日本平民的暴力行为，通州兵变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舆论震动。

上海之战

日本在东京的帝国总部（GHQ）决策层，对于日本通过中国北方卢沟桥事件处理结果而得到的权益收获感到满意，而起初表示不愿将冲突升级为全面

战争。

但是，中国国民党认为已经达到了日本侵略的“突破点”。蒋介石迅速动员中央政府的军队和空军，将其置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

1937年，一名日本军官企图进入虹桥军事机场被枪杀之后，日本人要求所有中国部队从上海撤军，而中国人拒绝满足这一要求。作为回应，中日双方都向上海地区增援军事部队。

1937年8月13日，国民党士兵攻击了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据点；而日本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日本闸北海军舰炮的支援下越过这座城市界限，导致了上海之战。

8月14日，张治忠指挥下的中国部队被命令占领或摧毁日本在上海的据点；导致街头苦战。在袭击日本巡洋舰出云号时，国民党飞机意外轰炸了上海国际定居点，导致三千多人丧生。

在1937年8月14日至16日的三天内，日本帝国海军（IJN）派出了许多架当时先进的远程G3M中型陆基轰炸机和各种舰载飞机，以期消灭中国空军。但是，日本帝国海军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后卫柯蒂斯鹰二/鹰三和P-26/281掠夺者战斗机中队的意外抵抗；日本军机遭受了来自保卫中国之空军飞行员的攻击所带来的重大损失（50％日本军机被摧毁）（8月14日被国民党纪念为“中国空军日”）。

中国的天空已经成为先进的双翼飞机和新一代单翼战斗机设计的实战试验区。从1937年9月18日开始，日军将先进的A5M “克劳德”战斗机引入上海-南京战区；这帮助日本取得了一定的空中优势。

但是，那些数量虽少、但富有经验的中国退伍军人飞行员们，以及几位美籍华人志愿者、战斗机飞行员们，包括Art Chin少校，John Pan Wong少校和Chan Kee-Wong上校，尽管使用的是老式而慢速的双翼战斗机，却证明了他们能够在与A5M战斗机的空战中胜任，而且还证明了这是一场日本空军与中国空军的消耗战。

战斗开始时，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兵力大约为5个师，或大约70,000名士兵；而日本部队则由大约6,300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

8月23日，中国空军用Hawk III战斗机和P-26 / 281战斗机攻击了日军在上海北部吴淞口的登陆部队；而日军则以航空母舰上飞来的战机群应战；最终，日本陆军成功在上海北部登陆。

为了占领上海，日军最后派遣了20万陆军，以及许多海军舰艇和飞机。经过三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日军的人员伤亡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期。

10月26日，日军占领了上海的重要据点大厂；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最终，11月9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撤退。

南京大屠杀之战

在上海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基础上，日军占领了国民党首都南京（1937年12月）和山西北部（1937年9月至11月）。这些战役涉及大约35万日本士兵，以及更多的中国人。

历史学家估计，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之间，日本军队在“南京大屠杀”（也被称为“南京强奸”）中，打死或打伤的中国人大约有40,000到300,000人；南京陷落。

1938年

1938年初，东京领导人仍然希望将冲突范围限制在上海，南京和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他们认为这将为预期的与苏联的对决保留力量；但到现在，日本政府和帝国总部（GHQ）已经实际上失去了对日军在中国的控制。日军已经取得许多胜利，日本野战将军升级了战争，企图消灭中国抵抗力量，但在台儿庄战役（1938年4月至4月）等战斗中被击败。此后，日军改变了战略，并部署了其在中国几乎所有现有的军队，以进攻武汉市；该市已成为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日军希望破坏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并强迫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6月6日，他们占领了河南省首府开封，并威胁要攻占平汉和陇海铁路交界处的郑州。为了防止日本在中国西部和南部取得进展，蒋介石在陈果夫的建议下，下令在郑州附近的黄河上打开堤防。南岸的花园口堤防于6月5日和6月7日被挖掘破坏，河南东部，安徽中部和北部中部洪水泛滥。江苏洪水淹没并摧毁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使黄河河口向南迁移了数百英里。成千上万的村庄被洪水淹没或摧毁，数百万村民被迫从家中撤离。包括日本士兵在内的40万人被淹死，另有1000万人成为难民。庄稼田地的破坏也导致后来饥饿的人口。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于1938年10月27日占领了武汉，迫使国民党撤退到重庆。但蒋介石仍然拒绝谈判；他说，只有日本同意撤回1937年之前的边界，他才会考虑进行谈判。1937年，日本帝国军迅速进军中国领土的中心。

随着日军的人员伤亡和费用的增加，帝国总部试图通过命令其海军和陆军所属的空中部队对中国平民目标发动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空袭，来打破中国的抵抗。日军突袭了国民党新建立的临时首都重庆，以及日军尚未占领的、中国大多数其他主要城市，使许多人丧生，受伤或无家可归。

1939–40：中国的反击和僵局

从1939年开始，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前所未有地在随枣会战，长沙第一次会战，桂南会战，和枣阳宜昌战役中遭到惨败。这些战事结果鼓励中国人在1940年初对日军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反攻。然而，由于其军事工业能力低下和现代战争经验有限，中国军队这一攻势被日军击败。

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冒险进行任何全面进攻的尝试，因为他的军队训练不足，装备不足，混乱无章；并且，在国民党内部乃至整个中国范围内，都存在着针对他的领导的各种反对力量。在上海战役中，他失去了大部分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在战事中，他的指挥并非经常有效，更谈不上如臂使指；时常，他会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中那些高度自治的将军们的摆布。

汪精卫与中国傀儡政权

1940年后，日本人在被占领领土的管理和驻军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并试图通过实施建立有利于日本在被占领领土上的利益的友好政府的战略来解决其占领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由前国民党人士、国民党总理汪精卫领导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但是，日军的暴行以及日本人拒绝授予任何真正的权力，使得伪军非常不受欢迎，而且基本上没有效果。日本人唯一的成功就是招募了一支庞大的中国协作军，以维护占领区的公共安全。

日军扩展

到1941年，日本占领了中国和越南的大部分东部沿海地区，但中国人在这些被占领地区继续进行游击战。日本遭受了中国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日本无法像纳粹德国在西欧进攻那样取得迅速进展。

到1943年，广东经历了饥荒。

中国抵抗策略

西方盟国加入之前，中国战略的基础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第一阶段：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战役）–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战役随着该城市陷落而结束）。

第二阶段：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之后）– 1941年12月（同盟国对日本宣战之前）。

第一时期（1937年7月– 1938年10月）

与日本不同，中国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军事工业实力很小，没有机械化的师，装甲部队也很少。直到1930年代中期，中国一直希望国际联盟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提供对策。此外，国民党政府陷入了一场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正如蒋介石的名言：“日本人是皮肤上的病，共产党人是心中的病”。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从未有真正统一的战线，因为——国共双方都在准备，一旦日本人被打败、赶出中国以后，就向对方摊牌。

即使在这些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意识到，要赢得美国和其他外国的支持，中国必须证明自己有战斗能力。蒋介石知道，匆忙撤退会阻碍外国援助，于是决心利用他受过德国训练的最好的集团师在上海顽强抵抗日军，以保卫中国最大、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免受日军的侵害。

保卫上海的这场战斗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双方都有大量人员伤亡，最后中国撤退到南京而告终。但事实证明，中国不会轻易被击败，并向世界展示了自己顽强抵抗的决心。这场战斗对中国人民而言是极大地鼓舞士气，因为它坚决果断地驳斥了日本人所吹嘘的“日本可以在三天内征服上海，而中国则可以在三个月内被征服”的言论。

此后，中国开始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策略。中国军队将发动战斗，以延缓日本向北方和东部城市的进攻，从而使国内阵线及其专业人士和关键产业能够向西撤退到重庆。由于中国军队的焦土策略，蓄意破坏了水坝和堤

坝，造成了大规模洪灾，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还有更多人寻求庇护。

第二时期（1938年10月– 1941年12月）

在此期间，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在与日军的消耗战中尽量拖延战争，从而耗尽日本资源，同时逐渐建立中国的军事能力。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此策略称为“以持久取胜”。国民党军队采取了“磁铁战”的概念，将不断前进的日军吸引到一定的地点，然后在这些地点伏击日军，实施侧翼袭击、以及重大会战中的包围战。这种策略最突出的例子是在1939年（以及1941年）成功保卫长沙；这给日军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同时，在敌后方，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开组织的中国地方抵抗力量继续在占领区抵抗敌人，以打扰敌人并使其在中国广大土地上的管理变得困难。1940年，中国红军在华北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摧毁了铁路和一个主要煤矿。这些不断的骚扰和破坏行动使日本帝国陆军深感挫败；并导致日军采用了“三光政策”（杀死所有，掠夺一切，烧光一切）。正是在此期间，日本犯下了大部分战争罪行。

到1941年，日本已占领了中国华北和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但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军方已撤退到西部内陆以继续抵抗，而中国共产党则仍控制着陕西的根据地。在占领区，日本的控制主要限于铁路和主要城市（“点和线”）。他们在广大的中国乡村没有主要的军事或行政机构，中国的游击队在那里自由地漫游。

美国从1937年开始就大力支持中国，并警告日本退出中国。1941年夏季，美国对日本实行金属和石油禁运（并冻结日本资产）。

1941年6月，当苏联准备对纳粹德国进行战争时，所有新的苏式战斗机以及苏联各种武器装备都注定要部署在对德战线上，所以中国无法再得到苏联的支持援助。1941年3月，蒋介石期望通过美国的《租借法》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

《借贷租赁法》在美国通过后，美国对中国的金融和军事援助开始流通起来。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指挥了第一个美国志愿人员小组（昵称“飞虎队”）；美国志愿飞行员驾驶着涂有中国国旗的美国战机攻击日本军队。

1942年美国参战后，陈纳德所领导的志愿飞行员队伍换上了美国空军制服，正式成为美国空军驻华部队。

而在1942年以前，正是苏联人为中国从1937年到1941年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最大的物质帮助，通过《中苏条约》为国民党中国空军配备战斗机，为中国军队装备火炮和装甲；泽特行动还派遣了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从1937年末到1939年加入中国空军，以抗击日本占领军。

美国在1941年切断了日本的主要石油供应，向日本施压，要求其就中国问题做出让步，但是日本却袭击了珍珠港、以及西太平洋的美国，英国和荷兰的产业之地。

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关系

在1931年奉天事件之后，中国公众舆论强烈批评满洲的领导人“年轻元帅”张学良，因为他不抵抗日本的入侵，尽管国民党中央政府也对这一政策负责。中央政府给予张学良的命令是“斟酌行事”，但却没有实际的支援。日本占领满洲后，张和他的东北军被中央政府派遣前往剿灭中国共产党。这给他的东北军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而蒋介石没有在人力或武器方面给予任何支持。

1936年12月12日，心怀不满的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希望以此结束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为了确保蒋介石获释，国民党同意暂时结束中国内战，并于12月24日建立了中共与国民党抗日统一战线。联盟对陷入困境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们同意组建新四军和八路军，并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名义控制之下。在与国民党协议之后，中共建立了陕甘宁边境地区和山西-察哈尔-河北边境地区；这些地区由中共控制。在太原战役中，中国共产党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一同针对日军进行了战斗，并于1938年在武汉战役中达到了合作的高峰。

日本在中国北部，沿海地区以及中国中部富裕的长江流域领土上取得了稳定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也极其明显。令人不安的国共同盟在1938年末开始瓦解，部分原因是共产党人为吸收日军后方的中国游击队力量而扩大军事实力的积极努力。拒绝效忠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民兵常常被贴上“伪军”的标签，并遭到中共军队的攻击。例如，1939年6月，由贺龙领导的中共军队在河北进攻并消灭了由张寅吾领导的中国民兵大队。从1940年开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公开冲突在日本占领区变得更加频繁（那些日本占领区内的农村地区，常常处于日本所控制能力范围之外），最终，这种国共之间的公开冲突在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中达到顶峰。

此后，国共第二次统一战线【国共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是在1920年代的国民党北伐之前、以及北伐初期】彻底瓦解。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概述了中共最终从蒋介石手中夺取政权的初步计划。

毛泽东开始在他的掌控权力下，进行巩固中国共产党权力的最后推动。他的教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学说的中心宗旨，后来被正式化为“毛泽东思想”。

共产党人也开始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集中于，在有机会的地方，建立和扩大势力范围，——主要是通过农村群众组织，有利于贫困农民的行政，土地和税收改革措施；

而国民党则试图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进行军事封锁来消灭共产党的影响力，并同时与日本人作战。

西方盟友的参战

重庆国民党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对日本宣战。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几天内，中国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也正式宣战；这标志着中美正式成为盟国。

由于西方盟军对日战争，中日战争将成为一个更大的、二战太平洋战场的一部分。

几乎同时，中国军队在长沙战役中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使中国政府在西方盟国中赢得了很多声望。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将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称为世界的“四名警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交屈辱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中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戴笠运营的中美合作组织（SACO）向美国海军提供了有关日本在太平洋海域海军运行的知识。【菲律宾和日本的海洋天气受到中国北方附近天气的影响。SACO的基地位于杨家山。】

蒋介石继续从美国接收战时援助物资。但是，与在战争期间的大多数时候中、畅通无阻的、通往苏联的北方补给路线相反，自1940年以来，通向南方中国的海路运输线以及通向滇越铁路的海上路线，一直处于被日军封锁状态。

因此，在1942年（缅甸路被迫关闭）和1945年（重新开放中印公路，即"利多路"Ledo Road）之间的那段重要战争期间，外国援助主要限于可以飞越喜马拉雅"驼峰"上空的东西。

1942年4月16日，在缅甸仁安羌之战中，日军第33师包围了7,000名英国士兵；而中国远征军第38师营救了那些英国人。

在杜利特尔突袭之后【美军飞行分队在杜利特尔的率领下，在珍珠港事件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前往日本上空进行空袭轰炸，并给日本决策层带来巨大心理震撼，导致随后的中途岛海战日军大败，太平洋战争局势被扭转，日本从中途岛战役之后不得不转攻为守】，日本帝国陆军对中国的浙江和江西进行了大规模扫荡（称为浙江江西战役），目的是——寻找幸存的美国飞行员，并对帮助他们的中国人作出报复，并摧毁空军基地。该行动于1942年5月15日开始；日军出动40个步兵营和15-16个炮兵营；但在9月被中国军队击退。

在这次运动中，日本帝国军留下了毁灭性痕迹，还传播了霍乱，伤寒，鼠疫和痢疾病原体。中国估计称，多达25万平民可能死于疾病。它导致超过1600万平民向中国内陆撤离。战斗开始之前，宁波已有90％的人口逃离了。

此时，日本已经占领或摧毁了中国的大部分工业。苏联拒绝美国通过哈萨

克斯坦和新疆向中国战区运送援助军事物资的要求；因为新疆军阀盛世才在1942年经蒋介石同意、转而反苏。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政府军队从来无法得到、或配备进行重大反攻所需的物资和设备。

尽管军事物资严重短缺，但1943年，中国军队成功地击退了日本在湖北和常德的主要攻势。

蒋介石于1942年被任命为中国战区的盟军总司令。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曾担任蒋介石参谋长一职，同时在中缅印战区指挥美军。由于许多原因，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不久就破裂了。

许多历史学家（如巴尔巴拉·W·塔奇曼）认为，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关系破裂的原因，主要是在于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

而其他历史学家（如黄仁宇和汉斯·凡·代·文Hans van de Ven)）则把蒋与史迪威关系破裂的原因描述为一个更复杂的情况。

史迪威（Stilwell）强烈希望完全控制中国军队并奉行主动进攻性战略，而蒋介石则更愿意采用耐心、且成本较低的战胜日本人的战略。尽管盟军恳求积极地打破日本的封锁，蒋介石仍然保持防御姿态，因为中国已经遭受了数千万人的战争伤亡，并认为日本最终将面对美国的压倒性工业产出而屈服。

由于这些原因，其他盟友逐渐开始对中国在亚洲大陆的进攻行动的能力失去信心；美军采取“跳岛”战略【逐一攻占太平洋上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岛屿，并以之为飞行基地和进攻基地，逐渐逼近日本本土】，将他们的努力集中在太平洋地区、尤其是西南太平洋地区，以对抗日本人。

中国，美国和英国之间在国家利益和政治立场上的长期分歧仍然存在。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不愿将英国军队重新置于缅甸公路上（英国军队在早期的战役中曾派遣了许多人）；另一方面，史迪威认为重新开放道路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大陆的所有港口均在日本的控制之下。

盟国的“欧洲第一”政策与蒋介石不太相符；而后来英国人坚持认为中国应当派遣越来越多的部队前往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以进行缅甸战役。蒋介石认为这是企图动用中国人手来捍卫英国殖民地产业的做法。蒋介石还认为，中国应该将其精锐的军事师从缅甸转移到中国东部，以保卫美国轰炸机的空军基地，他希望通过轰炸打败日本。美国将军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支持这一战略，但史迪威坚决反对。此外，蒋介石在1942年与圣雄甘地举行的会议上表达了对印度独立的支持，这进一步恶化了中英关系。

美国和加拿大出生的华人被招募到日本占领的中国地区担任秘密特工。他们利用自己的种族背景来掩饰自己，其任务是与当地公民融合，并发动破坏活动。活动的重点是销毁日本的物资运输渠道【向盟军轰炸机发送信号，使之可以炸毁日军控制的铁路，桥梁】。

1943年末，中国军队入侵缅甸北部，在密支那包围了日军并占领了宋山。英军和英联邦部队在第204任务中行动，向中国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

美国将中国战区视为困住大量日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把中国当作美国空军攻击日本本国群岛的基地地点。

1944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战事态势迅速恶化，日军动员了500,000多名日本士兵，在中国发起了"一号战略攻击行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大战役攻势。日军攻击了中国领土中的美国空军基地，并贯穿中国沿海地区的陆地、成功地把满洲和越南之间的铁路联系起来。在日军一号攻击战役中，湖南，河南和广西的主要城市都被日本占领。

中国军队未能成功保卫这些地区；这促使史迪威试图全面掌控中国军队。随后他与蒋的对决和关系破裂，导致他被罗斯福召回、并被艾伯特·科迪·魏德迈少将接任。

1944年，中国军队在缅甸对日本的几场胜利中脱颖而出，导致了过度自信。

自1942年中国国民党军队出兵新疆，从当时的苏联傀儡军阀盛世才军队的手中收复了新疆【在此之前，军阀盛世才的部队受到驻守新疆哈密的苏联红军第八团的支援。早在1934年时，苏联就已经入侵了新疆、并占领新疆北部。1937年，新疆发生了伊斯兰叛乱，当时苏联又趁乱占领了南部的新疆。因而，在苏军的掌控下，从1937年后的很长时间内，整个新疆处于盛世才和苏联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盛世才部队后来在国民党军队的影响下转而反苏。1944年初，伊黎叛乱（苏维埃支持的维吾尔共产主义叛乱分子）导致的战斗进一步升级，使得中国军队与两个阵线的敌人同时作战；有12万中国士兵与伊犁叛乱分子战斗。】

日本一号战略攻击行动的目的是，摧毁对日本本土岛屿构成轰炸威胁的、中国南部的飞机场，并将北京，武汉和广州各城市的铁路，从北京一直连接到中国南方的广州海岸。

美国在华南部署的轰炸机对台湾新竹机场的日本空军进行了空袭；这震惊了日本。日本正确地推断出，中国南部可能成为美国对日本本土岛屿发动大规模轰炸的基地，因此日本决心在“一号战略行动”中摧毁并占领所有美国轰炸机使用的华南空军基地。

蒋介石和中华民国当局故意无视和驳斥了法国人在重庆向中国政府传递的预警情报；该情报是法国人在法属印度支那所得到的；该情报显示，日军即将大规模进攻和占领相关的重要城市。

中国军方认为这是日本制造的一种误导性的假情报，因为当时只有30,000名日本士兵在华北越过黄河开始了“一号战略攻击”的行动。因此中国人认为这只会是在中国北方的一次局部行动。

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自1940年以来，中日之间的战线一直保持着静态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战线已经持续了四年，直到1944年“一号战略攻击”行动之前；所以，蒋介石认为日本将继续保持同样的姿态。在蒋介石看来，日本会固守1940年时的战线态势，在该战线后方的日本占领区内，巩固那些地区的汪精卫等傀儡伪政权政府，并积极开发和利用那些地区的物质资源。

从1940年到1944年，日本人确实采取了这种行动策略。在1944年以前，日本人仅仅进行了几次软弱的尝试，试图攻击和占领中国在长江沿岸的重庆临时首都；但是，在1944年以前，日本很快就放弃了这样的努力。

在1944年的日军“一号战略攻击行动”之前，日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的大规模进攻性意图。在第一次长沙之战（1939年），第二次长沙之战（1941年）和第三次长沙之战（1942年）中，中国军队针对日本军团的连续三场胜利也使中国对自己充满信心。中国还用远征军在东南亚的印度－缅甸战场上击败了日本。

中国人不敢相信，日本会不小心将关于日军在中国大陆即将发生大规模进攻行动的情报【即关于日军“一号战略攻击行动”的情报】透露到印度支那地区的法国人手中。中国人认为，日本故意向法国人提供了错误的信息，以使中国军队从印度和缅甸撤回中国。中国误认为，缅甸战区对日本来说，比中国南部对日本而言要重要得多，而且日本军队在中国南部的战斗只会继续采取防御性姿态。中国还误认为，日本在华北地区进行的最初攻击仅仅是一次局部性的佯攻和干扰，因此，在日军进攻时，在华北地区的40万中国国民党军队有意撤回而未作任何正面战斗；中国军队高层误以为，日军的攻势只是暂时的、小规模的，日军还会像以前那样在取得占领胜利以后、为保存实力就很快撤退。

这个战略判断错误导致中国防御线迅速瓦解，因为最终有数十万人的日本士兵不断从北向南挤压，从华北到华中进行攻击，再到华南各省。而中国士兵则先是故意撤退，然后导致混乱和瓦解。但是，在衡阳保卫战中，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中国军队在那里只有17,000名士兵，却与11万多名日本士兵抗衡数月之久，给日本人造成19,000–60,000人死亡。

在国民党贵州省的土山，为了抵抗日军的一号战略攻击行动，中国国民党政府被迫在第8战区部署了5支军队【这些国民党军队在整场战争中一直被

用于遏制中国共产党军队】。在那里，日军决策层由于日本部队士兵的饮食缺乏和遭受的伤亡增加，被迫结束了在贵州的"一号战略行动"。

在此以后，蒋介石启动了一项计划，从1945年起把部署在东南亚的中国远征军队从缅甸战区撤出，以对日军发动反攻。

到1944年底，在孙立人指挥下的中国军队从印度进攻，在卫立煌指挥下的中国军队从云南进攻，在孟尤会师，成功地将日本人赶出了缅甸北部，因而保卫了通往中国的中印公路（利多路）的重要供应动脉。

1945年春，中国人发动进攻，夺回了湖南和广西。随着中国军队在训练和装备上的良好发展，魏德迈将军计划在1945年夏季发起"卡博纳多"行动，夺回广东，从而获得沿海港口，并从那里向北、航行到上海。但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及苏联对满洲的入侵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这些计划没有付诸实施。

外国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

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战争开始之前，德国自魏玛共和国时代以来就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作战部队提供了许多装备和训练，其中包括向中国国民党空军的一些飞行员进行了一些空中打击的训练。

包括美国，意大利人，日本在内的许多外国，都曾向战前中国的不同空军

部队提供训练和装备。

随着中国与日本帝国全面战争的爆发，苏联通过1937-41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而成为中国抵抗战争的主要支持者。【随后苏联由于与日本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而退出了对于中国的支持和援助行动。直到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才进入满洲、向日本宣战。】

当日本帝国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地区）以后，尤其是当1941年美国宣布对日本进行石油和钢铁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国势力范围内所有的资产以后【美国还随即通过了旨在援助盟国的租借法案；中国于1941年5月6日成为该法案的主要受益人之一】，——中国的主要外交，金融和军事支持者都来自美国。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更直接成为参战国，从此中美并肩作战，中国从美国得到巨额资金与军备支持。

海外华人

超过3200名海外华人驾驶员和汽车修理工前往战时中国，以支持军事和后勤补给线，特别是在印度支那地区（越南、老挝、柬埔寨地区）。当日本切断对中国内陆的所有海洋通道后，中印、中缅之间的陆上交通变得至关重要。

为回应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美国海外华人社区筹集了资金、并培养了人才。美国华人的捐款，为整个波音P-26 281型281战斗机中队提供了资金；这些捐款所购买的波音军用飞机，是为中国和日本之间迫在眉睫的战争局势而购买的。

包括John“ Buffalo” Huang，Arthur Chin，Hazel Ying Lee，Chan Kee-Wong等在内的十几位华裔美国人飞行员组成了最初的外国志愿飞行员队伍，加入了中国空军（一些省级或军阀级飞机）部队，但最终全部整合到

集中的中国中央空军中，通常被称为“国民党空军”，以“保卫祖国的爱国号召”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1936年，几名原籍华裔美国志愿飞行员被中国空军派往德国的拉格莱希菲尔德空军基地进行空中枪炮射击训练。

德国的援助

中日战争爆发前，中德处于密切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中，德国帮助中国工业和军事现代化，以换取中国的原材料。德国派出军事顾问，例如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到中国，以帮助国民党政府改革其军队。一些师开始按照德国的标准进行训练，并组成一支规模相对较小但训练有素的中国中央军队。到1930年代中期，大约80,000名中国士兵接受了德国式的训练。国民党在南京失利并退居武汉后，希特勒政府于1938年决定撤回对中国的支持，转而与日本结盟，成为日本在东亚的主要反共盟伙伴。

苏维埃的援助

之后，当德国与日本准备结盟时，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苏联希望中国保持战斗，以阻止日本北进、侵略西伯利亚、并导致自己两线作战【苏联西面的德国，以及苏联东面的日本】。

1937年9月，苏联与中国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公约》，并批准了“捷特行动”；这是一支秘密的苏维埃志愿空军的组成部分；苏维埃技术人员在其中为中国空军的军备进行升级，并运行了中国的某些运输系统。

来自苏联的轰炸机，战斗机，补给物资和顾问抵达中国；其中包括未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者苏维埃将军瓦西里·乔科夫。

在西方盟友援助中国之前，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最多：——苏联为支援中国的弹药和其他物资，而提供了约2.5亿美元的信贷。

1939年5月至9月9日，苏联在哈尔基欣·高尔（Khalkhin Gol）战役【即"诺门罕战役"】中击败日本，使日本人不愿再次与苏军作战。

1941年4月，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以《苏日中立条约》和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开始而告终。苏日中立条约使苏联避免同时与德国和日本作战。

1945年8月，苏联废除了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并入侵了满洲，内蒙古，千岛群岛和朝鲜北部。苏联人还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

1941年前的苏联援华时期，总计有3665名苏联顾问和飞行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政府和军队；其中有227人死于战斗。

西方盟友

直到1940年以前，美国一般都避免在日本和中国之间采取任何行动，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向中国提供任何援助。

从1937年12月起，日本袭击美国军舰和南京大屠杀等事件，在西方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对，并加剧了他们对日本扩张的恐惧；这促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向中国提供了贷款援助，以及向中国提供战争物资的援助合同。澳大利亚还阻止了一家日本国有公司收购澳大利亚的铁矿，并于1938年禁止了铁矿石出口。

但是，在1939年7月，日本外相与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Craigie）进行了谈判。该谈判促成一项协议，使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同时，美国政府把其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协定延长了六个月，然后完全恢复对日贸易。根据该协议，日本为关东军购买了卡车，用于飞机制造厂的机床，战略材料（钢铁贸易直到1940年10月16日为止；汽油和石油产品贸易直到1941年6月26日为止），以及各种其他急需的用品。

从1937年到1940年，日本轰炸机以美国石油作为燃料，而日本武器则是用美国废铁制造的。

1940年9月，日本入侵并占领了法国印度支那北部（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以防止中国通过滇越铁路每月接收盟军运输的10,000吨物资。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了苏联。这对世界政治局势产生了某些巨大的影响。

7月21日，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地区（越南和柬埔寨南部），这违反了1940年的《绅士协定》；根据该协定，日本曾向西方国家承诺不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日本飞机可以从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的基地进攻马来亚，新加坡和荷兰东印度群岛。由于1940年日本对法属北部印度支那的占领已经切断了从西方到中国的供应，因此迁往法属南部印度支那被视为对英国和荷兰殖民地的直接威胁。日本政府和军方（尤其是海军）的许多主要人物都反对这一举动，因为他们预见到这将招致西方的报复。

1941年7月24日，罗斯福要求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军。两天后，美国和英国开始了石油禁运。此后两天，荷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是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决定性时刻。石油进口的损失使日本无法长期在中国开展战斗。它为日

本发动对盟国的一系列军事攻击奠定了基础，包括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的攻击。

在1941年的年中，美国政府出资创建了美国志愿航空队（AVG），或飞虎队，以取代之前苏联从中国撤回的志愿者和飞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飞虎队”直到美国对日本宣战后才开始进行实战。在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带领下，美国志愿飞行员们在早期战斗中成功地击落300架日军战斗机，仅损失了12架新装备的、鲨鱼彩绘P-6战斗机。这些美国战斗机配备有6X50口径机枪，而且俯冲速度非常快，这使他们受到广泛认可【此时，中国空军正处于对日作战的最艰难时刻；在美国飞行队伍来华之前，中国空军在与日本空军战斗中承受着沉重的损失】。

陈纳德将军所率领的空军作战人员们在与日本空军的空战中所总结出的“高速飞行对抗”、“打完即走”等等战术，很快被整个美国空军借鉴运用，以此成功地胜过日本零式战斗机的空战技术【日本零式战斗机在中低速飞行时非常灵活善战，但在高速飞行状态时却极其难于控制，非常笨拙】

1942年4月日军封锁缅甸路之后，在1945年初中印公路（利多路）完工之前，向中国人提供的大部分美国和英国补给品必须通过空运运送，飞跃喜马拉雅山脉东端，即驼峰。美国飞行员们在中印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上空进行驼峰飞行，把大约65万吨物资运送到中国。驼峰飞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空路线之一。在驼峰飞行空运过程中，共有1659名机组人员牺牲，594架飞机坠毁。飞跃驼峰的空中运输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

1942年，中美两国签约，建立互相分享对日战争情报的组织，中美特种技

术合作所（SACO）。它与美国第一家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办公室（OSS）一起在中国开展业务，同时还作为两国之间的联合培训计划。这些机构为美国海军舰队和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的第14支空军部队提供咨询和培训，进行天气预报和侦察着陆区，营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并拦截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中，一项基本的任务目标是为盟军进攻日本本土而发展和准备中国海岸基地。福州被视为潜在的集结区和跳板，是盟军未来登陆日本的可能跳板。

1941年2月，中英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据此英军将协助已经在中国运营的中国突击部队，而中国将协助缅甸的英国部队。

1942年2月，英澳突击队通过204行动向中国突击队提供训练。英澳特派团主要在云南和江西两省进行了两次行动。

法属印度支那

中国的国民党也支持越南国民党（VNQDD）对法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在广西，中国军事领导人组织越南民族主义者反对日本。越南革命联盟是由亲中国的越南国民党运营的各种越南民族主义团体的联合会。中国国民党将领张发奎创立了该联盟，以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在印度支那对抗法国和日本的影响力。其既定目标是基于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博士创立的“三民主义”，推进越南与中国联合，并在越南反对日本和法国帝国主义者。张发奎将军精明地阻止了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加入联盟，因为张将军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力。中国国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这些越南民族主义者来对付日军。

战后，卢汉将军领导的20万中国军队被蒋介石派往印度支那北部（16度北纬平行线以北），以接受日本占领军在那里的投降，并一直留在印度支那直到1946年法国人返回。中国人利用国民党越南分会VNQDD来增加他们在法国印度支那的影响力，并向对手施加压力。蒋介石威胁法国人发动战争，以回应法国人和胡志明共产党部队相互对峙，迫使他们达成和平协议。1946年2月，他还强迫法国人放弃在中国的所有租界权益，放弃其域外特权，以换取中国人从印度支那北部撤军、并允许法国军队重新占领该地区。在法国同意这些要求后，中国军队于1946年3月撤离。

同时期的叛乱

1937年，盛世才叛军在新疆起事；当时亲苏的盛世才将军在苏军的陪同下入侵新疆。国民党36师、马虎山将军率领的部队抵抗盛世才部队与苏军的入侵。

马虎山将军与蒋就苏联的进攻交换了信息，期望得到南京的帮助。但是，第二次中日战争和新疆战争同时爆发，蒋介石和马虎山只能各自与日本和苏军对抗。

中华民国政府完全了解苏维埃入侵新疆省、以及苏维埃军队在新疆和甘肃四处移动，但为避免国际事件、并希望持续地得到来自于苏联的军事援助物资，国民党被迫向公众掩盖这些苏军侵华之真相，而称之为日军所伪造的“虚假宣传”。

由于亲苏维埃的省长盛世才控制了新疆，而且苏联派兵驻扎在新疆吐鲁番，所以中国政府也不得不将部队驻扎在那里，免得失去新疆。

当时马步青将军实际上控制着甘肃走廊地区。1942年7月，蒋介石派遣马步青率领他的30,000士兵部队转移至青海柴达木盆地。蒋介石任命马为垦务专员，威胁盛世才所控制的、与柴达木接壤的新疆南部。

马撤离甘肃后，来自中国中部的国民党军队控制了该地区，并渗透到了苏联所占领的新疆，逐渐将其收回，并迫使盛世才与苏联决裂。国民党几次下令马步芳进军新疆，以恐吓亲苏的新疆省长盛世才。这为中国人在新疆定居提供了保护。

1944年11月新疆伊宁事变爆发时，苏联支持反对国民党的维吾尔叛军。国民党军队对之进行了回击。

少数民族

日本试图与中国少数民族接触，以将他们团结起来反对汉族，但仅在某些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和藏族分子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功。

日本人企图让穆斯林回族人起来对抗汉人的努力失败了，因为白崇禧，马鸿宾，马鸿逵和马步芳等许多中国将军都是回族。日本人试图接近马步芳，但未与他达成任何协议。马步芳在1938年成为青海省的主席（总督），并指挥一支集团军。他因抗日倾向而被任命，对试图与西藏人联系的日本特工严加防范。

许多回族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战斗，如白崇禧，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马占山，马彪，马仲英，马步青和马虎山。

青海藏人曾在青海军队中抗日。

西宁在1941年遭到日本战机的空袭，导致青海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军。韩有文将军在日军飞机空袭中指挥了西宁市的防御。

结论与后果

太平洋战争结束，日军在中国投降

1945年8月6日，美国的一架B-29轰炸机Enola Gay在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炸死了成千上万人，并夷平了这座城市。1945年8月9日，苏联放弃了对日本的中立条约，并在满洲攻击了日本人，兑现了其雅尔塔会议的承诺，即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三个月内进攻日本。这次袭击是由三个苏联军团组成的。当天，美国又在长崎投下了另一枚更具破坏性的原子弹。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关东军被摧毁。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与同盟国代表登上美军USS密苏里号战舰，正式签署日本投降文书。在这个仪式上，有几个盟军指挥官，包括中国将军徐永昌。

日军向中国投降

盟军在太平洋取得胜利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下令在北纬16°线以北的——中国境内的所有日军（不包括满洲），以及台湾和法国印度支那

的日军，向蒋介石投降。

战后斗争与内战的恢复

1945年，中国虽然取得了战争胜利，但经济上很虚弱，而且濒临全面内战。长期的昂贵战争和内部冲突的军事要求，通货膨胀的螺旋形上升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包括暴利，投机，囤积，对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此外，苏联在满洲发展势力范围。在将满洲交还给中国之前，苏联人拆除并撤走了日本人留下的一半以上的工业设备。

战争破坏了中国主要农业地区的大片土地；战争爆发使人们面临饥荒。许多城镇被摧毁，数百万人因洪水而无家可归。

旷日持久的战争肆虐后的恢复和重建问题，其困难程度令人震惊；战争使国民党遭到严重削弱；他们的政策使百姓对他们很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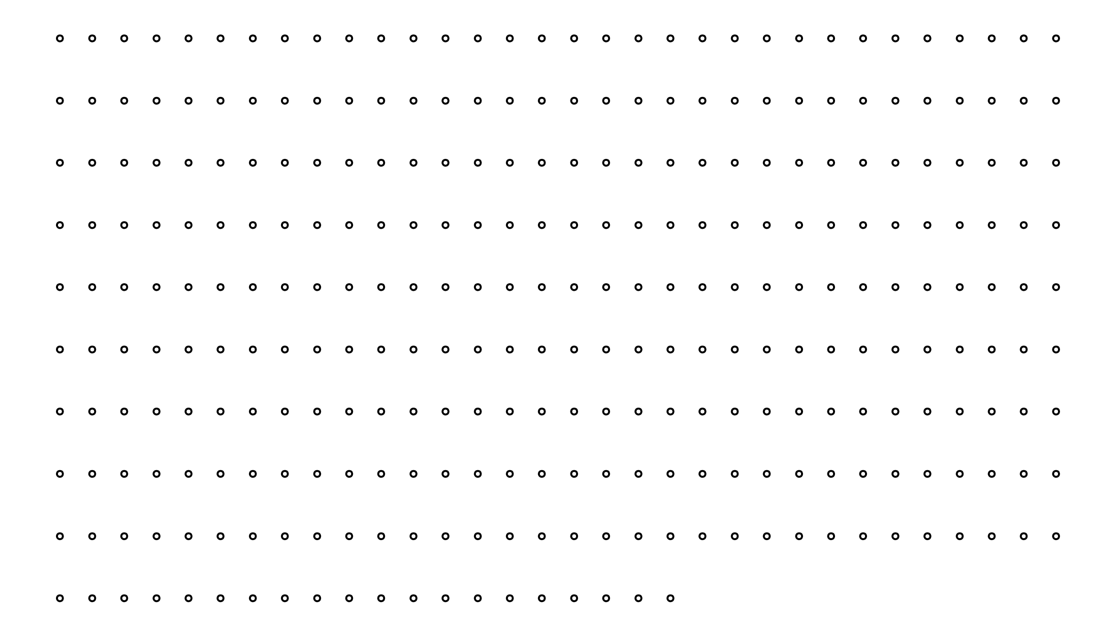
同时，战争增强了共产党的声望和战斗力。在延安和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其他地方，毛泽东能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的国情。他教导党的干部通过深入群众生活、与群众共处、了解百姓思想，来领导群众。

中共军队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就是他们有效地开展游击战争以保卫国家。共产主义军队适应了不断变化的战时条件，成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部队。通过熟练的组织和宣传，共产党员从1937年的10万增加到1945年的120万。

毛泽东还通过迅速将其部队从延安和其他地方迁至满洲，开始执行其建立新中国的计划。中国共产主义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国民党天真地以

为，占领满洲的苏联只会与他们合作，而不是与中共合作。

但是，苏联对满洲的占领时间足够长，足以让中国共产主义部队集体行动，并用日军投降的军事装备武装自己，迅速在农村地区建立控制权，并开始包围在中国东北主要城市的国民党政府军。此后，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爆发了中国内战，以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和国民党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而告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6%97%A5%E6%88%B0%E7%88%AD

苏日战争（俄语：**Совет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或称“日苏战争”（日语：日ソ戦争）、“远东战役”或“八月风暴行动”（Operation August Storm），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与苏联之间的一场战争，也是二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该行动以苏联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为主，苏军迅速占领了库页岛南部以及南千岛群岛，并迫使日本帝国于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军事力量在此打击下缴械投降，日方傀儡政权满洲国因此灭亡，傀儡政权皇帝溥仪也被苏军俘虏。

1945年初轴心国集团各地战线皆濒临崩溃，同盟国于雅尔塔会议上规划战后秩序与要求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后者承诺将于纳粹德国投降后3个月加入远东战斗。亚洲方面日本急于应付逐渐进逼中的英美联军，冀望尚对日中立的苏联可从中调停，以维持日本在东亚的利益。苏联表面上与日本“友好”，但已秘密备战且漠视日方调停要求。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前即开始转调军队至远东地区，其主要对手为驻于满洲70万日本关东军，与苏军相比，关东军早将精锐单位调出实力大减。

1945年8月8日，150万苏军同时自北、东、西3方向对满洲发动进攻，苏联通过广播宣布对日宣战，苏军进攻顺利，攻势凌厉，期间，苏军将满洲国当敌国看待，军纪弛懈，犯罪严重，导致当地治安败坏。占领满洲后，苏联立刻展开对南库页岛和北方群岛登陆行动。最终，在美国原子弹轰炸的作用下，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于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苏联于8月14日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主要内容有苏军出兵攻打满洲国后3个月内从东北“撤完”，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交换条件）同意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是否独立。苏军攻占满洲后，根据该条约撤出东北，但撤军因掠夺大量财物及工业设备等战利品并抢运至苏联境内而推迟，1946年初，苏联撤军，中华民国国军进驻东北。

冷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默许下，抢先进入东北，并建立根据地；同时装备了大量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其力量得以大幅增强。而朝鲜北部亦被苏联占领，后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给半岛局势带来了深远影响。日本在对苏战争后也在满洲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日侨，日侨被迅速遣返，许多人死亡；被苏军俘虏的60万名日军也被送往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后约有10万人死于当地。

简介

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会议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同意苏联将在纳粹德国战败后加入对日本作战。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意盟国请求将于欧洲战争结束的3个月内加入太平洋战区对日作战。行动开始于1945年8月9日正是德国5月8日（莫斯科时间5月9日0时43分）投降后的3个月。

这次行动发动于8月6日广岛市原子弹爆炸和8月9日长崎市原子弹爆炸之间。尽管斯大林并没有被同盟国各政府告知有关西方盟国的原子弹计划详细内容，但通过苏联的情报来源他已经了解到了这一计划及其目的。

跨贝加尔时间1945年8月8日晚上11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通告，表示苏联已向日本帝国宣战，并从8月9日起，苏联政府将进入对日作战状态。从跨贝加尔时间1945年8月9日0时01分起苏军3个方面军同时向满洲东、西及北3个方向进攻，行动被分成数个小规模行动及战术部分：

兴安岭-奉天攻势

1945年8月9日—1945年9月2日

哈尔滨-吉林攻势

1945年8月9日—1945年9月2日

松花江攻势行动及后续行动

1945年8月9日—1945年9月2日

南萨哈林行动

1945年8月11日—1945年8月26日

清津登陆行动

1945年8月13日—1945年8月16日

千岛群岛登陆行动

1945年8月18日—1945年9月1日

背景及准备

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是由日本战胜俄国，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通过和约及后来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等，日本控制了朝鲜、满洲及库页岛南部。20世纪30年代苏日边境冲突不断，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张鼓峰事件（1938年7月至8月）和诺门罕战役（诺门罕事件，1939年5月至9月），这些都导致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日军尤其在诺门罕战役中认识到，苏联红军的强大，从而转变心意，不再计划北进西伯利亚等地与苏联对战，而是计划南进入侵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同时，苏军迫切担心会与德日两面同时作战，因而希望与日本签订和平协议】。苏

日中立条约使苏联部队从边境事件中解脱出来，集中对德作战，同时使日本集中在南部向亚洲和太平洋扩展。

然而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打败了德军，苏联对日本的态度发生转变，斯大林发表公开演说谴责日本，“私下”更命令苏军在远东建立部队和储存物资。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上，除讨论其他事宜外，丘吉尔、罗斯福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斯大林同意，让苏联在纳粹德国战败后3个月内加入对日战争。苏军在远东不断进行集结，日军在1945年初已经可以明显察觉苏联正在准备攻打满洲，虽然当时在德国投降前进攻不太可能发起。因此，除了在太平洋战事外，日本也意识到其必须确定在何时何地进攻会出现。

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上斯大林在得到罗斯福保证其在远东的领土要求的情况下，同意在击败德国2至3个月后加入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3月中旬，太平洋地区战事对日本已十分不利，迫使其从满洲撤出精锐部队以支持在太平洋行动。与此同时苏联继续在远东组建部队，并决定不再延续中立条约。根据当时中立条约条款的规定，在条约届满12个月前，苏联必须向日方告知，于是在1945年4月5日，苏联方面通告日方自己不希望延长该条约，这引起日本极大关注，不过苏联花了很多努力令日本相信该条约仍然有12个月的有效期，因而日方尚不必担心。

莫斯科时间1945年5月9日德国投降，这意味着如果苏联履行雅尔塔协定，则需要在1945年8月9日之前加入对日本作战。日本情况则继续恶化，他们现在是唯一仍在战斗的轴心国，他们渴望保持与苏联和平及延长中立条约。日本在雅尔塔会议后曾多次接触或试图接触苏联，希望能延长中立条约，并争取苏联为中间人与盟国进行和平谈判。苏联没有令日本人的希望破灭，但尽可能地拖慢这一进程（同时继续为行动做准备）。在这之中内阁首相铃木贯太郎扮演了积极角色，他在1945年4月上台，试图在非无条件投降下争取获得任何和平条件。6月下旬日方向苏联靠拢（中立条约仍然有

效）并邀请苏联充当调停人与盟国进行和平谈判，日本向苏联提出具体的建议并提出作为回报，日本对苏联在领土上提供了非常吸引的让步作为报酬，斯大林表示有兴趣而日本等待苏联回复，但苏联继续避免作出回应。1945年7月16日至8月2日波茨坦会议举行，7月24日苏联召回在日本所有使馆工作人员和家属，7月26日会议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中丘吉尔、杜鲁门和蒋介石（苏联当时仍然未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7月29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正式向美英建议，要求美国和英国出面再发表一封邀请苏联对日作战之正式信函。杜鲁门当即表示拒绝并解释说："我看出其中讽刺性的外交动向：俄国在这个时候参战，似乎是致胜的决定性因素"。

日本一直监察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交通和苏军在满洲东部活动并对苏联实施拖延战术，同时所有迹象都表明苏联在8月底前还未完成进攻准备，但是至于进攻会在何时或何地出现，他们对现实情况并不了解也没有确凿证据。

当苏联在1945年8月8日午夜前1小时宣战时，日本被完全惊醒，8月9日午夜刚过，进攻行动在3条战线上同时展开。

参战部队

苏联

在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下，远东司令部制定了攻下满洲的简单而规模庞大的计划。作战将计划对整个满洲实施一次庞大的钳形攻势。该攻势将由满洲西部的外贝加尔方面军和在东部的远东第1方面军分别进攻两翼，北面的远东第2方面军则进攻口袋的中心。作为在战争期间唯一运作、相当于一个战区的苏联司令部（除了1941年在西部短暂运作的"方向"

外），远东司令部由3个红军方面军组成。

满洲西部战线

外贝加尔方面军由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包括:

第17集团军群

第36集团军群

第39集团军群

第53集团军群

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群

苏联蒙古骑兵机械化集群

第12航空集团军群

外贝加尔方面军组成了苏军钳形攻势的西翼，计划将通过内蒙古沙漠及越过大兴安岭山脉。该方面军的最终目标是攻占奉天（今沈阳），并在满洲中南部的长春地区与远东第1方面军会师，并完成对满洲中部的双重包围。

拥有1,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群作为装甲矛头，率领方面军进攻，并在进攻后的5天内向满洲内陆推进了350公里。

与此同时，第36集团军群也从西面发起进攻，并与远东第2方面军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会师。

满洲东部战线

远东第1方面军，由基里尔・梅列茨科夫元帅指挥，包括:

红旗第1集团军群

第5集团军群

第25集团军群

第35集团军群

第10机械化集团军群

第9航空集团军群

远东第1方面军组成了苏军钳形攻势的东翼。参加此次攻击的部队包括红旗第1集团军群、第5集团军群和第10机械化集团军群，首要目标为占领牡丹江市。在攻占牡丹江后，部队将向吉林市（或麒麟）、长春和哈尔滨推进。其最终目标是与外贝加尔方面军的部队在长春和吉林市会师，从而完成双重包围。

此外，远东第1方面军的另一个次要目标，将是防止日军逃入朝鲜，因而进入朝鲜半岛并推进至三八线也成为进攻计划的一部分。朝鲜半岛北部的苏联占领区，后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次要目标由第25集团军群完成。与此同时，隶属第1方面军的第35集团军群的任务，则是攻占勃利、林口和密山市。

满洲北部战线

远东第2方面军，由马克西姆·普尔卡耶夫上将指挥，包括:

红旗第2集团军群

第15集团军群

第16集团军群（其位于库页岛的第56骑兵集团军群仅是观战）

独立第5骑兵集团军群

Chuguevsk行动集团

黑龙江小舰队

第10航空集团军群

远东第2方面军将扮演辅助进攻的角色。其首要目标是占领哈尔滨及齐齐哈尔，并阻止日军向南撤退的计划。

当远东第2方面军与外贝加尔方面军的部队攻占长春时，他们将进军辽东半岛并占领亚瑟港（现时之旅顺）。

远东司令部辖下之苏军

总数

兵员　1,577,725

火炮　27,086

多管火箭炮　1,171

坦克及自行火炮　　5,556

飞机　3,721

后贝加尔方面军

兵员　654,040

火炮　9,668

多管火箭炮　583

坦克及自行火炮　　2,416

飞机　1,324

远东第1方面军

兵员　586,589

火炮　11,430

多管火箭炮　516

坦克及自行火炮　　1,860

飞机　1,137

远东第2方面军

兵员　337,096

火炮　5,988

多管火箭炮　72

坦克及自行火炮1,280

飞机　1,260

每个方面军有“前线单位”直接配属于方面军，而不是下辖于军级单位。部队共有89个师包括1,500,000人、3,704辆坦克、1,852辆自行火炮、85,819辆车辆及3,721架飞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兵力为支援战斗及后勤部队。海军部队有12艘主要水面作战列舰艇、78艘潜艇、许多两栖舰艇、以及黑龙江支队，由炮艇和众多的小型船只组成。苏联计划内所有机动作战的经验，均来自于与德国人的战斗。

日本

日本帝国陆军之关东军，由山田乙三大将指挥，是日本在满洲和朝鲜占领军主要组成部分，由2个方面军及3个独立军组成:

第1方面军（满洲国东北部，司令部驻敦化），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包括

第3军：驻延吉

第79师团：驻图们

第112师团：驻珲春

第127师团：驻图们以南

第128师团：驻汪清县罗子沟镇

独立混成第132旅团

罗津要塞司令部：濑谷启中将

混成第101联队：山内静雄大佐

第5军：驻鸡宁县

第124师团：驻牡丹江

第126师团：驻鸡西

第135师团：驻密山

第15国境警备队：驻虎头

第3方面军（满洲国西南部，司令部驻奉天），司令官后宫淳大将，包括

第30军：驻新京

第39师团：驻四平

第125师团：驻通化

第138师团：驻抚顺

第148师团：驻新京

第44军：驻奉天

第63师团: 驻通辽，撤退至奉天

第107师团：驻阿尔山，被全歼

第117师团：驻洮南，撤退至长春

独立战车第9旅团：驻四平

独立单位

第4军（独立地方军驻守满洲北部），驻哈尔滨

第119师团：驻海拉尔

第123师团：驻孙吴

第149师团：驻齐齐哈尔

独立混成第80旅团

独立混成第131旅团

独立混成第135旅团

独立混成第136旅团

第34军（独立地方军负责驻守第3及在朝鲜北部的第17方面军之间地区满洲北部）：驻咸兴

第59师团：驻咸兴

第137师团：驻罗南

独立混成第133旅团

永兴湾要塞司令部：多田勇夫大佐

関东军航空部队

戦闘飞行部队

教育飞行部队（独立第101教育飞行团）

陆军士官学校满州派遣队

驻蒙军：司令官　根本博　中将（负责驻守蒙疆）

第17方面军（负责驻守朝鲜；在开战后11小时被配属于关东军）

其它部队

第5方面军 – 樋口季一郎　中将 负责驻守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

第88师团：司令官　峯木十一郎　中将 南库页岛

第91师团：司令官　堤不夹贵　中将 千岛列岛

除了集团军（相当于西方一个军）外，每个方面军（相当于西方一个“集团军”）均被分配总部单位和这些单位直接受方面军指挥。除了日军外，还有满洲帝国陆军40,000人，包括8个兵员不足、装备低劣、缺乏训练的满洲国军师。而朝鲜、苏联远东司令部下一个目标，由第17方面军驻守。

关东军共有超过600,000人，分为25个师团（包括2个坦克师团）和6个独立混成旅团，这些部队拥有超过1,215辆装甲车辆（主要是装甲车和 对苏联来说 轻型坦克）、6,700门大炮（其中大多数 对苏美来说 是轻型）、和1,800架飞机（主要是培训和过时类型，只有50架第一线飞机）。

从经济角度看，满洲是值得保卫，因为它是在日本本土外有大量可利用原料工业地区，而且于1945年仍在日本控制之下。然而，日本军队（关东军）兵力远低于核定人数，（仅有70万人），相比3年前，大多数重型军事装备以及他们所有最好的军事单位都被转移到太平洋，（战败后苏军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给养）。到1945年，关东军内包含大量新兵。因此，关东军已基本上变成一支缺乏机动力及经验的轻步兵反游击部队，（坐拥在满洲经营了数十年号称东方马奇诺的工事群）。在表面上，日本军队没有能力与高机动机械化与在坦克、大炮、经验和战术优良的红军相匹敌。

除了这问题外，日本军队作出了很多错误假设和重大失误，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是:

他们错误地认为，任何来自西面的攻击要么将沿前往海拉尔的旧铁路线或

从蒙古东面进入索伦。苏联是有沿这些路线的攻击，但他们主要的攻击是由西面经过在索伦南部被认为不可逾越的大兴安岭范围及进入满洲中部。

日本军事情报未能确定苏军在远东集结性质、地点和规模。由于在初期低估了苏军实力，以及监测苏联横贯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他们认为在8月底前苏军不会有足够部队实施进攻，和这样攻击最有可能发生在1945年秋季、或在1946年春季。

由于撤出关东军精锐部队重新部署到太平洋战区，日军以针对苏军似乎不可避免的进攻之新作战计划在1945年夏季被制定出来。这些计划要求从边境地区重新部署大多数部队；边境地区将由象征性防守及日军将实施阻击行动，同时主力部队将防守东南部（以便保卫朝鲜免遭袭击）。1945年5月30日大本营陆军部下达新的对苏作战要点，将原先歼敌于边境地带的战略，调整为确保以通化为中心的满洲东南三角地区，即以新京到图门的"京图线"铁路以南与新京到大连的"连京线"铁路以东要地，以这两条铁路构成第二道绝对防卫圈。通化作为整个防御计划的核心要点。

此外，他们只观察苏军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沿东满战线活动，因此他们正在准备从东面来的进攻。他们认为，当进攻从西面开始时，部队将能够重新部署来应付。

然而，虽然这已经开始重新部署，这要直至9月才完成，因此，关东军正在重新部署时，苏军3个方面军同时发动进攻。

会战

苏联红军成钳状地包围着满洲地区，莫斯科时间8月9日零时苏军分别从西面、北面和东面进攻满洲。在西线苏军穿过蒙古的山脉和沙漠，远离他们的铁路补给线，这出乎了日军对苏联后勤的估计。日军未能预计苏联会这

么快便对日宣战，他们预计苏联最快要在10月才可出兵，在开战后的最初18小时日方将领几乎不能作出有效率的指挥，而且部队和指挥部的通讯也出现问题，致使虎头、东宁等边境要塞失去联系。另外苏军使用了运输机把部队空降到各大小机场和城市中心以及透过空军空投为超出陆上补给线的部队提供补给。在苏军的陆空夹击之下，日军依靠边境筑垒和城镇进行抵抗。“日军第3方面军主力配置在满洲纵深的长春和沈阳两地域内，因此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右翼部队迅速击溃伪满军的抵抗，迅速推进至赤峰、通辽。”

8月11日溥仪及满洲国政府官员开始乘火车撤退。因为日军主力在长春沈阳，苏军开战至8月12日并未遇激烈抵抗。8月13日晨溥仪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车站。8月13日中午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开始进攻牡丹江市。同时攻占咸镜道、清津。8月14日后贝加尔方面军攻占洮南，距长春200多公里，远东第2方面军进入了宝清。

在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电台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并在翌日开始停火。8月15日，远东战役的战线大致从西到东是，克什克腾旗——突泉——洮南——兴安盟——海拉尔——孙吴——宝清——林口——牡丹江。日军只有9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及各个国境警备队与苏军交战，其中第107、124、126、135师团以及国境警备队遭受了重创。

满洲国皇帝溥仪也在8月17日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宣布满洲国政府解散，满洲国正式灭亡。

8月16日苏联攻占元山。而此时远东战役的战线大致为克什克腾旗（赤峰西北约150公里）——突泉——洮南——兴安盟——海拉尔——孙吴——宝清——林口——牡丹江。虽然苏军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迅速压制关东军和满洲国军，然而仍没占领任何一座中等以上城市，且日军主力全在并仍

在重点战备。

主要的战斗持续了约1周。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下令满洲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同一时间蒙疆也被红军和外蒙军队占领。

日本投降后，苏联继续进击抢占日军控制的土地。8月18日苏军越过鸭绿江，进击朝鲜半岛北部，同日并攻占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8月19日苏军才以空降兵对长春和沈阳进行占领，溥仪等人在奉天机场被红军俘虏。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斯大林发密电，电文如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满洲国皇帝及其随从人员自奉天押往克拉夫琴柯军总部。按照您的命令我将其扣留并计划安置在赤塔地区。"

8月20日苏军占领新京、奉天、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8月22日苏军占领平壤和开城，苏军占领朝鲜半岛北部。8月26日与外界失去联系的虎头要塞被攻克。

9月2日，日军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自此苏日战争以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胜利作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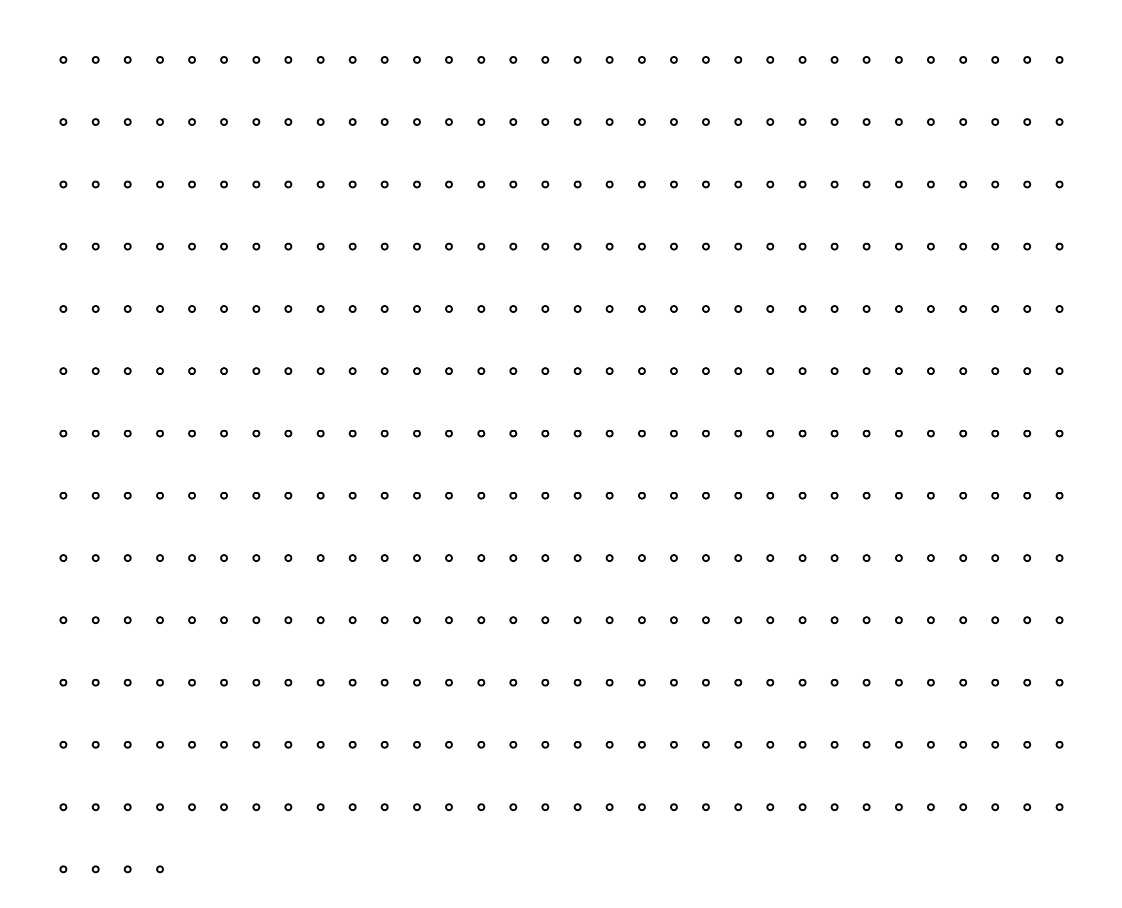
当地损失

苏军进入满洲地区和朝鲜后，依靠来自苏联国内的3,000多名技术人员，在大城市和其他工业基地中大规模拆运工业设备，致使许多工厂变成空壳而停产。此外，苏军并将满洲国与朝鲜各公私银行的贵金属、债券、纸币运往苏联。根据日本资料统计，苏联从满洲拆运的资产价值合1946年的5,340,714,845日元，相当于当时的1,363,484,499.92美元。苏联还在朝鲜

拆运的资产价值超过10亿美元。

苏联红军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苏联屠杀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许多来不及撤回日本的侨民被苏军屠杀。典型的例子有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和葛根庙屠杀。此外还有来不及撤退的日本兵和日本女兵或被俘虏的日本兵和女兵，一同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强迫奴役或非人道虐待(殴打、强奸、处死、酷刑)据说这些日本俘虏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每年死亡人数大约5万左右，红军高层军官默许对俘虏的虐待，苏联因为战后男女人口严重失调，苏联女兵和苏联男兵将目光注视到俘虏，进行强奸或轮奸的行为，据说苏联俘虏日本兵的总数是60万，从西伯利亚送回日本的俘虏在20万左右，外加几船的骨灰。

同时，苏联亦对中国东北的平民进行骚扰。当时，苏联占领军统帅部是设在长春市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其首领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而沈阳市的防卫，则是由俄国城防司令哈尔科夫少将负责的。然而，苏联军队军纪败坏，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来往行人，在市内，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因为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反而会被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年轻的妇女们，早把头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苏联士兵甚至使用机关枪射杀，对孩童施暴。龙应台对此评论道，在纪念碑落成、要求“长春各界人士”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在大街上对妇女施行强暴；连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因制止苏联红军抢劫而遭枪击致死。而苏联军队任意进入住宅，以刀枪威吓强夺物品与奸杀妇女，苏联当地进行的抢劫和强奸妇女的行为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东北人均抱怨：“走了个小鼻子，来了个大鼻子。”当地人对苏联红军的厌恶远超过日本殖民者。在此期间苏军的行为甚至影响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



https://www.sohu.com/a/201050584_523187

沈志华：中国内战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转轨（1945-1949）

一、斯大林在中国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 斯大林最终确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 并得到美国的认同和支持。除了对日本的索取， 2月11日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表明， 苏联在远东的战略诉求有三点需要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 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 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 共同经营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 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该协议还特别指出， 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 以取得中国的同意。

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 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 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1945年6月《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二战后的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种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在与美国人的多次谈话中所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二战后初期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1945年4-5月间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两次谈话中， 斯大林均强调蒋介石是“无私的”， 是“爱国者”， 只是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 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表示， 苏方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苏联从来没有， 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共。同美国一样， 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为此， 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 对国民政府两面夹击， 软硬兼施， 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艰辛而漫长， 足足拖了一个半月。斯大林原本把通过缔结条约实现苏联在华战略利益作为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的条件， 然而就在中苏条约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 8月6日， 美国在日本投放了原子弹。由于担心日本投降致使苏联失去占领中国东北的机会， 斯大林不顾同盟条约谈判尚无结果， 急忙下令苏联第一、第二远东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150万人马于8月9日凌晨对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当天， 美国在日本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在这种形势下， 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接受无条件投降。这样一来， 斯大林和蒋介石都着急了。没有一纸条约在手， 斯大林担心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及其谋取的特权缺乏法理依据， 而蒋介石则害怕苏军在中国东北长期驻军或把这一地区交给中共。于是， 双方很快就中苏同盟条约及相关文件的条款达成一致， 并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小时完成了签字仪式。苏方做出的保证是:1.中国东北的主权只移交给国民政府；2.协助中国政府平息新疆的暴动；3.苏军在日本投降三个月后撤离中国。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如愿以偿了。对斯大林而言， 不仅雅尔塔协定得到了落实， 而且同国民政府签订的同盟条约为苏联在华利益提供了法理保障。由此， 苏联对华政策的合作对象当然只能是国民政府。

1945年8月前后， 中共中央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 “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 因为“没有国际援助”， 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 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 尽管早在6月底中苏条约谈判前就听说了有关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秘密协定的内容， 中共中央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然而， 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 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二、苏联把中共作为实现其东北目标的工具（1945.8-1946.3）

斯大林万万没有料到， 中共采取的行动直接干扰了苏联的设想和安排。对于延安来说， 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

毛泽东一度认为， 通过武力扩大解放区和根据地可能是最佳选择。因此，在苏联出兵的第二天， 中共中央便下令其指挥下的所有武装力量向日军发动进攻， 迅速占领一切"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 几天后又调整部署， 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 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 "准备内战战场"；在江北则全力争夺"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此时， 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 在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当天， 蒋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未为所动。20日， 蒋再次去电催促， 毛仍不为所动，仍抓紧部署。毛泽东一面令八路军各部队配合苏军夺取长城以北各城市，一面指示华中局在上海及南方其他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显然， 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 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趁势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这一切显然违背了斯大林的意愿。就在中共积极部署， 准备夺取华东、华北及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 莫斯科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两封电报， 在后一封电报中， 联共（布）中央一方面明确表示完全赞同斯大林的前一封电报的内容， 一方面重申:"发动内战的路线会断送中国的复兴事业。我们建议您重新审视关于拒绝同蒋介石会谈的决定。我们认为， 您应当同蒋介石会谈并同他达成协议。"在斯大林看来， 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

武装夺权的方针， 必将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 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 唯一清楚的是: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 都将破坏业已签订且使莫斯科受益颇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远东雅尔塔体系， 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 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 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中共固然未对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抱多大希望， 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 但考虑到苏联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中共最终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21日， 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 要后者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 称今后的行动方针将由“革命”方式转向和谈方式， 但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同日， 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 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 蒋介石发送第三封电报， 再邀毛泽东赴重庆。与此同时， 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也转来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的电报， 表示赫尔利大使愿继续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毛泽东于次日作出答复， 称周恩来先去， 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由此看来， 在此问题上， 美苏主张不谋而合， 而且同时向中共施加了压力。

斯大林在后来与蒋经国的会谈时曾提到， 苏共中央认为， “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 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混乱”倒不至于， 但莫斯科的指示的确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变了自己的战略部署。在8月23-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二战后远东的国际局势， 指出， 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 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 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 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

泽东于8月24日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 抗日阶段结束， 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 争取我党的地位， 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 依靠人民”。8月25日， 中共又接到魏德迈的邀请电， 遂开会商定， 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

毛泽东虽然迫于形势， 不得不委曲求全， 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 内心却十分明白， 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 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靠武装斗争。当然， 这个斗争主要和首先应该在被苏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展开。不过， 在这个问题上， 斯大林的做法再次令毛泽东失望。10月10日， 就在重庆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 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毛说， 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 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但强调， “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 “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 因此， “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他还表示， “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 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 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也曾向彼得罗夫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时， 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 面对毛泽东的提问， 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苏联人未必没有看出， 中共在重庆谈判中争取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武装割据———首先是东北和内蒙， 其次是华北， 但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支持以国民党为主导的统一政府。为此， 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当然， 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 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 而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 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 就目的而言， 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有一点是一致的， 那就是必须保证苏联

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 其主要目的是使这一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对应条件， 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 中国东北的行政权将归还国民政府， 而苏军则在日本投降后3个月内撤离中国， 他是希望以此换取国民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 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 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背后的支持者美国， 既不放心， 也不信任。所以， 苏联不能把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 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 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 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中国东北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 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当地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 开展各种宣教活动。如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进入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 苏军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多万份。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 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 组织音乐会、戏剧、电影演出160场。此外， 苏军还在东北大力推动中苏友好协会的恢复和发展， 通过开展文化宣传活动， 培育当地民众的对苏友好情绪。

其次， 充分利用在苏联境内休整培训并重新组建的原东北抗日联军部队。1940年底， 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 周保中、张寿篯

（李兆麟）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远东地区， 继续坚持战斗。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公布后， 苏联开始禁止抗联部队再进入东北活动， 并在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疆区提供了两个营地（北野营和南野营）， 供部队训练和休整。1942年7~8月， 在周保中等人的要求下， 苏联同意将抗联人员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随后，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决定授予教导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番号， 列入远东方面军战斗编制， 由远东军副参谋长索尔金直接领导。苏联对日宣战后， 周保中提出了扩充部队， 配合苏军作战的要求， 并建议八十八旅成为东北人民军队的核心或交由八路军统一指挥。这显然不符合苏联的方针。此后， 斯大林决定解散八十八旅， 并将其骨干力量分别派给远东军各部， 以配合苏军行动。8月26日， 苏军下达了关于这一决定的正式命令。不久， 周保中等干部分组进驻中国东北地区被苏军占领的57个大小城市， 帮助苏军维持占领区秩序， 提高苏军的威信， 促进中苏友好， 并在主要占领区以外建立党组织和人民武装。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掌控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地区的接收进程和实际结果。斯大林答应将东北政权移交国民政府的前提， 是要完全实现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要做到这一点， 很重要的条件是在苏军撤离之前， 不能让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东北， 并保证与国民政府就东北经济合作谈判的顺利进行。在此方面， 中共对于国民党军就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牵制力量。

苏军占领东北后最初接触到的中国武装力量不是“国军”， 而是蜂拥而至的中共军队， 这让尚未接到外交指令的苏联基层部队有些不知所措。9月14日， 苏军代表飞到延安， 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在9月16日， 苏蒙联军代表又进一步向中共中央作了通报。苏方提出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苏军撤

离之前， 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地区， 已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共部队必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二是苏军不久即行撤退， 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 中共军队可接管锦州、热河、张家口和内蒙地区， 以防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 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 仍要为自己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 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 不准搬用， 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 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 均反映了这种情况。尽管如此， 苏联的意图仍很明显:表面上国共两党的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 但实际上， 苏联无法控制且最为担心的是国民党的军队， 却可以操纵共产党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 一旦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受到威胁， 便可以利用中共军队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这样， 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 又能保证内蒙、东北地区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蒋介石非常担心中共借助苏军的帮助在东北抢占先机， 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 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给总统。杜鲁门总统于9月18日作出答复， “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 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 “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 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 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24-27日就有消息传开， 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 国民党军将被空运和海运至平津。一方面美国在8月下旬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另一方面， 国民政府在10月初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 中国计划在东北吸引外资， 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

军舰抵达大连。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 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就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 莫斯科的担忧越来越加重， 所持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其后同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默认， “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 “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斯大林也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 “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 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共及其军队的宽容和友好态度， 均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10月上中旬， 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 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苏军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 设置重重障碍。与此同时， 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 加快了控制东北的步伐。10月3日， 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联军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 高度赞赏中共“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 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 并建议中共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 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第二天， 苏方又通知东北局， 称苏军准备把从日本关东军缴获的所有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都转交给中共。苏军指挥部还表示， 已决心“打开前门”， 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中共， 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掌管一个月。苏军甚至在已经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 也建议中共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10月6日， 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 估计其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 便请求苏军“一律拒绝， 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10天后彭真报告， 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 已被拒绝”， 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路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 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在国民党军准备登陆的安东， 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 还爆发了呼吁东北独立、撤消东北行营的集会。

10月25日， 国民政府正式通告苏方， 称国民党军将使用美国军舰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于是， 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 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 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 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 放开些干”， 如国民党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 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 毛泽东“甚为欣慰”， 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 控制东北， 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 然后同蒋开谈判， 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 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 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10月28日， 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各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 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

因受制于外交， 苏联无法拒绝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因此， 苏联一面应允国民党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 进至锦州、海城一线， 并同意其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4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另一面则通知中共， 中共军队可以“不加任何限制”地在营口、葫芦岛作战， 以及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 并可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为此， 毛泽东在11月上旬不断发出指示， 要求在山海关迎击国民党军队， 并指示“必务要将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 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 同时， 他还要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 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 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据东北行营的通报， 中共在长春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 约2000人已进入长春市， 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11月10日， 毛泽东致电彭真:“请求我们的朋友（莫斯科）， 让他们尽可能推迟国民党军队进驻满洲的时

间。”11月12日，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信心十足地宣称， “只要有现在的条件， 苏联不帮助我们， 我们也不怕”， 只有此战得胜， “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 此时苏联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共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以加强其同国民政府关于接收和经济问题谈判的筹码， 并未根本转变对华政策的方针。因此， 就在毛泽东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 进而占领东北的紧要关头， 莫斯科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等人发出一封密码电报， 指令“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 而且“越快撤出越好”。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 驻东北苏军指挥部便通知东北局， 称已经允许国民党在苏军撤退前5天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 而不准中共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 如果出现冲突， 苏方只能缴中共的械。苏军还一再声明， 这是“莫斯科的决定”， 任何人员无权变动。17日， 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 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 苏军当局又“郑重通知”东北局， “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 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 既不准与蒋军交战， 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 “必要时不惜用武力”予以驱散；东北全境， 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 均不准作战。同日， 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于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 中共部队撤出后， 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到哈尔滨接收。在重庆， 苏联大使馆也告诫到访的中共代表王若飞， “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 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中长路， 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24日， 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 称后者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 强调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 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二个月撤离， 以利中方接收。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 严格保

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 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12月4日， 张嘉璈、蒋经国率东北行营重返长春。后经双方协商确定， 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 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

12月下旬， 国民政府陆续实现了对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的行政接收。

莫斯科态度的突然改变， 是基于国际局势和苏联整体利益的考量。在中国， 蒋介石有意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早在10月19日， 国民政府就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 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11月8日， 蒋介石又在政府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 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 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一个星期后， 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 中方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 国民政府还照会各国使领馆， 通告苏联阻碍接收工作。随后， 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通告华盛顿， 并指责苏联人未履行1945年的中苏条约， 希望与美国密切协调行动， 防止局势继续恶化。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远不止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 在远东地区， 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 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磋商。在近东地区， 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 对苏联倍感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美国和联合国。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 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 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可以看出， 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 并争取美国对苏联主张的支持， 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 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 苏联不仅积极响应， 还立即开始与美国

紧密接触和协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了关于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则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

于是， 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他在12月30日与来访的蒋经国会谈时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 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 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 两支军队”， 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 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 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 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 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对中共方面， 斯大林则希望后者能放弃既定的目标。1946年1月， 苏联大使馆告诫中共驻重庆的谈判代表， 称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 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彼得罗夫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 尤其是伤及美国人， 必致引起严重后果， 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

面对如此形势， 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战略方针。11月22日， 刘少奇提出了“让开大路， 占领两厢”的口号， 准备“建立根据地， 作长期打算”。12月7~8日， 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 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12月30日， 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 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 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蒋军开进的地区， 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尽管很不情愿， 但是在苏联既定方针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 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独占东北的计划， 准备与国民党和解， 进入国民政府。1946年2月， 随着马歇尔主导的国共和平谈判的进展， 中共

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府委员会， 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 同时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梳理这一阶段的中苏关系， 可以看到一个吊诡的现象:中共在二战后初期采取的策略与行动阻碍了苏联在中国战略利益的实现———如果没有中共，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完全有可能得到顺利执行， 但恰恰又是中共成为了苏联维护自身在华利益的工具， 这就是中苏关系的复杂性。国共之间的对抗影响了苏联对华政策的选择， 反过来， 苏联政策的改变也影响了国共关系及中国局势的发展。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在中国大地时， 莫斯科的态度又发生了急剧转变。

三、苏联对中共的暗中支持和有限援助 (1946.4-1949.2)

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 副外长洛佐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曾作了具体的说明:第一， 中国政府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第二，中方必须保障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 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 应由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 “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 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 实现与中国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合作， 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 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可以想见， 如果在苏军撤退前这些目标如愿以偿， 苏联的对华政策会继续下去。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 1946年初的苏联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

为了及早撤军， 减缓国际舆论压力， 苏联代表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一再表示愿意让步， 称只要中方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合资经营， 苏方就会采取行动， 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而国民政府却恃美国的支持， 态度愈益强硬。1946年1月26日， 蒋介石指示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 对经济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 尽管苏方谈判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 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地区“霸占利益”， 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 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 中方对战利品问题“不予考虑”， 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 一切非金属矿业均不在合作之列， 即使在合作企业中， 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苏方坚持以签订经济合作协定作为最后撤军的条件的立场， 中方则强调在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之前无法谈经济合作， 以致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此时， 美国政府开始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月11日， 美国同时照会中苏两国政府， 称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 认为这一谈判“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 是对美国商业利益和威信的“一种明显的损害”， 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 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这无疑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 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1946年2月11日， 在雅尔塔协定签字一周年之际， 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苏联同意公布协定， 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 而美英的考虑显然针对中国东北问题。为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 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定。这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时间舆论哗然， 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 张贴标语， 示威游行， 发表演说， 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蒙古的行为， 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中国东北。3月5日，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 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3月6日， 国民政府照会苏联， 称撤军期限已过， 苏军尚未完全撤退， 要求苏联政

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 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 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 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 没有什么内政可言”。东北局势更趋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的报告， 国民党与当地的土匪勾结， 煽动反苏情绪， 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是苏方的机构， 不断骚扰、袭击和杀害苏联军人和侨民等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 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 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面对如此局势， 莫斯科不得不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只有把东北地区完全交由中共掌控， 才能保证苏联的利益。

1946年2月1日， 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 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 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 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不仅如此， 当2月2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提出策动内蒙古独立及并入外蒙古的计划时， 斯大林竟然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

3月12日， 东北局电告中央， 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 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 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然而， 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军事力量的对比， 中共中央决定， 不仅不去进攻沈阳， 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 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 以交换国民党军从热河撤军， 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3月中旬， 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 指责后者不应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苏军还表示， 凡苏军撤离之地， 包括沈阳和四平， 中共都可以“放手大打”。另一方面， 美国的态度也引起毛泽东的强

烈不满。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但长春以北应让中共军队驻扎。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

在苏联的支持和美国的压力下，中共对东北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同意他们派兵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毛泽东还指示东北局速与苏方接洽，以驻兵“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3月18日，东北局报告:鉴于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复电表示同意。3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东北局，如苏方同意，“即可进占长春”。23日，中共中央甚至要求林彪立即采取行动，动员全军，“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

为了配合中共的部署，苏方此前曾以瘟疫、交通不便等借口延缓撤军，并且迟迟不将撤退时间告知国民政府，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中长铁路北进的困难。而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同中共方面的配合日益紧密。3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指示后者速与苏军交涉，力求能在苏军撤退时被允许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与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称一旦条件具备，即会通知中共接管长春，与此同时，苏方还通告东北行营接收人员，称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25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要求即刻与苏方联系，请后者“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令中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两日

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并以长春为首都。

3月底， 中苏经济谈判重新开启且似有进展， 苏联的态度因而再次出现反复， 以致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时出现了一些周折。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苏联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 苏方一面答复国民政府， 称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的日期， 并协助国民政府接防部队；另一面却接连通知东北局， 告以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 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此三市近郊待机， 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向东北局解释说， 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 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 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 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 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 造成美蒋被动。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 苏联还对国民党采取了麻痹战术。4月13日， 苏联大使馆信誓旦旦地向中国外交部重申， 将通知驻东北苏军的具体撤离时间， 并将尽力协助中方完成接收任务。但第二天， 苏军即突然撤出长春， 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 当天便占领了长春机场两处、市区一部， 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19日， 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 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 成立东北自治政府。同时， 中共中央还要东北局一面向四平增兵， 再打几个胜仗， 另一面则“全力夺取哈、齐二市”。20日， 苏军代表告诉高岗， 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 无法再提前， 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 进城后即可得到。按照计划， 东北民主联军于25日攻占齐齐哈尔， 28日进驻哈尔滨。

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 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 中共中央此时(4月21日) 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 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然而， 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已经悄然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

持， 1946年2月上旬和3月， 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 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 都相继投入到东北战场。东北地区国民党正规军的兵力， 已由1946年1月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同一时期中共在南满的军队共计10.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 随即兵分两路， 向南进攻本溪， 向北增援四平。此时， 中共颇有骑虎难下之感。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 急需休整补充”。4月27日， 毛泽东提出“化四平街为马德里”；28日便询问林彪，是否考虑尽快停战；30日， 又指示“死守四平， 寸土必争”。5月1日， 东北局复电称:“战争以快停为有利。”毛泽东当日命令林彪:坚守四平、本溪两处， 消耗敌军， 以利和谈。

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任何喘息的机会。5月初， 驻东北苏军全部撤退回国。5月5日， 国民政府宣告还都南京。5月8日， 斯大林提出与蒋介石在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的提议，同时下令全力围攻四平和本溪。5月14日， 新六军攻占本溪后， 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 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 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 于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此后， 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 兵力分散， 力所不及， 止步于松花江， 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不过在关内， 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 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 这大概是斯大林所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 利用共产党，通过与国民政府建立起来的正常外交关系， 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 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 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 不知道在蒋介石和毛泽东眼里， 停战谈判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

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 国民党在东北经济谈判中的强硬态度及其对美国援助的依赖， 更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 促使后者不得不开始将重心向中国共产党一方倾斜。在这里可以看到的， 不是美苏关系影响了中国政治局势（这也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不能允许的）， 反而是国共关系的发展影响了整个亚洲的国际格局。

1947年， 国共内战的趋势发生战略性转折， 中共转守为攻。至1948年底1949年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发动三大战役， 同国民党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不过， 就整个二战后国际局势而言， 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 即使1947年秋冷战局面在欧洲出现以后， 莫斯科的立场也是防御性的。美苏双方都无意进行全面和公开的对抗。在1946年前后， 苏联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共的有限支援，以使后者能在中国东北和内蒙一线站住脚跟。斯大林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在远东地区获得的现实利益。然而， 这种支持和援助又是有限度的:一方面， 为避免引起舆论谴责并维持与国民政府的正常外交关系， 这些支持和援助在形式上必须是秘密的；另一方面， 为维持和稳定体现了苏联利益的雅尔塔体系， 这些支持和援助在范围上必须要限定在中国长城以北地区。

总体来看， 苏联对中共的有限支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提供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到1945年11月初， 苏军就已向中共军队转交了从日军缴获的至少12万支步枪， 约4000挺机枪。此后， 苏军在撤退时又向中共转交了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有学者统计， 至1946年夏秋， 中共总计获得长短枪20-30万支， 机枪8000挺， 各种火炮1000多

门。然而， 由于这些武器装备中的相当一部分被用来支援华北作战， 故东北民主联军退守北满时， 虽有兵力32万多人， 却只有长枪16万支， 轻机枪4033挺， 重机枪749挺， 各种炮556门。为此， 林彪曾于1946年10月3日派代表去苏联， 要求获得军事援助。有俄国学者指出， 这是此期中共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唯一的一份文件， 但苏方没有给予答复。后来（到1947年6月止）， 苏联通过北朝鲜向东北局援助了从日军缴获的四批共约800-1000个车皮的军用物资。此外， 苏联控制下的旅大地区实际上也成为中共支援前方作战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基地。在解放战争期间， 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 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

第二， 通过贸易往来给予经济援助。1946年12月21日， 应中共方面的要求， 苏联对外贸易部与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进行了首次贸易谈判， 并签署了贸易合同。1947年7月14日， 斯大林亲自签署了一项决议， 要求各部门于11月1日前向外贸部提供一批出口计划外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这批准备提供给东北民主联军的物资包括400辆汽车、60台各种功率的电动机、2000台军用整流器、3200台不同用途的电话机、50000米军用电缆、10000米棉布， 以及电台、收发报机、药品和医疗设备等， 其中大量物资是通过减少苏联国内的供货计划而转为出口的。7月21日， 苏联部长会议作出一项计划在1949年向东北民主政府提供出口物资的决议， 这一决议提到的物资包括3000辆运输汽车、1500吨航空汽油、2.38万吨车用汽油、1443台电动机等。据统计数字显示， 至1947年底， 苏联与中共政权（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贸易总额已达3.211亿卢布， 并于1948年猛增至6.502亿卢布。这对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 为中共提供交通线和后勤基地。在东北内战期间， 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既是中共调兵遣将、转移物资的交通线， 又是安置伤员、贮存物资的后勤基地。据驻韩美军情报反映， 1946年8月， 中共军队“分布于满浦、清津和定州的广阔地区”， “北朝鲜几乎整个铁路网都被用来转移这些军队”。1947年1月， “中共军队仍持续不断地转移到兴南-咸镜地区”，“已经进入朝鲜的实际人数据估计不少于5-7.5万人”， 其中， “1-2万中共军被迫到北朝鲜避难是有可能的”。美军情报认为， “有可能中共正利用北朝鲜作为后勤基地支持当前满洲的战事”。此外， 转移的物资主要是兵工厂设备。1946年6月， 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中， 通化的300多车皮的机器和物资， 就是经图们和南阳转移到珲春的。军工部的子弹厂、炼钢厂、化学厂也是先迁到朝鲜阿吾地， 最后又搬到珲春的。据不完全统计， 中共通过四条水路交通线经朝鲜转运的物资， 1947年1-7月有21万吨， 1948年全年达30.09万吨。中共党史资料显示， 在撤离安东时， 除了留下少量部队打游击， 中共安东地委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全部撤到了朝鲜， 大批军需物资和其他主要物资也都被转移到了朝鲜。据报告， 通化、安东失守后， 中共有1.5万多伤兵和家属越过鸭绿江， 被分散安置在朝鲜居民家中， 重伤员则被送进医院治疗， 暂交朝鲜保存的物资有2万多吨。直到1947年6月， 还有2000多人滞留朝鲜。在斯大林看来， 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就是中共的战略后方。

第四， 帮助修复东北地区的铁路网。中长铁路的修复不仅对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也对东北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意义。苏军占领东北后， 首先修复了满洲里至绥芬河线。苏军撤退后，苏方铁路员工在北满根据地继续铁路的修复工作， 到1947年春， 在北满中共政权管辖区域内的整个铁路主干线已经修复通车。1948年3月， 除沈阳、长春、锦州等几座孤城， 东北全境已在中共掌握之中。在这种形势下， 无论是大规模调动军队围歼守敌， 进而入关南下， 还是迅速恢复东

北经济， 为解放全国建立巩固的后方， 都迫切需要全面修复东北铁路网。于是， 中共直接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一要求。5月13日， 苏联政府决定派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 赶赴东北组织恢复东北铁路运行的相关工作。6月， 科瓦廖夫率数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携带大量设备和材料抵达东北。当年底， 科瓦廖夫欣然向斯大林报告:任务基本完成， 中长铁路几条主干线全部通车， 并指出， 此举将有力地促进全歼满洲国民党军。随后， 应中共要求， 苏联政府又作出决议， 决定尽快恢复和保证东北铁路的正常运营。据俄国资料显示， 1948年5月到1949年9月，苏联政府为援助中长路修复前后作出了5个决议， 以贷款或易货贸易方式向中共政权提供的机车、车厢、钢轨等物资援助总计达8760万卢布。

总而言之， 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与援助， 对中共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以及战局的扭转， 均起了重要作用。但是， 要说此时斯大林已经期待甚至决心帮助中共夺取全国政权， 恐怕为时尚早。至于苏联对中共提供支持和援助的限度， 以下实例具有典型意义。

第一， 苏联迟迟不向中共政权派遣顾问和专家。如果说派遣专家修复中长铁路是苏联分内之事， 外界无可指摘， 那么要派遣大量顾问和专家帮助中共政权建设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了。1948年9月8日， 林彪直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要苏联帮助制定东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计划， 并请求派来至少100名各部门的专家， 此信还列举了14个方面所需专家的具体人数。10月6日， 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 称“不宜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 建议先派“一名非常有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前往联系， 至于向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 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再行商议。在征得斯大林同意后， 莫洛托夫于10月16日将此答复发往哈尔滨。1948年12月科瓦廖夫回国后向斯大林报告称， 毛泽东、林彪、高岗和陈云

再次请求向斯大林报告， 中共急需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 特别是顾问和专家。按照科瓦廖夫的计算， 苏联至少应派出500名计划专家、工程师和其他各种工业专家。与此同时， 葛罗米柯也向莫洛托夫报告， 对林彪信中提到的往满洲派100名苏联专家的要求， “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同时， 应尽快帮助东北民主政权恢复经济， 并迅速修复华北铁路。结果， 苏联满足了中共关于迅速修复华北铁路的要求， 并将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在华停留期限从原定的1949年1月1日延长至4月1日， 只是苏方认为，关于全面经济计划和派遣专家的制定问题， 应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再行讨论。

第二， 斯大林一再拒绝毛泽东访问苏联。为了取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于1947年初提出要去莫斯科面见斯大林。6月15日， 苏联通知， 可以派飞机到中国来接毛泽东。7月1日， 斯大林又突然改变主意， 推迟毛泽东访苏。1948年4月， 毛泽东再次提出访苏。斯大林当即（4月29日）答复， 同意毛泽东的计划， 但几天后（5月10日）， 又以安全为由， 建议毛延缓动身日期。7月4日， 毛泽东通知斯大林， “决定近期”前往莫斯科。斯大林则借口苏共领导干部要忙于粮食收购， 将访问日期推迟到11月。毛泽东对此颇有怨言， 但无可奈何。到11月20日， 莫斯科方面并未如约提出访问事宜， 毛泽东只得主动提出因身体不适， 推迟出发日期。1949年1月9日， 毛泽东提出准备动身， 希望苏联在20日之前派飞机来石家庄接。1月10日， 毛泽东再次电告斯大林， “急需”面谈， “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斯大林于14日复电称， “我们依然坚持认为， 您最好暂缓执行马上来”， 但提议由苏共派遣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同毛商谈。

第三， 苏联有意单独出面主持国共和平谈判。1949年初， 人民解放军陈

兵长江， 控制了中国的半壁河山， 蒋介石被迫下野， 国民党提出国共和谈， 并请四大国出面调停。斯大林获悉美英等国即将出面调停， 面对雅尔塔格局已被打破的现状， 非常担心美国对中国局势进行政治干预， 掌握在亚洲的主动权， 因而向毛泽东建议， 要中共接过“和平的旗子”， 利用其主动地位请苏联单独出面主持国共和谈。毛泽东此时已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夺取全国政权， 认为苏联出面调停反而会引起西方国家干预， 进而造成保住国民党政权的后果（其结果甚至可能造成“南北朝”的局面——这是毛泽东后来的说法）， 因而坚决反对斯大林的“迂回策略”。面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和美英宣布不参与国共和谈的尴尬局面， 斯大林只得收回自己的建议。尽管如此， 他仍坚持认为， 提出和谈是美国人主导的阴谋， 拒绝和谈会给西方进行武装干涉提供借口。

可以看到， 斯大林此期对中国革命仍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虽然冷战已经爆发， 而且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作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斯大林最初的战略设想是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 集中力量整肃阵营内部， 统一思想和步调， 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 日丹诺夫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 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 特别是在柏林危机最后阶段采取退缩让步的方针， 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 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特别是在亚洲。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 加上对中国的局势尚无把握， 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 又不便给予直接的、公开的、全面的支持和援助。这种情况到1949年春天开始发生变化。

四、苏联放手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1949.3-1949.10）

苏联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变发生在1949年初。就是此时， 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给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出示了一封斯大林的电报:“从现在起， 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

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 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的角度出发， 还是着眼于苏联安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都只是在雅尔塔体系的框架内把中国长城以北地区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一目标到1948年底已经完全实现， 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但是， 随着中国内战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发展下去， 斯大林对中共的继续支持和帮助就开始面临日益严峻的风险。问题主要来自美国和中共两个方面:第一， 如果美国无法接受共产党掌控中国的结局， 而在最后时刻站出来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 那么苏联就不得不面对其无力应对而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同美国的冲突。第二， 如果中国共产党部分或全部摆脱莫斯科的控制， 甚至与美国拉上关系， 那么苏联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其最终结果有可能致使苏联失去已经到手的在华利益和优势地位。无论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 此时的斯大林都必须格外小心谨慎。

莫斯科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局势发展的态度和立场。随着中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苏联对美国可能的反应的警惕也与日俱增。1948年4月2日，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提交了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报告， 其中谈到， 在中共武装力量的打击下， “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 但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蒋介石已准备撤离首都， 并与美国人一起在华南建立

根据地。美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 其基本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 奴役中国， 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5月10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苏联驻华使馆， 要求其在与反政府人士接触时必须“依据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密切注意美国人在华活动， 揭露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资料和事实。6月中旬， 斯大林在拒绝毛泽东访苏的同时， 还推迟了中国解放区一批工人和工会干部到苏联学习的日期。

实际上， 中共胜利进程越是加速， 莫斯科就越是紧张。罗申在1948年12月与其他国家的驻华使节接触时， 不断询问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12月27日， 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备忘录认为， 美国停止向蒋介石提供援助已经“不是意外之事”， 但是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在增加， 其表现就是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 并极力推动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 加入联合政府。斯大林尤其不愿在这个关键时刻刺激国民政府， 以免为美国插手中国事务提供机会和借口。新年前夕，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因当地发生的反苏活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 称这是对苏联的“敌视和挑衅”。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接到报告后， 却批评齐赫文斯基“措辞过分强硬”。1949年1月1日，《真理报》还发表了塔斯社的“辟谣”， 说苏联无意参与对国共内战的调停。但斯大林却私下致电毛泽东， 提议由苏联单独出面主持国共和谈，其目的就是排除美国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 斯大林的情报和判断有误， 美国不仅没有策划国共和谈， 甚至先于苏联拒绝出面调停。既然有迹象表明美国不会继续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帮助蒋介石，那么苏联的第一个担心大致可以解除了， 但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风险就更大了， 就是中共的立场和倾向问题。

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上， 曾多次出现严重的分歧和矛盾， 如西安事变（1936年）、皖南事变（1941年）、重庆谈判（1945年）等， 其结果都是中共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被迫改变自己已定方针和政策。与以往的情况不同， 在1949年1月调停和谈的问题上， 却是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 如此顶撞斯大林， 毛泽东是继铁托之后的第二人。如果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 又不服从莫斯科的指挥， 甚至与美国人走到一起， 那么对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安全岂不是更大的隐患?斯大林也确实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苏联驻华使馆三秘马卢欣12月27日的报告认为， 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毛泽东在1949年1月7日的谈话中透露， 美国人试图与中共接触， 司徒雷登大使就派人到香港找过中共。苏联人无疑开始担心起来， 关于调停和谈的争论结束后， 斯大林决定不再邀请毛泽东访苏， 而是必须派人去中国实地了解情况。

关于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的过程， 目前已有大量俄国档案问世， 情况已经基本清楚。在双方举行的12次的正式会谈中，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充分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和态度:高度评价历史上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 称“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 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充分肯定苏共的经验， 反复强调向苏联学习的决心， 毛泽东甚至几次坚持说自己就是斯大林的学生；在苏南冲突问题上同苏联保持一致， 毛泽东称铁托就是中国的张国焘， 是叛徒；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强调“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 “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 “对我们来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反复强调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要求苏共“在中共中央设立代表机构”， 因为中共的“主要问题要在莫斯科解决”。这些显示忠诚的表态， 无疑都令斯大林感到欣慰。至于苏联最关注的中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 周恩来强调， 早在美军观察团到延安时， 中共就坚持“禁止美国干涉我国内政

的政策”， 而自从马歇尔调停失败后， 中共与美国的联系就中断了。接着， 周恩来便大谈中共在战后与美国爆发的六次冲突， 并总结说， “我们不会挑起事端， 但如果美国反对我们， 我们将给予坚决的回击”。当米高扬转达斯大林的意见———新中国“不应马上激化同美国人的关系”时， 毛泽东坚持认为， 因为美国支持蒋介石反动派， 所以中共最主要的敌人是美国。

尽管如此， 斯大林似乎还有些不放心， 提出了所谓苏联调停国共谈判的泄密问题。斯大林把自己的判断失误归咎于中共中央泄露了双方讨论调停问题的情况， 一方面是委过于人， 挽回面子；另一方面也是在向中共施加压力。他坚持认为， 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就是美国间谍， 并要求中共立即逮捕此人， 还指出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是美国间谍。毛泽东虽然最初对此颇有不满， 拒绝认错， 但在米高扬走后不久， 当1949年2月22日《真理报》刊登了斯特朗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消息后， 还是把李敦白关押了起来。为了让斯大林下决心给予中共全面的和公开的支持， 毛泽东不得不表现得顺从一些。

尽管笔者目前还没有发现苏共中央做出的明确决议， 但基于很多迹象发现， 从这一时期开始， 苏联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笔者对俄国出版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日程目录做了粗略统计， 从1945年至1948年， 每年被提上政治局会议讨论议程的问题大约有830-1310个不等， 而直接涉及中国的， 1945年有6个， 1946年有8个， 1947年有6个， 1948年有12个， 其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直到1947年才出现1个， 1948年也只有3个。但在1949年， 被讨论的中国问题已猛增到86个， 而且大多数都是与中共有关的。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她在苏联的亲身经历， 叙述了1947-1948年苏共干部和机关对中共的冷淡态度。据她的观察， 1948年11月初， 苏联报纸开始刊登一些有关中共胜利进军的消息。直到1949年1月下旬解放军占领天津和北平以后， 苏联报纸才打破长期的沉默， 发表了有关中国内战的社论。美国驻苏联参赞福伊·科勒在报告中讲述得更具体:1949年2月初苏联的《文学报》和《新时代》杂志突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局势的评论文章——这是几个月来苏联报刊第一次对中国局势发表看法， 而且无论在主题上还是用词上， 都与中共刊发的文章保持了一致。选择《文学报》和《新时代》， 而不是更具官方色彩的《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和《消息报》（最高苏维埃机关报）在米高扬访华之初刊登这些评论文章， 说明斯大林一方面要向中共传递一种示好的信息， 另一方面在没有把握中共中央对苏联的明确立场和态度之前仍较谨慎。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及其结果， 成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转轨最重要的拐点。米高扬走后， 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向苏联靠拢的方针。3月13日，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没有各国无产阶级， 首先是苏联的援助”，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强调“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 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 是盟友， 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此后， 中共与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对于会谈中提到的问题， 双方进一步交换了意见或作出答复。同时， 中共也开始在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进一步密切同莫斯科的沟通与协商。此外， 中苏两党之间的联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只有捷列宾作为联络员转交来往电报， 而现在科瓦廖夫被指定为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的代表， 直接与中共领导人讨论各项工作。

西柏坡会谈后， 苏联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2月6日， 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 责成苏政府有关部门在10天之内将中长铁路所需要的汽车、汽车备件和器材以贷款供货的方式发送到中国；责成财政部从1949年度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给交通部拨付在东北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所需经费578万卢布， 指示对外贸易部和国家银行再提供经费240.1万卢布；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中国东兴公司签订关于以商品供货方式清偿外汇支出和苏联外汇支出的协议；简化科瓦廖夫工作组人员的出入境手续；责成远东军区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为科瓦廖夫工作组提供通信工具、翻译、司机及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责成科瓦廖夫在一个月内就中国各生产领域和国民经济规划提出所需参考书和技术文献， 以保障苏联专家与顾问的工作。5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还做出决议， 决定租用5艘外国货轮（总载重5.5万吨）从黑海为中国北方地区运送石油产品。6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还通过了帮助中国清除长江口的水雷的决议。此外， 苏联还为中共提供了急需的贷款。1949年3月苏联部长会议命令为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解放区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贷款（其中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5月14日同意为出国工作的新华社记者拨款16万捷克克朗和5.3万英磅；同一天又决定为中共重要领导人到苏联治病提供200万卢布的贷款。

1949年6-8月，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了直接会谈。斯大林为这次会谈进行了充分准备和周密安排， 满足了中共提出的各项要求， 并明确表达了苏联全面支持中共、接纳中共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定立场。在贷款、贸易、专家、海军建设、空军建设等各方面， 斯大林承诺将为中共提供全面和优惠的帮助， 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甚至主动表示愿意提供汽车、运输机和战斗机， 帮助中共尽早占领新疆。让中共感到欣慰的是， 斯大林多次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作出高度评价， 并对苏共过去在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他还主动提出， 希望中共利用自己的革命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

命提供帮助， 并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托付给中共。当然， 在这次会谈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主要涉及到与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的东北问题和外蒙古问题， 以及解放台湾战役苏联提供海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对这些问题， 双方采取了暂时搁置或退让的方针———中苏双方此时首先关注的是政治和战略问题， 宁愿将未来主权和利益上的分歧拖到以后解决。无论如何， 斯大林在此次会谈中表达了与未来新中国结盟的意愿。既然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达成了共识， 在国际斗争中也形成了一致的战略考虑， 那么结盟显然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由此可以认为， 刘少奇访苏以后， 苏联与新中国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就在刘少奇把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以后， 毛泽东决定公开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和建国方针。斯大林对此甚为满意， 8月12日亲自给毛泽东发电， 对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

正是出于尽快建立同盟关系的考虑， 斯大林在与刘少奇的会谈期间， 要求中共立即着手筹备国家宪法， 并组建中央政府。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之际， 苏联人又通过巧妙的外交安排， 即在苏联报刊上公布关于同新中国建交的答复的同时， 通知东欧国家可以同中国建交， 如此一来， “与民主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倡议就会被认为是苏联提出来的了”。

五、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中国内战与亚洲冷战

总体来看， 从二战结束到中国内战结束期间，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苏联主要是通过与国民政府交涉来实现在中国的战略利益， 中共只是斯大林手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张牌， 这一阶段的历史拐点出现在1946年春；第二阶段， 苏联从东北撤军前后， 开始支

持和援助中共， 但仅限于东北和长城以北地区， 而且是通过不公开的方式进行的（大量的是通过北朝鲜）， 这一阶段的历史拐点出现在1949年初；第三阶段， 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 通过米高扬访华， 毛泽东表明了追随苏联的明确立场， 斯大林最终决心彻底改变对华政策， 并在刘少奇访苏期间表示将全面支持中共建国。还要补充一点:尽管1949年夏天毛泽东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 中苏同盟的正式建立（1949年底至1950年初）还是经历了一场为维护各自国家利益而展开的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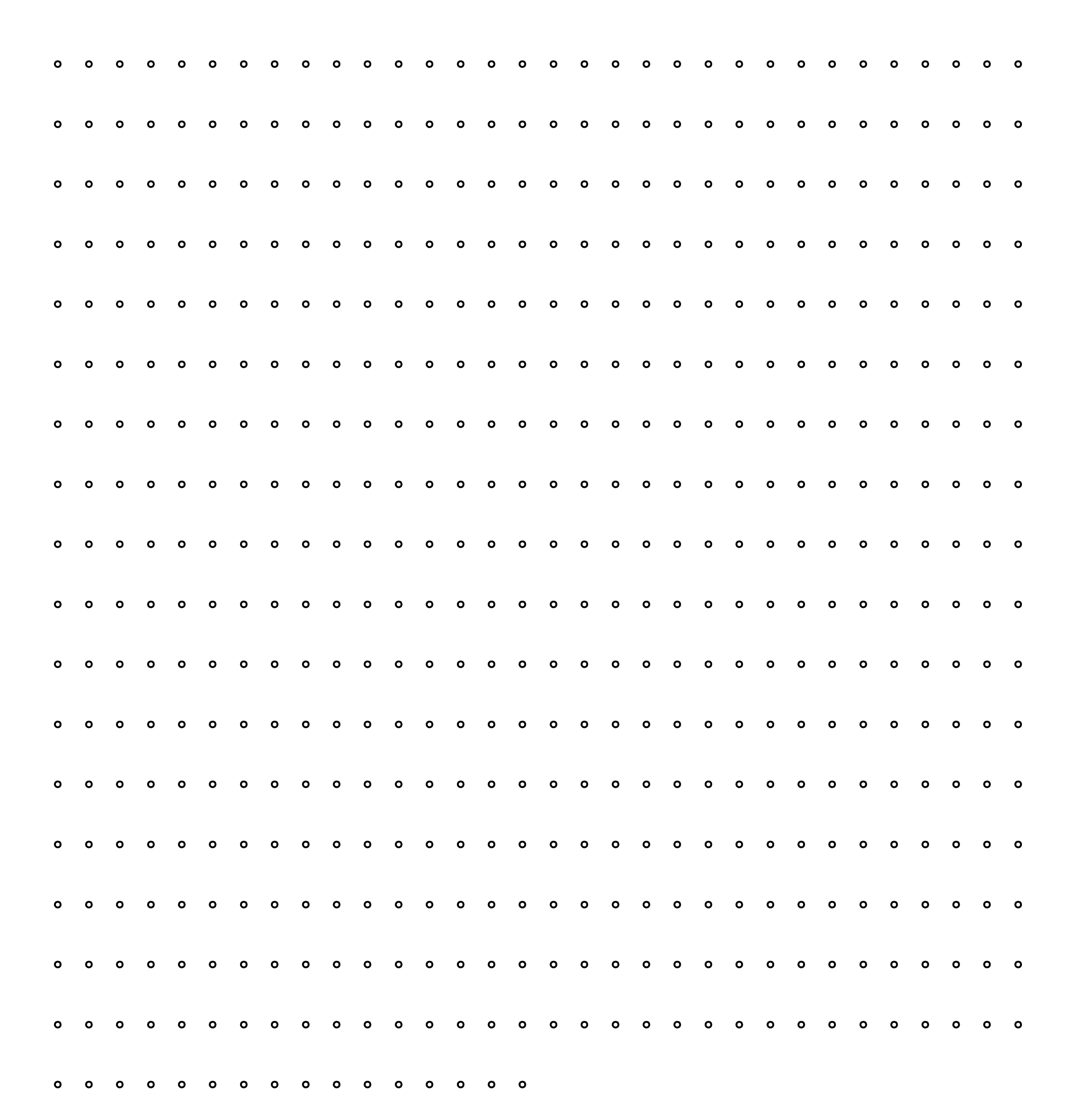
从苏联对华政策转变的轨迹可以看出， 苏联与中共结成同盟关系， 无论对斯大林还是毛泽东， 现实利益都是首要的和主要的考虑因素， 意识形态是次要的而非“关键的因素”。1944-1945年间， 斯大林选择蒋介石作为合作对象， 而毛泽东则更看重与美国拉近关系；至1949年初， 双方均一改初衷， 斯大林开始全力、公开地支持中共， 而毛泽东则在党内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在这一过程中， 双方的着眼点都是现实利益， 而非意识形态。笔者同意文安立的观点， 即“在国际承认方面最重要也是对中共最为实际的， 当然是来自莫斯科的承认”， 但同时认为， 斯大林接受毛泽东的新中国， 主要不是因为中共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恰恰相反， 斯大林一再告诫中共不要急于按照苏联的方式搞社会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而是因为中共一再表达了追随莫斯科的决心和忠心。

当然， 意识形态对于中苏结盟并非没有意义， 其作用主要体现为三点:其一， 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必要条件。是否真正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另一回事， 但没有这张“入场券”是不行的；其二， 中共宣布追随莫斯科走社会主义道路， 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 都是对党员和国民解释中苏结盟必要性、合理性的需要；其三，

中共没有经济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经验， 从一个非法的在野党突然转变为执政党， 唯一可以接受和仿效的发展模式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出， 汉斯•摩根索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性显然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 考察苏联对华政策转变的历史过程， 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现象:第一， 战后初期苏联采取的是与美国合作的方针， 甚至在中国谋取战略利益方面还要得到美国的协助和支持；而在中国，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和谈或者联合， 都只是策略和口号。因此， 美苏关系与国共关系的起点是完全不同的， 国共内战的爆发先于美苏冷战。第二， 到1947年夏天以后， 苏联与美国在欧洲已经从合作走向对抗， 但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主要是防御性的（这一点与美国异曲同工）， 另一方面， 苏联并不愿意把这种对抗扩大到雅尔塔体系中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这一点又与美国不谋而合）。而在中国，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双方都必置对方于死地。因此， 美苏关系与国共关系的表现也不同， 前者是冷战， 后者为热战。第三， 美苏都曾试图影响国共， 采取合作或联合的方式解决中国政治问题， 而国共也都试图说服、诱导美苏站在自己一边。最后的结果， 不是美苏分别影响了国共， 而是国共斗争的结局影响了美苏在亚洲的关系:首先是苏联决定全力支持中共建立一个新中国政府， 并与之建立起同盟关系；接着是美国在中苏同盟条约公布后， 制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 对苏联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行了全面遏制战略。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不是美苏各自的政策分别影响了国共双方的关系， 而是国共斗争的结局影响了美苏各自在亚洲的政策；不是美苏冷战引起了中国内战， 而是中国内战及其结果引发了美苏在亚洲的冷战格局。



https://m.aisixiang.com/data/57139.html

[俄]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 [美]亚历山大•潘佐夫 著 * 姚显 译 来源：《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1

中国、西方和俄国历史学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持有相同的看法，即这一时期可以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1949—1953年)，与“根据苏联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3—1958年)。这一分期意味着直到1953以前，毛泽东和毛主义者尽可能地实施他们自己截然不同于苏联的策略和战略。毛等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考虑到这一事实：中国比俄国要落后得多，因此还没有为社会主义做好准备。中国斯大林化的过程—实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化模式—开始于1姗年的某个时刻。一些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迅速结束是“始料不及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指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人“为什么恰恰”在1卿年选择了斯大林模式。

乍看起来，这种看法似乎符合历史事实。的确，中国共产党在获得政权时并不是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中共用来吸引中国人的是民族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在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和1937—1949年被称为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共在与其历史宿敌国民党的斗争中，放弃了它的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形象。它并不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更希望按照中国总统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路线：民族、民主和民生(后者包括了各种有益于

人民大多数的社会和经济计划)来进行社会改革。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理念进行了自由主义式的解释，许诺在严格的国家控制之下保证私人所有权、刺激国民私营商业、保护国内市场和吸引外国投资，降低税率、发展多党体系，组织联合政府，以及维持民主自由。

正如毛泽东所宣称的那样，这种“新民主主义”学说与“西方的旧民主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毛在1939年12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写成的小册子《论新民主主义》中提出了这一新路线。他又在随后的一系列著作中和他在1例5年中共七大上的著名讲话(论联合政府》中，继续发展了这一路线。

共产党人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十分依赖中国的民主传统。如果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许多因素的激发下，中国政治文化发生了实质性的革新。这些因素包括了1911—1912年反君主制的辛亥革命的胜利，1912年1月1日宣布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颁布宪法，第一次议会选举和议会辯论，反对孙中山继任者袁世凯及其恢复帝制计划的斗争，1924—1927年第一次联合战线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联合与竞争，学生和工人运动，以及最后宣布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1915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反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1918一1922年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和1935年反日的一二•九运动，则加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主倾向。许多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非常活跃，成为中国人口中积极拥护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部分。

在尖锐的对立中，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将孙中山的思想解释为强硬的国家主义。他认为必须要采取以下措施：对经济和私有权进

行国家控制，发展农业的集体化，加强国民党政治独裁，铲除异己。这些观点使得国民党极大地疏远了自由主义者，并最终发现自己陷于孤立状态。

中国共产党设法利用了这种状况。它联合了所有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力量，在国内战争期间将国民党彻底击败，并于1949年年底夺取了中国大陆。1949年9月30日，共产党人组织了一个多党联合政府，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三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旧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毫无疑问，中国与苏联及其卫星国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而积极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并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与联合国军队作战。但是在这一时期同样真实的是，至少在形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复制斯大林式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斯大林式模式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进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投巨资于国防，消除私有权，对农民进行集体化，并对公民的政治和智力生活实行僵硬的一党控制。中国共产党官方在1953年宣布开始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到1958年年底的大跃进时已经成功地将中国斯大林化。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斯大林化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简单。在苏联和中国发现的重要档案文件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解释。

一、斯大林、毛泽东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根据已有的文件，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绝没有与斯大林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过程发生冲突。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与共产国际的“人民民主”整体转向是完全一致的。

共产国际的这个转向发生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和之后。此时斯大林开始预见到纳粹是苏联面临的现实威胁。斯大林的这种预见是他改变共产国际策略的主要原因，因为他试图在民主国家中寻找盟友。不用说，在斯大林自己打的算盘中，他并没有放弃要实现共产主义者统治世界的战略目标。他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在本质上仅仅是想欺骗西方。在二战期间，斯大林甚至解散了共产国际。根据南斯拉夫驻共产国际代表米洛凡•吉拉斯的回忆，解散共产国际的想法首先是在“巴尔干国家正在与苏联联合起来”的时候。斯大林自己也在1944年透露了这一点：“共产国际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共产国际正在偏离自己的方向—内部不合变得越来越严重。”斯大林所谓的“人民民主”其基础就是欺骗，他在与他关系亲密的布尔什维克同志进行私人谈话时从不掩饰这一点。吉拉斯回忆到：

他所提出的建议在实质上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不应当“害怕”英国。他的意思是，为了不让他们觉察到南斯拉夫正在发生一场革命或者正在被共产党人努力控制，我们应当避免任何打草惊蛇的举动。斯大林愤怒地说：“你们为什么要在帽子上戴上红星？这种形式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收获。你们竟要红星。天哪，红星根本不必要。”

这种政策也极大地方便了共产主义者在战后对他们的国家进行统治。共产主义组织作为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它所具有的能力使得它很可能统治一个由各种民族主义力量组成的、相对广泛的联盟。毕竟，斯大林只能

从苏联卫星国的胜利中获得好处。

斯大林在寻求胜利的同时也非常谨慎地考虑了其后果。作为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不得不对将要出现新的共产主义权力中心而感到担心。一个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或者更有可能的共产主义中国，都可以通过专制的方式来实现苏联式的经济快速现代化。这也许会对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中的统治构成挑战。斯大林将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者的野心限定在其国内革命的“民主主义”任务上，使他们和他们的政策听令于自己。

斯大林一直坚定地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农民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看法可能加重了斯大林对出现一个强大中国的担心。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兴起于农村，这看起来违背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关于工人阶级“历史角色”的思想。毛泽东从来没有去过莫斯科，斯大林对其知之甚少。而克里姆林宫从中共党内外通风报信者那里不断收到的信件，都将毛谴责为“反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些通报者之一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前领导人王明，他也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中最咄咄逼人的一个。1943—1945年间，王明通过苏联驻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阿洛夫和弗拉迪米洛夫向斯大林通风报信。弗拉迪米洛夫也向莫斯科报告了中共领导人一些让斯大林不满的特点。因此毫不奇怪，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曾将毛称为“一个原始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不能低估斯大林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持的教条方式。斯大林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快慢依赖于一个共产主义者建立了统治的国家的社会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速度，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将不得不经历一个更长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类似于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然斯大林和他的同盟者在实践上要比在理论上激进得多，但在进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说教时，他们仍然狂热地奉行那种类似于圣礼般的教条宗教仪式。

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反法西斯联盟这个决定了斯大林发生转变的第一个因素已不再存在。而共产主义者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中控制了许多国家，也使得第二个因素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共产主义者不需要为了方便进行他们的革命而扮演民族“民主主义”党派的角色。但是，斯大林对出现多极化共产主义世界的担心和对理论教条的坚持，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他对毛泽东的怀疑也是同样，特别是在1948年“铁托震荡”之后，即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铁托(肠加)(他被莫斯科认为是与苏联最亲密的苏联卫星国的领导人之一，但却出乎意料地显示了莱鹜不驯)与斯大林发生决裂。“铁托事件”发生后不久，斯大林在和他的密友进行的私下谈话中，对可能来自中国的新威胁感到担心：“毛泽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农民观点，他看起来害怕工人，并使他的军队脱离城市人口。”

从1945年到1949年间，斯大林在他的地缘政治战略中不得不考虑新出现的美国核垄断。由于苏联还不能做好准备来对似乎非常可能的美国核打击进行反击，因此斯大林不得不竭尽全力不激怒华盛顿。大国之间1945年2月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定和苏联与中国国民党1945年8月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也限制了斯大林的主动权。这两个条约因为国民党政府在远东的经济、政治和边界问题上向莫斯科做出了让步而有利于苏联。毫无疑问，斯大林并不想为了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危害这些利益。因此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斯大林就表露出他对中共夺取政权的疑虑。1945年秋，斯大林甚至

建议毛泽东与蒋介石“达成暂时的妥协”。但是当毛泽东向他保证中共将会与各种困难做斗争时，斯大林迅速地改变了这一“偏差”。直到苏联在1949年8月研制成功了原子弹之前，斯大林对中国内战所采取的政策一直十分谨慎。

上述这些因素，不仅导致了苏联对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了非常克制的方式，也影响了中共。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时候，恰恰是在斯大林提出解散共产国际想法的时候。为何如此巧合？很明显这不是巧合。毛也许对斯大林“也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他非常明白他要在中国的斗争中取得成功，就必须得到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支持。因此，他必须非常忠于斯大林，特别是在他知道斯大林的多疑本性之后。比如说，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1948年8月28日毛就他访问苏联时将可能讨论的各种问题而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宣称：“为了使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与苏联的路线相一致，我们将达成协议。”而在1944年毛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打交道时，斯大林每隔一段时间总要给毛泽东很真实的共产主义热情降温。看起来奇怪的是，在为“新民主主义”进行的正式斗争中，如档案显示的，毛泽东比斯大林还要僵硬。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所持的态度是不情愿的或者是否定的，他只不过为了抚慰莫斯科的领导人而继续这一政治路线。

是斯大林，而不是毛泽东，力图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与布尔什维克政党相去甚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莫斯科一直拒绝接待共产党领导人。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不断表示希望与斯大林会面，但是斯大林并不想与之会面，也不想因此而给西方以口实说毛是“苏联的代理人”。相反，在1949年1月，斯大林秘密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往中共在河北西柏坡的司令部，负责讨论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未来新民主主

义政权的本质将是怎样的问题。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谈到了这一问题："在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阶段，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例子，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当离开政治舞台，这将极大地加强中国革命。"这一点很明显与毛泽东自己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说法相冲突，也与以在中国创造多党体系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相反。

斯大林在1948年4月20日的一份电报中做了如下回应：

我们并不同意这一看法。我们认为，代表中国人民中的中间阶层、并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各种反对党将要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为了反对中国的反动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中共将不得不加入到他们中间以寻求合作，但要对他们进行控制，比如要在其中起到领导作用。中国人民民主政府非常可能不得不吸纳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而且也不得不为了扩大该政府在人民中的基袖和孤立帝国主义者及其国民党代理人而宣布自己是一个联合政府。必须要记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全国胜利之后，在此胜利之后紧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在其政策方面必须是一个民族革命一民主政府，而不是一个共产党政府。这一阶段的长短现在还很难决定。

斯大林随后又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

（这）意味着现在不实行对所有土地进行公有化、废除土地私有权、没收所有从小到大的工商资本家的财产、没收不仅属于大土地所有者而且也属于浏刘雇工的中小所有者的土地。这些改革只能留待以后。

毛泽东看起来好像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在他1948年4月26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对中共领导人的“左倾倾向”承担了责任，并告诉斯大林，这些倾向“已经被彻底地改正了”。

但早在1948年9月，毛泽东就尝试修改中共的政治路线。他当时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即使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也要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领导地位。他认为在革命之后，共产主义国家应当没收国民党官员的所谓官僚资本，并对所有其他大型工业、商业和银行企业实行公有化，然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看起来中共政治局委员们都支持这一观点。排名第二的刘少奇甚至对此做了进一步描述，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同时刘少奇也提到，共产党不能过早地采取迈向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米高扬在1949年1月到2月与毛泽东会面期间，再次向中共领导人清楚说明了苏联的立场。毛泽东正式确认他接受苏联的立场，但因为预见了中共在和国民党斗争最终肯定能获得胜利，毛泽东很快又尝试回到他原来激进主义前提上去。在考虑中共于1948—1949年间获得军事和政治胜利后中国情况会怎样时，毛泽东再一次倾向于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他之所以准备这样去做，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加快革命的进程，并超越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所具有的局限性。非常典型的是，毛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的二

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几乎完全避免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而是代之以“人民民主革命”。二中全会的决议说明，这两个词在毛那里是有差别的。该决议认为，东欧国家在所谓“人民或人民民主”时期，“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自由贸易和竞争的存在与发展……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约束”。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则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民主。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完全从当时毛的讲话和文章中消失了。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新文章，也被冠名以(论人民民主专政》。

斯大林再次对此进行了干预。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的访问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私人谈话，其中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在这些谈话中，斯大林强调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考虑民族资产阶级”。而对西方世界，他要求毛软化其严酷立场，指出“你们(中国人)不必要和英国发生冲突……关键是不要突袭、不要冲突”。毛不得不再次向斯大林保证，将“尽可能”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

斯大林的这些策略被苏联传媒和绝大多数苏联社会学家，特别是汉学家，非常技巧地加以掩饰。斯大林的这些策略最后帮助中共建立了专政。但是，中共以创造新民主主义为目标的路线事实上却是中国开始斯大林化的内在一部分。

二、“新民主主义”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一步斯大林化，也就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在中国的

建立，却受制于若干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大林的对华政策是不确定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斯大林认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中国是将会威胁到他的统治，这一点似乎主导了斯大林的思想。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国领导人会面期间，根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的记述，毛泽东自己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了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因为斯大林自己对这一主义的表达"比俄罗斯人民自己还要强烈得多"。

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秘密。例如，斯大林并不想与新中国签订一项正式条约，因为他很满意与国民党已经签订的条约。而在与国民党签订条约时一起签订的特别协议，则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旅顺军港驻军、管理大连港和共同拥有长春铁路30年等诸多特权。斯大林只有在1950年1月初获得消息说英国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他才改变了立场，于该年2月14日与中国签订了一项新条约。

中苏正式条约签订带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喜悦很快就消失了，这是因为斯大林一直急切地要控制毛泽东的政策和新中国的经济。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前夕，两国代表所达成的一系列秘密附加协定揭示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

这些秘密协定中的第一个协定同意俄罗斯人—不包括非俄罗斯的其他外国人—继续保有其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权。斯大林甚至想和中国这些边疆地区单独签订贸易协定。这样做将会加强苏联的控制，但这一想法遭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强烈反对。根据另外两个协定建立的四个合资企业将为苏联剥削中国的经济资源。而新的中长铁路协定作为中苏条约的补

充，则更使中国人感到沮丧。

斯大林对中国事务干涉越多，他的欲望就越大，他对毛的怀疑也相应增多。他很难掩盖对毛的不信任。赫鲁晓夫后来回忆到，斯大林在和毛会谈后以相当不欣赏的口气讲到毛。赫鲁晓夫写道，“斯大林在谈到毛时，让人感觉他是在说某种自大傲慢的人”。斯大林甚至曾经公开向毛挑衅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尽管毛泽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却有民族主义的情绪。”斯大林还说在中国有出现“中国铁托”的危险。而毛则只用一句话来回答斯大林：“这里所说的与事实不符。”但是为了尝试打消斯大林的疑虑，毛要求斯大林派遣一位“苏联同志”去检查和编辑毛的著作。他的真实含意是让斯大林信任的某个人来亲眼看看中国是否在真正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毛后来不止一次地说，只有在中国军队介人朝鲜战争之后，也就是1950年10月19日之后，斯大林才最后将“半心半意的铁托这个标签”从毛的头上移开，并开始相信“中国共产主义者并不倾向于美国人，中国革命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但是这一看法也许并不真实。斯大林1951年派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专家尤金到中国来审查毛泽东。尤金回去之后，斯大林当着几位政治局成员的面问他：“好的，他们到底怎样？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斯大林特别强调了最后一个词儿)尤金理所当然的回答道：“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根据尤金的说法，克里姆林宫的老板斯大林总结道：“很好！我们可以安静一下了。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已经自己成熟起来。”

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了许多斯大林对他不信任的例子。与斯大林的霸权主义与教条态度交织在一起，斯大林的不信任使得莫斯科的领导人为了减缓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限制了对中国的援助。当然，即使斯大林真的想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援助，苏联的战后经济

情况也很可能不允许斯大林这样做。但是，所有已有档案资料都证明，是政治动机而不是经济动机，使得斯大林决定限制对中国的援助。斯大林这样做仅仅是不想让中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根据前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康斯坦丁•科瓦利的回忆，斯大林在和周恩来谈判时就很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在1952年8月到9月间举行的双方谈判中，当周恩来建议“你们要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也会帮助你们建设一个共产主义苏联”时，斯大林并不支持周恩来的建议。

斯大林也不支持中国要在1951—1953年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这不现实。1950年2月14日两国协定所规定的苏联对中国的财政援助，仅仅是年利率为1%优惠利率的3亿美元的5年贷款。这笔贷款的确是毛自己在西柏坡与米高扬的会谈时要求的。毛认为“现在和将来几年借的少要比借的多好”。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斯大林为了己方的利益也并没有提供更多贷款。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不得不使用苏联贷款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这种贷款的使用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笔贷款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国内经济问题，而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在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

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的1953年3月初，苏联政府只正式同意帮助中国建设和重建中国设计的147项企业中的团项，而且并不急于实施这些协议。这些计划的执行陷人了官僚机构之间的互相推诿之中。事实上，斯大林拒绝了中国提出的所有要增加苏联援助的请求，坚持要求中共领导人不要加快他们的现代化。1952年9月3日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国的1953—1957年五年计划草案。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急切地将年工业增长率定到20%，斯大林并不满意。他不能接受这一增长速度，因为根据官方统计，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增长率只达到了18.6%。斯大林建

议周恩来将中国的增长率降低到15%，只同意将年增长率即%作为保留上限。1953年2月初，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马克西姆•萨布罗夫将苏联专家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转达给李富春，后者作为中国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在莫斯科参与同苏联的经济谈判(为了这次谈判，李从1952年8月到1953年6月这10个月中一直留在莫斯科)。萨布罗夫按照斯大林的考虑，建议中国同志将工业年增长率降到13.6%—15%之间。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这一点，并由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和高岗在2月23日将这一决定通知李富春。最后，中国将一五计划的工业年增长率定为14.7%。

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召开期间，斯大林与作为中国政治局成员和毛泽东的副手的刘少奇举行了会谈。莫斯科再次表现出它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所持的谨慎态度。当时，斯大林坚定地反对中国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实现农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想法。这一想法是在刘少奇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前一个月，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并由刘少奇在向斯大林汇报中共中央当前政策时提交给斯大林。根据苏联大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的日志记录，1953年11月初刘少奇向他回忆说，“斯大林同志建议他不要急于建立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因为中国的现状要比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情况要好得多。”刘少奇将斯大林的意见传回了北京。

但是，毛泽东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盲目听从斯大林的建议。1949—1953年间，毛竭尽全力加速中国的斯大林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虽然国民党残余部队被驱逐到台湾，但国内战争仍在继续。与此同时，1950年之后，共产党人忙于在各地建立地方政权。由于农民仍然很消极，共产党领导人派遣了专门的党员积极分子工作队到农村去。这些工作队人数每年约有30万人，他们负责建立农民协会，配置新的权力精英，并严厉地打击“地主”和“富农”。司法程序被简化了的群众公审在许多村庄举行，

其结果往往是死刑。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或者送到劳动营。无论共产党官方宣布的政策是什么，事实是中国富农的数量急剧下降。农村的权力和事实上的经济特权被转移到了共产党精英的手中。

城市的富人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1951年12月，中共发动了严厉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反对官僚腐败的三反运动和反对私营商业的五反运动。紧接着这些运动的是很多公审大会。

知识分子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1951年在中共的发动下，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以对电影《武训传》的争论为借口，一个学术争论很快就变成一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识形态讨伐。之后又发起了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作为这种运动的第一个，展现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恐怖模式，而这种模式又将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扮演不祥的角色。根据一些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中，有超过400万"反革命分子"被处死。

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并不是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接受毛制定的政治路线。一些中共高层对新民主主义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少奇。根据苏共驻中共中央代表伊万•科瓦廖夫的回忆，我们知道早在1洲9年，斯大林就从中共政治局委员、东北区主席高岗那里得到了关于刘少奇的机密信息。高岗指责刘少奇是"右倾主义叛徒"，"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评价过高"。但是斯大林却拒绝了高岗的揭发，并在1949年12月底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将高岗的汇报交给了毛。科瓦廖夫是从参加了这次会谈的毛的私人翻译师哲那里知道这些的。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这一举动是斯大林对中共中央“不信任和怀疑”的表现。但是斯大林这样做或许是有其他原因。首先，他也许真的不相信这些指责的真实性。高岗过去曾向斯大林提供过太多这类对中共领导人指责的信息，以至于高岗这些信息的准确性非常值得怀疑。曾被高岗揭发过的中共领导人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例如，1949年7月底，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及其在中共的盟友有反苏联和“右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斯大林似乎将高岗的所有揭发都看成是中共党内斗争的表现，因此并不重视。

第二，从1949年夏开始，斯大林开始对高岗非常不满意。这是因为在一次斯大林与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高岗的一些行动被斯大林认为是非常愚蠢的。很明显地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极度忠诚，高岗在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面前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要求将中国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共和国。斯大林非常恼怒地打断了高岗，并称他为“张作霖同志”。

第三，如果斯大林相信高岗的揭发，那么刘少奇是“叛徒”这一点对斯大林“遏制”毛泽东激进主义的政策有利。

但是，高岗的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中共领导层内部并不完全一致。和毛相反，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当时仍然毫无顾忌地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例如，刘少奇和周恩来就讲到“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建设”和“文艺中的新民主主义倾向”。在毛对新民主主义做了激进主义

的解释之后，这些领导人在当时就形成了的毛的反对派。

因此，这一时期中共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民主方式已被写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其他文件中，而这些文件则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发展。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共于1949年9月召开。许多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群体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种类型的组织在1946年就已经出现，被中国人视为新政权的传统民主组织形式。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个联合阵线组织行使了立宪会议的权力。正是作为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共才建立了其新统治机构。共产党代表政协会议接受了《共同纲领》，使得《共同纲领》成为宪法。该纲领宣布了各种民主权利，但是却强调中共的领导地位。该纲领建立了一个多党体系，使得8个承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非共产主义政党获得了合法地位。该纲领还鼓励私有权，支持民族企业家，发布利于劳资双方的法令。该文件还制定了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共同纲领》绕开了社会主义转变这一想法，甚至都未使用“社会主义”一词。1950年6月28日政府通过的《土地改革法》似乎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指定的。新政权1950年通过一部新婚姻法赋予妇女权力，并提请人们注意妇女的平等地位。

从1949年到1953年，不仅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有陈云、邓小平、董必武以及其他一些中共领导成员，都在与共产党员积极分子的非正式谈话中表达了他们对新民主主义较为稳妥的看法。这些领导人在反对毛泽东时利用了斯大林的权威，即斯大林要求中国不要急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议。无论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如何，他的这种政治支持对于中国“稳妥派”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的这种帮助使得‘稳妥派’们的实践有了坚实的基础。斯大林的态度还对“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老大哥”的观点。

在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的解释方面，毛泽东和他的反对者们并没有不同，他们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点看法不同。有这样几个例子。1951年春，山西省领导人提议加快农村合作化。但是刘少奇不仅仅将这些提议指责为卖弄味头，甚至准备了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一份文件，将这个省领导人的固执己见批评为“错误的、危险的和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想法”。但是毛泽东却起来保护地方积极分子，并在两个月后否定了刘少奇的文件。1952年12月，由周恩来召开了一次政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由财政部长薄一波拟定的新税制大纲。这个新税制和旧税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收划一。这使得国有和合作企业丧失了在税收方面上的优惠，从而为私营经济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竞争环境。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规在最后实施时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批准，毛也没有见到该法规的文本。此后不久，毛泽东在1953年1月15日非常生气地给政府领导人(国家政务院)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政府会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毛认为新税制是一个错误，并以此为借口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来反对“稳妥派”和任何反对毛泽东激进政策的人。

到1953年夏天，这场运动变得异常激烈，并在6月14日到8月12日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达到顶峰。刘少奇、邓小平和薄一波被迫进行了自我批评。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因此，毛将他的观点强加于共产党之上。“沿着苏联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式开始。

三、通向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之死，影响了那些决定了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取得胜利的条件的发展变化。在毛泽东的眼里，斯大林应该一直被视为是中国在经济建设上面对的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对手，此外还是毛自己力图加速革命转化—也就是将中国最大程度和全面地斯大林化—的挡路石。现在毛变得自由得多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就苏联提供经济援助这一问题，周恩来在与苏联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举行的谈判中取得了胜利。这些谈判的第一个结果就是1953年3月21日中苏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和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与重建电站的协定。之后5月15日双方又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1959年年底之前将向中国提供建设91项大型工业项目所需的技术和全套设备。此外，这些谈判还加快了苏联对已经答应建设的其他50项工厂的建设工作。

三月谈判标志着苏联极大地改变了它对待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式。很难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苏联新领导人如此剧烈地改变了斯大林的谨慎政策。苏联新领导人之所以努力寻求毛对苏联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支持，可能是因为害怕毛利用局势并摆脱苏联的监护。他们很可能感受到这种危险，所以试图取悦于毛以避免毛走铁托的路。此外，至少在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明白斯大林对中国的政策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他急于改变这一状况。很可能马林科夫也有同感。不同于斯大林、莫洛托夫或者米高扬，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参与过对中国的决策，也因此不会为毛曾遭受过的羞辱而负责。

莫斯科的新立场对毛泽东来说意义重大。从现在起，他可以利用苏联的大规模援助来实现他建立一个伟大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追求。只有现在，在得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之后，毛才能最终打败那些反对他抛弃新民主主义计划的党内力量。1953年夏天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其讨论

和决定反映了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这场争论之后开展了针对党内外官僚主义的新运动，其目的在于清除那些被称为“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就是怀疑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路线正确性的骑墙分子。两年之中，约有数千名“反革命分子”被镇压。恐怖气氛非常严重，许多党员都害怕遭到指责。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年中，超过19万人精神崩溃，到公安部门承认了许多虚假的罪名。

最后，毛泽东开始转守为攻。非常激动的毛在1954年将苏联模式对中国重要性的讨论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并对刘少奇关于宪法大纲报告的文本提出了修改意见。

在苏联的帮助下，共产党政权于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毛泽东的胜利增了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实施体现了中共进行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这一计划建设了694个重要的工业项目，其目的是为中国重工业和军工业的快速增长打下基础。该计划还号召进一步发展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其目标是在1957年年底之前将33%的农民组织进“半社会主义”或者“低级阶段”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些合作社中农民将他们的资源全部交入合作基金中，仅保留他们的私人自留地，他们的粮食收获根据他们劳动投人的多少和向合作基金投人的多少来进行分配。此外，合作运动还扩展到城市中约200万手工业者中。绝大多数私人工厂和商铺也被改造成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单位。

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获得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地位后，他开始在苏联对华政策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中国的援助在他那里获得了“高度优先权”，并被置于他的直接监督之下。1954年早期，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做出了

一个更为重要的新让步。赫鲁晓夫接到一封来自中国方面的信，要求加快苏联对中国重工业项目的援助。赫鲁晓夫对此非常热心，他命令苏联各相关工业部门制定出一个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计划。他向毛提供了一笔新的长期贷款，并在众多领域向中国提供巨大的经济支援。同时赫鲁晓夫为了使两国实现真正的平等，决定清除中苏关系中所有不一致的地方。他说："我们和中国人将像兄弟一样生活，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会把我们的面包分一半给中国人。"他越来越需要毛全心全意地承认，不仅仅在苏共中而且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都是斯大林继任者和权威领导人。

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他说服苏共领导层中的所有成员接受他的中国政策。他认为："如果……我们在将来的五年不能向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中最重要的一步提供帮助，我们将会失去一个与中国建立和加强友谊的历史机遇。"他的热情使得苏联其他领导人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这次会议之后不久，从9月29日到10月12日，赫鲁晓夫率领一个高级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庆典。在两国峰会中，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出口汇率)的长期贷款，将对中国141项工业项目的技术援助增加4亿卢布，并帮助中国又增加了15个工业项目。此外，赫鲁晓夫放弃了苏联在四个合资企业中的股份。他还取消了规定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权的秘密协定。最后，他同意在核材料方面向中国提供训练专家的帮助。

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他后来承认，"我第一次和赫鲁晓夫见面时，我们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并建立了相互信任。"但是，赫鲁晓夫似乎在

慷慨方面过了火。他的无私国际主义和太多的礼物使得中国主席感到迷惑。事实是，正是第一个访问毛的赫鲁晓夫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原因，加深了毛的疑虑。毛作为斯大林的真正信徒，只尊重力量。他很难忍受赫鲁晓夫的交往方式，似乎将此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在毛得知赫鲁晓夫需要他在精神上的支持后，这种感觉又进一步被加大。在双方的峰会中，毛和周通过提出各种要求为难赫鲁晓夫来考验他。毛甚至要求赫鲁晓夫向中国开放原子弹的秘密并为中国建立一支潜艇部队。虽然赫鲁晓夫拒绝了绝大多数要求，但是他被完全当成为一个懦弱的伙伴。因此，这次峰会也标志着毛自我解放的开始。就此而言，赫鲁晓夫所获得的恰恰和他所期望的相反。但是毛泽东暂时没有表现出他的想法：对他来说，要在一夜之间去掉对"老大哥"的尊敬并不容易。此外，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对苏联援助的需要甚至大于以前。当时，工业化已经进行，人们普遍预测，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能成功完成所制定的一五计划增长速度。

但是结果却超出了所有乐观的估计。中国工业增长率比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根据不同的推测，中国真正的工业年增长率在16%到18%之间。五年间整个工业产量的增长超过了两倍，而生铁和轧钢的产量翻了三番多。虽然苏联的直接财政援助并不多—苏联对新项目投资的贷款(15.7亿元)只占中国全部投资(约3亿元)的3%，但是苏联援助的重要性却不能低估。苏联不仅向中国提供了一些资金，还向中国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价值数亿美元的大量技术信息。在帮助中国建设了重要工业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的同时，苏联还在训练科技干部方面极大地帮助了中国。根据一些消息，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派遣了超过以6000名留学生和大约7000名工人，并接受了超过12000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专家和顾问。

无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如何之大，对于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来说，最

重要的是国家对经济现代化所进行的巨大国家投资。在基础设施方面，国家的投资占到了总投资额的97%。城市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其主要来源是早已被预先决定好的农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人仍然十分依赖残忍但却很有经济效果的苏联经验。

四、通向农村的社会主义

毫不奇怪，实现农业的一五计划是党的工作核心。1950—1955年间完成的土地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贫下中农”，在经济上比以前更独立。但是，改革后的农业经济结果却不能为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原料。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生产力低下、人口过多、缺乏肥沃土地，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土地贫府、农业基础设施不发达和社会关系陈旧。土地革命的后果首先是“贫下中农”成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阶级，这反而使得经济危机更加严重。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出现，其原因是农民消费水平上升，但是其经济的商品化却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革命之后的1953年11月9日，刘少奇在与苏联大使库兹涅佐夫的谈话中，不得不承认“如果农民吃得更好，他们将消费掉农村生产的所有粮食。而城镇将没有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能让农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共产党开始寻求一种与农民合作的新方式。到那时为止，通过市场调节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已经被抛弃。毛这个社会主义空想家开始制定政策。在1953年秋，毛泽东开始攻击农村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关系。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从1953年11月25日起粮食全部由国家垄断。到1954年，国家垄断扩展到原棉、棉纺织品、菜油及其制品。

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力图控制所有主要商业渠道，但是这对情况的改善来说作用不大。事实上，超过一半的农村人口处于饥饿的边缘，数千万家庭没有国家的直接援助就不能生存。情况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国家通过税收和对粮食及其他物品的低价征购从农村拿走了一大部分农业剩余；另一方面，国家不得不将所征购的粮食的三分之二多又返还给农村，以免数百万农民饿死。国家刺激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变得越来越有限。农民被迫经常出卖的农业品数量越来越多，这使得农民不愿再提高生产。因此，需要国家援助的人数迅速增长。反市场政策实际上使毛和他的密友们陷入了死胡同。正是这种情况鼓励了合作化运动的加速。

1953年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成员进行了谈话。之后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16日做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决定。该项决定成为在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之一。农户之间的合作被要求逐步和稳步的进行，这自然说明在党的领导层中仍有人试图反对毛的激进倾向。例如，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坚持农村合作化要与一五计划同步进行。他的立场得到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经过仔细考虑后，这一问题被提交到政治局，以支持邓子恢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充分地利用了地方干部。1955年7月31日，毛主持了一次由各省、市、地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号召他们直接支持他的计划。毛发表了名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其目的在于说服党的中层干部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化的进度。与前一天已经由全国人大通过了的一五计划相反，毛坚持不是33%，而是50%的农户应在1957年底之前被组

织进合作社。就合作社而言，到1956年秋，应当比原有的65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他在讲话中像过去一样继续赞扬了苏联的实践经验。毛宣布“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即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实现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虽然仍受到苏联模式的激励，但是他已经开始设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要超过苏联的发展速度。他强烈谴责“一些同志”一味强调斯大林对苏联集体化运动时期的“鲁莽”和“轻率”所做的著名批评。毛后来在1956年9月承认，在斯大林的著作中他不喜欢《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其中包括了对“鲁莽”和“轻率”的批评。当赫鲁晓夫劝毛不要加快合作化的速度时，毛拒绝听从。在新的政浩气氛中，虽然苏联不断地在两国关系中展示平等，但是毛却越来越在行动上变得独立。他的态度得到了党内干部的同情，因为这(毛的态度)使后者也很受用。

7月会议意义重大。在党的历史上，毛第一次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并公开地向地方干部透露了党的领导层的内部分歧。总的来说，毛的努力被证明是成功的。毛在得到了来自“下面”的政治支持后，现在能够迫使党的领导层接受他加速斯大林化的计划。1955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六次全会，来正式批准他的政治路线。值得注意的是，中低层干部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人数超过了中央委员的十倍。这些人帮助了毛泽东保证全会做出令他满意的决定。党的喉舌也完全支持毛的加速合作化的计划。邓子恢、薄一波和李富春因为他们的“右倾”倾向而受到攻击，并不得不进行自我批判。周恩来发表讲话，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

到1956年初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设法大大加快合作化速度。

一个新的阶段—快速集体化—在1956年前半年被基本完成。党的地方干部非常巧妙地操纵了贫农的平均主义狂热，这些贫农构成了“贫下中农”这些贫瘠农田所有者的绝大多数。结果是农业社会主义胜利完成。到1956年底，中国超过96%的农户参加了75.6万个合作社。几乎89%的农户属于“高级阶段”的合作农场，也就是完全的“社会主义”集体。

不用说，毛获得了一次极大的政治胜利。但是，根据苏联的消息，在粮食义务征购制实行之后，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并未缓解。苏联远东经济委员会在1957年早期认为，“中国的农业集体化遇到了农民的反对”。一些新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社员心怀不满。但是，农民反抗的规模不像苏联集体化时期那样让人印象深刻。从实质上来看，社会主义十分平静地来到中国农村。

五、从斯大林化到毛泽东化

1956年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和整个世界产生巨大震荡的事件。人们从莫斯科知道，在2月25日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篇谴责斯大林的演讲。赫鲁晓夫虽然没有提到斯大林对毛的不信任，但是他却谈了很多斯大林在处理与铁托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毛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正面的。对克里姆林宫前独裁者的谴责彻底地和完全地解放了中国领导人。由赫鲁晓夫1954年访华开始的过程到现在结束，从那时起，毛不再看重苏联和感激苏联的经验了。如果说从1955年晚

期到1956年早期这一阶段毛之所以还看重苏联经验，仅仅是为了加速斯大林式的农业集体化速度，那么现在他可以真正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尝试将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强国。他也许甚至试图赶上并超过苏联。在很快熟悉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毛在1956年3月31日与苏联大使尤金会面时，讨论了二十大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毛“毫不怀疑”地继续认为他以前的导师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好的和诚实的革命家”，但尤金记述道，毛“强调，二十大的材料让他印象深刻”。毛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二十大之后的气氛，都有助于我们……对一定范围内的问题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苏联共产党提出这些问题很好。对我们来说……是很难首先提出这些问题的”。毛向大使表示了他对斯大林的错误对华政策的不满，并告诉尤金，《人民日报》很快将有一篇头版头条文章专门来讨论斯大林问题。

由毛的同盟者陈伯达所写的、并由毛和其他一些政治局与非政治局成员修改过的这篇文章，在4月6日发表。由于该篇文章是为普通大众准备的，所以对前共产主义偶像并未做过多的批评。中共领导们，首先是毛，并不想让任何人利用反斯大林的旗帜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专制。同时毛也不想暴露他要寻求新模式的隐秘想法。这篇文章将斯大林的功过概括为三七开。但是，这篇文章赞扬了苏联人“对过去所犯错误进行了勇敢的自我批评”。第二天，毛在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使米高扬面前详细解释了这些观点。

1956年4月末，毛在为期四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发言，标志着毛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毛在4月25日所做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演讲中，勾画出中共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将走和苏联模式不同的新路线。毛第一次对苏联经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公开要求采取不同的道路。毛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但是他很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式”社会

主义发展战略的一些方面，例如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加快内地的增长，减少对国防的直接投资的同时加快经济建设的增长。同时提出还要进行精神刺激，例如强调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是进行物质刺激；缩小集权行政管理下的经济领域的范围；发展相对自主的生产单位和劳动密集型项目。毛泽东毫不掩饰他的新战略与苏联模式之间的不同。

毫不奇怪，毛的讲话当时并没有出版。因为这份讲话不仅公开对苏联人提出了挑战，还和许多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经济观点相反。后者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例如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毛要求增加20亿元建设投资时，周恩来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周认为这将会引起商品供应紧张和城市人口过快增长。

毛感到受到了极大的冒犯。在1956年5月2日的国务会议上，他将其新观点的绝大多部分进行了详细地陈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将毛4月25日讲话的文本散发，但只散发给中高层干部。当时，周恩来、陈云和其他中国经济学家正在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毛的非正统观点让人感到无所适从。此外，1956年中共发动了一个需要全党全力以赴完成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中共领导层的成员没有时间深人讨论毛的提议，所以他们大多忽略了这一提议。

发生在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此之前共产党于1951—1952年

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三反和五反运动)运动的继续。在这些运动之后的1953—1954年间，中共对所有基本商品都实行了国家管理，进一步限制了市场经济。国有工商业企业开始取代私营企业。共产党人使用各种形式的“低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他们的政策。到1955年，政府将中小私营企业的80%纳入国家的控制之下，雇工超过500人的大型单位被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到1956年底，私有财产在全国范围内被废止。

中共在很短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共的技巧非常有效，在农村和城市中都没有引起富人的激烈反抗。由于中国政府给予资产阶级以为期7年、每年为被征用财产5%的补偿，这大大削弱了后者的抗拒。更为严重的反抗来自另一个社会群体—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改造降低了工人的收入，还使得工人失去了在工人控制雇主体系下所保证的一些特权。这一体系在1949年共产主义获得胜利后开始实行，并确实保证了工人的利益。国家工会在社会主义化后取代了这一工人控制雇主体系，至此，与工人对抗的是国家而不是雇主。工人们开始通过罢工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地方政府在设法镇压各种“骚乱”的时候很少遇到大的困难。根据官方资料，从1956年8月到1957年1月，全国范围内总的来讲一共发生了超过1万次大小不等的罢工，和超过1万次的学生静坐示威。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八大1956年9月15—17日在北京召开。在正式会议召开之前的8月29日到9月12日，首先召开了一系列秘密会议。这些会议事实上已经预先决定了大会所有的主要决议。在这些秘密会议上代表们讨论和通过了主要报告和发言的决议与文本草案。代表们还协调干部的各种决定。在赫鲁晓夫遣责了个人崇拜以及毛在1956年4月末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失败之后，毛泽东在八大上非常谨慎。他并未主持会议，也不做主要发言。他只向听众做了两个简短的发言，其中他并没有提到他在《论十大关系)中

提出的观点。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中最活跃。

但是毛并未放弃。他试图通过修改刘少奇向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政治报告草稿来推进他的观点。例如，在8月29日，毛在草稿上加了这样的话：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童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毛为了故意表现出自己不同意苏联的家长制，拒绝参加赫鲁晓夫的使者米高扬发表讲话的会议。

但是中共八大的语气却有所不同。大会的代表赞扬苏联模式，只支持毛泽东那些使得中国斯大林化快速完成的社会试验。大会正式宣布中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所有的发言者都热情地赞扬了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果。

这次大会的一些决定特别让毛感到不安。

在新的气氛下，他不得不接受从党章中删去作为“共产党指导路线”的“毛泽东思想”一词。毛泽东思想在1945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被认定为指导路线，现在却被一个模糊的词句所代替：“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行动的

指导。”此外，邓小平在他题为“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必须要与“个人膨胀做斗争，与个人颂扬做斗争。”党的总书记一职的重新设立也意味深长。虽然这一职位的恢复是由毛提出来的，但是却是刘少奇的亲信邓小平获得了这一职务。因此，对干部的直接控制现在落人党内“稳妥派”的手中。

个人崇拜问题是最让毛感到泄气的问题，毛决定在此问题上进行反击。在中共八大之后，毛在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中顺便提到，“有一些人曾经公开地批评过我。但是人们能容忍我的缺点和错误。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想为人民服务并为人民做一些好事。”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对他的反对者的一种警告，特别是当毛解释“家长制”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时。他也谈到，“当一些人批评我的时候，其他人会反对他们并指责他们轻视领导”。

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爆发的反苏运动帮助毛巩固了他的地位。在波兰工人起义被镇压之后4个月的1956年10月，前斯大林时期的囚犯哥穆尔卡(夺取权力成为波兰新领导人，他将波兰政治局中的斯大林分子清除出去。反共产主义情绪在波兰人中很快传播。同时，匈牙利的民主领袖在一次反共产主义造反后也夺取了政权。这些事件很明显是由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遗责所导致的。在苏联的请求下，中国积极地参与了对这些危机的处理。虽然这两次危机最终得以解决，共产主义并未发生动摇，但是看起来毛泽东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也深受震动。1956年10月，周恩来在向苏共中央成员鲍里斯•波诺马廖夫表达了中国领导人的一致观点。周开始批评苏共在谴责斯大林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首先，“事先没有征求兄弟党的意见”；其次，“完全缺乏全面的历史分析”；最后，苏联党的领导同志“缺乏自我批评”。10月底，刘少奇将修改过的这些中国领导人观点直接通报给赫鲁晓夫。

1956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和尤金的谈话中，突然谈到俄国人完全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结果是敌人夺去了这把刀子来杀共产党人。这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详细地论述了他的“丢掉刀子”的观点。他对苏联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攻击。毛甚至批评一些苏联领导人“列宁这把刀子”已经“丢掉相当多了”。此外，他提出了一个与莫斯科意见相左的新看法，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进行批评。赫鲁晓夫是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主要报告时提出这一可能性的。毛说：“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根据毛的解释，一些东欧国家的根本问题是他们的共产主义者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阶级斗争，这些国家还有许多反革命分子。

毛利用了当时的状况发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加速运动，并再次对“稳妥派”发动攻击。在这种联系中，毛要求1肠7年在共产党内部进行了一场新的“整风”运动。他并没有点名谁是“稳妥派”，但是代表们都知道他指的是在这次二中全会上做主要报告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令毛不满的是，因为害怕“经济过热”，中国工业发展执行了“暂时倒退”路线。最受攻击的是，刘少奇和周恩来认为东欧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波兰和匈牙利前领导人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这些领导人坚持要加快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会开幕的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与刘、周观点一致的文章，认为匈牙利领导人在1951—1953年间错误地强行进行该国的工业化和农民集体化。虽然包括“稳妥派”在内的大会发言者，都和毛一样对苏联的“错误”表示愤怒，但是毛仍然不满意。

195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命令《人民日报》的编委准备了一篇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新头版头条文章。这篇文章六易其稿，最后交由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毛还做了一些修改。其中最意味深长的是毛删去了第六稿中的这一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同时，毛在稿子的空白处写道："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这篇文章1956年12月29日发表。

赫鲁晓夫感到了危险，他试图软化苏联对斯大林的态度。1957年1月17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欢迎周恩来的宴会上，指出苏联共产党人仍然是"斯大林主义者。"他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斯大林是一个坏的共产主义者而批评他……斯大林的名字与马列主义不可分割。"但是毛根本不管这些，1957年上半年他在几次国内发言中都详细说明了他对苏联人的批评。

同时，毛又进行了一个加速现代化的新尝试。他在2月27日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做了一个公开的演讲，再次鼓动中层干部，即参加会议的一般官员。但是，对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很短时间内将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大国，他表示怀疑。为了革新党的精神，毛邀请非党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知识分子，来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干部进行批评，勇敢和真诚地评价党的政策。毛鼓吹要发起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广泛意识形态运动。事实上，毛很可能希望将群众的批评引向中国领导层中的反对者；毛号召人民起来攻击领导人这一技巧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重演。这场运动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旗号开始。

1957年6月"百花运动"正式开始。中共领导人似乎给了人民以充分的言论自由，并承认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多元主义。从1957年6月初开始的近一个月里，所有的中国报纸和其他媒体都欢迎对政治问题提出批评看法。但是许多批评者开始攻击共产党的整个专制体系，而不是那些"个别的错误"。6月初，毛停止了这场运动。言论自由被取消，共产主义者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政治恐怖办法上。针对知识分子的新镇压运动其规模远超以前的镇压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数百万受教育的人被称为"右派资产阶级分子"并成为迫害的对象。大约有团万人被送往"劳动改造营"。这些人中并不是全部都是对政权的批评者，许多是非常忠诚的市民。

恐怖气氛帮助了毛向他的主要反对者，首先是周恩来，进行报复。根据中国历史学家力平的报告，毛在1957年深夏对周发动攻击，宣称这位总理在努力平衡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犯了严重的错误。毛称自己"喜欢冒险主义"，不害怕为了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而打破平衡。毛甚至考虑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位置。周同意辞职，但是其他政治局成员都反对。

1957年10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总结了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结果。这次会议认为这些运动非常有效，即使是毛也对此十分满意，并决定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前缓和一下整风运动。现在他向中共提出了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答案已经确定好了："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毛回到了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观点，越来越考虑进行大跃进

的可能性。大跃进是一种在共产党的政治支持下加快经济建设的新模式。该模式主要利用中国的优势，首先是密集使用中国的主要资源—劳动力。这种新模式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和克里姆林宫传统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在1958年1月的杭州和南宁会议上，对反对“鲁莽与轻率”的人和仍然遵守苏联模式的人，毛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批评。在1月18日的南宁会议上，毛普告党的干部说反对“鲁莽”的斗争将会损害“6亿人民的热情”。他进一步普告周恩来说，周和右派之间的距离“只有50米”。干部们支持毛，周恩来不得不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再次获得了胜利。1月31日，他在《工作方法60条》这份重要文件中将这两次会议的结果做了总结。这份文件最后提出了大跃进这一新事业。曾经激发了毛的热情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转变模式，就这样结束了。

六、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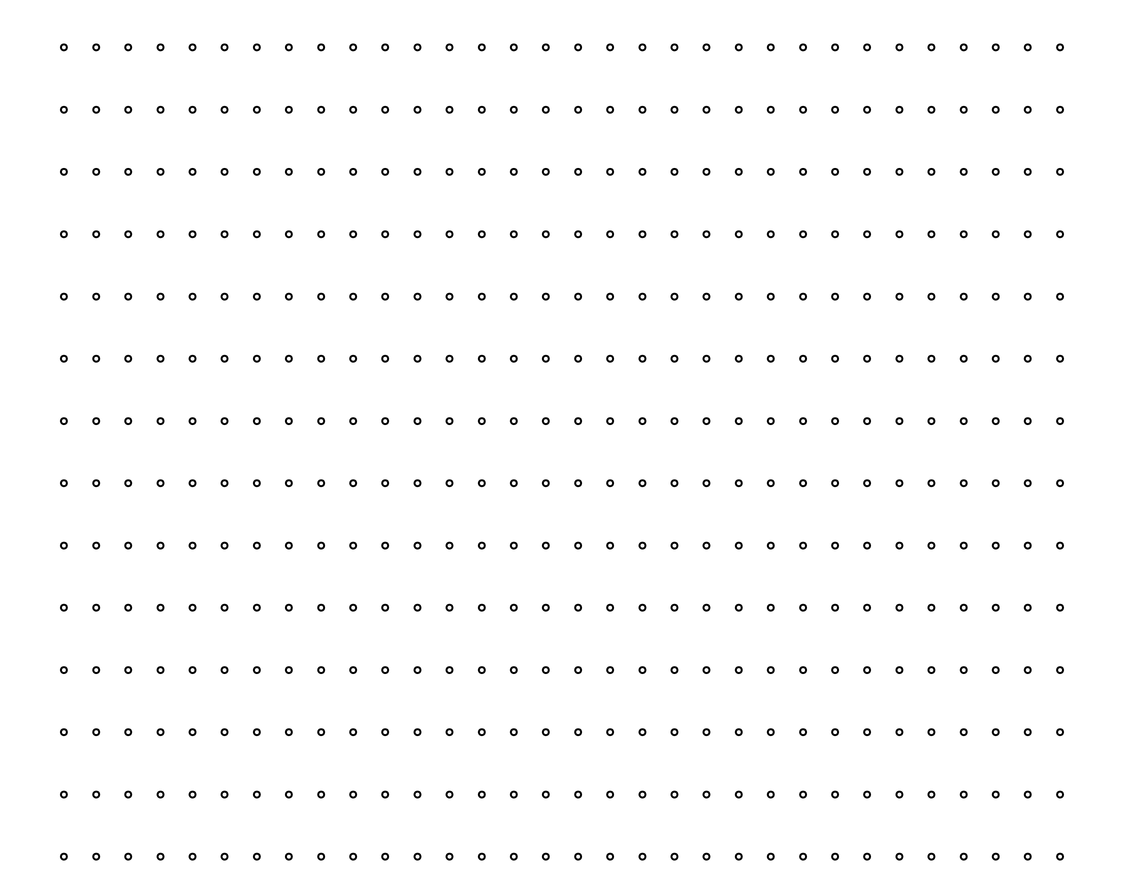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化时期的时间长度比人们原来所想象的要长。这一时期从新中国1949年建立起，延续到1958年初。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尝试着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移植到中国。他们的目标很清楚：镇压反革命，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后来的将经济落后的中国工业化，将农民集体化和将私有财产公有化。为了完成这些目标，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和市民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生活实施了严厉的控制。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对此有所疑虑。他们的苏联导师也是如此。

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差异之处不在于斯大林化，而在于双方就斯大林化的进程看法不一。在这一方面，当中国严重依赖莫斯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态度非常重要。但是“老大哥”的观点却并不一致。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所采取的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听起来颇为讽刺、但却被已有档案所支持的是，事实上恰恰是斯大林一直努力地减缓中国的斯大林化。而赫鲁晓夫作为被世人公认为的反斯大林者，却起了相反的作用。他为中国向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中共精英内部，至少存在着两个小群体，他们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党内权力的平衡状态。从一开始，毛领导的群体占据了左倾的位置。这一群体一直、但又十分谨慎地反对斯大林和党内保守主义者。新民主主义中国正是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开始斯大林化运动的。但是，毛在1953年在形式上不得不紧跟新民主主义的口号，只能和莫斯科保持紧密的联系。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薄一波领导的“稳妥派”群体追求的是另一种政策：他们非常看重和格守斯大林的建议。在斯大林死后所进行的一场激烈斗争中，毛最后设法使得“稳妥派”们接受了他的观点。然而，从1953年之后到1958年早期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稳妥派”的转变只是表面上的。他们虽然不情愿地开始将中国工业化和集体化，但他们试图尽可能地减缓速度。毛很快就对此不满，并再次开始了与“稳妥派”的斗争—这次是加快了斯大林化的速度。

在毛就要快实现他的目标时，他突然转变了策略。从1956年春开始，他开始反思斯大林模式，认为该模式不够激进，苏联经济建设的速度不够快。

他关于“中国模式”社会主义和建设理想社会的中国道路的这些想法，只能在由赫鲁晓夫等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的后斯大林气氛中出现。因此，赫鲁晓夫不仅激发了毛来加快斯大林化，也让毛最后抛弃了苏联道路，这违背了赫鲁晓夫的真实原意。中国的斯大林主义结束了，有的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化，而不是斯大林化。同时，人们应当认识到毛泽东主义不再是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形式。虽然中国的苏联式斯大林化也结束了，但是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其影响却并未消失。从那时到今天，其影响还通过各种方式决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演进。



。。。。。。。。。。。。。。。。。。。。。。。。。。。。。。。。
。。。。。。。。。。。。。。。。。。。。。。。。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contemporary/1950_Taiwan.txt

１９５０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

　　１９４５年８月，苏军解放了北朝鲜。而后，金日成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在北朝鲜建立了劳动党领导下的政府。由于在美军占领下的南朝鲜也建立了反共的李承晚政权，南北朝鲜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１９４８年底，为迫使美军撤离，苏军首先撤出了北朝鲜。然而，苏军撤走之后，半岛的局势却日趋紧张，从１

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到４月１５日，南朝鲜军队就３７次在三八线挑起军事摩擦，并且秘密向三八线附近调集了多达４１０００人的军队，给北朝鲜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出于安全的需要，还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和１９４９年１月，金日成就两次向苏联方面要求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并要求提供武器援助。考虑到美国可能会以此为借口攻击苏联有意永久分裂南北朝鲜，苏联没有同

意金日成的要求。但根据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的报告，斯大林批准了由苏联远东军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只不过，这一援助主要还只是些轻型武器。

１９４９年３月，金日成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期间，与斯大林直接讨论了有关北朝鲜的安全问题。为此，根据苏联大使和在朝鲜的军事人员的报告，斯大林明确表示：加强北朝鲜的军队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害怕南朝鲜人。

然而，１９４９年４月中旬，即金日成回国之后，一份来自北朝鲜的情报称，美军准备在５月全部撤出南朝鲜，南朝鲜人决定，一旦美军撤出，就于６月对北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两个月结束战斗。为此，斯大林非常担心，毕竟金日成这时只有３个步兵师，武器装备还十分欠缺，而李承晚则有６个全部经过

美军训练的全副武装的师。因此，苏联方面提议，与北京协商，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编入朝鲜人民军部队。据此，金日成一方面向斯大林求援，要求苏联方面于５月底之前帮助朝鲜人民军实现机械化，于９月底以前转让航空技术；一方面向刚刚打过长江的中国共产党请求在兵员上提供帮助。

５月，金日成的特使秘密访问了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平，向毛泽东说明了北朝鲜面临的严重局势，突出强调了南北朝鲜难以并存的情况，并转交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求援信。毛泽东显然赞同平壤的看法。他承认，北朝鲜与南朝鲜的冲突在所难免，“既可能是闪电战，也可能是持久

战。对你们来说，持久战

是不利的，因为到时候即使美国不干涉，也会唆使日本向南朝鲜提供援助”。但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为此担心，苏联和中国都站在你们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就会派兵与你们并肩作战。他强调，金日成应当坚定不移地争取实现统一朝鲜的目标，但近期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因为国际形势还不利，而且目前中国共

产党还不能有效地和大规模地支援北朝鲜，一旦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情况就不同了。

北朝鲜人此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中共领导人将给予实际援助的具体保证。毛泽东甚至还明确承诺，布防在东北地区的两个朝鲜族师可以很快编入人民军，一旦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告一段落，人民解放军中的其他朝鲜族士兵和军官，也都可以编入人民军，以便加强北朝鲜军队的实力。

随着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对北朝鲜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敌视态度，南北朝鲜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双方之间边界冲突的次数到 6 月间更加频繁。 6 月 1 1 日，李承晚甚至公开宣布，南朝鲜人正在准备给共产党人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平壤的不安情绪更加明显，苏联方面这时也开始考虑如何从根本上

解决朝鲜问题了。他们一方面坚持平壤应当极力发动和平统一攻势，另一方面则认为，在应付南朝鲜方面的进攻的同时，北朝鲜人有必要做反攻的准备。到了这一年的 9 月份，包括重型武器在内的大批苏联军事装备运抵北朝鲜，人民军也迅速扩展到 9 万人，北朝鲜领导人第一次开始提出，应

当对南朝鲜的挑衅采取进攻行动。据苏联大使向莫斯科的报告说，在金日成看来，如果国际形势允许，“他们能够在两个星期之内占领南朝鲜，最多是两个月”。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他们不了解的是，还在他们之前两个月，中共中央就已经在请斯大林帮助解放台湾了。

毛泽东计划进攻台湾　莫斯科对此态度含混

　　１９４９年４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般地跨过长江天险，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企图盘踞中国南部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但是，由于解放军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诸岛一时还鞭长莫及，无可奈何。蒋介石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早早就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共

产党要完成统一中国的计划，就不能不考虑进攻台湾的问题。

　　对国民党的巨大军事优势，使毛泽东最初对进攻台湾的艰巨性缺少足够的估计。他虽然知道进攻台湾必须跨海作战，没有海军困难极大，但他相信，既然自己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即使没有海军和空军，他靠步兵和渔船也能占领台湾，长江天堑不就是这么渡过来的么？当然，毛泽

东表示，如果到时候自己的空军能够初步形成，有空军掩护并协助攻击，则“把握更大”。

７月中旬，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准备秘密访苏。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关于是否向苏联提出协助中共准备进攻台湾的技术手段的问题，会议同时建议刘少奇在代表政治局给斯大林的信中，试着提出请苏联出动空军和海军援助的问题，但是，根据多年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并不对此抱太多希望。随

后，在访苏期间，刘少奇即根据政治局关于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台湾的技术条件的建议，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准备在１９５０年进攻台湾的设想，要求苏方提供２００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争取赶上在进攻台湾的战役中使用。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共的请求。不过，对于刘少奇带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提议的，请苏联在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的要求，斯大林明确表示难以赞同，说是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而苏联人民已经遭受过巨大的战争灾难，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毛泽东能够理解斯大林的顾虑，他多少年就是自力更生走过来的，他这时并不十分介意苏联的援助问题。但他的看法很快就发生了改变。因为，人民解放军在１０月下旬和１１月初先后发动了夺取福建沿海金门岛和浙江沿海登步岛的战斗，两场仗打下来，部队损失惨重，跨海作战的难度终于使毛泽东了解到准备技

术条件的极端必要性。直到这时，他才比较深切地感到需要再度向苏联求援。很显然，这两次作战失利都是因为渡海工具过于简陋。沿海作战、近岛作战尚且如此，跨海进攻台湾更非充分准备不可。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１６日见到斯大林的当天，他就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

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

舰队协助夺取台湾。”

对于中共领导人再度提出的援助请求，斯大林没有一口回绝，而是含糊其辞地表示：“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当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

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即使是只用战，也难免会被美国人发现，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斯大林在会谈中再三提到他在１９４５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达成的那个《雅尔塔协定》，称破坏这个由苏、美、英三个大国对远东政治格局所作出的共同承诺，未必是明智的。联想到斯大林这时因为担心与美国在远东发生直接冲突，甚至连是否应当根本废除旧的中苏条约，另订新条约一事都犹豫不决，可知他这时是不可能真正提供军事援助的。他建议毛泽东采取更策略些的方式来解放台湾，比如，是否可以先向台湾空投伞兵，组织暴动，然后再去进攻呢？

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甚至不能确定是否应当帮助毛泽东。就在他始终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对待毛泽东，把毛泽东搁在莫斯科坐冷板凳的时候，一个十分意外的情况戏剧般地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

１９５０年1月5日和１２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讲话，声称“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美国政府的这种公开声明使斯大林的胆子壮了许多

。原来不想签的条约同意签了，原来犹豫的军事援助不犹豫了。既然美国自己放弃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把中国和朝鲜划在自己的防御圈之外，这就等于把它们交给了苏联。因此，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就适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同意将苏联给中国的３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不过，直到最后，斯大林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同意利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来进攻台湾。

苏联人能够提供必要的军事装备和军事顾问（包括军事技术人员），这在毛泽东看来已经足够了。所以，“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１９５０年中共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起来。苏联人也加紧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各种装备和技术的改进工作，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和海军也迅速地初具雏形！

金日成决定先发制人　斯大林倾向统一朝鲜

与长期同莫斯科存在隔阂的毛泽东比较起来，金日成和相当一批北朝鲜领导人都曾在苏联远东的军营中度过相当多的日子，因此，在中朝两国之间，斯大林显然更加相信北朝鲜的领导人。但是，斯大林也不会因此就愿意为金日成的设想冒险。对于金日成１９４９年9月的提议，他同样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苏共中央

明确答复说："美国在中国失败之后，可能会比在中国更直接地干预朝鲜事务"，更何况北方的军队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南方发动一场成功的速决战的程度。战争一旦形成相持局面，"就给美国提供了在各方面干涉朝鲜事务的理由"。

然而，金日成不会放弃统一朝鲜的设想。南北朝鲜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要根本上消除战争阴云就必须铲除南朝鲜反共政权。而作为朝鲜共产党人，自然要以解放全民族为己任。眼看着毛泽东一举统一了中国，而朝鲜还有半壁江山和一多半人民没有解放，金日成心焦如焚。因此，艾奇逊声明刚刚发表了 5 天，金日成就不失时机地重新向苏联外交官提出了加速统一南北朝鲜的问题。

１月１７日，在为北朝鲜驻中国大使赴任举行的午餐会上，金日成拿着酒杯走到苏联驻朝鲜顾问的跟前，有些激动地说：目前中国正在完成它的解放事业，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完成统一朝鲜的问题了。他宣称：毛泽东已经保证过，当中国统一完成之后，朝鲜统一就是最迫切的任务。中共将支持他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也曾经亲口答应他，一旦南朝鲜发动进攻，他可以进行反攻，结果，南朝鲜没有发动进攻，朝鲜的统一问题就这样拖延下来了。金日成说："一想到不应辜负人民的热切希望，我就夜不能寐。"他明确要求再次会晤斯大林，以便说明局势。

斯大林最担心美国干涉。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没有干涉毛泽东统一中国？如果连中国大陆都不愿干涉的话，美国又怎么会去干涉一个小小的朝鲜呢？如今，杜鲁门和艾奇逊又公开声明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自然就更加没有必要为美国的干涉忧心忡忡了。既然如

此，斯大林第一想到的也是钥

鲜问题。这是因为，日本从来都是俄国人的心腹之患。与对苏联安全无关轻重的台湾比较起来，朝鲜的统一会极大地巩固苏联远东的边防，并使日本直接处于苏联的威慑之下，斯大林对此可谓梦寐以求。在比较了金日成和毛泽东的要求之后，斯大林明确认为支持北朝鲜要比支持中国人划算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更看

重朝鲜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是因为帮助金日成几乎不需要一个苏联士兵。毕竟，美国对远东保势。一旦美国政府发现有苏联人秘密加入到远东地区的战争中去，杜鲁门和艾奇逊未必还会遵守他们的声明。

经过了将近两周时间的考虑之后，斯大林终于在１９５０年１月底开始倾向于接受金日成的援助要求了。他在１月８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情绪，但他必须懂得，诸如他想要着手解决的关于南朝鲜这样一件大事，需要有周密的准备。事情必须要组织得没有太大的风险

。如果他想要与我讨论这件事，那么我将随时准备接见他，并与他进行讨论。把这些转告金日成，并告诉他我准备在这件事上帮助他。"

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已经决心要帮助金日成了，这时离毛泽东离开莫斯科至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斯大林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半个字。他们之间只是偶尔提到过朝鲜问题。当双方谈到中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１月关于按照１９４９年４月毛泽东对金日成所作的承诺，把人民解放军中的其余１２０００名朝鲜族

官兵，连同配备的武器，全部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决定时，他们才提到了朝鲜问题。而毛泽东仍然在说，现在还不是北方如何进攻南方的问题，而是北方如何防御南方的问题。在他看来，更现实的还是中国解放台湾的战争！

苏联人秘密施援手　中国人意外担责任

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方面很快就与金日成商定，苏联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将来取有偿的方式来进行。北朝鲜以９吨黄金、４０吨白银和１５０００吨其他矿石来换取价值１３８００万卢布，足够装备三个师的苏联的武器弹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苏方还同意，北朝鲜可以提前使用原定要于１９５１年才提供的７０００万卢布的国家贷款来装备自己的军队。

在北朝鲜为统一事业加速装备军队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在为解放台湾做积极准备。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钱，只不过，毛泽东不了解，金日成投入的力量比他大得多。斯大林是唯一了解双方情况的人，他显然认为，金日成有必要就他的计划与毛泽东进行必要的沟通。正因为如此，在他批准金日成访问

苏联的同时，他特别要求他的大使提醒金日成，在朝鲜统一问题上，金日成应当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南北朝鲜之间的关系一直剑拔弩张，李承晚不时地发出战争叫嚣，北

朝鲜经常有南朝鲜计划进攻北方的情报。这些情况，无论莫斯科还是北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何况，毛泽东就是以武力方式统一中国的。因此，金日成确信毛泽东不会反对他的计划。在他出访莫斯科之前，他经过北朝鲜驻中国大使通知毛泽东说，他希望就统一朝鲜问题对中国进行一次访问，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对此，毛泽东欣然表示同意，他告诉朝鲜大使说，他欢迎金日成的来访，如果金日成对朝鲜统一已经有了具体计划，这种访问可以是秘密的；如果还没有具体计划，最好进行一次正式的访问。由于这时北京在平壤既没有大使，也没有军事观察人员，因此，毛泽东丝毫也不了解北朝鲜统一工作的进程。他一面肯定以武力统一南方的必要性，一面仍旧提醒北朝鲜应当加强警惕，说北朝鲜目前应当首先做好一切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加强自身的力量，以应付可能的战争。

３月３０日，金日成等人秘密访问了莫斯科。这次访问一直持续到４月２５日才结束。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金日成介绍说，由于苏联的帮助，朝鲜人民军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对南朝鲜的优势，再加上南朝鲜人民的支持，他现在应当说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统一朝鲜了。由于苏联情报系统这时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给华盛顿的一份秘密报告，其中主张美国不要干预南北朝鲜之间发生的冲突，因此，斯大林也对形势感到乐观，相信现在是统一朝鲜的机会。

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第一次对金日成的统一计划表示了肯定的态度，并称，如果说他在一年以前认为金日成的这个计划行不通的话，那么今天这样的计划就是可行的了。因为无论是朝鲜国内还是整个国际的局势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帝国主义目前不会对朝鲜内部的冲突问题进行直接的干涉。当然，他仍旧强调说，

统一朝鲜的作战应当建立在对南朝鲜的进攻发动反攻的形式上。他最后没有忘记提醒金日成，他的计划必须通报给毛泽东，如果毛译东也同意的

话，他不会有反对意见。

斯大林之所以始终向毛泽东封锁消息，直到最后才要求金日成去征求毛泽东的同意，很大程度上恐怕并不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计谋。考虑到中共中央早就提出了请苏联帮助解放台湾的要求，毛泽东又亲自向斯大林本人提出请求，不难想象，斯大林很难摆平毛泽东与金日成的关系选择的必要性，与毛泽东争论孰轻孰重，倒不如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使毛泽东无话好说。毕竟早在１９４９年７月刘少奇率团访苏时，双方就已经商量好，朝鲜

问题仍由苏联方面负责，因而在朝鲜问题上，不事先与中方商量，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即使这样做了，他也必须还给毛泽东一个形式上的“公平”，尽管这种“公平”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但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让金日成去请求毛泽东的“同意”，在心理上可以或多或少地给毛泽东以安慰。何况，朝鲜半岛的动荡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中国的态度都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毛泽东反对，那么，采取进攻行动无论如何都是冒险的。

斯大林的再三叮嘱，促使金日成从莫斯科返回平壤之后不久，就再次与毛泽东联系，要求访问北京。

毛泽东颇多疑虑　金日成信心百倍

５月１３日，金日成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在当晚的会谈中，

金日成首先通报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他解释说，南朝鲜的侵略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南北朝鲜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南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着祖国的统一，现在统一朝鲜的机会已经到了。关于这一点，斯大林也明确地给予了

肯定，并以为统一朝鲜现在是可行的。只是，斯大林同志强调，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取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这就是他此行访问的主要目的。

毛泽东不是没有想到金日成会有一个统一计划，但他还是对金日成通报的情况深感意外。因为，在斯大林已经明确表示同意中国进行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各项先期工作也已经按部就班地迅速展开的情况下，他怎么也想不到斯大林会突然间转而赞成首先统一朝鲜。

毛泽东很委婉地对金日成表示：你们的大使已经几次来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都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金日成则解释说，苏联已经帮助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不得已，毛泽东告诉金日成，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他需要请苏联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实一下。毛泽东随后中止了会谈，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立即给斯大林发电证实金日成的说法。

第二天晚上，苏联大使拿着斯大林的电报来见毛泽东。电报说：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菲利波夫（斯大林使用的化名）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如下意见：由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着手重新统一的建议。但有个附带条件，即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那么对问题的解决就应延迟，直到进行一次新的讨论。会谈

中的细节朝鲜同志可能会向您转述。

鉴于斯大林已经明确表态，毛泽东自然无法持反对态度。他对苏联大使说，他已经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情况，他完全同意朝鲜同志的估计，即由于美国势力逐渐退出南朝鲜，朝鲜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过，他认为，恐怕有必要像中苏条约那样，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迅速签订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毛泽东显然对金日成的计划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些担心，因而想到中国需要为直接援助北朝鲜做好准备。

在与苏联大使会晤后，毛泽东立即在他的办公室召集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在京的重要领导人开了会，讨论这一重要的情况变化。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和金日成没有事先与他商量这件事相当不满意。几年之后，他在与苏联大使，以及与米高扬、与赫鲁晓夫等人的谈话中，曾经多次重提这件事，认为自己实际上是被蒙

在鼓里，直到金日成跑来告诉他说斯大林已经同意，他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不论他是不是感到窝火，中共中央却只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这是因为，斯大林１９４５年以来几度干预中共，“不许革命”，曾经引起过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也已证明这种外来的干预是极其错误的，在这些事情记忆犹新

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又怎么会去扮演斯大林过去扮演过的那种角色呢？因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接受既成事实。

５月１５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他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那样中国将会更充分地援助北朝鲜。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金日成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三阶段计划，即第一步进一步加强兵力；第二步公

开向南方提出和平统一方案；第三步，在和平统一方案遭到南朝鲜拒绝后则准备诉诸武力。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肯定的意见。他强调，作战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部队灭敌人。不过，毛泽东还是对美国驱使日本军队或直接干预的可能性有所担心。他告诉金日成，一旦有两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中国会派出军队支援北朝鲜的，因为到那时，苏联出兵是不方便的，它受到与美国签订的协定的限制，而中国则不受这样的限制。

金日成认为，日本军队参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美国人派个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人民军的士兵将战斗得更加坚决。至于美国参战的可能性，他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不必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在５月１６日，即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最后一天，他收到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表示同意毛泽东所提议的中朝缔结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建议，只是，莫斯科以为，这不应当是在战争发动之前，而应当是在朝鲜已经成功地统一之后。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已经箭在弦上，金日成此时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相比之下，鉴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将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的沮丧也不言而喻。几乎就在金日成访苏之前不久，中共还特别就武力统一台湾的一些具体作战设想与苏联军事当局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而由于这时空军和海军的装备正在陆续到达，进攻

台湾的技术条件问题正在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而逐渐得到解决，中共中央已经重新开始有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台湾的决心，并初步考虑在１９５１年条件基本具备后，选择适当时机实施作战行动。毛泽东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朝鲜战争会排在了他解放台湾行动的前面。他最担心的显然是，一旦朝鲜战争爆发，无论胜负，美

国政府都可能会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从而使自己解放台湾的计划面临巨大的困难。

５月２９日，金日成通知苏联大使，他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答应提供的武器和装备的主要部分，他们准备在６月发起进攻，６月１０日前部队将全部集中到预定的进攻地点。按照既定方案，随着北朝鲜提出的和平统一主张在６月１１日遭到南朝鲜当局的拒绝，第三阶段，即军事进攻阶段开始进入了倒计时。根据苏联

瓦西里耶夫中将和苏军顾问组协助制定的“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人民军应当在２２到２７天内分三个阶段实现解放南朝鲜的战略。６月１９日，作战计划下达到人民军部署在三八线沿线的各个部队。２５日，受命参加进攻的７个师　　面对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不安。他们焦虑

地注视着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反应。两天之后，一个最让毛泽东担心的局面随之出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于６月２７日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因此他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防止战争蔓延。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的这一行动，显然无异于救了国民党的命。

对于美国的行动，毛泽东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号召“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但在内部指示中，中共中央不能不承认：自己没有与美国现代

化的海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可能，“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海峡挡着”，只好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与此同时，由于６月２７日美国总统又同时宣布美国将出兵南朝鲜，中国东北边防以及可能的增援朝鲜的问题日益紧迫，中国的战略重点也被迫转向东北地区。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逐渐停顿下来，以至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了这一作战计划。

这是一件让毛泽东感到极其不满的事情。７月２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在讨论如何应付联合国卷入朝鲜战争的外交问题后，他极为反感地告诉大使说：早在５月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国领导人就已经提醒他美国可能干涉的问题，而金日成当时不相信。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估计是对的。与此同时，通过给苏联方

面的一份综合反映外国人对朝鲜战争的看法的报告，中国领导人也曲折地表达了对苏联选择这个时候支持统一朝鲜行动的疑惑。在报告中写道，一位英国代表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鼓励朝鲜内战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毛泽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进行朝鲜战争，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他本来想首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寻找适当时机协助金日成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武装进攻南朝鲜，既需要通盘考虑，也需要合适的机会。而且，他始终认为，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朝鲜人民军，实际上还很少经受真正的全过程的战争考验，因而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熟起来，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统一朝鲜的速决战，更不可能对付可能直接参战的优势的美国军队。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有所怀疑。只是，斯大林的支持使他失去了反对的可能。到９月中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轻而易举地围歼了人民军进攻部队，毛泽东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了。但越如此也就越遗憾。所以，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这个问题上埋怨斯大林。他肯定地说：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

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但毛泽东心里想的多半是，如果当初斯大林不是盲目地支持在朝鲜采取行动，那么不仅不会犯这样大的错误，而且也不会使台湾问题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也用不了付出在朝鲜战争中那么大的代价，就能够解放台湾了。

++

——————————————————————————————————————

日本的麦克阿瑟宪法与战后重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9B%BD%E5%AE%AA%E6%B3%95

《日本国宪法》，简称为《和平宪法》或《战后宪法》，是日本现行宪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起施行。该宪法是日本政府在二战战败投降之后的盟军占领时期所制定的，以便用来取代原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而其中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在该宪法的撰写中居于主导的角色。但由于施行以来从未修改，因此仍存有昔日在日语上使用的习惯，例如保留历史假名遣、内文的汉字以旧字体书写等。

《日本国宪法》采用自由民主的君主立宪制，取代旧宪法所施行之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以国民主权（主权在民）为原则将天皇权力架空，确立国会、以总理大臣为首的内阁、裁判所三权分立的国家统治机构模式，政府的统治权力也来自人民的认可才有效，明文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而根据此宪法，天皇是日本国家与国民的象征，只能扮演纯粹仪式上的角色，即所谓的"象征天皇制"。此宪法较为著名的地方是在于第9条禁止日本拥有军队，并规定日本以和平主义放弃宣战与放弃保有战争武力的权利，成为不战国家。整体来说立法受到美国与近代日本史的影响很大，将战前天皇至高无上的观念、强调服从的压迫性人权与军国主义思想等问题，彻底进行封堵，使和平主义、国民主权、对人权的尊重被列为现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并被称作为日本国宪法的"三大要素"。

沿革

草拟前

日本的首部现代宪法是《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于1889年，在明治维新时期获通过，是根据普鲁士模式所建立出来的一套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在

该宪法中，天皇是一位活跃的统治者及拥有相当的政治权力，但国家财政预算的批核权力在国会手上。1945年7月26日，联盟国军领袖丘吉尔、杜鲁门及斯大林发表了《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该宣言第10条介定了日本投降后联盟国军占领的主要目标："日本政府要解除在日本中人民之民主的所有障碍，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及基本人权将会被确立。"此外，文件中第12条写到："当这些目标已达到及这里建立了建构于日本人自由表达的意愿而同时倾向和平及负责任的政府时，占领的联盟国军将撤出日本。"联盟国军不单是要向这个军国主义敌人寻求惩罚和赔款，还有在政治制度上根本的改变。政治学者罗伯特·E·沃德（Robert E. Ward）言："这次占领或许是世界历史上最精心的计策，由外来势力所指导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行动。"

草拟过程

《波茨坦宣言》的内容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日本投降初期所采取的措施都显示出，麦帅与在华府的上级都不打算单方面地在日本实施新的政治制度。相反的，美国政府希望日本自行实施民主改革。但至1946年初，麦克阿瑟就在"编写新宪法"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与日本官员出现意见分歧。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币原喜重郎和他的许多同僚极不愿意地采取激烈的手法——以一份含有自由思想的文件来取代明治宪法。1945年后期，币原喜重郎成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并邀请美浓部达吉等一班学者进行修宪的咨询。其中是由国务大臣松本烝治所提出的"宪法修改四原则"（憲法改正四原則），大意如下：

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大原则不变。

扩大议会权限，相对限缩天皇大权。

国务大臣在国政上对议会负起全责。

对人民自由、权利强化保障，在遭受侵害时给予充分之救济。

1946年2月，委员会公布依上述原则的草案，仍然维持天皇主权、但不符《波茨坦宣言》的国民主权精神，麦克阿瑟认为这些过于保守，逐加以否决，并指示三原则：

天皇为国家元首，其皇位世袭。依宪法行使职权，顺应所体现国民基本之意志。

废除发动国家主权之战争。日本放弃以战争解决纷争、甚至保护自己安全为手段。其防卫与保护委由当前世界正在推动国际和平之崇高理想，禁止设立陆海空三军，并不赋予任何日本武力有交战权。

日本的封建制度予以废止。贵族权利除皇族之外，止于现存之一代，今后在其任何国民或是公民政治权力之中无贵族特权。从而决定仿效英国的制度。

枢密院院会通过“修正帝国宪法改正案”

于是，命其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成员自行草拟新宪法。文件中，大部分由两位拥有法律学位的高级军官——盟军司令部法务官米罗・洛威尔中校与民政局局长考特尼・惠特尼准将所草拟。关于男女平等的章节，则由盟军司令部文职雇员贝雅特・西洛塔・戈登所写。虽然编者非日本人，但也参考明治宪法、民间宪法草案，征询了日本的律师及政治领袖（如币原

喜重郎和吉田茂）的意见。1946年2月13日，新宪法草案向日本官员公开。同年3月6日，政府向民众公开了新宪法的纲目。同年4月10日，日本举行选举，选出将商议该宪法草案的第19届帝国议会下议院。由于选举法的改变，这是该国首个容许女性投票权的全民选举。

GHQ草案欲施行一院制，但在日本人的坚持下改行两院制，两院皆由选举产生。其他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在3月6日自行草拟的文件体现了2月13日所撰写的文件的理念，这些包括宪法中最显著的特征：天皇的象征性元首地位，人权与公民权之保障，以及放弃战争。

颁行

昭和天皇签署《日本国宪法》

日本国宪法是根据明治宪法第73条的规定，透过修宪的方式制定的。明治宪法规定修宪案需由天皇以敕令的形式呈送帝国议会，并经过帝国议会两议院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才可通过。昭和天皇在6月20日先将修宪案呈送众议院后，经过两院一些修改，贵族院在10月6日通过议案；在随后一日，众议院在只有5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议案。10月29日，枢密院院会，天皇亲自出席，会中一致通过“修正帝国宪法改正案”，美浓部达吉与一名顾问官缺席；同日，得到昭和天皇的同意，成为正式法律。11月3日，在贵族院举办“日本国宪法公布纪念典礼”（日本國憲法公布記念式典）公布新宪法，并在皇居外苑举办“日本国宪法公布纪念祝贺都民大会”（日本國憲法公布記念祝賀都民大會）。根据规定，新宪法将六个月后（即1947年5月3日）生效。由于该宪法是麦克阿瑟所主导修改，因此经常被不满者称作为“麦克阿

瑟宪法”或“麦元帅宪法”（**マッカーサー憲法、マ元帥憲法**）。

早期的修宪建议

如果麦克阿瑟按照日本政治人物以及宪法学者意愿的话，新宪法将不会写成。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盟军占领时期结束，日本恢复主权之后，“宪法源自外国”的问题曾经引起争议。但在1945年及1946年，已有许多宪法改革的公众讨论，麦克阿瑟的草拟很明显是受到日本自由主义分子的思想所影响。麦克阿瑟的草拟并不打算推行美国式的总统制或联邦制；相反的，草案采用英国式的议会制。这被日本自由主义分子视为取代欧陆式专制主义的明治宪法的最可行选择。

1952年后，保守派及民族主义分子打算修改宪法，使之更日本化，但受一些原因所阻。一个原因是修宪较为困难，修宪动议须获得国会两院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才可交由人民进行公投(第96条)。还有，反对党在国会占有三分之一议席，主张维持现时宪法，不支持修宪。甚至对长期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党员来说，宪法并无不利。在宪法框架下，他们可制造出附合他们利益的政策制定过程。就连在政治生涯中时常要求修订宪法的中曾根康弘，在任职总理大臣期间(1982年至1987年在任)，也低调面对修宪议题。

基本理念

《日本国宪法》中时常被列举的三大原则是：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主权在民）、和平主义（放弃战争）。日本政治以这三大原理及其中最基本的对个人（个人尊严）的尊重为基调运行。在三大原则当中，尊重基本人权是最根本的原则。正因为每个人各自得到作为人类最大限度的尊重，也因此各人的考虑在政治上不得不得到反映，需要国民主权（主权在民）。于是，在个人被尊重的前提下，不得不建立和平的国家及社会，和平主义（放弃战争）的原则也被采用了。

三大原则当中的尊重基本人权及国民主权，就算在各国近代的宪法也受到重视。在其他国家的宪法中，许多时以三权分立代替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的背后有自由主义，国民主权的背后有民主主义，这两种主义融合以后，也称为自由民主主义。这并不是把两项主义的地位并列。自由民主主义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实现自由主义为手段，而采用民主主义；这是回应在民主之名下，并以多数作为依归，大肆地蹂躏自由的苦痛历史而建立出来的考虑方法。还有，自由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正是宪法中最重要的基础要素。尊重基本人权，被视为根本法理、根本规范；即使是经过修宪，这些理念也被视为不容否认的共识。

即使维持尊重基本人权的理念，也有修正个别规定的可能性。例如，即使修改个别人权的规定，只要没有否定尊重基本人权的内容，也是可以的。

故此，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及和平主义是作为《日本国宪法》背后的三大理念，被加以尊重、保障。另一方面，这三主义似乎也有自身对立的地方；比如，自由主义与公众福利对立，民主主义与间接民主制对立，和平主义与行使自卫权对立。

以下对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以及和平主义（放弃战争）并加以说明。

尊重基本人权

尊重基本人权是对个人拥有人权的尊重，自由主义的表现。起初，是具有解放受国家压迫自由的人民的重要意义。基本人权在第3章具体地列举出来。在该章所列举的，是在宪法上受保障的人权。除了明文规定的权利外，也存在判例上所认许的人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为了避免权力肆意行使而压抑个人的人权，统治机构于是设定至不使权力集中至一个机构（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为了不使个人受到摧残，宪法就以自由主义为原则设立出来。

尊重基本人权，在旧时，就是要尽可能地人类的自由思想与活动，是以这样的自由主义作为基调而成的政治理念。作为政治的基本理念的自由主义，就意味从依据国家权力而作出压制中得来的自由。为了把这种从国家而来的自由展示出来，许多时称立宪主义，这是在对国家权力不信任的前提下而来。在民主政治的实现过程中，排除藉国家权力而来的强制，并作为保障个人权利的理念而支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来说，是市民自由的扩大；经济上来说，是维持自由政策；更进一步来说，正因为自由主义是以确保个人幸福为目的。但是随着个人变成集体，自由主义被把握著为决定国家应走的路向。在《日本国宪法》，国家组织的规定和国民主权的考虑相互关连，沿袭著自由主义。

在现代，由于初期施行自由经济政策产生贫富悬殊，自由主义受到社会权（所得的再分配）而来的修正。另外，随着现代的民主主义强烈依存于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自由主义的重要性急速地增加；尤其是德国纳粹党在民主体系之下诞生，引致极大的祸害，也让世人明白：不能保障国民自由的制度，即不能被说是民主主义。故此，自由与民主的主义变得密不可分，而成为立宪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即使在《日本国宪法》，在个人自由与国家之间出现冲突时，自由也被规定成优先的。

未来发展

宪法纪念邮票

由于本法施行以来从未修改(是目前未修正的宪法中最久的),因而在宪法本文中仍存有昔日的日语使用的习惯,例如保留历史假名遣、内文的汉字以旧字体书写等,自然存在修宪问题。

修宪问题

自由民主党(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之一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政见都提出了"现行宪法的修订"。

2012年,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发起修宪提案、并倡议修订现行宪法,提出将否定集体自卫权的条文予以取消,以允许自卫队到海外参与联合国的维和及反恐行动,将自卫队的目标设定为"本土防卫和国防保障",并透过修改宪法条文促使日本成为正常化的主权国家。但修宪内容具有争议性,因此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一些疑虑。

自2012年日本众议院大选后,新一届众议院议员支持修宪的比例则高达89%,之后降为约75%,意味着日本已经具备修宪的条件。

目前日本各大政党对于是否赞成修宪、修宪的形式以及修宪的内容意见各不相同(这里仅就是否支持修改第九条进行总结):

问题:修改第九条

赞成: 自民党、希望之党、日本维新会、日本之心党;

持审慎态度:公明党、自由党;

反对: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

目前状态:

众院执政联盟勉强过三分之二(312/465)

在参议院席次自民党只有刚好过半,就算加上公明党,也还差18席才达三分之二(146/242),势必要与其他如日本维新会等小党寻求协助才能过关。换言之2019年参院选需要多18席方能通过。(164/245)

然而,2019年选后时仅有160席次,根据结果及投票数而言,需再度和其他政党协商。

最后一关公民投票需要过半

如果要同时修宪多项，将按内容划分不同的相关条款并分别由国会提议，公投根据个别修宪草案每人一票进行投票。投票年龄年满18岁。

其他问题

由于本宪法是二战以后才施行，因此存在是否有美国主导的问题。2016年12月7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篇文章指出，日本宪法是“二战后美国强加的”。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stitution_of_Japan#Provisions

日本宪法长约5,000字，由序言和103篇文章组成，分为11章。这些包括：

I.皇帝（第1-8条）

二。放弃战争（第9条）

三，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第10至40条）

IV。国会（第41–64条）

V.内阁（第65-75条）

六。司法机关（第76-82条）

七。金融（第83-91条）

八。地方自治（第92-95条）

九。修正案（第96条）

十，最高法（第97至99条）

十一。补充规定（第100-103条）

日本宪法的正式生效，是由日本天皇颁布圣旨宣告。它包含天皇的枢密印章和签名，并由日本首相和其他国务大臣根据日本帝国先前的宪法要求予以签

名。该法令指出：

“我很高兴按照日本人民的意愿为建设新日本奠定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批准并颁布了在与枢密院协商和根据上述《宪法》第73条规定的帝国国会决定之后生效的《日本帝国宪法》改正案。”

序言

宪法在序言中明确声明了人民主权原则。这是以“日本人民”的名义宣布的，并宣称“主权与人民同在”，并且：

政府是人民的神圣信任，权力是人民的权力，由人民代表实施，为了人民的利益。

该语言的部分目的是反驳先前的主权君主在于宪法的理论。宪法声称，皇帝仅仅是国家的象征，“他从人民的意志获得主权权力”（第1条）。宪法案文还主张基本人权的自由主义。特别是第97条规定：

该宪法保障了日本人民的基本人权，是人类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古老斗争的成果；他们经受住了许多严格的耐久性测试，并被赋予了今世后代的信任，不可受到侵害。

皇帝(第1至8条)

根据宪法，皇帝是“国家和人民团结的象征”。主权取决于人民，而不是像《明治宪法》规定的皇帝一样。皇帝具有国家领导的大部分功能，正式任命首相、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召集国会和解散众议院，并颁布法律和条约、行使其它功能。但是，他在内阁或国会的建议和批准下行事。

与《明治宪法》相反，天皇的角色几乎完全是仪式性的，他没有与政府有关的权力。与其他君主立宪制不同，他甚至不是日本自卫队(JSDF)的名义首席执行官或名义上的总司令。宪法明确将皇帝的角色限制为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事务。宪法还规定，这些职责可以由皇帝根据法律规定委派。

王位的继承受《皇室法》管辖，由一个包含十名委员的、名为“皇室委员会”的机构管理。皇室的预算是由国会决议来管理。

放弃战争(第9条)

根据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战争、不以之为国家的主权、不将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此，该条规定“陆，海，空部队以及其他战争潜力将永远不会得到维持”。自第9条颁布以来，其必要性和实际范围一直在日本进行辩论，特别是在建立了日本自卫队(JSDF)之后;自1954年7月1日起，日本自卫队是事实上的战后日本军事力量，可以代替战前武装部队。一些下级法院认为，日本自卫队违反宪法，但最高法院从未就此问题做出裁决。

一些日本人还对美军在日本的存在以及《宪法》第9条规定的《美日安全条约》提出了挑战。日本最高法院认定，美军的驻扎并没有违反第9条，因为它没有涉及日本指挥下的部队。法院裁定《美日安全条约》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并拒绝根据政治问题学说对它的合法性作出裁决。

许多政治团体呼吁修改或废除第9条的限制，以允许集体防御努力并增强日本的军事能力。

个人权利(第10至40条)

战后宪法突出强调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反映出对《波茨坦宣言》“尊重基

本人权”的承诺。

日本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植根于第十三条，该宪法主张人民的权利“被尊重为个人”，并在遵守“公共福利”的前提下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本文的核心概念是“jinkaku”，它代表“将每个人定义为一个人的性格和个性元素”，并且代表了政府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尊重的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第13条被用作确立隐私权，自决权和对个人自身形象的控制权的依据；

随后的条款规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禁止基于“政治，经济或社会关系”或“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或家庭出身”对日本公民的歧视（第14条）。不能以“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家庭出身，教育，财产或收入”为由拒绝投票权（第44条）。在婚姻（第24条）和儿童教育（第26条）方面，明确保证了性别平等。

禁止贵族：第十四条禁止国家承认贵族。可以授予荣誉，但不得继承世袭或授予特殊特权。

民主选举：第15条规定：“人民有选择和解散公职人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它

保证了成年人(在日本，年龄在20岁以上)的普遍选举权和无记名投票。

禁止奴隶制:第18条保证。非自愿奴役仅可作为对犯罪的惩罚。

宗教与国家分离:禁止国家授予宗教特权或政治权威，或进行宗教教育(第20条)。

集会，结社，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所有内容均不受第21条的限制。因而禁止政府进行言论审查。

工人的权利:第27条宣布劳动是一项权利和义务，其中还规定"工资，工时，休息和其他工作条件的标准应由法律确定"，并且不得剥削儿童。工人有权参加工会(第28条)。

财产权:保证公民能够得到"公共福利"。如果国家支付赔偿金，则可以征用私人物业以之用于公共用途(第29条)。国家也有权征税(第30条)。

适当程序权:第31条规定，"除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任何人不得受到惩罚。第32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剥夺其诉诸法院的权利";最初是为承认刑事正当程序权而起草的，现在也被理解为民事和行政法案件中正当程序权的来源。

防止非法拘留:第33条规定，任何人不可以在没有逮捕令将其拘捕，除非正在作案时被抓捕。第三十四条保证人身保护权，律师权和被告知罪名的权利。第40条规定了起诉国家不当拘留的权利。

公正审判的权利:第37条保障接受公开审理、以及可以得到律师、辩护和质询证人的权利。

防止自我入罪: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证自己之罪;在胁迫下获得的供认不予受理,也不得仅根据自己的供认而定罪。

其他保证:

向政府请愿、诉求的权利(第16条)

有权诉讼国家(第17条)

思想和良心自由(第19条)

表达自由(第19条)

宗教自由(第20条)

变更居住权,选择工作,出国和放弃国籍的权利(第22条)

学术自由(第23条)

禁止强迫婚姻(第24条)

义务教育(第26条)

防止任意进入、搜查和扣押(第35条)

禁止酷刑和残忍处罚(第36条)

禁止事后法律(第39条)

禁止因同样罪行与罪名而被双重控罪(第39条)

根据日本判例法，鉴于公司的性质，在可行的程度内，宪法人权适用于公司。宪法规定的人权也适用于外国国民，除非那些仅适用于公民的权利(例如，外国人无权根据第22条进入日本，无权根据第15条投票，以及其其他政治权利)。

政府机关(第41–95条)

战后宪法下的政府

宪法建立了政府的议会制度，在该制度中，立法权归属于两院制国民议会中。尽管在现行宪法下存在两院制的国会，但新宪法废除了由贵族成员组成的上层同僚(类似于英国上议院)。新宪法规定，两个参议院均由直接选举产生，由下议院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上议院组成。

国会从议员中提名首相，但如果两院不同意，则由下议院拥有最终决定权。因此，实际上，首相是众议院多数党的领导人。只有众议院拥有对内阁进行不信任投票的能力;众议院可以否决参议院对任何法案的否决权，并具有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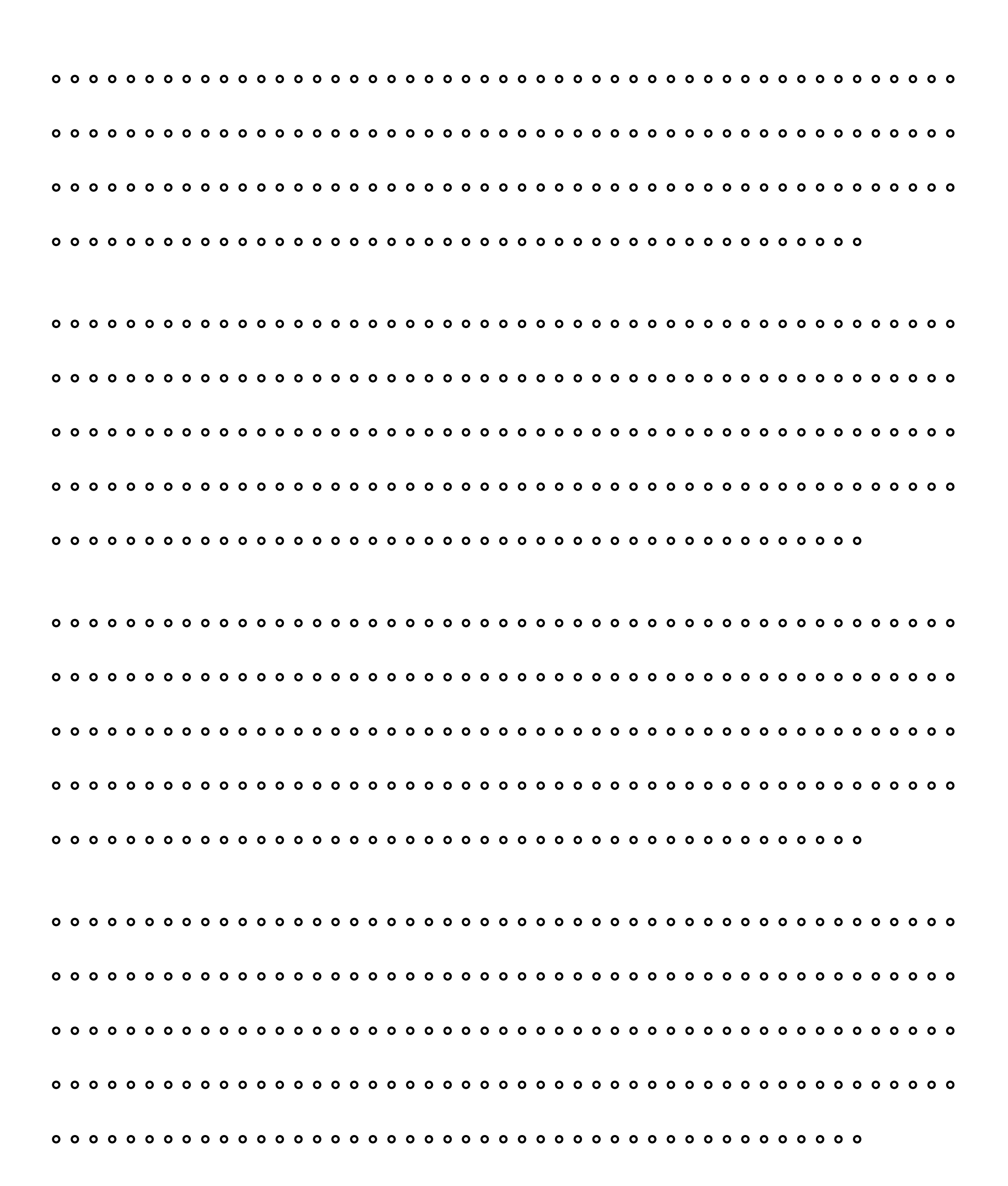
定国家预算和批准条约的优先权。

行政权归属内阁，向国会负责，由首相领导。首相和多数内阁成员必须是国会议员，并有权利和义务参加国会会议。内阁还可以建议皇帝解散众议院，并要求举行大选。

司法机构由几个由最高法院领导的下级法院组成。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内阁提名，由皇帝任命，而其他大法官由内阁提名和任命，并由皇帝认证。下级法院法官由最高法院提名，由内阁任命并由天皇认证。所有法院都有司法审核的权力【即，审核政府行政部门的政策与规定是否符合宪法】并可以解释宪法以否决政府法规和其他政府行为，但前提是这种审核解释与实际纠纷有关。

宪法还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框架，要求地方实体选举产生其首长和议会，并规定适用于特定地方的政府行为必须得到该地区居民的批准。这些宪法规定构成了1947年《地方自治法》的框架，该法律建立了县，市和其他地方政府实体的现代体系。

。。。



http://japan.kantei.go.jp/constitution_and_government_of_japan/constitution_e.html

日本宪法内容

1946年11月3日颁布

1947年5月3日生效。

我们，日本人民，通过我们在国会正式选出的代表，决定采取行动，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为了确保与所有国家和平合作的成果、和整个这片土地上的自由与福祉，为了再也不因我们政府的行动而承受战争的恐怖，——宣告主权是人民的主权，并坚定地建立了这部宪法。政府是人民的神圣信任，其权威得自于人民，其权力由人民的代表实施，其利益是为了人民的享有。这是本宪法赖以建立的人类普遍原则。我们拒绝、并废除与此原则矛盾的任何宪法，法律，条例，规章。

我们日本人民一直渴望和平，并深知关乎人际关系的崇高理想；我们决心维护我们的安全与生存，相信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正义与信念。我们希望在国际社会中拥有荣誉的一席之地，努力维护和平，致力于从地球上永远驱逐暴政、奴役、压迫、不宽容。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有和平地生活的权利，而不受恐惧与侵夺。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对自己负责的，除非其具有普遍的政治道德

律；遵守这样的政治道德律是所有国家的意愿；这样的国家因而得以维持其自己的主权，并因而与其他国家拥有正当的主权关系。

我们日本人民以我们的国家荣誉保证，我们将以我们所有的资源实现这些崇高的理想和目的。

第一章

皇帝

第一条 皇帝是国家和人民团结的象征，其地位应从拥有国家主权的人民的意志中衍生而来。

第二条 皇室的王位应根据国会所通过的法律继承。

第三条 皇帝在国家事务中的一切行为，均须取得内阁的意见和批准，内阁对此负责。

第四条 皇帝仅可在本宪法规定的国家事务中履行其作为，而他无权行使与

政府有关的权力。

皇帝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国家事务中委派其行为的执行。

第五条 根据《皇室法》设立摄政王时，摄政王应以皇帝的名义在国家事务中履行其作为。在这种情况下，上一条的第一款将适用。

第六条 皇帝任命国会所指定的总理。

皇帝应任命内阁指定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第七条 皇帝在内阁的建议和同意下，应代表人民在国家事务中进行下列行为：

颁布宪法，法律，内阁命令和条约的修正。

国会的召集。

众议院解散。

宣布举行国会议员大选。

认证法律规定的政府部长和其他官员的任免，以及大使和部长的权力与资

格。

大赦和特别大赦的认证，减刑，缓刑和恢复权利。

授予荣誉。

法律所规定的批准书和其他外交文件的认证。

接待外国大使和部长。

履行礼仪职能。

第八条 未经国会授权，皇宫不得赠予或收受财产，也不得赠予或收受任何礼物。

第二章

放弃战争

第九条 真诚地渴望建立在正义与秩序基础上的国际和平，日本人民永远放弃战争，不将其视为日本国家的主权，不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了实现上述的目标，陆，海，空部队以及其他战争潜力将永远不得维持。日本国家的交战权将不被承认。

第三章

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成为日本国民的必要条件由法律规定。

第十一条 不妨碍人民享有任何基本人权。本宪法保障人民的这些基本人权，这应被赋予这一代和后代人民永恒和不受侵犯的权利。

第十二条 本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应由人民不断努力维护，人民不得滥用这些自由权利，并始终负责将其用于公共福祉。

第十三条 全体人民应作为个人受到尊重。在不影响公共福祉的范围内，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应是立法和其他政府事务中的最高考虑。

第十四条 所有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关系上不得因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或家庭出身而受到歧视。

特权和贵族不受承认。

任何荣誉，勋章或任何殊荣均不得享有特权，任何此类荣誉奖励的有效时间不得超过承受人的在世时间。

第十五条 人民有选择和解散公职人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所有公职人员都必须是整个社区的仆人，而不仅仅是其中某一个部分人群的仆人。

在选举公职人员方面，保证成年人享有普选权。

在所有选举中，都不应违反投票的保密性。选民不得因其所做出的选举抉择而公开或私下受责。

第十六条 人人有权和平地请求赔偿损害，撤离公职人员，颁布、废除或修正法律、法令或法规以及其他事项。任何人不应因其所主张或支持的这些请求而受到歧视。

第十七条 每个人因任何公职人员的非法行为遭受损害的，可以依法向国家

或公共实体提起诉讼。

第十八条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的奴役被拘禁。禁止非自愿奴役，除了对犯罪的惩罚以外。

第十九条 思想和良知自由不得受到侵犯。

第二十条 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得到保障。任何宗教组织均不得从国家获得任何特权，也不得行使任何政治权力。

不得强迫任何人参加任何宗教行为，庆祝活动，仪式或习俗。

国家及其机关应避免进行宗教教育或任何其他宗教活动。

第二十一条 保障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言论，新闻和一切其他形式的表达自由。

不得保留任何审查制度，也不得违反任何通信手段的保密性。

第二十二条 人人有选择和改变其住所的自由，并有权选择不影响公共福祉

的职业。

所有人移居国外和放弃国籍的自由不应受到侵犯。

第二十三条 学术自由得到保障。

第二十四条 婚姻仅应在男女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并应在夫妻平等权利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合作来维持。

关于配偶的选择，财产权，继承，住所的选择，离婚以及与婚姻和家庭有关的其他事项，应从个人尊严和两性基本平等的角度制定法律。

第二十五条 人人有权维持健康和有文化的生活的最低标准。

在所有生活领域中，国家应尽力促进和扩展社会福利与安全以及公共卫生。

第二十六条 所有人都有依法获得与其能力相对应的平等教育的权利。

所有人都有义务使所有受其保护的男孩和女孩接受法律规定的普通教育。这种义务教育是免费的。

第二十七条 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权利和义务。

工资，工时，休息和其他工作条件的标准应由法律规定。

不得剥削儿童。

第二十八条 保障工人的组织，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的权利。

第二十九条 拥有或持有财产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

财产权应依照法律的规定，符合公共利益。

私有财产可以仅在获得补偿的情况下用于公共用途。

第三十条 人民依法应当纳税。

第三十一条 除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或自由，也不得处以其他刑事惩罚。

第三十二条 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诉诸法院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 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除非有称职的主管司法人员签发的令状明确指明了该人被起诉的罪行;或者除非，该人士在正在犯罪的时候被逮捕。

第三十四条 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除非其在被逮捕的时候立即被告知其被控罪名、并可以立即享有不被禁止的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被逮捕，除非有充足的逮捕理由，而且这样的逮捕理由应当在被逮捕人的要求下可以立即作为呈堂控罪的罪名(这样的呈堂控罪不应当禁止所涉及之被逮捕人及其律师的在场)。

第三十五条 除非有充分理由签发手令，并特别说明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押的东西，否则人人享有在其房屋、文件和物品上，免于强迫进入、搜查和扣押的安全权不得受到损害的权利。除第33条另有规定外，每次搜查或扣押均应由有资格的司法人员签发单独的逮捕令。

第三十六条 绝对禁止任何公职人员施加酷刑和残酷的惩罚。

第三十七条 在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均应享有由公正法庭进行的、及时公开审判的权利。

应准许他有充分的机会检查所有证人，并且他有权使用公务费用请来对自己有利的证人。

被告在任何时候均应得到合格律师的协助，如果被告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律师，则应由国家指派律师供他使用。

第三十八条 任何人不得被强迫为自己的罪而作证。

在强迫，酷刑或威胁下，或在长期逮捕或拘留后作出的供认，不得作为证据。

如果对被告之罪的唯一证明就是被告自己的供罪，那么，法庭不得因此而对该被告定罪或处罚。

第三十九条 任何人不得对实施时已为合法或无罪释放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也不得因同样的罪行罪名而被控多次。

第四十条 任何人在被逮捕或拘留后无罪释放的，可依法起诉国家以寻求赔偿。

第四章

国会

第四十一条 国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

第四十二条 国会由两院组成，即众议院和参议院。

第四十三条 两议院应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全体人民的议员组成。

每个议院的成员人数应依法确定。

第四十四条 众议院议员及参选人的资格应由法律确定。但是，不得因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家庭出身，教育，财产或收入而受到歧视。

第四十五条 众议院议员任期为四年。但是，如果众议院解散，则应在其整个任期届满之前就终止任期。

第四十六条 参议院议员的任期为六年，每三年选举半数议员。

第四十七条 选举区，投票方式和与两院议员选举方式有关的其他事项，应依法确定。

第四十八条 任何人不得同时成为两院的成员。

第四十九条 两院议员应依法从国库收取适当的年薪。

第五十条 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在议会集会期间，两院成员均免于被捕；在议会集会之前被逮捕的任何成员，应议会的要求，在议会集会期间获释。

第五十一条 两院议员不应当为其在议会集会内的演讲、辩论或投票，而在议会集会之外承担责任。

第五十二条 通常，议会集会应每年召集一界。

第五十三条 内阁可决定召集国会特别界会。当参议院中（或众议院中）的成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或更多提出要求时，内阁必须决定是否召集国会特别界会。

第五十四条 众议院解散后，必须在解散之日起四十(40)天内对众议院议员进行大选。新一届国会必须在大选之日起三十(30)天内开始集会。

众议院解散后，参议院也同时关闭。但是，在国家紧急状态时，内阁可能会召集紧急参议院集会。

这里提到的、该届参议院紧急集会措施，应是临时性的，并应当被随后撤销，除非在下届众议院集会开始后的十(10)天内获得该界众议院同意。

第五十五条 参众两院中，各院应对与成员资格有关的争议进行裁决。但是，为了拒绝任何成员的席位，必须以出席会议的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决议。

第五十六条 除非存在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或以上，否则不能在任何一个议院中进行事务处理。

除《宪法》另有规定外，所有事项应在每一议院中以出席者的多数决定，如遇平局，主持人应决定问题。

第五十七条 每个议院的辩论应公开进行。但是，可能会举行秘密会议，其中

出席会议的成员中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多数会通过决议。

两院均应保存其会议记录。该记录应予以公布并广为散发，但秘密会议程序中可能被认为需要保密的部分除外。

在出席会议的成员中，若有五分之一或更多成员的要求，就应在会议记录中记录成员对任何事项的投票。

第五十八条 两院应各自选举自己的议长和其议院内的其他职务官员。

两院均应各自制定其有关会议，议事程序和内部纪律的规则，并可以惩罚行为不检点的成员。但是，为了驱逐成员，出席会议的成员中三分之二或更多必须通过决议。

第五十九条 :两院通过的法案成为法律，但《宪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若与参议院的决议不同，那么，当众议院第二次以在场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或更多而通过该同样法案时，该法案即成为一项法律。

这里的规定并不排除，众议院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而召集两院联合委员会的会议。

如果，参议院在收到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后六十(60)天内【除休会期间外】没有

采取最后行动,那么,众议院可以因此认定,参议院拒绝通过该项法案。

第六十条 预算必须首先提交众议院。

在审议预算时,如果:参议院做出的决定与众议院的决定不同,并且根据法律规定而进行的两院联合委员会协商也无法达成两院协议(或者,参议院在收到众议院所通过之预算案的三十(30)天内【不包括休会期】无法针对众议院的审议决议而以最后行动做出决议);那么,——众议院的决定就是国会的最终决定。

第六十一条 前条第二段也适用于缔结条约所需的国会批准。

第六十二条 两院均可对政府进行调查，并可要求证人在场和作证以及提供记录。

第六十三条 首相和其他国务大臣可以在任何时候关于任何议案出现在两院的任何一个议院中，而不论他们是否是议院议员。如果他们必须出现才能给出答案或解释，那么，他们应当出席。

第六十四条 国会应在两院成员中设立弹劾审判庭，以根据相关法律规程对于政府法官进行弹劾审判。

第五章

内阁

第六十五条 内阁拥有执行权。

第六十六条 内阁应由首相担任领导，并由法律规定的其他内阁部长组成。

首相和其他内阁部长必须是文职人员。

内阁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应对国会集体负责。

第六十七条 首相应从国会议员中选拔、以国会决议方式任命。该任命职务应优先于担任首相之人的所有其他兼职事务。

如果众议院和参议院意见不一致，并且根据法律规定通过两院的联合委员会也无法达成协议，或者参议院未在十（10）天内【不算休会期间】指定首相人选，那么，由众议院所指定之首相人选，即成为首相。

第六十八条 首相应任命内阁大臣。但是，必须从国会议员中选择多数内阁大臣。

首相可随其选择罢免内阁大臣。

第六十九条 如果，众议院针对内阁通过不信任决议、或拒绝通过信任决议，那么，除非众议院在十（10）天内解散，否则内阁应全体辞职。

第七十条 首相职位空缺时，或在众议院议员大选后首次召集众议院集会时，内阁应全体辞职。

第七十一条 在前两条条款提到的情况下，内阁应继续其职能，直到任命新首相为止。

第七十二条 首相代表内阁向国会提交法案，关于一般国民事务和外交关系的报告，并对各个行政部门进行控制和监督。

第七十三条 内阁除具有其他一般行政职能外，还应履行以下职责：

忠实执行法律；进行国家事务。

管理外交事务。

缔结条约。但是，它应事先获得国会批准，或视情况而定，随后获得国会批准。

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管理公务员。

准备预算，并提交给国会。

颁布规章命令，以执行本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但是，除非得到该法律的授权，否则不能在此类内阁命令中包括刑法规定。

决定大赦，特殊大赦，减刑，缓刑和恢复权利。

第七十四条 所有法律和内阁命令应由相应内阁部长签署，由首相背书。

第七十五条 内阁大臣在任职期间，未经首相同意，不得被采取法律行动。但是，采取这一法律行动的权利，不应因此受到相关的阻碍。

第六章

司法

第七十六条 整个司法权归属于最高法院和依法设立的下级法院。

不得设立特别法庭，也不得赋予任何行政长官、任何行政机关以任何司法判决权力。

所有法官在行使良知时应保持独立，并仅受本《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第七十七条 最高法院具有制定司法体系内部秩序规则的权力，根据最高法院的权力来确定程序和惯例规则，以及与律师、法院内部纪律和司法事务有关的事项。

公共检察官、公诉人应服从最高法院的规则制定权。

最高法院可将制定下级法院规则的权力下放给此类法院。

第七十八条 除非通过公开弹劾，或除非其在智力上、或身体上无能力履行公职，否则不得罢免法官。任何行政机关或行政机构均不得对法官采取纪律处分。

第七十九条 最高法院应由首席法官和法律规定的法官人数组成；除首席法官外，所有此类法官均由内阁任命。

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应在此任命发生后的、众议院当届议会集会中，予以审查。该审查完成的十年以后的、众议院当届议会集会中，再次对此任命进行审查。以后依次类推。

在这样的审查中，当多数议员赞成罢免该法官时，应将其罢免。

审查事项由法律规定。

达到法律规定的年龄时，最高法院的法官应退休。

所有这些法官应按规定的定期间隔获得适当的薪金；其薪金在其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第八十条 下级法院的法官由内阁从最高法院提名的人员名单中任命。所有此类法官的任期均为十（10）年，可连任，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年龄退休。

下级法院的法官应按规定的定期间隔获得适当的薪金，其薪金在其任职期间不得减少。

第八十一条 最高法院是有权决定任何法律，命令，法规或官方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终极法院。

第八十二条 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审判应当公开宣布。

如果法院一致认为对某案件审理之公开性，对公共秩序或公共道德构成危险，则可以私下进行审理该案件。但对政治犯罪，或涉及新闻出版的犯罪，或涉及本《宪法》第三章所保障之人民权利的案件，所进行的审理，应公开进行。

第七章

财政

第八十三条 国会决定怎样进行国家财政管理。

第八十四条 除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的条件外，不得征收新税款或对现有税款进行修改。

第八十五条 除非国会批准，否则政府不得支出、也没有义务支出，任何花费。

第八十六条 内阁应准备并向国会提交每个财政年度的预算，供其审议和决定。

第八十七条 为了弥补预算中无法预见的缺失，国会可批准设立储备金，由内阁负责使用。

关于动用储备金的任何花费，内阁必须经过国会的后续批准。

第八十八条 皇室的所有财产归国家所有。皇室的所有开支应由国会在预算中拨付。

第八十九条 不得将公共资金或其他财产用于任何宗教机构或协会的使用、利益或维持，或任何不受公共权力控制的慈善、教育或慈善企业的支出或挪用。

第九十条 国家收支决算应由审计委员会每年审核，并由内阁在所涉时期紧接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内向国会提交，并附有审计声明。

审计委员会的组织和权限应由法律确定。

第九十一条 内阁应每隔一定时间、至少每年一次，向国会和人民报告国家财政状况。

第八章

地方自治政府

第九十二条 关于地方政府的组织和运作的规定，应当依照地方自治的原则，依法制定。

第九十三条 地方公共实体应当依法设立议会作为其决议机关。

所有地方公共实体的首席执行官，其议会成员，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地方官员，应在其所有各社区内以直接普选产生。

第九十四条 地方公共实体有权管理其财产，事务和行政管理，并在法律范围内制定自己的规定。

第九十五条 国会不得在未依法获得有关地方公共实体多数选民同意的情况下，制定仅适用于一个地方公共实体的特别法律。

第九章

修正案

第九十六条 本宪法的修正案过程，应由国会启动，参众两院各自分别以其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通过，然后应提交人民投票批准；人民投票的过程，应当在国会所指定的选举中，或是在特别全民投票中，以多数票通过。

经如此批准的修正案应立即由皇帝以人民的名义颁布，作为本宪法的组成部分。

第十章

最高法律

第九十七条 本宪法赋予日本人民的基本人权是人类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古老斗争的成果；它们经受住了许多严格的耐久性测试，并被赋予了今世以及后代的信任，并将要被持守而不受到侵害。

第九十八条 本宪法为国家最高法律，与本法规定相抵触的任何法律，法令，帝令或其他政府行为或其任何部分均不具有法律效力或效力。

日本与各国之既定法律体系所缔结的条约应当得到忠实遵守。

第九十九条 皇帝或摄政王以及国务大臣，国会议员，法官和所有其他公职人员都有义务遵守和维护本《宪法》。

第十一章

补充规定

第一百条 本宪法应自其颁布之日起六个月之日起执行。

颁布与执行本宪法所必需的法律，选举参议院议员和召集国会的程序以及实施本宪法所必需的其他筹备程序，可以在宪法规定的日期之前执行。

第一百零一条。 如果在本《宪法》生效之日之前未成立参议院，则由众议

院单独成为国会，直到参议院成立。

第一百零二条 根据本《宪法》在第一届任期中，参议院有一半成员的任期为三年。属于这一类别的成员应依法确定。

第一百零三条。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出于执行本《宪法》的考虑，在本宪法生效之日，原来的国务大臣、众议院议员和法官以及所有与本宪法所提到的职务相对应的其他公职人员，不得自动丧失其职务；但是，根据本《宪法》的规定选举产生、或任命继任者时，他们应当理所当然地丧失其职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panese_economic_miracle

战后日本经济奇迹

背景

这种经济奇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西德从冷战中受益的结果。它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日本政府的经济干预主义，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协助和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日本建立了重要的分支机构，以减缓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扩张。美国还对日本经济的增长感到担忧，因为存在一种不快乐和贫穷的日本人口转向共产主义的危险，并因而会增长苏联对太平洋的控制。

在“经济奇迹”年代，日本经济的显着特征包括：制造商，供应商，分销商和银行之间的紧密合作；强大的企业工会和财阀集团；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并保证大公司和高度工会化的蓝领工厂的终身雇佣（shūshinkoyō）。

政府贡献

即使在盟军最高指挥司令部撤离以及朝鲜战争推动的经济繁荣减弱之后，日本的金融复苏仍在继续。日本经济幸免于因美国军事采购付款停止以后而可能造成的严重衰退，并继续增长获利。到1960年代后期，日本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实现了惊人的迅速和完全的经济复苏。直到1960年代后期，日本经历了最繁荣的时期；日本政府通过刺激私营部门的增长来刺激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首先是通过制定有效管理经济危机的法规和保护主义，然后集中精力进行贸易扩张。

历史

日本经济奇迹简介

日本的经济奇迹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冷战结束（1945-1991年）之间的日本经济的显着增长。经济奇迹可分为四个阶段：复苏（1946-1954），高增长（1955-1972），稳定增长（1972-1992）和低增长（1992-2017）。

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到广岛和长崎核轰炸的损坏，以及盟军其它的空袭行动，日本能够从二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并到1960年代成功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不包括苏联）。然而，在三十年后，随着日元的升值，日本经历了所谓的“增长衰退”。为了防止增长进一步放缓，日本极大地改善了其技术进步并提高了日元的价值，因为日元贬值可能会给经济带来进一步的风险，并可能对贸易产生潜在抑制作用。日元的升值导致1980年代的重大经济衰退。为了减轻经济衰退的影响，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金融政策来刺激内需。然而，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发生的泡沫经济以及随后的通货紧缩政策摧毁了日本经济。通缩政策实施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时期，一直持续到今天。

恢复阶段（1946-1954）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伤害。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棉花产业就濒临崩溃。战前的三分之二的棉纺锭子被战时的管理人员废弃了；炸弹和城市地区的破坏造成了进一步的后果。纺纱损失20％，织造能力损失14％”。然而，复苏的能力令世界震惊，赢得了“日本经济奇迹”的称号。总的来说，每个国家在战后时期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增长，日本，西德和意大利等由于战争破坏而导致工业产值大幅下降的国家实现了最迅速的恢复。在日本，工业生产在1946年下降到战前水平的

27.6%，但在1951年恢复并在1960年达到350%。

日本从战争创伤中迅速恢复过来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成功进行了经济改革。日本主要关注产业政策的政府机构是经济产业省。其中主要的经济改革是采用“倾斜生产方式”。“倾斜生产模式”是指倾斜的生产，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和棉花等原材料的生产上。纺织品产量占工业总产值的23.9%以上。此外，为刺激生产，日本政府支持新招募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通过增加对女性劳动力的招聘，日本设法从破坏中恢复过来。关于招聘的立法包含三个组成部分：限制在区域内招聘和安置劳动者；禁止直接招聘新的离校生；以及根据劳工部发布的明确规定直接招聘非离校生。

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复苏的第二个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朝鲜战争是在直到1945年被日本帝国吞并的朝鲜领土上进行的。当美国参加朝鲜半岛的冲突时，它转向日本经济来采购设备和用品，因为从美国运来的后勤物流很快成为军方的重要问题。日本工业很快向在朝鲜作战的美军提供了所需的弹药和后勤保障。需求刺激了日本经济，使其能够从太平洋战争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并为随后的快速扩张提供基础。

高增长阶段（1954年至1972年）

在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实现国内经济改革之后，日本得以从1950年代飙升至1970年代。此外，日本还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成为东亚最早的发达国家之一。1967年至1971年的《日本经济年鉴》出现了显着增长。年鉴在1967年说：1966年日本经济因此以比以前预期更快的速度发展。1968年，年鉴说，日本经济在1965年秋触底后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增加”，“增长”和

“上升”等词语充斥着1967年至1971年的年鉴。日本在此期间的迅速工业现代化的原因很复杂，主要特征包括了池田勇人首相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大规模刺激消费与出口，等等。

政府政策的影响：池田政府和财团

1954年，日本通商产业省在1949年至1953年间建立的经济体系全面生效。池田首相被称为是“日本经济奇迹中最重要的建筑师”；他奉行重工业化政策。该政策导致出现了“过度贷款”（今天仍在继续）；日本银行向城市银行发行贷款，而城市银行又向工业企业集团发行贷款。由于当时日本缺乏资金，工业企业集团借贷的能力超出了他们的偿还能力，甚至往往超出了其净资产，导致城市银行反过来从日本银行借钱。这使日本国家中央银行完全控制了 对其依赖的各地本地银行。

过度贷款的制度，加上政府放宽了反垄断法，还导致了称为“财团”的工业企业集团的重新出现，类似于战时时期的财阀。在索尼商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的经济改善的带领下，财团有效地分配了资源并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财阀企业集团之成功的核心原因在于城市银行；其借贷慷慨，并在不同行业交叉持有股份。财阀集团既包含水平整合、也包含垂直整合；锁定了日本产业旗下的外国公司。财阀集团与通商产业省有着密切的关系；财阀集团彼此之间也通过交叉持股而联系深厚，从而保护了公司免受外国收购的

影响。例如，日本开发银行83％的资金用于战略性行业：造船，电力，煤炭和钢铁生产。财阀集团事实证明，日本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于保护日本弱小行业至关重要。

财阀集团还促进了日本经理人的态度转变；他们在短期内可以容忍低利润，因为财阀较少关注增加的股利和利润，而更多地关注利息支付。一般而言，财阀公司大约只有三分之二的股票被交易，这使财阀免受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并允许财阀经理制定长期计划并最大化市场份额，而不是着眼于短期利润。

池田政府还制定了外汇分配政策，这是一种进口管制制度，旨在防止外国商品淹没日本市场。通商产业省利用外汇分配、促进出口、管理投资和监测生产能力来刺激经济。1953年，通商产业省修订了《外汇分配政策》，以通过修订出口链接制度来促进国内工业并增加出口激励。后来基于修订的生产能力用于防止进口倾销的外汇分配。

大量消费：从生存到娱乐

在重建时期和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日本设法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生活水平得到了显着改善，消费量也显着增加。从1955年到1970年，城市家庭的平均月消费量翻了一番。而且，日本的消费比例也在变化。诸如食物，衣服和鞋类等日用品的消费量比例在减少。相反，娱乐，娱乐活动和商品的消费增加，包括家具，交通，通讯和阅读的消费比例增加。消费的大幅增长刺激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而刺激了生产。

大量出口：黄金六十年代并转向出口贸易

1955年至1961年之间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为“黄金六十年代”铺平了道路，这是通常与日本经济奇迹有关的第二个十年。1965年，日本的名义GDP估计略超过910亿美元。十五年后的1980年，名义GDP飙升至创纪录的1.065万亿美元。

日本政府在池田首相（前任通商产业省部长）的领导下，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收入倍增计画”。池田降低了对私人企业的利率和税收，以刺激支出。此外，由于日本政府财务信贷计划提供了财务上的灵活性，池田政府迅速扩大了对日本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铁，机场，港口设施和水坝。池田政府还扩大了对日本经济先前被忽视的通信部门的政府投资。这些行为都延续了日本走向有序经济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了混合经济模式。

除了池田坚持政府干预和经济管制外，他的政府还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到1960年4月，贸易进口已经放开了41％（1956年为22％）。池田计划在三年内将贸易自由化至80％。然而，他的计划遭到了两个行业的强烈反对，这两个行业都因过度贷款而蓬勃发展，而日本民族主义者们则担心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大肆收购日企。日本媒体将自由化比作“黑船的第二次来临”；“面对来自外国资本主义大国的进攻，日本诸岛的防御能力不足”；以及“日本经济要准备好迎接本国资本与外国资本之间的血腥战斗。”池田的收入倍增计划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举措的回应。池田的动机纯粹是务实和外交政策，然而，他只有在通过有利于日本产品和公司的内部法规确保了相关市场受保护之后，才转向贸易自由化。

池田还成立了许多相关的外国援助分发机构，以展示日本参加国际秩序和促进出口的意愿。这些机构的成立不仅是对国际组织的小让步，而且消除了一些公众对贸易自由化的担忧。池田于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1964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到池田卸任时，国民生产总值以惊人的13.9％的速度增长。

稳定增长阶段（1973–1992）

1973年，第一次石油价格冲击袭击了日本（1973年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增加到每桶13美元以上。在此期间，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原因是供应能力无法有效应对需求的迅速增长，而设备投资的增加常常带来不良结果-供应趋紧和商品价格上涨。此外，由于石油价格再次上涨，1978年和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加剧了这种情况。从每桶13美元到每桶39.5美元。尽管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日本仍然能够承受冲击，并设法从以产品为主的生产形式转变为以技术为主的生产形式。

实际上，这种转变是石油危机和美国干预的产物。由于石油价格上涨了十倍，生产成本也随之飙升。在石油危机之后，为了节省成本，日本不得不以更环保的方式生产产品，并且消耗更少的石油。石油危机之后引发产业变革的最大因素是包括原油在内的能源价格上涨。结果，日本转变为技术集中型经济，确保其经济稳定增长，并在石油危机期间受重伤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脱颖而出。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摩擦，因为日本的快速经济增长可能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1985年，美国与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签署了《广场协定》。“广场协定”是试图使美元贬值，但对日本造成的伤害最大。日本试图通过日元升值来扩大国际市场，但它们却过

高地升值，从而形成了泡沫经济。广场协议成功地减少了美国与西欧国家的贸易逆差，但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其减轻对日贸易逆差的主要目标。

通商产业省的作用

通商产业省（MITI）是日本战后经济复苏的工具。一些学者认为，没有任何其他政府法规或组织对经济的影响比MITI更强。“日本经济增长的特殊速度，形式和后果，”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写道：“如果不参考MITI的贡献，就无法理解”（Johnson，vii）。成立于1949年的MITI的角色始于“关于工业合理化的政策”（1950年），该政策协调了各行业为抵消SCAP通货紧缩法规的影响而做出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MITI正式确定了日本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该政策的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MITI希望“使钢铁产量翻一番，财团就会立即拥有了资本，建设资产，生产机械的制造商，以及大多数其他必要因素”。MITI协调了各种产业，包括新兴的财团，朝着特定的目标，通常是朝着国家生产目标与私人经济利益的交汇点迈进。

MITI还通过将技术进口与其他商品的进口分解开来提高工业安全性。MITI的《外国资本法》授予该部权力，以协商技术进口的价格和条件。技术控制的这一要素使其能够促进它认为有前途的产业。进口技术的低成本使工业得以快速发展。通过新设备，管理和标准化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

日本于1952年8月废除了经济稳定委员会和外汇管制委员会，从而MITI拥有了监管所有进口商品的能力。尽管经济稳定委员会已经由MITI主导，但吉田政府将其转变为经济研议机构，仅为“智库”，从而使得MITI对所有日本

进口可以完全控制。外汇预算的权力也直接交给了MITI。

MITI在日本开发银行的建立也为私营部门提供了用于长期发展的低成本资本。日本开发银行（Japan Development Bank）引入了“财政投资和贷款计划”（Fiscal Investment and Loan Plan）的使用权，该计划是个人和国家储蓄的巨大汇集。当时FILP控制着世界最大商业银行储蓄的四倍。凭借这种财务实力，FILP能够维持异常高的日本建筑公司数量（是其他任何具有类似GDP的国家的建筑公司数量的两倍以上）。

结论

经济奇迹的结束与冷战的结束相吻合。日本股市在1989年底创下历史最高峰，在1990年晚些时候开始回弹，但在1991年急剧下跌。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结束的那一年恰逢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history_of_Japan#Post-World_War_II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这场战争抹去了日本自1868年以来取得的许多成就。该国约40％的工业厂房和基础设施被摧毁，生产恢复到大约15年前的水平。人民对这场破坏感到震惊，并采取了行动。新工厂配备了最先进的现代化机器，从而使日本相对于现在拥有较老工厂的胜利者国家具有最初的竞争优势。随着日本第二个经济发展时期的开始，数百万前士兵加入了一支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以重建日本。日本的殖民地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丧失，但自那时以来，日本人已将其经济影响力扩展到整个亚洲及其他地区。

占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盟军（主要是美军）迅速开始抵达日本。占领者几乎立即开始了旨在使日本民主化的强化法律改革方案。一项行动是确保制定一部工会法，允许工人第一次集体组织，罢工和讨价还价，日本国会于1945年12月22日通过了这项法律。虽然法律是在日本被占领期间制定

的，但法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作品。它是由一个以法律学者Suehiro Izutaro为首的大型法律咨询委员会制定的。该委员会规模很大，由“三名福利部官僚和两名学者，一个由30名成员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包括著名共产主义人士德田圭一）组成，成员总数超过130名，分别代表大学，企业，政党，官僚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劳工。” 在占领期间，美国的援助总额约为19亿美元，占该时期进口总额的15％，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种援助中约有59％以食品的形式提供，以工业材料的形式提供15％，以运输设备的形式提供12％。但是，美国的赠款援助在1950年代中期迅速减少。1953年，美国从日本的军事采购达到了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的7％的水平，而在1960年后降至1％以下。美国在占领期间采取的各种措施，例如土地改革，促进竞争，为日本后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战后对工业领导者的清洗使新的人才可以在国家重建工业的管理中上升。最后，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贸易，因为国际贸易使得日本能够快速扩大出口，并能够以所得外汇进口技术与设备。这也正是19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

2018年的一项研究使用“合成控制方法”，将日本与“合成日本”（其组合类似于日本，但没有美国同盟关系）进行比较，发现美国同盟关系使得日本的GDP从1958年到1968年能够“更快地大幅度增长”。

“天降的礼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正遭受广泛的疲惫和因战争导致的绝望，这被称为“ kyodatsu ”，导致大规模的沮丧和颓废。“天降的礼物”一词是漫画家加藤悦郎在美国军事占领下的第一批插图中创造的。这些礼物指的是美军从头开始的无血腥的民主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使社会衰弱的战争。在

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许多方面中，将选举权扩展至妇女，加强工会组织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是迄今为止最为持久的变化。

在1947年日本社会党首次参加选举之后，片山首相与日本民主党和国民协同党组成了联合政府。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改革之一是将农村土地分配给日本佃农。以前，财产归地主所有，农民以封建佃农制度进行耕作。现代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这种封建佃农制度并没有激励经济增长。在日本战后土地改革政策中，农村地主阶级被解散了。除了解散地主阶级外，而且，那些有效地控制了日本经济近100年的庞大企业集团“财阀”也被拆分，并面临市场竞争。《消除过多的经济集中度法》（1947年12月通过）规定，解散任何被视为垄断的公司；1948年1月的《驱逐财阀相关控制法》迫使与财阀家族有密切关系的财阀董事会成员辞职，同时采取了一项措施，禁止担任其附属公司的兼职董事会成员。此外，政府雇员法颁布；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第一批被任命；地方政府和警方进行重组；民政事务改革；海军和战争的部委被废除；广泛地修订刑事法；土地改革取得进展。最后，美国占领军鼓励日本工人加入工会，迫使公司在技术和创新上展开竞争。

重建

战后初期，致力于重建失去的工业能力：在电力，煤炭，钢铁和化学制品上进行了重大投资。到1950年代中期，产量已达到战前水平。从战时军事主导型的政府需求中释放出来的经济不仅恢复了失去的势头，而且还超过了早期的增长率。在1953年至1965年之间，GDP每年增长超过9％，制造业和采矿业增长13％，建筑业增长11％，基础设施增长12％。1965年，这些部门雇用了超过41％的劳动力，而仅26％留在了农业中。

日本备受赞誉的战后教育体系为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上最高的识字率和高等教育水平是日本成功实现技术先进的经济的主要原因。日本学校还鼓励纪律，这是组建有效劳动力的另一个好处。

196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向某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开放并发展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迎来了新型的工业发展。纺织品和轻工业在国际上保持了盈利能力，而其他产品，例如汽车，电子产品，轮船和机床则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在1965年至1970年之间，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增加值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长。在1970年至1973年之间，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持平，都保持在8％左右。零售贸易，金融，房地产，信息技术和其他服务行业发展迅速。

石油危机

日本在1970年代中期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日本在1973年受到石油危机的震撼；它已成为依赖进口石油的经济体。战后日本经历了工业生产的首次下降，以及严重的物价上涨。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的复苏恢复了大多数企业领导人的乐观情绪，但是面对高昂的能源成本，要保持工业增长，就必须改变工业结构。

不断变化的价格条件有利于节约能源和替代性工业能源。尽管投资成本很高，但许多能源密集型行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末成功减少了对石油的依赖并提高了生产率。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末，微电路和半导体领域的进步导致消费电子和计算机领域出现了新的增长行业，并推动了既有

行业的生产率提高。这些调整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制造业的能源效率并扩大了知识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在日趋后工业化的经济中发展壮大。

但是，随着经济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成熟，年增长率仅为4％至6％，结构性的经济变化无法阻止经济增长的放缓。即使如此，在石油价格昂贵的世界和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这些增长率仍然是惊人的。例如，在1980年代后期，日本的平均增长率为5％，远远高于美国的3.8％。尽管1979年石油价格上涨幅度更大，但日本经济的实力显而易见。它的扩张没有出现困扰其他工业国家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曾经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困扰日本本身）。日本在1980年代中期经历了较慢的增长，但其需求维持了持续的经济繁荣；1980年代末期，许多陷入困境的行业复活了。

增长因素

复杂的经济和体制因素影响了日本战后的增长。首先，日本的战前经济能力提供了一些重要的遗产。德川时代（1600至1867年）产生了重要的商业领域中新兴的中心城市群，相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尽管对来自欧洲的科学知识有限），一个成熟的政府官僚机构，农业生产效率，紧密统一的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和行销系统，以及全国性的道路基础设施。明治时期的工业发展使日本可以进到世界大国的地步，是1955年至1973年战后增长的重要前奏，并提供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劳动力。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贯穿直至整个1980年代的投资水平和质量。战前平均对主要设备的投资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1％，在1950年代增加到国民

生产总值的20％左右，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增加到30％以上。在1980年代后期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比率仍徘徊在20％左右。日本企业引进了最新技术来发展工业基础。作为现代化的后起之秀，日本能够避免其他国家较早地发展工业过程所需要的反复试验。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日本通过获得美国的许可，购买专利以及模仿和改进外国发明来改善其工业基础。在1980年代，工业加快了发展步伐。研究和开发，许多公司以其创新和创造力而闻名。

日本的劳动力由于其可得性和素养以及合理的工资需求，为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大量农业工人向现代工业的转移导致生产率的提高，而工资却只有适度的增长。随着人口增长放缓以及国家在1960年代中期变得越来越工业化，工资显着上升。但是，工会合作通常使工资增长保持在生产率增长的范围之内。

高生产率的增长在战后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高技能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超常的储蓄率和相应的投资水平以及日本劳动力的低增长是生产率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该国还受益于规模经济。尽管中小型企业创造了该国的大部分就业机会，但大型设施生产效率最高。许多工业企业合并形成更大，效率更高的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型控股公司形成了财富集团，即财阀，在大多数行业中占主导地位。在战争结束后，财阀被解散，但财团集团（大型的现代工业企业集团）应运而生。这些小组内活动的协调以及将较小的分包商纳入这些小组可提高工业效率。

日本公司制定了有助于其巨大增长的战略。抓住机遇的、以增长为导向的公司成功竞争。产品多样化已成为许多财团增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日本公司在产品需求出现之前，就增加了工厂和人员能力。寻求市场份额而不是快速获利是另一个强大的策略。

最后，日本无法直接控制的情况也为其成功做出了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国际冲突往往会刺激日本经济。日俄战争（1904-05），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朝鲜战争（1950 – 53年），和越战带来的军事物资需求拉动了日本经济（1954年至1975年）。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良性对待促进了该国的重建和发展。

不断变化的职业结构

直到1955年末，约40％的劳动力仍在农业中工作，但随着日本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这一数字到1970年下降到17％，到1990年下降到7.2％，在21世纪还不到5％。小型家庭农场消失了。

日本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经济增长是基于重型制造业在汽车，钢铁，造船，化工和电子等领域的快速扩张。到1970年，第二产业（制造，建筑和采矿）占劳动力的比例增加到35.6％。但是，到19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从重工业转向更加以服务为导向的（第三产业）基础。在1980年代，批发，零售，金融，保险，房地产，运输，通讯和政府部门的工作迅速增长，而第二产业的就业则保持稳定。第三产业从1970年的47％增加到

1990年的59.2％。

1980年代

在整个197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排在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并在1990年主要工业国家人均GNP排名中位居第一，为23,801美元，大大高于其1980年的9,068美元。在1980年代中期经济温和下滑之后，日本的经济在1986年开始了一段扩张期，一直持续到1992年再次进入衰退期。1987年至1989年之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从而使1980年代中期相对处于休眠状态的钢铁和建筑等行业复苏，并带来了创纪录的薪水和就业机会。但是在1992年，日本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放缓至1.7％。甚至在1980年代经历了惊人增长的汽车和电子等行业也进入了1992年的衰退期。日本汽车国内市场萎缩，而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也下降了。日本电子产品的国内外需求也有所下降，日本似乎正在失去在世界半导体市场上的领导地位，而输给了美国，韩国和台湾。

不同于出口所导致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繁荣，国内需求在1980年代后期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这一发展涉及从根本上的经济结构调整，从对出口的依赖转向对内需的依赖。始于1986年的繁荣是由公司决定增加私人工厂和设备支出，以及消费者继续大举购买，而导致的。日本的进口增速快于出口。日本战后的技术研究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是军事发展。1980年代高科技产业的增长是由于国内对——电子产品等高科技产品以及更高的生活，住房和环境标准；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更多的福利；扩大休闲设施；改善适应迅速老龄化社会的方法；——等等的需求增加所致。

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将重点从第一和第二产业（特别是农业，制造业和采矿业）转移到了处理业，而电信和计算机变得越来越重要。信息成为财富和权力的核心，是重要的资源和产品。信息经济的兴起是由对尖端技术（例如先进计算机）的重大研究带动的。信息的销售和使用对经济非常有利。东京成为主要的金融中心，拥有一些世界主要的银行，金融公司，保险公司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然而，即使在这里，经济衰退也造成了损失。1992年，日经225指数在年初的平均股票价格为23,000点，但在8月中旬跌至14,000点，到年底稳定在17,000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

1989年经济泡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日本实施了严格的关税和政策，以鼓励人们节省收入。随着银行中货币的增加，获得贷款和信贷变得更加容易，并且日本拥有大量贸易顺差，日元兑外币升值。这使本地公司比其海外竞争对手更容易投资资本资源，这降低了日本制造的商品的价格并进一步扩大了贸易顺差。而且，随着日元升值，金融资产变得有利可图。

由于有那么多资金可用于投资，投机不可避免，尤其是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和房地产市场。在日经股指触及历史最高水平的1989年12月29日，它在以38,915.87收盘前达到38,957.44的历史高位。住房，股票和债券的利率上升如此之快，以至于政府一度发行了100年期债券。此外，银行还发放了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

在泡沫最严重的时候，房地产被高估了。1989年，东京银座区的房价最高，精选物业每平方米的价格超过150万美元（每平方英尺139,000美元）。东京其他地区的价格仅略低一些。到2004年，东京金融区的主要“ A”类房地产价格暴跌；东京的住宅房屋相比于其高峰时期已经降低了很多倍，但仍被列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房地产。东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共同崩溃，导致了万亿美元财富消失。

由于日本的经济受到其高投资率的驱动，因此经济崩溃的打击尤为严重。投资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国外，日本制造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技术优势。随着日本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下降，一些人认为低消费率开始对经济产生影响，导致通货紧缩螺旋上升。

易于获得的信贷帮助造成并吞噬了房地产泡沫，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直是一个问题，直到1997年，银行仍在提供还款担保率很低的贷款。贷款人员和投资人员很难找到任何可以投资的东西，以赚取利润。同时，极低的存款利率（例如0.1％）意味着普通日本储户将钱存入床下就像将其存入储蓄帐户一样。随着政府开始补贴破产的银行和企业，创建许多所谓的“僵尸企业”，纠正信贷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最终，套利交易，即，——从日本借钱，在其他地方投资以获得回报，然后偿还日本人的交易，——为交易者带来可观的利润。

逐渐的、而不是骤然灾难性的、泡沫崩溃的发生时间，在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或二十世纪的终结”。2003年4月，日经225指数在7603.76最终见底；2007年6月，股指向上移动到18,138、一个新的高峰；随后恢复下降趋势。日经指数的下跌可能是由于全球以及本国的经济问题所导致。

从1990年代到现在的通货紧缩

日本的通货紧缩始于1990年代初期。2001年3月19日，日本银行和日本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利率（这是其“量化宽松”政策的一部分）来消除经济中的通缩。尽管长期以来利率一直接近零，但该策略并未成功。一旦接近零的利率未能阻止通货紧缩，一些经济学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和一些日本政客就谈到故意制造通胀（或至少故意引起对通货膨胀的担心）。2006年7月，零利率政策终止。2008年，日本中央银行的利率仍然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通货紧缩仍在继续。

日本通缩的系统原因可以说是：

资产价格下跌。在1980年代（1989年末），日本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都出现了巨大的价格泡沫。

资不抵债的公司：银行贷款给投资房地产的公司和个人。当房地产价值下降时，许多贷款没有偿还。银行可以尝试收集抵押品（土地），但是由于房地产价值降低，这将无法偿还贷款。银行推迟了收回抵押品的决定，希望资产价格能够提高。这些延误是由国家银行监管机构允许的。一些银行向这些公司提供了更多贷款，用于偿还已经拥有的债务。这种持续的过程被称为维持“未实现的损失”，并且在资产被完全重估和/或变卖（以及损失已实现）之前，它将继续是经济中的通缩力量。

资不抵债的银行：大部分贷款属于“不良”（未付款的贷款）但尚未核销的银行。这些银行在增加现金储备以弥补不良贷款之前不能放贷。因此，贷

款数量减少得更快，可用于经济增长的资金也更少了。

对资不抵债的银行的恐惧：日本人担心银行会倒闭，因此他们宁愿购买黄金或（美国或日本）国债，而不是将钱存入银行帐户。人们还通过投资房地产来储蓄。

《经济学人》认为，完善破产法，土地转让法和税法将有助于日本经济。NHK称，2009年10月，日本政府宣布了增加烟草和绿色税的计划，同时降低了中小型公司的税率。

2011年，日本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决定考虑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2000年代后期的全球经济衰退严重损害了日本的经济。该国在2008年的实际GDP下降了0.7％，随后在2009年出现了5.2％的严重下降。相反，世界实际GDP增长的数据是2008年增长3.1％，随后在2009年下降0.7％。

日本过去几个季度的经济政策受到“安倍经济学”辩论的影响，政府追求激进的政府基础设施支出增加和日元大幅贬值。

在全球COVID-19衰退之前，由于两个主要因素，2019年第四季度的GDP比上一季度下降了7.1％。一个是政府将消费税从8％提高到10％。另一个是台风哈吉比斯（也称为Reiwa 1东日本台风（令和元年东日本台风，Reiwa Gannen Higashi-NihonTaifū））或19号台风（台风19）的毁灭性影响。

2019年太平洋台风季节的第38，第9台风和第3超级台风，这是几十年来袭击日本大陆的最强台风，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台风之一，其峰值直径为825海里（950英里； 1529公里）。这也是有史以来代价最昂贵的太平洋台风，比米雷尔台风的记录高出50亿美元以上（未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度假胜地箱根町，仅24小时就降了近一米（942.3毫米，37.1英寸）的破记录降雨。这增加了COVID-19大流行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的影响；首相推出了一项“大规模”刺激措施，相当于GDP的20％。2020年4月，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日本发生COVID-19大流行，这也迫使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使该国经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齐藤淳（Jun Saito）表示，大流行给日本漫长的新兴经济带来了“最后一击”（日本经济在2018年曾恢复了缓慢增长）。日本政府注入了两套刺激方案，分别于2020年4月和2020年5月出台，共234万亿日元（2.2万亿美元），几乎占日本GDP的40％。

。。。。。。。。。。。。。。。。。。。。。。。。。。。。。。。。
。。。。。。。。。。。。。。。。。。。。。。。。。。。。。。。。
。。。。。。。。。。。。。。。。。。。。。。。。。。。。。。。。
。。。。。。。。。。。。。。。。。。。。。。。。。。。。。。。。
。。。。。。。。。。。。。。。。。。。。。。。。。。。。。。。。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t%E2%80%93World_War_II_economic_expans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扩张

在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地区，这种繁荣表现为郊区发展和城市蔓延，以及汽车拥有量的增加等等。

二战后的经济扩张，也被称为战后的经济繁荣或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出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时期的经济扩张，并结束于1973至1975年的经济衰退。美国，苏联以及西欧和东亚国家尤其经历了异常高且持续的增长，并拥有充分的就业机会。与早期的预测相反，这种

高增长还包括许多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例如日本（日本经济奇迹），西德和奥地利（Wirtschaftswunder），韩国（汉江奇迹），比利时（比利时经济奇迹），法国（Trente Glorieuses），意大利（意大利经济奇迹）和希腊（希腊经济奇迹）。即使是相对未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如瑞典（创纪录的年份），也经历了可观的经济增长。

术语

在学术文献中，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或简称为战后的经济繁荣。

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名字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这个术语是由经济学家 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创造的。这不要与镀金时代相混淆，镀金时代指的是美国大约1870年至190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时代。

时间轴

经济学家罗杰·米德尔顿（Roger Middleton）指出，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1950年是黄金时代的开始日期，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指出1951年是黄金时代的开始日期。Skidelsky和Middleton都以1973年作为公认的结束日期，尽管有时认为黄金时代早于1970年结束。

这个长期的商业周期以19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事件而结束：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货币体系崩溃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作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响应

汽车和电子产品等制成品国际贸易的增长

1973年的石油危机

1973 - 1974年股市大跌

随后的1973–75年衰退

虽然这是全球时期，但特定国家/地区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业务扩展；例如，在台湾，台湾奇迹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后期，而在法国，这一时期被称为Trente Glorieuses（光荣的30年），并且被认为是从1945年到1975年的30年。

全球经济气候

在美国，失业率在1950年代波动，但在1960年代稳步下降。

在1950年代，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每年超过4%，在1960年代每年平均接近5%，而1970年代为3%，1980年代为2%。

斯基德尔斯基在他2009年的书《凯恩斯：大师归来》中用十页谈论了（1950-1973）黄金时代与他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时期（1980-2009）之间的比较：

	黄金时代	华盛顿共识时期
	1950-1973	1980-2009
全球平均增长	4.8%	3.2%
失业（美国）	4.8%	6.1%
失业（法国）	1.2%	9.5%
失业（德国）	3.1%	7.5%
失业（英国）	1.6%	7.4%

斯基德尔斯基认为，黄金时期的全球高增长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在那个时期，日本是唯一一个拥有高增长的主要亚洲经济体（当时的台湾和韩国是小经济体）。直到后来，世界才有了中国的惊人增长，从而提高了全球平均水平。斯基德尔斯基还报告说，在黄金时代，不平等现象总体上在减少，而自从华盛顿共识形成以来，不平等现象一直在加剧。

在全球范围内，黄金时代是金融异常稳定的时期，危机的发生频率和强度远低于之前或之后。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报告说，在1945年至71年（27年）之间，世界仅发生了38次金融危机，而从1973年至97年（24年），则发生了139次。

原因

生产率

从战前到战后直到1970年代初期，生产率一直在高速增长。1930年代后期出现的自动化技术（例如反馈控制器）辅助了制造，这是战后投资快速增长的领域。批发和零售贸易得益于新的公路系统，配送仓库以及诸如叉车和联运集装箱之类的物料搬运设备。石油在许多用途中替代煤炭，尤其是在机车和轮船中。在农业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广泛采用了以下技术：

化肥

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

高产品种

农药类

新产品和服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建或扩展的行业，导致了私营部门的扩张。这意味着婴儿潮一代在广阔的经济中成长。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战后的扩张是由于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而引起的。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辩称，欧洲和美国的高增

长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而战后这一时期在南美部分地区则受到劳尔·普雷比施（RaúlPrebisch）领导的发展主义经济学的影响，繁荣迅速发展。

基础设施支出

艾森豪威尔的不朽成就之一就是拥护并签署了1956年批准州际公路系统的法案。他通过1956年的《联邦援助公路法》为该项目辩护，认为这对冷战期间的美国安全至关重要。人们认为，大城市将成为可能发生战争的目标，因此，高速公路的设计目的是方便撤离并简化军事演习。

财务压制

在此期间，通过政府政策，金融压制-低名义利率和低或负实际利率（名义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和税收）-分别导致偿债成本低（名义利率低）和现有债务清算债务（通过通货膨胀和税收）。这使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既可以处理其现有的政府债务水平，又可以减少债务，而无需将大量政府支出用于偿债。

财富再分配

许多财产在战争中被摧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萧条也使投资损失了价值。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实行了累进税制和资本征费，其普遍提出的目标是更平均地分配战争所需的牺牲。尽管两次战争之间的税率有所下降，但它们并未恢复到战前水平。最高税率急剧上升，在某些情况下提高了十倍。这对收入和财富分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政策通常被称为"收入征集"和"财富征募"。

货物配给也被广泛使用，目的是有效分配稀缺资源。定量配给是广泛使用配给票完成的，配给票是第二种货币，可以使持票人（用常规货币）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例如，两盎司的肉，或一定数量的商品，衣服或燃料）。还使用了价格控制（例如，对餐厅进餐的价格设置了上限）。

在战后时期，累进税一直存在。遗产税也有影响。英国的配额制一直持续到1954年。战后同盟国的战争债券到期，将现金从政府转移到私人家庭。

在日本，盟军占领期间征收累进税率，其税率大致与当时美国的税率相当。在战后的几十年中，日本经历了几十年的高轨道边际税率，韩国经历了类似的轨迹。富人的边际税率很高，直到1990年代迅速下降。国家还通过了重大的土地改革立法，深刻地限制了地主的权力和政治贿赂现象。

低油价

战后数十年来，实际石油价格处于较低水平，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才结

束。

在1940年代，石油价格约为17美元，在朝鲜战争（1951-1953年）期间升至20美元以上。在越南战争（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石油价格缓慢下降至20美元以下。在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迅速上涨，价格翻了一番。

国际合作

原因之一可以提到前轴心国与西方盟国之间政治关系的迅速正常化。战后，各主要大国决心不再重蹈大萧条的覆辙，其中一些失误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策失误。尽管战后眼前的局势更加复杂，但欧洲为重建而制定的马歇尔计划最为人称道。1948年，《马歇尔计划》投入了120亿美元，用于西欧的重建和现代化。在以后的几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形成，后来成为欧盟的基础。

机构安排

制度经济学家指的是战后建立的国际机构。从结构上讲，胜利的盟友建立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旨在促进稳定的国际机构。这是通过一系列政策实现的，包括促进自由贸易，制定马歇尔计划以及使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但是应该指出，这是在现代东方国家扩大劳动力之前，即在保护主义者指出外包问题之前。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

在美国，1946年的《就业法》设定了实现充分就业，充分生产和稳定价格的目标。它还成立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就发展和执行一系列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问题提供客观的经济分析和建议。在最初的7年中，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在政策制定方面取得了五项技术进步：

用“增长模型”代替经济的“周期性模型”

设定经济量化目标，

利用财政拖累和全面就业预算的理论，

认识到在税收方面需要更大的灵活性，以及

通过对于总需求低的问题的认识，改进了对于失业这一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特定国家

美国，日本，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体的表现尤为突出。在这些年中，尽管英国本身正经历其历史上最大的绝对繁荣，但日本和西德赶上并超过了英国的GDP 。在法国，这一时期往往是令人留恋的黄金三十年（称为“光荣三十年”）；而西德和奥地利的经济被称为Wirtschaftswunder（“经济奇迹”的意思）；在意大利它被称为Miracolo ECONOMICO（也是“经

济奇迹”的意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此期间也做得不错。

比利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经历了短暂但非常迅速的经济复苏。比利时重工业在德国占领期间遭受的损失相对较小，欧洲范围内对该国的传统出口（钢铁，煤炭，纺织品和铁路基础设施）的需求也意味着比利时成为第一个恢复战前水平的欧洲国家。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低通胀和实际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

但是，缺乏资本投资意味着比利时的重工业在1950年代没有能力与其他欧洲工业竞争。这有助于在瓦隆地区开始去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出现。

法国

在1947年至1973年之间，法国经历了由JeanFourastié命名为“Trente Glorieuses”的繁荣时期（平均每年5％的增长）。Trente Glorieuses（光荣三十年）是他于1979年出版的一本书的标题。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业生产、工作时间数的增加。的确，劳动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而“婴儿潮”被教育时间的延长所抵消。生产率的提高，是得益于对美国技术的追赶。1950年，法国的平均收入是美国人的55％。它在1973年达

到80％。在“主要”国家中，只有日本在这个时代的增长快于法国。

漫长的转型和现代化时期还涉及法国经济的日益国际化。到1980年代，法国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大国和世界第四大制成品出口国。它成为欧洲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出口国，到1980年代，此类产品占世界此类产品贸易的10％以上。服务业迅速增长，并成为最大的部门，产生了大量的外贸顺差，主要来自旅游业收入。

意大利

意大利经济增长变化很大。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意大利经济蓬勃发展，增长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包括1959年的6.4％，1960年的5.8％，1961年的6.8％和1962年的6.1％。这种迅速而持久的经济增长是得益于——意大利商人的志向；新行业的开放（借助于在波河谷发现了用于钢铁制造的碳氢化合物）；对大多数意大利城市（如米兰，罗马和都灵）的重建与现代化建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供给该国的援助（特别是通过马歇尔计划）。

日本

1959年由三洋制造的晶体管收音机。在此期间，日本制造了世界上许多消费电子产品。

1950年后，日本的经济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并开始蓬勃发展，其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受到朝鲜战争的推动，日本经济是联合国军的主要供应国，在制造业的带动下，日本经济开始了长期的极速增长。日本已成为许多经济领域的重要力量，包括钢铁加工，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日本在对外贸易，国民生产总值和总体生活质量方面迅速赶上西方。由于1973年石油价格翻了四倍，1960年代中期到后期的高经济增长和政治安宁进程被放慢了。日本几乎完全依赖石油进口；日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衰退。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日本的贸易顺差不断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向日本施压以纠正这种不平衡，使日元升值，日本开放市场，促进从美国的进口。

苏联

1950年代初期，苏联重建了战争遗留的废墟，经历了十年的繁荣，不受干扰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技术成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颗地球卫星。在1950年代中期，该国进入了人均GDP最高的前15个国家。但是，到1960年代中期，随着政府开始将资源投入大型军事和太空项目，民用部门逐渐萎靡，增长放缓。尽管每个其他主要国家都大大扩展了服务业，但在苏联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赫鲁晓夫被罢免之后，由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阿列克谢·科西金（Alexei Kosygin）领导的苏共领导集体振兴了经济。在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经济在1960年代后期持续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步履蹒跚，开始了停滞时代。

瑞典

瑞典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没有受到伤害，并在1970年代初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当时社会民主党总理塔格·埃兰德（Tage Erlander）从1946年至1969年任职。直到1930年代，瑞典曾经是一个向外移民的国家；但二战以后瑞典的蓬勃经济，产生了对劳工的巨大需求，刺激外部移民进入瑞典，特别是从芬兰以及希腊，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移民来到瑞典。瑞典城市化进程很快，直到1960年代发起“百万计划”之前，城市地区的住房短缺迫在眉睫。

英国

英国首相 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1957年的演讲中捕捉到了黄金时代的感觉，甚至在1960年代最灿烂的年代之前：——

“让我们坦率地说：我们大多数人从未拥有过如此出色的产品。到处走走，去工业城镇，去农场，您会看到一种繁荣的状态，这是我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甚至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也从未如此。”

失业数字显示，黄金时代的失业率明显低于或之前或之后：

时代　日期范围　　英国劳动力失业率。

前黄金时代　1921-1938年 13.4

黄金年龄　　1950–1969年 1.6

后黄金时代　1970–1993年 6.7

除了优越的经济表现外，黄金时代的其他社会指标也更高。例如，英国说自己“很高兴”的人口比例从1957年的52％下降到2005年的36％。

美国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代初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扩张时期之一。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45年的2280亿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将近1.7万亿美元。到1975年，——美国经济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35％左右；而美国经济是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的3倍多。在美国经济的扩张期间，曾经发生过5次短暂的衰退：1948-49，1953-54，1957-58，1960年至1961年，和1969-70。

2,000亿美元的战争债券已经到期；《1944年军人复员法案》为培育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提供了资金。中产阶级，GDP和生产率都有所增长。美国经历了自己的经济增长黄金时代。这种增长在各个经济类别之间平均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这一时期的工会力量—工会会员人数在1950年代达到顶峰。增长的大部分来自低收入农场工人向城镇中薪水更高的工作的转移，这一过程在1960年基本完成。

西德

在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经济大臣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领导下，西德从1950年代初开始就实现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记者称它为Wirtschaftswunder或“经济奇迹”。工业生产从1950年到1957年翻了一番，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9％或10％的速度增长，为整个西欧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工会对新政策的支持，推迟的工资增加，罢工最少化，对于技术现代化的支持，以及共同决定政策（Mitbestimmung）（其中涉及令人满意的申诉解决系统，并要求工人代表参加大公司董事会），————所有这些都为如此长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美国提供的14亿美元《马歇尔计划》援助，打破旧的贸易壁垒和传统习俗以及开放全球市场，加快了经济复苏的步伐。西德赢得了合法性和尊重，因为它摆脱了德国在纳粹统治下获得的可怕声誉。西德在建立欧洲合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它于1955年加入北约，并于1958年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始成员。

衰退

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由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加速了向后工业经济的过

渡，此后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在1970年代的钢铁危机期间，钢铁需求下降，西方世界面临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对于采矿和钢铁区（例如北美锈带和西德鲁尔区）而言，这尤其严峻。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收复东北

http://history.sina.com.cn/bk/ezs/2015-11-18/path-ifxksqiv8456708.shtml

二战苏联究竟从东北运走了多少财富

作者：吴明

到抗战末期，经过日军多年的苦心经营，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日本投降后，其在东北的工业，自然成为同盟国注意的目标。

中国人民浴血抗战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

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予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求：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归苏联，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

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全面占有和重点摧毁。三个环节都服从于苏联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首先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头--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抓起来，拘留于长春寓所，严加看管，然后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攫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联署了以下文件：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

这样，高崎等一伙非法签署了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红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做了同样的移交。

在逼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实行接管。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为谁也不能说关东军不抽烟卷儿，不洗衣服，不点电灯，不住房子，不用瓦，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具了证明，证明移交的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以让高崎倒填的日期断定，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1945年9月下旬。所有被苏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守，严禁外人进入。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做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然后分海（大连）陆（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在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其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

例如，东北最大之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经40余日才拆运完毕。又如，奉天飞机制造厂，月产高等教练机70架（装配），发动机100台。后来为躲避美机轰炸，实行分散经营，设公主岭和哈尔滨二厂。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哈尔滨月产高等战斗机10架，发动机100台。以上三厂全部机件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机部件也被拆运一空。拆运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破坏了东北的工业基础，但满足了苏联的需求。东北水电和火电发电机，苏联也有需求，但苏联准备与中国合作，就拆了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实际上已无可再拆了）。

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

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做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

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利益！

https://xw.qq.com/partner/vivoscreen/20200917A05FL000

苏联出兵东北9个月后匆匆撤兵，一个人的死亡是原因之一

宋家小敏 2020-09-17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着157万苏联军队对盘踞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日军发动了进攻。经过苏德战争洗礼之后的苏联军队在战斗力方面已经大幅度提升，这不是日军所能比拟的。仅仅4天功夫，日本关东军已经被苏联军队分割包围。紧接着，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50多万日本关东军也放下了武器。

按照原来的想法，苏联要在东北待上很长时间，但是为啥呆了9个月就撤兵了呢？其实，和一位中国人的莫名死亡有关。

表面上看，苏联是帮助中国人打日本，实际上并非如此。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已经注定日本必须要失败。看到这个，此前一直按兵不动的苏军慌了，为了分一杯羹，8日苏联对日本

宣战并进入中国东北，开始南下摘桃。苏联进入的东北，在名义上是“伪满洲国”，为日本盟友。这给苏军接下来的暴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那么，苏联出兵东北期间，从中国东北带走了什么呢？根据资料介绍，苏军占领沈阳后，抢劫了这里的900多家工厂，甚至连供水，采暖等系统也遭到破坏。沈阳在苏军掠过后，一片狼藉，几乎变成一座空城，苏军带走了很多，唯一留下的是，一座苏军烈士纪念碑。

鞍山，盘锦等地的钢铁厂，发电厂，化工厂，凡是能够运走的，苏军全部搬走了。主要有化工冶炼设备，机床，各种车辆等等，甚至，苏军连铁路铁轨都不放过，有的地方铁轨也被他们拆回去了。

据统计，1945年，苏军在东北一共掠夺了大约相当于当时13亿多美元的物资，还不包括苏军掠夺的大量的黄金，白银，钻石等。而在1946年，蒋介石政府曾经发公告，8年抗战中国总的经济损失为130多亿美元。如此一对比，苏军一年在东北掠夺的财富，竟然就占到我们总损失的百分之十！

此外，苏军在东北还干了两件事。

其一，肆无忌惮的抢劫平民，甚至强迫平民去西伯利亚做苦力。在东北目睹了苏军暴行的美国人哈尔.莱斯说，苏军不光抢劫日本人，对中国人也同样抢劫和杀戮。苏军踹开中国百姓的家门，搬走家里的一切物品。

据《帝国的废墟里》一书记载，“苏军抢走当地人的一切贵重物品，稍有反抗的直接被开枪射杀”。 此外，苏军随意的在大街上上强抢平民，押往苏联做苦工。很多人去了，就再也没能回来了…

其二，强奸妇女。据一名日军军官的回忆录记载，“我亲眼看见几十名苏军，在屋外排队，等待进入强奸里面的中国和日本女人”。哈尔. 莱斯记载，中国女人就在公共车站，或者火车站被强奸，甚至有苏军当街强奸当地女性。女性被迫束胸，剃发，抹脸。一位叫做阿纳托利耶夫娜的苏联人，在目睹苏军暴行后，在《祖国与信仰杂志》对苏军的强奸和抢劫进行了控诉。

其实，中共东北局曾经就苏军在东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向苏联当局提出过严正抗议。指出“对于中国平民的抢劫和强奸，绝不应该是无产阶级军队的作为”。

有人把苏联和日本做了对比，认为日本占据东北后，是想把这里建成家，所以虽然伤害百姓，但是有尺度的。而苏联则不然，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发财。至于苏军在东北的军纪，很多领导人都说，苏联的军纪太差了。

苏联的军队在东北呆了9个月就回国了，因为一个人的莫名死亡。

他叫做张莘夫，原名张春恩，中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毕业回国后，张莘夫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

抗战期间，张莘夫担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主持这几种战略性稀有金属的生产。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

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和助理人员牛俊章、徐毓吉等5人，在中长铁路苏籍副助理理事长马里意的陪同下，从长春出发，经沈阳转赴抚顺，准备接管抚顺煤矿。

国民政府接收抚顺煤矿是根据《中苏同盟条约》的规定，苏方无法明着反对，但他们在暗中极力阻拦。张莘夫等到达抚顺，下车后即被苏军安排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居住，由苏军4人把岗监视。次日，随行路警枪支全被缴去，所有接收人员失去人身自由。张莘夫设法打电话通知沈阳，刚说到“苏军仅能保证24小时，望设法”，电话就被切断。

1月16日晚8时，苏军军官会同当地警察来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对张莘夫说，抚顺煤矿不能接收，劝其速返沈阳。当晚，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专车离开抚顺回沈阳。当专车行至距抚顺25公里的李石寨时，一队“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上车将张等拖下专车杀害。

1946年2月，以“张莘夫事件”为导火线，全国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游行。

2月16日，流亡重庆的东北旅渝同乡会在青年馆举行集会，讨论张莘夫被杀事件和收复东北问题。东北籍的国民政府官员莫德惠、李锡恩、钱登来、宁恩承参加了集会。会后，2000人游行至国民政府，请求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措施，收复东北。

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省、市当局，指出学生酝酿活动，全系激于爱国热诚之中立分子所发起，“党团事先并无主动”，在“制止恐不可能”的情况下，要求各地“善为引导”。

22日，重庆26所大、中、小学的2万多名学生和职工，组成“重庆市各校学生爱国运动游行大队”，于早上6点从沙坪坝小龙坎整队出发，7点入城游行，队伍中既有中央大学附小的学生，也有大学教授。游行队伍高呼“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东北是我们的生命线”、“彻查张莘夫惨案”等口号，穿过牛角沱、上清寺、中三路、中二路、林森路等街道，沿途散发了《慰问东北同胞书》、《告全国同胞书》、《对苏抗议书》等宣言，游行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

重庆爆发的反苏示威游行迅速波及全国，北平、上海、南京、杭州、贵阳等地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由“张莘夫事件”引发的反苏示威运动在短期内波及全国，对中苏外交产生了很大影响，英、美等国也强烈谴责苏联拆运东北工矿企业设备的行径。

2月24日，沈阳苏军司令高夫堂发表声明，称拆迁东北工矿机器设备，系根据苏、美、英三国的共同协定。两日后，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否认这一说法，并严正声明“美国未与苏联或其他政府商定关于中国东北境内战利品之协定或其他协定，本政府不接受战利品包括工业企业或如中国东北境内日本工业及配备之任何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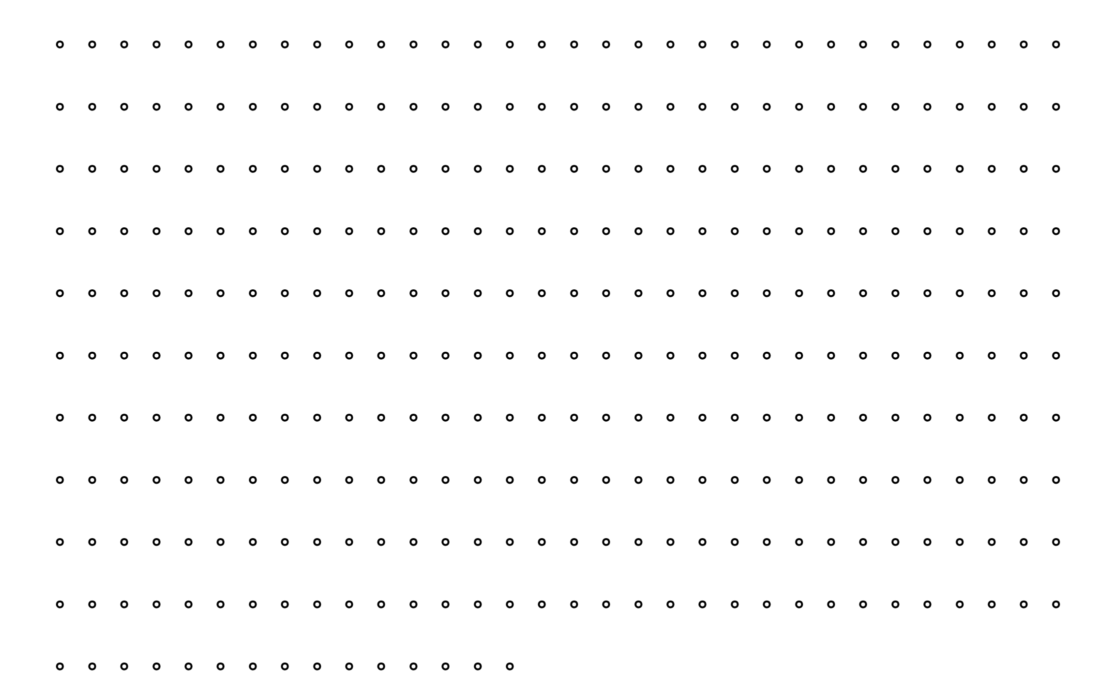
3月9日，英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表示“断难承认”苏联政府将“中国东北工业设备擅自运走”。

在中国爆发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的情形下，斯大林下令苏军加紧破坏和劫掠东北的工矿设备，并准备自东北撤退。

3月10日夜间，苏军秘密撤出沈阳。5月3日，苏军全部撤出东北。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6%E8%92%99%E5%8F%A4%E7%8B%AC%E7%AB%8B

外蒙古独立(蒙古语:Үндэсний эрх чөлөөний хувьсгал)是指外蒙古地区于20世纪上半叶脱离中国独立成为主权国家的历史事件。外蒙古包括今日蒙古国以及唐努乌梁海地区，蒙古国是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而唐努乌梁海地区则被俄罗斯控制。自辛亥革命清朝崩溃后，外蒙古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1921年在苏联红军的介入下，中华民国政府尚能掌握内蒙古，而外蒙古地区成为不受管辖处于实质独立状态。外蒙古前后多次宣布独立，虽曾获得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不过于冷战期间曾有争议。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时唐努乌梁海一部分被并入俄罗斯苏维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即现俄罗斯联邦），另一部分则并入当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库苏古尔省，今日俄蒙界线便因此而定。

历史背景

13世纪初，乞颜部首领成吉思汗统一此地区所有部族，建立大蒙古国。其后忽必烈在中国建立元朝，元朝灭亡后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外，北元与明朝对峙。1636年满族统治者征服漠南蒙古，后建立清朝，1691年喀尔喀蒙古臣服清朝。清代后期官方文书中，出现内蒙古和外蒙古的概念。内蒙古一词指内札萨克49旗，外蒙古则指喀尔喀4部（有时也包括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

从16世纪起，沙俄经营西伯利亚，开始与蒙古地区往来。1727年中俄签定《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合称《布连斯奇条约》），确定蒙古属于清朝管辖。沙俄则取得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特权。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说"中国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签订多数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关于俄国在蒙古利益条款。在此期间，俄国根据黄俄罗斯计划和蒙古各部交流经济、文化和军事。

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

1905年日俄战争，1907年两国和好签订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之"优越地位"，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一切权利"。

1910年，日韩并合，日俄签订第二次密约，俄国尊重日本对朝鲜的行动，日本也同样尊重俄国在外蒙古与伊犁的一切行动。

1912年，日本与俄国签订第三次密约，设立中国东西内蒙古分界线，俄国承认东内蒙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承认西内蒙为俄国势力范围，以东经116度27分为日俄界线，日本从俄国取得进军热河的默许。

清朝在蒙古开展“新政”，经费全部摊派到当地，牧民“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指库伦）各旗，为之一空”， 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盟长以及哲布尊丹巴管理的沙毕纳尔的商卓特巴，于1910年（宣统二年）联名向库伦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呈报，称“蒙古人民已经忧心忡忡地接到了几道要他们执行新政的命令，我们可怜的、为各种赋税弄得一贫如洗的盟和沙毕的台吉和牧民们，已经到了他们再也无法支持的地步了。历次颁布的命令，没有一个对蒙古人是有利的……我们希望继续古老的生活方式”。俄国也通过驻华公使向清朝表达了抗议，清廷指示库伦办事大臣变通执行。

第一次宣布独立

那木囊苏伦前往圣彼得堡寻求俄国支持

宣统三年（1911年）7月，外蒙古独立首倡者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率团出访俄国，得到俄国军事支援。辛亥革命后，清朝统治逐渐瓦解，杭达多尔济等人认为时机成熟。11月初，以土谢图汗部盟长、左翼后旗札萨克镇国公察克都尔扎布为首的“临时总理喀尔喀事务衙门”在库伦成立。11月30日，俄、蒙军队包围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12月29日，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等王公喇嘛在库伦宣布独立，拥立外蒙古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登基，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建立“大蒙古国”。清政府得知后电令库伦帮办大臣朋楚克车林劝谕库伦取消独立，12月

21日任命在京的车臣汗部盟长多尔济帕拉穆和新任科布多办事大臣桂芳为“查办库伦事件大臣”，由于俄蒙方面阻挠未能成行。

1912年1月，俄罗斯帝国驻乌里雅苏台领事协助札萨克图汗索特那木拉布坦发动叛乱，札萨克图汗饬令驱逐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恩等人，限“于七日内将仓库、银、缎、军装等项，一律交蒙参赞接收，自备资斧回籍”。奎芳拒不答应，在俄罗斯帝国领事协助下派一队哥萨克骑兵强行将奎芳押解出境。5月，黑喇嘛丹毕坚赞、马克思尔扎布、达木丁苏隆和海山等人率外蒙古军队进攻科布多，新疆都督杨增新救援失败，城池陷落。

1912年初，沙俄驻呼伦贝尔领事乌萨蒂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调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以“大清帝国义军”的名义发动叛乱。1月15日，进入呼伦（今海拉尔市）城内，成立“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授胜福以“参赞大臣”头衔，作为其驻呼伦的“总督”。

“大蒙古国”将独立宣言及时告知内蒙古各盟、旗，内蒙古部分地区也举行武装暴动，在乌泰等内蒙古王公策动下，库伦政府决定出兵南下，用武力占领内蒙古。北京政府为了控制内蒙古也动用武力。1913年初，蒙古军分五路向内蒙古进攻，取得普遍胜利。1913年10月止，蒙古军队基本上控制了内蒙古西部各盟、旗，但同时开始面临后方补给停止的局面。同月下旬，北洋军开始反击，蒙古军无法再展开军事行动，年底开始从内蒙古撤军。蒙古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武器短缺和俄国政府极力反对这场战争。这场持续一年的战争给内蒙古地区造成重大灾难，民间称其为″牛年之乱″

（**Үхэр жилийн үймээн)**。

1912年11月3日，俄国前任驻华公使廓索维茨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政府”签订《俄蒙协约》及《俄蒙协约专条》，俄国以支持蒙古自治换取在外蒙享有排他性商业地位，对中国在外蒙主权只字未提，引起中国不满。经过谈判，1913年9月18日，中国外长孙宝琦同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达成《中俄声明文件》，中国不在外蒙驻兵、殖民、设官，承认外蒙自治，承认《俄蒙协约》及其专条，换回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基于宗主权而衍生出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蒙权力已由主权改为宗主权。

短暂自治及被占领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与共戴年号”。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册封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取消独立，实行自治。此时外蒙古上层的僧俗两派斗争趋于白热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人毒死了“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与赛音诺颜部亲王那木囊苏伦，压制了世俗王公的势力。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俄国势力大幅撤离外蒙，苏维埃俄国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918年9月在外蒙古自治政府要求下，北洋政府派遣少量军队进驻库伦

协防。

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俄国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919年2月、3月间召开大乌里会议名为“蒙古国体运动”又称“泛蒙古主义”或“泛蒙运动”，主张内外蒙古结合并与呼伦贝尔（政务厅厅长凌陞）、布里亚特等势力组联合政府布里亚特-蒙古国。5月、6月泛蒙运动到达高峰，在海拉尔建立政府，逼迫外蒙古表明立场。

1919年10月1日，外蒙古自治政府外交部长车林与库伦都护使陈毅会谈达成共识，特派库伦都护使衙门秘书黄成垿带着六十三条外蒙撤治善后条例到北京，表达外蒙希望恢复前清旧制（有条件撤治，回到前清绝对宗主权），取消国际条约里中国在国防、外交上的约束限制，但外蒙仍保有相当的自治权。徐树铮所属皖系曾向日本大量借款以备中国内战使用引发舆论批评，得知外蒙撤治消息急于争功随即向外蒙增兵。10月29日徐树铮到达库伦，软禁陈毅十日胁迫他修改六十三条，最后徐树铮自己新增八条，挟持“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签字，外蒙变成“无条件撤治”。陈毅遭军队押送回北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但徐树铮在外蒙古期间，不顾其传统习俗，全面推行新政改革，致使外蒙古上层集团对北洋政府的统治更加不满。呼伦贝尔原本希望参与外蒙独立运动，遭俄国反对。北洋政府随后与俄国签订呼伦贝尔条

件八款，俄国取得区域经济利益，并限制中国在此主权。

第二次宣布独立

由于外蒙古无法忍受徐树铮的行为，开始派员联络苏俄红军（苏赫-巴托尔为代表到伊尔库次克与共产国际接洽）、帝俄白军（恩琴）及日本（哈尔滨日本领馆），寻求援助把中国人赶出外蒙，哲布尊丹巴甚至写信给日本天皇，希望日方协助其恢复独立。

1919年帝俄白军将领谢米诺夫及恩琴聚集西伯利亚东部，协同布里雅特蒙古、呼伦贝尔、外蒙古等人士，驱逐滞留在外蒙古的中国官员，以民族自决、独立建国为口号，并在日军的支持下再次宣布独立。

1920年，日本派山田大佐为参谋长，成立对蒙顾问团游说外蒙喇嘛王公支持恩琴男爵。11月，恩琴（约800人的残兵，自称亚洲骑兵师）第一次进军库伦战败。

1921年1月，恩琴透过蒙古人的内应带八世哲布尊丹巴离开库伦，并取得许多王公喇嘛的支持。8月唐努乌梁海设立图瓦人民共和国。

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战败，旋遭通缉，逃入日本使馆。库伦仅留守部分兵力。原皖系第三旅第七、第八团因直皖战争失利军心不稳。1921年2月11日，恩琴的亚洲骑兵师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

攻入库伦。由于中国国内处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夕，各派军阀无暇分身，只得坐视外蒙古地区的军事冲突。中国驻军撤离库伦，部分在高在田的率领下返回内地，部分跟随陈毅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3月18日，蒙古人民党军队另外在苏俄红军的支持下攻占买卖城，击败了当地守军，中国在外蒙古的势力自此完全消失。

2月13日，八世哲布尊丹巴被推举成为“大蒙古皇帝”。1921年3月1日，第三国际派沙洛克维克夫（**И. Сороковиков)**和波雷索夫支援外蒙革命，并撮合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在恰克图成立蒙古人民党。3月21日，哲布尊丹巴重新登基。外蒙古恢复了事实上的独立。

第三次宣布独立

1921年5月25日由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做向导，苏俄联合赤塔远东共和国的红军共二师兵力从伊尔库次克出兵干预；另一方面因华盛顿会议的关系，日军自延吉、珲春撤军，恩琴失去日方支持。7月6日苏联红军开入库伦，恩琴被俘。1921年7月11日，外蒙古建立亲苏的君主立宪政府。北洋政府下令命张作霖收复外蒙。张仅作了敷衍，并没有出兵至外蒙。11月25日外蒙古建立“人民政府”，并与苏联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23年1月26日，企图武力夺取政权的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秘密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同意苏军留驻外蒙。

1924年4月17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并要求苏方撤军。但该条约并没有被很好执行，当时报纸称苏军在外蒙重要据点均有驻军。

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第三国际支持与行动下，蒙古人民党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苏联驻军，自此确立了外蒙古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卫星国。但中国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国家政府皆未承认。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于1922年5月1日向苏联政府表达严重抗议："苏联政府对中国历次通牒曾宣言，所有往日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定条约均为无效，并放弃对中国领土之侵略，今苏联政府乃背反前言，擅与蒙古私订条约，此等行为直与帝俄政府时代对华如出一辙，须知蒙古系属中华民国领土，本国政府实难容忍，为此特向执事严重抗议，所有苏联政府与蒙古私订无论何种条约，中国政府决不承认。"

国民政府与外蒙古

抗战期间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中，从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原大战、第一次国共内战，到1931年九一八事件和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无力处理外蒙古问题。其间1928年国民革命军在外蒙古东部边界与苏

军发生了小规模战斗，之后再没有进入外蒙古。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苏联军队彻底从蒙古国撤走，蒙古才实际获得独立。与此同时，在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了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制度。

1939年，苏、蒙联军与日本、满洲国的军队因蒙满边境问题爆发诺门罕战役，之后因欧洲战事而停战。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苏，苏联外交部次长在3月27日对中国驻苏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4月11日"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接待。"但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13日，苏联就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此期间，内蒙古的德王试图使内蒙古也独立，还建立了实际上受日本人控制的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但随着日本的投降和苏、蒙联军的参战，该傀儡政府也垮台，内蒙古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控制，1947年中共根据民族区域自治理论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

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邵力子曾说："我在1943年春间，曾提出有关中苏邦交的建议……关于中苏之间的许多应解决的问题，我所建议的几乎多与中苏友好协定所包含的相类似。因为那时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合理的解决，尤其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和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定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治自决的精神，完全符合。"

8月8日，德国投降正好三个月，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之后，苏联在和中国谈判成功之前，对日本宣战。一百五十万苏军在蒙古集结后进攻中国东北、朝鲜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其间外蒙古提供后勤并派军队参加了苏军对日军在内蒙古的作战。中苏在就外蒙古问题举行谈判时，斯大林坚称外蒙今日已是“人民共和国”，其现状即独立。谈判开始时，中方坚拒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则称，外蒙问题如无法获致解决，则条约不能订立。谈判中，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斯大林回答：“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为继续取得同盟国对中国战区的支持，以及避免苏联使得新疆伊宁事变扩大、援助中国共产党和在东北驻军不撤走，1945年8月14日，经过与苏联两个多月的谈判，中华民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授权下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三个月内（从东北）撤完、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宋子文拒绝签字，并辞掉外交部长一职，最后该条约由王世杰签字。同日，中苏两国外交部互致照会：

中苏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

甲：纪录

斯大林统帅与宋院长子文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第五次会谈时曾讨论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领土撤退之问题。斯大林统帅不愿在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之协定内，加入在日本战败后三个月内将苏联军队撤退一节，但斯大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

宋院长询及撤退完毕需要若干时间。斯大林统帅谓彼意撤军可于不超过两个月之期间内完竣。

宋院长继询是否确在三个月以内撤完。斯大林统帅谓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 王世杰（签字）莫洛托夫（签字）

乙、中华民国政府文

部长阁下：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此照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

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

部长阅下：核准阁下照会，内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本部长顺向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此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王世杰回国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孙科主持下，以95人赞成，4人反对（以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同日，蒋中正在中央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讲称：“ 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我们早已明了我们如不能以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壹贯的传统政策用断然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势将引起永久的纷争，对于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都将因此要发生重大的影响，今当日本帝国主义已告失败，东亚和平秩序，初见端倪之际，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壹重大问题的时机，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

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前去参观。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投票结果显示，98.5%的投票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1945年11月15日，苏联违反条约，拒不从东北撤军，扶持东北根据地和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1945年底，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

（中央社重庆五日电）国府于一月五日发表承认外蒙独立之公告如下：外蒙古人民于民国卅四年十月廿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法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国民政府公告》（1946年1月6日）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雷法章事后声称此次“公民投票”：“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古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中华民国政府同苏联交恶后，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曾于1947年8月27日于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表示质疑此投票之公正性，发言称：“吾人认为此事是吾人所不能接受之过分简单的历史，当适当时机来临后，我国政府有从事进一步观察之权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2日，苏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12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播迁台湾，中华民国外交部在1949年11月7日《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中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但是苏联却违反条约。苏联屡次违约，但国民政府却“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废除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旗（1945年－1992年）

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徽（1960年－1991年）

1952年，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不援助中共”等条件，联合国大会2月1日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谴责苏联，是为“控苏案”。1952年10月13日，蒋中正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蒋还称，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蒋中正还表示自己“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1953年2月2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对国会正式否认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存在，中华民国政府2月23日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推翻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承认。2月25日，外交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蒙古加入联合国

1946年7月13日，中国驻美公使谭绍华博士向美国国务院电话通报：中国政府不支持（does not feel that it is in a position to work for or

to support）外蒙进入联合国。8月6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徐淑希表示外蒙古加入联合国时机未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选举之故，国民政府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国民政府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1946年外蒙古等五国申请加入联合国，被安理会否决，联合国大会因此在1946年11月19日通过35号决议，建议安理会重新审查五国的申请。

1947年7月28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徐淑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指责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入侵中国新疆，反对外蒙古加入联合国。同年8月18日，安理会第186次会议，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以北塔山事件为由投票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这在联合国大会引起安理会是否越权的讨论。

1948年10月，朝鲜在中国和苏联之外第一个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49年5月，阿尔巴尼亚也与其建交。

1955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代表在安理会对联合国大会3502号草案中，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部分行使否决权，理由是全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

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0票反对，1票（美国）弃权的

表决结果，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166号决议，建议联合国大会接受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未参加投票表决。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案，接纳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未参加表决。

中华民国与外蒙古关系

法律关系

中华民国行宪前声索外蒙古的法规以及草案有：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三条：“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民国20年（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一条：“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

同年制定公布蒙古盟部旗组织法时，第四条第二项提到车臣、土谢图、三音诺颜扎萨克图、塞音济雅哈图、唐努乌梁海、青塞特奇勒图、乌拉恩素珠克图、巴图塞特奇勒图各部，而第八条以及第九条提到蒙古地方。

民国25年（1936年），五五宪草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为……、新疆、蒙古、西藏等固有之疆域。”

民国35年（1946年），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时，尚未举行国大代表选举乃至于制宪，故宪法中之固有疆域已不包括蒙古国。

民国36年（1947年），内政部发布《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凡例八：“蒙古地方虽经我政府于民国35年1月5日承认其独立，但详确疆界，尚待勘定。”

关于国民政府放弃了对外蒙古的主权，顾维钧这样写道：

“ 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苏联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即使从英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这是贝尔纳斯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伦敦五国外长会议时在伦敦对我说的。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蒙古。我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觉得这个评论进一步证实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对我说的话是有理由的。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民国36年（1947年）12月25日施行中华民国宪法以及公布训政结束程序法时，宪法第四条：“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中的“蒙古代表”是指境内蒙古族的代表，主要来自塞北四省、新疆、青海的蒙古盟旗：

蒙古西藏之代表四十名，在蒙古方面（一）由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青海左翼盟，青海右翼盟，察哈尔部及阿拉善特别旗，额济纳特别旗，土默特特别旗选出者九名。（二）由巴图塞特奇勒图中路盟，乌拉恩素珠球克图四路盟，及青塞特奇勒图盟选出者三名。（三）由哲里木盟，卓索图昭盟，昭乌达盟，呼伦贝尔部，及伊克明安特别旗选出者五名，（四）由其他蒙古盟旗选出者七名

当时，云南省代表段克昌等曾提案将固有疆域改为列举方式：

本条拟修改为“中华民国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察哈尔、绥远、宁夏、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热河、台湾、蒙古、西藏、及其他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议决，不能变更之。”

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都是由生活在上述几省中的蒙胞或其代表依宪法选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第一届立法委员和第一届监察委员中，杜固尔、海玉祥和迪鲁瓦活佛是外蒙古人。

民国42年（1953年），立法院决议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撤销对蒙古独立的外交承认。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蒙古的态度

1922年，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曾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联武装力量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当时李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1920年代末期，当时由李立三、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曾指出说：“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尔

塞维克》第十期）。

1931年11月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主张“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1940年1月，《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秘文在香港披露，日本意图以满洲国、吴越平原为根据地，来交换承认外蒙、新疆、西藏为苏俄势力范围。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国共产党则对《苏日中立条约》表态：“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并为此发表社论。

1949年1月，毛泽东曾非正式地试图通过阿那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外蒙古回归中国，成为革命后新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遭到拒绝。毛泽东随后表示“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表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

条约。中苏后来发表公告称："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约定均已失去效力，但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已因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后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继承中华民国的国际法地位，在中华民国已经于1946年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上发展对蒙外交，1949年10月16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复函蒙古总理兼外长乔巴山，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载郭沫若在8月12日为《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的文作，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支持及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党史学家胡华的文章，名为《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该文提到："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

1949年到1950年，毛泽东和苏联签署新的友好协议。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宣称废除国民党的"不平等条约"。1950年毛泽东出访苏联，为争取苏联的外交支持，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61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邮

票庆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

1952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章中明确提出，“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原始版本1939年12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的第一章中并没有这句话）。

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之际，毛泽东透过周恩来向赫鲁晓夫询问如何看待外蒙古并入中国。赫鲁晓夫表示蒙古同志“不会欢迎你们的建议”。

1960年5月31日，在乌兰巴托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同年10月12日生效。1962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睦佳・泽登巴尔在北京签订《中蒙边界条约》，1963年3月25日在乌兰巴托互换批准书后生效，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划定边界。1960年代中苏决裂后，蒙古试图保持中立，后来被迫倒向苏联，把大约7000名中国的援建人员驱逐回国。

蒙古国国旗（1992年起）

苏联撤军后，中蒙关系缓和。1990年，蒙古代表团28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1994年两国签订《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表示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相关历史事件年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1日喀尔喀成立临时政府，12月29日博克多汗登基，宣布成立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

1912年2月12日，清朝统治者发布退位诏书，宣布中华民国为其继承政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1912年11月3日《蒙俄协约》签订，双方建立了商贸关系，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要求继承前朝（清朝）领土。

1913年中俄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俄国承认蒙古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

1915年，中俄蒙三方签订《恰克图条约》。蒙古放弃涉及政治和领土问题的国际法权，以中国历法和蒙古历法为同等地位，蒙古保留处理对外贸易和内政自治的全权，俄国和中国不干涉任何蒙古的内政和政体问题，确定了蒙古的边界划分。外蒙古建立海关、司法机构、电报，邮政按照以往的体系。

1917年俄国内战爆发。

1919年部分不满博克多汗统治的蒙古贵族联结北洋政府发动叛乱，在邀请下北洋政府派遣徐树铮领导新组建的"西北边防军"占领外蒙古，10月蒙古被徐树铮完全控制。

1919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徐世昌正式宣布单方面撕毁《恰克图条约》，宣布撤销外蒙古自治，改为直接统治。

1921年2月俄国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率部进入蒙古，击退北洋政府的军队，占领库伦等地。

1921年3月苏联红军击溃恩琴男爵的部队，同年秋肃清其残余势力。1921年11月25日在蒙古人民党建立了“人民政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博克多汗依旧为大蒙古国君主，权利被宪法限制。

1924年11月26日博克多汗去世，大蒙古国结束，蒙古宣布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

1924年，中国唐努乌梁海发生反俄运动，苏俄派兵镇压，并将一部分“归还外蒙古”（库苏古尔省）。

1928年蒙古人民党创始人之一的霍尔洛·乔巴山在蒙古当权执政，宣扬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建立共产政权，宣布实行畜牧业集体化，消灭佛教寺院和“人民公敌”，在1936-37年间，遭到政治迫害被镇压的人数在36000人。宗教被禁止，上百座寺院被拆毁。

1935年1月24日，日本主张呼伦贝尔之贝尔湖以南的哈尔哈庙，是满洲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蒙古不该派兵屯驻，苏日爆发第一次边界冲突。苏联、日本、满洲国、外蒙古四方代表在哈尔滨争执不休，冲突延续到隔年12月苏联才让步。1939年再爆发诺门罕战役。表面上是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了领土而交战，但实际上则是日本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的较量。

1939年蒙古军队和苏联红军一起在诺门罕战役中击败日军的侵略。在二战德苏战争中，蒙古给与了苏联极大的经济支持。

1945年8月蒙古军队和苏联红军一起参与了八月风暴行动，击溃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

1945年10月20日蒙古进行外蒙古独立公民投票，计票显示100%的有效投票

认为外蒙古是主权独立国家。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之后外蒙古亦获其他主权国家承认。

1947年6月2日，蒙古人民军发动“北塔山事件”，由苏联军机掩护侵入新疆北塔山；11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中，遣责中国军事入侵外蒙古。外蒙政府并吞不属《中俄蒙协约》规定之外蒙古自治范围的达里冈崖。

1949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955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这是中华民国唯一一次作为中国的代表行使否决权。

196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第971次会议通过联合国安理会166号决议，建议联合国大会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中华民国在2002年经中华民国立法院投票获多数票数承认蒙古国护照后成为最后一个承认蒙古国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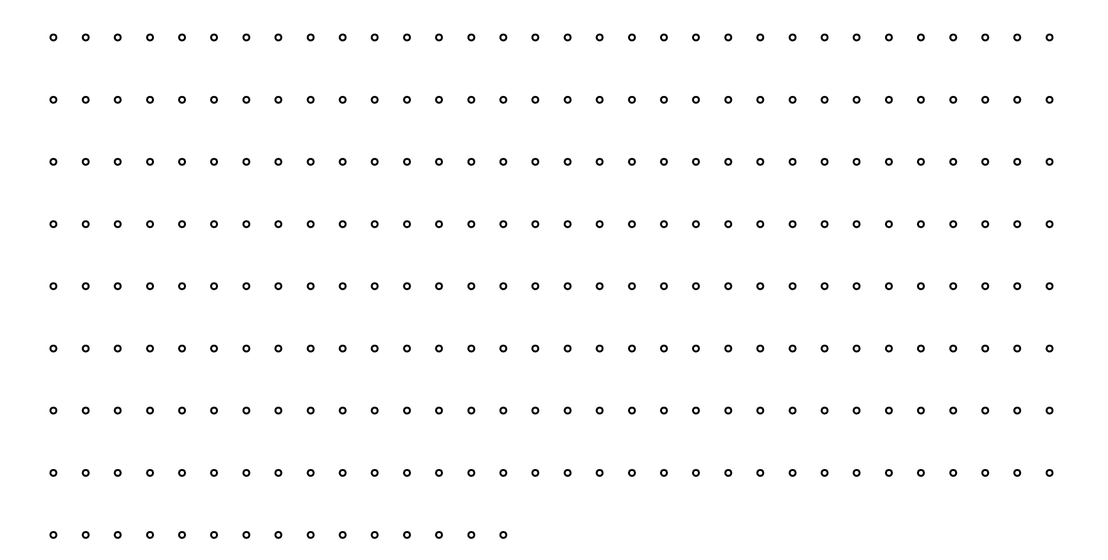
2012年5月2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蒙古“非我国宪法第4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81%AF%E6%88%B0%E7%88%AD%E7%BD%AA%E8%A1%8C

苏联战争罪行

苏联战争罪行概略描述苏联军队在1919年至1990年间，其领导人和数目不详成员所犯之严重、并可能违反国际法之战争行为，包括1944年至1945年初在东欧与中国东北所进行的战争或武力镇压，特别是谋杀和强奸。至今未有任何国际军事裁判组织对红军领导阶层任何一人就战争罪行在法庭起诉追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红军和大屠杀

早期的苏联领导人曾公开谴责反犹太主义，威廉·科雷写道："自30年代末以来，反犹太歧视就已成为苏维埃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苏联当局努力遏制反犹太人的偏见，特别是在俄罗斯内战期间，红军部队进行大屠杀时，以及在1919-1920年在巴拉诺维奇的苏波战争期间。

大屠杀受到了红军最高指挥部的谴责，有罪的部队被解除武装，而个别大屠杀者被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有罪的人被处决。仅管此后仍发生了乌克兰红军部队的大屠杀，但犹太人认为红军是唯一愿意保护他们的力量。据估计，在俄罗斯内战期间被杀害的犹太人有3,450人，占犹太受害者的2.3%，这些人是由布尔什维克军队谋杀的。相比之下，根据《摩根索报告》，在涉及波兰责任的所有事件中，总共约有300名犹太人丧生。该委员会还发现，波兰军事和民政当局已尽最大努力防止此类事件及其将来的再次发生。摩根索报告指出，对犹太人的某些形式的歧视具有政治性质，而不是反犹太性质，因此特别避免使用"大屠杀"一词，并指出该词的使用范围广泛。没有具体定义。

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

参见：大清洗和卡廷惨案

1922年2月6日，契卡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部分，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或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宣布其职能是保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通过对"阶级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来实现的。在实施政治镇压方面，红军经常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支持。作为古拉格的内部安全部队和狱警特遣队，在整个苏维埃历史上的军事敌对时期，内部部队压制了持不同政见者

并从事战争罪。他们专门负责维持古拉格的秩序、进行大规模驱逐和强迫重新安置。后者针对的是苏维埃当局假定对其政策怀有敌意并可能与敌人合作的许多民族，包括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朝鲜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

背景

在轴心国方面，种族意识形态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并导致苏联平民在1941-45年德国入侵和占领期间遭受许多战争罪行，估计约两千万苏联平民在战争期间因战斗波及和系统性消灭政策直接导致死亡。

在苏联方面，红军自成立第一天就是意识形态灌输和取向，它是苏联共产政权为了在血腥的俄国内战保护新政权而设立。红军之父列夫·托洛茨基，利用宣传、思想灌输和无情恐怖来击败白军。因蓄意饥荒、恐怖行动、集体处死、放逐和其他报复惩罚导致的后果，使得俄国内战中平民人口的死伤远高于战斗员，一些研究显示死于此内战的平民人数是战地部队的九倍。这使得红军自成立伊始，就是一支执行残暴命令和方针的部队。更甚者，苏联不承认沙皇俄国同意的海牙公约对新政权有约束力，直到1955年才签署。

随着击退德国进攻，苏联部队在1944年进入德国和匈牙利，战争罪行、掠夺、谋杀平民和特别是强奸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数十年来，西方学者一般将在德国和匈牙利所发生的这些暴行简单解释为苏联对德国在苏联境内的暴行，和屠杀苏联战俘的复仇（520万战俘中有360万死亡）。此说法现

受军事历史学家如安东尼·比弗的质疑，至少在关于大量强奸的部分。比弗认为红军士兵也强奸俄国和波兰自集中营解放的妇女，并强调这弱化了复仇解释的可信度。大量强奸也发生在红军占领的波兰城市，例如，在克拉科夫，苏军的到达为波兰人带来的是妇女和女孩被苏联士兵大量强奸，私人财产被残暴劫掠。

自1941年起，斯大林即有意不惜代价向东线反攻，并以极端残暴方式（包括对他自己的士兵）领导战争。红军在二战的死伤高过任何其他军队，部分是因为高人力耗损和训练时间不足。面对装备差劲，几乎无能抵抗机关枪、坦克和火炮的步兵单位，苏联指挥官所使用的战术常是以人海为基本，使自己的部队遭受惨重损伤。此战术并没有被用来清理雷区，利用步兵波次“进攻”以清除地雷的说法本身只是冷战期间的妖魔化宣传，苏联本身也有扫雷坦克以及类似美军的除雷部队投入战场。在苏联最高司令部命令下，撤退的士兵或甚至踌躇不前的士兵将被后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射杀；斯大林在1941年8月16日第270号命令表示，若发生任何撤退或投降事件，所有参与军官和士兵就地枪决，并可能对他们的家人进行报复惩罚，不过这项命令内容暗示政委只会在后方进行惩处，后来也因为本身无法解释政委在战场上的高死伤率而不全属实，射杀败退官兵的命令本身也因会严重打击士气大多不被指挥官们实行。在苏联和现今俄国关于“大爱国战争”的历史书，此命令和其他俄国在二次大战的暴行，除少数例外外极少提及。这些证据随着冷战后一些苏联档案向外公开，被西方历史学者发掘和公布。

红军在1939至1941年间，和1944至1949年间，在占领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所犯之罪行，发生后便铭记在这些国家的历史知觉中，不过仍然，系统性、由公

众控制的研讨只在苏联垮台后才成为可能。这点对苏联在1945年毁弃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后在满洲国和千岛群岛的占领地也同样适用。

平民死伤

冬季战争期间

芬兰拉普兰Seitajärvi被苏联游击队所杀的平民、1942年。

冬季战争，或称苏芬战争，随着苏联在1939年11月30日进攻芬兰展开。在2006年11月，芬兰官方解密了苏联士兵和游击队向芬兰平民进行跨国境突袭的照片，其中包括众多被杀害妇女和小孩的照片以及被吃掉的士兵的人皮照，这些照片被隐匿了如此久的时间以避免扰乱与这个东方强邻的关系。

1939年-1942年

在德苏密约条款下，苏联在德国进攻波兰16日后，入侵并占领了波兰东部，并在这之后如同与纳粹政权商议的，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小国、部分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苏联在所有新控制地区的政策是残暴的，表现出了强烈种族清洗成分，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跟在红军之后清洗占领地的“反苏份子”，波兰历史学家托马斯·恩伯注意到德国特别行动队与此部队的近似。许多人试图逃离苏联NKVD，那些失败的人极可能成为红军囚犯，并在之后放逐至西伯利亚和/或死在“古拉格”。1939-1941年期间在前波兰苏联控制区内，近一百五十万名居民被放逐，其中63.1%为波兰人和其他民族，7.4%为犹太人，这些被放逐者绝少活过战争。

依据美国教授卡罗尔·奎格利的研究，红军在1939年俘虏的32万波兰战俘中至少10万人被消灭。

放逐、处死、酷刑、强奸以及其他各种对人民罪行（谋杀、绑架人质、烧平村落）随着红军在1941年的败退更变本加厉，许多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政治犯被屠杀，以避免让他们落到德国手上。在波罗的海三小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被捕的反抗份子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红军附属部队处决，而非留在当地。苏联的这些行为增长了对那些曾帮助苏联的人，或被怀疑为苏联盟友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增长波兰人和其他民族对苏联的仇恨。结果，在这些国家，特别行动队可以依赖愿意参与他们的残暴任务的志愿者和密报，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1943年-1945年

在战争转折点后，红军与德军战斗时不再撤退，反而主要开始重夺东线失去的土地。对所有被控通敌者进行的复仇行动，导致与D-Day之后在解放法国对通敌者的审判类似的结果。 在波兰，纳粹暴行在1944年末结束，但苏联的压迫仍在持续，在华沙起义期间红军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受争论并被一些历史学家质疑。一些波兰家园军的士兵被迫害、囚禁，并常在假审判后处死（例如维托尔德-皮尔基，奥斯威辛反抗势力组织者）。

德国1945年

根据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苏联军报的宣传和苏联最高司令部的命令两者皆对红军人员的暴行有责任，其文章一般文意为红军以复仇者的身份来

到德国，并有权惩罚。苏联作家伊尔亚·爱伦堡在1945年1月31日写道:“德国人已在奥佩伦、哥尼斯堡和布雷斯劳受到惩罚，他们已受到惩罚，但仍不够，一些已受到惩罚，但还未达全部...”。此外，苏联将军的呼吁也鼓动了士兵，在1945年1月12日，陆军将领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向他的部队发表以下言论:“无论对谁都不应有任何怜悯，因为我们也未得到任何怜悯...法西斯的土地必须成为沙漠...”

在德国方面，即使红军已在1944年的最后一个月侵入德国领土，任何对市民的有组织撤离皆为纳粹政府所禁止，以提升部队士气。不过，德国市民从来自东线服役的朋友和亲人的消息，很清楚红军对平民的战争方式，并害怕红军。另外，纳粹的宣传 – 为巩固民防以详细画面和阴森方式描述红军暴行如内默尔朵尔夫大屠杀 – 引火烧身使得民间出现恐慌。结果，在纳粹官员撤离后，平民开始自动自发的向西逃窜，逃离推进中的红军。超过两百万德国东部省份（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的人民死于寒冷和饥饿、战后种族清洗或因卷入战场被杀，很大部分死亡发生在当难民列被红军部队追上时，他们被坦克撵过、洗劫、枪击、谋杀，妇人和女孩被强奸后遗弃，任其自灭，苏联空军的战斗轰炸机穿透前线好几公里并向难民列攻击。战后红军将在东线或被苏联俘虏的德军、女兵、市民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强迫奴役和不人道虐待(殴打、处死、酷刑、强奸)，因为战后苏联男女人口严重失调，红军高层军官默许红军在俘虏随意虐待俘虏，这当中也包含了德国女兵被红军的军士官兵轮奸，东线战场也发生许多战争性犯罪，尤其是红军攻破柏林的时候，许多德国女人也沦为红军的施暴对象，二战中,总共有600万德国平民和士兵沦为俘虏，光是斯大林格勒一次战役中,就有近10万德军被苏联红军俘获。美国人也俘获了大量的德国战俘，这些德国俘虏中,被关押在美国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战俘营里，算是比较走运的。而不幸被关押在苏联战俘营里的大约300万德国战俘,命运最为悲惨,他们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再没有踏上故土，在当时，许多德

国战俘并不是军人，而是来自平民。德国被苏联人划区占领后，如果一个苏联军人要搭走一个国人,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许多被带走的德国人,原以为登记一下就会回来,所以没有任何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但是他们错了。以为两个小时后就能回来的德国人不计其数,他们在战俘营里一呆就是几年,甚至是一去不返，1955年,战后西德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为了要回关在苏联的最后一万名战俘,不惜访问莫斯科,并低三下四地接受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才在数年后把这一万名幸存者带回了德国。这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骨肉团聚活动。它意味着一万多个家庭得以归于完整。但是另有达100万名的德国战俘就此再无踪影。

那些走的人须承受红军统治的重负:谋杀、强奸、抢劫和放逐。例如，在东普鲁士城市哥尼斯堡，红军占领此城时大约有10万名德国市民居住于此，当德国人终于在1948年被驱逐出哥尼斯堡时，只剩约两万人仍然存活[来源请求]。红军在德国的暴虐在占领期间不断持续，并导致如德明镇之类事件发生，此小城在1945年被苏联部队占领，尽管德明和周边在未有任何抵抗下无条件向红军投降，近900人在苏联指挥官宣布德明开放洗劫三天后自杀。

虽然并未经常有红军大规模屠杀平民的报导，却有小规模处决市民的照片以及案件，例如在特罗恩布里珍有一件已知事件，至少88名男性市民在1945年5月1日在被集合后枪决，此暴行发生在苏联士兵的胜利庆祝之后，庆祝中众多特罗恩布里珍女孩被强奸并且有一名红军中校被不知名人士枪击。一些研究表示此事件中高达一千人被处死。

波兰1944-1953年

在据有波兰被德军占领的土地后，苏联士兵经常对波兰人进行的劫掠、强奸和盗匪行径，将人民对苏联的态度转变成厌恶、恐惧、甚至仇恨。红军部队也参与了反波兰行为（如追击奥古斯图夫政权，约600人死去）。

中国东北1945-1946年

1945年美国为了尽快结束太平洋地区对日战争，降低美国的损失，于是于1945年在雅尔塔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三国领袖达成《雅尔塔协议》，要求苏联进军中国东北，苏联于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对日本宣战，进军东北，占领城市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联红军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苏联屠杀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许多来不及撤回日本的侨民被苏军屠杀。典型的例子有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和葛根庙屠杀。此外还有来不及撤退的日本兵和日本女兵或被俘虏的日本兵和女兵，一同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强迫奴役或非人道虐待(殴打、强奸、处死、酷刑)据说这些日本俘虏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每年死亡人数大约5万左右，红军高层军官默许对俘虏的虐待，苏联因为战后男女人口严重失调，苏联女兵和苏联男兵将目光注视到俘虏，进行强奸或轮奸的行为，据说苏联俘虏日本兵的总数是60万，从西伯利亚送回日本的俘虏在20万左右，外加几船的骨灰

同时，苏联亦对中国东北的平民进行骚扰。当时，苏联占领军统帅部是设在长春市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其首领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而沈阳市

的防卫，则是由俄国城防司令卡尔可夫少将负责的。然而，苏联军队军纪败坏，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来往行人，在市内，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因为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反而会被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年轻的妇女们，早把头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苏联士兵甚至使用机关枪射杀，对孩童施暴。龙应台对此评论道，在纪念碑落成、要求"长春各界人士"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在大街上对妇女施行强暴；连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因制止苏联红军抢劫而遭枪击致死。而苏联军队任意进入住宅，以刀枪威吓强夺物品与奸杀妇女，苏联当地进行的抢劫和强奸妇女的行为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东北人均抱怨："走了个小鼻子，来了个大鼻子。"当地人对苏联红军的厌恶远超过日本殖民者。在此期间苏军的行为甚至影响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

强奸和绥靖

德国

根据以下资料估计，红军士兵在二战末强奸了超过两百万德国妇女，其中20万人之后死于伤口、自杀、或是直接被谋杀。对1944年至1945年间被红军强奸的受害人数估计如下：东部省份:1,400,000。苏联占领区不包括柏林：500,000。柏林：100,000。另外，许多受害者多次被强奸，一些多达60至70次。

自1945年夏起，被捉到强奸的苏联士兵通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从拘留到处死[61]。不过强奸仍然层出不穷，直到1947-48年冬，苏联部队被官方限制在严密看管的驻地和军营，将他们与东德居住人口完全分离才解决

问题。

诺曼·奈马克在《俄国人在德国:苏联占领区的历史、1945-1949》中写道:“不只每个受害者都被迫在她的余生背负创伤，整个东德也遭受到巨大的集体创伤...强奸犯罪在占领的第一天就刻在苏联占领区人们的心里，历经1949年秋东德的成立，并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到今天。”

匈牙利

仅只占领布达佩斯期间，就估计约有五万这个城市的妇女被强奸。匈牙利女孩大多被带到苏联军营监禁、强奸，有时也被杀害，受害者的国籍对这些士兵并没有意义，甚至还攻击瑞典公使馆。

南斯拉夫

虽然红军在1944年仅经过南斯拉夫东北很少部分，但它的行径仍引起当地共产党游击队的严重关切，忧虑他们的共产党盟友做的强奸和掠夺会降低他们在人们中的声望。至少有121件强奸被记录，其中111件也关系到谋杀，另外有1,204件暴力洗劫被记录。斯大林对一位南斯拉夫游击队领袖向他抗议红军行为的回应是“难道他不能理解一位横过数千公里血、火和死亡的士兵找个女人快乐并拿些小玩意吗?”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袖拉多·克莱门蒂向科涅夫元帅抗议苏联部队在斯洛

伐克的行为，得到回应是将之归咎红军逃兵。

保加利亚

因为托尔布欣元帅的部队较好的纪律、相对相近的文化、近一世纪的友善关系和对苏联部队的公开欢迎，强奸相对而言不存在，特别是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被占领状况相比。

波兰

红军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对付波兰的游击队和平民。在1945追击奥古斯图夫政权期间，超过2000名波兰人被俘，其中约600人死亡。

中国

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当街殴打中国民众，并众目睽睽下追逐与强暴妇女，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对城市的破坏和掠夺

大至上，红军军官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德国境内的所有城市、村落、农庄皆公然开放掠夺和洗劫[39]，虽然书面命令并不存在，不过有好几份文

件描述了红军的行为模式，其中一份文件是布达佩斯瑞士公使馆的报告，描述1945年红军进入此城发生的事，内中说:“在布达佩斯包围战和其后的悲惨数周，俄国（苏联）部队随意洗劫城市，他们事实上进入所有屋子，无论是最穷的或最有钱的，拿走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特别是食物、衣物和贵重品。每一栋公寓、商店、银行，诸多此类，皆被洗劫多次，拿不走的家具和较大的艺术品之类，经常被直接破坏。在许多案例中，洗劫后还将房子付之一炬，造成庞大损失，银行保险箱无一例外的被清空--甚至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保险箱也是--无论找到的什么全部拿走。”

Walter Kilian，柏林夏洛登堡行政区战后由苏联指派的第一位市长，报告了红军士兵在这个地区进行的广泛洗劫:“个人、百货公司、商店、公寓...全部被盲目抢劫。”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向斯大林报告，苏联士兵进行的洗劫和强奸可能会导致德国人口对苏联的负面反应和伤害整个东德社会主义的未来，斯大林对他德国同志的忧虑的回答是：“我不会容忍任何人弄污红军的荣誉。”

所有证据，例如报告、照片和其他关于红军洗劫、强奸、烧毁农庄和村落的文件，因而全部自所有在苏联德国占领区（后成为东德）的档案库内抹消[69]。不过在私人记忆、日记和相片簿，1945事件的被尽力保留了下来。

许多时候苏联士兵将建筑、村落、城市部分点火，然后射击任何意图熄火的人。例如在1945年5月1日，苏联士兵将Demmin市中心点火，并阻止任何人熄火，市场周围的所有建筑中，在烈焰后仅尖塔留存。大多数的红军暴行发生在被归类为敌对地域的地方，尽管如此，红军士兵和NKVD人员在1944和1945年经常在波兰洗劫运输火车。

苏联军队占领东北后，以‘解放者的姿态’在东北建立纪念碑，并掠夺日本做为中国赔款的工厂设施，运回苏联，据统计其金额高达80亿美元，超过德境三倍。

战俘的处置

苏联命令、1945:“一些陆军人员的行为导致了庞大的物质损坏，因为他们破坏东普鲁士城市和乡村里的高价财产，烧毁现已属于苏联的建筑和整个村落...此外发现案例陆军人员使用武器对付德国平民，特别是对女性和老人。发现众多案例战俘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被恶意射杀。”此命令之后继续说明对此类事件的处置方式。

在1955年前，苏联并不承认沙皇俄国加入的海牙公约对其有约束力并拒绝签署。这已导致1919-21年波苏战争期间波兰和苏联双方对战俘的野蛮对待，在1955年之前，苏联也拒绝签署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相应的，苏联自二战开始就以残酷的方式对待先是波兰、之后德国、德国盟友和日本的战俘。

1941年期间，紧急降落的德国飞行组员经常被射杀。酷刑、致残、谋杀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自1941年6月成为家常便饭。在1941/42年冬，红军每个月大约抓到10,000名德国士兵为战俘，但死亡率高到反而使战俘的绝对人数减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波兰东部及周边国家（主要是现代西白俄罗斯）和苏联占领区的其他地区的战俘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处决。整体死亡人数仍然未知。

特罗恩布里珍大屠杀

特罗伊恩布里岑大屠杀发生在1945年4月最后一日和5月第一日，在艰苦战斗攻下这个村落后，红军集合了约一千名平民并在附近森林将他们处死，据说这是为了一位苏联高阶军官死于占领此村落的战斗进行的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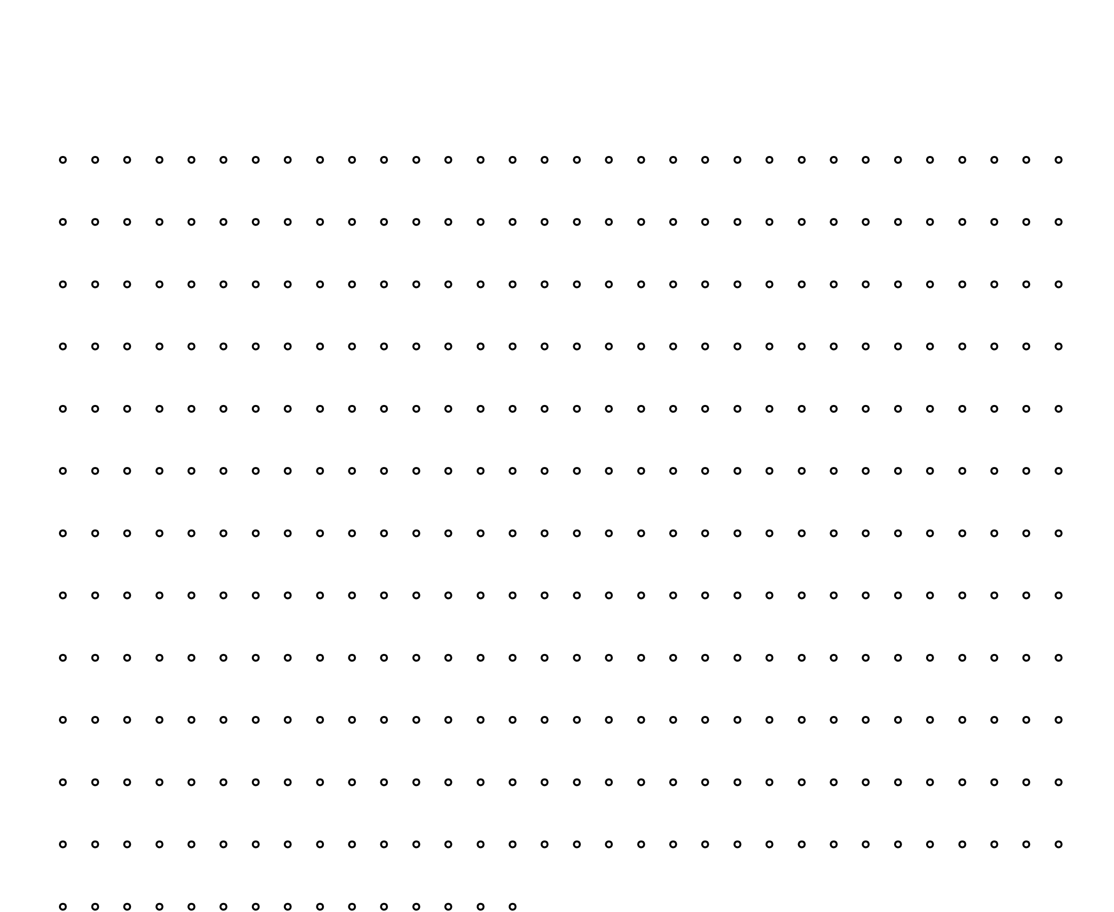
冷战

更多信息：苏联入侵阿富汗、布拉格之春和大韩航空007号班机空难

匈牙利革命（1956）

根据联合国为匈牙利问题（1956）设立的特别委员会： 苏联坦克向所有他们认为攻击他们的建筑进行无差别射击。委员会收到大量的报告，苏联在没有遭袭的情况以迫击炮和火炮射击城内有人居住的Buda区。委员会收到随性射击无防备路人的报告。根据许多证人，苏联部队向正在商店外排队的人们开火，据述多数受害者为妇女和小孩。亦有许多苏军向救护车和红

十字车辆开火的案例被报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5%AE%81%E4%BA%8B%E5%8F%98

伊宁事变，也称伊宁叛乱，由苏联在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期间借机策动，新

疆省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在1944年11月7日起发生借口新疆独立。伊犁事变是三区革命的开始，三区革命历时1944年至1949年。此为中华民国时代最主要的新疆民族冲突。

事变后苏联扶植维吾尔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东突），东突"惨不忍书的民族仇杀，人人皆知、史家忌书的一个血腥口号叫'杀回灭汉'"。

。。。。

1933年盛世才掌握新疆省大权之后，为了依靠苏联稳固统治，长期实行亲苏亲共政策，惟双方彼此互不信任。

1942年，盛世才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输诚，反苏反共，逮捕苏联人员及中国共产党党员。苏联积极扶植反盛世才的各方武装及政治组织。

1943年至1944年间，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副领事波列索夫为中心，策动伊犁各族各界人士建立了各种秘密组织，在左翼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发展了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维吾尔族人）等人。阿巴索夫及同伴们联合了有很大社会影响的大阿訇艾力汗・吐烈（苏联乌兹别克人），成立了一个由12人领导的解放组织。艾力汗・吐烈是一个支持泛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因受伊宁警署监视，阿巴索夫的革命活动遭威胁，被迫避居中苏边境，在当地联络各族青年成立游击队。

1943年，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人）在苏联派出的以波波夫少将为首的12人顾问团陪同下，从苏联回到新疆阿山青河县布尔根河流域，加入了乌斯满·巴图尔（哈萨克族人）领导的游击武装。达列力汗和乌斯满的合作，使阿山形成哈萨克族克烈部落的大联合，一致对抗新疆省军和国军。

1944年9月，盛世才因试图再度投靠苏联斯大林而被国民政府调离新疆。他的调离使新疆暂时出现权力真空，新疆北部爆发了多起事变。

伊宁事变所建立的反政府组织

苏联境内

1944年5月，由曼苏尔·罗兹也夫（苏联人，Mansur Roziyow，曾在盛世才主政时期以苏联顾问之名担任新疆省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会长，却向新疆少数民族革命领袖传授“民族革命理论”而遭逮捕）、哈斯马洪·司马义诺夫所建立“伊米尔指挥部”下辖：“为解放而战组织（1944年7月由阿比尔米提·哈吉约夫成立）”。1945年7月底，苏联人列斯肯率领东突民族军第三骑兵团攻下新疆塔城县城，曼苏尔·罗兹也夫、哈斯马洪·司马义诺夫成为塔城区第一、二副专员。

中国新疆境内

1937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约400人在盛世才的允许下进入乌鲁木齐，开启

了中共在新疆革命运动的序曲。为了抵御英国和日本的势力向新疆渗透，苏联政府与盛世才商定，在新疆建立一个专门侦察境外敌情的机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开始组建，即为“先锋社”。1939年，中共选派数十人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学习结束后刘庆南、杨文先、王振坤、杨天云、张明敬和谭政文等人又被共产国际先后派到新疆边务处工作，受苏联顾问领导，从事对美英的情报工作。1943年1月，国民政府中央势力介入新疆，导致大量中共所谓“爱国进步人士”（国府称疆独反政府势力）遭逮捕入狱（毛泽民、陈潭秋）。

1930年代由苏联所建立的“新疆省政府政治监察总管理局”由中国共产国际人员张义吾、王立祥，苏联顾问包国定领导的谍报组织，是仿照苏联国家保安部建制。

1943年12月，苏联开始协助乌斯满·巴图尔组织反盛反中国的“阿勒泰哈萨克复兴委员会”（青河县布尔津河上游）以期望建立“新回教国”。1944年初攻占可可托海县、青河县、布鲁尔托海县，6月联合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反中国武装力量，7月再联合维吾尔族反政府吉乃木游击队，10月成立阿山民族革命临时政府（1945年并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1944年11月下旬，苏联在新疆伊宁成立“一号房子”（苏联红军弗拉基米尔.柯兹洛夫领导）、“二号房子”（KGB弗拉基米尔.斯特潘诺维奇领导），另在阿拉木图派遣贝利亚为苏联军对中国新疆的督战。

名称

中华民国对于1944年11月事件一开始称为“伊犁匪乱”，之后史料才以“伊宁事变”称呼，并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傀儡组织”。新疆暴乱的革命者（如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拜克·木农阿吉）自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军”或“11月革命”。中共在1950年以前称新疆暴动者为“伊犁当局”、“伊塔阿三区”，扎巴依喀勒山空难后改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三区革命”。

旗帜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所使用的旗帜有两种，一种是绿底上绘有白色星月标志，一种是用金粉写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过程

暴动

1944年4月，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主席为苏联籍乌兹别克人艾力汗·吐烈。

1944年8月，苏联侨民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组织巩哈游击队，发动“巩哈暴动”。

1944年9月，伊斯哈克拜克·木农阿吉（柯尔克孜族人）在苏联境内筹建

“蒲犁解放组织”和蒲犁游击队。命努尔阿吉等人率蒲犁游击队从苏联越境攻打蒲犁县。

10月7日，游击队攻占巩哈县城，伊宁驻军主力1600人调往巩哈平乱。苏联侨民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在果子沟组织游击队，形成战略呼应。

11月6日，在得到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帮助下，苏联军官阿列克山德洛夫率军从霍尔果斯潜入伊宁，同“伊宁解放组织”组成军事指挥部。同日，列斯肯占领芦草沟，切断迪伊公路。

11月7日，伊宁事变爆发，外有巩哈游击队进攻，内有苏军和武装人员呼应，驻军中少数民族士兵哗变。

11月9日，伊宁驻军负责人曹日灵电告朱绍良内有：“名为剿匪，实为国际战争”、“市区土匪全为归化人(俄罗斯族)及塔塔尔族，以其领事馆作根据地，所获武器系苏联制造”。

11月10日，伊宁全城被攻占，守军残部及汉族官员、平民约8000人撤至城郊机场及艾林巴克、鬼王庙两处高地，等待救援。

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

政府，主席为艾力汗·吐烈，阿巴索夫任临时政府内政部长。

1945年1月5日，艾力汗·吐烈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华民国而独立。

1月31日夜，国民政府伊宁区长兼守备指挥官杜德孚率残部及千余平民从伊宁据点突围。至皮尔清沟，被叛军追击。最终，杜孚德重伤自尽，所率军民仅二百余人突围生还。

2月1日，在苏军的帮助下，民族军攻占艾林巴克。7月31日，攻占塔城。

张治中曾记述道：“三区汉人被杀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杀光了”。关于伊宁事变中被害的汉回平民数量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

平乱

1944年9月，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后，蒋介石改派吴忠信就任新疆省长，并把下属各厅厅长都换成国民党员。蒋介石命令马步芳派一个军的骑兵驻扎在新疆各地，平定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国军调集大批部队，“死守大迪化”。国军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峤奉命抵达迪化，将新编第46师部署在绥来并成立前线指挥部。民族军和国军在玛纳斯河沿岸对峙，新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以玛纳斯河为第一道防线。谢义锋的新二军

军部由绥来迁移到景化（今呼图壁），为第二道防线。从青海赶来的马呈祥的整编骑兵第1师接替原暂编第3师的防地，进驻迪化、景化一带；暂3师调往焉耆。第43军杨德亮加强伊吾、哈密的防守，徐达率领新45师一部防守在七角井。

谈判

中苏谈判

1945年期间，国民政府屡次与支持叛乱的苏联政府交涉。1945年7月5日，蒋介石在一次中苏会谈上提出："苏联政府如果能保证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领土和行政主权，对中共和新疆变乱不再作任何支援，中国政府才考虑苏联有关外蒙的要求"。会后宋子文继续与苏联谈判。斯大林表示，无论延安、新疆均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发表声明，并答应宋子文关于制止从苏联往新疆偷运武器的要求。

其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紧接着在1945年9月，苏方代表莫洛托夫与中方代表王世杰在伦敦就"新疆伊犁事件"磋商时表示这个事件是临时现象，不久就可以平息。在得到苏联的保证后，蒋介石开始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意和平地解决新疆问题"。

府乱谈判

1945年10月，双方同意派代表赴迪化进行谈判。南京方面派出了张治中，三区派出了热黑木江（团长）、阿不都哈依尔・吐烈、阿合买提江・哈斯

木、赛福鼎·艾则孜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苏联亦派出一位代表。经过半年的谈判后，最终在1946年4月制定了十一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恢复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的建制，后成立新疆省民主联合政府。三区临时政府高层中的一部分封建势力、宗教人士和泛突厥人士被清除出领导层，原东突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被苏联驻伊犁领事扣押并送回苏联。联合政府的核心改由从亲苏派组成，领导人为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与阿合买提江。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5%A4%A

7%E6%9C%83%E7%AC%AC505%E8%99%9F%E6%B1%BA%E8%AD%B0

联合国大会505号决议案的标题是《苏联违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以致威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及远东和平案》。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后，联合国大会第六届会议在1952年2月1日通过此决议案。

历史背景

日本在1931年侵略满洲（中国东北）并在1932年成立满洲国。中华民国抗议日本侵略而国际联盟以42票对1票（仅有日本投反对票）要求交还满洲给中国，但日本拒绝遵守而退出国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同盟国为争取苏联对日本宣战，通过雅尔塔会议，苏联在1945年8月8日进攻满洲国，以换取苏联派兵进攻在满州的日军。并在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与迫使中华民国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在1946年1月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1947年7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外蒙古入会问题，中国代表表示反对。中国代表为徐淑希。1947年8月18日，安理会第186次会议，中华民国代表蒋廷黻以北塔山事件为由投票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

1949年9月22日，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向大会提出《控告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威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及远东和平案》；首席代表蒋廷黻并在当天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声明，“鼓吹反共”。9月23日，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抨击蒋廷黻演说。9月27日，蒋廷黻正式

向联合国大会控诉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联合国宪章》。9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46票对5票批准程序委员会把蒋廷黻提出之控诉苏联案列入本届大会议程建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金门澎湖马祖等岛屿，继续自称为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伪政权”。1949年12月8日，联大通过291号决议“促进国际关系之安定”。1950年12月，联大通过383号决议，决定继续调查苏联违约状况。国共内战在1950年代初告一段落。虽然中国大部分领土已经不受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但由于时处冷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仍得到许多西方国家的支持，因此其后20年间，中华民国政府能够保有在联合国的中国席次。

中华民国政府对于中国共产党以武力占据其在中国大陆之领土所建立之政权视为非法政权，反对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分裂国家的行为，并认为其违反二战后1954年确立之现代国际法对于新国家成立的必要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合法性与对于中国的继承权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败退台澎金马等岛屿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已经灭亡，自称为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建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

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苏联阻挠其在东北九省恢复主权之努力，并在国共内战中援助中国共产党以反叛之，因而违反了条约。1952年，中华民国向联合国控告苏联。联合国大会以25票赞成，9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五〇五号决议案谴责苏联。此案常称为“控苏案”。

后续发展

控苏案表决后，1953年2月24日，中华民国立法院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拒绝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中华民国认为决议案五〇五是外交胜利，但收复中国大陆及蒙古的希望更加渺茫。中华民国曾在1955年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1956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外蒙入会；通过日本加入联合国。为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在美国压力下，最后迫使中华民国停止阻挡蒙古，最终蒙古在1961年加入联合国。

2002年后中华民国与蒙古国互设大使馆级的代表处。2005年10月3日，又弃用法理上各省（市）县（市）行政区域代码。《中华民国年鉴》也于次年起不再将大陆地区列于“土地”一章之中。此后政府文献中仅列出实际统治区（即台湾地区）之行政区域，并弃用“中华民国全图”。2012年5月21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新闻稿表示“民国35年我国宪法制定公布时，蒙古（俗称外蒙古）独立已为我政府所承认，因此，当时蒙古已非我国宪法第4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否定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

全文

大会认为联合国首要目标之一，在“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

查中华民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曾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缔结友好同盟条约，内除其他事项外，并规定：

(a) 缔约国“同意在……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b) “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查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自日本投降后对中国国民政府在东三省（满洲）恢复中国主权之努力，始终横加阻挠，并以军事及经济上之援助给与中国共产党以反叛中国国民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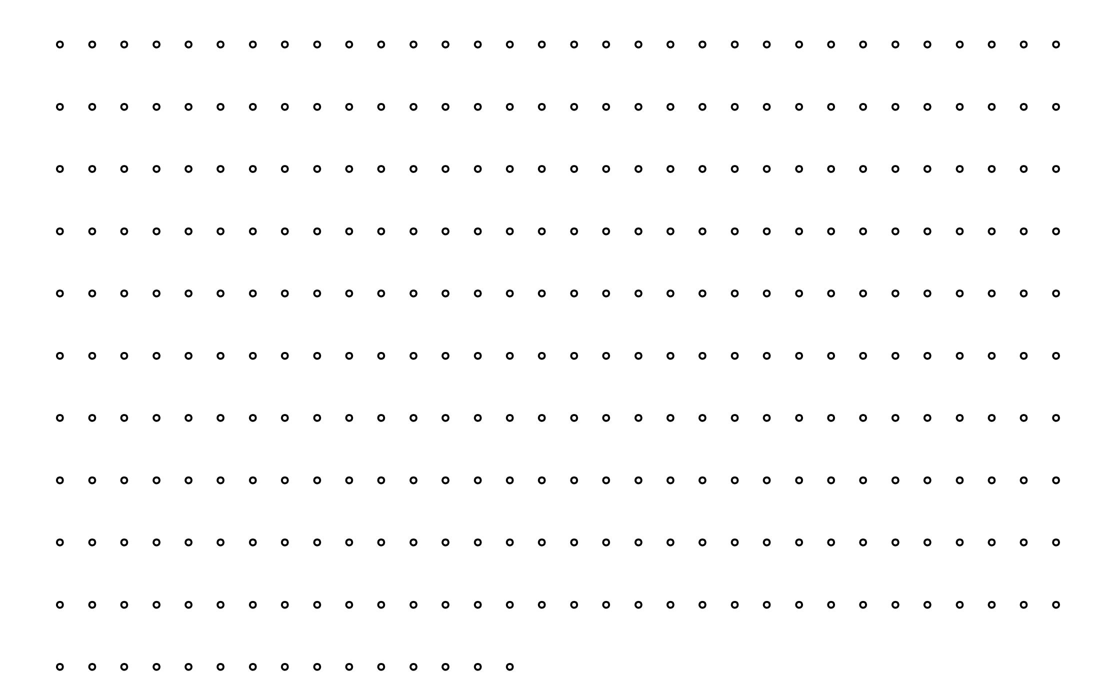
爰断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就其自日本投降后对中国之关系而言，实未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签订之友好同盟条约。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第三六九次全体会议。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98%87%E5%8F%8B%E5%A5%BD%E5%90%8C%E7%9B%9F%E6%A2%9D%E7%B4%84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称《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俄语：**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бе и союзе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是中华民国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际与苏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时苏联军队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已经发动八月风暴攻势，一个星期以后，从日本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与内蒙古（当时满洲国和蒙疆）。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与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此条约最大要点是关于中国北方边界的问题，尤其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换文内容附件有两条主要：一、苏军三个月内从东北“撤

完”；二、“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华民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没有时限。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及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等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显示97%的公民赞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协议过程

王世杰代表国民政府签约

1945年6月1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来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晋谒，出示一个为进行中苏交涉的“五项先决条件”的文件，其内容是为：一、恢复旅顺港的租借，建立苏联海军基地。二、大连商港国际化；同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的权利。三、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组织合办公司，共同使用。四、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使成为独立国家。五、库页岛南部以及与其邻接诸岛暨千岛群岛归属苏俄。如果　蒋主席同意这几项基本条件，苏联准备即刻开始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6月15日，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送来了杜鲁门总统的极机密备忘录——“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纲要的说明”，附有雅尔塔密约的全文。备忘录中记载着“斯大林总书记所表示的明确意志”，内容是：（一）斯大林总书记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三）斯大林总书记期待中国达成统一、安定，希望满洲为统一中国的一部分。（四）对于中国没有领土的要求，为了和日军作战而进入中国领土的苏联军队，尊重中国主权。（五）为使中国便于在满洲组织

行政组织，欢迎蒋主席的代表和苏联军队同行进入满洲。（六）斯大林总书记同意美国对于中国所提倡的门户开放主义。（七）斯大林总书记同意朝鲜由中、美、英、苏四国托管。

美国方面依据这个外交文书，认为是斯大林对于中国没有存丝毫野心的‘背书保证’。根据杜鲁门回忆录，由杜鲁门总统发给赫尔利的电令很明显地表示出基于在雅尔塔协定中会商决定“由罗斯福总统通知蒋主席，让他了解。”并指示赫尔利“要尽最大的努力得到蒋介石主席的认可。”

而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在该日谈判过程，极力争取两项问题：（一）旅顺问题，绝对不能使用‘租借’等类的名称。（二）对于外蒙古，可以赋予高度自治，在外交和军事上都能让其相对于独立；但宗主权必须属于中国。不过，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宜提出去。

同年6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华盛顿返回重庆，他告诉王世杰：“苏联将不惜丢弃中共与我订约。”6月27日，宋子文等人由重庆飞莫斯科，蒋介石派蒋经国随行。随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钱昌照等。

谈判过程主要由外蒙古现状僵持不下，宋子文认为外蒙现状，就是维持1924年苏联承认中国拥有外蒙主权之《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所有现状。而斯大林则认为外蒙现状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名词，并提出基于下列三项理由，中国要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一）外蒙对西伯利亚东部的防

守，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苏方应有自卫的法律权。（二）外蒙古不愿加入中国，亦不愿加入苏联，故而独立，中国无代表在外蒙，外蒙亦无代表在中国，故中国应承认其独立。（三）苏联在东方的国防计划，悬想日本在二十年至三十年之后，将恢复其力量；苏俄目前在远东防止日本再恢复其力量之准备，实嫌不足：正在建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苏维埃港两个军港，及由该军港至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铁路，以及在贝加尔湖以北的铁路，估计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因此苏俄需要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和外蒙古方面自卫法律权。

7月2日与7月7日两次谈判中，宋子文奉国民政府令，拒绝承认外蒙独立的要求。7月2日会谈记录证实，宋子文对斯大林说："吾人实处于困难之地位，吾人无法向人民宣布吾人将放弃任何一部分领土……如吾人承认外蒙之现状，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斯大林说："外蒙在地理上之地位，可使他人利用之，以推翻苏俄在远东之地位。……日本即使投降，亦将再起，因此之故，苏俄在外蒙领土应有自己之法律权。"7月6日，宋子文电告："斯大林对东三省问题尚可让步，但对承认外蒙独立一节则坚持。"直到7月12日为止，在和斯大林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中曾经六度晤谈。

斯大林威胁这一问题不解决，则协定不能签订，并强调：波茨坦会议即将开始，如中苏两国间问题不能解决，以出兵问题就无法商讨，胁迫中国。美国总统特使哈里曼极力斡旋，美国官方记述："在谈判时，宋博士之主要注意，为获得苏联承认中国在蒙古的主权；此在多年前，在事实上即早丧亡，虽有1924年中苏条约，苏联自1920年起，已为事实上之控制权力；宋博士显然愿意同意其他重要之让步，以为外蒙古之交换条件；经过若干困难后，哈里曼先生始劝服其接受实质以代替形式。"

因谈判不成与美方斡旋决定对策为："（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二十年；旅顺行政管理权，属于中国，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能完整。中东南满铁线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期限均为二十年。（二）新疆动乱，苏联依照约言协同消灭此种叛乱，而外蒙侵占之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三）中国共产党其军事及行政组织，深盼苏方祇对国民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四）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愿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拟公投方式投票后，中国宣布外蒙之独立；外蒙之区域范围，以原疆界中国旧地图为准，藉以获得两国久远而根本之合作"

斯大林始同意中华民国提出"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的提议，这一提议在表示中国政府，不承认民国初年苏联外蒙独立侵占部分内蒙古和新疆土地为其领土，同时根据这一原则规定，中国保有勘定外蒙疆界之权。遂将这些协议作成换文，以为条约附件之一。

中东南满铁路的经营与旅顺、大连的特权：斯大林要求这些特权有效期限为40年至45年，同盟条约期间则为20年；而中国政府对宋子文训令原则均为20年，斯大林认为时间太促，再三要求改为30年，最后中方未同意。

大连：雅尔塔协定订明："应开辟为自由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但在莫斯科谈判时，斯大林要求："作为苏联专用港湾，与中国共同

管理大连”，经中方代表以承认之领土主权完整原则拒绝。

旅顺：雅尔塔协定订明：“仍复为苏俄所租用之海军基地”。斯大林因要求军港由苏方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于征得苏俄同意后任用，并要求旅顺附近约一百公里以外岛屿不设防。

宋子文回国请训后，8月5日又与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等，于8月7日午后抵达莫斯科。当晚十时，宋子文等等往克里姆林宫会晤斯大林，“一切谈话几乎完全在宋子文、斯大林之间进行”经过四次谈判后，8月14日上午十一时王世杰“与莫洛托夫将各约文稿逐一商定，彼方亦略有迁就我方意见”。后因“中俄文约稿书写需时”，签字手续直至8月15日“晨六时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宋子文、斯大林出席，“约文则由两国外交部长王世杰、莫洛托夫签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此签订。

尽管许多当时报刊与教科书记载签订日期为8月14日，但根据参与签约的王世杰与蒋经国的记事，签字时已经是苏联时间8月15日的早晨6点，几乎和裕仁天皇在日本时间8月15日的中午12点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投降同时发生；事实上，签字前四小时王世杰等人已得知日本投降的决定（前一天日本已透过瑞士等国向美国传达）。苏联的官方媒体之所以在签字前数小时就假称签字完毕、而中华民国政府也将错就错，是因为要营造该条约是在日本投降前签订的态势，毕竟条约的名义是在敦促苏联对日用兵；而且苏联数周前已经发动八月风暴，对日本不宣而战，所以国府希望在东北已被苏联入侵的既成事实下，以此条约规范苏联战后从东北完全撤军、并减少对中共的支援。

双方立场

苏联方面坚持要求中国政府官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并通过旅顺和大连港将其割让给苏联关东州，并赋予苏联管理中东铁路以及中国境内矿山，工厂和其他工业企业的全部权利。作为回应，苏联政府准备签署友谊与同盟协定，从而保证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也不会为蒋介石在中国的敌人提供援助。

当时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此约同主要有目的，（一）稳定中苏关系（二）减少中共猖獗（三）保证对日作战的苏军在作战结束后，自东三省撤退，以利国军接收东北，并尽量限制苏俄在东三省的权益，与其在新疆等地的活动。（四）中苏之间的谈判，闹成僵局，恐波及中美关系，发生不良影响；能够和在雅尔塔协定上签字的美、英两国保持协调，予此援助中国，牵制苏联动向的一个条件，并可借由国际舆论，防止苏联侵占更多中国领土，美国对中苏间的纠纷亦不能坐视，根据道义与公理的立场予中国以援助。

国民政府认为苏方在东北三省方面违约，依据该条约附属“关于苏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协定”，1945年8月14日日军已向苏军总司令投降，在中国东三省的最高当局，应为中国行政当局。但苏联方面却拒绝国军乘美国军舰自大连港登陆接收。且中苏条约“关于苏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协定谈话纪录”：俄军应在12月3日以前撤出东北，然而苏联并未履行此协议，拖延至隔年1946年3月1日方才告知中国政府撤军。另外东北日军遗留之工业机械与武器，1945年9月3日，国民政府以备忘录致美苏驻华大使馆表明决定没收日本在中国的公私财产的立场，要求日本一切资产均归为日本对中国侵略赔偿，

苏联进军东北后，却大肆掠夺日本遗留之机具、军火，将东北产业视为战利品，据美国赔偿代表至杜鲁门总统一份报告指出，苏联占领期间，东北经济损失达8亿5800万美元，全数复原费用需20亿美金。且有价值30亿美元黄金与50亿美元满州币遭掠夺，但数字是否如此未定论。后国民政府的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联络处召集原在东北各地主持各种事业机构明了实际情形的高级日籍人员21人组织调查团，从事更为详尽的调查，并查阅日人工厂原始簿册帐表，计算损失经数月调查结果，其已证明确切的直接损失，共为12亿3千6百万美元。

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黻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批准

王世杰回国称该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于是8月24日立法院在孙科主持下，以95人赞成，4人反对（以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废除

1949年9月27日，国府出席联合国代表向大会出提“控告苏俄违反中苏条约侵华案”，终于获得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10月，苏联承认中共政权，国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苏联断绝邦交。

1953年2月，蒋明确下令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2月24日，中华民国政府鉴于苏联以军事援助中共、未使东北主权完整并且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废止该条约，其所有条款概无效力，并与联大谴责苏联干涉中国内政。

1950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再度否决苏联排斥中华民国代表权案。9月，联合国第五届大会，否决印度、苏联牵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建议。

1952年，中华民国政府以苏联“违约”为由，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苏案”，并经大会决议通过。

1952年10月13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蒋中正做《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蒙古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定条约和附件。

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的，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 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 外蒙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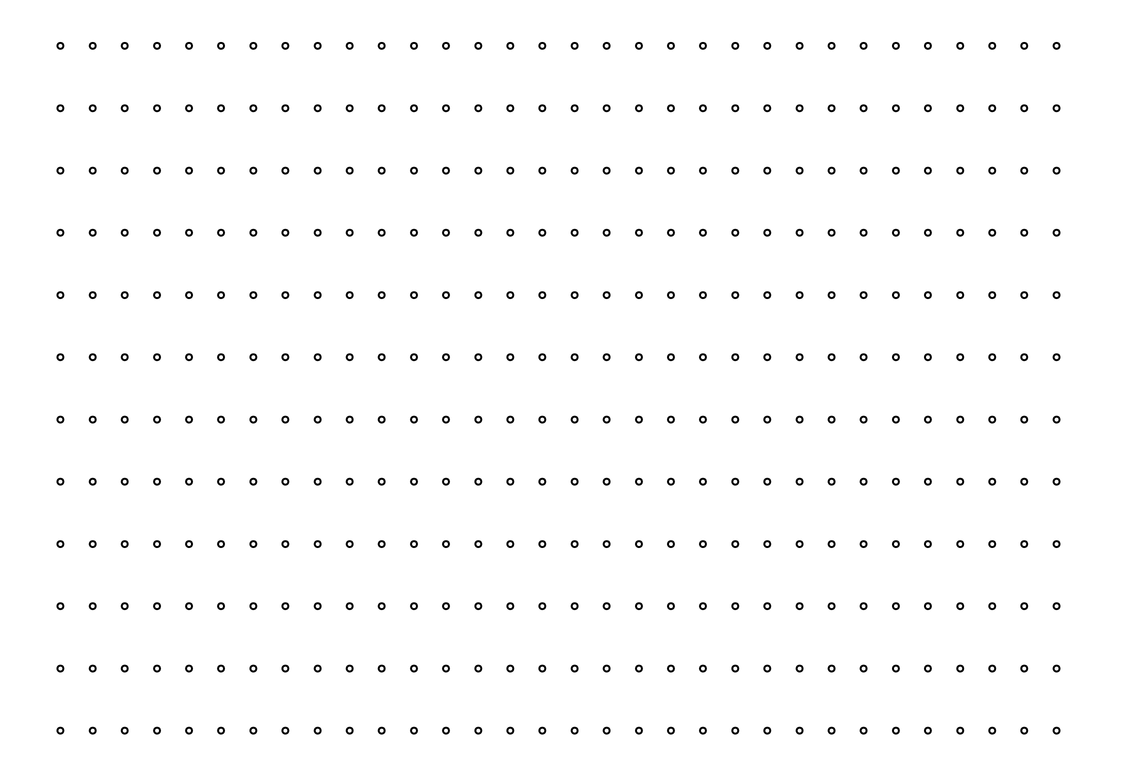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究会归到起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的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1953年2月24日，中华民国立法院表决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月25日，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部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宣布废除该条约，指出：

基于中华民国政府所提出之事实及证据，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常会于四十一年二月一日（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通过决议案谴责苏联，指出“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就日本投降后对中国之关系而言，实未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签订之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此种背信违约之举，已使中国及中国人民受有严重之损害与不堪言状之痛苦。 由于苏联不顾其在中苏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下之义务，继续对中国进行侵夺、敌对之行动，意图完全剥夺中国人民为一自由独立民族之权利。苏联此种行动，迄今尚在进行之中，而其狂妄暴戾之程度与日俱增，从而严重威胁东亚及世界之和平及安全。在此种情形下，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该约及其它有关文件既因苏联之行动而归于无效，中国自有权解除其所受该约及其它有关之文件约束，爰正式宣告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之中华民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为无效。中华民国政府并保留中国及其他国家人民对于因苏联违反该约及其他有关文件所受之损害向苏联提出要求之权。



。。。。。。。。。。。。。。。。

https://www.rfi.fr/cn/%E9%A6%96%E9%A1%B5/20120528-%E4%B8%A4%E4%BB%BD%E4%B8%AD%E8%8B%8F%E5%8F%8B%E5%A5%BD%E5%90%8C%E7%9B%9F%E6%9D%A1%E7%BA%A6%E5%8D%8F%E8%AE%AE%E9%99%84%E4%BB%B6

两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协议附件

（转自《历史解密网》2012年3月26日）

国民政府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协议附件

签名：王世杰 斯大林

1、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宗国地位；苏联必须在1950年前撤走在外蒙古境内的所有驻军。苏联同意中国政府对蒙古的驻军，但其驻军不能用来反对苏联。苏联强烈要求25年以内中国政府同意外蒙古举行公民表决，由

联合国监督表决的公平性。

2、中华民国政府声明对外蒙古有不可质辩的主权，中国政府1950年10月10日恢复对外蒙古驻军，用于保护领土完整，不用于反对苏联，在同一时间实行蒙古高度自治。中华民国政府同意100年以内让外蒙古人民举行公民表决，由联合国监督表决的公平性。

3、双方同意就蒙古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双方同意就东蒙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4、苏联同意无条件撤走苏联驻东三省所有武装力量。同意中国政府恢复原苏殖民地大连主权；……苏联承认中国对海参威的主权，苏联同意在50内以内撤走苏联驻海参威所有武装力量。

5、中国政府将在1995恢复对海参威的主权，并开放海参威为自由港，对苏联免税。

6、双方同意就海参威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7、苏联承认乌苏里江江北64屯为中国领土。苏联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中国主权。

8、中国声明图门江出海口是中国主权，为了中苏友好，图门江对苏联开放。

9、中国政府将保留继续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权力……

10、苏联拒绝中国对科叶群岛的主权要求，但原意同中国政府就所有领土纠纷进行谈判。

11、中苏两国一致同意乌苏里江江面主权中苏各二分之一

新中国中苏友好条约附件1949年中苏友好条约附件协议

签名：周恩来 安 扬 维辛斯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

2.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所以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乌苏里江江北64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1945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

4.乌苏里江江域北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南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

5.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

6.双方同盟一致反对国民党，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

。。。。。。。。。。。。。。。。。。。。。。。。。。。。。。。。

。。。。。。。。。。。。。。。。。。。。。。。。。。。。。。。。

。。。。。。。。。。。。。。。。。。。。。。。。。。。。。。。。

。。。。。。。。。。。。。。。。。。。。。。。。。。。。。。。。

。。。。。。。。。。。。。。。。。。。。。。。。。。。。。。。。

。。。。。。。。。。。。。。。。。。。。。。。。。。。。。。。。

。。。。。。。。。。。。。。。。。。。。。。。。。。。。。。。。

。。。。。。。。。。。。。。。。。。。。。。。。。。。。。。。。
。。。。。。。。。。。。。。。。。。。。。。。。。。。。。。。。
。。。。。。。。。。。。。。。。。。。。。。。。。。。。。。。。
。。。。。。。。。。。。。。。。。。。。。。。。。。。。。。。。
。。。。。。。。。。。。。。。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82

法规名称：　终 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

签订日期：　民国34 年08 月14 日

终止日期：　民国42 年02 月25 日

沿革：1.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于莫斯科签订；并于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效；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告废止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愿以同盟及战后善邻合作、加强苏联与中国素有之友好关系，又决于此次世界大战抵抗联合国敌人侵略之斗争中，彼此互助，及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彼

此合作，以迄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又为两国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之利益，对于维持和平与安全之目的表示其坚定不移之合作志愿，并根据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联合国共同宣言，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签字之四国宣言及联合国国际组织宪章所宣布之原则，决定签订本条约，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

两全权代表业经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约定条款如左：

第一条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第二条缔约国担任不与日本单独谈判，非经彼此同意不与现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弃一切侵略企图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缔结停战协定和约。

第三条缔约国担任在对日本作战终止以后共同采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及破坏和平之可能。

缔约国一方如被日本攻击不得已而与之发生战争时，缔约国他方

应立即尽其能力给予该作战之缔约国一切军事及其他之援助与支持。

本条一直有效，以迄联合国组织经缔约国双方之请求，对日本之再事侵略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

第四条缔约国之一方，担任不缔结反对对方之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之任何集团。

第五条缔约国顾及彼此之安全及经济发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第六条缔约国为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

第七条缔约国为联合国组织会员之权利及义务，不得因本条约内所有各事项之解释而受影响。

第八条本条约应于最短可能时间批准，批准书应尽速在重庆互换。

本条约于批准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倘缔约国任何一方不于期满前一年通知愿予废止，则本条约无限期继续生效；缔约国任何一方得于一年前通知对方终止本条约之效力。

为此两国全权代表将本条约署名盖章，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中文俄文各缮两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王世杰(签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全权代表

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莫洛托夫(签字)

附件

外交部叶部长公超之声明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实行其对中国之侵略计画之过程中，已一再违反前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署之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文件。

基于中华民国政府所提出之事实及证据，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常会于四十一年二月一日通过决议案查悉：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自日本投降后对中国国民政府在东三省恢复中国主权之努力，始终横加阻挠。并以军事及经济上之援助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反叛中国国民政府；」并断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就其日本投降后对中国之关系而言，实未履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签订之友好同盟条约。」

苏联此种背信违约之举，已使中国及中国人民受有严重之损害与不堪言状之痛苦。

查在中苏外交关系断绝之前，中华民国政府曾作多次努力，以期将此项关系，置于与上述条约之文字及精神俱属符合之基础上，俾东亚国际关系之稳定，得以确保，然虽有此项努力，苏联依然不顾其在该约及联合国宪章下之义务，继续对中国进行侵夺敌对之行动，意图完全剥夺中国人民为一自由独立民族之权利。苏联此种行动，迄尚在进行之中，而其狂妄暴戾之程度与日俱增，从而严重威胁东亚及世界之和平及安全。

在此种情形下，中华民国政府认为该约及其他有关文件既因苏联之行动而归于无效，中国自有权解除其所该约及其他有关文件之约束，爰正式宣告

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之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

及其他有关文件为无效。中华民国政府并保留中国及其他人民对于因苏联

违反该约及其他有关文件所受之损害向苏联提出要求之权。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86

法规名称：　终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

签订日期：　民国34 年08 月14 日

终止日期：　民国42 年02 月25 日

沿革：1.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中华民国政府全权代表王世杰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全权代表莫洛托夫于莫斯科签订；并于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效，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告废止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愿

使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

国行政当局之关系符合两国间现存之友谊精神与同盟关系起见，议定各条

如左：

一苏联军队因军事行动之结果进入中国东三省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在作战地带于作战所需之时内，属于苏联军总司令。

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复之领土执行左列任务：

甲在敌人业已肃清之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

乙协助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间之合作。

丙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军总司令之积极合作，并依据苏联军总司令之需要及愿望，待予地方当局指示，俾得有此效果。

三为保证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间之连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中国军事代表团驻于苏联军总司令部。

四在苏联军总司令最高权力下之地带内，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收复区域之行政机构，应经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与苏联军总司令保持联系。

五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并经由其军事及民政机关给予苏联军总

司令一切协助及支持。

六所有在中国领土内属于苏联军队之人员，均归苏联军总司令管辖；所有中国籍人民，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此项管辖权并包括中国领土内之人民对苏联军队犯罪过之案件。此项案件如发生于军事行动地带内时，则属例外，应归苏联军总司令管辖。遇有争执之案件，由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协议解决之。

七关于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之财政事项，应另定协定。

八本协定于本日所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时，立即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俄文各缮成二份，中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订于莫斯科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全权代表

王世杰(签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全权代表

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莫洛托夫(签字)

附件纪录

斯大林统帅与宋院长子文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一日第五次会谈时曾讨论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领土撤退之问题。

斯大林统帅不愿在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之协定内，加入在日本战败后三个月内将苏联军队撤退一节，但斯大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

宋院长询及撤退完毕需要若干时间。斯大林统帅谓彼意撤军可于不超过两个月之期间内完竣。

宋院长继询是否确在三个月以内撤完。斯大林统帅最多三个月足为完成撤退之期。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

王世杰(签字)

莫洛托夫(签字)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83

法规名称：　终 中华民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友好同盟条约之换文

签订日期：　民国34 年08 月14 日

终止日期：　民国42 年02 月25 日

沿革：1.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签换；并于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效；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告废止

换文(一)

(甲)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

部长阁下：

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业于本日签订，本部长兹特申明两缔约国间之谅解如左：

一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联政府

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

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

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

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

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关于上列各项所述之谅解，倘荷

贵部长函复证实，本照会与

贵部长复照，即成为上述友好同盟条约之一部分。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签字)

(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

部长阁下：

接准贵部长本日照会内开：

『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业于本日签订，本部长兹特申明两缔约国间之谅解如左：

一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二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关于上列各项所述之谅解，倘荷

贵部长函复证实，本照会与

贵部长复照即成为上述友好同盟条约之一部分。』

等由；本部长兹特声明上项谅解正确无误。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

王世杰（签字）

换文（二）

（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照会

部长阁下：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批准后，发生拘束力。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八月十四日

西历一九四五年

王世杰(签字)

(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莫洛托夫部长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照会

部长阁下：

接准阁下照会内开：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

准后，发生拘束力。』

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

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

本部长顺向

贵部长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长世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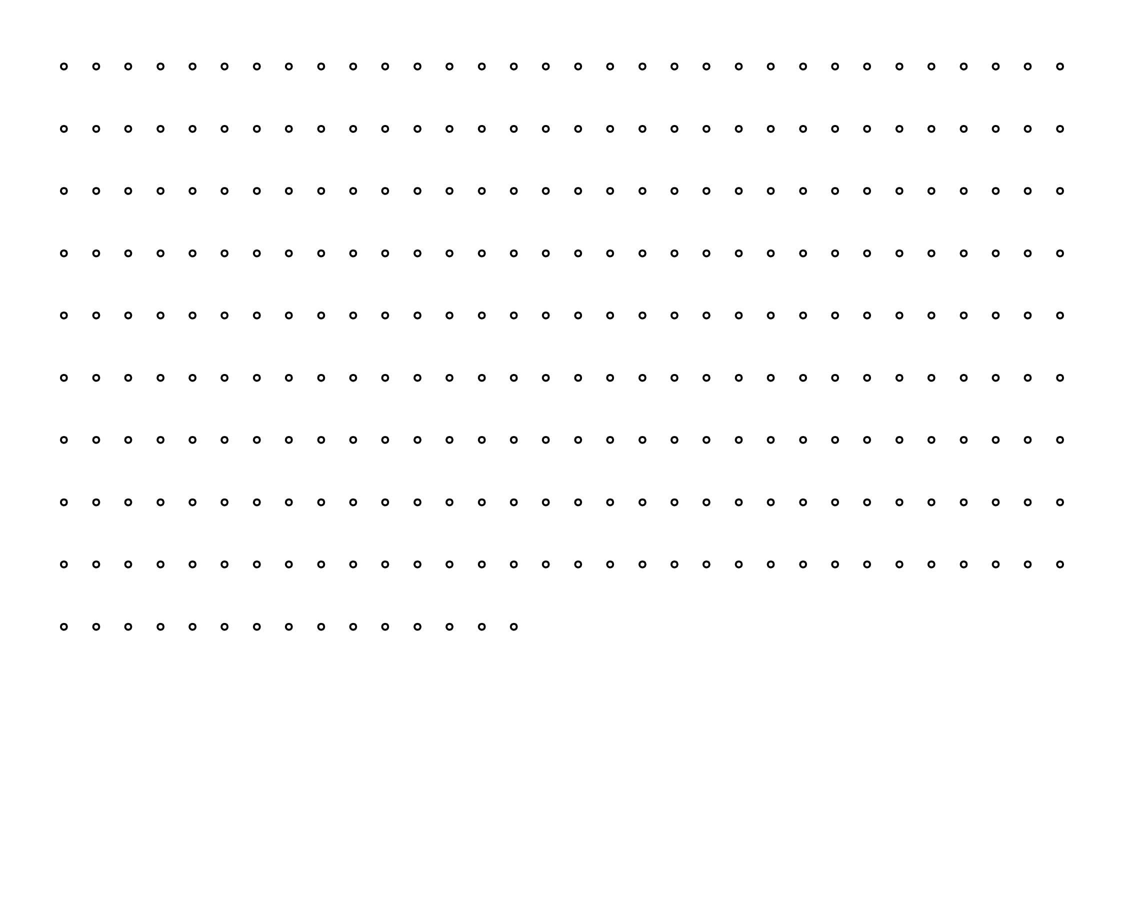
西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莫洛托夫(签字)

。。。。。。。。。。。。。。。。。。。。。。。。。。。。。。。。

。。。。。。。。。。。。。。。。。。。。。。。。。。。。。。。

。。。。。。。。。。。。。。。。。。。。。。。。。。。。。。。。



——————————————————————————————————————

国共内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45%E5%B9%B4%E5%9B%BD%E5%85%B1%E5%86%B2%E7%AA%81

1945年国共冲突指的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为争抢接受日军投降和抢夺物资而发生的军事战争。主要由上党战役、平绥战役、平汉战役、津浦战役以及山海关阻击战组成。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率先全国所发动的上党战役而引发的第二次国共内战；同时，当年华北地区南北纵向铁路（主干线津浦，平汉等）遭到中共全面破坏。

另外，苏联斯大林政权的态度对中国国共内战的加剧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二战结束后，由于苏联控制了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趁机欲接管满洲，以便能更好的与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继续展开武装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深冲突，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如此，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满洲回国之前，依然为中共抢占满洲的真空地带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例如苏联红军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将领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苏联将掳自日军之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使用，其中有步枪30万枝、轻重机枪4,836挺、大炮1,226门、战车369辆、飞机925架、汽车2,300辆、驿马17,497匹。此外，日军各补给站库存野炮1,436门、机枪8,989挺、卡车3,078辆、马104,777匹、特种车815辆、补给车21,084辆。前苏联克格勃将军苏多柏拉托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中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这些战略进攻期间，苏联于1948年特意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计划，他们想以此转移美国对中国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将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减少美国对敌视中共的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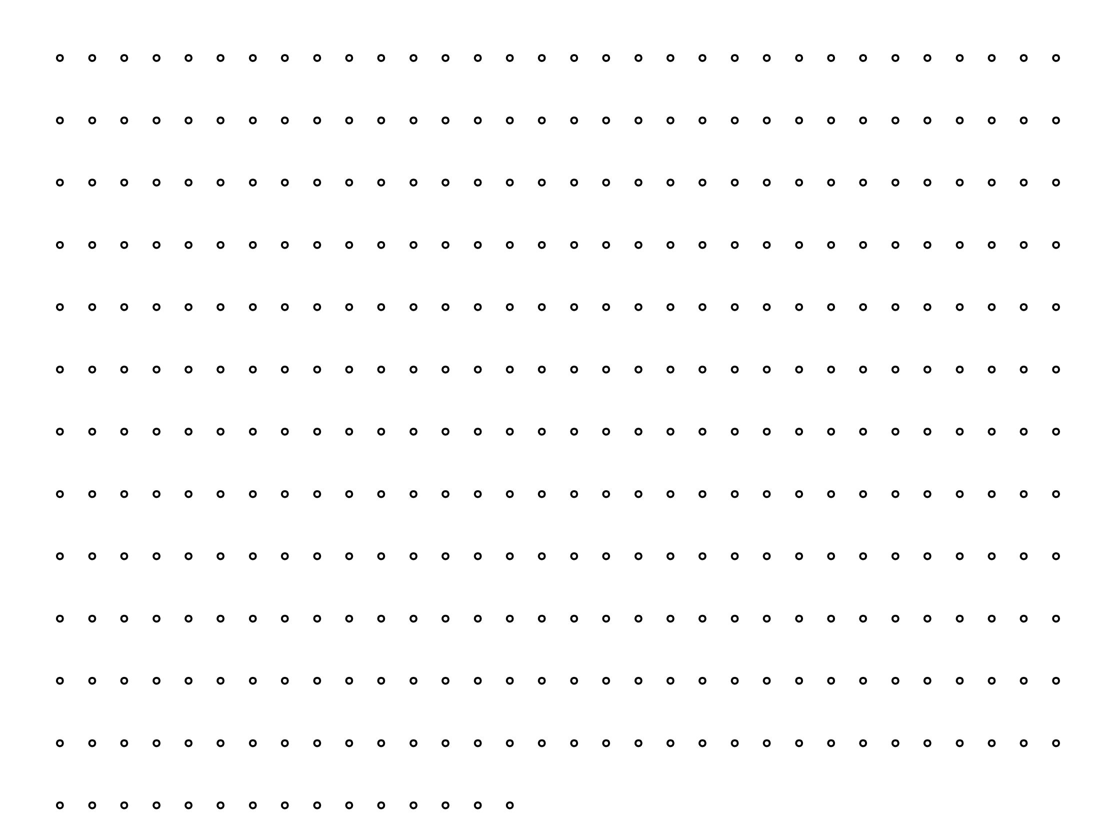
民国三十四（1945）年八月中旬以来，蒋介石就命令国军沿平绥、同蒲、

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推进受降。其中，傅作义部队则沿平汉线已逼近张家口。为了延迟国军向华北和东北推进，中共除全面破坏华北纵向铁路外，另命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发起上党战役，晋察冀军区举行了平绥战役阻止国军北上。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中共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此指示的含义是，向南防御就是打击和阻止国军向北推进接受日军投降，因此中共在华北大规模破坏主要的铁路交通线。向北发展就是完全控制察哈尔，热河，发展和控制东北。此时中共陆续派遣十名中央委员（含四名政治局委员），二万名干部，十一万大军挺进东北，刘少奇还特意嘱咐，派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带武器，一律穿便装，打扮成劳工模样，“你们要赶快去抢”。10月11日，刚从重庆签署和平协议返回延安的毛泽东更订下完全占领东北的详细计划，“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为配合中共占领东北，苏联红军则采取各种措施。渤海湾苏联军舰默许并提供情报协助山东地区的共军直接赴辽东半岛。10月12日，东北苏军司令部就撤军问题与国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谈判，拒绝国军从大连登陆。10月18日，又阻止运送国军的美舰在葫芦岛登陆，由此被迫在秦皇岛登陆。随后在进发到山海关遇到中共阻击，酿成军事冲突。政治协商会议由此被迫延期。10月14日，苏军又突然搜查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封锁了东北行营。次日，苏军派人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我们过去要你们谨慎，那么现在，你们应“以主人自居，放手干”。还说，东北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都可以给共军，你们用这些武器弹药去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国府被迫将东北行营迁至山海关。

产党联盟在北伐战争中崩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Civil_War

中国内战是指中国国民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至1949年之间的持久而间歇性的战争。（1）1927年8月至1937年，国民党-共产党联盟在北伐战争中崩溃，国民党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2）从

1937年到1945年，敌对行动被制止，第二次国共合作。（3）内战随着日本的战败而恢复，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至1949年的战争的最后阶段占据了上风，这通常被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在1911年革命、清朝崩溃之后，在袁世凯担任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总统之前，中国陷入了短暂的内战时期。新成立的政府以北京为首都，被称为北洋政府。随后，袁世凯短暂的、试图称帝的尝试失败了。袁世凯于1916年去世后，前北洋军的不同派系之间发生冲突；随后几年，中国政治充满内斗和军事混战。（在袁世凯去世前，同盟会/国民党虽然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性胜利，但其领导人宋教仁被蹊跷地刺杀）。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了新政府，通过一系列运动来抵制北洋政府的统治。

孙中山试图从几个国家获得援助，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在1921年求助于苏联。为了政治上的便利，苏联领导人提出了对孙中山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双重支持政策。因此，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就开始了中国的权力斗争。

1923年，孙与苏联代表阿道夫•乔夫（Adolph Joffe）（即，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保证苏联将为中国的统一提供援助。《孙越宣言》是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合作的宣言。共产国际特工米哈伊尔•鲍罗廷（Mikhail Borodin）于1923年到达中国，以按照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协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合并。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组成了国共之间的第一次统一战线。

1923年，孙中山派遣了蒋介石（他的同盟会时代的中尉之一）在苏联首都莫斯科进行了数月的军事和政治考察研究。到1924年，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并以孙中山的继任者的身份升为国民党领袖。

苏联为该军校提供了许多教育材料，组织和设备，包括弹药。他们还提供了许多群众动员技术方面的教育。在这种帮助下，孙能够筹集了一支专门的“党的军队”，他希望以此来在军事上击败军阀。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也出现在军校里，其中许多人成为了讲师，包括被任命为政治讲师的周恩来。

共产党员被允许个人加入国民党。当时的共产党本身还很小，在1922年只有300个成员，到1925年只有1,500个成员。到1923年，国民党至少有50,000个成员。

但是，在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后，国民党分裂为左翼和右翼。国民党成员担心苏联人试图使用中国共产党从内部摧毁国民党。然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反对北伐战争，在党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

然后，在1927年3月，国民党举行了第二次党派会议，苏联人帮助通过了反对北伐和遏制蒋介石政权的决议。不久，国民党将被清楚地分裂。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派钱和间谍

来支持中国共产党。没有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可能会失败。有文件显示，当时中国还有其他共产党，其中一个党有多达10,000名成员，但它们都在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失败了。

北伐军和国共分裂

1927年初，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竞争导致了革命队伍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已经决定将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从广州转移到武汉，那里共产党的影响力很强。然而，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军队击败了军阀孙传芳，向东、向江西转移。左派人士拒绝了蒋介石消除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的要求。蒋介石谴责他们通过接受苏联的命令而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4月7日，蒋介石和国民党其他几位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提出，共产党的活动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破坏，必须对之取缔，才能使得国民革命继续进行。4月12日，在上海，由于共产党人的武装暴动所造成的威胁，按照国民党白崇禧将军的命令，数百名共产党员被逮捕和处决。中国共产党将此称为四一二事件或上海大屠杀。这一事件扩大了蒋介石与控制着武汉国民党左翼派别的领导人汪精卫之间的裂痕。

最终，国民党的左翼也将中共党员赶出了武汉政府。国民党恢复了北伐北洋军阀的运动，并于1928年6月占领了北京。不久以后，中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南京中央政府迅速得到国际承认，成

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根据孙中山主义宣布了革命的三个阶段的方案：军事统一，政治监护和宪政民主（军政、训政、宪政）。

共产主义叛乱（1927-1937）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发动起义，反对武汉的国民党政府。这场冲突导致了红军的成立。8月4日，红军主要部队离开南昌，向南前往广东进攻。国民党势力迅速重新占领了南昌，而中共在南昌的其余成员则躲藏起来。中国共产党在8月7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确认了该党的目标是武力夺取政权，但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很快在8月8日被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党政府镇压。8月14日，蒋介石宣布他的临时退位，而国民党的武汉派和南京派再度结盟，其共同目标是在较早之前的分裂后，统一起来，并共同压制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后来试图占领长沙，汕头和广州等城市。由叛乱的前国民革命军士兵和武装农民组成的红军控制了中国南部的几个地区。国民党部队继续试图镇压叛乱。然后，在9月，汪精卫被迫离开武汉。9月还发生了一次以毛泽东为首的、失败的、农村武装起义，称为秋收起义。10月，鲍罗廷经蒙古返回苏联。11月，蒋介石去了上海，邀请汪精卫加入自己的行列。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起义，第二天在那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在张发奎将军的指挥下，到12月13日，反攻广州胜利，苏维埃政权败亡。12月16日，汪精卫前往法国。此时（1927年），在中国有三个首都以及相应政权：——国际公认的首都北京；国民党左翼以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武汉；和国民党南京政权。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南京将成为被广泛承认的、并得到国际唯一认可的、国民政府的首都。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十年武装斗争的开始，该斗争在中国大陆被称为“十年内战”，以1936年西安事变而告终，当时蒋介石被迫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以进行抗日战争。

1930年，由于国民党的内部冲突，爆发了中原战争。它是由冯玉祥，阎锡山和汪精卫发起的。

同时，国民党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一系列的五次围剿运动中，从而试图消除共产主义活动的残余地带。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剿失败了；第三次围剿战役因九一八事件而中止。第四次围剿战役（1932-1933）取得了一些初步成功，但是当他们试图进攻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心脏地带时，国民党的军队受到了严重损失。在这些战役行动中，国民党部队能够迅速进入共产主义地区，但却很容易被广大的乡村所吞没，无法巩固自己的立足点。

最终，在1934年末，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战役，其中涉及以坚固的堡垒战对江西苏维埃地区进行有计划的包围。与以往的一次性进攻、深入渗透的战役不同，这次国民党部队耐心地建造了堡垒，每座堡垒相隔约八公里（五英里），以包围共产主义地区并切断其补给和食物来源。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利用堡垒连线中的虚弱区域（那里由蒋介石的军阀盟军，而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来管理）突围了包围圈。军阀军由于害怕失去自己的士兵而不愿向共产党部队发起挑战，因此他们并不热衷于追逐中国共产党。

此外，国民党主要部队被用于全力消灭张国焘的军队；张的军队比毛泽东的军队大得多。

共产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撤退，历时一年；根据毛的估计，有12500公里（25,000里）； 它被称为长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率领下进行的军事撤退，以逃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或攻击。它由一系列撤退行动组成。在此期间，南方的许多共产党军队向北方和西方逃脱。

在从江西撤退的过程中，由一个没有经验的军事委员会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方面军，被基本歼灭；这是因为，蒋介石在江西有着坚固的据点。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挥下，共产党“经过了西部和北部的盘旋迂回撤退路线，据说行走了370天，穿越了9,000公里。”该路线先向西行驶，然后经过中国西部最困难的地形，然后向北行驶至陕西。1935年11月，在陕北定居后不久，毛泽东正式接任周恩来在红军的领导职务。在正式改组职位之后，毛泽东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当中国共产党到达陕西内部时，长征结束了。张国涛的军队沿着中国西北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被蒋介石及其中国穆斯林同盟马家军集团的军队摧毁。一路走来，共产党军队没收了当地军阀和地主的财产和武器，同时试图招募农民和穷人，巩固其对群众的吸引力。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长征时的90,000-100,000人，到陕西时，中共只剩下7,000-8,000人。张军的残余分子最终在陕西加入了毛泽东，但是由于他的军队被摧毁，即使张本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成员，张也从未能向毛泽东的权威提出有效挑战。本质上，大撤退使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国民党动用了康巴土匪的部队与共产党红军作战，并削弱了经常拒绝与共产党部队作战以保持自身实力的地方军阀。国民党招募了300支“康巴土匪”加入四川军，这是中央政府为渗透和破坏刘文辉等当地军阀的努力的一部分。政府试图对边境地区施加全面控制，以对抗地区军阀。刘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实力而拒绝与共产党战斗。康巴的部队曾与红军作战，但当他们的宗教领袖被共产党俘虏时被击败。

1936年，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张学良暗示他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这被共产国际在苏联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张学良在党外活动更有利于共产党）。后来，周劝服张和另一个军阀杨虎城，策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软禁，被迫停止对红军的袭击，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日本的威胁上。

（1929年中国的局势：北伐以后，国民党直接控制了华东和中部，而中国其他地方以及满洲都在名义上忠于国民党政府的军阀的控制下。）

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

【第一次中日战争则是指清末甲午战争】

在日本对满洲的入侵和占领期间，将中共视为更大威胁的蒋介石拒绝与他们结盟对抗日军。蒋介石更愿意通过首先消灭军阀和中共军队来团结中

国。他认为，国民政府仍然太虚弱，无法发动进攻以赶出日本，而且中国需要时间来进行军事建设。统一以后，国民党才有可能发动对日战争。因此，他宁愿无视中国人民对关于日本的妥协政策的不满和愤怒，并命令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针对共产党的镇压；但是，他们的省级部队在与红军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大人员伤亡。

1936年12月12日，心怀不满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密谋绑架蒋介石，迫使他与中国共产党休战。该事件被称为西安事件。双方都暂停了战斗，组建第二次联合阵线（第二次国共合作），以集中精力与日本人作战。1937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其装备精良的部队击败了中国北方和沿海的国民党的卫国者。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只是名义上的。与国民党军队不同，中共军队回避常规战争，转而对日军进行游击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实际合作与协调水平其实非常低。在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日本占领线后方（即，那些没有被日本人直接统治、而由日本傀儡政权如满洲国和南京汪精卫傀儡政府所管理的地区）竭力争夺各自的“领土优势”。

1940年末和1941年初，共产党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激化，内斗局势达到了顶点。（在北方，贺龙的部队袭击并歼灭了忠于国民党的一支抗日部队）。在南方，蒋介石于1940年12月要求中共新四军撤离安徽和江苏省，这是由于中共新四军在该地区挑衅和骚扰国民党军队。第二年，新四军在撤离期间被国民党军队伏击，导致数千人死亡。它也结束了第二次联合阵线（即，第二次国共合作），该阵线是为抗击日军而早些时候、1937年成

立的。

随着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冲突加剧，美国和苏联等国家试图防止灾难性的内战。新四军事件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派出特使劳克林·居里，向中国人表示，唯一能从内战中受益的人将是日本人。苏联与中共关系更加紧密，于1941年向毛泽东发送了命令电报，警告说内战将使日军的处境更加轻松。由于国际社会的努力，出现了暂时的、表面的和平。蒋介石在1943年以《中国的命运》一书攻击中共，思考抗日战争以后中共的权力发展。而中共强烈反对蒋介石的领导，并称其政权为法西斯主义者；试图为其营造负面的公众形象。

总的来说，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是有利的。由于国民党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国民党必须保卫国家、开展抵抗日本的主要战役，这对蒋介石及其部队来说代价高昂。1944年，日本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豫湘桂会战（一号战略攻击行动），导致蒋介石的军队被严重削弱。中国共产党则因其游击战术而损失很少。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红军已有超过130万名成员，另外还有超过260万名成员的民兵。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华北等地区约有1亿人居住。

战后立即冲突（1945-1946）

根据美国规定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日本部队被命令向国民党部队而不是向某些占领区的中国共产党投降。然而在满洲，国民党没有军事力量

存在；日本投降了苏联。蒋介石命令日军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接受国民党受降、而不向共产党交出武器。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在重庆举行了第一次战后和平谈判，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参加了该谈判。该谈判以签订《双十协定》作为结束。双方都强调了和平重建的重要性，但会议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结果。即使和平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双方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直到1946年1月达成协议。不过，中共与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大规模战役和全面对抗暂时得以避免。

（1945年9月至10月上党战役中，共产党向国民党阎锡山的、准备向日军受降的部队发起攻击。）

在东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月，苏军对满洲和中蒙边境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满州战略进攻行动。这次行动在短短三周之内摧毁了关东军，并让苏联在中国当地军队的全部权力真空中占领了整个满洲。结果，驻扎在该地区的70万日军投降苏军。当年晚些时候，蒋介石意识到，他缺乏资源来阻止共产党在预定的苏联撤离后接管中国满洲。苏联拒绝了国民党军队穿越其占领区域（山海关以及旅顺大连）的要求。然后，国民党军队被空运前往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主要城市，而农村已经由中共控制。1945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开始了一场运动，以防止中国共产党加强其本已强大的基础。苏联人花了额外的时间有系统地拆除广泛的满洲工业基地设备（价值高达20亿美元），然后将其运回自己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

1945-46年，在苏联红军占领满洲期间，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指挥马洛夫·马里诺夫斯基元帅（Marion Rodion Malinovsky）向毛泽东提供被俘获的大部分日军武器。

蒋介石的部队在1945年11月26日之前推进到了锦州，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随后，共产党军队对山东半岛的攻势大获成功；山东半岛大部分区域均落入共产党控制手中。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停火协议破裂。中国随后进入持续了三年多的激烈内战状态。

共产主义革命战斗（1946–1949）

到第二次中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增强。他们的主要部队增至120万部队，另外还有200万民兵，共计320万部队。1945年，他们的"解放区"包含19个基地地区，其中包括该国领土的四分之一和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城镇。此外，苏联将其所缴获的所有日本武器和大量自备物资移交给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也从苏联人那里获得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支持。

1946年3月，尽管蒋介石多次提出要求，但在马里诺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苏联红军继续推迟撤出满洲，而马里诺夫斯基则秘密地告诉中共军队：——当苏军撤退以后，中共立刻进驻；从而引发了中国内部的关于控制东北的全面战争。这些有利条件也促进了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许多变化：更激进的强硬派系想要全面军事接管中国。共产党内强硬派最终占据了上风，

并击败了谨慎的机会主义者。

在控制共产党领导人之前，3月27日，苏联外交官请求与满洲国民党建立工业发展合资企业。

尽管马歇尔将军说他不知道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武器是由苏联提供的，但中国共产党事实上能够利用日本人遗弃的大量武器，包括一些坦克；不过，直到大量的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被打败、并投降和加入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才终于能够全面掌握和使用手中的重型军事设备。

然而，尽管军事硬件处于劣势，中共的最终王牌还是其土地改革政策。中国共产党继续向广大无地而挨饿的农民作出具有难以抵抗之吸引力的承诺，即，通过为中国共产党而战，一旦赢得胜利，他们将获得自己的土地来种庄稼。

这一战略使中共能够为战斗和后勤目的获得几乎无限量的人力；尽管在整个战争中许多人员伤亡惨重，但人力仍然大量涌入。例如，仅在淮海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就动员了534万农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占领了先前被日本帝国军夺取的大部分银行，工厂和商业物业。他们还以更快的速度从平民百姓招募部队并囤积补给品，为与共产党的战争做准备。这些匆忙而艰苦的准备给上海等城市的居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时，上海的失业率为37.5％。

在“贝莱格行动”中，约有50,000名美国士兵被派往湖北和山东的守卫地

点。美国装备并训练了国民党军队；美军将日本兵和韩国人运送回国；帮助国民党军队占领原日本统治区、并控制共产党所在地区。根据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 ）的说法，美国的援助包括大量的多余军事物资，并且向国民党提供了贷款。在抗日战争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从美国获得了44.3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军事援助。

战争爆发

战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失败后，两党之间的内战又恢复了。这一战争阶段在中国大陆和共产主义史学中被称为"解放战争"。

1946年7月20日，蒋介石以113个旅（总计160万部队）对华北共产党领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标志着中国内战最后阶段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知道他们在人力和设备上的劣势，因此执行了"被动防御"战略。它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强势部队，并准备放弃领土以保卫其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周围的乡村和小镇早在城市之前就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还试图尽可能消灭国民党军队。这种策略似乎是成功的。一年后，势态对中国共产党更加有利。他们消灭了112万国民党士兵，而他们自己的力量却增长到大约200万人。

1947年3月，国民党夺取了中国共产党的首都延安，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共产党随后进行了反击；1947年6月30日，中共军队越过黄河，迁往大别山地区，恢复并发展了中原地区。同时，共产主义力量也开始对东北，华北

和华东地区进行反击。

到1948年下半年，中共最终占领了沉阳和长春等北部城市，在夺取东北各城市时遭受了许多挫折以后，通过决定性的“辽沉战役”胜利，从而掌握了对东北的控制权。被视为国民党最好的“新一军”，是在中共对长春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残酷包围之后，被迫投降；在此次长春围困战中，超过15万平民因饥饿而死亡。

在东北战役中，对国民党大型军队的俘获，为中共提供了执行长城以南进攻行动所需的坦克、重型火炮和其他复合式武器设备。到1948年4月，洛阳市沦陷，国民党军队从西安撤离。经过激烈的战斗，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9月24日占领了济南和山东省。1948年末和1949年初的淮海战役为中国共产党占领了中东部地区。这些战役的结果对内战的军事局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平津战役导致了共产党对中国北方的征服；——从1948年11月21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张家口、天津以及大沽和北平的港口和驻军时遭受了重大人员伤亡。中国共产党从东北地区调遣了890,000名士兵，以对抗约60万国民党军队。仅在张家口，就有4万名中共部队士兵伤亡。而中共则最终在战役中打死、打伤或俘获了约52万国民党军队士兵。

（国民党撤退到台北：国民党在南京失利之后，他们接下来搬到广州，然

后搬到重庆，成都，最后是西昌，然后才到达台北。）

在辽沉，淮海和平津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消灭了144个常规和29个非常规的国民党师，包括154万国民党士兵，这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斯大林最初赞成战后中国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并试图说服毛泽东、阻止中国共产党横渡长江、阻止共产党进攻江南的国民党阵地。毛拒绝了斯大林的立场，并于4月21日开始了长江渡河运动。

4月23日，他们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民党政府撤退至广州，直至10月15日；然后又迁至重庆、成都、西昌，最后12月7日撤退到台湾。

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南部向南方追击国民党军队的残余人员；只剩下西藏没有被共产党军队攻击。此外，从1944年至1949年，伊犁叛乱是苏联支持下的、第二次东土耳其共和国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起义叛乱政权。在北塔山事变期间，国民党政府派遣了一支中国穆斯林回族第14骑兵团，在边界沿线攻击蒙古和苏联阵地。

战斗尾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了的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其在北平的首都，回到了以前的名称“北京”。解放军进入四川省之后，蒋介石和大约200万国民党人员于12月从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岛。大多数抵抗力量在1949年12月10日成都沦陷后崩溃了，一些抵抗力量继续在南部地区扩散。

中共试图夺取国民党控制的金门岛，但在金门战役中遭到挫败；这阻止了解放军向台湾的进军。1949年12月，蒋介石宣布台北为临时首都，继续声称民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机构。

共产党人在1950年进行的其他两栖作战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共产党人于1950年4月征服了海南岛，在广东沿岸占领了万山群岛（1950年5月至8月），在浙江沿海夺取了舟山岛（1950年5月）。

后果

在1945年至1949年的战争阶段，共产主义军队遭受了130万人的战斗伤亡：260,000人丧生，190,000人失踪，850,000人受伤（不包括非常规战斗部队人员）。国民党一方则有5，452，700名（常规战斗部队人员）和2，258，800名（非常规战斗部队人员）伤亡。

大多数观察家预计蒋介石的政府将最终被人民解放军入侵台湾而消灭；而美国最初不愿在蒋介石的反共立场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于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将不会介入任何涉及台湾海峡的争端，并且不会在中国共产党发动袭击时进行干预。但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局势迅速改变。这导致了美国政治气候的变化，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航行到台湾海峡，作为遏制措施的一部分，抵抗共产党潜在的攻台举措。

中国内战结束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指控苏联违反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叛乱，从而颠覆中国合法政府；联合国大会在1952年2月1日通过的第505决议中谴责苏联。

政治影响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驱逐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曾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蒋介石代表拒绝承认其作为中国代表的资格，因此离开了会场。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其他成员国也很快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到1984年，中国和中华民国开始通过彼此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来降低敌对程度，此后两岸贸易和投资一直在增长。中华民国于1991年正式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尽管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但双方从未签署任何协议或条约正式结束战争。

毛泽东认为，在继续进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存在三种"在短期内制止帝国主义干预"的方式。首先是通过迅速完成对该国的军事接管，并表现出决心和力量来抵制"外国企图在中国边界上挑战中国的新政权"。第二个是"与苏联组成全面的军事同盟"，这将使苏联有能力直接保卫中国以抵抗敌人。在冷战开始的背景下，这方面变得十分重要。最后，第三，该政权必须"铲除其国内反对派：——包括反动会道门，宗教团体，秘密社团组织，独立社会组织，少数民族组织等"。

共产主义胜利的原因

历史学家拉纳·密特（Rana Mitter）得出的结论是，“ 1945年的中国政府被与日本的战争从根本上摧毁了”。

历史学家奥德·阿德·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说，共产党人赢得内战是因为他们犯的军事失误比蒋介石少，而且因为蒋介石在寻求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时与中国太多的利益集团对立。此外，他的政党在抗日战争中被削弱。同时，共产党人针对农民等不同群体，将他们带到了自己的身边。

蒋介石在1948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开封沦陷后，我们的情况恶化了，而且变得更加严重。我现在意识到，在整个历史上，我们的国家不断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外部敌人，但由于内部的瓦解和腐烂。”

在中国内战中，尽管苏联（和苏军所控制下的朝鲜北部地区）在口头上不支持共产党军队，但它们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事实上的支持。他们提供了军事后勤保障、运输、和帮助部署共产主义战士以打击国民党，也为其运送病人和伤员；把满洲国军队和日军投降的武器都交给中国共产党；朝鲜派出一支军队对抗国民党等；陈云说：“他们竭尽所能为我们提供帮助；我

们得到了苏联和朝鲜的支持。”

国民党收到的美国支持，被失败的马歇尔使命所对冲；然后完全停止；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家庭所控制的、臭名昭著的长江开发公司）以及国民党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挫折。

共产主义土地改革政策向贫苦农民许诺了土地，确保了人民解放军的民众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优势是其领导高层内部的“非凡凝聚力”。这些技能不仅可以避免在困难时期发生的叛逃，而且还可以进行“战术上的交流和顶层辩论”。毛泽东的超凡魅力的领导风格造就了国民党所缺乏的“目的统一”和“指挥统一”。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操纵地方政治的手段，以从中获益。这也源于他们的宣传技巧；这些技巧也已经成功地“群众化”。其宣传技巧的中心是在于“将对手描绘成所有中国人的仇敌”并将其本身描绘成“（在与日本战争背景下的）国家和人民的捍卫者”。

在1945年后的中国内战中，由于恶性通货膨胀以及中华民国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失败和金融改革失败，中华民国地区的经济崩溃。1948年末，金元大幅贬值，导致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同时，共产党人继续进行不懈的土地改革（土地再分配）计划，以赢得农村人口的支持。

战争进程

中国内战（第一阶段，1927-1937年）

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战

1927年–南昌起义

1927年–秋收起义

1927年–广州起义

1930–1931年–第一次包围运动

1931年–第二次包围运动

1931年–第三次包围运动

1932年–第四次包围运动

1933年至1934年–第五次包围运动

1934–1936年-长征

1935年– 泸定桥战役

第二次中日战争，1931-1945年

1931年–奉天事件（九一八事变）

1931–1932年–日本入侵满洲

1931年–江桥战役（黑龙江）

1931年–嫩江大桥的抵抗

1932年–哈尔滨防御

1932年– 1月28日事件

1931–1942年–满洲国的太平洋化

1933年–长城防御

1933年–热河战役

1933–1936年–内蒙古的行动

1936年– 绥远战役

1937年–卢沟桥事件

1937年–北平–天津战役

1937年–上海战役

1937年–北平至汉口铁路（京汉线）作战

1937年–天津至浦口铁路（津浦线）作战

1937年–平型关战役

1937年–忻口战役

1937年–太原战役

1937年–南京战役

1938年–徐州战役

1938年–台儿庄战役

1938年–武汉之战

1938年–万家岭战役

1939年–海南岛行动

1939年–南昌战役

1939年– 随枣会战

1939年–长沙战役

1939年–桂南之战

1939年-昆仑关战役

1940年–枣阳—宜昌战役

1940年–百团大战

1940年–湖北中部行动

1941年–上高之战

1941年–鄂西行动

1941年–晋南之战

1941年–长沙战役

1942年–长沙战役

1942年– 同古战役

1942年–仁安羌战役

1942年-浙赣战役

1942年–云南缅甸之战

1943年–鄂西战役

1943年–北缅甸与云南西部之战

1943年-常德战役

1944年– 日军一号战略攻击行动

1944年–长沙战役

1944年–桂林—柳州之战

1944年–松山战役

1945年–豫西西部–湖北北部战役

1945年–湘西战役

1945年–第二次广西战役

1945年-苏联入侵满洲

中国内战（第二阶段，1945-1949）及其后果

1945年

7月21日- 8月8日–爷台山战役

8月13日至19日–苏南战役

8月13日至16日–鄂东反攻

8月15日至23日–宝应战役

8月16日至19日–雍家镇战役

8月17日至27日–天门战役

8月17日至25日–平玉战役

8月17日– 9月11日–临沂战役

8月24日–五河战役

8月26日至27日–尹集战役

8月26日– 9月22日–淮阴淮安战役

8月29日– 9月1日–兴化战役

9月1日至13日–大中集之战

9月4日至5日–灵壁战役

9月5日至8日–诸城战役

9月5日至22日–商河战役

9月6日至9日–离石之战

9月7日至10日–平度战役

9月8日至12日–泰兴战役

9月10日– 10月12日–上党战役

9月13日至17日–无棣战役

9月18日–响水口战役

9月21日–如皋战斗

9月29日– 11月2日–蔚广暖战役

十月–时村战役

10月3日– 11月10日–盐城战役

10月17日– 12月14日–桐柏战役

10月18日–后马家战役

10月22日– 11月2日–邯郸战役

10月25日– 11月16日–山海关战役

10月26日至30日–大同至蒲州铁路沿线战役

1947年11月– 4月–镇压中国东北土匪的战役

11月3日至4日–界河镇战役

12月19–21日–邵伯战役

12月19日至26日–高邮–邵伯战役

12月21日至30日–塘头郭村战斗

1946年

1月19日至26日–侯马战役

3月15日至17日–四平战役

4月10日至15日–金家屯战役

4月17日– 5月19日–再次四平战役

6月22日– 8月31日–华北平原战役

6月12日– 9月1日–大同至蒲州铁路南段的攻势

7月31日– 9月16日–大同济宁战役

8月10日至22日–陇海线战役

8月14日– 9月1日–大同一蒲州战役

8月21日– 9月22日–淮阴淮安之战

8月25日– 8月–如皋黄桥战役

9月2日至8日–定陶战役

9月22日至24日–临浮战役

10月10日至20日–张家口卡尔甘战役

11月10日至11日–南洛北洛战役

1947年11月22日– 1月1日–吕梁战役

1947年12月17日– 4月1日–临江战役

1947年12月31日至1月30日–关中战役

北塔山事件

1947年

1月21日至28日–保定南部战役

4月24日至25日–娘子关战役

4月27日至28日–堂二里战役

5月13日至16日–孟良崮战役

5月13日– 7月1日–中国东北地区1947年夏季攻势

5月28日至31日–合水战役

1948年6月11日至3月13日–四平战役

6月26日– 7月6日–保定北部战役

7月17日至29日–南麻战役

8月13日至18日–子午岭战役

9月2日至12日–（河北）大庆河以北战役

9月14日– 11月5日– 1947年中国东北部的秋季攻势

10月2日至10日–萨河山战役

10月29日– 11月25日–伏牛山脉东麓战役

1948年12月15日至3月15日– 1947年冬季进攻东北

12月7日至9日–凤凰顶战役

1948年12月9日至6月15日–西部泰安战役（东进战役，淮海战役序曲）

1948年12月11日– 1948年1月–大别山的反围剿战役

1948年12月20日至6月6日-京山钟祥战役（湖北）

1948年

1月2日至7日–公主屯战役

3月7日– 5月18日–临汾战役

3月11日至21日–周村-张店战役

5月12日– 6月25日–河北-热河一察哈尔战役

5月23日– 10月19日–长春围困战

5月29日– 7月18日– 兖州战役

6月17日至19日–上蔡之战

9月12日– 11月12日–辽沉战役

10月5日至1949年4月24日–太原战役

10月7日至15日–锦州之战

10月10日至15日–塔山战役

11月6日–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

11月15日– 1949年1月11日–九连山战役

11月22日– 12月15日–双堆集战役

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

1946–1948年–北塔山事件

1949

1月3日至15日–天津战役

4月– 1950年6月–镇压华北土匪的战役

4月– 1953年6月–镇压中国中部和南部土匪的战役

5月12日– 6月2日–上海战役

5月17日– 6月16日–咸阳战役

8月9日至27日–兰州战役

8月9日– 1953年12月–镇压华东土匪战役

8月24日-1951年9月9日-镇压福建土匪战役

9月5日至24日–宁夏战役

9月5日至1950年3月3日，镇压大别山土匪战役

10月25日至27日–古宁头战役

11月至1953年7月–镇压中国西北土匪的战役

11月1日至28日–南川县北部战役

11月3–5日–登步岛之战

11月17日– 12月1日–博白战役

12月3日至26日–镇压连阳土匪战役

12月6日至7日–梁家水战役

12月7日至14日–连阳战役

12月17日至18日–剑门关战役（成都战役）

1950年

1月– 1955年6月–镇压武平土匪战役

1月15日至1951年5月5日-镇压广西土匪运动

1月19日至31日–八面山战役

年2月– 195312月–镇压中国西南部的土匪运动

2月4日– 12月–镇压龙泉土匪运动

2月14日至20日–天全战役

3月3日–南澳岛之战

3月5日– 5月1日–在海南岛登陆

3月29日– 5月7日–新疆伊吾战役

5月11日–东山岛战役

5月25日– 8月7日–万山群岛战役

8月9日–南鹏岛之战

9月– 1951年1月–镇压粤北土匪战役

9月22日– 11月29日–镇压黔东北土匪运动

10月15日至11月–镇压湖南-湖北-四川边境地区土匪的战役

10月15日– 12月–镇压湘西土匪运动

12月13日– 1951年2月13日–镇压十万大山土匪的战役

12月20日– 1951年2月20日–镇压六万大山土匪运动

1950–58

国民党在中国的伊斯兰叛乱活动（1950年至1958年）

1951年

1月8日– 2月–镇压瑶山土匪战役

4月15日-9月–镇压桂西土匪战役

1952年

4月11日至15日– 南日岛战役

6月13日– 9月20日–镇压黑水土匪运动

9月20日– 10月20日–南澎群岛之战

1953年

5月29日–大鹿山群岛之战

7月16日至18日–东山岛战役

1955年

1月18日至20日– 一江山群岛之战

1月19日– 2月26日–大陈群岛战役

1960年

1961年11月14日至2月9日–在中缅边境举行的战役

暴行

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共产主义者都进行了大规模暴行，双方故意杀害了数百万非战斗人员。本杰明·瓦伦蒂诺（Benjamin Valentino）估计，中国内战中的暴行在1927年至1949年之间导致180万人至350万人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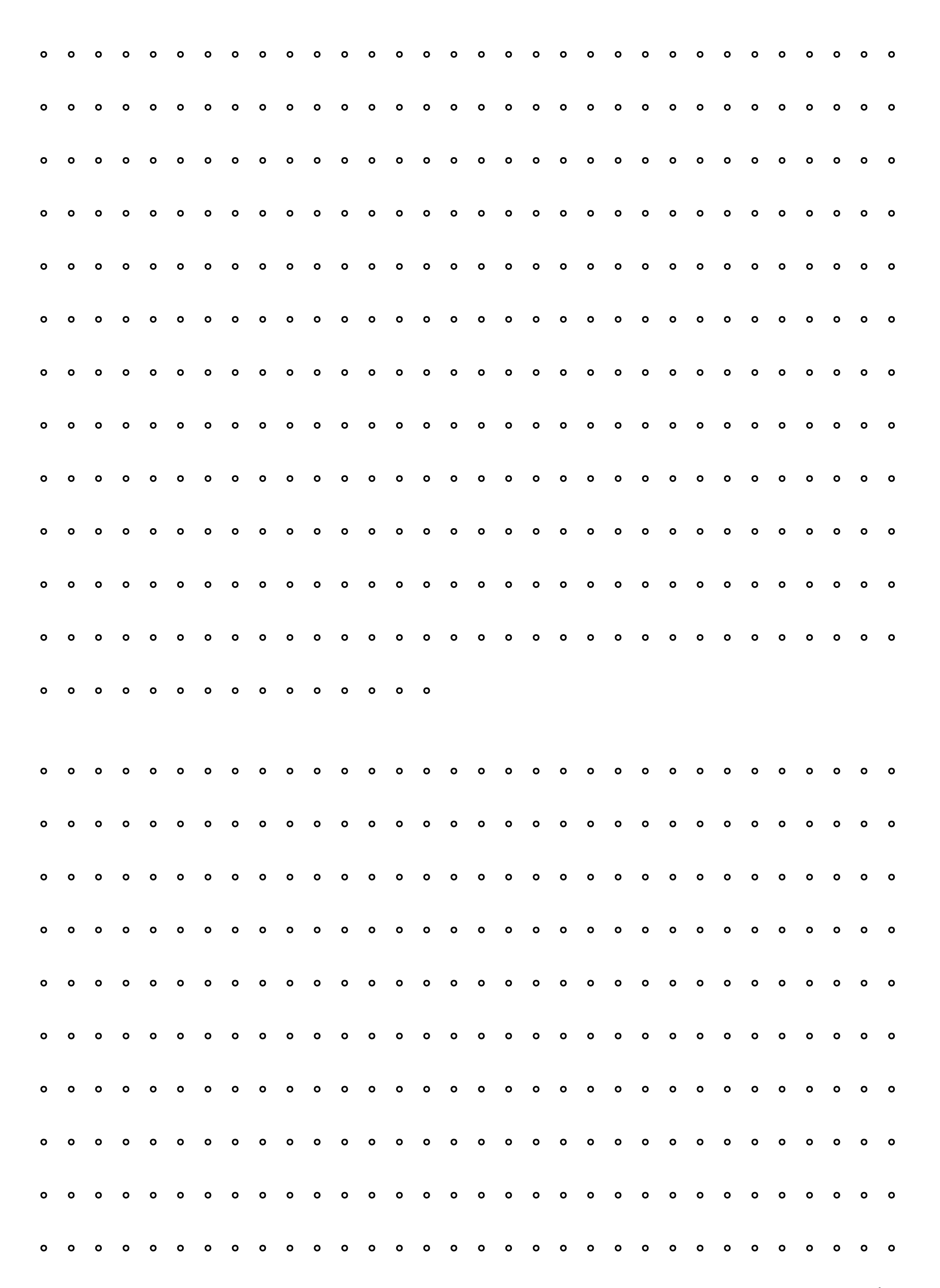
共产主义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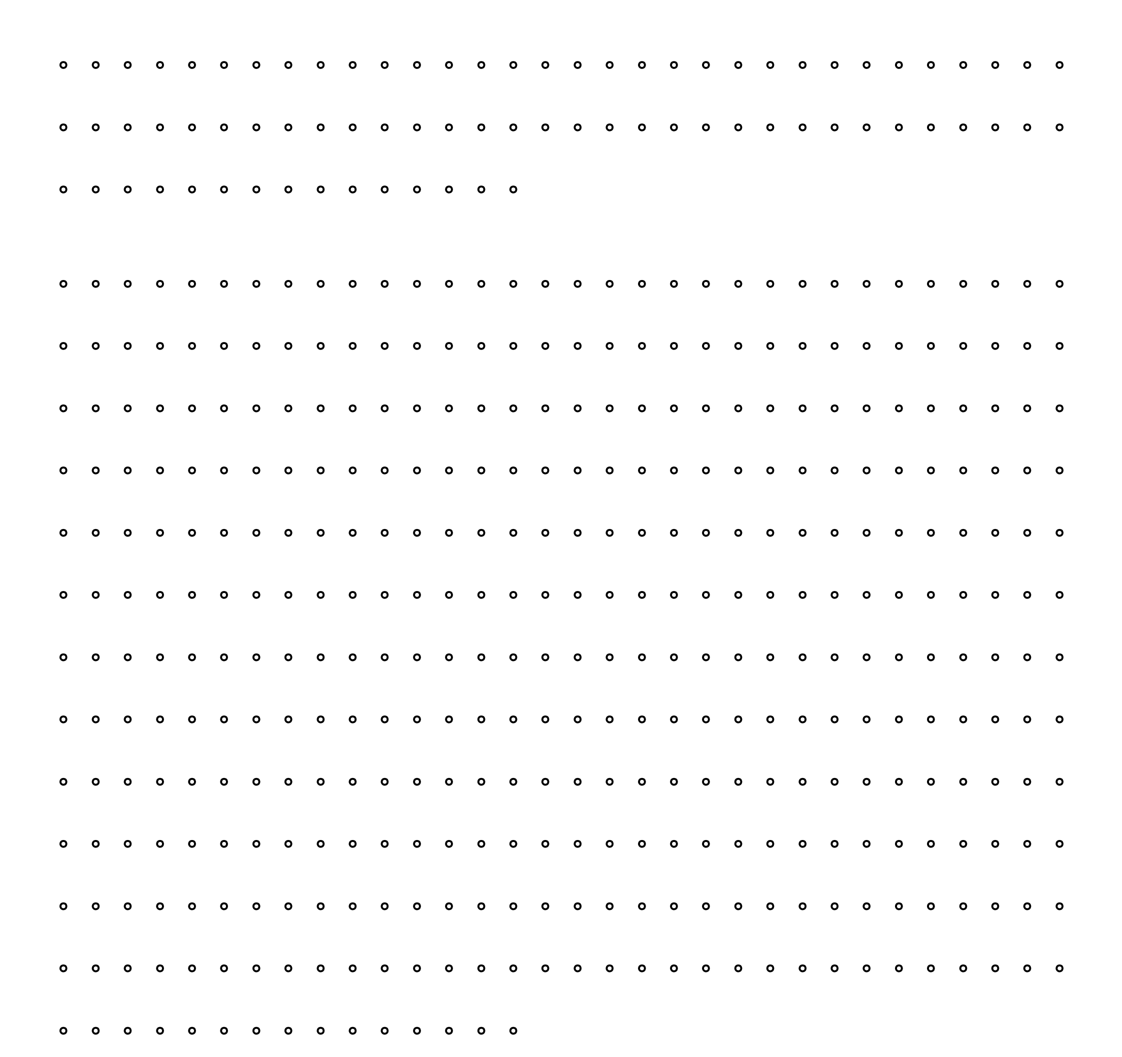
在长春围困战期间，解放军实行的军事封锁，防止这个城市中的平民从封锁期间离开城市。这种封锁导致该城中150，000平民因饥饿而死。之后，解放军继续在整个东北地区使用这种攻城战术。

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开始敦促采取激进政策，动员中国反对地主阶级。1946年7月7日的指令，引发了长达18个月的激烈冲突，其中，所有富农和所有类型的地主财产都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贫困农民。党的工作队迅速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将人口分为地主，富人，中产阶级，穷人和失地农民。

1947年10月的《土地大纲法》使得这种冲突更加暴力化；那些被谴责为地

主的人被活埋，肢解，勒死和开枪射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5%B1%E5%86%85%E6%88%98

国共内战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境内爆发的内战，也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内战。内战的一方为1947年行宪之前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与行宪后为民选的中华民国政府，另一方为中国共产党所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数个割据政权。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年至1937年间之第一次国共内战，第二阶段则是1945年至1950年大致结束之第二次国共内战。其为中国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两次内战，最终取得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取代原有的中华民国国家体制，而中国国民党则与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相隔台湾海峡两岸政治分立与军事对峙的局面，而双方自1979年1月1日起完全停火，并于1987年开始两岸交流。

1925年，主张联俄容共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与中共以及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导致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出现裂痕。在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发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两党矛盾激化。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上海宣布清党；同年7月，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国共两党正式决裂。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开始武装夺权，并先后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及数处革命根据地，与定都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28年12月，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后，自1930年起先后5次围攻共产党在南方之根据地。1934年，在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国军攻占当时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迫展开逃亡，于1935年抵达陕北。19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同意停止内战，达成合作抗日协议，中国工农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中国共产党统治的陕甘宁边区则在名义上由国民政府直辖。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之间的矛盾因裁军、行宪与联合政府等议题

再度凸显，导致双方爆发连番军事冲突。共产党将其掌握的武装力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后，共产党在东北与华北取得军事上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国民党在1947年结束训政、将以党治国的国民政府改组为行宪之中华民国政府、将国民革命军改组为中华民国国军，颁布动员戡乱令，并以推行金圆券等金融改革措施提振当时尚处战后疲弱的中国经济，尝试以改革换取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支持，但改革失败反使国民党民心尽失。1949年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停火谈判但告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第一大城上海，并渐次夺取绝大部分的中国疆域。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更名后的北京成立，而随着国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辗转于1949年12月撤退至台湾台北。自1955年大陈岛撤退后，中华民国政府有效统治范围限缩至台澎金马与部分南海诸岛。双方最后的地面战役为1961年中缅边境的江拉之战，而游击战则一直持续到1975年。1979年双方海上冲突停止后大致维持相隔的台湾海峡分治的统治格局，并于1987年开始两岸交流。

。。。。

内战根源及背景

中国国民党之政治主张经其前身“兴中会”到1920年代发展，在北伐战争时期形成，以孙文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主的指导思想，力图于民族、民权、民生等领域上，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达到中

国之统一民主富强。其终极目标为建立一个以西方民主社会为范例的、军队国家化、政治实现民主的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之政治主张从1921年建党以来，经历巨大变化。平均地权是两党根本分歧。最初主导思想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数次失败后，参考列宁斯大林的苏联模式，逐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即毛泽东思想。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何时最终定型，内容如何形成，现在并无证据支持。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政以后，其政治纲领也经历数次较大变化。

另一方面，国共双方都有发展自身武装力量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被北洋军阀把持。由于北洋政府军力强大，孙文意识到，国民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就没有可能成功革命。所以国民党自改组起，便从苏联引进党指挥枪模式，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国民党的武装力量通过北伐战争彻底推翻北洋政府统治，于1928年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北伐战争过程中，国共关系逐渐恶化。1927年8月1日从南昌起义开始，共产党也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试图夺取政权。至此，两党都各自掌握自己的军队，内战于焉展开。

第一次国共内战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两党矛盾

1920年8月，孙文在广州宣布重组护法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但其与曾为立宪派的陈炯明在政见上发生冲突，终于引发六一六事变。孙文回到上海后势单力薄，需要重新借助外界力量的支持。这时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与北洋政府谈判未果，与吴佩孚联系又遭到拒绝，到达上海与孙文会晤后一拍即合。双方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开始了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而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未有自身的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对苏联方面言听计从，在城市革命上更需要友党的支持，也就跟随苏联开展国共合作。陈炯明被多路军阀击败后，孙文被迎回广州，建立起大元帅府，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协助下重组国民党架构，组建黄埔军校，苏联在军事上也多有支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此时也达到了高潮。中国共产党党员甚至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此源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黄埔军校的不少学生也加入中共。

但孙文去世之后，苏联利用中共将国民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国民党中的实力派势力担心靠苏联和共产国家支持并领导的中共靠掌控党政要职逐渐坐大。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在国民革命军中发表北伐必败论，并于广州市区散发传单，反对北伐统一。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会议讨论北伐问题，并通过反对北伐统一的决议。

1927年3月10日，由苏联全权领导掌握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介石方案。同时为防止蒋独揽专权，会议缺席选举汪兆铭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并决议不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改为7人集体领导，免去原来由蒋担任的上述职务，将蒋降为普通委员。

国民党右派与中共以及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产生矛盾，国共合作开始产生裂痕，国民党加速分化为不同派系。西山会议乃是国民党右派开始排斥共产主义的标志。及至1926年5月11日中山舰事件，以及蒋中正在国民党的地位上升，中共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中共与国民党各派决裂，并被请出中国国民党。苏联及中共改组国民党成布尔什维克党的计划破灭。由于没有本党的军队就难以存续，中共几年后便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国民党武力清党

中山舰事件后，由于和蒋中正产生政见上的分歧，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12月，中国国民党左右派正式分裂，鲍罗廷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927年2月，汪精卫回国途经苏联，会见斯大林。回国后，汪精卫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中正排共，坚持容共，4月5日和中共领袖陈独秀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4月12日，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中正武力清党，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蒋中正遂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是为宁汉分裂。蒋中正下令“清党”，清除国民党内中共党员，并在各地大规模捕杀中共分子。

5月中，经李宗仁及朱培德斡旋，武汉及南京避免开战，决定分头继续北伐。月底，共产国际决议改变中共方略，准备武装工农成立新军，进行土地改革；但仍留在国民党内，使国民党及武汉国民政府成为工农革命独裁

机构。与此同时，中共在湖南开展流血的土地改革，斗争地主，使国民党不少军官不满，终与何键发生冲突；何键、朱培德等亦开始清共，是为“马日事变”。事变中，中共及倾共民众死亡达数百到一千余人。7月13日，中共发表宣言，声明因武汉广东之复杂关系，中共党员应退出国民党。7月15日，汪精卫识破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夺权计划，决定与南京方面主动进行和平分共，同时召开紧急会议，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之中共党员立即声明脱离中共，否则停止其一切职务。

南昌起义及冲突加剧

1927年8月1日，中共周恩来、刘伯承、叶挺、贺龙（其时非中共党员，为国民党左派成员之一）等发动南昌起义（国民党视之为暴动），建立红军，即中国工农革命军。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装部队。8月4日，红军放弃南昌，南下广东，国共首次武力冲突爆发。8月7日，中共召开八七会议，确定武力夺取政权，第一次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早在之前，即7月15日，汪精卫武汉政府大肆逮捕处死中共党人，实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蒋中正下野，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复合（共产党称之为宁汉合流）。

9月，桂系军阀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南京国民政府大权，汪精卫下野。同月，毛泽东在湖南、江西发动秋收起义。10月，汪精卫到广东否定南京政府，鲍罗廷经蒙古回苏联。11月，蒋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北上。12月11日，中共在叶挺、叶剑英领导下发动广州起义。12月12日，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广东国军将领张发奎调动军队反攻，12月13日，红军失败，被迫撤离广州。12月16日汪精卫辞职赴法国。

自1927年建军后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展开土地改革，并多次与国军战斗。这段时期，中国国民党称为“剿匪”、“剿共”，中国共产党则称为“土地革命战争”、“十年内战”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30年起，国民党先后对中共位于江西、湖南之控制区实行五次围剿，前四次未能成功。红军通过运动战，成功守卫南方根据地。但在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在德国顾问建议下步步为营，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进攻红军；加上中共方面因为采用了共产国际派驻顾问李德的错误策略，损失惨重。红军主力被迫自江西瑞金转进至陕西延安；中共称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国民党则称为“流窜”），同时，一部分红军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但在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后，成功突破国军重重封锁。途中，中共召开遵义会议，毛泽东重获军事领导权。最终长征的红军在仅余少量部队的情况下到达延安。

结束

1936年，周恩来与中华民国陆海军副元帅张学良交往甚密，张学良甚至还提出申请加入共产党，最后被共产国际拒绝。后来周恩来多次力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逼迫蒋中正停止剿共。最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停止与共产党作战，第一次国共内战结束。

抗日战争时期的缓和期

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冲突趋于缓和，这段缓和期中共称之为“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7月17日，蒋中正在庐山发表讲话，表明了中国对日本退让的底线以及准备全面抗战的态度。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会议中毛泽东称中共之真正任务，关于军事问题，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持久战。红军之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1937年9月，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所直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地区红军约4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依抗战序列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战场；另约8000名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抗战期间，国民党主要与日军主力进行正面作战，中共则在沦陷区开展游击作战。中国与日本发生22次大型会战和上万次中小战斗。其中有国军与少数八路军将领擅自协同参与的平型关战役。中共也有单独的对日作战如百团大战。国共之间曾爆发多次冲突，影响最大者，当属“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结束时，红军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260余万人，解放区拥有约一亿人口。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7年3月10日，中共首都留守处人员从南京返回延安3天后，国军胡宗南兵团从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进攻。

1945年8月起开始的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方面称为“解放战争”，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则称为“动员戡乱”或“抗共卫国戡乱战争”。

抗战后局势（1945年－1946年）

抗日战争结束后，因为国军与共产党部队冲突加剧，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谈判内容主要是投降日军接收，共产党部队与国军的合并，共产党战后的参政议政等问题。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决定在年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国共两党与民盟、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等代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五个决议案，一致同意在和平建国纲领下，共同实现民主宪政。但实际上双方冲突未有结束。2月底，虽受反苏运动等因素影响，国共双方仍达成整军方案，统一将国共军队整编为中国国防军。协定划定全国驻军服务区，各军队集结在此统一整编；整编以12个月为一期，分期缩编部队，直到完成全国60个师的目标。3月底，国共达成迄今最后一个正式协议——东北停战协定，但对东北内战无实际约束。

二战结束后，由于苏联控制了中国满洲（中国东北）及蒙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毛泽东欲接管满洲，以便能更好地与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继续展开武装斗争。而斯大林则为了避免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冲突的进一步加剧，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决定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如此，苏军于1946年在撤离满洲回国之前，依然为中共抢占满洲的真空地带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例如苏联红军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将军林彪的东北野战军。

全面内战（1946年－1947年9月）国军全面进攻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国共双方边打边谈，在东北、中原、华北等处展开争夺。1946年一月停战令之后，军事冲突暂息数月；同年3月，苏联自东北撤军，中国共产党随即迅速占领重要据点并阻止国军北上，导致4月时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六月停战令前后，山东和中原地区再度爆发冲突，中国共产党将此视为全面内战起始点。同年11月15日，在共产党与民盟的抵制下，国民党与青年党、民社党等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并于该年12月25日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三路兵力，集结在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周围。国民党为迎接制宪国大，下达了第四次停战令，但对军队无实际约束力。11月19日，周恩来所率的中共代表团结束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初，国民党应美国特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举行圆桌会谈，解决两党争端。中共认为国民党没有诚意，中共

南京代表陆定一回应，“废除伪宪法（指中华民国宪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国共谈判破裂。1月29日，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对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的关系，放弃国共调处工作，退出三人会议，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驻军调部的人员。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6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美军人员撤退。2月底，国民党下令在南京、上海、重庆之中共留守处代表于3月5日前撤离首都卫戍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重庆警备司令部，分别致电函京沪渝中共代表，所有中共人员限期全部撤退，并关停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1947年3月15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主持，出席中央委员146人，候补中央委员46人，列席各地党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68人；蒋致开幕词，称“中共全面叛乱……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为捍卫国家统一，保障人民安全，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我敢断定，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同时声称实行“民主”，“结束训政”，“改组政府”。3月17日，参谋总长陈诚向三中全会报告军事，历述一年来建军、复员、整军工作之情形及对中共之军事情况，称：“剿匪绝对自信，绝对有把握”，“剿匪应以军事为中心”，“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3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并发表宣言，宣称中国国民党之任务为：完成宪政准备，确立建国规模；消除统一障碍，巩固国家基础。至此，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

1947年3月至9月，共产党军队处于守势，宁可丧失关内所有根据地，也要死守东北；国军则向中共控制区进攻，攻占中共不少城市。由于解放军采

取运动战打击国军，国军屡受打击，还要分兵把守占领城市，机动兵力日益不足。

1947年，中共军队抛弃国军番号，陆续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称“解放军”，国民党方面则称为“共军”。

战局逆转（1947年9月－1950年8月）

1947年9月至1948年9月，解放军开始展开主动攻势，在东北将国军压缩至几个孤立城市，在中原地区则拥有优势地位，对首都南京所在的华中地区形成压迫，国共双方的武力优势逐渐反转。1948年秋季，解放军在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方向发动战略决战，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并取得全部三场战役的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国军总兵力损失150万人以上，精锐兵团几乎全军覆没，除西北外，长江以北的地区几由共产党所控制。与此同时，共产党开始在北方动员十数万名干部南下，以此作为接管南方政权的主要力量。尽管战局对共产党有利，但是农村的南下干部动员却一度十分被动，甚至发生了干部逃亡的现象，反而是城市的失业知识青年更积极地响应共产党的南下动员。

前苏联情报机构将军苏多柏拉托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一书中说，苏联在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这些战略进攻行动期间特意引发“第一次柏林危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计划，他们想以此转移

美国对中国国共内战的战略注意力，将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减少美国对反共的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军的援助力度。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与1948年立法委员选举后行宪，由国民大会选出蒋中正、李宗仁为首任总统、副总统，将国民政府改组为一府五院的中央政府，并在该年9月实施金圆券等经济改革措施，以企图挽救民心。但金圆券在同年底即告失败，造成国民政府统治区内急速地通货膨胀，使经济情势更加混乱。

1949年1月21日，面对军事与经济上的失利，蒋中正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接任后，有意与中国共产党停战。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但中华民国政府无法接受共产党所提出几近投降的国内和平协定，谈判遂于4月20日宣告破裂。北平和谈失败后，解放军随即发动渡江战役，攻下南京、上海等中部大城，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拿下华中与华南大部分地区，国军则不断向东南沿海与西南撤退。9月26日，最后一个西北省份——新疆省倒戈。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后复名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则相继撤退至广州、重庆、成都等城市，最终于该年12月撤退至台湾。

1950年4月西昌战役，解放军攻下西康省的西昌县。1950年8月，解放军夺取万山群岛。

海峡对峙（1950年－1979年）

1950年，解放军一方面逐一攻下沿海岛屿，一方面在福建集中兵力，为渡海攻台做准备。美国则坐视内战结束，台海战事一触即发。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解放军渡海攻台难度倍增。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抗美援朝”之后，原本预备攻台的部队调往朝鲜半岛作战，因此在东南沿海作战暂缓。朝鲜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军统帅麦克阿瑟支持下积极备战，试图反攻，多次尝试突击东南沿海岛屿，如南日岛战役、东山岛战役等，但皆以撤退和失败告终。1953年朝鲜战争正式停火。

1954年12月，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一方面阻止两岸冲突，另一方面也保证对台湾军事援助不再断绝。1955年1月，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失去一江山岛的屏障，中华民国国军在战略考量下，决定不再分散兵力驻守浙江沿海岛屿，转而加强金门与马祖之防备，遂于2月在美军协助下主动撤离大陈岛全数军民。解放军取得大陈岛后，中华民国政府的有效统治范围退缩至台澎金马并延续至今。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对驻守金门之国军发动榴弹炮突击，在四十四天内，向金门射击炮弹几近五十万发。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吉星文、赵家骧、章杰等中弹阵亡。9月2日，中华民国海军沱江号在金门料罗湾附近外海遭到解放军鱼雷艇包围与猛烈的攻击，几乎沉没。9月11日，驻守金门之国军炮击厦门火车站。9月22日，美国八吋大口径巨炮由中华民国海军运抵金门。海军与空军皆有交手。双方皆称胜利。其后十年，除1965年间偶发的东引海战、东山海战和乌坵海战之外，两岸海空军不断有零星交手，

双方各有战损，但大体而言，双方控制领域并无太大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台湾方面的海空军实力强于大陆，针对大陆民船的关闭政策得以长期执行。台湾方面允许海军、空军搜捕、击毁大陆籍船只的法律至1992年才废止。

停火状态（1979年至今）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从1958年开始对大金门、小金门、大胆、二胆等岛屿炮击，国共内战军事冲突告一段落。

1984年，驻扎在金门的中华民国国军因追击海上逃兵庄辉亮，金东师先使用轻兵器后改以105毫米榴弹炮射击，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的草屿，0.19平方公里的孤岛上落弹150余发，造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名战士身负重伤，但中国大陆对此事表示沉默，既未还击，也未抗议。1987年3月7日，烈屿师发生“东岗惨案”，6月破案法办后，蒋经国总统于7月宣布台湾地区解严。

1991年4月22日，中华民国国民大会通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年4月30日李登辉总统以总统令公布。5月1日起动员戡乱时期正式结束，中华民国政府不再视中共为叛乱团体，承认中共政权统治中国大陆的事实，并宣布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1996年中华民国第一次总统直接民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以东南海域为目标，实施弹道导弹试射，中华民国国军均进入高度备战状态。这次危机由美国第七舰队以“经过”之名进入台湾海峡而缓和，但解放军军机“不出海”之默契从此被打破，解放军军机活动范围延伸至台湾海峡中线，压缩了中华民国空军预警时间。

评价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方面认为：自从1911年推翻清朝开始至1949年，中国政局从未稳定，经受着由军阀割据、北洋复辟势力、国共斗争、日本侵华而造成连年战争灾害，可以说中华民国自1912年至1949年间治理时期，一直处于战乱与动乱。面对清朝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国力衰弱的中国，难有和平稳定的治理时期来证明其统治能力。引发社会弊端丛生，人民生活艰苦，国家积弱，政府无暇顾及百姓民生。不过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大致统一中国版图，并且领导中国在对日抗战中取得胜利，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及常任理事国。为当时中国的复兴，有相当贡献。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在民国时期，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重新夺回权利和土地，成为了人民寻求生存权的最直接，最简单的途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特别

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他们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而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分子界，被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视为敌人。

台湾民间

此外，战争造成的结果为中华民国仅能有效控制台澎金马地区，与其法定的领土大相径庭，造成台湾社会对台海两岸现状的定义、以及在国家或民族认同上逐渐分歧或对立，而出现“一台一中（一边一国）”、“一国两府”、“一国两区”、“一中各表”、“一个中华民国”等各种论点，莫衷一是，至今仍是敏感话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台湾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有逐渐降低或消失的趋势，而更加强调与中国大陆无关的台湾主体意识。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5%85%9A%E6%88%98%E5%BD%B9

上党战役又称长治战役，发生于1945年中华民国山西省上党地区（今山西省长治市）境内，是抗日战争结束之际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后发生的首次大规模战役，是1945年国共冲突的一部分，成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序曲。

该战役由中共发动，且发生于重庆谈判期间，意在打击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增加共产党的谈判筹码。这次战役歼灭了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之一阎锡山所属的晋绥军11个师的部队，使得阎锡山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未能对中共发动攻势，并且不得不借助中央军守卫山西。

1945年8月下旬，在华日军向国民政府投降，阎锡山部队第19军史泽波率4个师准备在山西上党地区接受日军投降。但该地区恰好位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分区与太岳分区两区之间，态势孤立。8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

关于各地军事部署的指示中，要求太行军区应即集结主力，“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31日再度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阎部一万六千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据此，刘邓部署了对上党地区(即长治地区)作战行动，准备收复该地区的这六城。集结太行军区主力、陈赓部及冀南一部共约2.8万人进行上党战役。

战役过程

9月10日，中共晋冀鲁豫军区出动太行、太岳、冀南3个纵队攻击阎锡山控制的各个城镇，不出10天，攻克大部分据点。20日，第19军被围困于长治，史泽波固守待援。阎锡山得知长治被围，一方面给史泽波鼓气告其“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另一方面调集第7集团军彭毓斌率领第23军和第83军驰援长治。中共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在白晋线设伏，将支援长治的彭毓斌部包围在了屯留北部山地。10月5日，援军被全歼。阎锡山遂急令史泽波突围。10月8日，史泽波率残部突围南逃，12日在沁水以东被共军拦截消灭，史泽波被俘。

战果

毛泽东在重庆利用中共中央南方局机要电台指挥上党战役，边谈边打。战役至10月12日共军取得完全胜利，晋军共3.5万人被歼，其中3.1万人被俘，损失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各种枪1.6万余支，国民革命军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战死，第19军军长史泽波被俘。

。。。。。。。。。。。。。。。。。。。。。。。。。。。。。。。。
。。。。。。。。。。。。。。。。。。。。。。。。。。。。。。。。
。。。。。。。。。。。。。。。。。。。。。。。。。。。。。。。。
。。。。。。。。。。。。。。。。。。。。。。。。。。。。。。。。
。。。。。。。。。。。。。。。。。。。。。。。。。。。。。。。。
。。。。。。。。。。。。。。。。。。。。。。。。。。。。。。。。
。。。。。。。。。。。。。。。。。。。。。。。。。。。。。。。。
。。。。。。。。。。。。。。。。。。。。。。。。。。。。。。。。
。。。。。。。。。。。。。。。。。。。。。。。。。。。。。。。。
。。。。。。。。。。。。。。。。。。。。。。。。。。。。。。。。
。。。。。。。。。。。。。。。。。。。。。。。。。。。。。。。。
。。。。。。。。。。。。。。。。。。。。。。。。。。。。。。。。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aoshen_campaign

辽沉战役是三大军事行动（连同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之一，使得共产党解放军在中国内战期间成功战胜国民党政府。这场战役在国民党军队在满洲地区遭受惨败之后结束；在此过程中失去了锦州，长春和沉阳等主要城市，最终导致共产党军队占领了整个满洲。这场运动的胜利使共产党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相比于国民党方面获得了战略上的数字优势。

背景

满洲竞争

满洲，在当代也被称为中国东北，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之后，满洲被苏联占领。1946年3月苏联撤军后，国民党和共产主义者都开始在该地区扩张。1947年中国东北的共产党冬季攻势之后，解放军在东北地区进行了相当大的扩充，总作战力量超过了国民党。自内战开始以来，这是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一次。

前奏

1948年1月，以林彪为指挥官的东北共军更名为东北野战军。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的扩张反应犹豫不决，因为卫立煌与蒋介石就东北的国民党战略直接发生冲突。卫认为最好还是“保住现状”，集中精力保卫沈阳和长春，蒋介石则坚持卫撤出这两个城市，将国民党军队集中在锦州-葫芦岛地区，以防止解放军通过山海关进入华北地区。

到1948年春，共产党控制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农村，使沈阳，长春和锦州的国民党军队相互隔离。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了京哈铁路的控制权，切断了通往沈阳和长春的国民党陆路补给线。因此，必须空运给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和不可持续的。

共产党进攻（9月12日至10月20日）

锦州是辽西走廊的"关键点"，辽宁走廊是从满洲到华北平原的主要陆地通道。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向南行驶，并在京哈铁路沿线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从9月12日至9月28日，共产主义部队采取行动切断了从秦皇岛到锦州的国民党补给线。到9月28日，他们已占领绥中，昌黎，塔山和义县，控制了锦州和秦皇岛之间的地区，有效地隔离了锦州。

蒋介石于9月30日抵达北平，与傅作义举行了军事会议。国民党组建了第39、62和92军，以加强锦州，成为"东进军"的一部分，目的是巩固国民党在葫芦岛的阵地。10月2日，蒋介石飞往沈阳，与卫立煌商讨组建"西进军"，并命令廖耀湘与西九军一起加强锦州，以制止共产党对锦州的包围行动。随着国民党战略的新发展，林彪起初犹豫不决是否继续进行共产党对锦州的进攻，但他被毛泽东说服继续进攻。

到10月8日，东北野战军已聚集25万部队，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10月10日至15日，国民党从西部和东部向锦州提供的增援部队正在向共产党接近，但他们在塔山被阻断。对锦州的最终进攻于10月14日开始。第二天晚上，

该城市与城中国民党军队一起被俘获。

长春

进攻前，长春已经被包围了五个多月。自从1948年2月以来，饥饿就已经泛滥，到1948年6月，每天都有大量平民逃离长春。许多难民无法通过共产主义封锁，并且由于国民党的捍卫者阻止难民返回城市而无法返回。尽管有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的驻军仍无法从这座城市突围。锦州沦陷后，驻扎在城市东部的国民党第60军于10月17日叛降共产党。之后，国民党新第七军于10月19日同意投降的条件。长春剩余的国民党军队于10月23日向解放军投降。

国民党反攻（10月21日至28日）

黑山战役

在国民党军队在锦州和长春遭受惨重损失之后，蒋介石打算发动反攻并迅速夺回锦州。他命令廖耀湘和从沈阳进来的第九集团军继续向西进军并进攻锦州。但是，廖和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对这一决定提出了质疑。10月16日，国民党最高统帅部达成共识，决定进攻黑山和大虎山，掩护他们撤退到营口的过程。该决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第10军集团于10月21日对黑山发动了进攻。

共产主义军队成功地保卫了黑山和大虎山，国民党军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第九集团军随后被解放军的主要部队包围并被果断击败。行动中有25,000多名国民党士兵被杀，廖耀湘被解放军抓获。

沈阳沦陷（10月29日至11月2日）

第九集团军被摧毁后，东北野战军于10月29日开始包围沈阳。当这座城市陷入混乱时，国民党第八军团瓦解，指挥官卫立煌于10月30日乘飞机从沈阳逃离。共产党部队于11月1日对沈阳的发动了进攻，国民军守备军14万名士兵，不久后迅速投降。11月2日，营口也被共产主义军队俘虏，国民党第52军乘船近距离撤退。其余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西军，在从葫芦岛撤至天津时设法保留了部分兵力。在东北彻底摆脱国民党力量的影响下，辽沈战役有效地结束了。

后果

辽宁战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来说都是重大的“战略和战术失败”，因为在锦州沦陷后，遏制东北共产党的最初目标失败了。在1945年至1948年之间，蒋介石从中国远征军中选拔了一些最好的部队到东北来对付中共，而其中许多部队在随后的战役中丧生。毛泽东在推动林彪充分参与锦州的最后进攻中的作用提高了毛泽东在中共的声誉。在中共全面控制东北之后，傅作义领导的北平和天津的国民军驻军现在遭到共产党的袭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ngjin_campaign

平津战役于1948年11月29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这场战役标志着国民党在华北平原上的统治结束了。

背景

到1948年冬，中国北方的力量平衡正在向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转移。辽沉战役结束后，由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中共第四野战军进入华北平原，傅作义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和秦皇岛，把部队撤到北平，天津和张家口并巩固这些驻军的防御能力。国民党希望保留自己的实力，并加强正在计划进行中的另一场徐州大战，或者在必要时撤退到附近的绥远省。

前奏

为战役做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停止了第一野战军向太原的前进。当第三野战军从济宁区向北平部署时，对呼和浩特的袭击也被阻止。

战役

1948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张家口发动了进攻。傅作义立即下令

北平国民党第35军和怀来第104军加强增援了这座城市。12月2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开始接近涿鹿。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于12月5日攻占密云，向怀来推进。同时，第二野战军向涿鹿以南推进。由于北平有被包围的危险，傅召回了张家口的第35军和第104军，在被解放军"包围和摧毁"之前回撤并支持北平的防御。

新宝安

从张家口返回后，国民党第35军在新宝安发现自己被共产党武装包围。来自北平的国民党增援部队被共产党军队拦截，无法到达该地。随着局势的恶化，傅作义试图从12月14日开始与中共秘密谈判，但最终在12月19日遭到中共拒绝。然后，解放军于12月21日对这座城市发动了进攻，并于第二天晚上占领了这座城市。第35军司令在共产党军队闯入这座城市时自杀身亡，剩余的国民党军队在试图撤退回张家口时被摧毁。

天津

占领张家口和新宝安后，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1月2日开始在天津地区附近集结部队。在南方的淮海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立即于1月14日对天津发动了最后的进攻。经过29小时的战斗，国民党第62军和第86军十个师的总共13万名士兵被杀或被俘。来自第17军集团和第87军的国民党军队的剩余人员于1月17日从海上撤退至南方。

北平投降

天津沦陷为共产党统治后，国民党驻军在北平被有效隔离。傅作义于1月21

日做出谈判和平解决方案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周，260,000名国民党军队开始撤离城市，以期立即投降。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北平，占领了这座城市，标志着战役的结束。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aihai_campaign

淮海战役开始时，1948年11月6日，人民解放军（PLA）发动了针对设在徐州市的国民党总部的大规模进攻，并于1949年1月10日结束时，解放军到达长江北岸。

背景

1948年9月24日济南沦陷于共产党人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筹划一个更大的战役，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省和徐州的主力。面对东北迅速恶化的军事局势，国民党政府决定在京沪铁路的两侧进行部署，以防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前进。

解放军战略

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粟裕向共产主义战争委员会提出了一项作战计划。计划是包围仍驻扎在山东省的国民党第六，第七军。该委员会迅速批准了这

一计划，并下令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陈毅（华东野战军指挥官，并联络中原野战军）和邓小平（中原野战军政委）的领导下进攻国民党在河南和安徽的驻军，以对山东进行突击。

战役

徐州的包围（1948年11月6日至22日）

当国民党第六，第七军开始穿越大运河撤退到徐州时，他们落后于原定的时间表。第七集团军黄百韬中将不得不等待三天，才能等到第九战区的部队到达，因此，过境之前，几个桥头堡没有固定。11月8日，23,000名国民党军队叛逃到共产党一侧，使第7军到徐州的撤退路线暴露了出来。解放军70,000名士兵包围了徐州以东的第七集团军的主要部队，并在他们越过河流时拦截了剩余的国民党军队。徐州国民军驻军指挥官杜聿明，决定进攻中原野战军并占领关键的铁路站点，以打破对第七军的围困。但是，蒋介石和刘峙认为计划过于冒险，否决了他的计划，并命令徐州驻军直接营救第七军。

共产党根据间谍情报以及正确的推理，预料到了徐州驻军的行动，因而将超过一半的华东野战军部署到阻击徐州国民党军队的位置。更重要的是，第二军司令部司令官、陆军中将邱清泉，与第七集团军黄百韬中将（由共产党秘密特工制造的摩擦）有个人争执，错误地相信了他在先前的战斗中所得到的错误情报，所以没有将他受美国训练有素的第五军团投入战斗。

由李弥中将指挥的第13军确实进行了尝试，但被共产党军队阻挡。第七军在没有补给和增援的情况下成功地坚持了16天，在被摧毁之前对解放军造成了49,000人伤亡。黄百韬于1948年11月22日在其总部自杀。

双堆集战役（1948年11月23日至12月15日）

随着第七集团军的不复存在，徐州的东翼完全暴露在共产党的攻击之下。国民党政府中的共产党同情者设法说服蒋介石将国民党总部迁至南部。与此同时，中共野战军拦截了由河南来的黄维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二军的增援部队。第八军和第六军试图打破共产党的围困，但无济于事。经过近一个月的流血冲突，第十二军也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新近被俘的国民党战俘加入了共产主义军队。只有黄的副指挥官胡琏中将在一辆装甲坦克上，设法与8000名幸存者一起穿透了共产党的包围，但在突围中受了重伤。

蒋介石曾经试图拯救第十二集团军，并命令仍在徐州驻军总部的三支军队转向东南，于1948年11月30日前往解救第十二集团军。但是，解放军追上了与他们（根据共产党间谍的情报）；他们在距离徐州仅9英里处就被包围。

徐州沦陷（1948年12月23日至1949年1月10日）

12月15日，第12军被歼灭，与此同时，孙元良指挥的第16军也努力突围。尽管孙本人安全地到达南京，但在此过程中，他的大多数官兵被杀害或被俘。杜聿明决定按照蒋的命令坚守下去。作为中华民国军队中最有才能的战略家之一，杜聿明针对目前的绝望局势提出了三种不同的选择：首先，召回驻守西安和武汉的中华民国军队，与共产党战斗；第二，等待增援；第三是自己突围。当蒋介石选择风险最大的选项时，他感到失望：命令他们自己突围。超过一个月的大雪，使中华民国空军无法为被围困的地面部

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随着粮食和弹药的减少，许多中华民国士兵杀了他们的马以养活自己，共产主义部队利用粮食诱使中华民国军队投降。大约有10,000士兵这样做。1949年1月6日，共产党军队对第13军发动了总攻，第13军的残余人员撤退到第2军的防御区。四天后，共产党部队俘虏了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在试图与部队突围时开枪自杀。只有李弥将军才能够逃回南京。

后果

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经过黄埔训练的部队遭受的沉重损失，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前政治对手的压力下，蒋介石宣布退位。当人民解放军接近长江时，有利的势头完全移向了共产党。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解放军跨过长江，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失去美国的支持；美国的军事援助逐渐停止。